

列寧工作室 ■ 精選文庫

# 現代世界體系

(第二卷)

重商主義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鞏固

(1600 ~ 1750)

〔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著



К. МАРКС ЭНГЕЛЬС.  
РЕВОЛЮЦИЯ ВПЕРЕД  
ВСЕХ ЕМ  
И НАЗАД  
ЩИХСЯ



重商主义与  
欧洲世界经济体  
的巩固 (1600-1750)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著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V.2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世界体系

第2卷

II

# 现代世界体系

## 第二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

吕丹 刘海龙 译

侯树栋 王勇

庞卓恒 主译兼总审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01-1995-340号

COPYRIGHT©1980, BY ACADEMIC PRESS, INC.

中文版©1997, 高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根据学术出版公司1980年版译出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 System V. 2**

Mercantilism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1600—17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 第二卷: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  
(1600—1750)/[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 庞卓恒等译. —北京: 高  
等教育出版社, 1998. 4(2000重印)

ISBN 7-04-006165-1

I. 现… II. ①沃… ②庞… III. 经济-概况-世界 IV. F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5808 号

---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54588 传 真 010-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1998年4月第1版

印 张 15 印 次 2000年11月第3次印刷

字 数 380 000 定 价 28.00 元

---

凡购买高等教育出版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  
质量问题, 请在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序言：十七世纪的危机？ .....	1
第一章 B阶段 .....	12
第二章 荷兰在世界经济体中的霸权地位 .....	44
第三章 中心区的斗争——第一阶段：1651—1689 .....	95
第四章 缓慢增长时期的边缘区 .....	169
第五章 十字路口的半边缘区 .....	237
第六章 中心区的斗争——第二阶段：1689—1763 .....	333
索引 .....	401



## 序言：十七世纪的危机？

历史学家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价格趋势的研究<sup>1</sup>，以弗朗索瓦·西米昂德 (Francois Simiand)<sup>2</sup> 提出经济周期理论 (约 250 年经历一个上升和下降周期的趋势) 和两阶段 (A 和 B) 的划分为指导，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似乎迄今还被广为接受的关于欧洲近代早期历史的总的概括，即 16 世纪为扩张阶段 (A 阶段)，17 世纪为紧缩、萧条或“危机”阶段 (B 阶段)。虽然关于这两个阶段的时间划分，出现的诸多变迁的性质 (即使我们把讨论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之内)，地区间的差异，特别是变动的后果与原因，都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这个总的概括却始终未变。

1953 年，罗兰·莫斯尼尔 (Roland Mousnier) 写了一部论述这 200 年历史的巨著 (该书自问世以来已出版了四个修订版)。在阐述 17 世纪——即被确定为 1598 年至 1715 年这段时间——这一部分时，他用一种戏剧性的颤音语调作为其开篇之词：

17 世纪是一个危机时代，它从整体上影响着人，影响到人的一切活动——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科学、艺术的活动——以及人的整个存在，影响到人的生命力、情感和意志的最深处。这场危机可以说是连绵不断的，只不过伴随着强烈的上下波动。<sup>3</sup>

这部著作问世后的第二年，E.J. 霍布斯鲍姆 (E.J. Hobsbawm) 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曾掀起一场学术大争论的文章。该文认为“欧洲经济在 17 世纪经历了一场‘总危机’，即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全面转化的最后阶段”。<sup>4</sup>

类似的论点在威廉·埃贝尔 (Wilhelm Abel) 与 B.H. 斯利彻

· 范巴思(B. H. Slicher Van Bath)对欧洲农业的权威性研究中也可见到。在埃贝尔看来,“17世纪的后半期至18世纪的前半期,欧洲价格主要呈下降的趋势”。<sup>5</sup>的确,斯利彻·范巴思是不愿意用危机一词的,他认为1650年至1750年这段时期是“一段不同寻常地被拉长了的萧条时期”,<sup>6</sup>但这是否就相差很大呢?无论如何,他并没有反对埃贝尔的观点,即这段时期反映了一个“周期性趋势的逆转”。<sup>7</sup>假如我们引用更为审慎的用语,我们就可能进一步扩大这种学术观点的一致性。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提到了“17世纪的相对衰退”;<sup>8</sup>皮埃尔·肖尼(Pierre Chaunu)则将A阶段和B阶段之间的差别解释成不是“增长[与]衰退的差别”,而是“增长[与]欠增长”的差别。<sup>9</sup>勒内·巴勒尔(René Baehrel)是最不情愿想像有全面危机的人;但连他也采纳了这一概念,运用于1690年至1730年这段十分明确地限定的时期。<sup>10</sup>随着术语的含义越来越淡化,表明危机的时间越来越缩短,我们不知还有多少实质内容保留下来。伊沃·舍费尔(Ivo Schöffler)以一种疑虑的语调为他论述这一时期的一篇文章作开篇之词:

那被镶嵌于16世纪和18世纪之间的17世纪,有时看起来像是没有独具一格的特点。一方面由于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我们所得到的关于这个位于二者之间的世纪的情况仅仅是一些诸如“过渡”和“变迁”之类的模糊不清的术语。<sup>11</sup>

正如让·默夫雷特(Jean Meuvret)在1944年指出的那样,或许这仅仅是因为对于两个价格明显上涨时段之间的这一时期,“我们所知太少”。<sup>12</sup>那么,我们是否就应拒绝阐明这一时期的特点,而听任这个时期陷入那些含糊不清、有时甚至连资料也混乱不堪的复杂状态中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同意舍费尔所说:“这可能是传统主义妨碍我们作出更好的判断,但是我们确实应该给17世纪一



个应有的位置。我们的想像需要它”。<sup>13</sup>

要不是因为术语争论背后有着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决策当成是文学中流行的奇思妙想。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诸如经济的“长期趋势”那样的东西是否真正存在，<sup>14</sup>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们与政治和文化是什么关系。假定这些长期趋势确实存在，那么每一对前后相继的阶段（中世纪至现在）是否都如加斯顿·英伯特（Gaston Imbert）所说的那样，反映了一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呢？<sup>15</sup>或者如斯利彻·范巴思所说的那样，它们都是从大约 1150 年延续到大约 1850 年的“间接的农业消耗”这一漫长时期的组成部分呢？<sup>16</sup>或者说在这当中的某处是否还存在着一次重大的断裂呢？如果存在一次重大的断裂，那么我们就面临着它何时发生的另一个问题。

对最后这一问题，有几种常见的说法。一派认为根本性的突破，重大的断裂是随着 18 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而发生的。在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看来，这一“事件”与公元前 8000 年的农业革命都代表了“历史进程连续性中的深刻裂口”。<sup>17</sup>D.C. 科尔曼（D.C. Coleman）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在 1500 年至 1750 年间的欧洲经济发展中，延续多于变化：“仔细考察，从总体看，1500 年至 1750 年的工业技术停滞多于变动”。<sup>18</sup>同样，在界定断裂的时间上，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得出了相同结论，如巴利巴尔（Balibar）坚持认为，1500 年至 1750 年是“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1750 年以后是资本主义确立时期。<sup>19</sup>与巴利巴尔持同样观点的 G.N. 克拉克（G.N. Clark）区分了中世纪晚期的“早期资本主义”和 19 世纪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并清楚地划分了“从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至伯克（Burke）<sup>[1]</sup>，从哥伦布（Columbus）至沃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sup>[2]</sup>，从福格尔家族

[1]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政论家；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辉格派政治家、政论家和演说家。——译者

[2] 哥伦布（1451—1506），原籍意大利的西班牙航海探险家通往美洲的新航路开辟者；沃伦·哈斯廷斯（1732—1818），英国殖民统治者，曾任英属印度总督等职。——译者

(Fuggers)至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衰落<sup>[1]</sup>,从焦托(Giotto)至蒂耶波罗(Tiepolo)<sup>[2]</sup>的第一阶段的界限。它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sup>[3]</sup>,拿破仑(Napoleon),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之时嘎然而止<sup>20</sup>。”

另一思想流派认为,断裂包含的不是工业革命,而是在“延长的”16世纪左右出现的欧洲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建立,以及资本主义的崛起。例如,西米昂德就把16世纪视为长波期的开端。<sup>21</sup>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则抨击巴利巴尔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他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工场盛行时期”(大约1500年至1750年)和“近代工业时期”不是“两种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的两个阶段”。<sup>22</sup>因此,这种断裂就发生在16世纪。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虽然更加扩展了这一时期,但仍得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

事实上,很明显,从一种经济观点来看,13世纪至17世纪大致构成了欧洲和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它在经济上向“旧制度”(Ancien Régime)提出了有力挑战。<sup>23</sup>

第三种观点认为断裂点发生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与延长的16世纪之间。他们把17世纪中叶视为近代的转折点。霍布斯鲍姆似乎持这种观点,皮埃尔·肖尼把这种观点作为其关于“古典欧洲”的真正的综合主题。在他著作的序论中,他特别反对那些

[1] 富格尔家族,14世纪中叶发迹于德意志的奥格斯堡,后发展成为大金融、工商业家族,15—17世纪活跃于欧洲国际舞台,17世纪末破产;阿姆斯特丹港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曾是欧洲世界贸易的最大港口,18世纪后期趋于衰落。——译者

[2] 焦托(1266—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画家;蒂耶波罗(1696—1770),意大利画家。——译者

[3] 罗斯柴尔德家族,活跃于18、19世纪欧洲国际舞台的犹太大金融家族。——译者

没能看到在斯宾诺莎 (Spinoza) 著作中已经可以见到“法国大革命的理性起源”的学者, 以及那些忘记了 16 世纪的“数量和空间的扩张”并非是一种真正深刻的变化, 而仅仅是“一场 12 世纪就开始的革命的最后结果”的学者们的观点。肖尼认为, “最重要的质变发生在 17 世纪”, 而首要的质变是“世界的数学化”。<sup>24</sup> 在每一问题的每一个方面, 人们皆可见到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论证。例如, 这第三种可能的断裂点观点的倡导者, 就有一位是苏联院士 E.M. 茹可夫 (E.M. Zhukov)。他在 1960 年向聚集到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历史学家断言:

按照苏联历史科学界的观点, 中世纪一般的和终结的界限是 17 世纪中叶。这是因为封建制度那时在经济上已进入垂暮之年, 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sup>25</sup>

这样, 对一次断裂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年限, 即 1500 年左右, 1650 年和 1800 年; 三种 (或更多) 历史理论, 即: 主张 1800 年者, 强调把工业主义看成是一次剧变; 主张 1650 年者, 侧重强调第一批“资本主义”国家 (不列颠和尼德兰) 出现的时间, 或者强调笛卡尔 (Descartes)、莱布尼兹 (Leibnitz)、斯宾诺莎、牛顿以及洛克的主要的“近代”思想的出现; 主张 1500 年者, 侧重强调一个与其它经济模式相区别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随之而来的对于“17 世纪是危机时期吗”的质疑的回答, 取决于人们对于近代世界的看法。危机一词不应被贬成一个周期性转变的单纯的同义词。它应被视为一个剧烈紧张的时期, 不仅是一次危机, 也标志着一个长时段 (Longue durée) 结构的转折点。

因此, 危机可以反映那些罕见的历史时刻, 那时社会制度内的通常的补充机制在许多重要的社会角色看来是如此的无效, 以致开始对经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重建 (这不是一种单纯的制度内对利益的再分配), 这种经济的重建后来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当

然一场既成的危机并非真的不可避免；但是替代的出路就是旧制度的瓦解，它会使许多（多数？）社会角色认为那种选择比已经发生过的结构的革命更具破坏性或更令人讨厌。如果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危机的含义，那么“17世纪是危机时期吗？”就成为一个颇具重要意义的学术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指的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性的转化”是何时和怎样发生的？该问题的答案要求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产方式，以及一种文明。在我们对上述不同时期选择的同时，我们也就选择了相似与不相似的范围。

本书的论点是：现代世界体系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式，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欧洲延长的16世纪<sup>[1]</sup>便已产生了，它促进了一种特殊的再分配或纳贡式的生产方式，即欧洲的封建生产方式（布罗代尔所说的经济上的旧制度）向一种性质极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的转化。自那时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a)从地域上已扩展到整个世界；(b)已经显示出一种扩张和紧缩的周期模式（即西米昂德的阶段A和阶段B），而且不断改变着经济角色的地理位置（霸权的兴衰，特殊的中心区、边缘区以及半边缘区的起伏动荡）；(c)已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包括生产技术的进步，工业化，无产阶级化，以及对这种制度本身的结构性的政治抵制力量的出现——这种转化今天仍在继续。

从这种角度来看，如果把17世纪视为大体上覆盖着从1600年左右至1750年这一段时期，它首先就是一个扩张与紧缩的周期模式的范例。在世界体系包括的整个地域范围内，建立于1500年左右的若干疆界直到1750年以后才发生重大改变。就是正在进行着的长期变化过程，在1600年至1750年这段时间内也难以发现有任何显著的质的飞跃。因此，我们认为在延长的16世纪和17世

---

[1] 即本书第1卷第2章所引布罗代尔所言：“‘我们的’16世纪分成两个……第一个16世纪开始于约1450年，结束于约1550年，第二个16世纪开始于同一年代，而延续到1620年或1640年”。见中译本第1卷边码第68页。——译者

纪之间本质上存在着连续性，伴随着扩张(A)与紧缩(B)、增长与欠增长的重大差别。我们将如何为这种概述现实的方式提供证据呢？从某种程度上说，答案非常简单。我们将尽力辨别扩张与紧缩间可察验的差别，指出这种周期模式产生的原因，并且概括阶级结构、政治斗争以及经济命运转变中的文化观念等方面的结果。从这种经验的描述中，我们将尽力把一个转为庞大的社会历史变迁理论中的一部分即资本主义发展理论阐述得更为清楚。

我们认为，世界经济的范围尽管在1500年至1750年这段时期内大致一样，但是，1450年（或1500年）至1650年与1600年至1750年（这种时间上的重叠是人为的）这两段时期内，在资源分配、经济角色、富裕与贫困、雇佣就业的分布以及工业企业方面是有区别的。要证明这种观点并非易事；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需要若干种全新的系列的经济指标，从内涵上讲这是比较困难的，从外在形式来看，也许是不可能的。我们可能需要以25年为一时段的、反映奢侈品和必需品贸易的规模、价值和趋向的一系列前后相继的同时态图表，以及1500—1650年和1600—1750年的“累积的”图表。如果我们的设想正确的话，那么这样的图表就可以反映出主要从事必需品而非奢侈品的欧洲贸易运转的地域范围：它处于东欧和俄罗斯、土耳其所辖的巴尔干之间，还有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地中海地区；这些地域范围可能包括美洲，却不包括非洲和亚洲。

最重要的是，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这些图表除非把加勒比地区包括在内，就不会显示在1500—1650年与1650—1750年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外部地域范围的模式的重大差别。另一方面，在这两个时期之间的欧洲世界经济体所包括的范围之内我们会发现某些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模式的重大变化。工业的分布与集中将是不同的（或者至少在变化的过程中），正如在工业与农业间的贸易，各地的雇佣就业的百分比以及雇佣工人的实际工资等方面会显示的那样。不同的国家机器可能变强或变弱，工农业生产和

人口繁衍的增长率也可能发生变化。那些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也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变异，最为重要的是，每个地区所占有的世界剩余额的相对比例也会发生变化。

即使在阐明那些预料中的变化趋向，提出我们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以前，读者也会明白所需要的定量资料是极其稀少的——至多不过是一些局部的和零散的数字。特别欠缺的是能够证明有关世界经济的相关性陈述的全面资料。如果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诸多变异做出肯定的论断，情况就会更糟。我们应该在1500—1650年与1600—1750年。这两段时期内，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整体而非特定国家的疆界内，发现一些阶级结构的变化模式和种族—国家疆域界说的变化，但这方面我们拥有的资料更为稀少。在这里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分析零散的资料，对那些多少可信的材料加以概括，重新考察包含那些资料的解释性模式，提出一种理论上的见解，总结出一些我们经验上和理论上欠缺的概念。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去考察历史文献所指的17世纪的“危机”、“相对的倒退”或“欠增长”的内涵。

## 注释

1 参见布罗代尔和斯普纳(Spooner)所著文章的目录(1967, pp. 605~615)。

2 参见西米昂德(1932b)。

3 莫斯尼尔(1967, p. 161)。

4 霍布斯鲍姆(1965, p. 5)。

5 埃贝尔(1973, p. 221)。埃贝尔著作的德文第一版于1935年出版。第二版出版于1966年，经过修改并在内容上有所增加。埃贝尔说：“保留了总的框架”，但是“14—15世纪和16—17世纪的萧条时期被解释为衰退时期，并尽可能作了细分”(1973, p. 6)。埃贝尔认为两次萧条之间有一次回升。

6 斯利彻·范巴思(1963a, p. 206)。最近的两篇考察报告(奇波拉, 1974, p. 12; 戴维斯, 1973b, p. 108)都不愿意使用危机一词，虽然奇波拉补充说：“每一个简单概念的底蕴总有一点真理”。

7 这种说法出现在第五章第二部分的标题(埃贝尔, 1973, p. 206)。皮埃

尔·肖尼在一篇关于 17 世纪的文章的标题使用了相似的短语，“价格与活动主要趋势的逆转”(1962b)。

8 维拉尔(1974, p. 46)。他认为这一时期开始于 1598—1630 年, 结束于 1680—1725 年。

9 肖尼(1962b, p. 224)。这与西米昂德对阶段 B 最初的描述相近:“并非是阶段 A 的逆转, 而是……一种微弱的增长或一种平衡, 不再是继续增长”(1932b, p. 649)。

10 巴勒尔(Baehrel)(1961, p. 29), 像肖尼一样, 巴勒尔认为阶段 B 未必就是一种衰落, 而仅仅是一种缓慢的发展(1961, p. 51)。其他人也认为这一时期特别艰难。勒·鲁瓦·拉杜里(Le Roy Ladurie)认为是“(17)世纪最后的 20 或 30 年”(1973, p. 431)。雅卡特(Jacquart)认为是 1680 年至 1710 年(1978a, p. 385)。但是, 莫里诺(Morineau)发现了 1660 年至 1700 年间“大量可信的(有说服力的)迹象”(1978f, p. 523)。

11 舍费尔(1966, p. 82)。随着历史学家引人注目的活跃, 许多模糊的概念总会遭到排斥。“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地被划分为‘过渡时期’这充分表明了历史学家对变化的依恋。”(苏普莱[Supple]), 1959, p. 135)

12 默夫雷特(Meuvret)(1944, p. 110)。参见莫多·麦克劳德(Murdo MacLeod)有关西属中美洲(Spanish Central America)的论著开头所发出的类似抱怨:“不久前, 17 世纪还被看作是‘拉丁美洲被人遗忘的世纪’”(1973, xi)——在提到雷斯利·鲍伊德·辛普森(Leslie Boyd Simpson)所著题为“墨西哥被人遗忘的世纪”的论著(1953)时, J. V. 波利森斯基(J. V. Polisenský)以相同的语气说:“社会、经济以及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一直很关注‘更具革命性的’16 和 18 世纪, 却极少顾及 17 世纪”(1971, p. 2)。威廉·鲍斯马(William Bouwsma)“从一种历史观的角度”把 17 世纪称为“在两个过度发展区域之间的欠发达的边界区”(1970, p. 1)。

13 舍费尔(1966, p. 83)

14 弗兰索瓦·克鲁泽(François Crouzet)在 1971 年时提到“像西米昂德的阶段 A、B 那样的陈旧概念”(1971, p. 147)。这时来自左翼的吉勒斯·波斯泰尔—维奈(Gilles Postel-Vinay)发起了类似的攻击, 他指出:“A 与 B 两阶段……证明是由于忽略地租分析引起的实际问题而必定要采取的方式”(1974, p. 78)。

15 G. 英伯特(G. Imbert), 在有关长波的论著中(1959), 区别了四种长

期趋势,每一种趋势与一种经济形式相对应:

1250——中世纪经济

1507—1510——重商主义经济

1733—1743——资本主义经济

1896——计划经济

16 斯利彻·范巴思(1963a, Pt. III)。

17 奇波拉(1964, p. 31)。

18 科尔曼(Coleman)(1959, p. 506)。这是一篇评论《技术史》第三卷的文章,科尔曼把它作为其论点的证据。同时参见勒·鲁瓦·拉杜里(1977)就1300—1320年与1720—1730年间“静止的历史”的论述。

19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这种时期分法。然而艾廷纳·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自觉地把“过渡时期”与一种生产方式盛行或“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作了理论上的区分(1968, pp. 218~226)。

马克思主义者内部讨论这一分期问题的明朗化的争论,出现在1940—1941年的《劳动月刊》(*Labour Monthly*)上。这场争论围绕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最早的一批关于英国革命的论著而展开。彼得·费尔德(Peter Field)指责希尔把1640年的英国看成“本质上还是封建的”。费尔德认为,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16世纪的英国“显然是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是正确的;16世纪的社会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确,与比利时的利奥波德(Leopold of Belgium)相比,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显赫的资本家”(费尔德,1940a, p. 558)。道格拉斯·加曼(Douglas Gaman)认为,费尔德“错把蛋当成鸡”,如果资产阶级革命在1640年以前就爆发了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问,是什么时候?”(加曼,1940, p. 652)。费尔德答复说,加曼先生“忘记胚胎和出生并不相同”,而且“以玫瑰战争(the War of Roses)为开端——资产阶级利用封建主的集体毁灭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进而)通过农民起义、没收教会地产、恩典朝圣(the Pilgrimage of Grace)(以及)北方伯爵的崛起,资产阶级社会已经产生”(费尔德,1940b, pp. 654~655)。

由此,多纳·托尔(Dona Torr)竭力为一种非常明确的阶段理论作辩护。她说,费尔德的错误在于认为社会从封建主义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因此“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小商品生产的中间阶段”。她说“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只是在14世纪英国庄园经济“解体”以后400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



生而得以存在(托尔,1941,p.90)。

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在论述与多纳·托尔相同的问题时,采取了一种折衷态度。一方面,他不同意托尔把资本主义的时期定在工业革命的观点。他说,如果这么讲,“如何能把17世纪的斗争看作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难道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就存在?”此外,他说,那种认为“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的英国与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相比是一个‘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是要回避这一问题”。多布对此问题的解答是,这时“即使生产力还保持其中世纪的形态,生产关系(可以说已发生了变化)”。因此,应正确地把16世纪的英国看作其“生产方式已经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多布,1941,p.92)。尽管多布的观点避免了托尔的观点容易导致的陷阱,但是正如多布后来的著作所表明的,他的看法与托尔的观点并无根本的不同。

几年后,希尔就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国革命的观点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是指“封建国家被其内部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所推翻,一个新的国家建立起来,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希尔列举了许多事例,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如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资产阶级精神对旧秩序的第一次进攻”);尼德兰革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取得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1848年流产的德意志革命;以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1917年的二月革命(1948,p.135)。这篇文章集中于政治表现和权力,回避了对经济的直接描述。因此,它没有能解决费尔德提出的问题。

20 G.N. 克拉克(G.N. Clark)(1960,pp.10~11)。

21 西米昂德(1932a,p.3)。

22 斯威齐(Sweezy)(1972a,p.129)。

23 布罗代尔(1974,p.6)。

24 肖尼(1966a,pp.20~21)。

25 茹可夫(Zhukov)(1960,p.85)。茹可夫特别注意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把法国革命当作转折点,但是俄国人却不同意。

## 第一章 B 阶段

在斯利彻·范巴思看来，欧洲自加洛林时代 (Carolingian era) 以来，农业的膨胀与紧缩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谷物价格相对于其它商品和工资而出现的上涨和下跌。这是一个对谷物贸易条件有利或不利的问題。他看到从 1600 年(或 1650 年)至 1750 年这一时期内谷物的紧缩，因而存在不利的贸易条件。<sup>1</sup> 因为斯利彻·范巴思相信小麦价格的相对下跌远比其他绝对下跌重要，因此，强调这种紧缩的内涵十分必要。<sup>2</sup> 与贸易条件的变化并行的(暂时避开所有因果关系的设想)是 K. 格拉曼(K. Glamann)所说的发生在 1650 年左右的“大宗的东、西方谷物贸易”中的转折点，其原因显然是“南欧和西欧(好像)对谷物已日益自足”。<sup>3</sup> 自足的原因是“17 世纪后半期的西欧在粮食产量提高的同时，人口的增长却普遍停滞”。<sup>4</sup> 从而可能导致了供过于求。然而，格拉曼在这同时也发现“胡椒的供应已在欧洲达到饱和”。<sup>5</sup>

但当时似乎存在着食物短缺的问题，怎么会会出现供过于求呢？舍费尔认为“从 14 世纪的灾难直至 18 世纪”，存在于欧洲的“永久性的、有时是潜在的结构性的现象”首先是“粮食的生产和分配与人口的粮食需求之间持续的紧张”，结果造成“营养不良，饥馑流行”。<sup>6</sup> 多梅尼科·塞拉(Domenico Sella)认为近代早期的富足依赖于“粮食的供应是否与人口的增长保持平衡”，而另一些人认为生产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显然，我们遇到了一种不规则现象，只有对事件的顺序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才能作出解答。我们且首先看一看其它事件的发生情况。

17 世纪农艺方面的某些变化如下：垦荒过程至少放慢了，可

能已停止了,还有可能倒退了。不同于 16 和 18 世纪的“创造土地”的时代(按肖尼巧妙的比喻),17 世纪,特别是在 1650 年以后,是一个“巩固”时期,但这种巩固却“毫无价值”。<sup>8</sup> 不仅耕地面积不再扩大,在 1600 年至 1699 年这段时期谷物的平均产出率在整个欧洲下降了,大麦和燕麦比小麦和黑麦的下降幅度更大。中欧、北欧、东欧各地下降得比西欧更厉害。<sup>9</sup> 德·马达伦纳(De Maddalena)称这种产出率的下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sup>10</sup> 农艺方面的另一个变化是对栽培作物的选择:首先,在较寒冷的地区将种植谷物的土地变为牧场,在较温暖地区则改种葡萄;<sup>11</sup> 其次,从种植谷物转向更多地生产饲料作物、需要密集劳动的蔬菜以及经济作物(亚麻、大麻、蛇麻草、油菜籽、茜草和大麦);<sup>12</sup> 其三,从高价的谷物(黑麦与小麦)转向低价的谷物(大麦、燕麦和荞麦),<sup>13</sup> 并且减少购买生产谷物所需的肥料(腐殖土和石灰泥)。<sup>14</sup>

随着这些纯农艺上的变化,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也发生了诸多的转变。德·马达伦纳认为,17 世纪时,“农民阶级的处境普遍恶化”<sup>15</sup>,在这期间,“地主以‘目前的迫切需要’为借口继续没收以前属于农民的农田”。<sup>16</sup> 他还注意到“对公有财产的 1/3 的剥夺——称之为劫掠可能更贴切——由此产生‘三开地’一词”。这就减少了农民有权放牧和采樵的地段。<sup>17</sup> 斯利彻·范巴思也认为农村居民遭受了城镇居民远不能匹比的痛苦,但是他一方面区分了小农场主和茅屋农,另一方面也区分了雇工和家仆,前二者的处境比挣工资的后二者的境况“相对来说更为糟糕”。<sup>18</sup> 默夫雷特对此作出了十分清楚的解释:

在那些因小麦的价格低而抱怨利润微薄的自耕农或佃农看来,众多的雇工或工匠都为价格低廉而感到欣慰;当他们必须购买小麦时,那样的良机是极为罕见的。<sup>19</sup> 总的来看,斯利彻·范巴思认为自耕农和佃农(*femiers - propriétaires*)经济地位的恶化是与租佃地的减少,特别是与小租佃农场主

(petits fermiers)数量的减少并行发生的。<sup>20</sup>与这两种减少同时发生的是农业耕作单位(exploitation agricole)规模不断扩大。<sup>21</sup>然而,尽管耕作单位扩大,使用的劳动更多,17世纪农业耕作的设备与16世纪相比却没有多少改进,虽然用于日常生产的农具有较多的革新,如搅乳器的革新。<sup>22</sup>

工业与农业一样,据说在17世纪,就已丧失了其自身的“加速力”,虽然其时间较农业稍晚。<sup>23</sup>但是从整个欧洲的生产来看,其影响并不清楚。塞拉指出,其波动相对而言是微弱的,因为16世纪人口增长之时,实际工资降低了,因而情况“基本没变”;然而1650年后,人均收入增加之时,这种个人需求的增长“可能[在总体上]部分地由于人口数目的减少而抵消”。<sup>24</sup>霍布斯鲍姆坦率地指出了这种分析方法的不可靠性:“生产怎么样了?我们全然不知”。<sup>25</sup>

我们好像确实知道的是工业的场所发生了变化。斯利彻·范巴思认为,“众所周知,农业紧缩时期——中世纪末和17世纪——乡村工业开始出现,尤其是纺织工业”。<sup>26</sup>人们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就业不足的乡村劳动对工业既有吸引力而且便宜。由于这种工业所需固定资本的比率很低,至少18世纪中叶前是这样,因而,罗马诺(Romano)指出:“这样,特别容易使经营得到补偿,收回投入的资本。”<sup>27</sup>对纺织工业而言这可能是真的,但是,这种论点却难以应用于当时三种重要工业中的另外两种(根据罗马诺本人的排列)——矿冶业和造船业。<sup>28</sup>纺织生产向乡村地区的转移,与那些无比重要的新工业——啤酒酿造、蒸馏造酒、以及软糖生产等所有以谷物转化为基础的部门的建立,是结合在一起的。<sup>29</sup>

显然,与日益下跌的谷物价格相对照的是日益增加的实际工资。“17世纪的后半期……当粮食价格趋于下跌时……工资率却保持了稳定或者说没有下跌到同样的地步”。<sup>30</sup>当然,这与发生在

延长的 16 世纪的情况相反。<sup>31</sup>大致地说,这部分是由于工资的相对“稳定”,但更多的是因为“1625 年至 1750 年间,欧洲各地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劳工短缺”。<sup>32</sup>如果真是如此,我们怎样把它和 17 世纪这样一个被认为是不能充分就业的高失业期的事实协调起来呢?如格拉曼所指出的那样:

雇佣工人的实际工资可能已经有所增加。尽管由此可以推断他已就业,但在一个以经济形势的紊乱为特征的时代却不能这样认定。无论如何,17 世纪的许多讲经济问题的著作家认为,在他们的社会中就业不充分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sup>33</sup>

价格(不管是谷物还是雇佣劳动)的任何讨论,在这一时期都被名义价格与贵金属价格的关系所搅乱。<sup>34</sup>如莫斯尼尔指出,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不是仅仅看以记帐货币计算的名义价格,而是用贵金属的相应重量的价格进行计算,价格的下跌在许多国家就比乍看起来的情况更为厉害。”<sup>35</sup>因此,如维拉尔所说,假如我们看一下贵金属价格,那么,“一个肯定的事实是:在国际上,白银的价格大约在 1660 年下跌,并在 1680 年降到第一个低点,在大约 1720 年至 1721 年无疑降到了第二个低点”。<sup>36</sup>随着流通中贵金属数量的减少,贵金属价格的跌落必然会得到控制。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阐述了整个形势:

总的说来,似乎可以肯定,欧洲的贵金属净存量在 1500 年至 1580 年在适度地上升;1580 年至 1620 年快速增长;可能在 17 世纪 20 年代开始下跌,因为从这时候起,欧洲白银的开采已经萎缩,美洲白银的流入量也急剧下降,直到 1700 年以后巴西的黄金开始流入。

无疑,可获得的货币数量的增长在欧洲是极为重要的。如果 1700 年还只拥有 1500 年时候那样一点有限的货币来

源,欧洲的贸易是无法运转的。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是,货币够用吗?欧洲货币净存量尽管增长很多,能与迅速增长的对支付手段的需求相平衡吗?若干迹象表明不是这样,尤其在1600年以后。<sup>37</sup>

不仅货币短缺,而且出现了相应的信贷短缺,以致如斯普纳指出,至少从1630年至1680年这半个世纪“银币、铜币、金币和信贷的总量(加起来)都几乎不能满足需要,从而导致货币活动局促而无生气。这是世界物质生活的普遍衰退的反映和结果。”<sup>38</sup>这就是被称为“17世纪的流行瘟疫”<sup>39</sup>的伪币盛行的原因。价格的这种变化对于全球的贸易量意味着什么呢?正如欧洲的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一样,实际上没有可以利用的全球数据。

弗雷德里克·毛罗(Frédéric Mauro)在其称之为洲际贸易关系的框架中把世界分为五个洲:欧洲、非洲、温带美洲、热带美洲以及亚洲。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完全恰当的地理分类,因为非洲和亚洲处于世界经济之外,而美洲则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区,而且由于毛罗把欧洲的核心区和边缘区置于同一个类别,因此忽略了关键性的资料。<sup>40</sup>尽管如此,考察一下他在表1中所列数值还是有用的;为了清晰起见,我将表中的安排作了变动。假如该表中的比较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往返于欧洲的贸易和世界范围的贸易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17世纪时,两者都反映出一个与其前和其后的扩张时期相反的停滞的间歇期。

再看一看人口这个重要的变量,我们发现人口统计学家的估计数字的变动幅度总是不大。莱茵哈德(Reinhard)和阿门高(Ammengaud)认为17世纪具有“如若不是……略有衰落(倒退),也是停滞不前”的特点,但不是一场“发生在14世纪那样的灾难性(危机)”;<sup>41</sup>Fr. 罗杰·莫尔斯(Fr. Roger Moles)说“尽管可怕的危机使其元气大伤,但是17世纪人口似乎仍然略有增加”。<sup>42</sup>这样,“略有衰落”,“略有增加”——简言之,保持平平。

表1 与前一世纪相比的五大区域和世界范围的  
洲际贸易涨落情况的比较<sup>a</sup>

地区	世纪		
	16	17	18
欧洲	增长	停滞	增长
非洲	停滞	增长	增长
温带美洲	(接近零)	增长	增长
热带美洲	增长	停滞	停滞
亚洲	增长	下降	下降
世界范围	增长	停滞	增长

a: 选自毛罗, 1961a。

与 1450 年或 1500 年至 1650 年 (A 阶段) 这个时期相比较, 以及与 1750 年以后的时期相比较, 1600 年至 1750 年 (B 阶段) 这一时期, 从总的欧洲经济模式考察中所展现的是一幅经济停滞的图景, 一个喘息、忧虑和重组的时代; 但是, 它是不是像 1300 年至 1450 年出现的“封建主义危机”那样, 也是一场“危机”呢?<sup>43</sup> 似乎不像, 因为尽管“其主要的特征一样”, 但是, 1650 年至 1750 年的“萧条比起中世纪末期的那次严重的经济衰落来远为温和”。<sup>44</sup> 如果这是真的, 就必须做出解释。我们提供的解释是: 1600 年和 1750 年之间的萧条, 不像 1300 年和 1450 年间的那样, 并不是一场“危机”, 因为难关已经越过, 困境已经避开, 封建制度危机已基本得到解决。因此, 17 世纪的萧条发生在一个活跃的、前进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中。它是这种体系以后将经历的多次世界性紧缩或萧条的第一次; 而这种体系已被充分地置于世界经济范围内的政治统治阶层的利益之中, 这些阶层不会去破坏这个体系而是相反, 他们大体上 [grosso modo] 会联合一致地去寻求一些手段, 利用那些手段使该体系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特别是在经济紧缩时期, 更是如此。

这个资本家阶层在 17 世纪还是一个大杂烩，几乎还没形成具有一致性的阶级结构，而且确实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统治、支配和获利的某些权利、完全具有自觉意识的阶级；但是他们已经很有能力面对可能出现的机会去获取利益。正如让南(Jeannin)在解释了但泽商人于 1600 年左右做出的一些极为复杂的计算之后所说：他们的“计算方式表明，他们已经理解了利润机制。他们进行交易的方法使人们可以认为，他们已经理解了‘贸易条件’概念的最艰深的含义”。<sup>45</sup>人们能够从贸易条件的变化去衡量利润，这促使我们对这个时期的经济行为作出重要的解释。正如维拉尔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该太注重价格的上下波动，而应该注意价格“运动中的差别”。<sup>46</sup>

这些差异既包括时间顺序又包括地域分布。它们的重要性并不单纯在于可以获取的利润，而在于对整个体系的影响。托波尔斯基(Topolski)指出，这种紧缩并不是一场“由经济活动的衰减导致的停滞、间歇和萧条意义上的普遍的经济危机”；而是在整个体系内表现出“日益增长的不平衡”的时期。<sup>47</sup>日益增长的不平衡不能与紧缩相提并论；在紧缩时期，不平衡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促使资本集中和不断积累的因素之一。维拉尔作出了很好的解释：“每当面临普遍的紧急关头，不同国家的反应各不相同，因此，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创造着历史。”<sup>48</sup>

我们再来看看塞拉所说的“经济活动中地域分布的戏剧性变化”，<sup>49</sup>但不是转向学术上令人失望的传统模式，因此，我们必须“避免一般化”。<sup>50</sup>我们还是牢记斐尔南·布罗代尔对力求精确性的补充说明：“由于没有任何单一事态：我们必须显示出一系列同时发生而交错重迭的历史。”<sup>51</sup>尽管学术界在细节问题上还有许多歧异，但主要的地域划分却取得了普遍的一致。霍布斯鲍姆在“普遍危机”的讨论中提到“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得以相对地免遭危机”，<sup>52</sup>这里他指的是联合省<sup>(1)</sup>和英国。然而，在另一次讨

[1] 指荷兰。



论中，他把“欧洲经济”分为四个区，其中三个地区据称在经济上已有一定程度的衰落（这里无意将它们排出顺序）。这些“在中世纪有着古老的‘发达’经济的地区是：地中海—德意志西南部”；“海外殖民地”；“波罗的海腹地”；以及“新兴的‘发达’地区”。在第四个区域，出现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势，不仅有荷兰和英国，而且还有法国。<sup>53</sup>

罗马诺的地域分析更具层次性：

在英国和低地国家，这场危机具有重要的释放性影响；在法国，却没有释放出能量，但是肯定留下了日后结果的种子；在欧洲的其它地区，除了衰退，别无所有。意大利无疑被包括在内，打上了衰退的标志。<sup>54</sup>

奇波拉对罗马诺的地域分析略作了补充：“17世纪对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而言，是一个黑暗的世纪，对法国至少也是灰暗的。但对荷兰来说却是黄金时代，对于英国，若不是黄金时代，至少也是白银时代”。<sup>55</sup>托波尔斯基用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描述了这幅图画的层次，区分了具有巨大潜力的地区（英格兰及联合省），缓慢发展地区（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德意志、波希米亚以及除波兰之外的东欧、中欧的其它国家），以及停滞或倒退的地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以及波兰）。<sup>56</sup>尽管细节上不同，但在作为组群的地域分类上似乎是一致的。

现在我们看一看时间的分类，在这方面比按地域分析更加混乱：紧缩时间因国家而不同，而且名义价格和白银价格也有差别；甚至对特殊的国家和特殊的价格种类，分析家们也众说纷纭。布罗代尔和斯普纳对价格资料考察后得出的论点很简单：“16世纪的终结与其开端一样难以确定”。<sup>57</sup>他们发现，贵金属的价格“在1590年至1600年的欧洲南部；1600年至1630年或许至1650年的欧洲北部”呈现出上扬的长期趋势的逆转。但是，对于名义价格，

他们却发现相继出现三种迥然不同的运动模式：一种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左右的德意志；一种出现在17世纪中期的锡耶纳(Siena)<sup>[1]</sup>、埃克塞特(Exeter)<sup>[2]</sup>、拉古萨(Ragusa)<sup>[3]</sup>、那不勒斯<sup>[4]</sup>、阿姆斯特丹、但泽以及巴黎等不同的城市；一种出现在1678年的卡斯蒂利亚(Castile)<sup>[5]</sup>，这个城市出现的价格模式“极不一致”。他们说，“名义价格只是在英国完全跟随着白银价格，在荷兰则是名义价格与白银价格紧密相连。”请注意我们所说的这两个国家是如何再次出现的。在所有其它国家中，在名义价格与白银价格之间则存在着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延续时间短则10年，在卡斯蒂利亚则长达3/4个世纪。“连续不断的通货膨胀……使名义价格在这些国家中不断上扬”。<sup>58</sup>

这里我们有一条珍贵的线索可供追寻。当世界经济出现紧缩时，通货膨胀会是一种相对衰落的模式吗？人们能说名义上的通货膨胀程度，特别是相对于贵金属价格作衡量时，是衡量相对衰落的尺度吗？当我们考察不同的时段时（这些时段的划分标准往往是模糊的），应该记住这个问题。根据斯利彻·范巴思的看法，西班牙的萧条大约开始于1600年，在意大利和中欧部分地区大约开始于1619年，在法国和德意志部分地区大约开始于1630年，在英格兰及联合省大约开始于1650年。1640年至1680年的中欧和1720年至1740年间的联合省，情况最糟。这次萧条于1730年在英国和法国结束，在德意志是1750年，在联合省是1755年。“经济上发达地区诸如英国和荷兰能抵抗更久。那些重要的生产国——16世纪时它们是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产区——几乎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sup>59</sup>

---

[1] 锡耶纳，位于意大利中部。——译者

[2] 埃克塞特，位于英国西南端。——译者

[3] 拉克萨，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南部。——译者

[4] 那不勒斯，位于意大利南部。——译者

[5] 卡斯蒂利亚，位于西班牙东海岸中部。——译者

维拉尔在利用白银价格作参照物时，发现了两种主要的模式——一种出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它们的衰落开始较早（1600年至1610年间），结束也早（1680年至1690年间）；另一种出现于北欧地区，其衰落开始于1650年至1660年，一直持续到1730年至1735年。在这种分类中，法国是以一个分裂的国家出现的，在那里，“与马赛相连接的地中海的米迪（Midi）更接近西班牙，而不是博韦（Beauvaisis）”。<sup>60</sup>肖尼也发现了两种同样的模式：一种是“地中海和西属美洲的早临趋势，另一种是与巴西和印度洋保持着有点奇特的联系的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延迟趋势”。<sup>61</sup>

但是，埃贝尔根据25年间谷物的白银价格的平均数提出一种稍微不同的分类，他从总体上归纳为一种“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前半期”的下降趋势。<sup>62</sup>他说，这适合于英国、西属尼德兰、法国、意大利北部、联合省、丹麦和波兰，但不适用于德意志和奥地利，因为它们的“价格曲线自17世纪的最后25年以来呈上扬趋势”。<sup>63</sup>实际上，仔细看看埃贝尔的图表就会发现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其中有两个突出事实。其一，最大的价格反差可能出现在1650年，此时，波兰的价格明显地高，德意志则低。其二，波兰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最大的价格波动，大致上从1650年的最高点跌到1725年的最低点。（德意志偏离标准的程度小得多）。在寻求一种解释的总体框架时，不应忽视波兰的这种明显的波动；但是，目前还是看一看德意志吧，因为有一部篇幅浩大的著作已经提出了三十年战争在德意志的“衰落”中所起的作用的问题。

1962年，西奥多·拉布（Theodore Rabb）在研究这部著作时，描述了两个思想流派，即“灾难性战争”派和“早期衰落”派（该派将三十年战争仅仅视为最后的打击）。<sup>64</sup>弗里德里希·吕特格（Friedrich Lütge）站在前一派的立场。在他看来，1560年至1620年间德意志的经济日益繁荣。它卷入了海外贸易，其工业种类繁多，收益颇丰。1620年以后，情况不再如此。因此，他得出结论：三十年战争是导致衰落的关键因素。<sup>65</sup>对此，斯利彻·范巴思的回答尤为

典型：“三十年战争毫无责任，因为德意志的衰落在16世纪后半期已经开始。”<sup>66</sup>为解决这场争论曾做出种种的努力。例如，卡斯腾(Carsten)就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战前衰落论：

即使可以认定多数德意志城镇在1618年以前就已经衰落，这也不能解释一场普遍的衰落，因为经济活动可能已从城市转入农村。德意志东北部的确是这样，在这里，16世纪时是一段和平和繁荣的时期，谷物出口日益增加，谷物价格飞速上涨。<sup>67</sup>

因此，城市的衰落未必就是一种消极的经济迹象。当然不能！它是一种边缘化的迹象。<sup>68</sup>此外，卡斯腾还发现上巴伐利亚，这个他全面考察的地区，在1608年以前的这一时期是“缓慢增长的繁荣时期”。因此，他建议应谨慎对待，需要作“更为详尽的考察和研究”。<sup>69</sup>卡斯腾坚持用我们集体的无知进行调和，拉布则以我们大家的知识“反映了(三十年战争以前的)德意志境内既有繁荣又有衰落，并且总是两者并存”，以此来加以调和。他也以谨慎的口气做了总结：

衰落的地区只占绝对少数的事实……使人不可能得出1618年以前的斗争比别的还要糟的结论……在最好情况下，也不过是说三十年战争触发了一场以前从未有过的衰落；最坏也不过是说它以灾难代替了繁荣。<sup>70</sup>

第三种折衷观点来自卡门(Kamen)。他承认“这场战争对大部分讲德语的地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场灾难”，但是他也指出“这场争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无的放矢的”，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称为德国的经济或政治单位，而且区分战前和战时的衰落总是不现实的”。<sup>71</sup>

所有这些全国性的“经济”估量都没有直接地考虑到三十年战争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既是全欧政治的结果，又是一次普遍经济紧缩的标志。J.V. 波利森斯基极力从整个欧洲的背景评论这场战争，他说这场战争应

被看作是两种文明观念冲突的范例。一种是源于人文主义遗产，带有新教色彩并把尼德兰联合省作为其模式的观念，另一种是以西班牙为典范的天主教—人文主义的观念，两者的冲突因此成为政治战线和强国联盟的出发点。<sup>72</sup>

这场波及全欧洲战争可能被当作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利森斯基虽然使用了谨慎的语句，但说到了关键点：

归纳这场冲突的一个前提是，在 17 世纪初期，如果不是存在一个经济联合体，至少也有一个交易结构和世界市场的初期迹象，其引力中心位于波罗的海、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整个地区。<sup>73</sup>

他的中心论点是认为，瓦扬斯坦(Vajnshtejn)所说“‘三十年战争’本质上是荷兰革命及其摆脱西班牙的解放运动的产物”这一观点是“无可争辩的”。对此，波利森斯基还补充说，“我们需要准确地了解一场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内革命是怎样成为全欧反对者的怪物的。”<sup>74</sup>以他看来，“荷兰因素”不仅在总结这场冲突中起关键作用，而且，最重要的结果是荷兰事实上在整个欧洲取得了胜利。他指出，正是荷兰取得胜利时，战争才得以结束：

1645 年，荷兰舰队首次控制了松德海峡和波罗的海商路。此时，荷兰省和阿姆斯特丹市的富商看到没有必要继续

与西班牙进行一场只有法国才会成为其中的胜利者的战争。

(1648年1月联合省与西班牙的)单独媾和立刻成为联合省共和国战胜西班牙以及荷兰战胜奥兰治公爵和尼德兰其余地区的胜利。这同样可以被视为阿姆斯特丹对所有其他荷兰商人的一次彻底胜利，而且战争的结束巩固了那些30年以前被奥兰治的莫里斯(Maurice)削弱的城市寡头政治的特权。<sup>75</sup>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荷兰的独立战争，尼德兰革命，既然早在1566年就已爆发，为什么直到1621年——即波利森斯基所说的“战争为荷兰阶段”(1621—1625年)的开端——才成为席卷全欧的熊熊大火，对此应作何解释？<sup>76</sup>它难道与罗马诺所说的1619年至1622年的危机没有丝毫关系吗？<sup>77</sup>很像是有关系。由那些年的严重危机<sup>78</sup>所标志的席卷全欧的紧缩，意味着政治控制的赌注更高了；而且战争破坏的代价对于参与者来说似乎比在紧缩时期脆弱的商业地位的潜在损失要小。从这方面来看，联合省参与了赌博而且赢了。因为战争的毁灭性代价，实际上已由德意志，不要忘记还有波希米亚偿付了。<sup>79</sup>因此卡门把这场关于德意志的争论视为一场“无的放矢的争论”是对的。问题并不在于如果三十年战争没有发生德意志是否会衰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假说性考虑。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是对世界性经济趋势发生逆转的一种回应，因此，这场战争便成为重新分配经济角色并强化经济不平等的一种方式。

综合了各家的研究和总结后，我们就会绘出下面的画面。在大约1600年至1650年的岁月中(正如1300年至1350年间一样)，一个经济扩张的时期似乎已经结束。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主要从价格方面考察的扩张的描述，以及价格史家们所用的方法，都没有错。但是因为价格在定义上是相对的，所以很容易使人误

入歧途。一种价格只有置于一个特定市场的一组共时态价格的整个系列之中去衡量,才具有意义。价格从不会普遍上涨或下跌;一些价格提高,就意味着另外一些价格下跌。业已结束的扩张不仅包括对名义价格的粗略计算;还包括许多真正的物质产品。最初的而且也许还是最重要的扩张是谷物生产的扩张,既包括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包括谷物种植总面积的扩大。后者的扩张是通过开垦土地来实现,还包括把牧场和葡萄园改为粮田。当然,这些扩张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谷物贸易条件相对于其它产品来说更为有利。

另外,至少在四个其他的领域内出现了扩张:(a) 人口,那个时代它的增减不可能长期与粮食供应不协调;(b) 城市“工业”,在其前向后向联系中促进货币交换的发展,创造高的雇工就业率,因此也就需要相应地保持较低的甚至不断下降的工资水平,而绝不能太远地偏离那个水平。;(c) 不同形态的存量货币(金属,纸币,信贷);(d) 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企业家的数量。所有这些都涉及到整个经济的扩张,但它们在众多经济部门中从未呈现出一致的~~趋势~~。如果在政治单位的范围内而不是在全球经济市场的范围内衡量它们,那就只会得出一幅片面的图景,其中的经济含意是难以理解的;政治后果因此也就会模糊不清,除非从更大的整体去考虑。

大约在 1300 年至 1350 年和 1600 年至 1650 年时,这些扩张因大致类似的原因而告一段落。然而,极为不同的是对扩张结束作出的系统的回应。在量的方面,我们极容易看到这种差异。与前一次上涨稍作比较,1300 年至 1450 年这段时期引起一次不同程度的下降,而 1600 年至 1750 年则表现了一种不同程度的停滞。1450 年至 1750 年的曲线看起来像一个阶梯,而 1150 年至 1450 年的曲线看起来则像一座山峰。但这仅仅是结构差异的外部表现。1300 年至 1450 年的衰退导致了一种社会结构即欧洲封建社会结构的危机,而 1600 年至 1750 年的衰退以舍弗尔的话说却产生了“一个

巩固和组构的时期”；<sup>80</sup>它标志着肖尼所说的“顺利增长的结束和众多困难的开端”。<sup>81</sup>巩固和众多困难指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唯一可以说得过去的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 1600 年至 1750 年紧缩时期的体制上具有建设性的特征。首先，虽然不宜过分强调，但是为了对付紧缩，这一时期的确是国家机构加强的时期，至少在中心区国家和正在崛起的半边缘国家是如此；另一方面，1300 年至 1450 年间的紧缩在土地贵族中实际上导致了激烈的自相残杀的战争，即封建欧洲的一次真正的诸神的没落(Götterdämmerung)。17 世纪也有战争和破坏，那是尽人皆知的；但是那些战争和破坏并不具有导致统治阶层血流成河的特性。战争的方式已经改变；雇佣兵的使用广为盛行；重要的是，17 世纪的斗争是在国家之间而不是诸侯之间进行，因而能够增强某些参战国的经济实力。正如埃利奥特(Elliott)在讨论所谓危机时指出：“16 和 17 世纪在欧洲人的生活结构中的确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却是发生在贵族君主国家的弹性结构范围之内”。<sup>82</sup>正是这种弹性使得紧缩未成为危机。

其次，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强劲的经济活动，仔细观察，好像是繁荣的迹象。我省略了一些最明显的例证：荷兰的黄金时代，德意志 17 世纪晚期以来的回升，英国农艺的稳步改善，简言之，“在这个艰难的不景气的 17 世纪，积累了无数的小改进”。<sup>83</sup>这些往往不易观察到的现象包括从未真正停止过的土地开垦，正如罗马诺提醒我们时说的：

垦荒吗？17 世纪时它一直在进行；它不是用货币来支付，而是依靠强制性劳役、帮佣、横征暴敛(Soprusi)等手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农业生产，不像其它生产那样，在 17 世纪几乎没有缩减过。”<sup>84</sup>

17 世纪的许多企业家似乎“缺乏投资的安全和生产出路”，这并不



使我们感到惊奇；<sup>65</sup>这毕竟是紧缩的一种内含。肖尼把17世纪说成是“利润缩减但……地租却胜利推进”<sup>66</sup>的世纪。这个说法使人们产生误解。他实际描述的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国家向农业投资的转变。

霍布斯鲍姆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发现了一种悖反现象：

我们因此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悖反现象，即资本主义只是在一种已基本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中才能得到发展，在任何并非资本主义的形态中，资本主义力量会使自己适应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因此他们不是十足的革命派。<sup>67</sup>

但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只能出自于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确实是一个矛盾——那么后者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600年至1750年这段时期存在和稳定下来的条件，在1300年至1450年是不可能具备的（正是因为1150年至1300年的扩张还没有打破欧洲封建结构的种种束缚）；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17世纪——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和社会上——才能为所谓的工业革命的迸发铺平道路。<sup>68</sup>

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在中世纪晚期没有其对应者的习俗革命，例如，在16至18世纪逐步上升的禁欲者的性道德，以及所有那些影响到家庭结构以使其适应资本主义世界的东西。如通常一样，肖尼由于其理想主义幻想的束缚而有点回避，但是，他的论点实际上也并非没有言中鹄的：

就习俗而言，17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或许是的唯一的革命的世纪，在传统文明方面，是对传统习俗进行攻击的出色的世纪！因此，似乎有点矛盾，它竟为马尔萨斯的革命准备了一个前提。<sup>69</sup>

我们还要再问，矛盾在何处？当然我们可以提出工业革命是否在17世纪就没有进行下去的问题。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十分大胆地提出这一论点：

后来所谓的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与17世纪荷兰的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差异吗？多数历史学家会说，的确如此。然而，我们怎能相信呢？……荷兰的造船业如同19世纪的运输工程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基础工业。<sup>90</sup>

我们不要忘记1600年至1750年这一时期继续并推进了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进程：如布罗代尔和斯普纳的考察所展示的那样，在欧洲的三个基本的价格区域中，价格上的差异在稳步地消除。

从18世纪早期就悄然开始弥合（最高价与最低价之间）的裂隙，表明全欧洲的价格是如何开始趋于整合的……通过过分地利用……价格差异，商业资本主义对价格扯平的过程和流通渠道的形成，以及促进到处寻找更有利条件的行业的转移，都起了作用。<sup>91</sup>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16世纪至18世纪是工业得以起飞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价格的均一则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依我看，在1450年至1750年这段时期和1150年至1450年的那段时期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别：在前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经形成，摇摆不定的历史可能性逐步消除；在后一个时期，虽然可以说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但却失败了，因为封建经济的政治凝聚力还没有通过其内部矛盾而被摧毁。这一主要的差别可以在整个经济的收入分配模式中看到。

威廉·埃贝尔在论述前工业化时期德意志民众贫困的著作

中,有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认为恩格斯在 1848 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提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随着工业化而恶化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埃贝尔引用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 (Bruno Hildebrand) 著作中的话认为,“[在德意志]恰恰是在那些没有任何工业的地区,贫困最严重”。<sup>92</sup>埃贝尔说,大众的贫困实际上发生在工业化之前,可追溯到 16 世纪:

(实际工资)最为严重的下跌发生在 16 世纪。后来,实际工资在三十年战争后不久的德意志以及 18 世纪初期的其它地区有所上升。然而,这些实际工资并不比 16 世纪后半期的实际工资高多少(而且比 15 世纪的实际工资低得多)。在贫民主义时代(1791—1850 年),由于新的衰退而使工资再次低落,但却决不是发生在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sup>93</sup>

埃贝尔著作的观点是要说明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是一次提高。这个问题不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之内,虽然他自己提到的 1791 年至 1850 年这一时期表明,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相关的是他的这个论点:1450 年至 1800 年这段时期下层社会的收入普遍下降。这个论点在其他著述中也得到了证实。明钦顿(Minchinton)以 1500 年至 1750 年这段时期为例,大胆提出了有关欧洲“需求结构”的一些概括性结论:“1750 年比 1500 年富裕多了”,他说,“而贫富间的差距却拉大了”。<sup>94</sup>布罗代尔和斯普纳通过对价格材料的考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从 15 世纪晚期直至 18 世纪初,欧洲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可能的话,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时期之前的 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状况,是十分有趣的。大体说来,那时的情况更好一些。在我们指出的反复的剧烈动荡之前,那个时代是否真像

许多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劳动者的黄金时代？<sup>95</sup>

我根据斯利彻·范巴思的材料设计的一个图表显示，1251年至1850年期间<sup>96</sup>英国木匠的实际工资在1251年至1450年期间呈稳步上升的趋势，在那一时期翻了一番，此后便或多或少地有所下降，最后又回到原来的起点（除了1601年至1650年期间出现的低落时期）。要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再次考察一下所谓的封建主义危机。佩里·安德逊(Perry Anderson)正确地指出，“全面地认识封建生产方式的运动是过去数十年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这场危机的发生不是基于失败，而是基于成功，是基于“（封建制度）代表的整个经济与社会的重大进步”。<sup>97</sup>然而经过3到4个世纪的不断扩张之后，到13世纪时，这个制度自身陷入了危机。

我以前曾解释过<sup>98</sup>我为什么相信这场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气候的变化、以及封建结构基本矛盾的不断加深。安德逊此后对这次历史危机的略为详细的分析，主要强调“推动整个封建经济向前发展达3个世纪之久的农业垦荒的基本动力最终超越了土地和社会结构的客观限度”。<sup>99</sup>在强调被称之为这种制度的社会和经济枯竭的同时，安德逊批评了多布和科斯明斯基(Kosminsky)提出的解释，即认为这场危机是由“贵族剥削的不断加深”所引起；他批评这种解释“实证依据令人生疑，理论推导流于空疏”，因为它看来与这个时期地租关系的总趋势并不一致。<sup>100</sup>

这里的混乱值得花一些时间去澄清。我们可以在安德逊本人的著作中找到一些直线上升假说的实际证据，例如，他指出，欧洲中世纪农民的平均土地面积“从9世纪的100英亩下降到13世纪的20或30英亩。”<sup>101</sup>他还指出，处于豪绅与农民之间的小贵族和官方代理人阶层“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社会和经济地位）稳步上升”。<sup>102</sup>可以说，这一定意味着经济剩余中流向非生产人员的百分

比在不断增加,因此也就意味着贵族剥削在直线上升。这样,社会经济的逐步枯竭与日益增加的剥削相结合(既然后者部分地成为平衡上层人士的个人收入的一种手段,难道不是前者引起了后者吗?),导致了(如我已指出,由于其他因素而强化了)著名的由“城乡价格关系日益扩大的剪刀差”产生的领主年收入的危机。<sup>103</sup>

这种“剪刀差”的结果之一是租佃关系发生了普遍的变化,它正是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安德逊说:

远非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普遍危机恶化了农村直接生产者的生活状况,危机之所以结束是通过生产者生活条件的改善和他们自身的解放。实际上,它证明是西方农奴制瓦解的转折点。<sup>104</sup>

在此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经济的“剪刀差”引起领主的反应;领主的反应又引起相对成功的农民抵抗,这种抵抗以农奴制的解体而告结束。“到1450年,在法国、英国、德意志西部、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使用农奴劳动耕种的领主自营地呈现一片无政府状态”。<sup>105</sup>我认为结果有所不同。社会经济危机削弱了贵族的实力,使农民在1250年至1450年或1500年期间能够逐步增加他们占有剩余产品的份额。在整个欧洲,无论是西欧还是东欧,这都是真实的。<sup>106</sup>正是低收入阶层向收入相对平等化方向靠近,不断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首先由于“枯竭”状态,才使得上层阶层遭遇真正的危机和他们不得不面临的困境。

没有剧烈的社会变迁就没有任何摆脱这种境地的出路。这条出路,正如我以前所指出的,就是建立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一种“新”的剩余剥削形式。<sup>107</sup>以资本主义方式来代替封建主义方式正是领主们作出的反应;这是统治阶层为维护他们的集体特权而做出的巨大的社会政治努力,即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一种根本性的经济改组和由此引起的对熟悉的等级划分的一切威胁。显然,由于

这样一种转变，某些家族可能会失去权利，但更多的家族则不会。<sup>108</sup>此外，最为重要的是，这种等级划分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还得到了强化。

尽管 1500 年到至少 1800 年这一时期包括了扩张(A 阶段)和紧缩(B 阶段)，欧洲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下降了，这一发现难道不能证明这种经济变革的策略，假如可以这样称谓的话，是多么成功吗？应该指出，这种对收入减少的经验论证并不是由一位资本主义批评家提出的，而是由埃贝尔纠正恩格斯的观点时提出的。(埃贝尔错误地认为 1800 年以后，收入降低得到了控制。他的这种错误看法表明，无论如何，他没有能够在一个正确的分析单位范围内去估算 1800 年以后的情况，也就是说，没有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作为分析单位，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外部疆界正是在那时扩大了。)

现在，我们回到对 1600 年至 1750 年的紧缩所做的解释上来。把 1450 年至 1750 年这一时期看作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个漫长的时期，把过渡概念这样地具体化是很冒险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肯定会缩短“纯”封建主义和“纯”资本主义的时段，最终会缩减为零，除了过渡以外什么也没有。真够妙的——一切皆为过渡；但是每当我们把局部特征夸大为普遍特征时，我们仅仅是在术语上转移问题。我们仍需要知道社会结构中的若干重大变迁是在“何时”、“怎样”以及“为什么”发生的。这些制度带有的有关它们自身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描述从来都不真实。不仅在 1650 年至 1750 年，而且在 1850 年至 1950 年，在整个欧洲，要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可说是“非资本主义”行为的例证，总是很容易。这些“非资本主义的”行为、企业与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资本主义的”行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或(令人最不愉快的说法)“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混合体，既非反常的也非过渡性的。这种混合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而且它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历史上是如何影响了与其共存于社会空间的文明的。

我说过，资本主义是作为封建主义危机的解决方式而出现的；但是，这种解决是通过克服那些任何现存的解决方式都必定要失利的个人和集团的抵抗，使大多数人聚集起来作出选择的结果。由于失利者人数众多且涉及面广，因此建立了奇异的联盟，过程被拉长了，而且不清晰。可能也尝试过其它的“解决方式”。查理五世企图重建普遍的君主制，但没有成功。<sup>109</sup>下层民众可能利用1600—1750年的周期性下降趋势，对这一体系造成一次大破坏，从而对当时已经大为增长的绝对剩余进行一次全面的再分配，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此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的中心国家的国家机器已经强大起来了，它们竭力通过复杂的途径融合各种敌对力量，使自己得以幸存和发展，终于促进了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层的利益。安德逊认为，“专制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重新调配和装备起来的封建统治工具，用来将农民大众强行推回到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上去——无视并且反对他们通过广泛的租赋折偿获得的利益”。<sup>110</sup>

如果把形容词“封建的”省去，我可能会接受安德逊的全部陈述。以我看来，无论公开的术语具有什么样的外壳，这种重新调配准确地说含有资本主义统治代替封建统治的意思。甚至安德逊本人也承认存在一种“明显的专制主义的矛盾”；他指出，专制主义在保护“贵族阶级的财产和特权”的同时，也“可能同时保护了萌芽时期的商业和制造业阶级的基本利益”。为了解释这个矛盾，安德逊援引了这样的事实，即在“机器大工业”以前的时期（大约1800年以前），“商业和工业资本”并不需要一个“大众的”市场，因而可以避免一场“与封建的农村秩序的严重决裂”。<sup>111</sup>这是真实的；而且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这种情况在20世纪依然存在。也就是说，这种大众市场的“需求”还没有把全世界的人口包括进去。

据前所述，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不是所有专制君主国都是强国，以及并非所有的强国都是专制君主国的原因了。其关键是国

家有多么强大,而不是政体有多么专制。当然,对政体形式的解释也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会发现 17 世纪的最强大的国家是那些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联省共和国排名第一,英国第二,法国仅排第三。英国革命加强了英国的国力,然而,路易十四的“联即国家”的主张却是法国相对衰落的标志。

17 世纪的紧缩并不是这个体系的一场危机。正相反,它是该体系巩固的时期。舍费尔在指出 16 世纪晚期西属美洲的白银进口减少有其积极的一面时,便言中了这一点。他指出,其结果是:17 世纪时,“价格的平均数普遍保持在同一水平”,这“对惨遭通货膨胀破坏的经济来说是一个稳定的因素”。<sup>112</sup>

延长的 16 世纪不只是一个通货膨胀的时期。它还是一个结构上的革命时代,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广大人民愿意接受新的激进思想。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思想使那些不顾一切要摆脱控制的人们具有了激烈的品质。17 世纪则代表了一个平和与冷静的时代。古典主义,像专制主义一样,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写真,而是一种纲领——一种使政治和文化的首创精神回归到上层社会中的纲领,以便更好地领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诞生所反映的根本的社会变迁。威廉·鲍斯马认为 17 世纪基本的精神冲动的特点是

体系化精神的全面恢复,其基点是对人的理智作出积极的估计。这种观念与作为世俗化运动基础的观点很不相同。它坚持要将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与普遍的、抽象真理的核心相联系。<sup>113</sup>

17 世纪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代表了对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减缓时期伴生的形式与结构的稳定性的追求。没有这样一个时期,便不可能有下一次前进的质的飞跃。这就使得 17 世纪并不是一次“危机”,而是一种速度的必需的变化;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使那些从资本主义体系获益最多的人的财富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因



素。<sup>14</sup>因为1600年至1750年这一时期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中非常重要,因此,十分值得对其原因作一番仔细分析。这样,我们就会明白资本家阶层在对付循环往复的世界经济紧缩时期时使用的是什么机制。

### 注释

1 斯利彻·范巴思(1965a, p. 38),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补充说:“这决不排除经济生活的其它部门,如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的啤酒酿造、蒸馏造酒、纺织业和烟草业等部门的繁荣。”(1977, p. 53)。

2 “最重要的是谷物与奶油、奶酪以及羊毛等畜牧产品之间在一段长时间内不断变化的价格比率。重要的还有小麦价格与亚麻、油菜籽、烟草等工业作物之间的比价关系;还有小麦与葡萄酒,小麦与纺织品、砖瓦之类的工业材料,最后还有小麦价格与租金之间的比价关系”(斯利彻·范巴思, 1965b, p. 144)。这一点,参见佩里·安德逊(Perry Anderson)对达比(Duby)不愿将欧洲中世纪晚期的经济说成一种危机中的经济的指责。达比在一些地区看到了一些持续的经济发展的迹象,安德逊则认为:“这会把危机和衰退的概念混为一谈”(1974b, p. 197)。

3 格拉曼(Glamann)(1974, p. 464)。

4 格拉曼(1974, p. 465)。同时参见斯利彻·范巴思(1963 a, p. 208)。关于后来谷物生产的全面衰退,参见雅卡特(1978a, p. 352, p. 360)。雅卡特指出(p. 378),生产的全面衰退可能有三个原因——生产成本的变化,收成水平的变化,产品市场价值的变化。他认为第一条原因对这一时期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因而加以排除,只保留其它两种解释。他认为低产出是主要的原因。但是,要参考斯利彻·范巴思反对把气候当作是产量减少的可靠解释的观点。“如果所有其它因素保持稳定,假如其它情况不变,那么这一时期谷物价格应该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事实上,它们却在多数国家表现出下落的势头。这表明,一定发生了影响到需求的变化。”(1977, p. 63)。

5 格拉曼(1974, p. 485)。

6 舍费尔(1966, p. 90)。

7 塞拉(1974, p. 366)。

8 肖尼(1966a, p. 272)。同时参见斯利彻·范巴思(1963b, p. 18)。17世

纪不仅在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如波希米亚、德意志诸邦、波兰、勃艮第可以发现荒芜的村庄，而且在主要战场以外的地区如意大利的坎帕纳(Campagna)和托斯卡尼(Tuscany)，以及西班牙的萨拉曼卡(Salamanca)，也可以见到同样的情况。参见斯利彻·范巴思(1977, p. 68)。

9 参见斯利彻·范巴思(1963b, p. 17); 同时参见雅卡特(1978a, pp. 363~368)。

10 德·马达伦纳(De Maddalena)(1974a, p. 343)。斯利彻·范巴思认为产出率与谷物价格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购买肥料以增加施肥会提高产量。但只有在谷物生产有利可图时才这么做”。(1965a, p. 32)。显然，他并不相信这有利可图，因为他还认为：“肥料数量和质量的减少，可能是1600—1750年在我们有据可证的大多数欧洲国家谷物产出率略有下降的原因。”(1977, p. 95)

11 参见罗马诺(Romano)(1962, pp. 512~513)，他列举了1650—1750年间从可耕地转为牧场的地区：卡斯蒂利亚，士威林(Schwerin)，沃拉尔贝格(Voralberg)，阿尔高(Allgau)，布雷根茨林山(Bregenzerwald)，恩蒙特地区(Pays d'Enhaut)，埃默河谷(Emmenthal)，萨伏依(Savoie)，尤拉(Jura)，格吕耶尔(Gruyères)，埃沃地区(Pays d'Hervé)，勃艮第(Bourgogne)，蒂耶拉什(Thiérarchie)，欧日地区(Pays d'Auge)，贝桑(Bessin)，科唐坦(Cotentin)，米德兰(Midlands)，爱尔兰。1630年至1771年新的葡萄园地区是：莱·兰德斯(Le Landes)，佩里戈尔(Périgord)，塞特(Sète)，蒙彼利埃(Montpellier)，阿尔萨斯，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沃德(Vaud)，哈尔维尔(Hallwil)，苏黎世(Zurich)的坎顿(Canton)。

12 斯利彻·范巴思(1965b, p. 33, p. 39)，他引用了发生在摩泽尔(Moselle)，哈茨(Harz)，爱尔福特(Erfurt)，以及低地国家(the Low Countries)的转变。

13 斯利彻·范巴思(1965a, p. 39)。

14 斯利彻·范巴思(1965a, p. 15, p. 39)。

15 德·马达伦纳(1974a, p. 288); 参见雅卡特(1978a, p. 346; 1978b, pp. 427~428; 1978c, p. 462)。

16 德·马达伦纳(1974a, p. 292); 参见雅卡特(1978b, pp. 391~392)。

17 德·马达伦纳(1974a, p. 294)。

18 斯利彻·范巴思(1965b, p. 147)。德语中与Knechte和Magde相对应的词是Kleinbauern, Kätner和Häusler。雅卡特同样强调了“中等农民”的相对的

衰落，他把这些人看作是“拥有或开发一小块家庭用地”的人，而且他认为这些人在危机中被“无产化”了(1978c, p. 466)。

19 默夫雷特(1944, p. 116)。

20 斯利彻·范巴思(1965a, p. 38)。

21 斯利彻·范巴思(1965a, pp. 37~38)。

22 斯利彻·范巴思(1965a, p. 15, p. 34, p. 39)。

23 罗马诺(1962, p. 520)。后来在概括这篇文章的实质时，罗马诺说：“第一个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突破——在农业方面——出现于16世纪末；商业和工业的突破来得迟些；其时间确定在1619年至1622年，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那几年短期的危机以后，商业和‘工业’活动进入了一个较长的危机时期”(1974, p. 196)。

24 塞拉(1974, pp. 366~367)。

25 霍布斯鲍姆(1965, p. 9)。

26 斯利彻·范巴思(1965a, p. 37)，他列举了以下地区：爱尔兰、苏格兰、缅因(Maine, 法国)、佛兰德斯、特文特(Twente)、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蒙斯特(Munster)的周边地区，萨克逊和西里西亚。

27 罗马诺(1962, p. 520)。

28 罗马诺(1962, p. 500)。

29 斯利彻·范巴思(1965a, p. 39)。

30 塞拉(1974, p. 366)；同时参见维戈(Vigo)(1974, p. 390)。

31 参见沃勒斯坦文集中我的观点(1974, pp. 77~84)。

32 埃贝尔(1973, p. 225)。

33 格拉曼(1974, p. 431)。参见莱昂(Léon)类似的观点：“17世纪时，实际工资的增加由于农业危机而受到阻碍，这一危机对谷物价格产生了突然而剧烈的冲击，引起生活费用的急剧增加，还引起了严重的工业萧条，而工业萧条又带来了长期而严重的失业。因此，对大部分工人阶级来说，它是一场灾难”(1970e, p. 674)。

34 参见我在沃勒斯坦文集中简单的叙述(1974, p. 271)。

35 莫斯尼尔(1967, p. 167)。勒·鲁瓦·拉杜里针对以一种贵金属作为衡量单位的观点作了巧妙的论证。他引用了勒内·巴勒尔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并不存在衡量货币价值的单一的正确尺度。为什么我们认为应该是一克白银呢？”对此，勒·鲁瓦·拉杜里回答说：“是的，然而更不用说，为什么我们

认为应该是图尔城铸的货币呢？就因为它不仅具有金属的相对性而且还有记帐货币的额外的不稳定性吗？……我不同意以某种普遍的相对性的名义，用铱 (iridium) 作为一种衡量尺度，那么我会用同样具有相对性但又具有令人烦恼的弹性的橡皮作为一种衡量尺度而去代替它吗？”(1964, p. 83)。

36 维拉尔 (1974, p. 246)；但维拉尔补充说，“除法国以外，很难忽视 1683—1689 年和 1701—1710 年之间曲线的上升”。

37 帕克 (1974a, pp. 529—530, 加的斜体词)。

38 斯普纳 (1956, p. 8)。

39 斯普纳 (1956, pp. 35—36)。

40 参见毛罗 (Mauro) (1961a, 特别是 pp. 16—17)。在马塔 (Mata) 和瓦莱里奥 (Valerio) (1978, 特别是 pp. 118—120) 的论著中，可见到对毛罗把欧洲当作单一类别的批评。

41 莱因哈德 (Reinhard) 和阿门高 (Armengaud) (1961, p. 114)。

42 莫尔斯 (1974, p. 39)；J. 德弗里埃 (J. de Vries) 计算的 1700 年的指数是 106, 1600 年的指数是 100 (1750 年是 123)；但是他在计算中省去了东欧，这肯定进一步减少了指数 (1975, p. 5, 表 I)。

43 参见沃勒斯坦文集中我的观点 (1974, Chap. 1)。

44 斯利彻·范巴思 (1963a, p. 206)。

45 让南 (Jeanm) (1974, p. 495)。

46 维拉尔 (1961, p. 114)。

47 托波尔斯基 (Topolski) (1974a, p. 140)。拉尔夫·戴维斯 (Ralph Davis) 说的实际是同一件事：“比一般衰落更令人震惊的是发展道路出现了偏差” (1973b, p. 108)。把托波尔斯基对“停滞”一词的批驳与罗杰奥·罗马诺作一下比较：“17 世纪是什么世纪？……尽管有很多的解释，却可以把它归结为一种解释：即它是一个‘经济停滞’的世纪。这仅是一种印象，但是我坚信，在这种轻易得出的观点背后，只有一种证据：价格史……但这是一个好的标准吗？我认为不是” (1962, pp. 481—482)。

48 维拉尔 (1974, p. 52)。这就是我为什么无法接受莫里诺 (Morineau) 完全否认 17 世纪属于 B 阶段的观点。他说：“是增长停顿吗？这就是这部 [集体的] 大作所选择的标题，它充满了许多假设和模糊的概念，它意味着支持罗斯托 (Rostowian) 式的增长理论，支持对 16 世纪的乐观看法以及对 17 世纪的完全悲观的观点……如果是荷兰人或英国人，而不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那

么 1598 年以后欧洲的地理扩张看来就是很明显的，这只是一个重新分牌的问题”(1978g, p. 575)。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看法并不完全悲观，如果他认为 B 阶段恰恰就是重新分牌的阶段，而且如果他持有与罗斯托增长理论相反的意见，那么他是不会受到这种反驳的影响的。

49 塞拉(1974, p. 390)。

50 德·马达伦纳(1974a, p. 274)。

51 布罗代尔(1973, II, p. 892)。就我看来，这种过程的重叠说明了皮埃尔·肖尼是正确的：“衰退一般并非发生在一种运动中，而是在两种，三种，四种运动<sup>[1]</sup>中。那是一些周期性危机的运动，这些危机的发生年代在欧洲各地大致相同，一般为时 2 年或 3 年。但是，这些危机的重要性和含义却因地而异”(1962b, p. 231)。

52 霍布斯鲍姆(1965, p. 13)。

53 霍布斯鲍姆(1958, p. 63)。

54 罗马诺(1974, p. 194)。

55 奇波拉(1974, p. 12)。舍费尔提到荷兰历史学家不愿意参加有关欧洲普遍危机的讨论：“这场普遍危机怎么能与荷兰的黄金时代(the Dutch Golden Age)相一致呢？”(1966, p. 86)。

56 如吉里梅克(Geremek)所述的那样(1963)。

57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1967, p. 404)。

58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1967, p. 405)。

59 斯利彻·范巴思(1965b, p. 136)。在马恰克(Maczak)和萨姆索诺维茨(Samsonowicz)(1965, p. 82)的著作中可以见到波罗的海地区(the Baltic zone)萧条的相似时期，他们将这一时期定在 17 世纪的 20 年代至 18 世纪的 60 年代。

60 维拉尔(1974, p. 303)。维拉尔努力使巴勒尔(1961)在不同情况下所持的不一致的观点与有关法国的普遍观点协调起来。

61 肖尼(1962b, pp. 251~252)。

62 埃贝尔(1973, p. 221)。

63 埃贝尔(1973, p. 222, p. 223, 表 37)。

64 拉布(1962b, p. 40)。

65 参见吕特格(Lütge)(1958, pp. 26~28)。

---

[1] 原文为 moments, 从上下文看, 疑应为 movements, 故译为“运动”。——译者

66 斯利彻·范巴思 (1963b, p. 18); 参考埃贝尔同样的观点 (1967, p. 261)。

67 卡斯腾(1956,p. 24)。

68 对卡斯腾本人来说, 虽然他没有使用这种语言, 但他对此是很清楚的。他说到“土地贵族的崛起以及他们与外商的直接贸易, 扼杀了许多小镇”(1956,p. 241)。

69 卡斯腾(1956,p. 241)。

70 拉布(1962b,p. 51)。

71 卡门(Kamen)(1968, p. 44, p. 45, p. 48)。

72 波利森斯基(1971,p. 9)。帕克同样提出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点(1976a, p. 72); 但是他提到波利森斯基在提醒不要做错误的解释时所说的下面一句话: “如果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拥护者与‘旧制度’和封建贵族的代表者之间的一场冲突, 那就纯粹是过于简单化了”。

73 波利森斯基(1971, p. 258)。因此, “这场战争作为一种催化剂, 加速了某些战前已经进行的一些社会经济变化”(p. 259)。它不是一个转折点。“三十年战争突出了已经存在的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它并没有改变贸易路线的基本方向或商业紧缩的强度”(p. 260, 加斜体词)。赫罗奇(Hoch)通过分析认为三十年战争是由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和停滞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因此也是“欧洲范围的市场”的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1963,p. 542)。但是, 他把冲突看作是“封建阶级内部”的冲突(p. 541)。

74 波利森斯基(1971, p. 264)。

75 波利森斯基(1971, pp. 236~237)。

76 这是波利森斯基第五章的标题(1971)。

77 参见罗马诺(1962)。

78 参见沃勒斯坦文集中我的观点(1974, pp. 269~273)。

79 “[波希米亚]的(经济)悲剧的影响是明显的”(波利森斯基, 1971, p. 294)。瑞士(Switzerland)也一样; 参考卡门的观点(1968, p. 60)。

80 舍费尔(1966,p. 106)。

81 肖尼(1967, p. 263)。

82 埃利奥特(Ellicott)(1969, p. 55)。

83 肖尼(1967, p. 265)。

84 罗马诺 (1962, p. 512); 里面的引文出自布尔费雷蒂 (Bulferetti)

(1953, p. 44 及 p. 77)。

85 明钦顿(1974, p. 160)。

86 肖尼(1967, p. 264)。斯普纳指出,土地只不过是当时商业致富的一种途径。他还列举了三十年战争、国家、大公司以及新的技术(1970, pp. 100~103)。

87 霍布斯鲍姆(1960, p. 104)。

88 肖尼发现了与早期相比的这个时期的成就:“由于一系列工具的出现(最完善的出现于13世纪),欧洲人撒开了第一张全球经济网,这里并没有矛盾。在18世纪中叶运输革命以前,从1550年至1750年,古典的欧洲难道不是保持着这一奇迹吗?”(1966a, pp. 277~278)。

89 肖尼(1966a, p. 209)。

90 威尔逊(Wilson)(1973, p. 331)。

91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1967, p. 395)。艾基利斯(Achilles)认为阿姆斯特丹的小麦价格已成为“全欧洲的标准”(1959, p. 52)。

92 埃贝尔(1972, p. 7)。

93 埃贝尔(1972, p. 63),他用一个图表来说明这种现象,该图表显示了一个泥瓦匠在英国、斯特拉斯堡、维也纳和莱比锡以小麦(用作面包)的公斤数表示的实际工资。

94 明钦顿(1974, p. 168)。

95 布罗代尔和斯普纳(1967, p. 429)。同时参见陶特伯格(Teuteberg)论欧洲中世纪晚期与1800年之间的“depecoration”(日益增加的素食)(1975, pp. 64—65)。

96 参见沃勒斯坦(1974, p. 80, 表1)。勒·鲁瓦·拉杜里写道, M. 包拉特(M. Baulart)指出15世纪至18世纪巴黎工人工资的最高水平是在1440年至1498年期间(1973, p. 434)。范范尼(Farfani)认为意大利的实际工资在16世纪时下降了50%(1959, p. 345)。

97 P. 安德逊(1974b, p. 182)。

98 参见沃勒斯坦(1974, pp. 21~37)。

99 P. 安德逊(1974b, p. 197),在他看来,并非只有农业才发生了危机:“同时,城市经济现在也遇到了发展中的某些障碍……货币普遍不足,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金融业和商业”。安德逊从采矿业中的“技术障碍”解释了这种不足(1974b, p. 199)。

100 P. 安德逊(1974b, p. 198)。我本人赞成希尔顿(Hilton)的这一假设的观点,因此我冒昧地投入了这一阵营;参见沃勒斯坦,1974, pp. 23~24。

101 P. 安德逊(1974b, p. 186),在一次私下交谈中,他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可分产继承制,而不是剥削的逐步升级。

102 P. 安德逊(1974b, p. 185),他认为这可能是全球产量增加的结果,再次认为不是剥削逐步升级的结果。但是请参见赫利希(Herlihy)对13世纪皮斯托亚(Pistoia)乡村所作的详细的实证研究。在驳斥以马尔萨斯观点解释14世纪人口减少原因的作法时,他指出,13世纪时农民“承担着惊人的租金水准”;他们把土地的永久租金出卖给投资者以便积累资本,1250年以后,“由于货币贬值和小麦价格迅速上涨,永久租金的价值也暴涨,13世纪80年代时达到顶峰”。此外,“皮斯托亚乡村担负着6倍于城市的税”(1965, p. 238, p. 240, p. 242)。

103 P. 安德逊(1974b, pp. 200~209),他简练而且极清晰地对这些后果进行了实证性描述。

104 P. 安德逊(1974b, p. 204)。

105 P. 安德逊(1974b, p. 209)。

106 虽然安德逊所著两本书中的一个主题是东西欧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甚至他也承认“(封建主义危机)的相对影响在东欧比在西欧更为厉害”。当然,他接着说两个地区形成危机的原因不同(1974b, pp. 246~248)。但其现实是一样的,对农民的有利影响也一样。

107 参见沃勒斯坦(1974, pp. 37~38)。

108 P. 安德逊本人指出了一种减少冒险或阻滞精英阶层离散的途径。他称这种方法为Vincalismo,指的是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引入的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以保护家庭的大地产,“抵制资本主义市场的分化压力和难以预测的变化”(1974a, p. 56)。

109 参见沃勒斯坦(1974, pp. 165~181);同时参见耶茨(Yates)(1975)。

110 P. 安德逊(1974a, p. 18),他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同样论点:“绝对专制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的统治是封建贵族在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统治”(1974a, p. 42)。

111 P. 安德逊(1974a, p. 40)。

112 舍费尔(1966, p. 97)。

113 鲍斯马(Bouwma)(1970, p. 10, 加斜体词句)。鲍斯马通过回顾“这



个时代的物质条件：这个世纪长期的萧条，社会的分裂，战争和革命”，以此来  
说明对“体系化的普遍理性”受到关注的原因(p. 14)。

114 拉布谈到了 1610—1660 年间构建的思想体系“广阔视野，巨大的  
画面”(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霍布斯)，他把这看作正是对危机的一种反  
应。“当这种关注在欧洲文化中失去其中心地位之时，如 17 世纪 60 年代以后  
发生的情况那样，人们还是可以说，那是因为不确定性和与此相关的‘危机’  
已被抛之脑后了”(1975, pp. 58~59)。

## 第二章 荷兰在世界经济体中的霸权地位

“在北方，一种类似鲁宾斯(Rubens)的现象……是不可思议的。”

——彼得·海尔(Pieter Geyl)<sup>1</sup>

到1600年时，西北欧稳固地成为欧洲世界经济的中心区，它们是荷兰和泽兰(Zeeland)；伦敦，内地各郡，东英格兰；法国北部和西部。<sup>2</sup> 这些中心区的政治单位的规模、形式以及政治状况极不相同，在后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他们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然而，在经济方面这些地区更多的是相似而非差异。正如在前一章中所见的那样，1600年至1750年是一段巩固的时期，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减慢了。整体上看确实如此；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特点是整体的主要趋势由各组成部分的极不相同的趋势混合而成。随着发展的减慢与巩固，强行实施了艰难的经济决策，滋长了政治（以及文化）的周旋余地。这种情况在17世纪的中心国家尤其如此。在中心国家的企业家阶层中，为了生存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些人必须被淘汰，以给另外一些人留下足够的利润。

历史著作把1600至1750年的这段时期称为重商主义时期。我无意去评论人们赋予这个术语的多重含义或构成其“本质”的多种定义。<sup>3</sup> 关于重商主义的争论主要涉及17世纪的理论家们提出的各种观点的真实价值。显然，他们的论题在某些方面反映了现实，而在某些方面是为了影响现实而设想出来的。所有理论都是如此。然而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感兴趣的却是那个时代国家的实际作为，而不管那是出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的理由。这些实际作为不是那个时代所独有的，而是被某些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历史的几乎每一时刻所利用，尽管其意识形态理由各不相同。在对 17 世纪的重商主义作出的众说纷纭的解释中，这一概念的两个方面得到几乎所有人的肯定：重商主义包括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政策并且关注商品的流通，无论是贵金属的流通还是贸易（双边或多边）的平衡。实际上涉及的本是关于“利益和权力”的真实关系，这正是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和今天的分析家中间争论不休的内容。

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弱者反对强者以及竞争者之间相互对立的国家政策，只是在接受正统学说。本书中稍有不同的是认为商业竞争的成功主要是由生产效益所决定的，以及所有重商主义国家政策的中期目标是提高生产领域的总体效益。这一过程必将由联省共和国来启动，因为对 17 世纪的至少一部分时期来说，这个“从冰川时代遗留下来的泥沙堆积体”，<sup>4</sup>虽然还只有一个匆匆形成而且似乎没有效率的国家机器，却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霸主。这个联省共和国（我们也许该称之为荷兰？）是继查理五世想把世界经济体改变成世界帝国的企图破灭以后兴起的第一个这样的霸权。称霸是很少出现的；迄今唯有荷兰、大不列颠以及美国一度称霸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每个国家也只维持了一段相对短暂的时期，荷兰更是昙花一现，因为它在当时的所有军事大国中最弱。

霸权包括的不仅仅是中心地位。它可以解释为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中，某个中心国家能够如此有效地生产产品，以致即使在其它中心国家中其产品也基本上能够与之竞争，这个中心国家因此会成为自由的世界市场的最大受惠者。显然，要想利用这种生产优势，这样的国家必须非常强大，以阻止或缩小内外的政治障碍，从而使得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势力发现激励某些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推进某些运动和意识形态是有利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真正的霸权，就开始衰落；因为

一个国家不再是霸权并不是因为它丧失了力量（至少过去很长时间后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其它国家取得了胜利。达到巅峰就意味着肯定未来不属于你，不管现在多么显赫；但它毕竟是甜蜜的。霸权的模式看来非常简单。工农业生产效益的明显优势导致在世界贸易的商业分布范围中占据主导地位；随之带来大量的世界转口贸易和对“无形交易”——运输业、通讯业以及保险业等部门的控制所产生的相关的利润。商业的优势转而又引起对银行（兑换、存款、信贷）和（直接的和有价证券的）投资等金融部门的控制。

这些优势是依次递进的，但在时间上互相重叠。同样，优势的丧失似乎也按同样的顺序（从生产到销售，再到金融银行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次递进的。因此，某一中心国家实际上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同时~~同时~~在生产、销售和金融方面优于所有其他中心强国。这种暂时的顶点就是我们所称的霸权。以荷兰或联省共和国为例，这一时期大致处于 1625 至 1675 年之间。荷兰首先在历史悠久的食品生产行业捕捞业即渔业，尤其（但不仅仅是）在被誉为“荷兰金矿”<sup>5</sup>的腌鲱鱼业，取得了生产效益。这种效益来源于 1400 年左右发明的一种大帆船<sup>6</sup>，这是一种捕鱼船，其较高的长宽比例提供了“较大的机动性，航海性能和速度，避免了船舱空间的损失”。<sup>7</sup>该船的一大优势表现在，它的设计可以使这种船使用巨大的拖网捕捞鲱鱼，这点在 1516 年时在西弗里斯兰（West Friesland）的霍恩（Hoorn）第一次被注意到；<sup>8</sup>另一方面，它那较宽的甲板能在船上对鱼进行加工处理。新的加工处理技术，即取出鱼的内脏后就立刻加以腌制，以保证其避免腐烂，在 13 世纪时就已产生。<sup>9</sup>这种“航船工厂”<sup>10</sup>的产生使渔船可以远离荷兰的海岸线，在外逗留 6—8 周。这些满载产品而归的快船把它们货物转给那些鱼贩子们（ventjagers）。<sup>11</sup>

荷兰不仅垄断了北海的鲱鱼捕捞业，即所谓的大渔业（Grand Fishery），<sup>12</sup>而且还垄断了冰岛的鳕鱼捕捞业以及斯匹兹卑尔根（Spitzbergen）的鲸鱼捕捞业。<sup>13</sup>人们实际上并不把鲸鱼当作食品，而

是一种工业品。鲸鱼提供的“鲸油”，用来做肥皂和灯油，鲸骨用于制作衣料。<sup>14</sup>鱼类工业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的前向联系，而且还因为它的后向联系如鱼网的生产，它创立了一种“欧洲独有的”人口比例形势，那种比例“至少部分地由渔业引起”。<sup>15</sup>17世纪，令英国人“愤怒”<sup>16</sup>的是荷兰人在英国的海岸捕捞，并在英国的港口进行竞争性的销售。荷兰人利用这种优势，在波罗的海建立了他们的“母体贸易”。英国此时已注意到这点。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爵士在1661年7月8日给克拉伦登（Clarendon）的信中写道：“（荷兰的）鲱鱼贸易是海盐贸易的起因，而鲱鱼和海盐贸易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这个国家垄断整个波罗的海的起因，因为他们到那里将大宗货物装入他们的船队”。<sup>17</sup>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确切地说是促进荷兰造船业效率提高的因素之一，荷兰人在一段时间内发现他们处于循环影响的良性环境之中：即优势的不断加强。

尽管乔治·唐宁爵士有所论述，鲱鱼捕捞业并不能解释一切。荷兰在那时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即农业方面表现了同样的优势；这无论在影响的广度上，<sup>18</sup>还是在努力的深度上，都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因为从地质土壤上看，尼德兰根本不适宜种植谷物<sup>19</sup>，也不适宜种植其它农作物。然而这种劣势转而成为两方面的优势。首先，为了开垦土地（开辟低洼地）而不断排干沼泽地，导致了风车的发明和工程科学的蓬勃发展；这样，在许多方面荷兰成为“木制机械时代”<sup>20</sup>的中心。开辟低洼地可以追溯到1250年，但是其高峰却是在1600年至1625年间，那时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这种高水平从1625年大致持续到1675年。<sup>21</sup>因此，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在《荷兰的特征》一书中讥讽地写道：“他在排干的沼泽中进行统治”。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第二个后果或许更为重要。环境迫使荷兰人从事强化农业（intensified agriculture）。最初是在1300年左右，当时，早期的困难和低廉的价格促使人们开始强化农业生产，后来在1620年至1750年间，出现了大规模的强

化农业。<sup>22</sup>

由于土壤尤其不适宜农业耕作，<sup>23</sup>因此只能通过亚麻、大麻、蛇麻草、花卉、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增加产量，特别重要的是染料的生产，16和17世纪时，荷兰人在这方面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者，几乎未遇到任何竞争”。<sup>24</sup>在园艺和农作物发展的同时，牲畜饲养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sup>25</sup>之所以能集中生产经济作物，是因为有大量的谷物进口。这种进口是无止境的。德·弗里埃 (De Vries) 估计，在17世纪中叶，荷兰乌特勒支 (Utrecht)、弗里斯兰 (Friesland) 以及格罗宁根 (Groningen) 等省的半数居民全仗进口的谷物维生。<sup>26</sup>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各种农业技术的改进——休耕的废除，<sup>27</sup>种植相关的牲畜饲料，采用苗圃和行列式的栽培方法，使用简单而廉价的生产工具，以及通过多施追肥和对小块土地的精耕细作来提高产量。<sup>28</sup>各种饲草的种植和系统的施肥能够饲养大牲畜和提高奶产量。<sup>29</sup>所有这一切的强化农业既能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时强化农业也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得到促进。“到17世纪中叶，大多数城市都允许市民收集(工业的)废弃物(例如灰烬)并且将其卖给或送给农民”。<sup>30</sup>难怪罗马诺在对以农为主的欧洲的16世纪作了比较后，把1590—1670年这段时期称为“荷兰的农业世纪”。<sup>31</sup>荷兰在农业技术方面越来越有效率，而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却相对静止，差距越来越大。

联省共和国不仅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农业生产国，同时也是主要的工业产品生产国。人们耗费了大量的笔墨去解释荷兰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化的原因，以致我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它的确是这么做的。值得称颂的是，查尔斯·威尔逊在论述尼德兰的大量著作中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观点。<sup>32</sup>人们首先会在纺织业这一传统的主导的生产领域看到工业的进步。尼德兰北部在16世纪60年代已开始从尼德兰革命造成的难民北流中获利。纺织工业的生产集中在莱登<sup>33</sup>，那里，英格兰的各种“新织布业”本已闻名于世，但莱登却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优势地位。一百年间，工业生产突

飞猛进,并在17世纪60年代达到顶峰(按指数估算,以1584年为100,1664年达到545,而1795年为108)。<sup>34</sup>生产规模不仅在量上扩大,而且,到17世纪60年代,莱登的纺织工业的主要对手,东英格兰的“新织布业”,也“不得不开一场艰苦战”。<sup>35</sup>奥斯特伦(A. ström)在估价17世纪波罗的海贸易中荷兰的实力时,把纺织生产的效益作为第一个解释,把荷兰人充当英国布匹(和南欧盐)的中间商作为第二个解释<sup>36</sup>——生产优势第一,商业优势居次,但紧随其后,并为前者所支持。

这种优势明显地在奥尔德曼·科克因的方案(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的历史中得到证实,通过它,英国力图扭转英国把未印染、未加工的布匹运到荷兰进行加工的局面。1614年,詹姆斯一世明令禁止“未印染”的布匹出口,荷兰则以禁止制成品的进口作为回敬;针对荷兰人的回敬,詹姆斯一世再次以禁止羊毛的出口进行反击。如苏普莱所说,这是一场“巨赌”<sup>37</sup>而且是一场以惨败告终的巨赌。三年之中,英国的出口量下降了1/3,该方案于1617年寿终正寝。赌注一直很大。威尔逊已算出,47%的附加价值归于印染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荷兰完成的。<sup>38</sup>可以看出,英国不可能赢得这场赌博,因为我们知道,荷兰这个时期在染料生产以及印染成本中享有绝对的优势。因此,17世纪前半期英国与联省共和国在布匹贸易中的竞争,正如捕鱼业一样,反映了“重商主义者未了的宿愿”。<sup>39</sup>

近代早期的第二大工业是造船业,在这一领域,众所周知的是,联省共和国同样独占鳌头。<sup>40</sup>鲜为人知但是要作清晰分析却必须知道的事实是荷兰造船业具有的“现代规范,日益标准化的、可重复运用的工艺方法”。<sup>41</sup>它高度机械化并采用了许多节省劳动力的方法——风力锯木机、与锯床相配的动力送料器、滑车和绞辘、搬运重木料的巨型起重机——所有这一切机械设备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sup>42</sup>它与工商复合体的联系是惊人的。阿姆斯特丹有一系列相互连贯的工业部门——缆绳工场、面包房、供应船用杂货以

及制造航海仪器和绘制海图的部门。<sup>43</sup>为了造船,需要木材——大量的木材。据估计,造一艘战舰需要 2000 棵树龄达 100 年的橡树,这样的木料不容易裂开;2000 棵橡树那时需要 500 英亩林地。“木材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波罗的海地区。荷兰人之所以独占这项贸易是因为他们在纺织生产中的效率。当然,结果便是造船业的实力,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荷兰能够统治世界商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造船业的发达。进一步说,除造船业以外,由于荷兰其它工业部门是“完全依赖”水上的供给,船队“一定被看作是一种真正的生产要素”。<sup>44</sup>因此,造船便是生产资料的生产。

纺织业和造船业并非仅有的重要工业部门。至少在 1660 年以前,荷兰还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制糖中心。<sup>45</sup>酿酒厂在 1600 年以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加”,并持续了一个世纪。其它的工业有造纸业、伐木业、出版业、制砖和石灰业,它们在 1500 年左右得以扩大并在 18 世纪“不断繁荣”;还有陶器业、烟草业和管道制造厂;17 世纪专为出口而兴起的规模宏大的制革业,17 世纪之交达到顶峰的啤酒酿造业;还有 17 世纪中叶最为繁荣的油脂和肥皂的生产;当然还有化学工业,其最初目的是生产染料,<sup>47</sup>以及人们不应忽略的军火工业。由于八十年战争和三十年战争的刺激,政府鼓励战争物资的进口,从而使军火工业稳步扩大。16 世纪末已有大宗的出口贸易;1600 年时,生产结构已经由手工行会转变为工场制造业和从来料加工到销出成品的生产体系。<sup>48</sup>

这并不是说,联省共和国在 1575 年至 1675 年这 100 年中,在一切工业领域中都占据优势或者没有任何强劲的竞争对手;如果如诺思(North)和托马斯(Thomas)所说,尼德兰“是获得自我发展的第一个国家”,<sup>49</sup>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相互配套、联系紧密并成一体化的工农业生产体系——而且没有受到 80 年独立战争带来的复杂经济形势的影响。<sup>50</sup>17 世纪时,任何仔细的观察家对荷兰现状的观察都不及英国人。1673 年,英国大使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爵士发表了《联省共和国》一书,其



中指出：

我深信那些聚集在狭小地带的广大民众才是贸易的真实来源和基础，这里，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很昂贵，拥有财产的人们都习惯于精打细算，而那些不名分文的人则不得不去工场做工。体力强健的人都从事劳动，这并不是为了弥补什么创造发明造成的缺陷。这些习惯起初来自于生活的必要，以后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的习俗。<sup>51</sup>

威廉爵士希望英国也出现同样的情况。

在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数据中可以证实这种生命力。众所周知，16世纪后期有过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特别是工匠和市民，他们从尼德兰的南部迁到北部，特别是从安特卫普<sup>52</sup>到阿姆斯特丹和莱登。<sup>53</sup>1622年，联省共和国60%的人口是城镇人口。其中的3/4居住在人口已超过1万的城市。<sup>54</sup>阿姆斯特丹的人口翻了两番——从1600年的5万增到1650年的20万，<sup>55</sup>它已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大熔炉”，它把佛兰芒人(Fleming)、瓦隆人(Walloons)、德意志人、葡萄牙人以及德裔犹太人(Jews)、法国的胡格诺教徒(French Huguenots)都变成了“真正的荷兰人”。<sup>56</sup>多数作家的目光集中于迁移来的商人和工匠阶层；特别是对于那些居住在贫民窟的广大无产者发展状况的观察(但不仅仅限于莱登)，至少是十分重要的。许多被雇佣的工人是妇女和儿童。正如让南敏锐地指出，“各种对立和冲突有一种现代性的反响”。<sup>57</sup>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已涉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简言之，可以说，在16世纪晚期，尼德兰北部已经具有了稳固的生产效益，从而使联省共和国在1600年左右发展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生产中心。在农业部门，它专门生产需要高技术并能创造高额利润的产品，<sup>58</sup>在工业部门，荷兰不仅在纺织业和造船业这两个当时主要的工业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其他工业中起着重要的、有时是统辖的

作用。正是以这种生产效率为基础，联省共和国才能建立起它的商业网络并把它自身变成“世界仓库”。<sup>59</sup>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段稍微熟悉的历史。

17世纪时，荷兰船运业统治了世界海运贸易。从1500年至1700年发展壮大10倍。到1670年时，荷兰拥有的吨位是英国的3倍，比英格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以及德意志拥有吨位的总和还多。荷兰造的船所占的百分比更大。荷兰的船运业实际只是在17世纪后半期时才达到顶峰。英国内战之际，荷兰趁机确立了它在“世界运输贸易中的毋庸置疑的优势”。在荷兰船队贩运所有的荷兰纺织品的时候，即使是属于拥有专卖权和获得特许状的公司英国船队，却不得不与荷兰船队共同贩运英国的纺织品，而且只占有很少的份额。<sup>60</sup>一直到1728年，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仍把荷兰人称作是“世界马车夫、贸易的中间商、欧洲的代理人和经纪人”。<sup>61</sup>17世纪荷兰人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他们“足迹遍及各地”<sup>62</sup>——东印度群岛、地中海、非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同时，他们仍控制着波罗的海[伊斯特兰(Eastland)]的贸易；他们扩大了西北欧贸易的份额，并得到了通往内陆的内河贸易通道。

东印度群岛贸易的历史当然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的历史。该公司是集投机事业、长期投资和殖民于一身的资本主义贸易公司的典范。<sup>63</sup>在阿姆斯特丹，它拥有精于运筹的董事“十七人委员会”(De Heeren Zeventien)，在巴达维亚(Batavia)有数位难以驾驭的代理领事，其中，以简·皮德斯戎·科恩(Jan Pieterzoon Coen)为主。<sup>64</sup>在某些方面，荷兰退回到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当安特卫普于1580年落入西班牙人手中的时候，欧洲的香料市场便转到了阿姆斯特丹。但是，由于西班牙于1580年兼并了葡萄牙，从而使里斯本成为欧洲进口香料的港口，因此，荷兰人力图避开西班牙人。<sup>65</sup>因而，利里利斯·德·豪特曼(Cornelis de Houtman)身负使命于1592年被派往东印度群岛。第一支贸易船队于1598年起航。1602年，荷兰国会授予东印

度公司特许状，这样做，一是为了遏制荷兰人内部的毁灭性竞争，二是为了给小投资者一个可靠的出路，三是为了创立一种反对西班牙的经济和政治的武器，另外就是为了得到比在欧洲得到的更多的香料。<sup>66</sup>

实际上，这是进入海运香料贸易的良机；穿过立范特的洲际贸易的重重封锁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样，发生在1450年至1500年之间，而是1590年至1630年之间。<sup>67</sup>因此，机会难得，荷兰人抓住了它。印度洋的重要航线由北半球（红海和波斯湾）转到了南半球（好望角）。荷兰人之所以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是因为他们拥有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技术。正如帕里（Parry）所指出的那样，“横帆船战败了三角帆船，贸易风战胜了季风”；<sup>68</sup>但是，荷兰人一涉入这种贸易，就遇到了与外部区域贸易的基本问题。因为这是一种奢侈品贸易，利润高，竞争激烈；但是因为这是奢侈品贸易而非必需品贸易，因此市场狭小，而且奢侈品充斥市场可能产生严重后果——腹背受敌（Scylla and Charybdis<sup>[1]</sup>）。<sup>69</sup>有两种办法可以对付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其一，通过把该群岛合并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地区，从而改变这种贸易的性质；其二，求助于在世界帝国之间以传统的远距离商业方式进行的“行政”贸易。到底采用哪一条途径，实际上在科恩和十七人委员会争论不休。科恩，这位“亚洲的铁腕人物”，<sup>70</sup>推出了前一种选择；而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上司却主张采用后一种。

科恩认为，东印度群岛的边缘化需要一种双重意义的殖民化政策：一，建立政治统治以制服那些相对强大的亚洲君主并重新组建生产体系；二，输出一个白肤色的占领阶级，这样，既有助于管理专供出售的农作物的生产，又为欧洲的除贵金属以外的出口商品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初级市场。他说，这种政策与行政贸易

---

[1] Scylla 为意大利墨西拿海峡上岩礁，古希腊神话认为该岩礁上居住着6个女妖。它的对面是 Charybdis 大漩涡。西方作品中以此为成语，喻腹背受敌、进退两难的处境。——译者

是不相一致的，它需要一种市场的运行原则。讨论这种政策时所用的术语常常被错误地当作是自由贸易和垄断；<sup>71</sup>但实际上，科恩并不反对东印度公司“在这一市场中”行使垄断（而且常常得到蛮横暴力的协助）；十七人委员会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有限的力量难以限制别人进入那样漫长的远距离行政性贸易。<sup>72</sup>这实际是一个短期内什么最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问题——剥削的利润还是投机的利润。短期内，那些赞成投机的人占了上风；<sup>73</sup>但是从长期来看，正如我们以前所认为的，<sup>74</sup>生产的剥削利润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占据领先地位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中心区列强（不仅有尼德兰，而且还有不列颠和法国）在18世纪时使印度洋地区边缘化，1750年以后才真正奏效。<sup>75</sup>

17世纪东印度公司的种种策略是否如马西尔曼（Masseman）所说的那样，是“目光短浅”<sup>76</sup>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人们必须看一看各种选择。在世界经济体处于相对普遍衰退的时代，其他地方还会有更多的剥削利润吗？答案是肯定的——在伊斯特兰，在西北欧，在美洲，一切都唾手可得。为什么要考虑东印度群岛呢？人们奇怪，东印度公司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全面逆差是否并没有掩盖收入在内部转移以及资本在联省共和国内部，从小投资者转向大投资者集中的巨大的过程。<sup>77</sup>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可以说，东印度公司起到了股票交易所的作用，对那些优先获得信息的人们来说很有利，如十七人委员会；但是它那时的历史，至少到17、18世纪之交时，更多的是金融方面而不是商业与流通方面的。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一个地区的统治是如何与另一个地区的统治相联系的。

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在17世纪时可能是荷兰的商业扩张中最富有戏剧性和最为辉煌的一个方面，但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也解释不了荷兰的霸权。荷兰商人出现在印度洋的时候，他们开始往来于地中海。1609年荷—西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出现了转折。<sup>78</sup>但是，两个贸易区应该有所区别。首先是普遍与基督教地中

海，特别是意大利北部进行贸易，这里，实际上只是供给经常必需的谷物，但是由于意大利农业歉收、瘟疫以及与立范特的政治分裂而使谷物供给日趋减少，在这同时，意大利北部的工业由于布匹出口到这个曾是纺织工业的出口区而受到损害，威尼斯的船队也被取代了。<sup>79</sup>16世纪末及17世纪初，英国人、法国人以及汉萨同盟与荷兰人一起竞争地中海贸易；但是荷兰人取得了最大的份额，这是因为他们的“船舶设计技术和商业组织”<sup>80</sup>占有优势，从而使他们能够将北欧的谷物（及其它产品）运往地中海并首先保证伊斯特兰贸易中谷物的安全。

在赢得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贸易之后，“荷兰人继续攫取（另一个商业区）‘富裕贸易’的大部分，同时，伴随他们商业活动的还有与他们残忍性格同样行之有效的暴力”。<sup>81</sup>一个紧接着另一个，因为地中海“富裕贸易”中的商业活动并非新生事物。实际上荷兰人在与立范特的贸易中正日益取代传统的威尼斯人的功能。这时，立范特准备从西北欧而非东印度群岛进口更多真正的商品（既非贵金属，也非奢侈品），但他们在1600年至1750年期间实际上出口了比印度洋地区出口还要多的奢侈品，在印度洋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茶叶、咖啡、印花布以及其它商品的出口，它们最终成为大宗商品，超过奢侈品。那时，立范特还是外部区域的一部分吗？难说；虽然立范特向边缘区地位的过渡要到18世纪晚期才能彻底完成，但毕竟开始了。

大西洋贸易——既面向西半球又面向其附属的西非——使我们不断地靠近荷兰商业网的中心。我们已经在两大荷兰公司，东印度公司和“比较晚的而且不怎么成功”的西印度公司之间作了较多的比较。<sup>82</sup>首先，他们各自的社会支持基础不同。东印度公司控制在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手中——他们是阿米尼信徒（Remonstrants）和和平的支持者。<sup>83</sup>西印度公司则是他们的对手艰苦创业的结果——有奥兰治“党人”（Orangists）、卡尔文教徒（Calvinists）、泽兰人（Zeelanders）以及定居在北方的南尼德兰移民

——他们是勇于开拓、尚武的冈马鲁斯信徒(Gomarian)。<sup>84</sup>当该公司于1621年6月3日(也就是荷—西停战协定签订后几周)成立的时候,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也渗入该公司;一个“传教士的殖民团体”的计划开始演变为一种“私捕对方商船的组织”。<sup>85</sup>于是在西印度公司内部便发生了两种不同利益的斗争,斗争的一方是经济上较弱的泽兰人,他们依赖于公司对商船私掠的垄断,另一方是阿姆斯特丹商人,他们准备阻止任何荷兰企业家采取的商船私掠行为。<sup>86</sup>

因此,西印度公司便成为一个“贸易与宗教交战不休的混合体”,结果,我们知道了“混乱的近于破产的令人凄凉的故事”。<sup>87</sup>无疑,这是事实;然而,这种被认为是政治性的努力实际上为17和18世纪资本主义贸易的中心柱石打下了基础:即所谓的三角贸易,它向欧洲提供棉花、糖和烟叶,所有这些当然是用非洲的奴隶劳动以及欧洲为了从西印度群岛获取香料和茶叶而使用的白银。<sup>88</sup>荷兰人是这种结构的先锋,如果利润大部分流入英国和法国,这主要是因为最初的“社会投资”不仅庞大而且浪费时间,用荷兰人创造的簿记术语来说,17世纪70年代荷兰霸权终止以后,利润被后来生产上更有效率的英国人所获得(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法国人所得)。

1621年西印度公司建立以后,荷兰人力图在下一个20年在大西洋扩张。他们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征服了巴西的东北部,把它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手中夺回,而且着手夺取西部非洲的埃尔米纳(Elmina)和安哥拉的卢安达(Luanda)。但是,在第一次英—荷战争(1652—1654年)中,葡萄牙人(当时又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重新夺取了巴西;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荷兰人丧失了新阿姆斯特丹和西部非洲的一些据点。那么,在与这么短暂的霸权相一致的时期内,完成了什么目标呢?首先,荷兰人把西班牙人阻止在美洲的海湾,提供了一种“海军屏障”,<sup>89</sup>从而使英国(加上苏格兰)和法国在其后能建立许多殖民地。第二,蔗糖的种植开始于

美洲境内的巴西，荷兰人遭驱逐以后，它被转到了巴巴多斯(Barbados)，这是第一块辽阔的英属加勒比海种植园殖民地。第三，荷兰人为了向蔗糖种植园提供人力，第一次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奴隶贸易；当荷兰人失去这些种植园时，他们试图以奴隶贩子的身份留在这一领域，但是，到1675年时，荷兰的优势结束了，让位于新成立的英国皇家非洲公司。<sup>90</sup>

荷兰人的大西洋时代无疑对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它为荷兰人做了多少呢？当然没有波罗的海贸易做得多，波罗的海贸易在16世纪就已经成为“母体贸易”了，当时，荷兰船队在总的贩运中占了60%左右。17世纪时，至少在1660年以前，尽管英国人竭尽全力要打入荷兰人的市场，荷兰人仍继续维持着其统治地位。<sup>91</sup>这说明了荷兰的商业优势。在英国人和荷兰人甚至还有法国人(更不用说北方诸国)都一致认为，对船运业的控制是极为重要和有利可图的，而在重要的区域内，荷兰人独自占了大头。<sup>92</sup>在仔细考察了世界经济体的日益停滞对英—荷在波罗的海的竞争产生的影响后，苏普莱和赫顿(Hinton)以同样的两种因素解释了荷兰的优势：廉价的货运和对出口白银的充足供给的控制。<sup>93</sup>莫里洛把荷兰的优势另外归因于他们比伊斯特兰公司(Eastland Company)愿意购买更多的谷物。<sup>94</sup>或许，他们以低价出售鱼类而实际形成的倾销也起了一定作用。<sup>95</sup>

拥有可供出口的白银是通过航运和纺织业的生产效益而获得的一种优势，这种效益使荷兰能从西班牙人和其它人那里得到白银。为什么在波罗的海的贸易中拥有白银是一种优势呢？这是因为经济紧缩和三十年战争引起了英国人所称作的“货币的上涨”(德意志人称为Kipper- und Wipperzeit)，它导致相对白银而言的小额货币的贬值。荷兰、德意志、丹麦的银币(rix dollar)，一种含银量不变且可携带的银币，在1600年时值37个小银币，到1630年时值90个小银币，其最大的增值，从45上升到75，发生在1618年至1621年间。这些转变的发生是因为小银币的含银量减少了，

虽然宣布它的含量是随着荷兰、德意志、丹麦的银币币值而变化的。<sup>96</sup>问题是它对荷兰的影响为什么不同于其对英国的影响。两者现在大致都可以在波罗的海以较低的白银价格得到产品；但是，要这么做，就不得不有“现成的货币”出口，而这方面荷兰人能做到，英国人则不行。另外，当一场全面的贸易萧条出现时，廉价进口不如更廉价的进口重要。

对英国人来说，根本的问题是荷兰商人能在英国以低于英国商人的价格出售波罗的海商品。<sup>97</sup>英国的伊斯特兰商人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像荷兰人那样，获准把波罗的海的谷物再出口到地中海；但是他们遭到了英国小麦商的强烈反对，这些商人由于担心英国谷物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每当价格高于一个较低数字时，他们就成功地禁止了出口。<sup>98</sup>结果，英国人在地中海没能挣得白银，他们本来可以用这些白银充分利用波罗的海低廉的价格，这样转而又会使他们获得更多的产品以得到更多的白银，等等。因此，由于荷兰人对波罗的海贸易以及地中海贸易的控制，因此，波罗的海的货币贬值对荷兰人比对英国人更为有利；它也使得荷兰人开始“侵吞英国商人在其英国本土上的商业利益”。<sup>99</sup>

在这种局面中，最后一个因素便是内河贸易，这种贸易在尼德兰起义以前一直属于安特卫普。当荷兰人封闭塞尔特河 (River Scheldt) 时，贸易便转向阿姆斯特丹，之后，有两条途径可使这种贸易再度转回到安特卫普：一是扩大联省共和国的版图，把安特卫普包括在内；二是和平和自由贸易。前者从未出现。斯米特 (Smit) 推测，尽管联省共和国宣示过那些目标（而且是奥兰治党人和卡尔文信徒的真实愿望），但是由于缺乏努力而归于失败：“荷兰并不想恢复南部诸省的原状，这样会出现贸易流回到解放了的安特卫普的风险”。<sup>100</sup>1648年当和平最终来临之时，阻止任何通过斯耳德河口到安特卫普的贸易的寓禁税<sup>[1]</sup>条款被写进了和约。<sup>101</sup>因此，

---

[1] 寓禁税 (prohibitive tax)，规定极高税率以阻止有关商品的贸易。——译者



作出如此巨大的政治努力是因为总的说来转口贸易十分重要；人们可能会认为，到 1648 年，阿姆斯特丹感到安特卫普再次崛起的威胁已经解除，但是，有一个生产所需的主要项目，这方面无机可乘：土煤<sup>[1]</sup>。它最初是为了供应安特卫普和布拉班特 (Brabant) 市场，然而在 16 世纪 70 年代以后，便转向位于荷兰境内的伊吉 (IJ) 和马斯河之间的地区。土煤的使用对荷兰城市工业的发展极为重要，它“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能与煤对 19 世纪欧洲产生的影响相比”。<sup>102</sup>此外，内河贸易还把城市的肥料运往其他地区，这有助于使“荷兰的谷物种植获得极好的高产”。<sup>103</sup>

从 16 世纪 80 年代起，改善了的运河的定期服务网络把荷兰各城市相互联接起来，也把其它诸省的腹地和布拉班特联在一起——都以荷兰为中心。1632 年初，由于修建第一条航道，即一条笔直的需要大量资本的运河，它为过往客船配有拖船路。<sup>104</sup>荷兰造船商建造了许多能以最快的速度在河流和湖泊上集散货物的船只。<sup>105</sup>结果形成了欧洲最有效的内河运输网；并在 17 世纪 60 年代达到了运输交通的顶峰。如果我们把这几件事结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即最远的贸易路线——东印度群岛、立范特，甚至基督教地中海和大西洋贸易——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却是次要的。荷兰从 17 世纪 20 年代（或许早在 16 世纪 90 年代）至 17 世纪 60 年代之间在欧洲世界经济中商业霸权的关键是“保持了北欧和西欧之间的古代贸易”；<sup>106</sup>荷兰人能够获得商业霸主地位的原因与他们以前的工农业效益息息相关。这又通过货运费用、保险费用以及经常性费用转换成商业效益。

为什么荷兰的货运费用如此便宜呢？最大的原因是船只造价低廉。帕里列举了六种成本优势：荷兰造船的技术，材料使用的节省，节省劳力的方法，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大规模的材料购买，荷兰船只对建筑材料的廉价运输。结果，总的生产成本，直到 17 世纪中叶时，还比他们最近的竞争对手英国便宜 40% 至 50%。<sup>107</sup>

[1] 土煤 (peat)，即泥炭。——译者

就这些优势而言，前三种被看作是荷兰人技术的先进，后三种则是在前三种之上累积起来的优势。荷兰的船只不仅造价节省，而且其船只需要的船员不多——一般正常的是 18 人而不像其它国家的 26~30 人。<sup>108</sup>这样能使荷兰人提高他们船员的待遇，比其它国家的船员实际要好许多；<sup>109</sup>因此，他们能以较低的支出获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人们可以在港口及海上看到这种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荷兰船只的“坚固和速度”是“定期保养”<sup>110</sup>和设计的结果。而且，荷兰船只因其“更干净、更便宜、更安全”<sup>111</sup>产生了一种螺旋式效应：更便宜的货运导致荷兰对波罗的海贸易的控制，从而可以获得更廉价的木材，由于更廉价的木材使造船更为便宜，低廉的造船费用又使得货运更为便宜。较为干净、便宜和安全的船只也意味着整个船运量的增加，从而能拥有较低的保险费——部分取决于其规模，部分取决于更为有效的金融机构，<sup>112</sup>对此我们还将作简略的讨论。较低的保险费用也是累积而成；它们导致了较低的货运费用，这又引起了货运规模的增大和交易技能的提高，从而导致更低的保险费用。

在“(荷兰)贸易的基础是造船业”<sup>113</sup>这句话中，最大的利润是在庞大的阿姆斯特丹的货物集散地通过交换和对各种商品按质分类<sup>114</sup>取得的，取得这样的成功应归功于荷兰商业组织形式的优越。赫克舍(Heckscher)说 17 世纪尼德兰“最大的特征”是它“具有促使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少而且较为简单的商业组织不断变换……的能力”。<sup>115</sup>但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它意味合伙经营体系中储蓄的集中，<sup>116</sup>当然这并非荷兰人首先开始的；然而，他们却把它扩大，并包括了狭小的商业贵族阶层和数目庞大的小商人。<sup>117</sup>其次，它意味着一种缓冲股票体系的建立，这一体系极大地减少了商人们的风险，尤其是在垄断组织出现以后，而且在使商人在推销过程中能够赚取投机利润的同时，这种体系减少了原材料市场对于变幻不变的供给(和成本)的依赖。<sup>118</sup>其三，它意味着一个委托代理人网络的形成，这些代理人为生产者寻找买主，以寄售的方

式获得商品并且接受买主付给生产者的汇票而获得委托。<sup>119</sup>因此，荷兰人的转口贸易紧随船运业发展起来，而船运业本身又是荷兰工业实力的结果。<sup>120</sup>这样再次产生螺旋式效应：荷兰人转口贸易的发展“日益摧毁”<sup>121</sup>了英国的船运业。当然，这种转口贸易带来了大批稳定的就业，<sup>122</sup>这些就业尤其在 17 世纪支持了对荷兰产品的内部需求。

我们已经说明，荷兰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优势的顺序是生产、流通、金融。如果这个顺序的第一部分还有争论的话，那么第二部分已是普通常识；但它常常表现得有点厚颜无耻，高尚勤俭的（商业）资本家变成卑鄙、爱奢华的食利者，在天堂出卖新教伦理，这就是为什么荷兰从伊甸园被赶出去的原因。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强烈反应来指责这种胡言乱语，但我希望走得更远些。转向金融并不是一种衰退的标志，更不用说衰落了；它实际是一种资本主义加强的标志，阿姆斯特丹的股票市场被比作“17 世纪的华尔街”<sup>123</sup>。这种实力的根源是什么呢？它是由一个顺序的三个步骤所引起的：一，在世界经济体中，生产和金融实力的加强为坚固的国家金融业奠定了基础。二，与世界范围的商业网相结合，坚固的国家金融业使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支付体系和货币市场的中心，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停滞和由此带来的资金不稳定性的形势下更是如此。三，生产与商业实力以及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控制，使得荷兰资本得以输出，这种资本又以汇款的形式送回国内，使得荷兰人能以远远超出他们创造的生产剩余为生，这种状况在他们自己的主要生产贡献时代以后还延续了很久。

在一个发展速度已经放慢的世界经济体中，联省共和国“总能清偿债务”<sup>124</sup>并成为 17 世纪“令人忧虑的连续拖欠债务”<sup>125</sup>的主要的例外，表明它既是全面经济称霸的原因又是其结果。从在海运和保险上的商业优势足以产生收支中的余额来说，它是结果；<sup>126</sup>由于可靠的金融业的声誉使荷兰政府能够以较低利息取得贷款，<sup>127</sup>由于荷兰政府极好的信用促成了“（它的）大部分军事胜利”<sup>128</sup>，并且由

于它成为安全的储备场所从而吸引了大量的金融资本，使得联省共和国能够拥有一种超值货币，从这几方面来说，它是原因。这最后一项优势意味着联省共和国能够平衡当前财政与得到的金融流量之间的赤字。<sup>129</sup>但是，可靠的金融业只不过是获得一般资本家的信任的一个必要条件，这种信任对于有效的金融交易的运作是必需的。可靠的金融业能够促进以低息进行大规模的信用交易，并且，每次低利润的金融交易，使获取总体的高收益成为可能。

1609年，也就是停战协定签署的那一年，建立了阿姆斯特丹银行；由于它“在17世纪的银行编年史上提供了一种少有的安全和便利”，很快就成为欧洲储蓄和兑换的巨大中心。在这一世纪中，储蓄量从不足100万弗罗林(florins)上升到1600万弗罗林，<sup>130</sup>而且它还成为那些为其财富的安全担忧的资本拥有者的好去处。<sup>131</sup>一旦有了足够的贵金属和货币储蓄，阿姆斯特丹便掌握了“可以说是欧洲国际支付体系的钥匙”。<sup>132</sup>由于拥有大量库存货币，阿姆斯特丹建立了一种允许多方面扩大结账的汇票体系。当然，需要时间建立信用和财源；但是，最晚到1660年，阿姆斯特丹无可争辩地成了一个多边支付体系的核心角色，并且一直保持到1710年。<sup>133</sup>关于对贵金属出口的限制，在重商主义时期的所有国家中，联省共和国是个极大的例外：贵金属流出联省共和国同其流入联省共和国一样的容易。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贵金属流入的原因。<sup>134</sup>当然，这种政策只有在确保贵金属流入时才有可能。同许多其他现象一样，这种现象在形式上也是螺旋式的，每一次行为都促使下一次行为，具有更大的获利可能性，直至最后达到顶峰。

储蓄和兑换的可靠性的增强使阿姆斯特丹银行在1683年得以开创信托业务。开始时对储户提供许多“贷款”，后来是承担了“承兑信用”，这些交易不再依赖阿姆斯特丹的转口交易，而且基本上不再依赖远方中心的交易信用。<sup>135</sup>荷兰人在“非常稳定”的特殊储蓄的基础上发展了信贷业务，因为自阿姆斯特丹银行成为贵

金属的仓库以来，“以一船贵金属来代替承兑汇票的成本已大大降低”。<sup>136</sup>最后，荷兰货币的稳定性使其贸易货币(negotiepen - ningen)，即银币和金币，具有“质量上的可靠性”，致使他们成为世界贸易中受人们信赖的硬币，对西班牙的 reales de ocho 也造成了威胁<sup>137</sup>。金融的流通转而又产生并维持了低利息率，这种低利息率又促进了进一步的流通。在整个 17 世纪，荷兰的利率降低了一半多，迫使英国、法国甚至瑞典降低利率；然而，后面的这些国家从来没有把利率降到足以与荷兰进行有效竞争的程度。<sup>138</sup>低利率把我们引向投资问题，它是金融利润的又一个来源。既作为欧洲的主要货币市场又作为主要的商业转口贸易基地，阿姆斯特丹得以显著降低借贷资本的调查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并因此激励了广泛的投资。<sup>139</sup>作为当时技术上最先进的社会，联省共和国也能够输出其技术，这是保证其内部金融流通的又一手段。<sup>140</sup>

扩大国内外的投资对荷兰的资本家极为有利，并且有助于这个国家支付体系的平衡；但是，它有助于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吗？近年来，就重商主义的含义展开了一场令人费解的争论，认为荷兰的“衰落”在某些方面应归因于联省共和国之外，尤其应归因于在英国所进行的大量投资。这将会否定投资者关心的是赚取最大利润，而不是支持国家这一事实。<sup>141</sup>我们将在讨论英国金融业的发展时再次谈及这一问题。目前，还是让我们看看范·迪伦提醒我们的，即资本的增进“对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人们只需考虑一下通过津贴而达成的联合”，<sup>142</sup>这是一种旨在加强私人团体投资的国家投资形式。的确，我们如果不直接考察国家所起的作用，就不能完满地阐明荷兰称霸的历史。联省共和国在 17 世纪重商主义观念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似乎是一个极大的例外。许多人根据这一事实作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推断，认为荷兰国家是衰弱的。而依我看，事实正与此相反：17 世纪时，荷兰是欧洲唯一具有足够的内外实力的国家，它极少需要重商主义政策。

我们简略回顾一下这种观念和实践的本质，然后再考察联省共和国的这些内外实力。历史上较早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当然奉行的是一条强有力的保护主义路线，<sup>143</sup>这条路线 17 世纪时在城镇范围内还没有完全消失。<sup>144</sup>进一步而言，许多人对联盟范围内缺乏保护主义提出了异议。随着这一世纪的深入，工农业部门便失去了他们的优势，只得求助于关税，但成效有限。<sup>145</sup>最高议会 (Estates - General) 在与英国和法国的斗争中也没有超出关税报复。<sup>146</sup>国家的作用不仅清楚地表现在保护政策方面，它也为私人企业的成功创造了条件。尼德兰一成立自治政府，“捕鱼业便成为该政府最为关注的行业”。<sup>147</sup>为了控制质量，奥兰治的威廉在 1575 年将五个渔港的代表召集在一起，并且在 1580 年至 1582 年期间通过一系列的法案创立了一个控制鲱鱼工业的社团组织。<sup>148</sup>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是针对殖民地商品的自由的世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确保海外倾销而作出的重要反应。斯托尔斯 (Stols) 指出，它们的重要意义的关键在于“国家在贸易和经济中的干预”，而且他还指出，两个公司的成立“几乎可以被称为‘特许状推进’的国有化”，这是一种努力将以前的国际贸易联合在一个国家垄断下的模式。<sup>149</sup>

荷兰政府捍卫了其企业家的利益，而很少考虑这么做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否一致。荷兰霸权的观念是公海 (mare liberum)，格劳修斯 (Grotius) 在 1609 年，即停战协定签订的那一年出版的著作中，最充分地表述了这个观念。然而，正如乔治·唐宁爵士在 1663 年 11 月 20 日写给克拉伦登勋爵的信中尖刻指出的那样：“不列颠海域是公海，但是非洲海岸和东印度群岛则是领海 (mare clausum)”。<sup>150</sup>这一切不足为奇。<sup>151</sup>联省共和国占统治地位，而“自由主义正适合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sup>152</sup>但是，每当自由主义与统治地位的延续发生冲突时，它就不会再延续下去。这是因为荷兰国家的那种“自由的”分散结构可以被看作是强大而不是衰弱的指示器。当然并非任何分散的结构总是一种强大的标志。在一个

边缘区如波兰，地方议会和小邦国的崛起则是衡量边缘化的尺度。然而，在这个霸权国家中，这样一种结构相对于其它中心国家来说则是实力的标志，这些国家确切地说需要增加行政集权以尽力削弱这个霸权国家的经济优势。

联省共和国的结构是什么？从 1579 年的乌特勒支联盟 (Union of Utrecht) 时期到 1795 年分权国家衰落、巴塔维共和国 (Batavian Republic) 建立的时期，细节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每一次相继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并非大不相同。早在 1576 年，七个邦(或省)——海尔德兰 (Gelderland)、荷兰、泽兰、乌特勒支、弗里斯兰、上艾瑟尔 (Overijssel) 和格罗宁格——都同意派代表团参加最高议会。在那里，每个邦都有一票表决权，而且决议必须无异议地通过。此外，还有一个相当软弱的被称为政府议会 (Council of State) 的执行机构。主要的军事组织——舰队，由五个不同的海军部机构管理日常事务。最重要的邦国——荷兰，还有自己的一套臃肿的政府机构；它的中央议会，荷兰国会 (States of Holland)，由不同城镇的 18 名代表和一名整个贵族阶层的代表组成。联省共和国没有君主。最相近的是总督 (Stadholder)，一名省级官员。奥兰治的国王同时也是各个省(但不是全部)的总督，当然，两个所谓的“无总督时期”除外。人们看来不得不建立一个似乎不像是有效地运作或实际上在发挥作用的结构。

事实上，它确实发挥过很好的作用，尽管也有冲突和暴力。[从个别事件来看，那时几乎没什么事件能与 1672 年海牙的约翰·德·维特 (Johan de Witt) 的私刑处置相比，1672 年被称为荷兰历史上的“灾年”。] 但是，如果我们把联省共和国的内部纷争与英国、法国的内部纷争作一比较，任何有理性的分析家都能看出，尼德兰并不及其他两个国家混乱；统治阶级的内部分歧远没有达到分裂这个社会的程度，下层阶层很少叛乱。要解释这种现象，首先，我们应注意政府形式上的结构掩盖了(只是轻微地)另一种真正的结构。财政方面，荷兰省支付了几乎 60% 的政府开支，而阿姆

斯特丹就占了一半。荷兰联邦的主要的省级行政官员是国家律师。这一职位后来被改称为议长,外国人称为大议长,这一官位逐渐成为整个联省共和国的真正的首相,在“无总督时期”扮演了总督的角色。<sup>153</sup>

由于最高议会和荷兰联邦政府并存于海牙的同一幢建筑之中,由于大议长在最高议会中年复一年的非同寻常的实践带来的连续性,以及由于荷兰省成为所有荷兰活动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还因为阿姆斯特丹对于供养一半人口的粮食进口的控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增进了官吏的权力。<sup>154</sup>如果对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之初的主导地位存有疑问,那么,当荷兰省的权势成为“使这个国家融为一体的粘合剂”的时候,当对外政策“从属于贸易利益”以适应霸权需要的时候,这种疑问在1650年至1672年的第一个“无总督时期”就完全消失了。<sup>155</sup>阿姆斯特丹承担了费用,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它“感到有权发号施令”。<sup>156</sup>如果人们能在没有国家集权的情况下如愿以偿,那么为什么还要担心国家集权呢?雷尼尔(Renier)和他之后的威尔逊所称的“中上层的社会独裁”<sup>157</sup>无疑受到内部各种对立势力纷争的不断争夺——反阿米纽派(Contra-Remonstrants)对阿米纽派、奥兰治党徒对罗弗斯特尔派(the Lovesteiniers);虽然统治阶层的利益从未受到社会上更为保守的贵族的威胁,但它或许被一个缓慢的“贵族化”过程而削弱。<sup>158</sup>科斯曼(Kossmann)正确地指出:“奥兰治诸王极不情愿也绝不可能取代荷兰的财阀统治”。<sup>159</sup>

这一统治阶层实际上也没有受到来自下层的威胁;它的成员为社会和平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荷兰的社会财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财富,引起了外国游客们的“无限称颂”,这些游客或许并没有注意到这些金钱的大部分出自被没收的罗马天主教会的财产。<sup>160</sup>人们对此并不介意——因为其它国家在17和18世纪也没收了教会财产,尽管没有“广施于贫民”。<sup>161</sup>我们对荷兰这个福利国家不应抱任何幻想。荷兰资本主义的整个利润“对大多数人民几



乎没有什么益处”。最初稍有增加的实际工资经过这一世纪也下降了；<sup>162</sup>国家的繁荣与“众多工人团体的极大贫困”相伴而行，在阿姆斯特丹，大约有一半的人栖息于“肮脏的后院、地窖和地下室”中。<sup>163</sup>

如何才能产生相对的社会和平呢？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对于某些人而言，不断下降的实际收入由社会福利的支付来得到平衡，这些福利比中心国家其他地方都高。<sup>164</sup>第二个因素是，阿姆斯特丹因其利润而获得的声誉使它成为“邻近国家失业者和不充分就业者的趋赴目标”。这一秘密后来被纽约重新发现。一旦“阿姆斯特丹的道路铺满了黄金”的信念得以扩展，<sup>165</sup>工人们便从各地迁移过来——足以恶化居住在这个光明之城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足以使那些以面包屑充饥的人感到高兴，也足以使每个移民热衷于改善自身处境。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权力、繁荣，和少量的慷慨赠予，以及轻微的社会流动——简言之，一种典型霸权国家的社会政策。

内部的实力加强与对外实力的加强同样重要。17世纪前半期，荷兰舰队控制了海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一支舰队控制海洋。<sup>166</sup>当然，西班牙以前曾一直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海军强国。1588年，荷兰人帮助英国人结束了西班牙的“常胜地位”；尽管如此，直到1600年，西班牙的海军实力仍超过荷兰和英国。<sup>167</sup>一连串的海上胜利改变了这种状况。1634年，荷兰人夺取了库拉索(Curacao)时才固定了前面提到的“海军屏障”。1645年，荷兰舰队首次获得了海湾(the sound)的控制权。<sup>168</sup>因此，如伟大的海军理论家、海军上将马汉(Mahan)写道，“联省共和国把他们的尊荣和权势归功于他们的财富和舰队”。<sup>169</sup>可以确信无疑的是，这种权势在1651年至1678年间，也就是荷兰霸权的顶峰时期受到了挑战；在18世纪转折时的战争时期，荷兰较之于法国和英国已变成一个二等军事强国。但是，这正是荷兰经济霸权的结果。17世纪中叶有一时期，累积的经济优势似乎不易削弱，致使英国和法国决定“必须

用武力将荷兰从该领域中驱逐出去”。<sup>170</sup>事实上，用纯粹的经济术语来说，霸权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当然是不能维持下去的；但是人们不能因为一点摩擦而指责英国和法国。那么，我们可以坚信，国家是荷兰资产阶级用来巩固他们一开始就在生产领域内赢得并继而将其扩大到商业和金融业的经济霸权的必要工具。那些争夺中心和半边缘权势的国家，在后来摧毁这个霸权的过程中同样成了重要的工具。

文化领域的情况怎么样呢？难道没有思想、价值、科学、宗教、语言、激情和品质的空间吗？当然有，文化是人们用来包装其政治—经济利益和动机以便表达它们，掩饰它们，在时空中扩大它们并牢记它们的领域。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最主要的内涵，而且也是我们最多的外在表现，我们个体和群体的特性。霸权怎能会没有文化上的表现呢？它不会在一切情况下都表现为文化统治。中心区列强总是要支配边缘地区，涉及它们的文化时，总是把一种劣等的意识强加于人民；但是，一个霸权国家不可能做与其它中心列强同样的事。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霸权的文化至多可以当作一种典范，<sup>171</sup>特别是一种技术性典范；但是，准确地说，这些文化是竞技场，这里有对霸权的抵抗，这里，人们诉诸以公认的“文明”的历史价值抗拒暂时的市场优势。这种情况今天看来是如此，在17世纪时也如此。

另一方面，霸权的确在文化上放射着光彩，而他们的批评家总是带着面对酸葡萄的心理加以评论。首先，他们的物质需要和物质手段使他们能够科学地生产，这种劳动生产率渗入到艺术领域。其次，自由主义政治总是助长着文化的膨胀，这特别是因为开放政策总是吸引别国的文化名人的到来，从而使文化更加膨胀。第三，财富带来了奢侈，虽然它摧毁了财富本身的物质基础，但却培育了文化作品。显然，应用科学在荷兰受到关注。以前几个世纪的技术优势准确地说是荷兰工农业实力加强的关键因素之一。的确，17世纪时，荷兰人忙于输出技术，我们已经说过这种转变是内

部金融流量的来源。当然，它也是文化撞击的一个标志，在整个欧洲世界，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普鲁士、波兰，有许多在堤堰和排水区域劳动的荷兰移民组成的村落，即“荷兰村(Hollandries)”。<sup>172</sup>在输出农业技术的同时，荷兰人又投入大量精力改进他们的船运技术——特别是通过改进航海技术，努力降低成本。<sup>173</sup>

在描述英国君主如何在 1669 年至 1750 年间鼓励荷兰的熟练工人向英国迁移时，克拉克说，荷兰人来英国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面临着国内同行的激烈竞争，他把这样的竞争不情愿地比作是像英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轻易得到的机会”。因为 17 世纪时，“不管就业如何暗淡，如果需要独创性……如果我们在其中找到一个荷兰人，我们不会感到奇怪”。<sup>174</sup>如果我们想到与苏格兰的“特殊联系”<sup>175</sup>，那么我们同样不会感到奇怪。商业由于宗教的关系而得到加强，结果，数代苏格兰人奔赴尼德兰去接受大学教育。这是链环中的另一环，它表明了 18 世纪后期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来由。该运动是英国工业不断推进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的进步并不依赖于心智的自由；但它确实是孕育自由的一种途径，也是一种适合霸权的方式。但是，奇怪的矛盾是，心智自由主义总有其危险的一面，特别是在其内部。它自身的逻辑可能不会顾及统治阶层各派系间的政治妥协，它的口号可能会鼓动下层民众发动起义。因此，霸权国家鼓励自由文化的同时也压制它，通过建立不可捉摸的观念的岩石来表明其局限性（尤其是内部的），以便能使处于优势地位的统治阶级获得政治和经济利益并免遭报应。

我们看看对联省共和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荷兰是“哲学家们的天堂”<sup>176</sup>——这些哲学家有笛卡尔、斯宾诺莎和洛克，他们三人是 17 世纪思想界的巨子。笛卡尔在荷兰找到了在法国与他无缘的宁静和安定。斯宾诺莎被教会的公告从西班牙或葡萄牙籍的犹太人的居住区驱逐到比较友好的荷兰公民居住区。洛克则在—位荷兰人登上英国王位的令人兴奋的时代到来之前，寻求

避开詹姆斯二世愤怒的避难所。当然，还有许多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如科梅纽斯(Comenius)、朱里安(Jurieu)以及拜尔(Bayle)，他们都赞美了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存在。<sup>177</sup>对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来说，它确实是一块流放地；但是荷兰人是自由的，他们既对胡格诺教徒表示欢迎，也欢迎杰森派教徒(Jansenists)；此外还有清教徒(Puritans)，保皇党人(Royalists)和辉格党人(Whigs)；甚至还有波兰的苏塞纳斯教徒(Socinians)。所有这些人都是荷兰商业原则的受益者，这一原则是：“尽可能不颁布禁令，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输入”。<sup>178</sup>这种态度不仅仅受到高文化阶层的荷兰人的单方面的赏识，而且它是一件好事，涉及到每一个人。一方面荷兰以其“高薪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sup>179</sup>——吸取智慧并非近来的发明。<sup>180</sup>另一方面，由于避开了欧洲世界经济体中的多种对立，可以在其国内印刷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意味着荷兰<sup>181</sup>的摄政者们“已认识到经济的优势来自书刊和小册子的销售”；<sup>182</sup>因此，一些人凑巧选择的表达媒介<sup>183</sup>“成为另一些人的商业红利”。

但是，这种事情还有它的另外一面。1592年，正当联省共和国开始向世界霸权转变的时候，首次阿米里教的论战爆发了。在一切皆为恩赐，一切都是拯救的清教神学盛行的时代，雅各布斯·阿米尼乌斯(Jacobus Arminius)就抓住了卡尔文逻辑中最棘手的支脉——命定说的谬误推理<sup>184</sup>及其心理逻辑，绝对堕落的学说。阿米里乌斯反对他的主要对手弗朗索瓦·戈马(Francois Gomar)所信奉的恩赐即拯救的观点。戈马认为，作为一种选择，恩赐是拯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拯救的必要工具。以20世纪的人们的带有偏见的眼光看来，这样的区别似乎微不足道，但它却酿成了17世纪的荷兰，实际上也是基督教欧洲最大的神学论战。<sup>185</sup>尽管阿米里派起初在荷兰的政治和经济圈内似乎已拥有强大的后盾，但是从短时期来看，他们却输掉了这场论战。1619年在多德雷赫特宗教大会(the Synod of Dordrecht)之时，反规谏者派(Contra-Remonstrants) [戈马派(Gomarrians)] 趁机攻击规谏者派 [阿米尼派

(Arminians)],并把直谏者派排除了国家之外。当然,从长期来看,阿米尼派并没有真正输掉。这就是故事的全部。

那么争论的是什么呢?以荷兰历史学家 G.J. 雷尼尔看来,阿米里派阐述的意思是单个的人能够抵制恩赐或失去它,因此,“直谏者派便保存了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片断内核。他们才是人文主义的真正的孩子”。也许是的,但谁支持人文主义呢?<sup>186</sup>阿米里派显然是一个社会少数派,但却是强大的,因为他们的政治基础是与商业贵族相结合的产物。<sup>187</sup>他们的对立面则是从质朴的家庭中招募来的,以宗教会议上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和城市狂热的群众为后盾,并得到摩里士大公(Prince Maurice)和奥兰治党人支持<sup>188</sup>的正经的清教牧师。戈马派指责阿米尼派对天主教太“温和”,然而,这种指责也许使天主教给阿米里派以某种默默的支助;但是,天主教徒深受压制,而且作为“社会的最下层”<sup>189</sup>在加强政治力量方面也难于发挥什么作用。

这样来确定两大阵营中的各社会集团所处的位置有些粗略,但并非不准确。有关这场论战的内容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首先,我们必须看到这场论战为什么会转而反对阿米尼派。第二场阿米尼论战开始于 1602 年,并在 1608 年达到高峰。第二次辩论较之于第一次引起了更多的争吵,尽管两次争论的倡导者和神学的争论基本相似。发生变化的只是政治形势。1609 年停战会带来什么,在续战派和休战派之间展开了争论。前者包括奥兰治党,他们希望进一步加强英雄总督的权力并获得荣誉;还有新教改宗者,他们仍想合并尼德兰南部地区,并根除天主教势力;另外还有一些从商船私掠活动中获利的商人;还有一些受机遇诱惑、憎恨外国人的下层集团。休战派则由荷兰国家律师,约翰·凡·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mevelt)领导,他代表了所有那些发现称霸的可能的人们。在后来的一个世纪,威廉姆·巴雷尔(William Ba-reel)总结了这些人的观点,他在 1654 年 12 月 18 日写给奥尔登巴列维特的合乎道德的继承者——雅各布·德·威特(Jacob de Witt)

的信中说：“可能得到的最佳结果和君主共和国的希望，以我们看来，是我们今天的和平和世界各地的和平，因为我们的贸易已遍及各地”。<sup>190</sup>

1608年8月30日，正当休战的政治争论已达到“激烈的顶峰”时<sup>191</sup>，阿米里乌斯发表了他们的观点宣言。这两场争论成为一堆解不开的乱麻。奥尔登巴列维特得到了和约，而戈马则赢得了多得勒克大会。一个是另一个的代价吗？如博克瑟(Boxer)所指出，统治阶级已经真正能阻止卡尔文教的狂热分子去干“牺牲成果换取虔诚”的事。因为阿米里信徒对宗教的宽容态度“主要是功利主义和自私自利”，<sup>192</sup>所以，极少数阿米里派人物，在紧要关头的牺牲，——如果不是就奥尔登巴列维特(他在1619年被处死，也就是多得勒克会议召开的那一年)而言，至少也是就他所在阶级的其他人而言——就不能视为一种不合情理的代价了。<sup>193</sup>这一特别富有戏剧性的情节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屡见不鲜的剧情。文化的宽容有其局限性，尤其有其内部局限。它不允许散布颠覆的言论，也不允许在统治阶级内部产生重大的分裂。笛卡尔和洛克颇受青睐，而格劳修斯则被囚禁终生。斯宾诺莎的重要著作遭到查禁，而他本人被流放国内，尽管还允许他定居和写作。他死时，“六辆马车和一大批富裕的市民”为他送葬，<sup>194</sup>这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的表现，也是一种慷慨。

1618年，一个威尼斯人认为，阿姆斯特丹是“早期威尼斯的镜子”。<sup>195</sup>到1672年，它便终结了其生命。霸权的结果是“衰落”，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痛苦，因为其顶峰过去后很久，人们还察觉不到。在以后的若干世纪中，我们可能会讨论何时出现衰落。但是，当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还有荷兰人，都把尼德兰视为中心，而且，如果不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至少也是在1763年以前，作为一个荷兰市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无疑都是很满足的。衰落只能被看作是发展，是其他地区在利润的效益方面的发展。要进一步讨论霸权的局限，我们必须从尼德兰

的集中表现中转到对联省共和国，英国和法国的并行发展和相互关系的系统讨论。

形势在这一世纪的中期开始发生变化。三十年战争结束了；八十年战争也硝烟散尽。联省共和国最后开始感受到经济紧缩的压力，而其它国家已经历了30年至50年之久的压力。英国的内战结束了——虽然还未完全消除，但毕竟过去了。法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激烈的内部纷争也刚刚结束。宗教改革派(Reformist)与反宗教改革派(Counter-Reformist)之间，“清教徒”(Puritan)与“原始自由派”(Protoliberal，或称“宽容派”)对基督教圣经译本之争普遍地得到控制，大部分转为内部争论。国家再度表现出生命力，政府的行政机关也开始成为统治者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sup>196</sup>

这样，我们从诸多分裂主要出现在国家内部，即卡托-康布雷西(Cateau-Cambrésis)以后欧洲的战争和政治向内转移的时代，转向一个诸多分裂再次主要出现在国与国之间的时代。后面这一时期从第一次英—荷战争开始的1651年延续到1763年七年战争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国内和国际的分裂的区别既专断又模糊不清；但是，即使如此，勾画一个时代的主要基调还是有用的。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阶级斗争错综复杂，而且在许多假象下曲折地表现出来。导致一个霸权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似乎对国内结构有利，就像那些在市场上寻求阶级利益的人们力图消除早些时候遗留下来的种种内部的政治禁锢一样。霸权衰落的这一时期似乎对国际间的分裂结构有利，正如那些在市场上寻求阶级利益的人们要竭力消除早先留下的那些国际间的政治禁锢一样。<sup>197</sup>

17世纪中叶，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致力于用武力消除荷兰的某些优势，并且以自己的优势取而代之。因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市场优势并非那么清晰，荷兰人仍很强大，而且因为正在崛起的半边缘地区的国家，如普鲁士、瑞典以及奥地利，都试图在没有军事强国的情况下谋利，因此，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使这种形势明朗化。到1763年，英国对法国(还有荷

兰)的优势已很明显,不列颠将成为下一个霸主。1763年时,普鲁士在半边缘地区最后的冲刺中获得成功,它决定了欧洲中心政治的未来进程;边缘地区的紧缩和改组已经完成,世界经济体已经为进一步的地域和经济的扩张做好了准备。

### 注释

1 盖尔(Geyl)(1961, pp. 37~38)。

2 J.R. 琼斯(J.R. Jones)选出这些特别的地区以在不列颠和联省共和国之间进行比较(参考1966, p. 40)。

3 在科尔曼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场争论的全面概述(1969)。但是,我不同意科尔曼的观点,他认为虽然重商主义作为一种政策的标志与“历史编纂学毫不相干”,但是作为一种经济理论的描述还是有用的(1957, p. 24)。我宁愿说恰恰是这相反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我认为这些理论因为都是辩护之词,所以彼此并不一致,但是我以为,处于某种地位的国家倾向于采取我们所说的重商主义政策。

4 范·菲恩(Van Veen)(1950, p. 11)。舍费尔对由于人为的干预而发生诸多变化前的尼德兰的地质条件作了言简意赅的描述(1973, pp. 9~13)。

5 参见威尔逊(1941, p. 3)。安德鲁斯(Andrews)对国会在1624年7月19日发布的一篇公告中的措辞进行了考索(1915, p. 541)。梅纳特·西门斯(Meynert Semeyns)在1639年写道:“荷兰人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捕捞的鲱鱼都多而且加工得好;上帝通过鲱鱼业使尼德兰成为整个欧洲的交易和主要商品市场。鲱鱼业使荷兰贸易不断推进,而荷兰贸易又促进了世界的发展”,*Corte beschryvinge over de Haring vischerye in Hollandt*, 引自比杰恩(Beaujon)的著作(1884, pp. 60~61)。法国分析家卢亚瑟克(Luezec)在1778年称渔业是“(荷兰)商业的摇篮”(I, p. 19)。

6 参见H.P.H. 杰森(H.P.H. Jansen)。R.W. 乌格(R.W. Unger)认为该船首次出现在霍恩角(Hoorn)的更为准确的时间是1415年(1978, p. 30)。

7 R.W. 乌格(1978, p. 30)。起初,比率是2.5:1。到1570年时为4.5:1,它“比任何最先进航船的比率要大得多”。但是,对这种比率有一种技术限制:“对网的拉力不能太大”。



8 参见 R.W. 乌格(1978, pp. 29~30)。

9 参见舍弗尔(1973, pp. 72~73)。24 到 48 小时内鱼会腐坏。参见米歇尔(Michell)(1977, p. 142)。

10 米歇尔(1977, p. 148), 他认为, 这种船只是“在最近才重新用于捕鱼业”。船上有三种工人: 清理工(取出鱼的内脏)、腌工(加盐者), 以及捕鱼工。

11 参见帕里(Parry)(1967, p. 172)。

12 他们因此可以利用捕捞鲱鱼的三个季节; 一个在 6 月和 7 月, 在奥克尼群岛(the Orkneys)、设德兰群岛(Shetlands)以及苏格兰北部地区; 一个在 8 月, 从苏格兰的邓巴(Dunbar)到约克郡; 一个从 9 月到 11 月, 在雅茅斯地区(Yarmouth)。参见米歇尔(Michell)(1977, p. 139)。鲱鱼被看作是“穷人的牛排”。在荷兰和西弗里斯兰(West Friesland), 第一批鲱鱼用二轮马车运入内地, 互相竞争以争取第一个进入市场”(米歇尔, 1977, p. 180)。

13 参见帕里(Parry)(1967, pp. 167~173)。

14 米歇尔指出这一点, 并说: “因此, 鲸的捕捞业反映的是欧洲的工业史而不是人口史。英国人在其商业霸权的顶峰没有能够获得鲸产品的自足(更不用说剩余), 而荷兰尽管经济普遍衰退却仍维持了其地位, 这很有意思”(1977, p. 171)。

15 米歇尔(1977, p. 180)。

16 威尔逊(1968, p. 64)。如 1887 年柯宁罕姆(Cunningham)所说, 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 “荷兰人有意伪造”, 这些词被用作他的专著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第一版第五卷第二章的标题[引自克拉克, 1960, p. 15]。

17 引自威尔逊的著作(1957a, p. 3)。

18 “我们怎么能忽略荷兰农业的显著发展和 17 世纪经济中低地国家的卓越地位之间的关系呢?”[德·马达伦纳(De Maddalena), 1974 a, p. 313]。事实上怎么会呢?

19 参见 E.L. 琼斯(Jones)(1967, p. 47)。

20 范·菲恩(1950, p. 145)。

21 参见范·菲恩的图表(1950, p. 65)。斯利彻·范巴思描述了农业价格和低地垦殖之间的明确关系。“很清楚, 1664 年以后, 开垦低地的伟大时代已告一段落, 也就在这同时, 谷物的价格下降了, 整个经济形势日趋恶化”(1977, p. 69; p. 70, 表 4)。

22 参见戴维斯(1973b, pp. 112~115)。斯利彻·范巴恩(1960, p. 153), 以及威尔逊(1977a, pp. 23~24)。以斯利彻·范巴恩看来, 强化农业“在粮食价格相对便宜的时期, 对于不断增加而且稠密的人口的谋生是必要的”。但是为什么其他地区不能有同样的行为呢? 戴维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即英国和法国都不及荷兰先进, 因为当荷兰把 13 和 14 世纪改进的技术在 15 和 16 世纪传给他们的時候, 欧洲就已经处于扩张阶段而且不易接受强化农业技术, 特别是由于在 1450—1650 年间, 农民普遍控制着耕地和优良的牧场, 并且对技术极为冷漠。他认为, 英国和法国在 17 世纪与荷兰并不在相同的起点上。

23 土地不合适, 只有“几个有利的地区除外, 那里土壤比较好而且干燥, 如荷兰的沙丘海岸、马斯河以南的部分岛屿以及弗里斯兰沿岸的粘土地带”[J. 德弗里埃(J. de Vries), 1974, p. 71]。

24 吉布斯(Gibbs)(1957, p. 693)。

25 J. 德弗里埃(1974, pp. 136~144)。

26 J. 德弗里埃(1974, p. 172)。这首先是一个使利润最优化的问题: “可以提出一个推测性的结论, 即贸易的增长降低了粮食价格, 而粮食在尼德兰北部生产成本比较高。如果这样, 地区经济就会由于相对较低的粮食价格而得到大量的储蓄, 由于粮食对当时任何经济部门都十分重要, 较低的粮食价格就意味着可以腾出资金用于其它目的”(p. 182)。请同时参考凡·德·威(Van der Wee)的观点, 他说尼德兰北部在 1500 年至 1670 年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明显的专业化的结果: 从波罗的海进口粮食, 这就使沿海地区能够集中力量生产乳制品、园艺产品, 以及经济作物,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镇中迅速增加而且富裕的人口的需要”(1978, p. 15)。

格拉曼发表过怀疑波罗的海粮食贸易的重要性的观点。他提出异议的根据是认为内陆贸易更重要。但他把莱茵河、佛兰德斯, 法国北部和英国划入内陆贸易的范围(原文如此! 1977, pp. 231~232)。

27 斯利彻·范巴恩(1955, p. 181)。

28 斯利彻·范巴恩(1960, p. 132, pp. 147~148; 1955, pp. 176~178)。

29 J. 德弗里埃(1974, pp. 142~144)。

30 J. 德弗里埃(1974, p. 150)。

31 罗马诺(Romano)(1962, p. 519)。

32 例如, 参见威尔逊的总结性论述: “有时人们认为[荷兰共和国]是一种没有能够转入工业化的纯商业经济。……就 17 世纪的条件而言, 这有些夸

大……许多技术……合理地集中于那些从经济上看极为有利的加工或提炼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过程；这样就刺激了商品通过货栈和市场的流动”。(1968, p. 30)。

同时期的人看得很清楚。J.J. 比彻(J.J. Becher), 作为维也纳皇帝立奥一世(Leopold I)的经济顾问, 主张鼓励制造业, 他在1673年写道:“荷兰人生产丝绸, 但是国内却不养殖蚕桑; 他们从外国购买亚麻和大麻, 进而生产精细网织品和漂亮的亚麻布, 然后再出口; 他们把外国的羊毛加工成布匹出口; 他们还从国外进口原料生产皮革, 以供出口”(Politischer Discours), 第二版, Frankfurt, 1673, p. 173, 引自克利玛(Klima), 1965, p. 97。

33 莱登(Leiden)在1350年以后成为重要的纺织品出口生产基地。参见H.P.H. 杰森(1978, p. 11)。杰森认为, 荷兰的工业从1350年到1400年期间有了关键性的提高; 由于受黑死病的影响较小, 其人口缩减的程度也较小, 因而荷兰“更有能力与那些人口锐减而且还有部分敌对的行会组织的周边地区展开竞争”(p. 17)。

34 费伯(Faber)等人(1974, p. 7)。

35 威尔逊(1965, p. 55)。格拉曼更多地从劳动分工方面看这种情况:“看看1620—1700年这段期间, 可以发现, 当英国的羊毛织品衰落而绒线业繁荣的时候, 莱登却相反。当英国在绒线产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时, 莱登的羊毛制品, 浴巾, 已经与英国产品展开了有力的竞争”(1974, p. 505)。但是请注意, 威尔逊所说的大致是1570年至1670年间的情况。

1621年和约(the Truce)的终止, 被伊斯雷尔(Israel)看作是荷兰的廉价、轻便布匹生产的倒退, 因该和约切断了西班牙控制的纺织品出口市场的地盘。“莱登试图扩大老的纺织品, 即更适合欧洲北部市场的受人欢迎的浴巾的生产, 以弥补其损失; 尽管莱登生产的纺织品的总价值在1621—1648年间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增加(老式的纺织品比新式纺织品更贵), 但是在所生产的布和所需要的劳动力的数量方面, 莱登实际上下降了”(1977, p. 61)。以德约恩(Deyon)看来, 这种转变, 他认为是在1650年以后, 是提尔堡(Tillburg)、韦尔维耶(Verviers), 以及博伊斯-勒-达克(Bois-le-Duc)相互竞争的结果, 相比之下, 莱登由于其高生活费用和高工资水平, 因而处于不利地位。莱登“放弃了高度劳动密集性产品……转而生产奢侈品、厚布以及山羊毛和骆驼毛混纺的驼绒产品”(1978d, p. 267)。

36 阿斯特罗玛(Aström)(1963, p. 61)。所列的第三种因素是“殖民地产

品”。

37 苏普莱(Supple)(1959, p. 34)。

38 威尔逊(1965, p. 71)。威尔逊说,总的来看,“最大的利润”在于“印染和缝制布料的精细的工艺之中,它(转而)提供了控制市场的钥匙”(1968, p. 29)。

39 威尔逊(1957a, p. 40)。

40 参见柯伦贝兹(Kellenbenz)(1977a, p. 531)。

41 威尔逊(1973, p. 329)。同时参见米歇尔:“荷兰人所取得的真正的成就并不在于造船方面,而在于他们产品获得了可信赖的质量”(1977, p. 152)。

42 参见 R. W. 乌格(1978, p. 7)和金得尔伯格(Kindleberger)(1975, p. 618)。

43 参见范·克拉维伦(Van Klaveren)(1969a, p. 183)。

44 参见纳伊斯(Naish)(1957, p. 493);同时参见塞拉(Sella)(1974, pp. 392~394)。巴勃尔(Barbour)认为,与英国造船业相比,荷兰造船业的成本低廉是因为英国不能进口便宜的木材和其它材料——造船业材料的成本是劳动力成本的8倍。荷兰的优势在于“低价购进,低价运输和低关税”(1954, p. 238)。

45 威尔逊(1977a, p. 39)。

46 1661年,阿姆斯特丹有60家制糖厂。1660年英国航海条例以及柯尔伯(Colbert)颁布的类似限制条例发布以前,多数英国和法国殖民地的糖都在那里加工。参见梅斯菲尔德(Masefield)(1967, p. 293)。

47 参见费伯及其他人(1974, pp. 4~10);德约恩(1978d, p. 289);苏普莱(1977, p. 429)。有关书的出版,参见哈泽德(Hazard)(1964, p. 112),他指出,至迟1699年,10个主要的出版中心有5个在荷兰,仅阿姆斯特丹一处便有400名印刷工。

48 参见克莱恩(Klein)(1966, pp. 195~197)和巴勃尔(1963, pp. 35~41)。

49 诺思(North)和托马斯(Thomas)(1973, p. 145)。在谈到20世纪的情况时,斯蒂芬·海默尔(Stephen Hymer)和斯蒂芬·拉斯尼克(Stephen Resnick)说:“我们认为,出现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替代不是以劳动替代悠闲或懒惰,而是低级的家庭生产向以专业化和交换为基础的高级方式的转变”(1969, p. 503)。难道这没有很好地概述当时发生在联省共和国的情况吗?

50 G. 帕克试图对荷兰起义所造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影响作出评论,并总结道,从总体来看,它带来的损失比收益要多,虽然并不是很多(1974b, pp. 11~15)。威尔逊则认为:“战争以后四十年,尼德兰北部所蕴含的经济实力从没有超过和约签订时的1609年”(1968, p. 22)。如果威尔逊的陈述可以看作是对荷兰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所作的估价,那么这两种估价并不矛盾。

51 伦敦,1673, p. 187,引自弗尼斯(Furniss)(1957, p. 102)。

52 参见范·赫特(Van Houtte)对安特卫普衰落阶段的分析(1962, pp. 707~712)。

53 参见莫尔斯制作的醒目的地图(1974, p. 63)。同时参见让南(1969, p. 71)。

54 参见赫林纳(Helleiner)(1967, p. 46)。

55 科斯曼(Kossmann)(1970, p. 366)。

56 弗灵登(Verlinden)(1964, p. 329)。关于荷兰对寻求致富之路的威斯特伐利亚下层民众具有吸引力的论述,参见比蒂(Beatin)(1939, pp. 131~132);对整个德意志西北部的论述,参见库斯克(Kuske)(1956, p. 225)。

57 让南(1969, p. 75)。我们甚至把与20世纪的城市规划相似的城市规划看作是对这些冲突的回应。1585年至1622年之间,阿姆斯特丹修建了三条运河——海仑运河(the Heerengracht)、凯泽运河(the Keisengracht)和普林森运河(the Prinsengracht)。因此,污染性工业——酿酒厂、金属加工、印染、玻璃制造、制糖——都被禁止建在城市中心。“它们被限制在城外西部的工人居住区,即乔尔凡(the Jordaan),这里,投机商为移民建造了许多小的低矮住宅,而且执政者的社会保险机构设立了许多慈善机构。这是有系统地划分区域,严重的种族隔离和资产阶级性质的第一个实例”(德恩,1978e, p. 299)。

58 即使在相对次要的农产品即粮食作物中,17世纪时,也出现了大麦向小麦的转变,“小麦是一种需要更为严格的生产条件的作物”(J. 德弗里埃,1974, p. 148)。

59 克拉克报道了当时的现象(1960, p. 14)。

60 引语出自里普森(Lipson)(1956, II, 1 iii)。同时参见里普森(1956, III, pp. 10~11),帕里(1967, p. 176, p. 210),格拉曼(1974, p. 452),以及明钦顿(Minchinton)(1974, p. 164)。鲍曼(Bowman)说,1650年时,世界船运贸易的20 000艘船只中,荷兰船只占了15 000~16 000艘(1936, p. 338)。

61 出自 *A M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p. 192, 引自威尔逊(1941, p. 4)。

62 库尔纳特(Coomaert)(1967, p. 244)。

63 关于东印度公司(VOC)法律结构的描述, 参见拉比(Rabe)(1962, pp. 351~366)。

64 尽管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一直那样认为, 而且姓名的外表有些类似, 但克恩(Coen)不是克亨(Cohen), 而且他不是犹太人。关于为什么克恩的父亲将其家族姓氏从凡·特斯克(Van Twisk)改为克恩的推测, 参见马西尔曼(1963, pp. 229~230)。

65 他们跨过里斯本和印度, 转向印度尼西亚贸易, 从而避开了西班牙—葡萄牙。参见帕里(1967, p. 195)。

66 参见马西尔曼(1963, 好几处都有记载, 但尤其集中于 pp. 62~66 和 pp. 141~179)。莫里诺(Morineau)强调, 欧洲市场香料紧缺, 因而价格高昂。(1978c, p. 133)。

67 参见杜坎(Duncan)(1975, p. 512); 同时参考格拉曼(1974, p. 477), 他认为:“‘大西洋’胡椒[对‘地中海’胡椒]的胜利如此令人信服, 以致它重新出口到立范特”。有关早期的情况, 参见沃勒斯坦论文集(1974, pp. 215~216, p. 325)。

68 帕里(1967, p. 199)。

69 格拉曼使用了隐喻(1974, p. 483), 他强调欧洲对香料的需求是有限的。里奇(Rich)从另一方面记述了类似的问题:“(这种)香料贸易受到这一事实的制约, 即香料群岛(the Spice Islands)几乎不需要欧洲的除火器以外的产品。……荷兰人也遇到了与他们的皮货商在北美洲所遇到的相同问题。一旦他们的直接需要得到满足, 岛上民众就会对贸易变得很冷淡”(1967, p. 368)。迈林克-罗洛夫兹(Meilink-Roefolsz)同样指出:“亚洲几乎不需要欧洲的任何产品”(1968, p. 66)。

70 莫里诺(1978e, p. 170)。

71 参见马西尔曼书中的讨论, 它具有典型性。(1963, pp. 433~442)。

72 克恩在致十七人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人们比强权和附带着权利的武力提供更好的权利了”。引自博克瑟(1965, pp. 98~99)。的确, 按盖尔的衡量,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世界中, 就是一种武力”(1961, p. 188)。至于十七人委员会, 博克瑟认为, 他们“很清楚”有三种贸易范围: 他们具有区域控制权的地区(为数不多); 他们具有垄断契约的地区:

“自由贸易”地区。博克瑟认为，这最后一类“几乎总是最重要的”（1965, p. 94）。帕里认为，除了“长途拖运贸易”以外，荷兰还面临着中国人、马来人、阿拉伯人，以及非荷兰籍的欧洲商人的激烈竞争（1967, p. 197）。

英国人能与荷兰人在印度群岛贸易而非波罗的海贸易中竞争的原因恰恰与“富裕”贸易而非“大宗”贸易的本质有关。造船成本在大宗贸易中比较重要，正因为这个原因，当时英国人把它们当作“亏损贸易”而注销。在东印度群岛〔以及地中海〕，所运商品与其价值相称，体积小，重量轻，而且武装这些船只比速度和效益更为重要。荷兰在这一领域的相对优势较弱（巴勃尔，1954, pp. 230~231）。的确，R. W. 乌格认为英国人“在危险贸易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且不仅仅是在远东——因为他们利用“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商人”（1978, p. 110）。在地中海，商船私掠极为有利可图，以致在17世纪初期成为一种“部分地由富裕商人以商业方式组织起来的规模可观的巨大……工业”。戴维斯（Davis）（1961, p. 127）。1618年时，海盗的舰队比所有地中海列强的舰队联合在一起都要强大。

73 如格拉曼认为：“胡椒的可分性与其耐久性相结合……使它成为投机活动的极好对象。它能保存很久：许多例子说明胡椒可在仓库存放三十多年，这当然影响了质量，但是可以掺合新鲜的胡椒而加以改善”（1974, p. 475）。但是克莱恩（Klein）认为，更普遍的是，“荷兰在17世纪的实际贸易中所获得的成功部分应归功于富商们敏捷的投机活动，用他们囤积的商品操纵市场”（1970, p. 33）。

74 参见沃勒斯坦（1974）。

75 库尔纳特（Coomaert）认为，欧洲人在17世纪不愿建立“大陆组织”。只是到这一世纪的末期和18世纪时，“荷兰、英国和法兰西的帝国才开始成形”（1967, p. 265）。同样，斯克夫指出，“土著居民开始几乎没受到该公司的影响”。直到19世纪时，舍费尔说，荷兰的存在意味着，对沿海居民来说，他们的商人和行政官员取代了阿拉伯和中国商人的地位（1973, p. 75）。当然，这基本上与沃勒斯坦所描述的葡萄牙人在16世纪的亚洲的地位相似（1974, 第6章）。参见帕赫（Pach），他提出了同样的观点（1973, pp. 60~61）。确实，1680年以后，在管理边远地区的土著耕种者时，荷兰的“咖啡巡视官”（coffee-sergeant）所起的作用有限；但是太有限了。参见里奇（1967, p. 370）。

F. 卡斯特（F. Gaastra）认为，随着贵金属外流的增加，18世纪的贸易模式发生了变化，而且作为进口货物的纺织品，茶叶和殖民地产品也发生了变

化(1976, pp. 18~19)。难以理解的是,正是荷兰人在亚洲贸易中地位的削弱才能说明贵金属外流增加的原因。实际上这是边缘化的一个标志,正如贵金属外流的增加是由于人们日益需要用它作为货币而不是用它做奢侈的装饰品一样。

76 马西尔曼(1963, p. 460)。这一论点认为,垄断引起毁坏贸易的劫掠活动:“由于被剥夺了其赖以繁荣的两种主要来源,香料种植和自由航运,一些中世纪著名的邦国,特尔纳特(Ternate)、蒂多里(Tidore)、马占(Matjan)和巴占(Batjan),都降到维持生存的地位。对于那些拥有一种有价值的产品因而受到一个决心要得到它的欧洲企业家集团所覬覦的地区来说,这就是惩罚……到17世纪末时,土著人已经一贫如洗,以致他们再也买不起(白棉布,因而他们)开始织他们自己的布”(p. 461)。

77 马西尔曼认为,香料销售所获得的利润是其成本的2.5~3倍,而且在17世纪时平均每年付18.7%的股息。尽管这样,90年以后,该公司债务达到400万基尔德(guilders)<sup>[1]</sup>。马西尔曼说,这一点“说明,维持垄断所付出的成本仅由毛利抵销了一小部分”(1963, p. 466)。从公司整体观点来看是这样的,但是对于公司的大投资者们也是如此吗?在由莫里诺(1975)所写的关于与远距离国家的所谓的贸易亏损的一篇有趣的文章中,他认为“一等于二”,也就是说,商人们在归途中把价格翻了一番,因此贵金属在数量上并没有像乍看起来那样外流。事实上,它反映了收入在欧洲内部的转移。

78 参见帕里(1967, p. 189)和伊斯雷尔(1977, p. 37)。罗马诺刚把转折点定在1611—1612年,他认为,1611年第一次任命了驻叙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埃及的领事(1962, pp. 489~491)。帕里认为,1612年时,由于荷兰人得以与土耳其签订协定,从而使荷兰贸易“完全合法化”。罗马诺指出,到1612年时,吨位数已超过了东印度公司的吨位数。

79 参见拉普(Rapp)(1975)。同时参见帕里(1967, p. 188),他认为,1593年到达莱亨港(Leghorn)的219艘船只中,有73艘装的是粮食。如果人们问,北意大利用什么交换其进口品,答案只能是前一时期所积累的资本。因此,这时阿姆斯特丹的粮食进口与威尼斯相比,意义极为不同。对阿姆斯特丹来说,当进口粮食比生产纺织品、船只和其它的农作物更为有利时,粮食进口并不意味着耗费生产粮食的能量,因此,它获得了不平等交换的利益。对威尼斯来说,粮食进口则意味着耗尽资本用于当前的消费,这是对“衰落”的一种极好

---

[1] 荷兰银币。——译者



的适当解释。

80 帕里(1967, p. 189)和戴维斯(1975, p. 10, p. 14)。拉普在讨论荷兰(和英国)成功地取代威尼斯在地中海的位置时指出,北方列强引进的不是促使其成功的商业活动中的新发明。他们必须提供的是他们在工业生产中的竞争优势,利用这种优势,他们能把“衰落”强加于威尼斯(参见1975, pp. 499~501)。

81 帕里(1967, p. 189)。

82 威尔逊(1968, p. 206),他探讨了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之间的区别(第12章, pp. 206~229)。

83 然而,人们应该记得,虽然在1645年、1657年以及1668年商业利益受到威胁时,或1672年共和国的生存基础(以及它们的贸易)处于危险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奉行的是“传统的爱好和平的政策……,但是如今这个强大的城市不再那么被动,而提倡一种强有力的和侵略性的政策”(弗兰肯, Franken 1968, pp. 6~7)。

84 参见肖尼(1961, pp. 1200~1202)。高斯林格(Goslinga)说,它被认为是“卡尔文主义和反阿米纽派(Counter-Reformation)的一个堡垒”,而且认为1629年时,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议会“抱怨北方人为了那些来自南方的难民即布拉班德人(the Brabanders)正在做出牺牲”(1971, p. 287)。

85 高斯林格(1971, p. 39)。

86 参见万新克(Wansink)(1971, p. 146)和高斯林格(1971, p. 109)。

87 威尔逊(1968, p. 210)。J. R. 琼斯把荷兰的西印度公司看作是“一个侵略性的、半海盗性质的团体”,而且还认为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对三次英荷战争承担责任(1968, pp. 44~45)。荷兰历史学家也强调了它的政治性质。凡·豪博肯(Van Hobboken)说:“最后(荷兰西印度)公司的命运,它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受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1960, p. 42)。高斯林格强调说,这仅仅是两个公司在寻找利润时方法上的差异,“东印度公司利用贸易取得利润,必要时还得到武力的支持,西印度公司的利益则来自商船私掠”(1971, p. 91)。

88 斯普纳指出,荷兰人之所以在东印度群岛胜于英国人,是因为它们控制了白银(更为需要)而英国人则只能提供黄金(1956, p. 68)。

89 帕里(1967, p. 204)。斯柳特(Sluitert)(1948)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参见沃勒斯坦有关背景的讨论(1974, p. 342和p. 197)。

90 参见埃默尔(Emmer)和里奇(Rich)(1967, p. 333)。

91 参见 W.S. 乌格(Unger)(1956, p. 206)。的确,从 1600 年至 1660 年,这种相对重要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利润相应地从 100% 上升到 200% ~ 300%。参见博古茨基(Bogucka)(1973, p. 439)。

92 当英国船只只运输英国商品时,荷兰船只则往返于所有从西班牙北部到波罗的海之间的西欧国家。参见达恩斯多夫(Dunsdorfs)(1947, p. 20)。

93 苏普莱(1959, p. 83)和赫顿(1959, p. 19)。赫顿补充了第三种因素,即荷兰人“精明的活动”,它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也可能仅仅是英国人留给我们的一种感觉,他们把它看作是荷兰成功的缘由。

94 莫里诺(1978d, pp. 144~145)。“粮食至今是数量上最重要的一种商品,荷兰人利用它同波罗的海进行贸易”[费伯(Faber); 1966, p. 115]。

95 参见米歇尔(1977, p. 177)。

96 参见赫顿(1959, pp. 14~16)。

97 参见苏普莱(1959, p. 86)。威尔逊在 *Kipper- und Wipperzeit* 中说,这种失衡和摆动只是向英国商人提出了一个“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则是由于荷兰的竞争力引起的(1965, p. 55)。

98 参见赫顿(1959, pp. 29~30)。

99 赫顿(1959, pp. 9~10)。

100 斯米特(1968, p. 21)。

101 参见舍弗尔(1973, p. 89),他认为“这会使佛兰德斯永远嫉恨北方”。同时参见博克瑟(1965, p. 92)。塞尔特河在整个 17 和 18 世纪一直封闭着。有关此问题的多次谈判,参见胡伯特(Hubert)(1909, pp. 641~646)。这些限制最后在 1795 年 5 月 16 日的海牙条约中被取消。

102 J. 德弗里埃(J. de Vries)(1974, p. 204)和库思克(Kuske)(1956, pp. 232~233)。德·泽(De Zeeuw)指出,泥煤的取得是地质学的一个意外收获,泥煤“非常靠近水面,有的刚好在水面之下”,这是由于“全新世时期海平面上升”所引起的(1978, p. 5)。泥煤给荷兰人提供了“廉价的燃料”,利用它“发展了以加热过程为基础的工业”,因此他们“能够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商品”(p. 23)。荷兰人在世界上竞争力的下降与以后的事件有直接关系。其一,由于利用易于取得的地区,以及不得不在较远的地区通过深挖和扩大运河通道来获得泥煤,从而使煤价日趋昂贵;其二,由于港湾和内河的淤塞致使运输更加困难(参见 p. 25)。

103 威尔逊(1977a, p. 24)。

104 参见 J. 德弗里埃(1974, pp. 202~209)和(1978)。

105 参见 R.W. 乌格(1978, p. 52)。

106 威尔逊(1957a, p. 2)。

107 参见帕里(1967, p. 211)。

108 威尔逊(1941, p. 6)。

109 莫里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法国南部船上水手的待遇同样优厚(1970b, p. 118),有关 17 世纪荷兰航运高昂的燃料费用的讨论,参见莫里诺(1970a, p. 114)。然而,博克瑟仍指出,荷兰水手的低工资是其运费低廉的一个因素(1965, pp. 66~67)。

110 R.W. 乌格(1978, p. 4;同时参见 p. 183 和 p. 7)。

111 威尔逊(1957a, p. 42)。

112 至少可以说,17 世纪时,阿姆斯特丹的“保险业不比其它地方经营得差”(巴勃尔,1929, p. 580)。巴勃尔提出,英国船只在 17 世纪时普遍在荷兰得到了保险,“尽管保险费一般比在伦敦高”(p. 581)。从表面来看这令人费解。如果巴勃尔的观点从经验上看是正确的,那么名义费用和实际费用必定不同,这是因为荷兰的商业组织更有效益,如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的那样,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然而,后来巴勃尔叙述了一般欧洲人对荷兰海上保险业的吸引力(参见 1963, pp. 33~35)。

113 威尔逊(1967, p. 518)。

114 威尔逊(1941, p. 10)。诸恩和托马斯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种“市场,或交易部门……是此时劳动生产率的巨大赢利得以实现的场所”(1973, p. 135)。

115 赫克舍(Heckscher)(1935, I, p. 352)。

116 在塞拉看来,正是这些合股的船运公司,即 the reederij,“才使荷兰的商业舰队在 1500 年至 1700 年之间出现了可观的、10 倍的增长”(1974, p. 411)。

117 格拉曼认为,“普通商人”“大规模地”参与了“17 世纪荷兰的商业扩张”,特别引用了他们在谷物、盐、鲑鱼、木材以及砖瓦贸易中的作用(1974, p. 519)。此外,船运业特别适合土地紧缺国家的小投资者。斯卡梅尔(Scammell)在谈到英国的情况时,说:“由于 16 世纪和 17 世纪土地的激烈竞争,而且与荷兰的情况类似,一艘轮船,更可能是一只小船,可能一直是那些地位低下、不引人注目的所有者拥有资本的唯一投资之处”(1972, p. 404, 加

了着重点)。

118 克莱恩(Klein)相信,这个体系“实际上有助于17世纪时荷兰经济的增长”。他认为,正是垄断行为的加强——“横向或纵向的价格协议,国内或国外的垄断特许权”——才能维持产生必要的缓冲股票(buffer stocks)的“冒险事业”;因为要不这样的话,“那些成功的商人(就会成为)猎取利润的竞争者的公开的靶子”(1966, pp. 188~189)。这些垄断很有效。格拉曼谈到粮食时说,“的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荷兰主要城市的那些著名的粮食交易所(确定了)欧洲的粮价”(1974, p. 457)。有关列格(Liege)的价格在1630—1738年间是怎样依赖于阿姆斯特丹的价格的情况,参见卢威特(Ruwet)(1957, p. 101)。

119 18世纪时,寄售制转变为由代理人支付可能价格的3/4(从低估计),但是,在商品售出前他获得了提前支付的适度利息。威尔逊认为,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斜坡”。当代理人从一种委托业务本身转移到船运业和陆路运输业,并且提供承兑信用的时候,他们就从银行业转到投机和赌博。“当这种委托贸易日益间接时,不稳定性和欺诈也就更加强了”(1941, p. 12)。

120 “的确”,正如戴维斯描述17世纪和18世纪的尼德兰时所说,“很难区分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1973b, p. 232);但是如苏普莱所言,“商业资本家在制造业部门投资和管理是一种非常正常,而且也是预料中的行为”(1977, p. 424)。

121 这个说法出自赫顿,他认为,荷兰的转口贸易是“使17世纪英国经济政策成形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1959, pp. 10~11)。

122 格拉曼认为,粮食贸易像“池塘里的涟漪般”逐步扩散。不仅仅是粮食的装与卸,而且还有缓冲股票(the buffer stocks),导致了仓库的修建,大约有3/4的仓库用于粮食的贮存。由于要经常翻腾粮食“以免生芽及自燃”,因此而创造了就业(1974, p. 461)。布里格(Briggs)指出,为了满足船运和仓贮的需要,阿姆斯特丹在1610年开始实施一项从中心向外扩张的雄心勃勃的宏大规划……把居住区扩大4倍”(1957, p. 294)。

123 古伯特(Goubert)(1970c, p. 27)。

124 卡斯腾(Carsten)(1961, p. 13)。把这与法国的预算作一比较,可以看出,1610年至法国大革命这段时期的预算,只是在1662—1671年的10年间才有剩余。参见帕克(1974a, p. 575)。

125 赫默尔(Homer)(1963, p. 98)。

126 参见维拉尔(Vilar)(1974, p. 249)。

127 参见帕克(1974a, p. 573)。这方面“当时”还比较富裕的一个国家是热那亚。

128 赫默尔(1963, p. 124)。赫默尔认为,在其他方面,“由于德意志雇佣军信誉较好,所以可以雇佣他们来保卫疆土”(p. 125)。

129 这是格兰斯姆(Grantham)的推测性看法(1975, p. 65)。凡·德·威提出另一个动机:“17世纪时,荷兰共和国(有意抬高)白银的价值,以便以贵金属的形式在阿姆斯特丹大市场提供向波罗的海和远东出口所急需的白色金属”(1977, p. 297)。

130 巴勃尔(1963, pp. 44~45)。

131 参见巴勃尔(1963, p. 46),他指出,在该世纪英国的两次政治危机中,一些人把资金转移到尼德兰。同样,卡斯特罗(Castillo)也指出,1649年,发生了4艘满载300多万未经铸造的金币到达阿姆斯特丹的“惊人事件”。他说,这些财产是1648年西班牙破产以后,马罗纳人(Marranos)<sup>(1)</sup>送回的。当主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资本主义知道如何去忽略意识形态和国界”(1964, p. 314)。德·卢弗尔(De Roover)说:“17世纪后半期,阿姆斯特丹取代热那亚而成为贵金属的世界市场”(1974b, p. 227)。

132 格拉曼(1974, p. 510)。

133 帕克(1974a, pp. 550~551)。他的图表说明,1700年左右,阿姆斯特丹作为这样一个交换中心比伦敦有明显的优势。维拉尔认为,这一持续到1763年(1974, p. 257)。同时参见赫默尔(1963, p. 174)和格拉曼(1977, p. 261)。阿姆斯特丹在1763年以前是唯一的金融中心,因而享有广泛的信誉,由此也就能吸纳广泛的财源。这里商人能够提取或接受来自俄国的汇票。参见诺伯斯(Knoppers)(1977a, pp. 13~14)。

134 参见德约恩(1969, p. 38)。同时参见维拉尔:“对荷兰人来说,贵金属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它的‘出口—进口’是有利可图的”(1974, p. 251)。然而,莫里诺指出,一旦确立了这种制度,实际上只需要出口很少的贵金属,至少对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是这样,如波罗的海地区,它不同于东印度群岛和立范特这样的外部地区。“总之,我们所必须注意的是联省共和国的经济在国内外经济(而不是金融)中的作用”(1972, p. 4)

---

[1] 指西班牙境内被迫改信基督教但私下仍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译者

135 参见范·迪伦 (Van Dillen) (1974b, pp. 179~185) 和克莱恩 (1970, pp. 39~40)。同时参见巴勒尔 (1963, p. 53), 他说:“17 世纪时, 其他地方罕见的出口贵金属的自由有助于稳定阿姆斯特丹的兑换率, 并激励作为信用预备工具的汇票的流通, 它的贴现和销售成为城市中活跃的业务”。阿姆斯特丹作为汇票的中心不仅从总体上促进了贸易; 它作为一种银行经营方式也是相当有利可图的。博古茨基指出, 荷兰银行家把大笔财产通过汇票转移到格但斯克商人那里; 这“并没有构成转移财产的唯一手段, 但却导致了被称为套利的投机的独立行为, 它……在 17 世纪的前半期使投资资本的利润在几周内上涨 6.5%~8%, 有时到 10%~12%。这时, 荷兰的利息率很少达到 3%~4%” (1972, p. 10)。

136 凡·德·威 (1977, p. 342)。

137 凡·德·威 (1977, p. 340)。

138 参见克莱恩 (1970, p. 38) 和赫默尔 (1963, p. 137, p. 179)。赫默尔比较了荷兰、英国和法国在 17 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的三种贷款的利率: 按人口统计的年金、抵押、其它长期债务; 短期商业贷款; 短期储蓄。在六项比较中, 有五项都是荷兰的利率最低; 有一项仅比英国略高。林格罗斯 (Ringrose) 认为, 低利率是由于“低地国家在 1566 年至 1648 年期间为了军事目的而大量地集聚流动资本”造成的 (1973, p. 291)。

139 参见诺恩和托马斯 (1973, p. 139, p. 142) 与里德 (Reed) (1973, pp. 182~183)。参见克莱恩 (1969, p. 14) 有关缓冲股票方面投资的论述。巴勒尔的著作考察了荷兰在国外的贷款和投资 (1963, pp. 104~129)。有关 18 世纪欧洲各国日益增加的债务的投资, 参见威尔逊 (1977a, p. 27): 货币主要流向“英国, 在那里, 荷兰投资者的决定足以成为连续几任财政大臣的重要考虑因素”。

140 早在 1628 年, 科尔尼厄斯·弗穆登 (Cornelius Vermuyden) 就已经与查理一世达成协议, 要排掉哈德菲尔德 (Hatfield) 狩猎地的水。参见柯宁罕姆 (1897, pp. 209~210)。狄更斯 (Dickens) 说荷兰人在 17 世纪“对英国进行了技术殖民” (1976, p. 8)。参见威尔逊关于排水、造船以及农业技术方面的技术输出的论述 (1968, pp. 77~91)。有关土地排水和垦荒的情况, 参见 L.E. 哈里斯 (L.E. Harris) 的文章。只是到 17 世纪末期, “排去 (英国) 沼泽的水……才不再是尼德兰人的特权” (1957, p. 322)。

141 马克思在把荷兰 18 世纪在国外的投资看成是其丧失商业霸权的

结果时,说:“哪儿的资本利润最好,哪儿就是它的祖国”(1969,p. 93)。

142 范·迪伦(1974e,p. 207)。

143 参见格拉曼(1974,p. 457)。

144 “城镇给工业以保护和补贴。造船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造船设备的建设便是一种津贴形式。造船工匠行会的规章包含着大量其他的津贴形式”(R. W. 乌格,1978,p. 114)。

145 但是这些利益必须得到满足。1681年,在经济困难时期,阿姆斯特丹的谷物商人与泽兰的农业生产者之间达成了妥协。前者取消了出口(和再出口)税,但是后者增加了进口税。参见让南(1969,p. 74),他告诉我,范·迪伦所写的两篇有关荷兰的文章(1917与1923)包含了辩论和政治妥协的许多细节。同时也要注意“整个17和18世纪,造船业原材料的出口,例如船缆和桅杆,有时被当作是非法的”(R. W. 乌格,1978,p. 115)。

146 参见德约恩(1969,p. 38)。

147 比杰恩(Beaujon)(1884,p. 30)。

148 米歇尔(1977,p. 148)。

149 斯托尔斯(Stols)(1976,p. 39)。

150 引自盖尔(1964, II, p. 85)。参见迈林克·罗洛夫兹(1968,p. 71)。同时参见高斯林格有关加勒比海的论述:“建于17世纪上半叶的荷兰殖民帝国,最初坚持桅杆就是扫帚,也就是坚持公海原则。海上危险一旦清除——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不再是荷兰人的真正威胁时——后者就不再对他们最优秀的哲学家所阐述的重要原则感兴趣,而情愿接受(与英国人相反的)伊比里亚人(Iberian)的领海观点”(1971, xiv)。

151 赫克舍却深感惊讶。“现在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情况,即荷兰尽管是所有重商主义者的典范,但是,在这同时,却没有像大多数其他国家那样受到那么多重商主义的影响。唯一的解释是尼德兰被理想化了”(1935, I, p. 359)。如果人们戴上经济自由主义观念的护目镜并拒绝以利害关系的特征而非属性的特征进行思考,那种解释当然就是人们能够想出的唯一解释了。试把赫克舍的观点与施莫勒(Schmoller)的观点相比较:“只要‘用不带偏见的眼光’去看,荷兰为了宗教自由以及摆脱西班牙的控制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就会显露其本身乃是长达一个世纪的征服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战争,同样也是对西班牙的白银船队以及西属美洲贸易的一种长期的掠夺。由于他们早期的低关税而受到我们今天的自由贸易者倍加赞美的荷兰人,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所曾经

见到过的最严厉也是最好战的垄断者”(1897, p. 65)。

152 德约恩(1969, p. 40)。格拉曼称自由主义是国家的一种“消极态度”,并说“因为政府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经济过程中绝不是中立的”,很明显,“这种消极态度正好与阿姆斯特丹大宗货物的增长协调一致”(1977, pp. 273~274)。

153 参见科斯曼(1970, pp. 362~365),凡·豪博肯(1960, p. 46),雷尼尔(Renier)(1944, p. 52),伯克(Burke)以及万新克(1971)。“似乎矛盾的是,荷兰坚决支持联邦式的政府,但实际意味着,荷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以复杂的半中央集权的方式统治共和国”(舍费尔,1973, p. 92)。

154 例如,1628年至1630年,“在荷兰缺少粮食的年月,阿姆斯特丹的权力很大”(范·迪伦,1964, p. 145)。

155 弗兰肯(1968, p. 2, p. 4)。同时参见伯克(1974, pp. 42~43),卡特(Carter)(1975a, p. 1),以及雷默斯默(Riemersma)(1950, p. 39)。然而,有关阿姆斯特丹(以及荷兰)决定政策能力的局限性,参见罗文(Rowen)(1974)。

156 博克瑟(1965, p. 90)。阿姆斯特丹的号令对这个国家非常有利。阿尔伯斯(Albers)认为,1650年以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贸易日益集中于阿姆斯特丹,直至最后这个城市垄断了它们”(1977, p. 86)。

157 雷尼尔(1944, pp. 16~24)和威尔逊(1968, p. 47)。在这点上,博克瑟明确表明与雷尼尔一致(1965, p. 11)。

158 参见卢达(Roord)的观点(1964, p. 119, 和 1967, pp. 196~197)。凡·迪克和卢达都反对夸大这种现象。“在18世纪末之前,并不存在阻碍社会流动的不断贵族化问题”(1976, pp. 101~102)。

159 科斯曼(1970, p. 365)。哈利(Haley)同样认为,虽然奥伦治分子与“富豪政治”的斗争得到了来自城市下层阶级分子的支持,并且因此具有“国内战争和社会革命的一切条件”,但奥伦治分子最后都妥协了。“最后,他们自己成了贵族和现存社会秩序的支持者”(1972, p. 83)。

160 博克瑟(1965, p. 55)。

161 威尔逊(1968, p. 53)。

162 克莱恩(1969, p. 9);同时参见J. 德弗里埃(1978, p. 303)。

163 博克瑟(1965, pp. 54~55)。

164 参见克莱恩(1969, p. 9)。

165 博克瑟(1965, p. 58)。



166 在一次私下交谈中,已故的斯坦恩·罗凯(Stein Rokkan)对我说起欧洲世界经济没有能够转变为世界帝国的一个主要因素;它四面环海,而不是由陆地包围,海洋本来就比陆地更难以征服。关于这个有趣的观点,我觉得完全是他个人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参见P.安德森(P. Anderson)对英国人的选择所作的评价:“虽然每一单位成本很高,但是海军的建设和维护的整个费用远远低于常备军的费用……。而且以后数世纪的收益会远远高于费用”(1974a, p. 135)。

167 参见库珀(1970, p. 227)。到1659年,西班牙舰队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比联省共和国或英国的舰队都软弱(后来又弱于法国的舰队)。

168 波利森斯基(Polisensky)(1971, p. 236)。

169 马汉(Mahan)(1889, p. 97)。弗兰克恩进一步认为,这是唯一通往得到权力的道路:“还可以肯定地说,财政储备并不足以支付一支陆军的开销,而陆军对于有效地贯彻国家政策终归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保护海岸和漫长的商路”(1968, p. 6)。而且,人们一定不要忘记荷兰的陆军,在1609—1621年的和约期间,“日益增加的财富使荷兰除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军之外,还能维持一支其实力唯一可以在欧洲与西班牙陆军相匹敌的常备军”[以塞尔(Israel), 1977, p. 38]。这就是摩利士(Maurician)改革的结果。这些改革包括人力的很好利用,较小的作战单位,以及攻坚战中的各种革新。罗伯茨(Roberts)指出,这些改革有两个前提:“第一是荷兰军队的待遇优厚,而且支付军饷及时……。第二个条件是培训和操练的有效体系”。在当代人看来,荷兰的改革“好像改变了战争的艺术”(1958, p. 185, p. 187)。

170 安德鲁斯(1915, p. 542)。

171 “不管贵族摄政者如何审慎地看待这个事实,到1621年,联省共和国还是一个强国,一种引人注目的文明模式,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这种模式才在欧洲成为成千上万有思想的人的理想”。(波利森斯基,1971, p. 162)。

172 参见范·菲恩的地图(1950, p. 56)。

173 威尔逊指出,这项任务同时需要多方面的技术成就才能完成,需要把“数学家、雕刻家、画家、绘图家、仪器生产者、磨镜工的才能”集中在一起(1968, p. 92)。

174 克拉克(1960, p. 16)。格拉曼认为,诺里奇(Norwich)和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这样的城市的居民中,1/3~2/3都是“尼德兰血统,他们主要从事新式布匹的生产。”(1977, p. 253)。威尔逊认为,可以肯定,“经济革新总是短

暂的,非常容易仿效”(1968,p.39);然而,问题是誰来进行革新。

175 威尔逊(1968,p.178)。

176 威尔逊(1968,pp.165~177)。

177 关于朱里厄(Jurieu)和贝勒(Bayle)对他们的放逐作出的不同反应,参见E.拉布鲁斯(E.Labrousse)。

178 让南(1969,p.103)。

179 让南(1969,p.102)。

180 “(实行自由迁徙政策)的荷兰共和国的半自由放任政策……给这个新的‘国家’带来了生产、商业和财政技术、人事关系网络以及大量额外的资本和船只的增长……如果没有这些,荷兰的发展将会较慢,规模较小”(威尔逊,1977a,p.18)。

181 比廷(Beutin)说,它是18世纪欧洲唯一的一个“新闻比较自由”的地方(1939,p.110)。

182 哈利(1972,p.124)。

183 威尔逊(1968,p.163)。如维拉尔所说:“自由精神表达了荷兰在当时商业方面的优势地位”(1974,p.251)。它使我们陷入一场长期的绕弯子的争辩,去辩论荷兰的艺术,“中产阶级”和“自然主义”的风格与盛行的形势之间的关系。只要牢记威尔逊所强调的这种情况的朴拙说法就够了:“使这种(艺术)职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是持续不断的需求,而不是对任何高报酬的期待”(1968,p.124)。

184 可以在肖尼的著述中发现这一说法。参见他对“多德雷特(Dordrecht),这个世纪最大的事件”的叙述(1966a,pp.470~474)。“所有人都到荷兰去玩牌”。

185 以我看来,肖尼认为这次辩论至少在17世纪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辩论更带根本性,这是相当正确的。肖尼提醒我们,阿米纽信徒(Arminian)——戈马鲁斯(Gomarism)信徒的争论与天主教会中的摩利纳教徒(Molinist)——詹生派(Jansenist)教徒间的争论有相似之处。他把阿米纽主义(Arminianism)称为“19世纪自由派异端的先驱”是正确的(1962a,p.119)。

186 雷尼尔(1944,p.46)。参见皮埃特·盖尔对萨缪尔·科斯特(Samuel Coester)这位阿米纽派和阿姆斯特丹文学人物的观点的描述:“用一个比喻来说——这个世界是一匹由权威所驾驭、为法律的鞭子和宗教的笼头所控制的烈马;如果把这个笼头放在世俗骑手之中,教会和马就会脱缰而跑——科

特创建了教会对政府关系的纯粹的规劝派(Reimonstrant)理论。这是一种向全欧洲所有的有教养的人呼吁的理论。他们对那些缺乏理智的民众及其过度的宗教狂热感到忧虑,因为那样就在各个国家都助长了建立绝对权威的主张,而追求绝对权威的就是世俗统治者,在别的国家就是君主,在这里就是联邦国家的当权者。”(1961,p.70)。

187 尽管这种说法指的是开始辩论时的情况,但是社会分裂在整个世纪一直持续不断。让南说:“1672年,在阿姆斯特丹,人们普遍抱怨阿米纽派——它成了一个政治称呼,而不是一个宗教称呼——在政府官员中占据了多数,尽管他们所代表的人数不及总人口的5%”(1969,p.111)。但是,这些抱怨有多大可靠性呢?卢达认为,在荷兰称霸期间,随着僧侣阶层缓慢的“贵族化”,出现了一种妥协。“教会开始面对世界,并且与那个世界的各个列强融为一体……摄政者们也更拘泥于教会形式……(到1672年)教会与政府之间最激烈的冲突已经过去”(1967,p.201)。

188 肖尼描述了这种社会分裂:“一种社会对立:一方面,荷兰省的摄政者组成阿米纽党;另一方面,东部的土地贵族、中产阶级,以及少数最近形成的大资产阶级组成戈马鲁斯党的骨干分子。戈马鲁斯信徒分布于除荷兰省以外的其它6个省份,特别是最近征服的农业省;这些戈马鲁斯信徒是在1590年的边远地区刚改变了信仰的人。阿米纽信徒是荷兰除阿姆斯特丹以外沿岸城市的资产阶级,他们比在沙丘地带的那些荷兰人更具有新教的特点”(1966a,pp.128~129)。

189 卢达(1967,p.204)。雷尼尔认为,天主教会尽管外表“冷淡”,但私下却具有同情心(1944,p.49)。E.H. 科斯曼在一次私人通信中说,他怀疑在17世纪初期,天主教徒是否应被看作是社会的最低层,因为许多贵族仍是天主教徒。

190 引自弗兰肯(1968,p.5)。

191 班斯(Bangs)(1970,p.481),他的文章是对理论、经济与政治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精彩分析。同时参见盖尔(1961,pp.13~14)。

192 博克瑟(1965,p.131)。

193 哈利同意这种观点:“[摄政者们]倾向于宽容的观点,并且极不情愿成为偏执教会的世俗帮凶。然而,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消除争论,以求得和平与和谐。”(1972,p.104)。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如卢达所指出,奥伦治派的省督并没有真正尽力去保护平民和反对“贵族的不义行为”,因为“省督的行为

很少能够满足中下层奥伦治信徒们的期望”(1967, p. 189)。

“主和”派也开始发现这时的议和没有什么好处。1621年,菲力普三世为了扩大和约的内容而提出三项条件:信仰天主教的自由,开放塞尔特河,撤销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奥伦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发现他们的利益再次趋于一致(参见盖尔,1961, p. 84)。大概西班牙在26年多的战争中赢得一个天主教的尼德兰南部;但是荷兰的经济利益却占据了优势(参见帕克,1972, p. 263)。因此,新教牧师们最终并没有如愿以偿。

194 哈利(1972, p. 128)。

195 威斯康蒂(Visconti)(1958, p. 301)。

196 E. 巴克(E. Barker)于1660年“稍带专断却还不失理智地”开始写他的现代政府史(1966, p. 1)。

197 P. 安德森的评论是相同的:“如果17世纪是整个贵族政治统治体系内的阶级与国家关系的混乱和杂乱无章的正午,那么,比较之下,18世纪便是他们的宁静与和谐的金色的傍晚”(1974a, p. 55)。

## 第三章 中心区的斗争

——第一阶段：1651—1689

当贸易处于危险时，它就  
是你最后的防御工事；你  
必须保卫它，否则就会遭到毁灭。

——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sup>1</sup>

荷兰霸权在 1651 年第一次受到真正的挑战。为什么只是在这时呢？这当然不是因为英国和法国不想在更早的时候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过于专注其内部问题以致无法作出“任何实在的努力去打破荷兰的霸权”。<sup>2</sup>

整个欧洲在 1650 年后的半个世纪，在人口方面只是停滞不前，要么下降，要么达到平衡。人口曲线在该世纪末再次开始上升。<sup>3</sup>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以下因素的综合影响：三十年战争的蹂躏，生态压力在某些地区引起的地方性短缺（所以瘟疫流行），以及从世界经济整体来看谷物生产过剩，导致世界价格下跌。<sup>4</sup>然而，最突出的还是地区差异。很明显，在 17 世纪初，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欧洲古老的中心地区（从佛兰德斯到意大利北部）以及欧洲世界经济体的新的中心地区（联省共和国的西部地区、英国的东南部、法国的东北部和西部）。<sup>5</sup>三十年战争、八十年战争，以及 17 世纪早期的瘟疫的主要影响都会使古老的中心地区和以前人口密度适中的西班牙北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发生锐减。<sup>6</sup>

相比之下，新的中心国家中，几乎没有衰落。在联省共和国，1650 年至 1680 年期间，情况有些混乱，此后便是普遍的稳定，直到 1750 年开始出现上升。<sup>7</sup>在法国北部，“没有发生重大的灾难”。<sup>8</sup>英

国的情况被认为“不清楚”<sup>9</sup>，而且“一直知之甚少”，但这时人口可能有“适度”地增长。<sup>10</sup>

如果知道了中心地位与抑制人口下降之间联系，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乐观”的人口理论竟在 17 世纪占据优势，这种理论相信人口稠密导致了民族的强大，稀少的人口则意味着一个国家“必然是穷困、软弱的”<sup>11</sup>。如何使他们的国家比别国更强大，是中心区国家所关注的问题。正是 1622 年的大萧条，激励了托马斯·曼 (Thomas Mun) 爵士写出重商主义的古典之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sup>12</sup>可以肯定，重商主义在英国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格兰普 (Grampp) 把它追溯到 1500 年<sup>13</sup>，昂温 (Urwin) 把它描述为在詹姆士一世统治下的广泛的保护主义运动<sup>14</sup>；但是当危险波及英国和法国的时候，重商主义政策就被“更加有力而系统”地采纳了。<sup>15</sup>但是，正如我们以前所讨论的那样，奥尔德曼·科克因的方案证明是不成熟的。该世纪中叶是什么样的变化使得重商主义政策得以成功呢？使其成功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sup>16</sup>

在中心区激烈的斗争中，英国 1651 年的航海法打响了第一枪。是什么促使它产生呢？1648 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最终承认荷兰摆脱了西班牙控制而获得独立。英联邦国于 1649 年宣布成立，1651 年，联省共和国开始了无总督时期。从欧洲大规模的宗教斗争来看，宗教改革派与反宗教改革派或多或少地达成了协议（法国对胡格诺教徒的驱逐除外）。因此，有和平，但也有战争——或者说是一场真正的旷日持久的“冷战”，偶尔也插进一些阻止中心区列强之间“邪恶的商战”的战斗。<sup>17</sup>大陆战争的结束对英国并无任何好处。正相反，由于英国的船运业已从其中立地位中尝到了甜头，因而，“即将来临的和平意味着转口贸易又要倒回荷兰”。<sup>18</sup>而且，1632 年以后，由于战时的不安全性，西班牙的 *asientistas*<sup>[1]</sup> 用英国船只把贵金属运往佛兰德斯。这对英国有很重要的额外利

(1) 指与西班牙签约、向西班牙供应非洲奴隶的外国奴隶贩运商，特指英国的奴隶贩运商。——译者

益,因为根据协议,2/3的贵金属要在多佛尔(Dover)卸货并且运走之前要在伦敦的铸币厂铸成硬币。这就提供了大量的国家岁入,这对查理一世以及后来的长期国会都十分有利。<sup>19</sup>

荷兰方面,战争结束后,荷兰与丹麦在1650年签订了补偿条例(Redemption Treaty),允许荷兰人承包他们的船只在海峡的通行税,以之作为交给丹麦的一笔固定的年收入。这不仅节约了钱财而且“更重要的”是节约了时间。<sup>20</sup>1652年4月7日,简·凡·里贝克(Janvan Riebeeck)在好望角建立了第一个荷兰前哨,扼住了通往东印度群岛的咽喉。总的来看,荷兰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相比之下,“英国的状况从来没有比这时更糟”。<sup>21</sup>1649年,谷物价格达到那一世纪的高峰。法国人禁止英国的商品进口。无论是在国内(通过征税)还是国外(由于缺乏一个外交使团和海岸线上的海军防御力量),商人们正在支付内战的代价。正是由于这些情况,英联邦国主要新教组织准备打破历史上新教主义和爱国主义交错混合的模式。<sup>22</sup>的确,利希舍姆(Lichtheim)认为克伦威尔在不列颠海外扩张史上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正像他把清教徒“民族化”那样,他把对外政策也世俗化了。<sup>23</sup>

由于荷兰是事实上的霸主,因此,促进英国商业的发展只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国家对英国商人提供支持;二,国家对外国商人加以抑制。1621年,由于担心后一种政策会招致荷兰的反对,英国于是以调整公司的方式采纳了前一种政策。<sup>24</sup>这种政策对这些公司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对于整个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却非如此。尽管遭到被调整的公司的反对,<sup>25</sup>但是为了与“整个经济力量的前进步伐”相一致,<sup>26</sup>英国人通过在1651年提出的对进口的种种限制而把矛头直接指向荷兰人。1651年的航海条例宣布,凡进入英国的商品必须用英国船只或者是生产国(即第一港口国)的船只载运。这样做恰恰是为了“削弱荷兰的贩运和转口贸易”。<sup>27</sup>亚当·斯密认为航海条例是由于商人议会的利益促成的,而施莫勒则认为它是国家建设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在这二者之间做出选

择吗？<sup>28</sup>根本不必——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商人（某些商人）和制造商的利益，恰恰需要加强国家实力，这不仅能帮助他们占有波罗的海贸易，而且还能独占即将扩张的、更为重要的跨大西洋贸易。<sup>29</sup>

很难看到如何避免一次军事实力的较量。虽然英国人认为他们只是防御，但对荷兰人的挑衅太大了。1651年初，荷兰人拒绝了英国方面提出的和约，因而与英国的关系迅速恶化。<sup>30</sup>1652年战争一开始，便迅速指向荷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海军处于令人吃惊的糟糕状态。<sup>31</sup>一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引起了另一场战争。英国的“好战分子”正在等待“对荷兰的另一次打击”。<sup>32</sup>他们的机会要来了——若干年以后，而且这次是完全公开的进攻。如果“克伦威尔希望为保护自身而反对荷兰，那么查理二世希望自己成为他们的主人”。<sup>33</sup>但是，到查理二世时代时，荷兰舰队得到了改善，吸取了教训，而英国军队则士气低落（由于政府机构的无能和伦敦的瘟疫）；因此，相互僵持不下，出现了和平。

从某些方面来看，1667年的布列达和约（the Treaty of Breda）是荷兰的一次胜利，或者至少是一种妥协。荷兰人以新阿姆斯特丹“高昂的代价”换取了苏里南（Surinam）和东印度群岛的伦岛（Pulo-Run）。<sup>34</sup>英国人同意把联省共和国的内地产品（如在荷兰加工和〔或〕分装的德意志的亚麻布）看作是荷兰的。因为它们是荷兰出口到英国的大宗货物，这使得航海条例的某些规定失效。<sup>35</sup>然而，布列达和约仍被威尔逊视为“英—荷关系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并被卡特看作“荷兰共和国繁荣的下滑”的标志。<sup>36</sup>显然，在政治的遮掩下一定发生了一些事，而且它一定不仅仅是英国人通过取得新阿姆斯特丹，并在英国重商主义的诸多限制下堵塞荷兰的一个主要走私孔道而获得的利益。<sup>37</sup>这难道不是说明仇视荷兰人的英国人已经把他们对“荷兰人经济技巧不情愿的钦佩”<sup>38</sup>与“赶上他们的愿望”<sup>39</sup>协调起来了吗？这难道不也说明英国的农业—工业效益中所产生的重大变化，能够使布列达条约的挫折变得对他



们无足轻重,并能够把荷兰变成英国的小伙伴吗?

无疑,法国卷入争端是这种变化的结果,而且也促进了这种变化。1667年,法国对西属尼德兰的入侵是一个“严酷事件”<sup>40</sup>,它加速了布列达和约的签订并很快形成了英国、联省共和国、瑞典(当时是欧洲的第四大军事强国)三国同盟。路易十四被迫后退,荷兰则“于1668年以某些正当理由自诩为欧洲的仲裁人并使五位国王屈服”。怪不得路易会“对荷兰着魔”。<sup>41</sup>

1672年是个多事之秋。荷兰人发现他们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处于不同的战争状态。相对来说,第三次英—荷战争毫无结果,虽然英国人在象征性行礼问题上取得了进展。<sup>42</sup>相比之下,法国的陆地战似乎特别成功,至少开始时是这样。在1672年这个灾年整个荷兰几乎被法国征服;在随之而来的动乱中,约翰·德·威特被杀,荷兰共和国政权被颠覆。然而法国垂手可得的胜利却归于失败。(因此,荷兰人把1672年又称为“奇迹之年”。)奈美根和约(the Treaty of Nijmegen)远不是法国人接管了荷兰人的贸易体系。它于1678年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和不分胜负的战争,并要求法国人废除1664年的关税。<sup>43</sup>

1672年的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从1651年至1672年这段时期,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把荷兰看作是最大的对手;现在,他们主要攻击对方,而且,尽管荷兰人仍具有经济实力,但荷兰人突然成了次要的因素。<sup>44</sup>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费用正稳步上升。虽然整个现代初期,武器的技术基本上类似,但是骑兵<sup>45</sup>和荷兰人所擅长的围攻战的作用逐步下降。<sup>46</sup>到17世纪末,部分勃艮第的人口统计结果开始反映出战争的损失。联省共和国,尽管有富足的财富,但是他们“太小,以致无法承受他们必须承担的无限的难以承受的军事负担和海军防御”。<sup>47</sup>最后,英国海军大大超过荷兰,主要是因为英国“控制着更多的资源”。<sup>48</sup>当然,法国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利用的是陆地资源而不是海上资源;而且从长期来看,他们在军事投资方面得到的回报较少。<sup>49</sup>

英国和法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来源于经济基础的重大变化。就1650年至1750年间中心国工农业生产的效益比较的讨论，特别是就英格兰/不列颠与法国的比较而言，其中一个问题是，几乎所有的研究只限于国家范围以内。这样的研究总是包括多种比较论述，他们反映的常常是偏见而不是认真的评价。世界学者，包括法国学者在内，常常都把19世纪的差异看作较早时期就有的差异，因而孜孜不倦地去解释他们尚未得到实证的事实。我极为怀疑的是，这期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的工农业效益之间的差异比我们设想的恐怕要小得多。这些在1763年时还是小的差异从政治方面被夸大为一个世纪后的重大差异，这时，它们在经济上已经制度化。我们将努力概括的正是这一论点的前半部分。

比较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比较什么样的地区。法国的政治单位在规模和人口方面(大致相同的密度)大约是英国的4倍。如果把苏格兰和威尔士加上，把大不列颠作为一个比较单位，这也不不过使面积扩大不到两倍，而人口比率又减少了。仅就代表着法国统一关税区的五大税区而言，它的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整个大不列颠。如果我们拥有完全按这些不同的单位划分的资料(我们实际上没有)，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的选择作出不同的结论。外部政治疆界对估计军事方面的可行性以及指明政府政策能够影响经济生活的地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即使如此，在这三个中心强国中，每一国中央政府在不同方面也要受到其宪法结构性质(更不用说内部政治)的制约。

雅卡特(Jacquart)认为法国农业在17世纪是“财富的最重要的来源，而且迄今仍是如此”。<sup>30</sup>难道英国不也是这样的吗？在经济停滞时期，部分可耕地在英国被用作牧场，而在法国则用来种植葡萄。两者都回复到16世纪扩张以前的那种土地使用方式。这两个国家反应上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气候和土壤。古伯特(Goubert)在比较了英国、荷兰以及欧洲其他一些地区的农业后，描绘了法国农业的暗淡景象；但是，勒·鲁瓦·拉杜里(Le Roy Ladurie)认为法

国农业的发展，至少在边远的北方（最好的耕作区），与英国的农业扩展在同一起点上——1690年。英伯特(lmbert)认为，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法国的谷物生产只略有提高，而葡萄酒的生产则大大提高。<sup>51</sup>

从1650年至1750年三个中心国家都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谷物价格下跌。其它农产品的价格也下降了，但却不是总以同样的速度下降。<sup>52</sup>在每一个国家，通过转向其它的企业或通过效益的提高以及组织的再建以降低成本，从而努力维持利润水平。荷兰人在农业多样化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现在其他国家也要与它一争高低。<sup>53</sup>对富塞尔(Fussel)来说，英国“最重要的新生事物”是引进了宜于可耕地轮作的萝卜和苜蓿，琼斯则认为“主要的创新在于饲料的供给”。威尔逊强调了“从旧的荒废地中获取新的土地的过程”的作用，而在哈巴库克(Habbakuk)看来，新技术的利用不如“现存最好的(技术)的传播”重要。<sup>54</sup>这四种说法不管哪一种正确，应该注意两个主要的事实。这些“改进”必然能使那些以前生产率低下或者完全废弃的土地得到耕种；<sup>55</sup>这些改进是对谷物市场疲软的直接反应，因为，为了维持利润水平，农民们必须获得一个相对停滞的市场<sup>56</sup>的较大份额或转向其他的产品。

对这一时期英国农业技术改进的描述是大量文献的主题，它们那么具有说服力，以致会使我们失去观察力。德弗里埃(De Vries)提醒我们，至少在17世纪，英国农业的改进“主要用来使它达到尼德兰和意大利北部已达到的标准，不是远远地被抛在后面”。<sup>57</sup>在一种以法国学者的疑虑眼光看来都颇为大胆的陈述中，<sup>58</sup>罗尔(Roehl)坚持认为：

近代(农业)技术，在法国与其他地区一样早已引进。特别是靠近海峡的巴黎西部以及靠近佛兰德斯的北部地区，在结构和气候上与英国最好的农业地区十分相似。所以，看到“农业革命”在法国与在英国一样偶然地出现不平衡，并且在

两个国家的同一类型的农业区开始出现，而且长期局限于这些地区，就不会感到惊讶了。<sup>59</sup>

关于生产率的提高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斯利彻·范巴思把英国、尼德兰以及法国全部放在他的C阶段中（谷物的平均产出率是6.3~7.0），把英国和尼德兰的时期划在1500年至1699年间，把法国的时期定在1500年至1820年间——同样的起始时间，但终止时间不同。对英国和尼德兰而言，他估计在1750年以后，上升到他的D阶段（平均产出率10.0以上）（这使我们无法肯定他确信在1700年至1750年间发生了什么）。<sup>60</sup>霍斯金斯(Hoskins)发现，1650年至18世纪末，英国的产量没有任何明显的增长，然而里格利(Wrigley)估计，从1650年至1750年，人均产出率提高了10%；但是，费希尔认为，在查理二世统治晚期，大概1680年左右，“土地的生产量很大，使人们感受到数量大的恐怖”。<sup>61</sup>至于苏格兰，农业（耕地和牧场）的商业化是“17世纪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sup>62</sup>在法国，从15世纪到1840年，以产出率或每公顷产量而非日益延长的工作日或工作年来衡量，谷物的生产率维持了稳定，<sup>63</sup>此时的工作日和工作年都已延长。<sup>64</sup>

如果我们孤立地考察谷物生产，那么我们会忽略一部分重要问题，因为“农业提高的关键是畜牧和耕作的互相结合”。<sup>65</sup>这是新的草料种植——干草，紫花苜蓿，三叶草——所能达到的目标。这是英国人从荷兰人那儿学到的。<sup>66</sup>这使得劳动力代替了空间，并且在非游牧状态中发展高劳动生产率的畜牧业。<sup>67</sup>当这种情况在英国继续时，法国同时出现了蓬勃的葡萄酒的生产。肖尼颇带苦涩味地指出，在17世纪，西方国家“在通往人造天堂之路上”开始赶上东方国家。<sup>68</sup>

把1650年至1750年的欧洲世界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看出，从中心区到边缘区，谷物生产的地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将在论及有关东欧边缘区发生的变化时，对这一问题展开全面

的讨论；但是因为法国南部一半的地区事实上是半边缘区或边缘区，所以，在那儿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或许这种对所发生的事实的描述方式是要说明，虽然英国和法国北部作为中心区都大幅度提高了他们在当时世界谷类产量中所占的百分比，但是从英国方面来看，新的剩余都是供跨越国界的出口，<sup>69</sup>而法国北部地区，新的剩余都“出口”到国内。<sup>70</sup>如果这种大致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英国和法国之间后来出现的差异就不会表现为17世纪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同。或许差别更可能是出现在农业生产的不同组织之间。要对这期间英国和法国土地使用的发展状况作一合理的比较，我们必须牢记，每一个国家在利用土地方面都有两种主要方式，但他们只有一种是共同的——种植谷物。英国的第二种方式是畜牧业，它比法国的第二种方式即葡萄酒的生产更有助于发展规模经济；畜牧业需要更多的资本投资。这种简单的经济事实，比起法律、传统、态度、下层的阶级结构，或者“封建”权利的推定继承制，更能解释土地使用的发展的差异。

在英国和法国，由法律、政治以及市场的波动所组成的复杂的交叉网络，产生了名符其实的土地的各种关系的万花筒。通过具体考察按主要收入来源划分的四个主要阶层，人们就能看清这种复杂关系：一，地主，一般都是大地产主，往往是贵族，他们从生产者那里获得租金收入；二，富裕的生产者，总以“承租人”的身份出现，他们控制着中等规模直至大规模的土地，并且雇用劳工；三，非富裕的生产者，他们拥有少量土地，有时是所有者，常常需要通过其他职业来补充他们的收入；四，无地劳工（或几乎没有土地）。一般来说，极为含糊的术语如农民和自耕农原则上属于第二类，偶而也属于第三类。当作家们写到英国自耕农的消失和法国农民的幸存时，好像指的是第三类。17世纪时，英国和法国正发生什么事呢？如果我们逐一研究每个范围，我们就会看得更为清楚。

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现象是大地产缓慢而又稳定的发展，一个日益集中的过程。<sup>71</sup>一种主要的途径是圈占公地，这段时间它似乎并未明显消退。在困难时期，要建立这样的大地产需要付出金钱和精力。<sup>72</sup>渐渐地，土地通过出售的方式转到非贵族阶级手中，尽管在法国，这种情况追溯起来不大引人注目，因为一个非贵族去购买土地所需的同样多的财富也能使他买到一个贵族头衔（比在英国更方便）。这些大地产部分是由一块一块的地产拼凑的，因此一些所有权的集中就是“账簿的集中。”<sup>73</sup>从定义上讲，这种账簿集中因此引起“不在场地主制”（absenteeism）<sup>[1]</sup>的增多。此外，随着谷物价格的下跌，直接耕种土地日益无利可图，而租出则会受益。<sup>74</sup>国家机构的稳步增长吸引越来越多的地主到都市生活。不管他们留下来做朝臣还是参与金融市场的交易，他们自身离农业生产越来越远。<sup>75</sup>

要维持大地产，个人就得成为有竞争力的企业家；对于这些有才能的人来说有广泛的活动空间。但是，许多家庭则努力保护自己而排斥那些无能的继承人。在英国，这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形式——严厉裁决（the strict settlement）。<sup>76</sup>这种形式很有用，因为利息率降低了（这使人们更可能借债），而严厉裁决所限定的借债条件的限制却加强了。<sup>77</sup>在法国，家庭继承还面临强制分割地产的问题。但是法国地主和英国地主一样地狡猾，他们利用了法定地租的法律漏洞，这种地租可以过户给继承人，以区别于不能过户给继承人的地租。他们宁愿接受低利息率，而不愿为了保持永久性世袭财产而去取回资本。官方的受贿为这种投资提供了一种关键性途径。<sup>78</sup>

另外两个阶层，富裕的生产者与非富裕的生产者，被混为一谈，尽管有些人是所有者，但多数是承租人，而且一些法律上的承租人是事实上的所有者；<sup>79</sup>所有者—承租人的区别与经济实力、社

[1] 或译为“遥领地主制”、“在外地主”，指地主不在自己拥有的地产上居住而从他居住的外地收取地租的制度。——译者

会地位、政治面貌的划分没有任何联系。在大地产所有者范围内，经济困难时期承租人的状况比所有者的状况可能更好一些。<sup>80</sup>这两种人的发展应看作是两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在17世纪的前半期，地租还在上涨，而且税收也开始提高，但是，小麦生产的利润却每况愈下。<sup>81</sup>这对小谷物生产者形成一种压力。许多独立的生产者被迫放弃他们的独立地位。<sup>82</sup>小佃农也是如此。<sup>83</sup>

结果似乎是在随后的经济停滞时期，从事谷物生产的富裕的承租农民的兴起，他们靠非富裕农民（不管是所有者还是佃户）的没落而致富。在英国<sup>84</sup>和法国北部<sup>85</sup>都同样如此。这些地区另一项主要的农业经营，即乳制品业，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如此。<sup>86</sup>富裕的租佃农民之所以兴起，恰恰是大地产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结构的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结构需要许多中间人来监视直接的生产者，不管他们是雇佣劳工还是转租人。<sup>87</sup>这些中间人并不容易找到，谷物价格低落时能使这些中间人从地主那里获得较有利的地产租用条件。这种有利的租用条件可能是实际租金的减少<sup>88</sup>，或者地主得在某种程度上负担改进的费用。<sup>89</sup>

从1660至1750年这段时期，人们普遍同意英国的小农或自耕农或“土地所有者”正在消失；但是在法国，他是否幸存了呢？我们一直认为，从较广的范围来看，对法国北部来说答案是否定的（或至少否定程度与英国一样），但是对法国南部来说是肯定的。关于法国有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先看看专门术语。自耕农民最近似的法语词是劳动者（laboureur），它所表示的不是土地的占有而是资本的积蓄。古伯特说，一个劳动者“习惯上表示（在法国东部和北部）拥有被称为北方大犁的耕作装备的某个人”。<sup>90</sup>现在一副大犁应区别于摆杆步犁，尽管在英语中这两个词常常译成犁（plow）。<sup>91</sup>在17和18世纪的法国，北方大犁是一种比摆杆步犁更为沉重的工具，犁得更深并且用的铁也更多。因此，它需要数匹马或牛来牵引。所以，一个劳动者是“一个相当大的所有者或土地控制者（经营者），由于其经营方式以及他所能雇佣的人口的数量，

他在乡村人口中显得日益突出。

往南看看那些只有摆杆步犁而没有大犁的地块，我们所能发现的只是被称作 métayers 和 closiers 的经济力量弱小的农民，而不是劳动者。<sup>92</sup>迪帕格 (Dupâquier) 和雅卡特估计，在 1685 年 1789 年之间，在法国的维克辛 (Vexin)，一个北方地区，被称为 haricotiers 或 sossons 的小农 (petits laboureurs) 人数的百分比从 9.9% 到 3.0% 不等，较富裕的有承租权的劳动者的百分比仅在 10.2% ~ 8.4% 之间变化。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在生产葡萄酒的地区，“小农财产明显占据优势”，所占比重为大规模耕种的北方地区小农比重的 5 倍多。<sup>93</sup>但这些小农受到排挤的时候，许多人转而成为主要的熟练劳动者 (雇佣劳工)。勒·鲁瓦·拉杜里认为，而且我也同意，我们对于 16 世纪不应过分地强调这种区别，因为在这些群体与大租佃农户 (gros fermier) 之间才有真正的分界。<sup>94</sup>对英国来说也是如此。然而，停滞时期所发生的一切是，在英国，这条界限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更为明显，但是在并不种植谷物的法国乡村地区，这种情况不太清晰。

那么布伦纳 (Brenner) 提出的 (并非由他一人所提) “近代早期法国的小所有权的支配地位使得法国农业长期以来处于落后地位” 的论点有何意义呢？我们对两种假设——小所有权的支配地位 (法国北部并非如此)，以及相对于英国而言，法国农业的落后 (法国北部的情况令人怀疑，至少在 1750 年前是如此)，提出了我们的怀疑。布伦纳说，在英国，农业的进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地主能够垄断、兼并和圈占土地，从而建立了大农场并把它们出租给那些能够进行资本投资的资本主义承租人”。<sup>95</sup>

雅卡特认为，16 世纪“后半期”法国北部的变化主要是古老的家族开始出售他们的土地。他说：<sup>96</sup>

重要的……是新的土地控制者的行为。作为资产阶级的初露头角者，他们保留了商人祖先们所具有的牟利心态，尽



管他们竭力要忘掉他们的祖先。他们明白隐留领主岁人的关键作用，也了解集中大地产的益处，还明白林地和草地会带来更多收入。因此有一套完整的方略，它包括几代人对土地的攫取、改良和开发。

与此同时，雅卡特认为，15~20公顷的中等规模的、市场导向的农场也发展起来了，它们代表了典型的中等的资产阶级的投资，“有生存力而且有利可图”。大地产和中等规模地产的发展包括“逐步对农民进行剥夺的过程”，它引起了“乡村大众的真正贫困化”。这与英国真有什么不同吗？

布伦纳承认，法国地主可能也希望像英国地主那样“巩固自己所占有的土地”。但是，唉，他们做不到！因为在英国，法律允许地主“把租金或罚款提到不可能支付的程度，从而驱逐小佃农”。而在法国，“为了兼并成一个大生产单位就不得不买下无数小农的土地”。由此就促使我们去推断，这对法国的原始资本主义地主来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负担。然而，我们已发现，买进地产在英国和法国都是一种主要的集中方法，这不是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的确，当布伦纳说，在法国，“整个近代早期，许多农民的确深陷债务，最后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的时候，他含糊地认可了这种集中。”如果这样，那么谁买这些土地呢？布伦纳认为，在17世纪末，法国“耕地的40%至50%仍在农民手中”。但是，英国“农民手中的土地却不到25%~30%”。然而，法国北部的百分比是多少呢？

我们认为，英国和法国北部在1650年至1750年这段时期的土地的结构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并不大。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观点来看，这两个地区更多的是相似而非差别。为了维护停滞时期的整个利润水平，他们都不断地扩大他们在世界谷物产量中所占的百分比；这样能使他们局部地赶上荷兰余下的优势地位。关于工业部门，17世纪时，英国和法国政府首先关心的问题是保护工业。里普森(Lipson)认为，英国的这种保护是英国重商主义

的三根支柱之一，与航海条例和谷物法相并列；他说，“重商主义时代”是“企业的时代”。<sup>98</sup>对法国来说，“柯尔伯主义(Colbertism)”已成为那个世纪的一个主要的突出现象，尽管事实上，保护主义的干预在黎塞留时代就已经很重要了。<sup>99</sup>

工业的保护，或许我们该称作促进，其种种努力最初主要集中在纺织业领域。我们先看看结果，然后再看解释。法国的纺织业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北端以及米迪的小部分。<sup>100</sup>17世纪时，里昂传统的丝绸工业有了“明显增长”。<sup>101</sup>羊毛和棉花稍次。1625年至1635年时，它们达到了顶峰，然后衰落，接着便是柯尔伯统治时(或者说，虽然有柯尔伯?)“停滞在较低水平”，<sup>102</sup>最后终于恢复，在1680年至1705年局部地回到原来状态。<sup>103</sup>是因为柯尔伯吗?)。这种恢复包括意义深远的工业的“乡村化”。<sup>104</sup>英国纺织业的危机开始较早，而且随着新的服装业的兴起，或许危机克服得很早。从1600年到1700年，布匹生产增加，出口量翻了一番，而且布匹的产品种类日益增加。<sup>105</sup>这里，纺织品的生产乡村化，也许“比欧洲大陆的乡村化更早，更为迅猛”。<sup>106</sup>

与英国，甚至法国相比，荷兰的纺织业在17世纪后半期陷入了困境。原因之一是，这种工业位于城镇之中，因而劳动成本较高。<sup>107</sup>所以，荷兰除驼毛纺织外，在所有毛纺业领域都衰退了，但不是毛织品行业。在驼毛产业与毛织品产业中，他们保住了优先获得必要的原材料的优势——从西班牙获取羊毛，从土耳其获取驼毛产品所需的原料；而且他们保持了用靛青和洋红进行印染的技术优势。驼毛产品和羊毛产品是价值高、质量也高的商品，但是，他们面向的不是一个广阔的市场。这种方向的变化是“总的衰弱地位”的结果，<sup>108</sup>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荷兰的资本在17世纪后半期不断从工业投资转变到具有较高回收率的商业企业。<sup>109</sup>

在其它工业中，变故较少。但是，英国造船业“大约在1670年出现了颇为猛烈”的增长，<sup>110</sup>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荷兰的造船数量减少了。<sup>111</sup>人们必须真正留意的是，在整个世界经济体中，需求疲

软。即使在需求日益扩大的部门，它也支持不了联省共和国及其商业对手英国和法国的农业—工业部门的推进。英国和法国最关心的是为它的工人找到就业；而联省共和国所关心的是维持就业。<sup>112</sup>佩尔斯(Pares)说，如果重商主义者能够创造就业机会，他也“不必关心雇佣劳动的劳动生产率”。<sup>113</sup>

中心列强互相输出失业的斗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在其停滞时期的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1660年至1763年期间，这种现象尤为剧烈，原因是英国和法国都另外面临着一个波及他们1/4至1/2的人口的经常性贫困问题，这些人口不仅包括赤贫者，而且还包括大量的（不断增加的）不能充分就业的工人。威尔逊说，英国有一支“部分或全部依赖于巨大的然而不稳定的生产出口品的工业的劳动大军”。<sup>114</sup>法国也同样如此，只是较少强调出口而已。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的充分就业。在这方面，关于工资作用的争论十分激烈。一方面，据现在及当时所言，荷兰人的一个不利之处是高工资，它“在防止其他国家不能幸免的购买力消退方面是独一无二的”。<sup>115</sup>这可能是因为工业集中于城市以及工人的工团力量强大，它导致了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从而引起了税收的增加。高工资和高税收实际上使荷兰的产品缺乏竞争力，这就导致了相对的衰落。

然而，英国和法国的工资实际上可能一直在上扬。法国的农业和工业中都有这种迹象。<sup>116</sup>另一方面，要想了解真正发生的事，我们得更多地了解劳动生产率和以货币支付的工资的百分比。希尔说，17世纪，“英国人的懒散是外国人的笑柄”。<sup>117</sup>大概主要是与荷兰人相比较而言的。里普森告诉我们，在比较艰难的年代，工匠们总是不得不领取部分折价很高的实物工资，或者以领取期票的形式延期发放工资，工人们设法把这种期票折价出售兑换成现金。<sup>118</sup>最后一点特别有趣，因为这意味着，增加的工资虽然对雇主来说是真正的成本，但是只对小银行家有利，而对工人无利可言。

因此，我们要考察一下，奉行重商主义的中心区强国在紧缩时期反对中心区霸权国家的充满矛盾的多种需要。一方面，他们不得不使其成本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他们必须为他们的产品寻找市场。为了使成本具有竞争力的压力，被转嫁给工人，要对他们加强劳动纪律。弗尼斯(Furniss)描述了这一观念在英国的产生过程，在那里，人们提出了“就业权利”应当与“工人职责”联系起来的思想。<sup>119</sup>汤普逊(Thompson)谈到，时钟的设想在17世纪传播开来，“到牛顿之时，它就……遍及各个角落”。<sup>120</sup>内夫指出，在同一时期，苏格兰的煤矿工人和盐业工人由于早期工业化而“降为奴隶”。<sup>121</sup>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自由雇佣劳动的增长与资本主义的增长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中心区，以致使奴隶制这个词令人惊讶，甚至惊愕不已。法国的皇家制造业中也发生了同样的事。那儿，工人们实际上被囚禁在他们的工作地点；但是，他们得到了相对高的工资。

我们把它与工资的争论联系在一起来看看。大多数重商主义者像大部分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都赞成低工资是一种提高其成本竞争力的方法；但是，大部分老练的重商主义者却不这样认为。1688年，乔赛亚·蔡尔德(Josiah Child)在他的新著《论贸易》中，以如下的方式解释了荷兰的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情况是，每逢工资提高，它就是那个国家富裕的一个确凿证据；劳动工资无论在何处降低，那它就是那个地区贫困的证据”。<sup>122</sup>因此，乔赛亚·蔡尔德比阿尔格赫里·伊曼纽尔(Arghiri Emmanuel)早300年提出了这一论点。<sup>123</sup>尽管蔡尔德肯定并没有说服每一个人，但是，他的观点反映了结构的压力。

劳动纪律和增加工资在世界经济体停滞时期是互为补充的，这两方面的推进结合起来增加了就业，但不顾及单位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强化劳动纪律(甚至包括近似的奴隶制)以增加产出(这难道不是苏格兰煤矿和巴黎的花毯厂的真正动机吗?)再加上提高工资以吸引技术工人(再次以花毯厂为例)，而且也扩大了

国内市场，因此扩大了需求量。把增加的“工资”转化为小银行家的收入，而不是归于工人的体制，较之使工人们真正得到优厚报酬的体制，可能同样地、甚至更多地扩大了需求。但是，太早地过多增加劳动成本（不管对谁有利）会有损于与荷兰人的竞争，所以必须达到一种平衡。

我们现在可以评价一下 17 世纪后半期在英国和法国为促进农业、工业的发展所做的努力而带来的成就。自由派历史编纂学的经典性作法是，把辉格党执政的英国（它已向着私人控制的大众工业的方向前进）和陷入奢侈工业套子官僚化的柯尔伯主义政策下的法国作比较。人们说，英国正在走向自由主义、国会统治和进步；而法国则不断加强贵族政治、“封建主义”以及浪费——简言之，加强旧制度。正如在许多涉及这一时期的其他论点一样，赫克舍是这种偏见的现代的“经典”表述者：

在英国不仅没有任何与（法兰西）国家一手操办的奢侈工业相似的工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英国也没有大量的和广泛的拥有任何可能特权的皇家私人制造业……

这种差别至关重要。因此，如果这些技术的变化，正如以前所发生的那些变化一样，主要存在于提高手工技巧、高雅的品味以及艺术的可塑性之中，换言之，如果它属于那种技术领域，其中生产由皇室、宫廷、贵族以及其它的富裕生产者所决定，那么法国似乎就很有希望成为阿尔卑斯山以北领先的工业国家。但事实却根本不是这样。“工业主义”或“资本主义”意味着面向大众消费而进行的大众化的生产，这里，奢侈工业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因此，领导权转到了英国。<sup>124</sup>

针对赫克舍的解释，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是事实是否正确。例如，皮埃尔·莱昂（Pierre Léon），虽然同意柯尔伯促进了一些奢侈工业的发展，但是，仍怀疑它的准确性。

主要的推进实际上直接指向大众工业：羊毛业和亚麻纺织业 [埃尔伯夫 (Elbeuf)、色当 (Sedan)、朗格多克]；作为军需工业基础的钢铁业 [瓦朗谢纳 (Valenciennes)、康布雷 (Cambrai)]；造纸业。通过他的努力建立了 400 多处捐赠财产(捐助基金)，包括 300 处属于纺织业。无疑，(柯尔伯)并没有创立一个已经存在数世纪之久的“工业基础”，但是，他确实努力去加强那个基础，并使之集中起来……毫无疑问皇家制造业……首先建立起来，它是……未来工厂的“模式”。<sup>125</sup>

关于柯尔伯主义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影响，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像官方受贿和雇佣兵一样，柯尔伯主义标志着向 19 世纪的模式跨出了一步，而不是偏离。柯尔伯主义是黎塞留首创的，约翰·内夫认为，必须正确评价它的两个积极效果：

首先，在体系内，经济冒险家得到了比他们在黎塞留时代以前所允许得到的更多的自由……其次，商业的规则体系……实际上在保证商人们的政治权利以及社会地位方面进了一步，伊昂 (Eon) (一名传教士，他的著作在柯尔伯时代时已具有影响力) 坚持认为，那是商人们非常需要的。<sup>126</sup>

如果 17 世纪的英国和法国重商主义的推行之间的差异比人们经常争论的少，那么，为什么古伯特 (Goubert) (像许多其他人一样) 要谈论“柯尔伯的全球性失败”呢？<sup>127</sup> 为什么说柯尔伯关税的主要作用只是“在一段时期内阻止”英国布匹生产的上升趋势呢？<sup>128</sup> 如果像德约恩所认为的环境不利，<sup>129</sup> 那么，它也会对英国和法国一样不利。威尔逊暗示说，法国人不是十足的重商主义者，他们的重商主义，不像英国那样，“甚至在柯尔伯时期，仍然是那么地不连贯、不明确”，因为法国缺乏“扩大的商业资本与伦敦那样的威斯

敏斯特—城市轴心所代表的政府影响的结合”。<sup>130</sup>这种论点促使我们去观察，两个重商主义中心国家的各利益集团是如何追逐他们的经济目的的——请记住，法国的版图是英格兰的4倍，而且在其疆界内包括许多非中心地区。<sup>131</sup>

要将它们进行充分比较，我们必须从总体的评价开始，通盘观察商业和财政的状况。人们普遍认为，1660年至1700年是“英国商业革命”时期，<sup>132</sup>这个时期，英国首先成为“一个依赖自己的世界贸易仓库”。<sup>133</sup>关于这一时期，经常强调的是，英国与荷兰相比所获得的世界贸易中的百分比，它反映了航海条例的成功方面。<sup>134</sup>但是，法国怎么样呢？按克劳斯特（Crouzet）的话说，“法国与英国17世纪期间（特别是1660年以后）对外贸易迅速不断的增长无法相比”；<sup>135</sup>但是，德卢摩（Delumeau）在考察1590年至1690年的整个时期后，提供了一幅法国对外贸易特别强劲的不同的图景：“发展……是缓慢的、不平衡的，深为各种挫折所困，但发展是确定无疑的”。<sup>136</sup>里奇特（Richet）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绝对有增长”，它的影响“超出了海岸地区”，并且能使纺织生产者和其他人“在1680年至1690年的数年内，达到他们在前一个世纪的最佳年月中从未达到的水平”。<sup>137</sup>

如果真能解释的话，又该怎样解释法国公司的失败，以及与英国和荷兰相应的情况相比，法国资本家极不情愿投资呢？据说这是因为“法国人的气质及其缺陷”，<sup>138</sup>或者因为法国商人的后代摒弃了经商这一行当。<sup>139</sup>我不认为这是很严谨的两种解释。即使它们比其他解释更为确切，然而还是令人怀疑，为什么会这样呢？不管哪一种情况，人们还是必须对正在讨论的后代们的父辈的投资模式作出解释。或许，仔细考察一下世界贸易部门模式会把事情阐述清楚。

我们先按照地域范围从总吨位和英国船运业的价值开始，总吨位和价值已经在表2中进行了计算（遗憾的是，我知道对法国没有同样的计算）。

在这个表中,三个事实非常显著。欧洲附近地区,大部分是其他中心列强的地区,在总吨位方面占了1/3强,价值占了将近一半。波罗的海贸易在总吨位上占了另外的1/3,但其价值却很小,这样对船主有利,但对商人就不太重要。东印度群岛所占的船运量比重和总价值都很少,但是,这个地区每吨的价值是最高的(相反,波罗的海贸易最低),每吨的高额价值意味着每艘船的高额利润率。这些事实表明,亚洲的贸易虽然对东印度公司一直很重要,但是对于世界经济体而言,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东印度公司有能力抵制针对其贸易逆差对它所作的违反重商主义逻辑的攻击。<sup>140</sup>这种贸易真正引起的损失是有限的。当然,与之相应的是,东印度公司因此期望英国政府“在亚洲让它自己谋生”。<sup>141</sup>

表2 1700年<sup>a</sup>英国的对外船运业

区域	吨位	百万镑	每1000吨的镑数
东印度群岛	5 000	0.9	.180
地中海	71 000	1.5	.046
西班牙和葡萄牙		1.7	
西印度群岛	43 000	1.3	.030
北美洲	33 000	0.7	.021
欧洲北部	218 000	0.9	.004
欧洲附近地区	<u>224 000</u>	<u>5.1</u>	.023
总计	594 000	12.1	

a 该表是对威尔逊表的复制(1965, p. 162);威尔逊则以拉尔夫·戴维斯(Ralph Davis)的研究为基础。

进口处于上升的趋势——与1600年的240 000匹白布相比。1700年是861 000匹(其中2/3用于再出口);<sup>142</sup>但是,欧洲商品在亚洲的出口市场仍然有限,以致“任何过多供给商品的努力都会引起需求的巨大缺口以及价格的下跌”。<sup>143</sup>在需求量成为重商主义



列强集中关心的问题的时期，东印度贸易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的确，为了使这种贸易“有用”，印度必须边缘化，然而，英国人认为这样做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法国人也认为如此，直到1750年以后，情况才有了好转。实际上，正是在那个时代，不列颠人开始对印度实施政治征服，在经济方面对其实施边缘化。<sup>144</sup>地中海贸易在许多方面，就其作为一个边缘区而不是一个外部区域的程度而言，<sup>145</sup>与东印度十分相似。那种贸易在数量上具有重要性，<sup>146</sup>而且在英法竞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sup>147</sup>

当我们说到英—荷竞争和英国以荷兰为牺牲而崛起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两件事，一是荷兰人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的英国国内市场，二是作为荷兰“母体贸易”的波罗的海船运业。如果只看重船上悬挂的国旗，我们就可能忽略船中载运的货物，它在整个17世纪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延长的16世纪中，波罗的海贸易主要由向西去的谷物（因此，格但斯克很重要）和向东去的纺织品构成。17世纪的经济停滞终止了这一贸易，但是，只是在该世纪的中期，才出现了名符其实的“波罗的海地区的分解”。<sup>148</sup>世界价格的跌落导致谷物出口的下降，进而引起波兰和东爱尔比亚（East Elbian）谷物产区退出国际市场。这又意味着这些谷物产区的布匹市场的衰落，一是因为可得到的硬通货减少（记住Kipper- und Wipperzeit），二是因为在东欧又恢复了本地的手工业生产，地主力图以此尽力弥补他们因谷物市场的崩溃所造成的某些损失。<sup>149</sup>

相对于荷兰纺织品和当地生产的纺织品，英国纺织品的边际效率并非很高，所以它很难在需求减少的波罗的海地区生存下来，“除非大幅度降价，而这是不可能的”。<sup>150</sup>伊斯特兰公司（the Eastland Company）由于出口经过印染和处理的布匹，因而提供了就业，所以才得到王室的支持。<sup>151</sup>当它把重点从出口转向进口时，它注定要丧失它的特权地位，特别是在英国越来越多地转向转手贸易和充当货栈角色的时候。但是进口什么呢？传统的进口货物谷物已经衰落。由于谷物贸易的衰落和世界经济的停滞引起了三

个中心国家激烈的商业竞争，而且由于它们的竞争常常激化为战争（特别是海战），由此导致对海上补给品和钢铁这两项需求的增长，而波罗的海地区能够在这两方面提供供应。

当然，海上补给品长期以来从波罗的海进口，但是“1650年以前的供给问题从来都不尖锐”。<sup>152</sup>现在却变得尖锐了，有三个原因：造船业的发展、房屋建筑的发展（特别是伦敦大火之后）以及从前的建设耗尽了英国木材储备（而且在那一世纪末时，爱尔兰木材储备也用尽了），从而短缺已“达到……一种民族危机的程度”。<sup>153</sup>这里，我们来看看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关键性差别：因为法国的版图大得多，它有相当充足的木材供给，并且直到柯尔伯晚期，它们在这方面似乎仍安然地领先于英国。<sup>154</sup>可以肯定的是，法国的木材就造船业而言，质量较差，欧洲北部的船桅用的都是上等木材；但法国的确拥有自己的木材。法国的的问题是，桅杆质量的差异是否足以值得在时间、金钱以及政治军事力量方面做出额外努力来从别地获取木材。答案似乎是否定的。<sup>155</sup>英国人却没有这种奢侈的选择余地；他们不得不从外部地区获取木材。这样，他们在波罗的海付出极大的努力，比法国人在北美付出的努力要大得多。

法国木材大量的国内供给附带产生了两个意义深远的影响。它推动波罗的海贸易在地域上向东发展，从格但斯克到柯尼斯堡(Königsberg)，然后到里加(Riga)，到纳尔瓦(Narva)，最后，通过斯德哥尔摩和维堡(Viborg)港口把俄国和芬兰连接起来。<sup>156</sup>其次，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推动英国发展它的煤矿资源。最近一项保守的估算认为，在整个17世纪，煤炭生产增加了约60%，并且从1650年的最低点到1680年的最高点增长了370%。<sup>157</sup>用煤炭代替木材取暖和烹调起初是由詹姆斯一世推行的，但是由于英一荷战争引起进口的中断，才使它的使用得到真正的推动。后来，制造商们开始寻求能够使用煤的生产过程，到1738年，一位法国观察家写道，煤炭是“英国工业生产的灵魂”。<sup>158</sup>

除海上补给品的供给外，另一个从波罗的海进口的新货物是

铁。17世纪之初，英国从波罗的海的进口中，铁占2%，到17世纪末，占28%。<sup>159</sup>铁产于瑞典，而且是工业产品，是矿砂经冶炼后的产品。为什么那时瑞典在铁的生产中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呢？人们一定记得，在18世纪末之前，木炭是熔化铁的极重要的能源。因为金属和能源的运费高昂，最理想的情况是在一个地方同时具备这两种因素（实际上，铁比森林更能大量开采而且资源丰富）。瑞典既有高质量的矿藏又有大量的木炭。<sup>160</sup>英国和法国也有较大的冶炼规模——法国的可能大一些，主要是由于“不那么缺乏燃料”。结果，英国为了供应本国生产而成为瑞典铁的大买主，而法国则“既不进口也不出口这种金属”。<sup>161</sup>也就是说，法国能自给自足，所以并不“需要”波罗的海贸易。瑞典的铁在瑞典成为世界经济体的半边缘区的过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以后我们再讨论这部分历史。目前，我们着重探讨的是英国和法国对外贸易模式的规模和资源上的差异的影响。两个国家的制造业都在发展；因此需要越来越多的铁，<sup>162</sup>更多的铁又需要更多的燃料。英国不得不转用煤做燃料并比法国<sup>163</sup>更早地进口铁的原因，与其说是工业化的不同发展水平，倒不如说是不同的生态结构所致。

也许正是在大西洋贸易中，英国和法国之间产生了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差异。英国跨大西洋贸易的数量比法国大得多。此外，英国在这期间在西半球开辟了殖民地，而法国的殖民活动比较缓慢，也不成功。这两种现象实际是相连的。到1700年，英国成为“在大西洋下有最大赌注”的国家。<sup>164</sup>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已经讨论过荷兰是如何控制欧洲贸易的；而且对他们来说，发挥其优势比培养新的而且困难的优势似乎更为合理。然而，为什么法国人没有与英国人一起转向大西洋贸易呢？或者更确切地说，特别是在1660年至1700年间，英国为什么比法国做得更好呢？事实看上去很清楚。17世纪时，在西半球建立了28个新的、分散的殖民区：荷兰3个，法国8个，英国17个；到1700年时，英国有35~40万个臣民（包括奴隶），而法国仅有7万个臣民，在蓬勃发展的加勒比

海殖民地,英国人的数量是法国人的2倍。<sup>165</sup>法属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在人口数量和生产的产量方面都不能与不列颠在北美的殖民地相比。1600年至1700年期间,英国开拓了一项重要的欧洲再出口殖民地产品的贸易,这是一项新的巨大的有利可图的转口贸易。<sup>166</sup>的确,航海条例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英国商人成功地垄断了他们殖民地的贸易,此外,他们在西属美洲的走私活动也取得了广泛的成功。<sup>167</sup>

当然,法国人也像英国人一样把烟叶和糖运过大西洋,只是总量不及英国人的多,而且法国国内市场吸收了大部分的进口产品,留下再出口的较少。与英国人相比,法国人在美洲的生产者较少——他们是殖民者、契约奴和奴隶;因此,他们生产的也较少。<sup>168</sup>为什么他们拥有的生产者较少,这一问题难以回答。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对不同的宗教团体迁移的态度是不相同的。实际上,英国鼓励这样的移民,至少不反对,而路易十四却禁止胡格诺教徒到美洲定居,并且说他“并不是为了把他的殖民地让给异教徒居住而去建立他的天主教王国”。<sup>169</sup>

我们似乎回到对两个国家的种种差异的通常的解释——英国是宪法国家而且相对自由一些,而法国却是专制主义和独裁主义的国家。但是,有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1687至1688年,南特敕令废止后不久,法国国王威胁说,一旦抓住“逃越”边境(可能逃往其他欧洲国家)的胡格诺教徒,他们将被驱逐到密西西比、加拿大、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或者美洲的其他地区。按斯科维尔(Scoville)的说法,这至少是一次有份量的威胁,因为“运往大西洋彼岸的威胁使胡格诺教徒感到震惊,比终生锁在大帆船上更为有效地迫使更多的人改变了信仰”。<sup>170</sup>这些事实表明,宗教的考虑看来并不是阻碍法国人派遣更多的殖民者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法国人不像英国人那样热衷于殖民地的开辟。

是什么引起殖民地开辟的兴趣呢?在此我认为我们已接触到问题的实质。美洲的殖民地服务于两个目的。第一,它们是所谓热

带产品的来源——糖、棉花、烟叶——这些产品需要一种气候，欧洲大部分地区不具备那种气候条件，扩大的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巴西和北美洲的南部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比较适宜，为此，英国和法国在这一地区获取了殖民地。两个国家在这方面的差异相对较小，尽管英国比法国更为成功。第二点而且也是殖民地相当不同的功能是，它是工业产品和转手出口商品的市场。热带殖民地市场疲软，正是因为它们有赖于使用强制劳动以减少生产成本。它需要生活水平较高的欧洲殖民者创造足够多的集体净收益以服务于这种功能。

英国开拓了这样的殖民地，而法国没有。是法国需要的市场较少还是它在不同的地区找到了市场？我们再次看看规模因素。法国不是能更多地在国内出售它自己的产品吗？<sup>171</sup>英国需要欧洲这个市场（长期经过联省共和国推销），<sup>172</sup>也需要建立它的北美洲殖民地。<sup>173</sup>这完全是一个相对的问题。由于面临同样的世界性萧条，英国和法国都把重商主义的对策首先指向联省共和国，然后指向对方；但是，英国把各方面力量集中于加强对外贸易。这是自我加强；由于贸易的需求，他们需要船只，进而需要海上补给品和用来购买海上补给品的产品，以及需要不断扩大的制造业产品的殖民地买主。数量甚至可以说明为什么英国发展了三角贸易而法国却没有。更多的船只引起对单程运输和船只使用不足的关注，对此，三角贸易成为一种解决方法；<sup>174</sup>这当然进一步加强了殖民地的用途。最后一招是，英国较大的大西洋贸易导致了较大的转口贸易，它在英国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反重商主义压力的团体；<sup>175</sup>也许，这可以说明 18 世纪出现发展差别的原因。

人们常常认为，英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没有捐税以及内部运输体系的改善（移开堰坝，加固河岸，加深河床，设置水闸，挖掘河道以缩短航线）。<sup>176</sup>虽然在法国，捐税所引起的成本增加不多，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这只适用于五大税区以外的贸易，但是，莱昂（Léon）和卡里尔（Carrière）说，总体来看，法国运输费昂贵。他

们感到困惑的是：“我们很难就一个相当难的问题谈得更多”。<sup>177</sup>

这样来看这个问题难道不合适吗？英国国内的运输费用与法国北部关税地区的运输费用的差别可能不是很大。如果人们从英国走海路，从法国北部税区走至少一部分（即使不是主要的）陆路的话，正是在这个时期，海路运输比陆路运输便宜得多，所以，英国由于缺乏一个足够的国内市场而引起的困境反倒变为一种优势。<sup>178</sup>也许关键在于法国经济上比英国更富裕。它需求较少，因而没有能使它走上“对外”贸易的发展道路。对外贸易的发展在漫长的衰退时期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差别，但是，它可能使英国做好更充分的准备——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方面的准备——以利用 18 世纪中叶得以恢复的经济扩张。<sup>179</sup>

现在我们必须看看英国和法国如何处理生产与贸易中的融资问题。有三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需要讨论：这个时期贸易中贵金属的作用（大概是重商主义者极为关注的问题）；这个时期贵金属的可利用程度和流量；以及公共资金对整个体系运作的影响。杰弗里·帕克(Jeffrey Parker)认为，1500 年至 1730 年是“金融革命”时期，它是工业革命必不可少的序幕，而且从私人资金方面来看，它说明两件事——信贷工具在几个中心的集中以及“与此相联的，一个国际多边支付体系的发展”。<sup>180</sup>在发展这个表示过程的名词的含糊含义背后，有一场重要的争论。实际上，支付在多大程度上是多边的呢？或者更确切地说，多边支付是在何时变得如此盛行，以致商人和政府在计算中要依赖它呢？

争论在一次著名的交锋中形成，其开端是由于查理·威尔逊对赫克舍对重商主义逻辑的摒弃表示不满意（的确他有充分权利这样做）。威尔逊认为，因为只是在 18 世纪才出现了从双边支付体系向多边支付体系的转变，所以重商主义者在 17 世纪对货币可利用程度的关注一直是合理的。<sup>181</sup>赫克舍回答说“多边贸易和套利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也许更早”——并且认为“实现这种多边贸易”的手段是一个“次要的问题”。<sup>182</sup>贵金属的流动只是取得多

边结算的一种手段；此外还有汇票，没有它的“普遍使用”，多边贸易就“不可能进行”。威尔逊的答复如下：当然早就存在某种多边贸易和汇票的某种用途，但是，贸易量所依赖的正是贵金属或硬币（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地区），而且，没有贵金属，贸易就会“由于退回到某种双边状态而受到限制”。<sup>183</sup>

在对这次争论进行评述时，雅各布·普赖斯(Jacob Price)责备了双方“不准确的历史依据”和把整个重商主义时期视为静态的作法。他说，汇票起源于中世纪决非简单地出于安全的原因，或支付手段的简便，“而是部分地补偿货币的相对不足”。他认为，从16世纪中叶至1660年，世界的白银供给突然繁荣起来，使得贸易扩大，但是在1660年以后，白银供给减少了，从而导致了汇票使用的增加和商品流通的扩大，以达到“平衡贸易”的目的。<sup>184</sup>普赖斯因此进行了折中，把17世纪的前半期给予威尔逊，把17世纪的后半期给予赫克舍。以普赖斯看来，可用的贵金属数量可以解释这种差别。斯伯林(Sperling)继普赖斯之后，同意1660年是转变的关键时刻，此后，那里便出现了一个阿姆斯特丹—伦敦的国际票据交换中心，这个中心“进而扩大以满足日益发展的世界贸易体系的需要”<sup>185</sup>并使工业革命得以进行。鲁道夫·布利茨(Rudolph Blitz)在这次争论中补充了一个有用的提示，即贵金属是一种货币也是一种商品：

如果一个国家除黄金以外什么也不生产，并把黄金出口到世界的其他地区以换取消费品和用于投资的商品，那么，把黄金出口当作“黄金商品出口”比当作一种衡量贸易逆差的尺度更有意义。<sup>186</sup>

这种论点完全正确，所以，17世纪时贵金属为何在某些渠道中的流量超过其他渠道的问题，与它流向什么地方同样重要。在观察不同的贸易地区时，我们注意到，威尔逊—赫克舍最初的

讨论主要围绕波罗的海贸易，威尔逊认为，“波罗的海是一个排泄管道，它排去了西班牙用以购买荷兰出口品而抵押给阿姆斯特丹的大量美洲白银”。<sup>187</sup>然而，仔细观察一下，波罗的海贸易总的来看并不真正需要白银出口。赫顿认为1660年左右，三种英国贸易需要出口白银——东印度，土耳其以及挪威——这种需要“对伊斯特兰贸易未必属实”。<sup>188</sup>阿斯特罗姆针对威尔逊有关波罗的海贸易的陈述指出，银币出口到了挪威和俄国，然而根本没有或者极少出口到贸易量大的地区，即东方国家和瑞典。<sup>189</sup>此外，斯伯林坚持认为，有“大量迹象”表明波罗的海地区使用了汇票。赫罗奇(Hroch)和格拉曼都认为，波罗的海贸易的亏损可能已通过一种相反的东西方陆路贸易平衡得到补偿。<sup>190</sup>那么，贵金属流向何处呢？它似乎流入挪威和俄国，或许是土耳其，最重要的是流入东印度以及另外一个地方——荷兰。东印度和荷兰——真是令人惊奇的一对！这两种贵金属的流动在形式和目的上都极不相同。

戴尔(Dales)认为，威尔逊是对的，但不是波罗的海方面；他说，威尔逊的论点适用于欧洲和“东方”之间的贸易。<sup>191</sup>肖德尤里的著作似乎令人信服地证明，在1600年至1750年间贵金属不断地从英国外流到印度。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肖德尤里说，大约在17世纪初——

因为该公司<sup>(1)</sup>已成为亚洲市场的地方贸易商，可以说，输出金银实际上有一半是输出资本，当资本投入到该公司的亚洲工厂时，就可以产生高额利润，从这些高利润中，至少可以用一部分购买欧洲商品。<sup>192</sup>

然而，随后的进口说明，一些商品（起初是香料）在亚洲廉价收购，在欧洲则高价出售。从货币方面来看，肖德尤里发现“贵金属流失

---

[1] 当指东印度公司。——译者



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大洲商品方面的金银价值显著而广泛的差异”。<sup>193</sup>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当肖德尤里讨论 1660 年至 1720 年这段时期时，<sup>194</sup>他认为，东印度贸易“也已相应地成为多边贸易”。然而，他提供的数据表明，贵金属出口没有任何显著的下降——实际上恰恰相反。他说，总的来看，每年出口的金银仍旧占出口总值的 70%~90%，这个比率表明，“支撑欧洲与东印度群岛之间贸易的基本经济因素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早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于荷兰，数字也显示出，从 1672 年至 1695 年间，它获得了英国出口的所有贵金属和硬币的 70%~90%，<sup>195</sup>并且从 1699 年至 1719 年，它仍然得到了英国“最多的金银”。<sup>196</sup>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事实是，贵金属既包括银也包括金，而且这些金属显然不是无选择地流动。金银有一定比率，而且它们不断变化；但是有什么模式可供观察吗？赫伯特·卢西 (Herbert Lithy) 提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黄金和白银完全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至少大部分金银是这样。然后，欧洲再把大部分的美洲白银转手出口到亚洲，“几乎全是单一本位制的白银”。<sup>197</sup>然而，黄金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它“到了欧洲并留在那里，被欧洲各国政府当作大规模商业清算和支付的主要工具”。<sup>198</sup>

现在我们看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内部的贸易与一个特定的世界体系同其外部地区间的贸易之间的区别。我现在探讨的世界体系是欧洲世界经济体，外部区域主要是东印度群岛，也有挪威、俄国，或许还有土耳其。要促进体系内部的贸易交换，就需要货币（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日常使用的是银币和铜币，金币为其后盾）。显然，纸币（汇票）也用于促进交换。我们期望这种交换基本上是多边的，而且在国际金融中心（17 世纪时是阿姆斯特丹）主要用纸币，间或用黄金汇兑进行结算。在两个经济地区的交换中，每一个地区外在于另一地区，不使用“货币”。交换相对来说是双

边上的，并且以商品形式进行，商品的价值对应地折算——现在所说的是，欧洲的白银最初是换成香料，后来是换成东印度群岛的印花布。流入亚洲（以及俄国）的硬币或贵金属主要“用于收藏或做珠宝”；<sup>199</sup>而且这种“贸易”（如果人们拒绝把白银作为一种商品）长期以来一直入超，而且主要是双边贸易。这两件事确实地说明，东印度群岛一直是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外部地区。西欧与伊斯坦（以及瑞典）的贸易大部分是多边贸易而且以汇票结算这一事实，从另一方面说明两个贸易区是一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把金银作为一种商品来生产，使美洲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的一个边缘地区，因为这种商品对这个世界经济体的运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被当作货币。如果美洲所有的贵金属都流向亚洲，那么美洲就会成为另外一个外部地区，欧洲就会成为三个地区——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轴心，以运往美洲的商品作为代价来获取亚洲的奢侈品。但是，美洲对于交换他们的贵金属并不感兴趣，而且确实也没有去开采它。所以，欧洲人首先攫取了印加的黄金，然后开采波多西（Potosi）和墨西哥的白银，还不断寻找新的矿区（在这些矿区中，巴西的黄金不久成为最重要的）。他们派遣殖民者从政治上控制美洲并监督经济的运作，同时输入劳动力。简言之，他们把美洲纳入他们世界经济体的轨道，主要是因为他们需要一种稳固的货币基础来扩大资本主义体系，其次为了利用与亚洲贸易中获得的剩余产品。当英国人在1663年废除了把贵金属出口到波罗的海的种种障碍时，<sup>200</sup>这难道不是因为波罗的海事实上已完全纳入到一个多边支付的体系中吗？

那么重商主义者关心贵金属的流通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吗？有的——因为作为货币的贵金属的流通是霸权国家用以保证其额外利益的途径之一。由于担心贵金属的流动，难道英国重商主义者（以及从较小程度上说，法国重商主义者）就不担心流向荷兰的货币流量以及通过荷兰的商品的流量吗？<sup>201</sup>如果流入东印度群岛的白银是真正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就从来没有一种严厉的措施遏

止它呢？欧洲世界经济体内部的贵金属流量不仅仅依赖于金融结算机制，而且还依赖于对商品生产和全部可得到的供给的控制。正是在这方面，所谓的17世纪贵金属奇缺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

人们认为，17世纪时，白银生产衰落，黄金生产停滞，此时，从美洲输入到西班牙的贵金属也陡然下降。<sup>202</sup>莫里诺对西班牙的贵金属流量进行重新估价时，非常怀疑这些既定事实，更怀疑基于这些事实所作的种种解释：

无论如何……我们再也不能依据总体的以及普遍化的危机来想像17世纪，更不能依据黄金和白银的奇缺，不管是美洲的来源，还是到达欧洲的数量。真正的问题是与此不同的。<sup>203</sup>

莫里诺并不想否认抵达西班牙的贵金属数量下降的事实，尽管他认为通常的数字都被夸大了；但是，他怀疑这是长期趋势形成的结果。他认为，这是由一系列的偶然经济因素造成的，他甚至更怀疑欧洲世界经济体的经济衰退（在某种程度上，他承认有）可以通过贵金属供给的转变得到解释。

两个问题都值得讨论。贵金属进口数量为什么减少了呢？显而易见，这一定是由于供给或需求的下降。最常见的解释是供给的下降。贵金属的便利来源因开采过度已经枯竭。而今开采贵金属的代价较高。发掘新的矿源需要时间。一种论点是，16世纪的扩张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上已用尽了这种重要的资源，结果是资本的短缺和经济的萧条。针对这种论点，莫里诺回答说，大约在1620年，“当黄金和白银的来源减少时”，恰恰是“与这些因素相关的人造成了这种趋势”。<sup>204</sup>就他看来，是人们“在趁机利用这些因素”，而不是相反。

贵金属，像任何其它的商品一样，也有价格，而且普遍的价格

膨胀这一 16 世纪主要的金融特点，常常意味着贵金属价格的不断下降。但是，贵金属作为货币在真正的交换中仅仅是一种因素。<sup>205</sup>当时贵金属的进口减慢。莫里诺说，这是“德雷克<sup>(1)</sup>效应”(Drake effect)，即“达摩克利斯之剑的‘现代’翻版”。<sup>206</sup>如果武装私掠船拦截的护航船队较少，那么如莫里诺所说，这些武装商船就会产生一种“更微妙，更灵验，也更有害的”影响；他们耽搁了货物，最终引起了破产。除 16 世纪后期的“德雷克效应”之外，还有 17 世纪中叶的“布莱克效应”(Blake effect)，它“摧毁了竞赛运动(Carrera)”。<sup>207</sup>

然而，这些军事掠夺只是抬高了贵金属的成本。如果贵金属的需求量与以前一样多，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这种成本转到消费者手中呢？为什么没有派遣更多的船只呢？忽视这种衰退的现实是行不通的；这种衰退并非主要由日益减少的贵金属的供给引起的，而是由于对这些供给的日益减少的需求导致的。日益减少的供给在 17 世纪初期对霸权十分有用，因为荷兰利用生产和商业优势可以先声夺人地吸引现有的贵金属。<sup>208</sup>当供给变得真正稀少时，贵金属就成为一个有利的投资体系的基础。到 17 世纪中叶时，荷兰商人将英国顾客支付给他们的贵金属放在伦敦，并且以 5%—7% 的利息率借出去，因此产生了一种机制，“它会及时以其‘牢固’的形式减轻对资本的压力”。<sup>209</sup>

我们已经迂回地接近我们的论题，即 17 世纪后半期贵金属的可能获得的程度及其在英—荷竞争中的含义。由于贵金属的生产率比其它商品的生产率要低，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贵金属变得日益奇缺。人们开始觉察到这种短缺，因此重新寻找金矿和银矿。<sup>210</sup>卢西怀疑，在贵金属短缺时期，法国的情况是否比其它国家更糟，而且他认为，在和平时期，法国实现了贸易顺差。他说，把法国既当作一个国家又看作是货币交换的场所时，它的硬币饥荒，

---

[1] 德雷克(Francia Drake, 约 1540—1596), 英国航海家和殖民掠夺者, 曾在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支持和授命下大肆掠夺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和海上货船。——译者

不像荷兰和英国，“并没有利用任何体制来缓和，那些体制能随时以不显眼的数量动员其他的流通或储蓄手段，或者——并非不重要的——动员收藏的财富”。<sup>211</sup>

像往常一样，这种解释只是把我们向后推了一步。欧洲旧的中心地区很早就发展了银行业机构。17世纪时，荷兰一如既往地行事。这是其称霸的自然结果。为什么在17世纪后期英国比法国更有能力沿着这条道路走呢？我还没有任何清楚的答案，但是我在此提供两个互相联系的事实。其一，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三种流通金属（现在仍这样）一般具有以下的社会用途：金币用于国际间的结算和国家事务（也用于储备），银币用于大规模的国内商业，铜币用于家庭和较小的商业需要。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由于法国的产品大部分在法国的市场上销售，而英国（以及荷兰）的产品却更多地在出口市场销售，这两大对手都走向“实际的单一本位制”——法国是银本位，英国是金本位。<sup>212</sup>

第二个事实与铜币的作用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增值，即“世纪之恶梦”。<sup>213</sup>斯普纳认为，金币和银币流通（而不是储备）的程度与铜币和借贷的流通之间有一种反比关系。从世界经济体的角度来看，后两种相伴而行；<sup>214</sup>但是，在国家政策方面，它们难道不是一种替代物吗？法国在整个17世纪力求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里佛尔（livre tournois）的贬值，<sup>215</sup>但是只是在柯尔伯时代取得了相对的成功。<sup>216</sup>这里，我们不是又有一个实例说明一个国家的规模如何成为世界经济体中的一个因素吗？法国政府，在经济上是内向的，政治上是外向的，走向了银本位；它无力制止银币短缺时期铜币扩大带来的灾难，除了在它企图扭转政治经济的车轮这一时期以外（柯尔伯时代）。英国在政治上是内向的，经济上是外向的，走向了金本位；因此，它向国际黄金银行网络开放，因而能够利用纸币而不是铜币。

那么，哪一个是“强者”呢？这个问题通常是不容怀疑的，路易十四难道不是专制君主制的化身吗？法国困境的产生不是由于国

家和贵族政治联合扼杀了资产阶级企业吗？然而，在我看来，情况大不相同。在我们探讨的时期之初，即 1651 年，联省共和国是“强大的”国家。到这个时期末期，即 1689 年，英国和法国都比联省共和国“强大”，而且英国和法国在实力上平分秋色。18 世纪时，英国比法国强大，而且正是法国政府的削弱，而不是它的强大推动了 1789 年的革命运动。可以肯定的是，这一论点围绕人们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而展开。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所有者—生产者希望国家代表他们履行两个重要的职能。他们希望它以少于增加的利润的成本限制或扩大市场的“自由”，从而获取或维护他们在市场中的利益，而不考虑国家的干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是相对于其他所有者而言的一个所有者的利益。此外，这些所有者—生产者还希望国家帮助他们榨取到超过他们在其他方面所能榨取到的较大的剩余价值比率，同样要求其成本低于增加的利润，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不关心国家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因此，对所有者—生产者来说，强有力的政府未必就是拥有最广泛的国家机器的政府，也不是拥有最专断的决策过程的政府。事实常常相反。

不用说，一个国家的实力是与那个国家的所有者—生产者在世界经济体中的经济作用相适应的；但是，如果这些论断不仅仅是无谓的老生常谈，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些独立衡量这种实力的政治标准。我们认为可能有五种这样的标准：其一，国家政策能直接帮助所有者—生产者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程度（重商主义）；其二，国家能够影响其他国家的竞争能力的程度（军事实力）；其三，国家能够以不耗尽其利润（政府财政）的代价来调动其资源实施竞争和军事任务的程度；其四，国家能够建立迅速执行其战略决策的行政体系的程度（一种有效的官僚制度）；其五，政治统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于所有者—生产者间不同利益团体的平衡，致使一个有效的“霸权集团”（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成为国家的稳定的支柱。这最后一个因素，即阶级斗争政治学，是达到其他几个标准

的关键。

所有这些标准都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因为它们不是生产效益的标准。当然，最终政治和经济标准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生产效益能够加强国家力量，而且国家力量的加强通过市场以外的手段进一步增强了效益。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所在的国家不像拥有中等生产效率的生产者的国家那样需要对世界市场进行积极的干预。由于生产效率与国家机器对世界市场干预的能力相关，最没有效率的生产者所在的国家无法“强大”起来。国家在世界市场（当然包括国内市场）与分布于该国的所有者—生产者的经济作用存在一种曲线关系。中等实力国家的政府最为“积极”。实力（“朕即国家”）经常代替现实。

辉格派的历史观，把现代时期看作是追求一个对软弱政府的漫长历史过程，它被认为与人类自由的进步同义。这种观点在理论上距无政府主义仅有一步之遥，但也仅仅是一步之遥。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同样的眼光来看英国革命，就此而言，他们同样陷入了迷雾。<sup>217</sup>我把国家的现代史看作是一种长期的追求，以建立强大的国家机构来保护世界经济体中的一些所有者—生产者的利益，反对另外一些所有者—生产者，当然还反对工人。

从这方面来看，军事实力是决定国家效能的一个关键。J.H. 普拉姆（J.H. Plumb）指责一些荷兰历史学家把1580年至1640年这段时期荷兰努力的扩张看作是在缺乏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条件下出现的“奇迹”，他正确地指出：

这种奇迹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虽然国家与城市之间有激烈的斗争，而且在牢固的权利和特权之间有着经常性的障碍，但是荷兰仍能够装备强大的海军和陆军，并主要用税收供养他们。这部分是通过那些加尔文教的寡头的奉献获得的，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命运具有作为一个阶级、一个民族的强烈的、富有活力的意识。<sup>218</sup>

只有人们把专制主义看作通往强大国家而不是权宜之计的最理想的道路时，它才算是一个奇迹。具有自我意识和自信的资产阶级会同意采取必要的集体调控，以避免要求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来强制地调控，从而消除后一形式的危险，因为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可能误导他自己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去重建一个“普遍君权”。这正是布克哈特(Burckhardt)谴责路易十四和后来的拿破仑效法查理五世的那种过错。它是由于软弱而采取的愚蠢之举。<sup>219</sup>

我们已经讨论了三个中心区强国是如何以及为什么由于17世纪的经济困境而互相攻击，以及英法一旦把精力转向加强其军事机构时，英国怎样在海上挫败联省共和国，法国怎样从陆上击败联省共和国。荷兰遭到两个问题的困扰。他们正保护一种优势地位而不是寻求优势地位，至少对大部分统治阶级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军备费用好像总比由于缺乏军备而造成的潜在损失更加可怕。<sup>220</sup>这是富人们在富裕和安全保障政策之间面临的永久困境；在军事方面，即使要保持一个适当地位，也不得不全力以赴。但是更为糟糕的是，这段特殊时期是军队规模迅猛扩大的时期。<sup>221</sup>这样便产生了如何供养扩大的军队的严重问题，因为“军队数量的增加远远超过生产方式的进步”。<sup>222</sup>因此联省共和国更加需要与英国和法国竞争，尤其在可能走向没落之时。

即使撇开前面讨论的促使法国朝大陆国家发展而英国和荷兰朝海上国家发展的原因，单是法国的人口优势也决定了它的军事方面的趋向。特别是自整个欧洲军队的绝对规模日益扩大以来的趋向。这种纯粹的军事因素解释了英—荷以牺牲法国为代价而和好的必然性。<sup>223</sup>1672年的冲击似乎已使荷兰察觉出法国是它最大的敌人，<sup>224</sup>威廉三世1688年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最后使阿姆斯特丹商人与英国重修伙伴关系。<sup>225</sup>

从法国表面的军事实力来看，塔皮埃说，法国1679年时就已达到其顶峰，<sup>226</sup>博尔德(Bourde)在谴责路易十四只注意成为南部的大陆轴心而不考虑成为一个北方海上强国时，说“路易十四的



失败”就是由此引起的。<sup>227</sup>如果我们要解释法国<sup>228</sup>军事失败的终极原因，那么我们必须考察非军事因素——重商主义及其幻想的问题。

莫斯尼尔说，从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时期，柯尔伯主义长期是法国政策的一个特点，它的目的“首先是政治的”。<sup>229</sup>这会意味着什么呢？大概，莫斯尼尔认为，追求国家的强大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是君主实际上追求的目的。无疑他可以想入非非地去追求这个目的，但是，实际上他会成功吗？法国诸王显然没有成功。事实上，王权复辟时期的英国和柯尔伯时代的法国都有意识地积极支持他们的生产阶级反对外国竞争者，建立他们的商船舰队，创立一种在国家和生产者之间共同分享全部国家产品的制度。莱昂（Léon）和卡里埃（Carrière）认为，在柯尔伯时代，船只数量大量增加，但我们不应该只归于他一个人的功劳，因为实际上那是由于“战争的重要”引起的。<sup>230</sup>德吕穆（Delurneau）注意到柯尔伯时代经济形势的普遍改善，但他说，这更应归因于福隆德运动（the Fronde）的失败导致的政治稳定而不是柯尔伯的功劳。<sup>231</sup>简言之，这些学者认为少数人的精明政策不是关键因素，我们应该注意考察潜藏着的压力。我同意；但是我们可以把同样的分析应用于英国，英国也有刺激造船业发展的战争动因，而且在1660年以后也经历了一个平息政治暴乱的过程。

威尔逊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差别：“英国的‘重商主义’和柯尔伯主义及其派生物之间的区别，好比定制的服装与现成的服装之间的区别”。<sup>232</sup>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是否能应用于政府财政体系和一般的行政机构。17世纪“战争的经常化”<sup>233</sup>意味着中心国家大规模增加财政费用。对荷兰共和国来说，负担实在是太沉重了。但是，对英国和法国又怎么样呢？这笔增加的经费不得不从某处支出，而这个来源又必须是赚钱的阶级。原因很简单。由于作为一个体系的资本主义已经增加了对工人生产成果的征课，对工人课税的任何增加实际上都意味着有钱阶级利润的减

少，或者是因为他们在其土地上不会得到同量的租金，或者是因为他们将不得不因此而付出更高的工资。<sup>234</sup>

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双重的：增加货币并合理地花销。合理花销并不等于就是诚实地花销，而是应把它用于生产，作为一种标准，用以衡量国内资产阶级在世界市场上增长的利润在多大程度上超过资产阶级在国家开销中承担的间接费用。这个问题对英国和法国都一样；并且对于王朝复辟时代的英国和柯尔伯时代的法国来说，看不出他们在反应能力方面有太多的差异。

不仅需要增加货币；而且必须迅速增加。这就意味着要从别处借款。这仍是联省共和国的优势，它“健全的公共信贷业……根基在于主要的投资者管理政府”。<sup>235</sup>英国和法国此时不断寻求满足借款需求的途径。

费弗尔说，柯尔伯是“一个炼丹家，他不得不为其国王寻找黄金，他四处寻找，从未停止”。<sup>236</sup>但是，柯尔伯觉得这个国家以包税的形式已借债太多。为了增加总收入，他减轻了包税商的任务（事实上已把更大比率的农民的税收转移到国家手中），同时控制“非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它减少了重新分配到一些有产阶级手中的税款）以便把它用于重商主义的目的。<sup>237</sup>

柯尔伯是比较成功的。他实际上使国王的收入增加了一倍。<sup>238</sup>路易十四的国家在这段时期可能是唯一不过多费力就能够支撑庞大军事力量的国家。<sup>239</sup>但是，柯尔伯的套装是现成的，如果你愿意，它清晰可见：更为直接地征税并平衡预算（即更为直接的再分配）。由于法国一直在进行昂贵的大陆军事扩张，他的措施没有普遍贯彻并受到限制。它们无法维持下去。

英国人的套装是定制的。它建立了一套崭新的长期公债机制，它包括不很显眼的税收，而且从长期来看对有产阶级的负担并不轻。它没有遇到什么抵制，因而在18世纪更有利于增加政府收入，得以更为合理地使用。尽管英国直到护国政体时，其公债形式不但与联省共和国而且与法国相比“相对落后”，<sup>240</sup>但是在复辟

期间奠定了 1689 年后所谓金融革命的基础。乔治·唐宁 (George Downing) 爵士于 1665 年所做的许多尝试, 包括呼吁小的个体投资者把钱直接借给政府, 仅延续到 1672 年, 但是, 它们使财政部提升为金融控制部门开创了重要的先例, 也为后来控制金融的技术手段做好了准备。<sup>241</sup>

正如人们所描述的那样, 法国以更直接的方法渗透到政府各个行政部门。当然, 有效的政府未必是专制政府。斯沃特 (Swart) 认为荷兰政府是软弱的, 是一个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古代的、半中世纪的混合物”, 斯米特 (Smit) 则完全反对这种说法 (我也一样):<sup>242</sup>“17 世纪时, 准确地说, 正是荷兰政府的分权制使它成为与集权的君主国家相比更有效能的政府”。的确, 人们可以在荷兰市民“贵族化”中见到政府效率降低的迹象, 这使他们的一些支持者提出了在荷兰共和国实行专制主义政治的理论, 并引起了一些抱怨, 认为执政者们丧失了海外贸易的兴趣。<sup>243</sup>

法国人加强国家的办法是人所共知的: 集权和统一。确实, 这已被当作经典的方法。当然, 中央集权不仅包括中央政府本身的创立, 它是早些时代留下来的成果; 它还包括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机构的直接联系, 也就是地方官制度。这种新的地方行政模式是“真正的专制主义的革命”。<sup>244</sup>我们可以称它为一次革命, 但是柯尔伯只是在五大税区建立了统一的税制。赫克舍认为, 这“证明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一个统一的格局”。<sup>245</sup>多么地苛刻! 我深信当默夫雷特说下面的话时是比较公平的: “大概柯尔伯多半只是一个勤奋的和固执的行政长官, 而不是一个大胆的和开拓性的改革者。这个时期的形势和态度都不允许有激进的变革”。<sup>246</sup>要了解柯尔伯努力使国家官僚化的斗争的艰巨, 人们只须看看海军和海军军官团, 他们抵制柯尔伯要建立一支在和平时代能够服务于商人船队的海军预备队的愿望<sup>247</sup>。在同一时期, 即 17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 “尽管在其政治生活中有激烈的冲突, (英国) 政府的核心日益强大, 而且更有效率”,<sup>248</sup>但是很少有铺张浪费, 因此也很少遭到朝野的反对。

为什么英国和法国同样在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却会有如此迥然不同的风格呢？为什么英国所走的路更富有成果呢？我们可以在阶级结构的细微差异中找到我们的答案。我们必须首先从英国和法国的共同点着手。两个国家在当时欧洲世界经济体中都竭力要成为农业和工业的生产中心。在两个国家中，大部分封建贵族已使自己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并且在非农业活动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在两个国家中，那些不是贵族的人如农业、商业、工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非贵族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成就迟早都会使他们跻身于较高阶层。由于法国在贵族和平民之间所划的界线低于英国，从技术上讲，那些在法国可以成为贵族的中高级地位的人们（穿袍贵族）在英国都是平民（绅士阶层）；但是，两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实际上是可以比较的。因为法国政府在历史上就比英国软弱（首先是因为其规模以及由此而来的离心的经济力量），穿袍贵族被当作国家官吏融进政治机构，缙绅阶层更经常地被当作地方官吏；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新的角色代表了真正的参政，虽然其作用有限。

进一步说，两个国家都是上层阶层内部冲突的舞台。这种冲突从16世纪至少延续到18世纪，或许到19世纪。斗争是在凭借封建时代保存下来的法律结构而居高位的那些人与达到一定地位的资本家之间展开的。斗争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时候，两个集团中的大多数人都既能显示其传统地位又能显示其经济成就，他们因此能够选择做贵族或是资本家，依其直接利益而定；再加上通过“贵族化”途径把市场上取得的成就转化为社会地位的经常性的历史过程，就必然在许多情况下难分楚河汉界。但是必须说，当时在那个变幻不定的舞台上沉浮的人们，比起后代的学者在回顾这些斗争时更为理解这些斗争的真相。<sup>249</sup>

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所有这一切表明，英国和法国之间在大约1500年至1800年整个这段时期中没有任何重大差别。托尼（Tawney, R. H.）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吗？当然是一次资产阶级

革命。但是麻烦在于资产阶级是游移于两栖之间的”。<sup>20</sup>然而，这却既符合 1688—1689 年的光荣革命，也符合 1640 年革命的实情，并且也符合福隆德运动，甚至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实情。这没有使它们失去“革命性”。它意味着我们必须消除那种与历史脱节的认识，认定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集团；特别是在这段时期，这种认识是脱离历史的。他们是两个大量交错重叠的社会集团，无论人们按社会等级身份还是按社会阶级来判断统治阶层，都呈现出一些不同的轮廓。因为所用定义不同，就产生了许多歧异。社会和政治斗争是真实的，但是，它们是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sup>21</sup>

我们虽然强调英国和法国的相似，但必须注意分析许多细节上存在的差别，这样才能理解两个国家在 19 世纪为何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因为正是这些早期的细小差别才使英国在 1763 年以后从经济生产率和管理方面大大超过它的对手。

在一本论述政治稳定性的著作中，西奥多·拉布 (Theodore Rabb) 说，现代早期的欧洲在 1500 年后政治上基本不稳定，国王与贵族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平衡”直到 17 世纪中期以前是“不确定的”，“过了一百多年，社会两极化问题才不再存在”。拉布说，尽管这个世纪中期以后还有大量的“事后震动”，但是却无人“从根本上……对这种政治组织提出疑问。这就是极重要的变化”。<sup>22</sup>这难道是对政治现实的合理描述吗？假如是，那么对于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斗争，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很快注意到，拉布的分期大致与长期的经济趋势有关。乍看起来它好像与古典的韦伯式相关 (Weberian correlation)：扩张与政治动荡相联，停滞与政治稳定并行。

我认为，如果我们更清楚地阐明我们所谈论的是哪一种政治稳定，以及我们区分的是什么时候，那么拉布是没有错的。我认为，16 世纪的经济的发展明显地产生了一个作为社会阶级而且与统治阶级关系模糊不清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发展速度

保持在高水平,就无需界限分明。一旦经济扩张的限度明朗化,分清谁有权控制国家机器的斗争就会激化。然而,持续的经济困难迫使两个集团达成妥协,以防政治冲突难以驾驭,下层民众(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开始积极、独立、直接地表明自己的权利。因此,随之而来的是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如拉布所说,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冲突被层层遮掩,或从制度方面得到抑制。

这里,我无意分析英国和法国在17世纪中叶的政治斗争的复杂过程;但是,我们还是看看这些事件结束时的情况吧。在两个国家君主政体都受到挑战,可以肯定,在英国更为激烈。最后,福隆德运动在法国受到镇压,君主政体在英国得到恢复。当然,国会的作用在宪法中有显著的差别,它在英国得到扩大,在法国却遭到排除。在英国,“国王的行政专制主义”被“国会立法的无限权力”所取代。<sup>253</sup>但是,社会妥协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能够找到对英国革命结局的大相径庭的总结。举两个例子就够了。斯通说:“1660年革命结束时的英国与1640年革命开始时的英国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差别”。<sup>254</sup>希尔说:“1660年并没有恢复旧的政体,仅仅是恢复它的外貌”。<sup>255</sup>

我认为,两种总结都说得不恰当。1660年与1640年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是,我相信,与大多数的论证相反,至关重要的是社会差别,而不是政治差别。公开的社会冲突结束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资产阶级赢得了城市权利,但是,这个阶级当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由那些旧的家族牢牢控制着。社会妥协的基础是制定一种服务于前保王党和议会派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没有什么比复辟时期的政府委员会和贸易公司董事会的追求更为典型了,在那里,王公贵族和商人平起平坐,共谋所期望的互利大计”。<sup>256</sup>也没有什么比用复杂的含混手腕掩盖归还被没收土地的问题,能更好地证明这种解决方式是一种妥协。这是一个由查理二世抛给国会,国会又抛给委员会的棘手难题,这个问题最后通过秘密方式得到解决。<sup>257</sup>

劳伦斯·斯通认为，前工业化时期，英国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动荡社会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幻觉”，<sup>258</sup>或许1540年至1640年这段时期是例外。难道1660年的妥协不是使16世纪令人不安的动荡停止和稳定下来、或多或少地把问题冻结起来的协议吗？<sup>259</sup>难道1660年英国社会的重大变迁不是统治阶级之间达成协议，让英国不再有内部的社会变革，政府（国王还是议会无关紧要）应当集中力量不惜牺牲世界经济体的其他地区的利益而促进经济发展吗？<sup>260</sup>难道1688年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没有证实这一点吗？<sup>261</sup>17世纪80年代不是有一些集团摆出一大堆无足轻重的理由，威胁说要重新提出那些王权复辟时代已经解决的问题吗？这些集团被镇压下去了。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辉格派把英国革命看成是战胜“封建主义”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时期，那么光荣革命就总是成为自由主义的辉格派青睐的时期。如特里维廉(Trevelyan)所说，<sup>262</sup>“这次革命裁决的主旨是个人在宗教和政治方面享有法律保护下的自由。历史上所有革命中的极端保守主义者也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特里维廉是不是突然被那种视此次革命为贵族革命的说法迷住了呢？没有，他说：“这次革命是整个民族、所有阶级联合影响的结果”；正是这个补充因素值得注意：

在一个仍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经济和社会的结构使得地主成为乡村自然的被大家接受的领袖，像丹比(Darby)和西摩(Seymour)的托利党人，德文郡(Devonshire)和施鲁斯伯里(Shrewsbury)的辉格党人那样的贵族和乡绅，在出现对政府的抵制时，就不得不出面充当头面人物。

在所有阶级联合的背后，真正的角色正是这些“自然的被大家接受的乡村领袖”。无疑，一个“专制”国王永远地从舞台上消除了；但是，正如平卡姆(Pinkham)所说，这件事本质上意味着

王权一直被国王利用来为他们喜欢的任何集团，有时甚至是——不要见怪——平民的利益服务，现在这些权力已转入那些能够控制国会的土地贵族之手。<sup>263</sup>

土地贵族的胜利实际上是资本家阶级的胜利。政治妥协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它对英国很有用，因为它使得贵族和乡绅与商人和金融家一道在竞赛中战胜他们的法国对手，以攫取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财富。

法国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再看看法国的地理位置。英格兰有它的边缘区，更不用说大不列颠。位于一个中心区国家外围的这些边缘区害怕两种趋势：政治上威胁他们的英格兰—不列颠国家的逐渐加强，经济上威胁他们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在大不列颠，这两种威胁相辅相成；对于边缘区对英国革命的敌视不应感到惊奇，<sup>264</sup>也无需就“革命的数十年间完成了英国的统一”感到惊奇。<sup>265</sup>如我们以前所讨论的那样，法国的情况极不相同。<sup>266</sup>那里，中央集权的力量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力量并不像英国那样能在地理上相互协调，中心区的各种势力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来自经济上边缘区和经济上处于中心地位、但却是政治上处于边缘区的抵抗，虽然那种抵抗未必是协调一致的。这使得统治阶层的内部冲突越来越持久（从宗教战争到福隆德运动），而且政治上越来越不明朗。

如果说英国的王权复辟平息了紧张状态，因为，如果你愿意那么说的话，妥协看来是在两个集团之间达成的；而法国在同一时期，即路易十四的柯尔伯时代，则是一种强制性休战协定。这种协定依赖于君主的力量，君主力图限制仍在下高昂赌注的各种力量，或者我们说，比起英国同侪来，法国人准备进行危险的游戏，国家的政治结构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西部地区，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的边境地区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处于“中心”之外。这些地区不仅被剥夺了与其他地区共同分享赋税联盟所带来的利



益,而且尽管它们处于不利地位,还得负担更重的税。<sup>267</sup>那些不是贵族的资产阶级以个人的名义获得了较高的地位,<sup>268</sup>但却不是集体性的,因而给他们造成了无尽的不幸和潜在的不安宁。<sup>269</sup>

这些矛盾在整个胡格诺教徒问题中显现出来。也许南特敕令已经朝着解决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迈出了一步。那么为什么它在1685年被废除了呢?从文献中对此问题找不到真实可靠的答案。胡格诺教徒不是特别的反保皇党人。<sup>270</sup>那么国王为什么要反胡格诺教徒呢?卢西把此举看作是法国“致力于对国家的崇拜”的行为,以此作为对先前国内战争中的屈辱的否定。<sup>271</sup>罗伯特(Robert)把它视为国王伺机而动的行为,这种时机产生于奈美根的光荣和平以后:“这次对外政策的巨大成功……使国王相信,从此以后他能尝试任何事情”。<sup>272</sup>勒·鲁瓦·拉杜里把它看作是使教会最后转到王权方面的手段。“公平交换(有来有往)。教区的传教士们后来成为现存秩序的支柱,他们为同盟<sup>[1]</sup>和福隆德运动的对抗做好了充分准备,尽管杰森派教徒(Jansenist)争吵不休”。<sup>273</sup>这些解释没有一种是充分的。也许,它像对奕中毫无意义的换棋,通过减少棋子,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一样。在棋盘上,如果一次换棋不是明显有利的话,那么只会越来越陷入僵局。国王力求加强其国家。但做起来要比英国难得多。南特敕令的废除无助于事,但是对他们也不会有所损害。

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证据能够全面解释英国和法国在17世纪中叶出现的稳定状态。这种在英国比在法国更为有效然而在两个国家都产生的稳定状态,是统治阶级内部妥协的结果。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就应该在下层人民的态度中看到一种变化,因为统治阶级的分裂给他们留下了空隙,而妥协则限制了他们的政治活动余地。对于后者,我们已有一些证据。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正在减少,更加倾向于中庸之道。<sup>274</sup>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困难时期,起义

---

[1] 指胡格诺同盟。——译者

可能存在着政治上的困难而不是缺乏刺激。

早先一个时期，农民能够使自己在起义中依靠少数统治阶层中的人物，17世纪后期就不再是这样了。<sup>275</sup>大妥协对农民和城市工人是多大的痛苦啊！一位宪章运动者1837年在回顾英国革命时说，“对数百万群众来说，它什么也没做”。<sup>276</sup>诚然，存在着社会动荡，特别是在城镇中，很难镇压；<sup>277</sup>但是资产阶级之间一旦形成妥协，他们就会转向消除那些动荡不安的因素。正是这时，工人阶级和危险阶级两个概念开始联系起来，并且“在统治阶级的思想中”发展成为一种“贫困与犯罪之间”的联想。<sup>278</sup>

如果人们那样期望，他就会重复旧商业与专制主义誓不两立的旧格言，因为商人可能“遮盖太阳王的光辉”。<sup>279</sup>但是熊彼特(Schumpeter)的补充更切中要害：“(封建制度的)羁绊不仅压抑了(资产阶级)，也庇护了他们”。<sup>280</sup>英国这样，法国也这样；<sup>281</sup>但是由于我们已描述过的各种原因，这种政策在英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 注释

1 引自普拉姆(Plumb)(1950, p. 71)。

2 盖尔(1961, pp. 161~162)，他说：“黎塞留可能有烦恼的时候，但是由于他毕生致力于为胡格诺教徒(Huguenot)和贵族带来秩序并联合法国的各种力量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因而使他没有了行动自由”。

3 参见肖尼并列展示不同地区曲线的图表(1966a, p. 181)。

4 彭特兰(Pentland)极有说服力地认为，这种因果关系一般是从经济机遇到人口的增加，而不是相反；但是这种顺序适用于长期向上的曲线的开端。其他时候，“人口增长本身在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下，产生了困境和停顿”(1972, p. 179)。例如，在讨论18世纪英国人口的增长时，他一反通常的分析，认为“由于食物过于丰富和农业陷入萧条，人口的增长在这个世纪的最初时期陷入停滞；后来有所增长，除了别的因素，农业价格较高，而且农业人口更加繁荣是重要原因”(1972, p. 180)。同时参见凡·德·武德(Van der Woude)，他提出了同样的假说。

5 肖尼有关1620年人口密度的图表对此表现得极为明显(1966, 图23)。

6 莱茵哈德和阿门高(1961, pp. 141~142, pp. 144~146)。他们探讨了德意志的“灾难”(包括捷克)以及17世纪南部欧洲“缓慢却持久的衰落”。而且,正如肖尼指出,饥饿导致了不断增加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又引起了恶性传染病的增加。“每一次食物的短缺都引起一些突变,那就是征服美洲的条件。”(1966a, p. 233)。

7 参见凡·德·武德和门廷克(Mentink)(1966, p. 1189)。

8 勒·鲁瓦·拉杜里(1975a, p. 360)。

9 斯利彻·范巴恩(1965b, p. 145)。

10 莱茵哈德和阿门高(1961, p. 147);但是,伦敦的人口稳步上升,从1600年的200 000增加到1650年的400 000,1700年时达到575 000。巴黎的人口只从1600年的400 000上升到1700年的500 000。参见里格利(Wrigley)(1967, p. 44)。

11 哈奇森(Hutchison)(1967, p. 94),他论述了这些思想本身(第五章)以及它们的起源和传播情况(第三章),而且他认为同一时期产生了近代人口学的先驱即“政治算术学”。在中心区地位和人口密度间的联系方面必须注意警惕一种普遍的误解。如哈巴库克指出,“19世纪以前,我们有关人口运动的知识部分是从经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也就是说,从工资、价格以及租金的行为中——人口运动被用来作为出现这些经济现象的原因”(1965, pp. 148~149)。

12 这本很久以后才公开发行的小册子的问世时间曾被认为是不确定的;但是现在看来基本上确定在17世纪20年代(参见古尔德,1955a, b;苏普莱,1954)。

13 格兰普(Grapp)(1952, p. 465)。

14 昂温(Urwin)(1904, pp. 172~195)。这一运动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它主要起源于一次围绕英国国会于1604年对自由贸易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参见拉布(1964和1968),艾什顿(Ashton)(1967和1969),和克罗夫特(Croft)(1975)。

15 德约恩(1969, p. 31)。赫顿提醒我们说,尽管重商主义者“不相信进步……他们的对立观念,退步,同样是对行动的一种有力刺激”(1955, p. 286)。

16 参见德约恩(1969, p. 43),他说:“在1650年至1750年的艰难时期,当需求和价格的停滞加剧竞争时,制造商们提出一种严厉的关税保护主义,

因此拥有一个政治强权以抗拒异国外交家和商人的压力”(补充的斜体词)。

17 这个现代术语被弗兰肯用来指荷兰—不列颠的关系(1968,p.8)。威尔逊也强调了这一恶毒的行为:“在西班牙的霸权威胁日益减弱,法国的霸权日益增长的间隔时期,英国人则进行了一场针对荷兰的短暂而又恶毒的战争”(1965,p.41)。

18 H. 泰勒(H. Taylor)(1972, p.260),他说:“1648年以后的危机与1651年航海条例的巧合那么切近,所以决非纯粹的偶然”。

19 参见凯普勒(1972);同时参见H. 泰勒关于作为佛兰德斯给西班牙供货的供给者的角色的描述,这种角色被认为是17世纪30年代英国贸易的“新的动力”(1972,p.240)。

20 赫顿(1959,p.85)。

21 J.R. 琼斯(1966,p.21)。

22 参见C. 希尔著作中的论述(1969,p.42)。同时参见罗伯茨,他认为,克伦威尔并没有使英国贸易从属于清教徒,而且他在波罗的海的政策,“即使受到了宗教因素的影响,但是从一种严格的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1961,p.405)。

23 利希舍姆(Lichtheim)(1974,p.24)。

24 参见赫顿(1959,p.63)。

25 参见赫顿(1959,p.165);同时参见M.P. 阿斯利(M.P. Ashley)(1934,pp.19~20,p.163)对英国商人集团不断变化的态度的论述。

26 威尔逊(1965,p.184)。

27 哈珀(Harper)(1939b,p.49)。这种新的英国冲击的副作用之一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597年,荷兰的三级会议发布了一种新的特许证,允许“葡萄牙民族居住在这些土地上”。这既包括新基督教徒又间接包括称为犹太人的。目的在于吸引犹太人的财源,巴伦(Baron)认为“奥伦治大公和他的同僚都过高地估计了这种财源”(1973,p.20;pp.3~73,随处可见这种论述)。1651年的航海条例通过后不久,奥利弗·克伦威尔开始与阿姆斯特丹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犹太人进行磋商,并取得成效,允许他们再次移居英国(犹太人在1290年时被爱德华一世驱逐出境)。从犹太人企业家的观点来看,再次移居英国意味着“能够避开航海条例的破坏性目的”。从克伦威尔的观点看来,再次移居英国,在发展海外贸易的总的政策中仅是一种次要的因素,允许犹太人在伦敦定居加强了英国与荷兰在商业竞争中的地位”(恩得曼 [Endelman],

1979, p. 15, p. 17)。

28 参见法内尔 (Farnell) 著作中对这两种解释的论述 (1964, pp. 439~440)。

29 戴维斯 (Davis) (1962, p. 297)。

30 参见盖尔 (1964, pp. 25~28)。赫顿指出,荷兰人主要想进行经济的联合,这种联合对他们仍是有利的;而英国人则喜欢政治的联合,这种联合有利于英国人 (1959, p. 88)。人们可以看到,从如此相反的立场出发,这些参与者们是如何迅速地从联合的讨论转向“仇恨的发泄”(P. 德·维里斯 [P. de Vries], 1950, p. 46)。想把荷兰人和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统一起来的建议已经预示了这场政治辩论。它发生于 1610 年至 1618 年之间,然而由于英国认为荷兰的要求过分而告失败。参见德米尼 (Dernigny) (1970 b, p. 453)。

31 马汉上将的解释是:“由于反对开支,其态度的非军事性,而且由于长期而轻易地战胜西班牙衰败的海军,因而荷兰政府使它的舰队蜕变为一个仅仅是武装商人的小集团。到克伦威尔时代,事情恶化到了极点”(1889, p. 126)。最近的学术研究已证实了这一判断。参见威尔逊,他说“在三十年战争漫长的陆战时期,荷兰海军相对来说已不受重视 (1975a, p. 65)。对这次战争本身的简短叙述,参见威尔逊 (1968, pp. 190~194), 他总结说“然而这场战争表现出了荷兰经济的严重衰退,它曾在经济效益、和平以及商业方面得到发展”。

32 威尔逊 (1968, p. 194)。

33 赫顿 (1959, p. 145)。哈利也认为,三次英荷战争是“不受荷兰人欢迎的”。他认为“前两次英荷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嫉妒的英国商人能够在短期内迫使政府发动进攻,以武力击破荷兰的商业和海军力量”(1972, p. 177)。通过这样一个事实使这个观点更为可信,即“当第一次战争于 1652 年开始时,布莱克 (Blake) 海军上将的三个主要命令之一就是要消灭集结于苏格兰海域的荷兰捕捞船队”[米歇尔 (Michell), 1977, p. 179]。

34 参见卡特 (Carter) (1975a, p. 6)。

35 参见威尔逊 (1941, p. 6)。

36 威尔逊 (1957a, p. 154); 同时参见法尼 (Farnie) (1962, p. 206) 和卡特 (1975a, p. 6)。

37 参见威尔逊 (1968, pp. 213~214); 同时参见威廉姆森 (Williamson) (1929, p. 252)。

38 威尔逊认为这是英国商业体系的“设计者”——乔治·唐宁爵士的态度(1965,p. 168)。

39 赫顿(1959,p. 106)。

40 J.R. 琼斯(1966,p. 75)。

41 古伯特(Goubert)(1970b, p. 112); 同时参见J.R. 琼斯(1966, pp. 60~61)。有关荷兰人为“维持现状”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参见弗兰肯(1968,p. 7)。

42 有一段时间, 英国人一直要求海上的异国船只向英国船只表示敬意。1672年时, 这种长期的要求强行得到了恢复。J.R. 琼斯指出, 对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汉萨人以及法国人来说, “这会导致现代人所称的一个海上联合王国的建立”; 而且它被认为与路易十四在陆地上的权利相同(1968, p. 48)。

43 参见威尔逊(1968, pp. 202~204)。

44 直到此时, 路易十四仍把英格兰视为“一个软弱的前法国式的国家”, 古伯特认为, 这种判断“在1661年是中肯的; 不幸的是路易在1670年才说出这种判断”(1970d, pp. 72~73)。鲁尔(Rule)同样认为, 路易“低估了英国的力量”。无疑, 这就是荷兰战争使“法国的政客们大感迷惑”的部分原因(1969,p. 59)。

对于英国来说, 观点的转变是政治争论中常见的事。C. 希尔认为, 到1674年, 是“辉格党人和金融家把法国看作同英国争夺世界贸易和世界霸权的主要竞争者”(1969,p. 163)。托利党人具有很少的决策权, 只是在1689年以后, 英国才愿意接受大国这一角色。直到那时, 霍恩(Horn)才觉得, 英国以这种角色出现在大陆上“总是不自愿的, 短暂的而且没有什么影响的”(1967, p. 2)。我不能确信我是否同意“不自愿”这个形容词, 但是另外两个形容词看来是真实的。霍恩提供了初步的迹象表明在1689年以后, 英国人才不再是辅助金的受付人而成为像荷兰和法国人一样的支付人。

45 参见A.R. 霍尔(A. R. Hall)(1957a, p. 347, p. 349)。武器技术缺乏重大革新不应使我们否定“军队组织的重大改进, 以及其规模大幅度的扩大”。与他们在武器装备上截然相反的有关军队结构的变化, 参见范纳(Finer)(1975, pp. 99~102)。关于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军事革命的保留意见, 参见帕克(1976b)。霍尔认为, 骑兵的衰落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巴内特(Barnett)指出, 1660年至1714年间的两项发明: 枪头刺刀和配有燧发枪机的毛瑟枪, 对

“步兵作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74, p. 129)。

46 “从拿梭王朝的摩利士大公(Prince of Maurice of Nassau)时代起,荷兰人就因攻坚战闻名遐迩,这种攻坚战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在工程学、布雷和反布雷、弹道学、爆破等方面的才能”(威尔逊,1968, p. 100)。

47 威尔逊(1970, p. 125)。

48 费希尔和兰德格林(Lundgreen)(1975, p. 541)。

49 对古伯特来说,1672年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重大转折点”,法荷战争标志着卢瓦(Louvois)对柯尔伯的胜利以及金融稳定的结束。“1673年时,国王挥霍掉钱财,而且柯尔伯所建立的大厦也开始从各个方面倒塌”(1970a, p. 140)。

无需多言,马汉海军上将也持同样看法:“在所有大国中,只有(法国)才有(在陆海之间)的自由选择权。1672年时,它最后选择了陆地扩张。当英国呈现笑意并且繁荣兴旺时,为什么(1715年时)法国前景暗淡而且疲惫不堪呢?为什么英国只是口上说说,而法国却接受了和平条款呢?显然,原因在于财力和信用方面的差别”。马汉引用坎贝尔(*The Lives of Admirals*)关于英国人在海战和贸易方面的成就的论述说:“这是因为我们海军力量的增强,及其使用方法得当的结果”。马汉评论说:“没必要再作补充了”(1889, pp. 226~227, p. 229)。

50 雅卡特(Jacquart)(1973, p. 172)。

51 参见古伯特(1970f, p. 150),勒·鲁瓦·拉杜里(1975a, p. 416)和J. 英伯特(1965, p. 339)。

52 关于联省共和国,参见凡·德·武德(1975, p. 240);关于英国,参见瑟斯克(Thirsk)(1970, p. 149);关于法国,见古伯特(1970g, p. 334, pp. 338~340)。

53 “早在17世纪之初,英国的同时代人已开始觉察到在许多社会组织支系中,荷兰人远远超过了他们。小册子也开始指出,英国人应该仿效荷兰人的实践,或者说英国人应该争夺荷兰人的成果”(克拉克,1960, p. 14)。

54 参见福塞尔(Fussel)(1959, pp. 613~614),E.L. 琼斯(1967, p. 7),威尔逊(1965, p. 33)和哈巴库克(1965d, p. 328)。“在英格兰……大约1630年以来,新的饲料作物汇合起来形成了混合的农业体系”(琼斯和伍尔夫,(Woolf) 1969, p. 7)。

55 参见钱伯斯(Chambers)(1960, p. 21)以及达比(Darby)(1973, pp. 330~344)。

56 参见 E.L. 琼斯 (1965, p. 14), 当他说到 (p. 1) 1660 年和 1750 年间“(英国农业)技术的变化与相对有限的市场的扩大不成比例”时,就否定了他自己的观点。那么恰当的比例是怎样的呢?出现在什么时候?当市场扩大时,维持当前的技术比偿付改进的成本常常更为有利。

57 J. 德弗里埃(1975, p. 82)。

58 例如,勒·鲁瓦·拉杜里谈到英国人把佛兰德斯人为小农场单位所设计的方法应用到大规模农业中的“天才的作法”。他说,在法国,在索姆河和卢瓦河间的敞田式的类似尝试只是在局部地区取得了成功而且很迟缓(1975a, pp. 416~417)。

59 罗尔(Roehl)(1976, p. 262, 加了斜体字)。他特别指出:“新作物,特别是来自北美洲的,被引进来进行轮种——马铃薯、苜蓿和其它的饲料作物、玉米、甜菜,它们同时起到了‘清理’和休闲土壤的作用,并且能缩减休耕地;厩内喂养牲畜,日后可耕地的扩大,都出现了”。罗尔把布洛赫作为参考(1966, pp. 213~219),但指出莫里诺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

60 斯利彻·范巴思(1963b, p. 16)。

61 霍斯金斯(Hoskins)(1968, p. 27),里格利(1967, p. 57),和 F·J·费希尔(1961, p. 4)。

62 斯莫特(Smout)和芬顿(Fenton)(1965, p. 78);但是,他们发现到 1650 年时,由于“中央政府的软弱”以及由于低价格所带来的利润率的下降,土壤改良(限于酸性土壤)和开垦荒地的速度减慢了。这与英国所发生的情况不同。这实际可以作如下解释:尽管苏格兰在政治方面处于中心强国的控制之下(而且只是局部地延续到 1707 年),但从经济方面来看,它是边缘区的一部分;因此,在考察衰退的影响时,我们可以在苏格兰和波兰生产商之间发现一种比苏格兰和英国的生产商之间所见到的更大的相似性。

63 参见莫里诺(1968, p. 326)。勒·鲁瓦·拉杜里特别指出这在“农民的世界中”是真实的。

64 勒·鲁瓦·拉杜里(1968, p. 83),但是指的仅是朗格多克(Languedoc)。

65 威尔逊(1965, p. 143)。

66 参见福塞尔(1968, pp. 33~34)。

67 参见默夫雷特(1968, p. 17)。

68 肖尼(1966a, p. 310)。



69 谷物出口的大幅度上升到1700年才开始,因此,贝罗赫(Bairoch)说,这说明,这个过程大概“在25年前”就开始了(1973, p. 459),这个时间与政府的政策开始变化的时间一致。1673年法令开始给谷物补助金——不仅仅允许,而且鼓励出口;参见里普森(1956, II, lxx - lxxii, pp. 451~452)。很可能联省共和国增加了它在世界谷物生产中所占的百分比;但是由于它开始占的百分比低,所以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参见弗兰克恩对E.L. 琼斯看法的答复,琼斯认为,谷物生产在低价格时期的增长是一种“英国独特的特征”(1967, p. 159)。杰森(Jansen)认为这是胡说:因为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林堡(Limburg)和其他地方。弗兰肯认为,这种扩张来自城市的压力,并且说,它导致了土壤肥力枯竭(1971, p. 165);但问题是为什么,特别是从生态学方面来看,粮食没有从更远的地方进口。获利的可能性问题必须得到解释。

70 根据雅卡特的看法(1974, pp. 181~182),“17世纪法国大量的农产品都在国内消费或者就地加工”。尽管出口其他的农产品,“但是如果不是收成好,通常是禁止粮食贸易的”。例如,正当英国对谷物作出补贴时,法国的国王议事会则颁布严厉的法令禁止出口——在1675至1683年之间颁布了30多项法令。尤舍尔(Usher),对谷物贸易的经典性论述中,对这个问题作了不同的评价(1913, p. 273. p. 294)。他认为,“柯尔伯谷物贸易政策的一个新的原则是自由贸易,而且认为主导柯尔伯政策的基本原则是“荒年禁止,丰年允许”。尤舍尔提出有两种自由贸易,出口和省际贸易。那么1675至1683年间的省际贸易的相对自由又怎么样呢?

关于这一点,人们也许应该注意到巴士省和朗格多克的粮食生产直到约1680年时还在不断扩大。对此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但结果是它弥补了其他地区的萎缩。肖尼认为,非中心地区这种持续扩张的“反常”是“因为有以前未开垦的土地(未耕作的)”,这表明“比其他地方早些时候才达到一种极限”(1963b, p. 354)。同时参见古伯特(1970c, pp. 49~54)。勒·鲁瓦·拉杜里发现,在1655—1675年的数年中朗格多克仅有:短暂的上升”(1974a, p. 149)。

当然,英国人也向“内地”出口,特别是向伦敦[参见埃弗雷特,1968, p. 64]。关键是把对外贸易的范围视为衡量生产过程的一种尺度——莫里诺强调了这一点(1965, p. 171)。联省共和国、英国以及法国在地理范围方面都处于一种向上的连续过程。国家越小,对外贸易在总贸易的百分比就越大,其它情况则相等。

71 参见F.M.L. 汤普森(F.M.L. Thompson)(1966, p. 512); 古伯特

(1970e, p. 102); 勒·鲁瓦·拉杜里(1975b, p. 1412); 和雅卡特(1968, p. 66), 他强调大地产在法国只出现在卢瓦河(the Loire)谷北部。

72 霍斯金斯认为, 在 17 世纪敞田制的英格兰还有“大量没有引起注意的圈地”(1955, p. 220)。同时参见达比(1973, p. 321)。在 17 世纪的法国, 大片土地被领主所占, 致使拥有一小块的牧场对农民来说就是“上帝的赐福”(古伯特, 1970e, p. 102)。布洛赫叙述说, 直到 1700 年, 法国的西部和中部都有非常广泛的圈地运动(见 1933, p. 332)。

73 默夫雷特(1960, p. 346)。塔皮埃(Tapie)认为, 17 世纪的法国, 许多大领主“已成为某种资本主义企业家, 他的土地由管家和佃户剖分和管理”(1959, p. 138)。

74 罗巴克(Roebuck)(1973, p. 15)。斯利彻·范巴思认为, 1665 年以后, “出租人的情况每况愈下”(1977, p. 107)。

75 这种情况在法国随处可见; 但是英国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参见罗巴克(1973, pp. 11~14)。使得专门从事地产管理的官员同农业生产增加了距离。参见明格(Mingay)(1963, p. 59)。

76 通过严厉裁决机制, 地产继承人在出售或抵押地产的途径受到了法律限制(参见哈巴库克, 1967b, pp. 2~3)。这种制度迫使新的富裕家族把目光转向小乡绅、自由持有农和公簿持有农, 主要去购买他们的土地, 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集中。参见明格(1968, p. 28)。

77 参见明格(1960, pp. 375~376)和哈巴库克(1960, pp. 160~165)。

78 这种非常复杂的体系在杰西(Giesey)的著作中得到全面的描述(1975)。古伯特认为, 17 世纪法国的法定租金的利息率与其他收入来源相比, 实际上并不低(参见 1970g, pp. 343~345)。

79 默夫雷特认为, 一种类似英国公簿持有权的永久占有权是一种“真正的财产”, 它的所有者能“出租、交换、出售或者分配”它。只要他向领主交税就行, “这些税形成了一种税收制度”(1960, p. 343)。然而, 古伯特指出, 行使这种所有权的特权是一种很高昂的税收负担(1970f, p. 130)。柯律治(Kerridge)就英格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 拥有终生租约的公簿持有农如果不是法律上的, 那么也是土地的自由持有农(1969, p. 60)。

80 例如, 明格相当正确地指出, 亚当·斯密使用的自耕农(yeoman)这个词就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地位的标志”。自耕农的地位高于一个普通的农夫而低于一个大农场主, 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自由持有农、一个公簿持有农, 或

者一个租约持有农(1963, p. 88)。斯利彻·范巴思也认为,一般来说,土地所有者并不总是优越地位的标志。“人口稠密和肥沃的地区由更为富裕的佃农而不是可怜的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有权和财富并不是相伴而生的”(1977, p. 109)。

81 就法国情况而言,1660年似乎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停滞和灾难”时期的结束,“停滞与灾难”是雅卡特给1560年至1660年法国农村这一章加的标题。然而,勒·鲁瓦·拉杜里认为,直到1675年地租一直在增加(1973, p. 430)。

82 在该世纪中叶以后,“曾以其帐簿上拥有若干面积的土地以及其相对的独立性而自豪的独立的小农,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失败。在大规模生产的地区,他的土地附属于某个大的租佃单位,如果他能够赢回他过去的租佃土地,他就满意了”(雅卡特,1975, p. 264)。同时参见迪帕格(Dupâquier)(1973, p. 171)和C.E. 拉布鲁斯(C.E. Labrousse)(1970, p. 703)。

83 劳伦斯·斯通认为:“17世纪早期,租金比物价增加得更快,而且利润流入地主腰包,佃农却没份”(1972, p. 68,加了着重号)。他所指的必定主要是小佃农,因为他说这一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说明了后来为什么会出现三个阶层的模式:地主、殷实的佃农,以及无地的雇工。哈巴库克在解释小农衰落的原因时提出,资本的总规模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从而证实了这一点。在困难时期,“农民的产品不管什么时候在附近出售,富裕的地主都拥有随时可以提取的(资本)储备”(1965a, p. 660)。哈巴库克对1660—1740年和1540—1640年这两段时期作了明确的区分。在后面这段时期,大地产的出售更为频繁。由于需要资本,导致了17世纪英格兰的小土地所有者的衰落,参见瑟斯克(1970, p. 157)。

雅卡特谈到1675年以后小生产者的破产,不管是劳动者(独立的)或农夫(佃农)都是如此(1975, pp. 210~211)。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法国北部在1680年至1700年之间“大量的商人—劳动者”消失了(1978c, p. 467)。

84 明格说,1660年至1750年期间,小生产者“剧烈”地衰落了(1968, pp. 14~15, p. 31)。在同一时期,明格认为,处于小所有者和大地产主之间的中间地位的“富有乡绅”“掌握着自己的命运”(1960, p. 375)。拉夫罗夫斯基(Lavrovsky)认为,小土地所有制和农民耕种的衰落发生在“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18世纪”(1960, p. 354)。

85 迪帕格(Dupâquier)认为乡村中强大的社会团体是由大租佃农和中

等规模的“所有者”以及商人组成的(1973, p. 169)。苏利公爵(The Duke of Sully)在17世纪初期喜欢反复地说,“农业和畜牧业是法国赖以生存的两个支柱,是它真正的矿藏和秘密财宝”。(引自拉罗兹[Larraz], 1943, p. 201)。默夫雷特指出,1660年以后,“在生产谷物的富庶乡村”发生的生计危机具有特别强烈的影响(1971b, p. 122)。

86 富塞尔描述了发生在17世纪西歌的不同地区“出租牛奶场”的现象(1968, pp. 31~32)。

87 对整个农民阶层和土地出租人的经济作用的论述,参见默夫雷特(1960, pp. 347~349)。勒·鲁瓦·拉杜里认为,法国所有的土地保有权的39%(但法国北部有多少呢?)是“大地产”(1975a, p. 421)。

88 在灾荒年间,地主都取消了拖欠的地租并重新负担起土地税,以便竞争到合适的佃农。参见E.L. 琼斯(1965, p. 8)。

89 参见明格(1960, pp. 378~379)。改良的主动性似乎主要来自租佃农以及一般控制着中等规模的生产单位的阶层(参见哈巴库克, 1965d, p. 327, p. 330; 明格, 1963, p. 166);但是这一时期地主可能被迫承担大部分的成本。

90 古伯特(1973, p. 135)。

91 例如,参见奎恩塞兹(Quencez)(1968, pp. 118~119),他在这部技术词典中把charrue(法语词)译成“犁”,把araire译成“抓犁,原始的犁”。同样的困难出现在德语(Pflug和Hakenpflug)、意大利语(arato和arato di legno)、西班牙语(arado de labor profunda和arado或arado primitivo)以及荷兰语(ploeg和primitive ploeg)中。

豪德里克特(Haudricourt)和德拉马里(Delamarre)(1955)写了长达506页的一部书,主要解释的不仅仅是在世界范围内,从古代到现在的charrue和araire之间的各种差别,而且也解释了由于语言学上的混乱和错误的翻译而导致的大量的错误理解。

92 古伯特(1973, pp. 135~136)。

93 迪帕格和雅卡特(1973, p. 171)。他们把haricotier定义为“有一匹瘦马的农夫”,并把sossor解释为“拥有一辆车的农民”。雅卡特估计,法国有3/4的农民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且他发现17世纪时,中等规模的土地所有者稳步增长,中等规模被定义为至少拥有30公顷的土地(1966, pp. 22~26)。G. 杜兰德(G. Durand)把农民所有者经营的南部地区的葡萄园看作是“劳动极端艰苦而又无限贫困的场所”,通过税收,利润主要流入商人和国家官僚

之手(1977,p.133)。

94 勒·鲁瓦·拉杜里(1975b,pp.1405~1407)。

95 布伦纳(Brenner)(1976,p.43,p.63)。克鲁特(Croot)和帕克(Parker)持怀疑态度：“农民对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种阻碍因素，实际上，通过采用新的耕作方法或新的作物，或者向地主表明优秀农民也会带来丰厚的利润，从而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1978,p.39)。

96 雅卡特(1975,pp.273~275)。

97 布伦纳(1975,pp.72~73)。无论如何，英国地主通过购买得到许多。参见T.S.艾什顿(T.S.Ashton)(1969,p.36)。克鲁特和帕克认为：“布伦纳教授忽略了英国农民的奉献，而且贬低了他们的独立地位，却夸大了法国农民的独立性”(1978,p.41)。雅卡特也认为，大土地所有者获得农民土地的方式在大陆与英国是一样的(参见1978b,p.409)。

98 里普森(1956,II, lxxxix, cxdiv)。英国中央政府在17世纪推行的专利保护政策有多大意义呢？对此意见不一。诺思认为它“非常重要”(1973,p.228)，能鼓励创新。克拉克认为，它是否鼓励了很多的发明者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许多人的报酬被骗走了(1936,p.152)。

99 随着兰斯(Reims)、亚眠(Amiens)和博韦(Beauvais)的布匹生产的衰落，1644年6月15日的关税协定使荷兰和英国的布匹税翻了一番。参见德恩(Deyon)(1969,p.77;1966,p.54)。

100 参见莱昂著作中有关1703年、1705年的图表(1970b,p.236)。

101 德约恩(1966,p.60)。

102 古伯特(1970g,p.336)。

103 “(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1680年至1705年间(在亚眠的丝毛哔叽的生产中)所获得的暂时的发展准备了、实际上启动了18世纪最初的激烈增长”(德约恩,1963,p.955)。

104 参见德约恩(1963,p.952)和柯伦贝兹(1965,pp.389~390)。

105 参见威尔逊(1965,p.185)。

106 这是德约恩的观点(1972,p.31)；但是柯林贝兹的研究(1965)好像并没有表明这点。

107 参见格拉曼(1974,p.506)和威尔逊(1972a,pp.26~27)。

108 威尔逊(1960a,p.221)。

109 参见斯米特(1975,p.62)。

110 赫顿(1959,p. 101)。

111 参见罗马诺(1962, p. 519),他把荷兰缩减的时间划在1671年至1701年。同时参见费伯(Faber)及其他人的论述(1965,p. 108)。R.W. 乌格认为,荷兰占有的领先地位到17世纪30年代已经衰微,到17世纪70年代已逐渐消失了;到18世纪时,荷兰的造船厂也减少或消失了。他在解释中提出了许多因素;法国的保护主义;引起荷兰税收负担和公债加重的战争;紧缩的国内市场;海盗的普遍衰落;船只使用寿命的延长(见1978, pp. 109~110)。

112 在谈到17世纪早期的英国时,苏普莱说:“就政府而言,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是长期失业问题”(1959, p. 234)。在谈到18世纪早期的情况时,D·乔治(D. George)说:“人们相信就业的不稳定性是一种现代疾病。事实上这根本不符合事实”(1953,p. 53)。

113 佩尔斯(Pares)(1937,p. 120)。弗尼斯说,对贸易的贡献,不仅应从它对贸易平衡的贡献来判断,而且应看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本国劳动力的就业”(1957,p. 52)。

114 威尔逊(1969a,p. 125)。

115 J. 德弗里埃(1974,p. 183)。到1690年,罗曼恩(Romain)估计荷兰的工资比英国高出16%(引自威尔逊,1969b,p. 118)。

116 雅卡特认为,福隆德运动以后,由于农业工人的缺乏,不得不提高工资(1973,p. 178);同时参见古伯特(1970d,p. 64)。关于1665年至1688年期间的工业状况,尽管一派萧条,但是“城市和乡村中的工资率(计件和计日)似乎一直稳定”(古伯特,1970g,p. 348)。这表明了一种相对的增长现象。同时参见C.E. 拉布鲁斯(1970,p. 370)。莱昂指出,“1660年至1750年间有明显的行会受到损害现象”,这是日益增长的城市比率的结果,也是工业不断转移到乡村地区的结果,那里的工人“人数过多而且易于控制,也习惯于低工资”(1970b,p. 251)。

117 C. 希尔(1969,p. 98)。

118 里普森(1956,III,p. 278)。

119 参见弗尼斯(1957,pp. 76~78),在法国也有同样的压力。参见马丁·圣-里昂(Martin Saint-Leon)(1976,p. 13,pp. 501~504)。

120 E.P. 汤普森(1967, p. 57),他描述了(p. 64)同期英国钟表工业的增长情况。

121 内夫(1968, p. 233)。达克罕姆(Duckham)说到“矿工奴隶制”时认为:“实际上没有一条法令允许‘奴役’矿工。但是在这一时期的苏格兰社会史中更清楚的是,大多数主人认为他们的矿工是纯粹的奴隶,而且实际上所有的矿工都接受了这个地位”(1970, p. 243)。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参加定期的罢工行动,这种罢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缺乏熟练的采煤工”[休斯(Hughes), 1952, p. 253]。

鲁舍(Rusche)和克兹海默尔(Kirchheimer)认为,正是在这个时候,确切地说在荷兰、英国和法国,我们看到教养院的增加,这种教养院主要当作“制造厂,以低成本生产商品,因为拥有便宜的劳动”(1939, p. 50; 同时参见 pp. 24~52, 多处论述)。此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发明了罚为划船奴隶的法律——“这是为这个即使经济条件最糟时也找不到自由劳动力的行业获取劳动力的最合理的办法”(pp. 57~58)。

122 引自威尔逊(1969a, p. 122)。同时参见赫克舍(1935, II, p. 169), 里普森(1956, III, pp. 273~274), 科兹(Combs)(1958, p. 35, p. 46)和威尔斯(Wiles)(1968, p. 115, p. 118)。

123 伊曼纽尔(Emmanuel)(1972)。

124 赫克舍(1935, I, p. 221, 加了着重号)。

125 莱昂(1970a, p. 113), 进一步说,国家在1660年至1789年间每年在工业上的投资仅200万法郎,“事实上是一个令人可笑的数字”,因为工业的年收入平均为1亿法郎(莱昂, 1970b, p. 225)。

126 内夫(1968, p. 215)。

127 古伯特(1970g, pp. 354~356), 他提醒我们,在奈美根和约中(1678年),在荷兰和英国的压力下,柯尔伯不得不就他的高关税政策作出让步。默夫雷特认为,这些公司的失败比关税和对外国船只每吨征收50苏(Sous)的Fouquet税更为重要,后者相当于法国的航海法(1971a, p. 32)。同时参见德约恩(1966, p. 55)。

128 普雷斯利(Priestly)(1951, p. 47)。

129 柯尔伯的努力“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德约恩, 1963, p. 951)。

130 威尔逊(1965, p. 65)。

131 法国被认为在某些方面太庞大,而荷兰则被认为有相反的问题。如果整个尼德兰联合起来的话,在英国出现的那种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可能早

就出现了。比利时的钢铁与煤矿,在阿登(the Ardennes)可利用的重要的水力资源,都能为工业革命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荷兰却不具备这些东西(普拉姆,1965,p.25)。

132 参见戴维斯(Davis)(1954, p. 161, p. 163),然而他认为,“贸易畅通时期从1677年萧条的消散一直延续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

133 威尔逊(1965,p.12)。然而,克莱恩认为,“到1670年左右,作为世界中心市场的阿姆斯特丹的主要商品市场已经无足轻重了”(1966, pp. 208~209)。

134 哈珀认为,这些法令“确实起到了阻止荷兰人充当第三者的作用”(1939b,p.300)。阿斯特罗姆(Aström)认为,1633年至1685年间波罗的海贸易中的变化“很多”(1960,p.7),尽管荷兰在波罗的海的损失对英国船主总是一种补偿。弗兰克恩引用了1684年阿姆斯特丹城市元老们的话,他们号召人们注意,英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农作物和工业品的生产中所拥有的商业资金”已大大超过了阿姆斯特丹,相比之下,阿姆斯特丹的贸易则是“虚假的”(1968,p.10)。

135 克鲁泽(Crouzet)(1972,p.62)。

136 德卢摩(Delurneau)(1966,p.105)。

137 里奇特(Richet)(1972,p.205)。

138 默夫雷特(1971a,p.33)。

139 库里斯彻尔(Kulischer)(1931,pp.16~17)。

140 参见P.J.托马斯关于17世纪东印度贸易的“激烈”讨论(1963,p.6)。关于利润,参见格拉曼,他认为“荷兰通过亚洲贸易所得到的利润与通过船运业和欧洲的商业所获得的收入相比属于中等水平”(1958,p.11);同时参见莫里诺(1978e,p.175)。

141 巴斯特(Bassett)(1968,p.85)。

142 威尔逊(1965,p.170)。亚洲的布匹因其轻便、优雅和精纺细织而在当时特别值钱。P.O.托马斯提醒我们,1727年时,海图表明印度和中国能用他们的产品覆盖整个世界”(1963,p.31)。

143 肖德尤里(Chaudhuri)(1968,p.486),他说,到1700年,“贸易条件向不利于欧洲商品的方面退化”。

144 穆克赫吉(Mukherjee)认为这种变化从18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正是这个时候,由于莫卧儿帝国的崩溃,英法之间的对立采取了“激烈竞争的



形式，目的在于控制印度，在牺牲其它公司的情况下而使一个公司获得最高的‘贸易’优势”(1974, p. 110)。

145 戴维斯在对英国贸易的分析中论证了边缘化(1961, p. 125, p. 137)。就意大利而言，他认为，1700年时，它已经成为“另外一个以其农产品交换英国工业品的国家”。他把立范特贸易描述为“用英国工业品交换外国原料”的贸易，并且说“事实上，这种贸易被降低到各种细平布交换生丝的程度”。我同意这种对意大利的评价，但是保留对立范特的意见。伊莎威(Issawi)(1974)认为，1600年至1917年期间，奥斯曼帝国逐渐卷入了世界经济体；但是何时发生的决定性变化却不清楚。他好像认为，18世纪是一个转折点。

146 拉普认为，英国17世纪的兴起“依赖于对南部市场的征服，更为确切地说是因为消除了地中海地区的工业和贸易的竞争对手”(1955, pp. 522~523)。据我看，这似乎有些夸大，尽管17世纪早期基督教地中海的贸易扩张对英国(和联省共和国)很有用。事实上，在1660年以后，地中海贸易尽管在绝对条件下不断扩大，但却只占到总数的一个较小的百分比。对法国来说，与立范特的贸易从16世纪后期占有所有对外贸易的一半下降到18世纪80年代的1/20。对英国来说，这种下降甚至更加剧烈：从17世纪中叶的10%的顶峰下降到18世纪末的1%。而且，作为原棉来源和纺织品市场的立范特，由于其它来源和市场的出现从而使它丧失了重要地位。参见伊莎威(1974, pp. 114~115)。

147 帕里认为，18世纪在以后产生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一个英国的地中海”(1967, p. 191)。莱昂和卡里尔(Carriere)认为，在1661年至1789年间，地中海贸易占了法国总量的30%(1970, p. 194)；伊莎威认为，18世纪80年代时，法国占了奥斯曼贸易的50%~60%(1974, p. 114)。法国贸易包括一种野蛮状态下的主导地位，与突尼斯有些类似(莱昂和卡里尔, 1970, p. 193)。

148 阿斯特罗姆(Aström)(1963, p. 29)。

149 阿斯特罗姆补充了另外一个因素，认为波罗的海地区购买各色细平布(而不是丝和天鹅绒)的社会群体是小贵族和绅士、传教士、官吏以及自治市的公民，他们的需求基本稳定。“因此布匹消费中大的波动体现在布匹消费的集团，即军队。战争的准备刺激了这种需求，而军队复员则阻止了这种需求”(1963, p. 71)。三十年战争后“北方的安定”使得布匹的购买量急剧下降。

我怀疑这是否足以解释这件事。首先，我不相信非军事的需求都是稳定的。阿斯特罗姆本人也认为，此时英国人从三个方面来解释布匹出口的危机：

“荷兰的竞争，北欧和东欧布匹生产的增加，波兰市场上人们购买力的下降”（1963, p. 69）。第二种和第三种解释恰恰包括了非军事性需求的变化。第一种因素与三十年战争相关——不是军事需求而是由于战争，荷兰船队从 1623 年至 1649 年在波罗的海“从英国的贸易中消失了”（赫顿, 1959, p. 37）。

150 赫顿(1959, p. 45)。

151 参见赫顿(1959, p. 59)。

152 赫顿(1959, p. 99)。

153 威尔逊(1965, p. 80)。达比认为“到 1660 年王权复辟时，林地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了”（1975, p. 328）。一种政策的后果是海军部感到惊恐并且向皇家学会请教。1664 年，约翰·伊夫林写了一篇报告，其中他呼吁土地贵族们植树。这项建议得到广泛响应，并且终于使国内供应得以增加。显然“那些年月中所种的树及时成材了，帮助英国海军度过了 18 世纪的战争”（达比, 1973, p. 329）。

154 参见班姆福特(Bamford)(pp. 206-207)。

155 “法国的企业家们极不情愿把资本和船只投资于北方的船运业，为此他们常遭到批评，但这表现他们已经十分现实地估计到他们的局限性和与难对付的荷兰人竞争的冒险性(班姆福特, 1954, p. 219)。班姆福特指出，极不情愿保护北方桅杆的第二个原因是，除了成本以外，害怕“在战争时期依赖它们会招致重大的战略失策”（1956, p. 113）。法国此时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仅占全部贸易的 7%（参见莱昂和卡里尔, 1970, p. 194）。有关在法属北美洲的努力，班姆福特说：“做桅杆用的树在加拿大丰富而且便宜，但是对它们的采伐需要雇佣当地劳工，而这些人工资特别高”（1956, p. 120）。

重要的是，要明白法国开始不情愿（与英国的需要相比较）寻找北美洲的木材是因为它本身能自给自足。班姆福特认为，法国人于 1731 年停止进口所有北美的桅杆木材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质量太差。但是班姆福特认为，劣质的桅杆事实上是由于在圣劳伦斯河附近砍伐而不是在较远的内地，而且在船运之前已搁置于地上达两年之久。“如果法国人不是停止进口，而且同意扩大他们在加拿大的采伐地，那么其结果肯定对他们有利，如以后加拿大的砍伐对不列颠有利一样”（1956, pp. 127-128）。

156 参见阿斯特罗姆(1963, pp. 41-44)。不仅寻找木材是这样，而且寻找亚麻、大麻、沥青、焦油以及钾碱都是这样。

157 兰顿(Langton)(1972, p. 51)，他指出，与内夫增加了 15 倍的估算相

比,这个数据显然保守了。所以他总结说:“明显的‘革命’并没有发生”,每一次他都用自己的数据来说明一次革命。

158 引自明钦顿(1974,p.151)。有关英国木材缺乏和煤炭增多的情况,参见威尔逊(1965,pp.80-85),他还特别提醒说:“煤炭代替木材作燃料的成功以及煤炭工业日益增长的产量一定不能被当作一种意外出现的教皇去解释纺织业以外的英国工业的每一方面的发展”。尽管如此,他还是补充说:“它可能是17世纪初期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个经济因素”。

159 阿斯特罗姆(1963,p.32)。

160 赫克舍(1932,p.139),他认为“瑞典的优势地位应归功于(木炭)的数量而不是(矿藏)的质量”。

161 莱昂强调,整个18世纪法国铁矿日益短缺。他认为,早在1685年,法国一年就从德意志、俄国、西班牙,特别是英国和瑞典进口850万磅的铁(1787年4200万磅)。他说,18世纪时,人们不断抱怨“采伐森林造成的威胁以及日益上涨的燃料价格”,并提到1731年在弗朗什孔泰省爆发了反对那些不断毁灭森林的冶金业者的农民起义(1970b,pp231-232)。

162 弗林恩(Flinn)反对那种陈旧的观点,即认为铁制造业在1660年至1760年间的英国是一种停滞的工业。与此相反,他深信,日益增加的进口反映了国内和殖民地日益增长的需求(1958,p.145)。贝罗赫(Bairoch)认为,英国国内钢铁产量从1660年至1760年间虽然保持不变,进口却增加了130%。他认为钢铁的主要用途是在农业之中(1966,pp.8-10)。

163 法国相应的扩张最后迫使它在1735年左右进入“煤的时代”(莱昂,1970b,p.232)。

164 参见K.G.戴维斯(1974,p.314)。

165 K.G.戴维斯(1974,p.45,p.80,p.85)。当然,殖民单位的不同数量依赖于人们如何定义一个单位。戴维斯列举了一个表格和一个证明。

166 参见戴维斯(1954,p.131)与威尔逊(1965,p.161)。

167 帕里(1967,p.206)。

168 英国人“更能充分地利用契约劳工”。到1700年时,与250000名英国人相比,只有20000名法国人迁徙到北美洲(K.G.戴维斯,p.80,p.96)。柯廷(Curtin)估计英国殖民地有更多的奴隶,特别是在1700年以前(1969,第三章)。

169 德黑欧(Dehio)(1962,p.89)。胡格诺教徒未必渴望去北美;如德黑

欧所说,他们“可能只是希望在大西洋彼岸找到相同的社会、政治及教会生活的权威形式”。

170 斯克维尔(Scoville)(1960,p.103)。

171 “毫无疑问,在数量上,(法国)国内贸易的总额绝对地超过国外贸易的总额”(莱昂和卡里尔,1970,p.165)。

的确,在17世纪,我们发现贸易港口开始转向内地——这就是莫里诺称作的马赛“北方化”,这样就“断绝了马赛港与地中海的关系”。他解释说,在17世纪初期,马赛就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扩张”,它“比16世纪的扩张更为辉煌”(1970b,p.163,p.169)。人们对此感到惊奇,因为马赛由于荷兰人的堵截以及后来贸易路线的改变而丧失了有利可图的香料贸易。莫里诺则答复说:马赛主要进口皮革,特别是生丝以供给里昂的丝绸生产商,正是在这方面,它取代了以前由北部意大利供应的法国市场。这是些什么样的市场呢?它们是宫廷的奢侈品市场,尽管发生了整体的衰落,但它却很繁荣。这个市场有三个来源:现存需求的调整,君主收入的扩大,廷臣年俸的提高,后两者是由于日益增加的税收而引起的。“这样就刺激了奢侈品贸易,并与武器贸易和皮革贸易相竞争,因为,我们不要忘记,17世纪是一个逐利的世纪。马赛把其自身发展的养料注入法国国内的资源之中,由此,它避免了贵金属不景气的影响(1970,pp.168~169)。

172 尽管英国“(在17世纪)的殖民冒险颇为壮观,但是贸易(仍然)主要在欧洲内部进行”(苏普莱,1959,p.7)。然而,在与殖民地贸易增长的同时,与荷兰的贸易却衰退了(威尔逊,1965,pp.271~272)。

173 参见F.J.费希尔(1950,p.156)。让南认为,1650年至1750年这一时期,西欧产品的两个主要市场是北美的殖民者以及北美各州(1964,pp.338~339)。与英国相比,法国是一个拥有更广泛需求的大国,这意味着对北美市场的需求相对较少。

174 参见戴维斯(1956,p.71)。

175 参见威尔逊(1967,p.513)。

176 参见T.S.艾什顿(1969,pp.72~74)。

177 参见莱昂和卡里尔(1970,p.178)。

178 参见沃勒斯坦以前的论述(1974,pp.264~266)。

179 我们不要忘记,在漫长的经济紧缩时期,即使对英国来说,对外贸易并不意味着一切。例如,里德认为:“对降低交易成本来说,重要的是交易的

总量,而不必考虑参与贸易的商人的国籍。(英国的)对外贸易于(17世纪)发展壮大时,它的水平仍低于国内贸易的水平,并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发展更快。所以,国内的商业可能发挥了主要的作用”(1973,p. 184)。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但是,还要看看法国国内的交易总额是否确实少于英国,特别是法国的版图更大。

所以,我们想考察的不是全国的交易额,而是现存市场的容量。当然,巴黎从来没有像伦敦那样把政治和经济的功能结合起来,这同样是因为法国的版图及其地理结构不同。1650年至1750年作为一个城市和市场的伦敦的发展在学术著作中已得到广泛的讨论[参见里格利(Wrigley), 1967, p. 63];并且伦敦的交易价格可能比巴黎和法国其它中心地区的交易价格低。诺恩和托马斯认为,1500—1750年这段时期,技术变化很小,不可能用以解释生产赢利的增长,这种增长的唯一可能的来源“在于利用市场引起的费用的降低”,如果这一观点正确,这或许可以说明英国比法国仅有的一点优势。

180 帕克(1974a, p. 532)。

181 威尔逊(1949)。

182 赫克舍(1950, pp. 221~222)。

183 威尔逊(1951, p. 232), 他坚持认为这次争论是确实存在的:“我希望,以贵金属作为国际支付手段构成了多边结算体系的观点上的一致,将缩小争论。但是却不能完全解决争论。因为我觉得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贸易的一般模式和支付手段仍存在概念上的差异。在我看来,赫克舍教授似乎过于贬低了贵金属的作用,又过于夸大了汇票的作用。托马斯·曼<sup>[1]</sup>的眼界真的如赫克舍教授认为的那样,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sup>[2]</sup>的眼界一样吗?国际贸易的融资是一个没有历史的课题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具有一定规模的贵金属的周转明显地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零星’周转截然不同”(1951, p. 233)。

184 J.M. 普莱斯(J.M. Price)(1961a, pp. 273~274)。

185 斯伯林(Sperling)(1962, p. 468)。

186 布利茨(Blitz)(1967, p. 41)。

---

[1] 托马斯·曼,17世纪英国著作家,本章开篇时提到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的作者。——译者

[2]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译者

187 威尔逊(1949, p. 154)。在这点上, 苏普莱支持威尔逊反对赫克舍(1959, p. 86), 并引用了路易斯·罗伯茨(Lewes Roberts) 1641年所写一篇著作, 书名为《商人的商业地图》:“人们认为, 伊斯特兰(Eastland)的居民拥有的金银很少, 他们因此在这方面蔑视所有的人[原文如此]。他们以低价出售他们丰富的商品, 特别是那些日常食品”(1951, p. 176)。

188 赫顿(Hinton)(1959, p. 115)。

189 参见阿斯特罗姆(1963, p. 82)。赫克舍也坚持关于瑞典的观点:“说得委婉些, 并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表明白银持续不断地流入(瑞典)”(1950, p. 225)。但是, 阿特曼(Attman)在谈到与俄国的贸易时说,“至少到17世纪中期, 每个国家不得不以贵金属支付其贸易赤字”(1973, p. 160)。

190 斯伯林(1962, p. 461)。流入波罗的海的一些白银被立范特的波兰人用来交换“东方的奢侈品”[马恰克(Maczak), 1976b, p. 2, 同时参见1974, p. 507]。同时参见赫罗奇(Hroch)(1971, p. 26)以及格拉曼(1977, p. 262)。

191 戴尔(Dales)(1955, pp. 142~143)。

192 肖德尤里(1963, p. 26)并参见西恩(Singh)(1977, 第七章)。有关贵金属从西班牙流入菲律宾的情况, 参见肖尼(1960b, pp. 268~269); 关于从荷兰流入东印度群岛的情况, 参见舍费尔(1966)和凡·德·威(1977, p. 310)。雷乔杜里(Raychaudhuri)概述荷兰向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输入的产品时说:“输入的主要货物不是贵金属和香料, 而是奢侈品”(1962, p. 197)。就荷兰而言, 由于它能接手往来于印度、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亚洲的海上贸易, “从而使(它)能够减少西方为了平衡支付而容许流向东方国家的金银的数量。因此, 直到1668年, 日本的白银还能使荷兰人部分地免于花费西班牙的比塞塔(piasters)使他们具有英国竞争者所没有的某种优势”(德约恩, 1978b, p. 229)。

193 肖德尤里(1963, p. 27)。

194 肖德尤里(1968, p. 484, p. 495)。

195 参见阿斯特罗姆(1963, p. 82)。

196 肖德尤里(1968, p. 496)。

197 卢西(Lithy)(1961, p. 34)。卢西说“几乎是完全的单一银本位制, 它与完全的~~不一样~~”。肖德尤里认为, 从1662年至1680年期间, 东印度贸易吸收了印度东南部企求的黄金, 这种贸易当时处于贸易的最前方, 但是, “在1676年, 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原因仍模糊不清——黄金和白银价格在印度的贵

金属市场突然跌落”(1968,p.488)。

卢兹·马丁(Ruiz Martin)认为,“从1609年……到18世纪”,白银在欧洲金融市场上比黄金“占有优势”。他说这部分是因为东方的需求。“例如,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与阿尔及利亚人和波斯人的外交接触中,经常听到要在协议中列入一个单独的条款:以卡斯蒂里亚的里亚尔(reales)(银币)支付”(1970,p.56)。然而,斯伯林在谈到1680年至1703年的“白银危机”时探寻了去往东印度群岛的船运中黄金没有代替白银的原因。“白银流向东方,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因为贸易依赖于它,而是因为它有利可图,其次……因为贸易条件对欧洲人已有所恶化,所以尽管利用了黄金,但利润却很少”(1962,pp.466~467,加上了着重符号)。他指出,当时西属美洲的白银—黄金比率是17:1,在欧洲是15:1,在印度为12:1,在日本是9:1。但是,如果不从不同的用途来理解对贵金属的估价,怎么会有这些不同的比率呢?

198 卢西(1961,p.35)。当然,白银在欧洲内部通用,但却只用于市场交换而不是清算。卢西补充了以下具有启发性的语言学上的注释:“在法国,如果说白银成为表示货币的术语,那么硬币就被翻译成“黄金单位”(卢西在法语文章中用了英语中的“硬币”一词)。

199 斯伯林(1962,p.450)。

200 参见威尔逊(1967,p.509)。

201 苏普莱认为,政府的真正问题是能否迅速适应贵金属流通的变化,即流动的困难。“这样看来,‘重商主义’,正如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更像一种防御性机制,而不是进取性地欺人而又自欺地猎取金银。由于担心货币的数量和质量的损失,统治者当然会希望在它还没有在经济中产生长期的失调之前控制货币的外流”(1959,p.194)。

202 参见维拉的总结性论述(1974,pp.237~244)。

203 莫里诺(1969a,pp.346~347;以及1978b,pp.80~85)。

204 莫里诺(1969a,p.311)。例如,在说明16世纪最后20年到达西班牙的贵金属的“增长”时,莫里诺指出,国王从美洲取回了更多的贵金属(它们大概是开采出来的,否则就不会跨过大西洋),同时还指出,国王从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那里攫取了更大的份额(1969a,p.334)。但是,印第安人却没有得到贵金属的支付,大概是西班牙殖民者想用贵金属在西班牙购买东西,因此贵金属终于越过了大西洋。德约恩提出了与莫里诺相同的疑点:“没人想否定意外发现的作用,但是关于欧洲的命运会埋在深邃的美洲矿井中的解释,我们

怎么会不表达我们的保留意见呢？”(1967,p. 84)。

205 在使用这一时期的历史数据时,勒内·巴勒尔认为,贵金属或货币是一种“次要的现象”(1953,p. 309)。我将以不同的方式说明它。它是一种像小麦和纺织品一样的商品,我们必须注意所有这些商品相互关系中的贸易条件。

206 莫里诺(1969a, pp. 331~332),他补充说,德雷克效应“首先是保险公司的圣饼”。有关德雷克效应,参见帕里(1961,p. 127)和林奇(Lynch)(1969, p. 190)。

207 莫里诺(1969a, p. 346)。这里指的是英国的布莱克海军上将,他在1656年攻击了加的斯(Cadiz)附近的8艘西班牙大型帆船,击沉两艘,俘虏两艘。

208 维拉尔说,“可以肯定,到17世纪中叶,荷兰共和国的资本至少相当于欧洲所有其它地区的资本”(1974,p. 241)。

209 威尔逊(1949,p. 160)。斯通注意到,从1620年至1650年期间,伦敦的利息率从10%降为5%,并且说它们和除荷兰以外欧洲的其它地区是一样的。“利润率剧减既是流动资本和就业机构增加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就业机构有合股公司以及拥有放债人和金匠的信托银行业”(1972,p. 69)。如果真是荷兰占有的贵金属导致了利息率的下降,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用全世界流动资本的减少进行更好的解释,虽然流动资本可以通过银行贷款而得到增加。

210 “首先,人们必须记住,商品价格十分低廉的时期一般都是贵金属具有很高购买力的时期,因此也是刺激人们去寻找贵金属的时期”(维拉尔,1974,p. 247)。

211 卢西(1959, p. 95),他怀疑贵金属缺乏这个概念是否确切,并认为缺乏的是流动资本。他指出,那时收缩一词既表示贮藏又指货币的短缺。

212 卢西(1959,p. 97)。这有持续的含义。维拉尔指出,在18世纪的前半叶,“英国的货币流通以它与巴西和葡萄牙的关系为基础,因而也就以黄金为基础;法国则主要与西班牙和加勒比海发生联系,因此以白银作为其货币的基础”(1974,p. 324)。

213 维拉尔(1974,p. 287)。

214 参见斯普纳(1956,pp. 3~4)。

215 参见皮勒格特(Pilorget)(1966, p. 129)。



216 参见卢西(1959,p. 98)。

217 艾什顿指责克里斯托弗·希尔的正是这一点：“他像辉格党人一样,认为17世纪是现代自由主义出现的伟大的英雄时代”(1965,p. 581)。

218 普拉姆(1965,xxii)。J.R. 琼斯同样指出,1640年以前,“英国对荷兰简直无可奈何”。(1968,p. 41)。

219 参见布克哈特(Burckhardt)(1965, pp. 144~145, pp. 152~153, p. 180),他说:“在路易十四看来,他的权力和财产的增加,是保护他们的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方法”。

220 威尔逊以防御费用来说明荷兰税额高的原因。他谈到独立后的情况时说:“为保护自己而战要比把无益的忠诚献给王朝君主更令人满意。它的费用并不更少。”(1968,p. 235)。斯米特认为,17世纪最后25年日益增加的战争费用“超过了国家的税收基础或人口基础所能达到的程度”。为了支持竞争,荷兰人不得不承受“一个纳税已经很重的国家的令人惊愕的庞大开支”(1975,p. 62)。

221 范纳(Finer)认为“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剧烈的增长”(1975,p. 101)。

222 波耶斯(Perjes)(1970,p. 3)。格拉曼指出,在17世纪末,英国海军中有20000人在海上服役,“这个数字与当时的城市如布里斯托尔和诺里奇的人口相当”(1977,p. 200)。

223 卡斯韦尔(Carswell)认为,1685年时,英国和荷兰的军事力量在实力上“比较平衡”,两国都依靠“征集兵员”进行战争,而法国有一支“庞大的职业军队”(1969,p. 24)。

224 参见卡特(Carter)(1975a,p. 12, p. 33)。

225 有关阿姆斯特丹商人迟至1683年的抵制和他们在1688年观点的变化,参见斯米特(1968,p. 33)。关于贯穿在英荷伙伴关系中的“敌对的共生”关系,参见霍布斯鲍姆(Hobsbawn)(1960,p. 112)。有关路易十四不久就意识到英国已成为他的“主要对手”的情况,参见鲍德(Bourde)(1960,p. 54)。

226 塔皮埃(1960,p. 12)。

227 鲍德(1960,p. 63)。

228 参见霍布斯鲍姆,他说:“17世纪的法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并不是柯尔伯主义,而是它相对的失败;不是君主政体的改革,而是它在经济上以及最终在军事上与其海上对手竞争的失败,尽管它的资源丰富得多,后来却

被这些对手击败”(1960,p. 111,加了着重符号)。

229 莫斯尼尔(1967,p. 269)。

230 莱昂和卡里尔(1970,p. 190)。

231 德卢摩(Delumeau)(1966,p. 94)。

232 威尔逊(1965,p. 57)。这是赫顿所说的英国商业体系的灵活性质吗?参见威尔逊(1959,pp. 71~83)并比较哈珀(1939b)在解释航海条例时对行政决策作用的重要性的论述。

233 这个说法来自明钦顿的著作(1974,p. 111)。同时参见帕克(1974a,p. 561)。

234 政府财政与私人利润间关系的现实,可以说具有多方面的影响。例如,德·马达伦(De Maddalena)指出,在法国和德意志西部,新兴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小心地进行着财产的集中,“因为兼并农民农场意味着承担随之而来的纳税义务”(1974a,p. 293)。这就是雅卡特为什么说国家是“17世纪真正的获利者”的原因(1978b,p. 406)。

235 帕克(1974a,p. 572)。

236 费夫尔(1933,p. 270)。

237 关于柯尔伯对包税人的敌视,参见马辛(Marsin)(1970,p. 269)。然而,卢西认为,租地人和包税人是一种必要的祸害,因为他们能增加国家本身的岁入(1959,p. 109)。重商主义的目的并非只限于工业领域。参见勒·鲁瓦·拉杜里:“国家对于从事资本主义经营的大规模的‘庄园主’领地发挥的作用和对柯尔伯时期制造业发挥的作用一样,都是一种扶植”(1974b,p. 16)。德色特(Dessert)和茹尔内(Journet)(1975)描述了他们定名的“柯尔伯的接待厅”,认为它代表了那些从1663年至1687年间占据着全部农场的金融家的利益;他们为了他们的工业和进出口企业而从土地上抽取税收。从某种意义上讲,柯尔伯主义代表了一种从低水平的非生产的包税人和租地人向高水平的生产者的转变。

238 参见鲁尔(Rule)(1969,p. 32)以及古伯特(1970f,p. 123)。

239 “柯尔伯的工作做得很好,虽然法国人付出的代价肯定很高,但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这么做”(古伯特,1970f,p. 124)。

240 M. P. 阿斯利(M. P. Ashley)(1934,p. 97)。

241 参见罗斯维尔(Roseveare)(1969,p. 61;1976)。

242 斯沃特(1975,p. 45)和斯米特(1975,p. 63)。

243 参见卢达(1964, pp. 126-127)。有关荷兰共和国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参见科斯曼(1976, pp. 13-17)以及鲍斯玛(Bouwsma)(1970, p. 9)。

244 E. 巴克(E. Barker)(1966, p. 7)。

245 赫克舍(1935, I. p. 104)。

246 默夫雷特(1971a, p. 29)。进一步说,把这种情况不恰当地与不列颠相比是荒谬的。不列颠统一的关税地区比法国五大税区的面积稍大一点。如克鲁泽(Crouzet)所说,对不列颠的统一“不应估计过高”(1972, p. 78)。

247 参见阿谢尔(Asher)(1960, p. 48),他认为柯尔伯的海上军需制度远比强迫服役制度更为公平,它失败的原因是专制君主制不够强大(参见 pp. 91-95)。

248 普拉姆(1967, p. 13)。

249 例如,詹姆士·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在*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1656)一书中说:“像法国人对贵族(Noblesse)一词的理解那样,我也将按贵族的豪华生活去理解绅士一词的含义”(由威尔逊引用,1965, p. 109)。认为后来的学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公平的。例如,哈巴库克认为,英国的贵族阶层和缙绅阶层“即使不是同质的,也是一个单一的社会阶级”(1967, p. 2)。并参见C. E. 拉布鲁斯(C. E. Labrousse),他认为所有者阶级混淆了三个等级的区别,这三个等级包括非年度、非农民的贵族阶层,僧侣以及富裕的资产阶级。“但是,绝没有否定他们的存在。这里,阶级与等级没有矛盾”(1970, p. 474)。

250 由C. 希尔引证(1975a, p. 281)。

251 “英国地主社会的真正分裂并不是旧的和新的地主家族之间的分裂,而是那些拥有严格限制的地产的所有者和那些由于不走运而又无人理睬他们的困境因而利用了环境的经营者,以及那些在经济扩张和社会流动中只顾谋利的富有进取精神或幸运的人们之间的分裂”(明格,1963, p. 107)。

252 拉布(1975, p. 71)。

253 E. 巴克(1966, p. 31)。这一体制在1688年得以恢复。国会对君主的胜利在18世纪实际上意味着“行政机关权力的增长,……这是通过对立法议会的征服而取得的,斯图亚特王朝虽曾为此而多次尝试,但从未实现这一目的”(普拉姆,1967, p. 65)。

254 斯通(1972, p. 49)。扎戈林(Zagrin)同样认为“以后再没有任何巨大的社会变化”(1959, p. 400)。

255 C. 希尔(1969, p. 135)。除了无人否认的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外, 希尔指出了封建土地保有权的废除和政府努力抑制圈地的结束。他说: “在贸易、殖民地和对外政策上, 中世纪英国的终结是在 1650—1651 年开始的, 这时, 共和政府可以解脱出来从而把注意力转向国外”(p. 155)。希尔认为, 中世纪就像一个水阀门; 不同的水龙头, 可以在不同的准确时刻把它关掉: “中世纪工业和国内贸易……结束于 1641 年, 这时中央政府失去了授予垄断权和控制济贫的管理的权利”(p. 169)。“在财政方面, 中世纪的英国结束于 1643 年, 此时开始征收两种新的现代税: 消费税和土地税”(p. 180)。

256 威尔逊(1957a, p. 153)。

257 参见瑟斯克(1954)。

258 斯通(1966, p. 51)。

259 1660 年以后, “设立了障碍以杜绝带有反革命印记的社会流动”(瑟斯克, 1976, p. 20)。

260 苏普莱说“使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地位区别开来的市场环境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行为决定的”。然而, 他又说, 这种国家行为是间接的。苏普莱的单子上所列的第一条就是 17 世纪国内冲突结束后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协调, (1973, pp. 314~316)。

261 “(1688 年的) 革命最终巩固了有产阶级的地位”(希尔, 1961a, p. 276)。

262 特里威廉(Trevelyan)(1963, p. 45)。

263 平卡姆(Pinkham)(1963, p. 85)。同时参见 J. R. 琼斯(J. R. Jones): “然而, 詹姆斯(James)想用城市中产阶级代替地主阶级, 这促使历史学家犹豫不定, 是否该把这次革命看作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严格地讲, 恰恰相反”(1972, p. 15)。

264 参见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 “在爱尔兰和苏格兰, 国王开始求助于旧的保皇阶级, 世俗的、宽容的‘官僚’贵族及其父辈的联盟所依赖的缙绅阶层……但是由于这些派系力量还不够, 国王在这两个国家开始依赖于凯尔特(Celtic)边缘力量。他成了“老的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种植园主以及苏格兰高地人反对低地人的领袖”(1967, p. 710)。与高地人的联系后来以雅各宾主义的形式保存下来。

265 C. 希尔(1969, p. 137)。

266 参见沃勒斯坦(1974, pp. 293~297)。

267 参见彼勒格特(1975,p.879)。当然,这些地区也常常在经济上遭受损失。有关它是如何影响巴斯克地区的,参见高罕纳兹(Goyhenetche)(1975, pp.5~32)。

268 从路易十四对他的官吏的政策的一系列研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点。我们无论是考察国务秘书,还是军官,或司法官员,可以清楚地看到,富有的和具有竞争力的人们都能受到招聘并得以在个人地位上得到提升。参见布鲁兹(Bluche)(1959, pp.18~22),科威斯尔(Corvisier)(1959, pp.45~46)和古伯特(1959,p.73)。

269 “但是,资产阶级仍……不满意。他们所狂热追求的权力,他们既拥有了它,同时也还未拥有它。如果自柯尔伯以来,大部分大臣们或多或少地有些资产阶级的根底,那么他们就会从坐在政府议会的那一刻起极力否认他们的根底,而把自己和贵族联系起来”(莱昂,1970d,p.643)。

270 参见亚当斯著作中的讨论(1974)。这件事那么重要,致使一些近代新教徒认为,此次撤销法令<sup>[1]</sup>把法国新教派从其保皇主义和遵奉教义中拯救出来,并在撤销法令之后迫使其回到“原来的特征”(列奥那多 [Leonard], 1940,p.11)。

271 卢西(1959,p.12)。

272 罗伯特(Robert)(1967,p.47)。

273 勒·鲁瓦·拉杜里(1971,p.28),他把法国和英国作了明确的比较:“英国君主制以新的面貌(于1688年)与以前的对立派别握手言和;就像路易十四与以前支持神圣同盟和福隆德运动的僧侣握手言和一样”(1975c,p.36)。

274 参见雅卡特(1975, pp.344~345; 1978c, p.492),勒·鲁瓦·拉杜里(1974c, pp.8~9),以及C.S.L.戴维斯(1973, pp.125~127)。

275 有关1661年以后普罗旺斯知名人士的“温驯”情况,参见彼勒格特(1975, pp.863~866)。同时参见比斯凯(Busquet)等人的观点:“(这种温驯)是保王派政府发动的统一运动取得成功的一个证据,也许是最好的证据”(1972,p.79)。

276 引自于C.希尔(1975b,p.204)。希尔也认为:“群众究竟从革命中得到了什么呢?消费税,免费住处,抢劫,征兵;而不是固定的公簿持有权、地契的废除以及对工业手工匠抵制雇主的保护”。如J.R.琼斯所说,那些为革

[1] 指1685年撤销南特敕令的法令。——译者

命而战的平民、战士“并没有成为革命的受益者”(1972, p16)。1688—1689年期间,英国的小乡绅也是如此——正如尼德兰起义之后卡尔文教派的好战者、海上乞丐、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情况那样。

277 参见莱昂(1970e, p. 684)。

278 莱昂(1970e, p. 686)。

279 格拉斯比(Grassby)(1960, p. 38)。如苏普莱指出,法国贵族根本不是不相容:“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被迫把资本和威望(献给)17世纪和18世纪的合股企业”(1977, p. 450)。

280 熊彼特(1943, p. 135)。

281 苏普莱通过引用英国和法国的例子说:“贵族的企业……没有比采矿和重工业更活跃的了”(1977, p. 499)。有关贵族在法国工业中的作用,参见德约恩(1978d, p. 277)。

## 第四章 缓慢增长时期 的边缘区

世界经济体的发展时期比较容易概述。生产不仅在各个方面而且在大多数地方得以扩大，就业广泛，人口增加，繁荣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大部分人的实际工资事实上可能在下降，但这种下降在名义价格稳定的膨胀中看得并不明显。有相当多的社会骚动，但是，这种骚动是由乐观主义，甚至是无所畏惧滋养起来的。个人的流动似乎是当时的常规。进步似乎是上帝的赠物。

衰落时期要复杂得多。首先，那些时期更为突出地显得不平衡，有倒退，停滞，紧缩和难熬的困境——但并非对每个人都那么坏。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以总价值或人均占有的数量进行衡量的话，生产总量处于稳定状态；但这可能是由于某些地区的生产量或生产率有所增加或二者都有，而被其它地区的衰落所平衡。那些雇佣工人的实际工资可能增加，但是失业的百分率也可能在上升。

在世界经济体的边缘地区可以看到一幅特别幽暗的景象。他们在政治上最为软弱。可以看到，中心区和半边缘区的统治阶层为维持他们的生产和就业水平而牺牲边缘区。然而，边缘地区并没有完全退出世界经济体——这有许多原因。其一，边缘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家希望留在世界经济体中；他们为留在那里而奋力挣扎。其二，中心区的资本家精英必定要期盼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体最终的周期性上升，为此，他们需要边缘地区的土地和人口所代表的自然区域和潜能。其三，中心国家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仍需要某些边缘地区的产品——部分是由于生态的原因，那些产品不能由别处提供；部分是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原因，边缘区的劳

动力成本任何时候都较之中心区要低得多。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衰落是经济活动的减慢，而不是停滞。用经济术语来说，它表现为在寻求利润时的一系列障碍，以便把资本主义的绵羊从山羊群中清除出去，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强者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日益繁荣。所以，对边缘地区来说，世界经济体的衰退既带来了衰退又带来发展；既引起经济活动货币化的表面上的衰退，又引起了新兴企业的兴起；既是一种抛弃又是重建或重新安置；既引起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特殊作用的下降又引起对这种特殊作用的不断加深。要评价这种明显的矛盾，我们必须从头开始。是什么导致世界经济体趋势的长期倒转呢？资本主义体系包括市场机制。这个市场并不是自由的——离自由很远——因为市场受到政治调整、文化的滞后和偏颇的影响。然而，如果没有任何的市场反应，那么就很难谈论资本主义体系。

我们知道，市场总是对供求关系的变化作出反应。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在大集市上不可预测地撞在一起的神秘力量。供给与需求相互决定并受制度约束；但是如果在太长的一段时间发生了太大的背离，那么市场一定会注意到这种情况。扩张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产生供过于求——简单的原因在于供给取决于单个的企业家（对他们来说，扩张时期增加产量展示着获取厚利的前景），而需求则取决于群体（通过政治机器调节收入分配）。在既定的世界范围的分配状况下，只要生产不断扩大，迟早会出现世界范围的需求不足。需要有两方面的努力才能消除这种背离：其一，收缩、停止或至少减缓不断扩大的生产；其二，重新安排收入的分配，以增加全球性的需求，最后得以出现一次新的扩张。

两种情况实际上都出现了，而且顺序也如上文所述。先是生产停滞，然后便是具有政治性质的收入再分配。这是衰落时期的社会外观。但是必须立刻补充一些详细说明。生产停滞现象在旧的边缘地区比其他地区要严重得多；而且具有政治性质的再分配更多地出现在中心区和半边缘区（或至少在它们中的一些地区），



而不是边缘地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延长了的 17 世纪，即 1600/1650—1750 年这段衰退时期的真实写照。对于这种缺乏有效需求的模式还有另外一种详细陈述。我们已把这段衰退开始的时期定在 1600 年至 1650 年之间。贯穿于本书的阐述中的这种含糊不清，并不是由于知识不充分而造成的，而是一种从扩张向衰退转变的正常模式的表现。有相当一段时间，扩张还在持续但衰落已经开始，因此，这段时间兼有两个时期的一部分历程。

我们已经说过，这种长期趋势的特别的逆转似乎由三个相继出现的商业震波组成：一个在 16 世纪 90 年代，一个在 17 世纪 20 年代，一个在 17 世纪 50 年代。<sup>1</sup>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欧洲世界经济体受到了货币不稳定的影响——波罗的海币值的上涨，西班牙铜币的膨胀，美洲贵金属生产的突然下降。也是在这个时期，战争、疾病、饥馑导致了各种人类灾难。这些事态汇合在一起并不是偶然的。当一个不利的市场突然出现时，边缘地区出口农作物的生产者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从他本身出发，有两种行得通的反应。他能够通过增加他的出口量或者降低他的生产成本而努力保持他的纯收入。任何一种或两种方法在短期内对单个的业主会有一定效果，但是从中期来看，它们导致了某一地区边缘生产者处境的普遍恶化。出口作物生产的扩大使全球产量增加，而市场需求却已接近于可以容纳的极限。降低生产成本，像许多边缘区很可能出现的那样，是通过强化对自然资源 and 人类资源的利用而实现的，这样就耗尽了未来的生产潜力。

我们将尽力说明，在 16 世纪世界经济体的主要边缘区，情况确实是这样。16 世纪 90 年代和 17 世纪 20 年代疲软的市场导致了产量的增加以及资源开发强度的增大。到 17 世纪 50 年代（即使不是更早的话），实行第一种策略的后果迫使边缘地区的生产者转向另外一种唯一感到可行的反应，即部分地从面向世界市场的生产中撤出——至少是从他们在 16 世纪曾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一部分世界市场撤出。<sup>2</sup>我们还是先从东欧边缘地区开始吧。17 世纪

时，东欧地区出口产品的价格、生产率以及出口的总价值和数量都下降了，最为严重(但不是唯一的)的是波兰的谷物和匈牙利的牲畜。价格的情况最为熟悉，因为正是在农业价格下跌的基础上才构成 17 世纪萧条的基本情况。到 1615—1620 年，波兰的小麦价格下降了，然后便是一次暂时的上升，随后又是 17 世纪中叶的“一次暴跌和长期延续的价格萧条”。<sup>3</sup>17 世纪初，匈牙利牲畜价格的上涨减慢，“在 17 世纪 20 年代出现另外一次短暂兴旺之后，完全停止了上升”。<sup>4</sup>17 世纪中叶，匈牙利牲畜的价格在维也纳“大大地”降低了。<sup>5</sup>对于捷克的农业来说，1650 年以后的 100 年是“一个停滞的世纪”。<sup>6</sup>

出口的价格不仅绝对地下降了，而且相对来讲，它们可能早已下降，也就是说，贸易条件对边缘地区的出口商们变得“越来越不利”。<sup>7</sup>同时，“奢侈品的进口数量迅速增加”，特别是在 17 世纪的第二个 25 年中<sup>8</sup>——这是边缘地区的缙绅们的最后放纵的一种表现。降低出口和增加进口(至少在过渡时期)产生了富有戏剧性的贸易平衡的变化。例如，波兰在波罗的海海上贸易的盈余从 1565—1585 年的 52% 降到 1625—1646 年的 8%，然后在 17 世纪后半期开始出现入超。<sup>9</sup>马恰克(Maczak)认为，波兰不利的贸易平衡是由“17 世纪 20 年代的灾难的 10 年”所引起的。<sup>10</sup>由于波兰保护较差的经济企业无力抵制通货膨胀所引起的货币不稳定的消极影响，从而恶化了变动中的贸易平衡。荷兰商人要求格但斯克商人除了接受坚挺的金币和银币付款外，还要接受一部分低值货币(例如，Loewenthalers)。当然，这种货币可能会遭到政治当局的阻碍；但是格但斯克商人强烈反对任何预防性措施，他们既“害怕在对外贸易中发生严重的混乱”，<sup>11</sup>又发现这种保护并不重要，因为他们能够把荷兰强加于他们的这种负担转嫁到“中产阶级、贵族以及农民身上”。<sup>12</sup>

对东欧谷物产出率的估算非常广泛，而且一致认为谷物产量在 17 世纪确实下降了。下降多少则是争论的问题。比较乐观的人

认为，谷物产量仅仅是停滞不前，而此时西北欧的产量正在增长。不怎么乐观的人则认为有大幅度的下降。<sup>13</sup>通常的解释认为，小麦产量之所以下降是因为“地主极度使用强制劳动进行的商品生产占了统治地位”。帕赫也以同样的解释说明匈牙利牲畜出口下降的原因。<sup>14</sup>但是为什么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生产会导致产出率的下降呢？原因有两条。其一，日益紧迫的强制劳动“使得许多农民不再饲养挽畜，而是把它交给佃农”；因为农民农场的产出率比贵族农场的产出率普遍高，所以整体产出下降了。<sup>15</sup>其二，生产的增加是“由于在耕作土地时违背了轮作制的基本原则”，<sup>16</sup>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耗尽地力。这种消耗人力和地力的办法使总的生产水平维持了50—60年之久，但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方法。其后果是可以看得见的，因为尽管做出种种努力来增加生产并降低成本，总的出口还是减少了。16世纪末，每年从格但斯克运出100 000拉斯特小麦；但到17世纪只有30 000拉斯特；18世纪初，仅有10 000拉斯特。<sup>17</sup>埃贝尔认为1620年时有一个突破点，<sup>18</sup>但是让南指出，松德(Sund)的记录表明1649年或1650年是“创记录的一年，超过了1618年”，并且建议我们把转折点定在1650年而不是1620年。<sup>19</sup>

牲畜出口的情况也一样。在匈牙利，1550—1600年是“黄金时代”，<sup>20</sup>之后便出现了衰落。波兰与西里西亚、萨克逊以及莱茵河流域的牲畜贸易随着三十年战争的开始而“丧失了它的重要地位”，因为驱赶牲畜太危险。<sup>21</sup>丹麦的牲畜贸易也一样，它构成了同一画面的一个部分。<sup>22</sup>帕赫认为，牲畜贸易的下降比小麦贸易更为严重，他因此认为匈牙利比波兰蒙受的损失更大，因为牲畜卖到了“沦为国际贸易路线转变的牺牲品”的德意志南部城市，而小麦则卖到了“日益发展的现代型的大西洋国际贸易中心”。<sup>23</sup>16世纪东欧第三项主要的出口物是铜。它在17世纪20年代也出现明显的衰退。<sup>24</sup>在每一种情况中——小麦、牲畜、铜——原因在于世界性的生产过剩。以小麦为例，出现过一次上升，尽管在南欧和西欧的

谷类生产中“上升幅度较小”，但是费伯(Faber)认为，它足以解释17世纪后半期“荷兰谷物贸易的灾难性衰退”。<sup>25</sup>至于牲畜，是“需求的减少才导致价格的下跌”。<sup>26</sup>就铜而言，主要因素是“涌进市场的瑞典铜的供过于求”。<sup>27</sup>

在每一个实例中，出口形势都恶化了，但不是由于国内的战争和破坏引起的，战争只是加剧了恶化——特别是瑞典对波兰的入侵(1655—1660年)，以及匈牙利境内整个世纪不断的战争，从十五年战争(1591—1606年)到拉科齐(Rákóczi)的独立战争(1703—1711年)以及丹麦—瑞典战争(1643—1645年)。<sup>28</sup>但是战争的破坏，包括总供给的减少，本身并不能解释什么。薇拉·齐曼伊(Vera Zimányi)提醒我们：“在整个欧洲，16世纪经历的战争都具有破坏性，但是在那个时期，它们却只刺激了生产，产生了有利的局面，结果提高了价格”。<sup>29</sup>那么从16世纪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欧洲世界经济体已从供给少于需求的局面转向其反面。在前一种情况下，战争的破坏易于产生更强劲的需求。后一种情况下，战争的破坏则为生产总量的减少提供了合理的缘由。

生产总量的减少是如何分配的呢？这是关键的问题，因为它决定了，或者说重构了边缘地区的社会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在东欧，商品农作物的强制劳动(所谓的第二次农奴制)作为一种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劳动力控制机制在16世纪时得到广泛传播。我们现在必须解释的是，在17世纪出口市场日益衰落时，对农奴的需求为什么反而更加广泛。我们必须先看看这样的事实，16世纪时，专供出售的农作物以差不多同样水平的效益既在领主土地上生产又在农民的小块土地上生产。<sup>30</sup>然而，17世纪在整个东欧地区，显然有相当多的土地集中现象，也就是说，更多的可耕地和更多的为市场生产的农产品都掌握在领主手中，而留在农民手中的则较少。这就是有关波兰、<sup>31</sup>捷克<sup>32</sup>和立窝尼亚<sup>33</sup>的情况。的确，对波兰来说，马恰克把17世纪和18世纪与16世纪特别地进行了比较，认为“富裕的自耕农—农民小群体……完全消失了……成

为贪婪的地主的直接牺牲品”。<sup>34</sup>

我们先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16世纪有利于世界市场的一种现象，即总的可耕地面积的扩大，这时停止了，甚至出现了局部的倒退；但是在可耕种的土地中，领主的直接专用地占有了增加的份额。也就是说，16世纪在东欧地区，扩大市场生产的需要从两个方面得到了回应：一是使用强制劳动耕种大地主的大片领地，二是富裕农民耕作土地的某种发展。“然而，到17世纪初，斗争以依靠使用强制性农奴劳动的‘古斯尔(Gutsherr)’的胜利而告终”。<sup>35</sup>

大领地比农民的农场，实际上也比中等规模的领地有几个方面的优势。收成的不可预测性只对较大的农场有利，因为控制着不同的地区，这使它们有一种对付歉收的内在的保险机制。<sup>36</sup>他们除了等式中的供给一方占有优势外，在需求一方也占有优势。在这一端上，他们能直接进入市场，能够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把商品运到港口，这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特权”。库拉认为它是促进土地集中过程的“一部分原因”。<sup>37</sup>从他编制的那个值得注意的表中(参见表4.1)可以看出，日子越艰难，那些优势就越明显。在该表中，库拉计算了波兰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在不同时间内的贸易条件(他们所出售的产品的购买力与他们所购买的产品相比较)。虽然不宜夸大那些不可靠的数据<sup>38</sup>的解释价值，但1550和

表3  
波兰各个社会阶层贸易条件的变化<sup>a</sup>

	1550	1600	1650	1700	1750
庄园大业主	100	276	385	333	855
贵族	100	80	144	152	145
农民	100	205	169	118	51
大业主		100	139	121	310
贵族		100	180	190	181
农民		100	82	58	25

a 得到允许后复制于库拉的著作(1970, p. 94)。

1600年这两个不同的指数时期的对比，使人们可能作出一些尝试性推断。1550—1600年的极度扩张时期不仅对大业主有利，而且对农民也有利——二者好像都以牺牲贵族利益为代价。一旦不景气的岁月来临，农民就会受到它的冲击。贵族和庄园大业主们却过得不错。从1600年的指数来看，很明显，贵族在一段时期（但仅仅是一段时期）比大业主境遇好些；同样很明显，从1550年的指数来看，庄园大业主总是绝对地领先于贵族。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且提出一个很简单的机理。艰难时期，生产者有两种方法使销售极大化——降低成本并排除竞争者。庄园大业主（和贵族）竭力不断增加强制劳动以降低成本，反对雇佣劳动。<sup>39</sup>这样不仅减少了平均成本而且增加了总产量，这是又一种补偿由于市场价格降低而造成的损失的方法；<sup>40</sup>为了确保庄园领主<sup>〔1〕</sup>土地上不断增加的产品能找到市场，领主买下了农民甚至贵族的财产，“贵族由于实际上已破产也准备出售其财产。即使大业主没有把新土地转入生产的轨道，他们至少不在新土地上生产与旧土地生产的商品相竞争的产品。这种看来极为可行的土地投资过程（即使人们不期望它马上从出口的农产品中带来货币），无疑受到了17世纪初期金融危机的推动，这种金融危机把大业主推入一种“心理上可以理解的贮存商品的竞赛，以作为一种保险来对付货币市场的不稳定性”。<sup>42</sup>包括土地在内的商品，如果它们的“贮存”要延长一段较长时期，那么把它们作为贮存价值保存起来似乎比保存货币更为安全一些。

在这些土地上发生了什么情况以至要把它们排除于竞争之外呢？无疑它们代表了“一种向维持生活的生产的转变”，<sup>43</sup>如果你愿意，会说它是一种退化，但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它们确切地代表了对市场环境作出的一种明智的调整，一种资本主义企业家（庄园大业主与贵族）在一个疲软的市场——全

---

〔1〕此处所称的领主(seignior)即前面所说的大业主(magnate)。——译者

球性存货的减少以及生产的全面停滞——条件下，使其利润极大化(或亏损极小化)的方法。农民可能不会扩大或缩小他们的努力以对世界市场的波动作出反应，但农民不是企业家；他们是半无产阶级，他们的劳动投入主要取决于企业家对世界市场作出的反应。<sup>44</sup>

一些地方市场面对向中心区国家出口减少的形势而生存下来甚至繁荣起来，这表明退却并不意味着放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斯皮兹(Spiesz)指出，早在16世纪，中欧地区就为地方市场生产，这说明它们与面向西欧出口的东欧地区有很大的不同。他把中欧地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下西里西亚、下卢萨蒂亚、奥地利[不包括提洛尔(Tyrol)]、萨克森、图林吉亚(Thuringia)以及匈牙利西部——的生产关系称作是与第二次农奴制相反的小农场经营。即使在那些国家，17世纪时，农民的条件也恶化了。<sup>45</sup>然而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17世纪，波兰的一些曾服务于洲际贸易的市场中心，如克拉科和波兹南，由于三十年战争和瑞典战争的双重影响而不再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是它们却作为地方市场中心在17世纪后半叶蓬勃发展起来。<sup>46</sup>与日益加剧的土地集中并行发展的是扩大了对强制劳动的劳动日的剥削。显然，如果大业主有一块较大的专有地，他就需要较多的劳动力；如果农民拥有的土地较少，那么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干这种强制劳动——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仍在耕种足够的土地以养活自己，<sup>47</sup>但是不再用更多的土地种植专为销售的农作物了。有一些报道表明，17世纪时，在波兰<sup>48</sup>、东埃尔比亚、<sup>49</sup>匈牙利、<sup>50</sup>波希米亚、<sup>51</sup>罗马尼亚<sup>52</sup>和丹麦，<sup>53</sup>使用强制劳动的数量增加了。

关于生产关系，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强制劳动的增加在17世纪是合理的，那么为什么在16世纪没有达到同样的水平呢？答案之一可能是它需要时间。答案之二可能是，高比率的强制劳动在各种原因影响下的市场萧条时期是合理的，但是中等规模的强制劳动更适合市场扩大时期，因为高比率存在着消极的一面。

达到某一点以后，强制劳动就会耗竭和降低生产率。拉森斯基(Rusiński)问道：“在什么时候，强制劳动在经济上表现出倒退的特征呢？……最新的研究使我们能极准确地确定这一时刻”。他说，波兰中部是在1580—1620年，西里西亚与波希米亚则稍晚一些。<sup>54</sup>这就把我们带回到过渡时期(1600—1650年)。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概述如下：16世纪时，强制劳动在经济上具有生产效益。它包括农民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强劲的市场而从事的同样的劳动；但是大业主通过实施强制劳役从农民那里剥夺了部分剩余。艰难时期，大业主不断要求增加农民的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开始提供他们在其他情况下绝不会再增加的劳动。最终，这种过度的产出会耗尽农民的劳动潜力而成为阻碍生产发展的因素；但在中期内，它却能保证萧条的世界市场所造成的大量损失由农民而不是大业主来承担。

自然，农民并不满意。“地产越大，大业主的保留地和农民的小块土地之间的差别也就越大”。<sup>55</sup>结果，农民逃亡、怠工。我们因此似乎陷入了又一个悖谬之中。这里，同时出现了强制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增加。如果我们记住东欧的大业主对待农村劳工实际上有三种方式：强制性劳动、工资以及抵销租金制，那么这种悖谬就不难解决了。与强制性劳动和工资相反的抵销租金制是东欧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主要形式。16世纪时，世界经济的扩张使得强制劳动得以重新实施并扩展，代替了抵销租金制。事实上，在那些最接近出口港的地区，如西普鲁士、“大波兰”北部和库杰伊(Kujawy)，农民能更有效地抵制16世纪强制劳动的实施，并且通过保持抵销租金制而为他们留得更多的市场利润。<sup>56</sup>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距港口近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以具有竞争性的成本安排他们的生产。然而，17世纪时，当市场出现困难时，东欧佃农抗拒庄园主压力的能力日益削弱，抵销租金制开始大量减少——如今已被强制劳动和雇佣劳动取代。<sup>57</sup>

从农村劳工的观点来看，雇佣劳动未必比强制劳动更可取。



实际上，在领主的保留地上，雇佣劳动力大部分是农奴或日工，后者“发现他们由于强制劳役而处于一种”比农奴“更强的依附地位”。<sup>58</sup>农奴不仅比日工有更多的安全感（因为他们不能被遣释），而且农奴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多的实际收入。尽管看上去有些奇怪，但他们确实还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尽管法律对他们有所约束，但是由于政府权威的软弱，“那些被领主课以太高租税的农奴总是能经常地更换领主”。<sup>59</sup>在领主与农民的这种冲突中，这种冲突实际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一种阶级冲突，农民并没有完全丧失保护其利益的能力，即使是在艰苦的岁月中。领主/资产阶级不得不去发现其它的方法，而不仅仅是通过合法手段来缩减实际工资，从而达到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自然地，他转向了工业生产，这样农民与他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雇工而且还是一个消费者。

如果在17世纪时出现了农民的贫困化，那么他们还能买什么呢？那些曾存在过的工业到16世纪末由于“遍布各地的绝大部分人口的贫困”而渐渐消失。<sup>60</sup>那么领主会生产农民能够买得起的什么产品呢？在歉收的年月，经常是简单的纺织品、某些玻璃品和金属器皿以及荒年所需的粮食。在任何情况下都似乎存在着工匠从城镇向大地主的流动，到庄园从事制造业工作。<sup>61</sup>最有成效的工业毫无疑问是为越来越穷的贫民生产他们永远不能离开的陪伴物——酒精。我们知道杜松子酒与18世纪后期英国新兴的城市工厂有不解之缘，威士忌与19世纪边境地区的那些被赶走的土生土长的民众有不解之缘。同样，为17世纪贫困化的农民而生产的还有波兰的伏特加和啤酒、匈牙利的葡萄酒。这种主要的行当称为“招饮业”，它实际意味着领主在酒这种饮料的生产和销售中拥有垄断权。<sup>62</sup>1650—1750年，这种“招饮业”常常成为贵族的主要财源。<sup>63</sup>

土地集中的最后结果，抵销了租金制的进一步衰落。“招饮业”则说明，尽管其出口农作物的世界市场疲软，尽管有战争的破坏，但是东欧上层阶层终究设法以适当的形式度过了这段时期。

无疑他们不会像阿姆斯特丹的统治阶级或法国北部的领主那样日益兴盛，但是东欧边缘地区纯收入的严重减少首先是使下层阶级蒙受了损失。“城市工匠和富裕农民破产，贫困的农民则更加贫穷。当社会分裂不断加剧时，某些人的身份也会上升。他们是宫廷的侍从——不像法国一样是国王的侍从，而是众多领主权贵的随从。”“这被称作是第二次封建化，但是马凯(Makkai)坚持认为这种说法措词不当；他说，它应被称为“贵族的膨胀”。”

前一章，我们描述了英国、法国的新兴资本家与旧的贵族之间所达成的社会妥协，这两类人远比当代的观点或已经注意到的那些时代的观点所认为的有更多的重叠；但是他们并非完全重叠，所以在世界经济体的扩张时期还有严重的摩擦。这种冲突在过渡时期发展到最剧烈的程度，而过渡时期是与世界性扩张的停顿并行的膨胀的最后时期；但是在1650—1750年这段时期中，衰落和重商主义时期的现实迫使两个相互重叠的阶层达成妥协，它在17世纪末的新体制的安排上(广义上说)被具体化。东欧边缘地区发生了类似的事吗？中心地区所拥有的两种因素，边缘地区是没有的。首先，对那些位于中心地区的阶层来说，资本主义利润的前景总体上比较好，这必定会缓和相互让步的痛苦。让步总还是值得的。其次，由于处在中心地区，上层阶级如果不是单个地，也是集体地因国家机器的强化而获利；而这种国家机器能够转而成为一种制度上的制动器以控制上层社会的内部冲突。

边缘地区既没有经济补偿也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君主制在波兰日渐削弱。匈牙利被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两个部分处于外国的统治之下，而且最终所有三个部分都受制于外国统治。捷克土地也同样沦于外国统治之下。的确，除我们以后要讨论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以外，17世纪是当地国家权威进一步崩溃瓦解的世纪。唯一有权统治它所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波兰王国实际上被称为Rzeczpospolita，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Respublica(共和国)，人们常常把它说成是贵族共和政体。然而，外国政府却经常干扰选举产

生的国王的选择，有时则选择一个非波兰血统的人做波兰国王。17世纪匈牙利的三位国王[加波尔·贝恩伦(Gabor Bethlen)、兹林伊(Zrínyi)、费伦克·拉科齐二世(Ferenc Rákóczi II)]都力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匈牙利王国以承担发生了变化的欧洲形势的重荷”，<sup>67</sup>并且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并力图征集赋税为建立海军作准备。<sup>68</sup>由于匈牙利贵族和哈布斯堡君主的联合反对，他们在1711年匈牙利独立战争失败后达成了相互都合适的永久性协议，因而国王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在匈牙利，贵族的免税权又延长了一个世纪，铜贸易落入了荷兰人之手，而中间人的利润则被哈布斯堡政府投资于奥地利现代型的采矿业”。<sup>69</sup>

在中心区国家，日益上升的新兴阶层，不论是绅士阶层或是穿袍贵族能够指靠国家机器对旧的贵族阶层（特别是对那些在市场中无能为力者）的要求加以抑制，但是在东欧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些阶层力图以“贵族共和政体”来代替强大国家，这是占人口5%~10%的上层社会强调在他们内部实行法律和道义上的平等而强加的体制，尽管这个上层集团内部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和冲突事实上是相当明显的，<sup>70</sup>而且当时的经济困难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和冲突。<sup>71</sup>在波兰，中等缙绅竭力在法庭上获得公平以抵制大庄园业主的欺压或从立法上加以匡正的要求都未能奏效。这些大业主贿赂法庭并且在他们无法控制时解散议会和地方议会。<sup>72</sup>在匈牙利，“缙绅”进行了一次战争但却失败了。在波兰，他们把萨马特人（the Sarmatian）的神话——起初仅仅是为了论证波兰一立陶宛诸王国不同的种族是出自同一个原始的斯拉夫祖先，即萨马特人——重编成一个神话用以说明一个取得征服胜利的贵族阶层的起源，即统治阶级的渊源。<sup>73</sup>那样的话，“缙绅阶层，也只有他们，属于波兰民族，其它据说是不同起源的社会阶层则被排除于民族共同体之外”。<sup>74</sup>作为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和排外主义者，缙绅阶层狂热地而且以极端的方式宣传这一信条，<sup>75</sup>无疑就被加上“狂想自大狂”<sup>76</sup>和“病态夸大症”<sup>77</sup>的罪名。但是如果一个国家

不可能发生“光荣革命”，那么它就只得满足于萨马特主义了，即使它会导致“文化的停滞和创造性心智活动的萎缩”。<sup>78</sup>

世界经济衰退时期使得中心区国家走上了民族主义（重商主义）的道路并在上层社会中采取了宪制上的妥协，结果削弱了下层阶层的反抗能力；而东欧国家的衰弱却意味着它们既不能追求重商主义策略所带来的利益，也不能保证在上层阶级内部达成任何妥协。这样就导致了边缘地区日益尖锐的阶级冲突，<sup>79</sup>地方主义的增强，民族意识的削弱，<sup>80</sup>对国内替罪羊的苛索，<sup>81</sup>以及农民阶层的剧烈动荡。<sup>82</sup>我们看到在南欧旧的边缘地区和美洲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虽然已有所变化。纵览一下基督教地中海地区，仍可以看出同样的模式在17世纪盛行一时，其特点是“商业停滞”。<sup>83</sup>主要出口物的价格下降了。西班牙的小麦价格在1585年以后也下降了，它们在整个17世纪处于停滞状态，葡萄酒、稻谷、油料的价格也一样。<sup>84</sup>西西里丝的出口减少了，1640年以后小麦和葡萄酒的出口也一样减少；但是艾马德(Aymard)认为，出口量的减少由于不断增加的人口所引起的“内部”消费的不断增加而得到补偿。<sup>85</sup>然而，这可能意味着人均谷物产量在下降，这种现象我们在东欧就已经遇见过了。

这种情况如何解释呢？坎西洛(Cancilo)认为，西西里从1573年至1653年是“殖民化的密集性劳动”。<sup>86</sup>达·席尔瓦(DaSilva)说，西班牙一位忧虑的作家在1609—1610年已指出土地滥用现象日益增加，三年轮作制已不再为人注重，因此生产者“正在耗尽地力”。<sup>87</sup>达·席尔瓦说，这种情况导致人们在1570—1630年间寻找新的土地，而这些土地那时也同样耗尽了。土地的“贫瘠化”特别打击了那些小生产者，<sup>88</sup>从而导致进一步的土地集中。这种耗尽地力的过程导致出口能力的削弱，由此引起的土地集中则导致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货币化”，因为“农民和村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无力维持自己的生存而扩大了国内市场”。<sup>89</sup>正当世界贸易衰落时，我们看到东欧的地方市场扩大了。人口也跟着增长。西班牙的

人口减少了——原因在于 16 世纪最后数年中发生的瘟疫和对摩尔人的排斥。瓦伦西亚 (Valencia) 的人口从 1609—1638 年减少了 35%，但是这种“剧烈的人口危机”是经济停滞的结果而不是原因。<sup>90</sup>

关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人口减少了。艾马德认为，西西里只是经历了人口增长的一个“减速”过程（而不是减少）；但是他又说，西西里的数据隐藏着“明显的地区差异”；该半岛被一分为二，北部、东北部和中部处于停滞状态，无法在食物供给上实现自给。<sup>91</sup>人们怀疑此外是否就没有一些隐藏的人口减少的情况。弗灵登认为，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奴隶制的影响范围从 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高峰跌到 17 世纪的低谷，因为非洲奴隶（他们以前由葡萄牙人运到地中海）的贩运转向了美洲，而且土耳其人和其它穆斯林的奴隶的供给更少了。<sup>92</sup>这难道不意味着其它统计数字中未曾注意到的整体人口的减少吗？这种经济的“明显收缩”据说可以说明那不勒斯王国从阿奎拉到萨莱诺一带的地方制造业成长的原因；<sup>93</sup>但是，这种情况不仅对那不勒斯而且对整个意大利以及朗格多克都是属实的。布罗代尔问道，这“能表明对不充分的贸易的令人不快的、广泛的反应吗？”<sup>94</sup>对作为萧条时期真正受害者的乡村小生产者压榨的结果，导致了剧烈的阶级冲突。在谈到 1647—1648 年那不勒斯的农民起义时，埃米俄·塞雷尼 (Emilio Sereni) 认为，它是“农村人口对封建压迫与专横所作出的反应，如今新贵族的商业贪婪又加重了这种压迫与专横”。他说，“与其说是‘封建化的再版’，不如恰当地说是封地的商业化”。<sup>95</sup>经济的萧条、不断增加的对土地和劳动力的压力、土地的集中、土地和劳动力的进一步商业化——所有这些在南欧和东欧一样实际上都是相伴而生的。

现在我们看看西属美洲，这里，“17 世纪的萧条”长期以来一直是主要争论的主题。我们还是先看看作为世界经济边缘地区的主要农业结构而兴起的种植园吧。如何解释和理解这种种植园

呢？它于何时产生的呢？我们已经遇见过一次就 16 世纪的情况发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把这些土地结构说成“封建的”<sup>96</sup>还是“资本主义的”。正如弗雷德里克·毛罗所认为的，可以说西属美洲在 16 世纪和 18 世纪至少“提高了投机者、商人、矿主、城市资产阶级……甚至皇家官僚的重要性”，17 世纪和 19 世纪则代表了“家长制社会”的胜利。<sup>97</sup>从这个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可以看作是与世界经济漫长的 A 周期和 B 周期相联系的两种相互竞争的趋势。因此争论主要关注的是 17 世纪而不是 16 世纪。弗朗索瓦·舍瓦利耶 (Francois Chevalier) 在其著作中描述了“非资本主义的”种植园自给自足的成功，这种成功被认为是世界经济体紧缩的结果：

在 17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白银繁荣的消失，把几乎是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扼杀在摇篮之中。土地成为收入的唯一来源……最大的地产能够自给自足。大的制糖厂、种植园、丰产庄园、冶炼厂及其附属的农场几乎可以全部自给……我们时常回想起中世纪……(大农庄主)实际上已成为贵族；一些人成功地获得了爵位。马克斯·德·瓦伦侯国最后成为勃艮第公国的一件苍白的复制品。<sup>98</sup>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André Gunder Frank) 竭力对 17 世纪墨西哥的农场作了描述，表达了另外一种观点：

17 世纪墨西哥大庄园的发展并非是由经济萧条所引起的向人们所称作的封建农场的倒退，正相反，此时农场得以壮大并蓬勃发展起来，正如拉丁美洲的所有其它时期和地区一样，是因为在国家和世界经济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态使得庄园生产的利润很高。<sup>99</sup>

如果我们更为切近地对这些历史过程进行分析，那么就会有助于我们评价这些相反的观点。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给衰退划定时间。林奇(Lynch)说，墨西哥白银生产的高峰是16世纪90年代，“这以后，繁荣便结束了”。<sup>100</sup>但是，就总的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而言，他接受了肖尼的观点，认为1593年至1622年间出现的只是“主要趋势的逆转”，1623年至1650年间出现了大萧条。<sup>101</sup>在谈到中美洲时，麦克劳德(MacLeod)则把1576年左右至1635年的这段时期称作是“过渡的半个世纪”，并把萧条的时间划定在1635年至1720年间。<sup>102</sup>贝尔特(Berthe)则把墨西哥农业深深的危机定在1630年至1680年之间。<sup>103</sup>最后，梅拉夫(Mellafe)在谈到整个西属美洲，特别是智利时，说“真正的危机是在1650年之后开始的”，并补充说，“卡塔基纳(Cartagena)1595年的衰落对将延续两个世纪之久的残酷的毁灭性的斗争来说是第一个警告”。<sup>104</sup>

像往常一样，学术界有关时间划分的争论反映了现实的复杂性，现实中，衰落似乎在上升周期还没结束就开始了。看来十分清楚，发生在西属美洲的周期性重复(或过渡)时期或许早在16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但在16世纪90年代更为明显，大约在1630年至1650年间便结束了。在这段时期我们所能发现的是主要部门的利润危机以及大业主和投资者通过短期行为弥补损失所做的种种努力，这些短期行为实际上使长期形势更加恶化。这就是所发生的情况。16世纪西属美洲的主要出口物——白银在1590—1630年间达到了一个高峰，此后，数字出现了剧烈和骤然的下降。在此，官方的贸易统计可能有误差，因为存在一种日益发展的不公开的贸易；然而来自矿区的记实性史料似乎表明“生产确实下降了”。<sup>105</sup>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劳动力的短缺所引起的。然而，尽管总人口下降，劳动力价格有所提高，但是矿主似乎仍能得到他们所需的劳动力。在墨西哥，他们采用雇佣劳动，在波托西(Potosi)，他们则从遥远的地区招收强制性劳动力。关键是，即使能够获得劳动力，生产还是下降了，如戴维斯所

说：“的确，在 17 世纪中叶，许多波托西矿区的管理机构不断接收印第安人的货币纳贡以代替强加给他们的 mita 或强制性劳动，宁愿要这种固定的收入也不要采矿可能带来的任何利润。<sup>106</sup>

那么是缺乏水银吗？很明显，在 17 世纪 30 年代和 17 世纪 60 年代之间确实缺乏水银。贝克韦尔(Bakewell)称水银供给的困难是“(白银)产量变化的唯一的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戴维斯认为它们并不具有“决定作用”。<sup>107</sup>问题是为什么 17 世纪的 60 年代比 17 世纪的 30 年代能获得更多的水银。在 17 世纪 60 年代为得到水银所做的一切比 17 世纪 30 年代一定更有利可图。请记住，尽管贵金属的供给在那个时期的价格构成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黄金和白银也(有)它们的价格”，而且“货币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金属体系中，只不过是与其它商品一样的商品”。<sup>108</sup>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同意前述的观点，并且把生产的下降解释为价格上涨的长期结果：

那么，即使白银成本保持稳定，白银价格的稳定难道不意味着利润的下降吗？通货膨胀时期，商品和服务价格提高，换言之也就意味着货币的价值或价格下降了。然而自从白银价格稳定以后，矿主在矿区所生产的难道不是货币吗？这意味着他们既要面临成本的增加，又要面临利润的下降——这足以说明为什么资本家要减少产出，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会把资金投到其它行业。<sup>109</sup>

作为主导部门的贵金属出口的衰落，转而影响了其它的“出口农作物”。关于中美洲靛青的生产，麦克立奥德认为，17 世纪的船运技术的状况为穿越大西洋的初级产品带来了一种不稳定的利润率。“在有利可图的时期，靛青能依靠黄金与白银的盈余生存；在困难时期，(靛青)由于离欧洲太远，因而无法带来持久的利润”。<sup>110</sup>关于靛青的这一观点也可以更普遍地运用。<sup>111</sup>



两个强大的集团很快因出口价格的下降而蒙受损失：他们是控制生产企业的西班牙人和向这些西班牙人征税的国家。税率在16世纪后半叶已经明显地提高；<sup>112</sup>但是西班牙及其帝国经济困境的开始时间正好与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的时期重合（三十年战争紧跟尼德兰起义）。面对减少的岁入与增加的开支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西班牙政府在17世纪之初求助于“无限的铸币”，<sup>113</sup>当这种方法不够用时，它就试图从帝国“挤出最后几滴油水”。<sup>114</sup>因此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政府既增加了税额又竭力更为有效地强化征课手段。<sup>115</sup>事实上这是拆自己的台。当菲利普三世于1620年没收了1/8私运的贵金属时，他事实上直接剥夺了商人的资本；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商人此后再也不愿意把贵金属运回去（无疑是减少白银生产的另外一个因素）。结果，皇室来自 *averia* 的收入，即用来支付皇家卫队的 *ad valorem* 税减少了。为了维持舰队，皇室不得不把 *averia* 率提到更高，如林奇所言，这“进一步引起了欺诈”并且使皇室成为一只“依赖美洲贸易和殖民地的寄生虫”。皇室还通过把更多的 *mercedes* 授与西班牙人而得到补偿。这是一个螺旋式的循环圈。“抢劫和寄生现象使得欺诈和走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sup>116</sup>——而且后两者，正如我们会看到的那样，进一步促进了西班牙的半边缘化进程。

一些克里奥尔人 (*Creoles*) 由于经济困境的影响而感受痛苦并且在政府职务中寻求解决办法，<sup>117</sup>从而增长了国家官僚的寄生性；另一些人则在很好地适应世界市场的变迁。从贵金属到当时主要出口农作物的生产都下降了；然而谷物生产却增加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了混乱。因为美洲的谷物（不像东欧的谷物那样）不是边缘地区向中心地区的出口，因此人们常常认为这种生产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巴赞特 (*Bazant*) 认为正好相反：“大规模的（小麦）生产无疑是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并使用了资本”。他提醒我们，虽然小麦并非被以玉米饼为食的劳工所消费，“然而却有一个可观的市场：城市中的白人”。<sup>118</sup>进一步说，这种生产需要更多的厂

房、畜群、劳动力的食物等形式的资本。

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情况对小麦是属实的，但对玉米却不然。然而这里商业化才是主要的：

开动机器的工人(印第安人)、黑白混血儿、黑奴、印欧混血儿和骡马，雇佣于矿区的全体劳工，都以谷物(玉米)为生。为了供应他们，从16世纪末开始，在矿区周围建立起大片农牧场，特别向他们提供粮食。<sup>119</sup>

这并不是说这些大农场不受到经济上的影响；矿区艰难的时期导致了“艰难的岁月，有时是衰退”，<sup>120</sup>这种衰退由于新兴的富有竞争性的大农庄的兴起而不断加深。然而，应该说市场有一个地区界限，在世界经济紧缩时期，一旦超出这个界限便无利可图。<sup>121</sup>供给小规模市场的农场与供给大规模市场的蔗糖种植园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差异，而这无疑是对此差异进行经典性描述的关键性起源。<sup>122</sup>在地区界限之内，大庄园生产相当有利可图。如果人们愿意，可以称其为自给自足，但是就我看来，更为合理的是，如贝克韦尔所说，它是“在‘新世界’形成一个多样化的(以当代的话来说)、欧洲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而且也是利用这种经济为了中美洲的利益而剥削中美洲富饶资产的结果”。<sup>123</sup>由此产生的利益并不能对中美洲的这个抽象整体发生影响，但是它们的确影响了一个具体的社会集团，就是中美洲的土地所有者。

然而，正如在东欧那样，作为整个的世界经济体的减缓要求密集使用其基本资源(土地和劳动力)以维持利润水平。西属美洲所有地区的印第安人口的急剧减少现在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sup>124</sup>那里流行性疾病起了明显的作用。<sup>125</sup>这种减少既为西班牙的土地所有者提供了机会又使他们陷入了困境。印第安生产者的减少(由于死亡和土地被剥夺)，城市和矿区的西班牙人和印欧混血儿的增加，为大庄园主创造了地区市场和高扬的价格。另一方

面,所有者需要劳动力。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围绕谁积累资本的问题而展开的斗争的关键。资本积累的世界性减缓意味着西属美洲的资本主义部门为了一个减少的经济馅饼而与西班牙的资本主义部门必定要进行激烈竞争。我们已经提过,王室不断增加的税收把剩余财富从美洲转移出来。从以前美洲最活跃的地区新西班牙的角度来看,最痛心的是西班牙王室试图削弱墨西哥与秘鲁和菲律宾的直接联系。毫无疑问,存在着广泛的走私活动,但同样无疑的是,王室的政策“对墨西哥城有严重的反面影响”。<sup>126</sup>

利润方面的紧张关系不仅表现为商路控制权的争端而且表现在劳动力供给的控制权的争端。分配制(repartimiento)<sup>[1]</sup>从16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有效,而从大农业生产者的观点来看它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它相当于强制性雇佣劳动,而劳动者却不是固定的,经常转而保持他们传统的生产活动。<sup>127</sup>劳动力的供给使西班牙的官僚,特别是小镇的警长可以进行调节,他们得到修道士的坚定支持,这些修道士认为它是保护印第安人不受西班牙人掠夺的一种手段。这些“保护者”的利益非常明显,如以塞尔(Israel)在关于墨西哥的阐述中说:

警长……经常利用各种勒索方法,包括以极低的价格强买印第安人的农产品到城市出售获取厚利,从而赚取了大量财富,他们以极高的价格强行兜售商品,从西班牙人那里收取好处费,狡猾地利用分配制……因此印第安人实际上支撑着两种分离的经济,一方面是西班牙殖民者的经济,另一方面是为了警长、修道士以及印第安统治集团的利益而运作的印第安地区的经济。<sup>128</sup>

印第安人的双重负担肯定部分地说明了其人口减少的原因;

---

[1] 早期的拉丁美洲征服者给部下或同辈分赐土地的制度,分赐土地时,连同免费或低价使用土著劳力耕种其土地的权利一并赏赐。——译者

而且它还在经济发生危机之时，对政治制度产生一种不可克服的压力。<sup>129</sup>

1632年，西班牙王室终于在新西班牙矿区以外的地区停止了强制性雇佣劳动。由于连续不断的压力，这样仅仅加快了西班牙土地所有者（现在是 hacendados）吸引名为 gañanes 或 laborios 的永久性劳工的策略。警长们起初的反应是不让这些 gañanes 免除分配制度的约束，这实际上意味着，为了削弱克里奥尔人作为一个阶层的实力，警长们强迫印第安人离开一个克里奥尔人而受制于另一个克雷奥尔人。当皇室采取完全废除强制劳役的策略时，印第安人就越来越可能根本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大农业生产者只有求助于债务劳役偿债制度把劳动力控制在土地上。<sup>130</sup>对土地的剥夺进一步巩固了对劳动力的控制；<sup>131</sup>因此 encomienda 变成了大庄园 (hacienda)<sup>132</sup>，强制性劳动者则成为债务雇农。在以时间为单位计算的报酬方面，工人的处境有可能得到了改善。劳动力缺乏给了工人某些讨价还价的权力；<sup>133</sup>但是，难道他没有为这种高水平的报酬被迫付出工时总量增加的代价吗？实际上，难道不存在劳动强度的增加和实际寿命的缩短吗？他们在这里，如在东欧一样，难道没有以耗尽劳动力资本来维持生产水平吗？

顺序大概是这样的：16世纪末农业商品的涨价和供给的短缺导致了对土地的侵占和生产的加速发展。例如，舍瓦利耶说，牧牛者甘愿“冒着耗尽其牛群的危险而杀掉许多牲畜”。<sup>134</sup>矿主、市民、官僚——简言之，那些组成农业商品地方市场的人们——企图利用价格控制机构控制生产者的利润水平，如阿隆迪加 (alhóndiga)，这是实行固定价格的城市谷仓，但不包括印第安人的产品。<sup>135</sup>较小的西班牙生产者由于受到压榨而趋于破产，如印欧混血儿生产者一样，许多人“跌到了悲惨的农民处境”。<sup>136</sup>相反，较大的生产者规模越来越大，价格下跌时还能扩张。莫纳 (Momer) 揭开了这种表面反常的逻辑的奥秘：

农业丰收时，由于市场规模的局限和物价的暴跌，种植园不得不减少产量。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费心去扩展呢？因为通过剥夺邻居的土地，这些 hacendados 消除了竞争性的生产，并因而强迫那些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转而成为种植园产品的消费者。<sup>137</sup>

这种庞大的所谓自给自足的种植园确实是一种能够对市场力量做出敏锐调节的机制。它能够通过改变利润而缩减或扩大生产，并加速或延缓资源的利用，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农业生产和世界经济间的联系。而且，种植园还是新兴纺织业生产的所在地。它的出现与以后数世纪所熟知的进口替代相似，而进口替代是声名狼藉的世界性收缩的结果。贝克韦尔认为，“大部分贸易可能衰落了，因为新西班牙不再需要欧洲的进口”。<sup>138</sup>于是他得出结论说“新西班牙的经济，远没有遭受 17 世纪衰落的任何痛苦，变得更加健康了”；<sup>139</sup>但是这样就误解了形势。并没有那种可与西班牙经济相匹敌的新西班牙经济。一些西属美洲的企业家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西班牙人与印欧混血人口的增加，白银出口量的减少，以及种植园体制下的劳动规模经济）而把投资特别转到纺织工业的生产，因此损害了西班牙纺织生产者的出口潜力。

世界性紧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衰落。的确，它大概标志着有地方基础的资产阶级企业实力的增强。<sup>140</sup>进一步说，像欧洲一样，关键并不是整个纺织生产中有任何衰退，而是这种生产正转到乡村地区、种植园和印第安人村落，“精致的布匹大部分正在 Obrajes 进行生产”。<sup>141</sup>纺织业也不是唯一发展的工业。铁和铜工业在 17 世纪之初也得到扩大，并为“大教堂门窗上修建带有文艺复兴风格的格栅”提供了材料。<sup>142</sup>当西属美洲主要出口的农作物（特别是白银）在遭受世界市场衰退之苦时，这些旧的边缘地区的生产者则把注意力转到其它的生财之道上去了。他们把他们的生产活动集中在日益发展的地方市场，从跨大西洋贸易的角度来

看，这反映了一种相对的倒退；但是还不能把它描述为自给自足方针的加强。同时，在中心区国家中，高的需求为糖的出口（以及数量较少的烟草）创造了日益扩大的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意味着世界经济纳入了新的边缘地区——加勒比群岛及其周围地区、英属北美洲南部大陆的殖民地。我们必须转而看看这个过程，才能完整地看清这幅图景。

直到 17 世纪初，多数加勒比海岛屿才沦于欧洲人的统治。西班牙人主要占领了特立尼达（Trinidad）的大岛屿以及所谓的大安的列斯群岛（Greater Antilles）[古巴、牙买加、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波多黎各]。他们饲养牛羊，种植一些食用作物和少量的烟叶及蔗糖；但是他们所关注的是控制通往他们在美洲主要关心的地区的商路。突然，在 1604 至 1640 年间，英国、法国及荷兰人侵入加勒比海并占领了所有的小岛。从 1625 年至 1654 年，荷兰人控制了巴西的部分地区。1655 年，英国人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牙买加。1629 年，一些法国海盗在伊斯帕尼奥拉附近的托尔图加（Tortuga）登陆，并在 1659 年完全控制了伊斯帕尼奥拉；不久，他们移师这个大岛的西半部，即今天的海地（虽然法国对海地的统治直到 1697 年才得到正式承认）。从 17 世纪的 50 年代到 1763 年，殖民地瓜分出现了相对的稳定。那么为什么突然出现西北欧列强侵入辽阔的加勒比海的高潮呢？为什么还没有占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就实际停止了呢？为什么 17 世纪特别是 17 世纪的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加勒比海地区，这个海盗的避难所，那个时代“未开发的西部”，“在魅力、刺激性、快速周转的利润以及经常的危险方面比美洲其它平淡无奇的殖民地”有更大的希望呢？<sup>143</sup>

皮埃尔·肖尼说，大约在 1619 或 1623 年至 1680 年间的某个时候（“不可能十分精确地确定”），西班牙的 Carrera 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僵死的官僚机构代替了具有 16 世纪成功的具有竞赛特征的灵活的机制。“从 17 世纪后半期起，从瓜达尔基维尔河通向大西洋的通道已成为几个通道中唯一的幸存者”。<sup>144</sup>肖尼所划定的时

间比当时一些人确定的时间晚。1619年,托莱多(Toledo)大学的圣经教授、西班牙重商主义思想家桑乔·德·蒙卡达(Sancho de Moncada)声称(无疑带些夸张),去往西印度群岛的9/10的商业都由外国人控制着,“致使他们拥有了西印度群岛和陛下的权利”。<sup>145</sup>他基本上是正确的。在重商主义盛行的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重商主义国家,因此,它们转变为半边缘国家,成为中心区强国在边缘地区利益的输送带。关于半边缘地区的情况,我们将在下一章作比较详细的探讨;关于边缘地区,我们必须现在谈谈。

在全面衰退时期,一些领域的经济活动必然要衰退。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经济活动中的衰退,中心列国之间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其中包括抢先控制边缘地区。他们既进行殖民活动,又彼此竭力阻止对方的殖民活动,由此而导致了激烈的殖民战争,而且他们使世界市场有利于比较容易控制的地区而不是不易控制的地区(美洲大陆相对于东欧和南欧更易于控制)。此外,对于衰弱的殖民大国,如果完全占领它们的领土代价太高,就竭力榨出它们的财富;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就主要采取这种方式。<sup>146</sup>因此,世界性衰退开始时,英国、法国以及荷兰都转向加勒比海以抢先占有它。他们对那些容易占领的地区实施殖民统治,然后通过控制贸易,竭力从仍然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控制的地区获取相当于他们在那里进行直接殖民统治所能得到的经济利益,17世纪时这样做的主要方法是走私。

要理解走私活动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必须首先看一下海盗的社会来源。16世纪时,牛羊遍及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岛。一些是野生的,一些则由印第安人控制着,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牧群越来越少,一些则由西班牙人在牧场饲养。我们已经描述过西属美洲的人口变化:印第安人口不断减少,克里奥尔人、黑白混血儿与印欧混血儿的人口则逐渐上升。采矿地区17世纪的衰退使得城市地区较为贫困的克雷里奥人和中等社会地位的黑白混血人与印

欧混血人的就业机会日趋紧张。许多人移居到乡村地区。一些人在日益发展的种植园和大牧场中找到了栖息之处。其他人则没有。那些失业的中等阶层的成员面临着“劣等化”的危险，降到仅仅是食品作物耕种者的地位。然而，在边远地区，他们的确有选择余地。他们成为野生动物的牛仔，为了生存而屠杀他们需要的动物。他们的队伍由于那些船上的逃亡者而开始壮大。荷兰的船长开始与他们做牛皮生意，这就更增加了屠宰率。“显然，这种行为非常浪费”；<sup>147</sup>终于，从殖民者的观点来看，“这种浪费太过分了”。<sup>148</sup>

大约在1640年，西班牙当权者开始努力把这些捕野牛的冒险家从所在岛屿和中美洲的沿海地区赶出去。<sup>149</sup>西班牙人所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杀掉牛群以打击这些牛仔。英国人为了打击西班牙人也加入到这场运动中。就这样，牛群实际上灭绝了，至少从岛上消失了。绝望的冒险家们于是下海成为海盗。但是，如果库拉索(Curacao)的荷兰人、圣多明戈(St. Domingue)(伊斯帕尼奥拉西部)的法国人，特别是牙买加的英国人没有“向这些海盗提供他们掠夺物的安全销路”的话，那么他们绝不可能生存下来。<sup>150</sup>牙买加是战略要地。克伦威尔统治时，英国将该岛从西班牙手中夺了过来，复辟时期，它又成为海盗们的基地，致使他们中的一个成员，亨利·摩尔根(Henry Morgan)升为总督副官，并被封为骑士。只是由于“光荣革命”，海盗才完全灭绝。克伦威尔的目的是要打破西班牙对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垄断。他先进行了外交攻势，失败后便诉诸劫掠。斯特朗(Strong)写道：“克伦威尔是伊丽莎白式的人物。他与雷利(Raleigh)、吉尔伯特(Gilbert)和哈克卢特(Hakluyt)属于一类。西印度群岛远征的整个形象是伊丽莎白式的”。<sup>151</sup>然而，这不仅仅是克伦威尔的政策，因为查理二世时期(Charles II)的牙买加仍然是“国家海盗冒险”的场所。<sup>152</sup>从理论上讲，海盗在1670年英国—西班牙和约中就不受法律保护了，但实际上，它强大的力量至少继续维持到1685年，确切地说，维持到1692年摧毁了庞大的海盗堡垒罗亚尔港的那次地震，最后才在1697年被赖斯韦克和约取



缔。在牙买加，该岛作为一个蔗糖殖民地的角色与作为劫掠和走私基地的角色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矛盾；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心区国家对海盗作为一种原始积累的方法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荷兰人作为一件很实用的事务，开创了走私贸易的模式。与西班牙的战争切断了荷兰通往伊比利亚半岛的航线，因此扰乱了鲱鱼工业所必需的食盐的购买，于是荷兰转而非法购买委内瑞拉盐池中的食盐。这种应急的作法由于世界价格的基本结构而成为永久性政策。联省共和国是一个比西班牙更有效率的工农业生产者。“塞维尔的垄断并不能（向西属美洲）以合理的价格提供充足的商品”。<sup>153</sup>而荷兰却可以做到。因此，走私就成为联结中心区国家的商人与他们不直接控制的边缘地区生产者的一种生活方式。<sup>154</sup>每当西班牙与一个中心区国家的关系变坏，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新的殖民地就会建立起来，“部分地用作海上劫掠的基地”，佩尔斯(Pares)认为，这是对殖民地编年史的部分解释。<sup>155</sup>它也说明，为什么法国经常与西班牙结盟反对英国而最后英国的殖民地却比法国的多。

牙买加代表了走私体系的高峰。它已成为加勒比海走私贸易的中心，“英国人不会停止……西班牙人也不可能制止”这种走私贸易。<sup>156</sup>最初，海盗的存在有助于这个过程。他们毕竟不是真正的海盗，因为他们抢劫的只是西班牙人，而且他们这么做经常有本国政府的授权。<sup>157</sup>但是蔗糖的种植在牙买加越来越重要，西班牙人于1670年最后放弃对殖民地旧的排他性专有权以后，这些海盗逐渐被英国人看作是讨厌的人，特别是随着白人贫民由于种植园的扩大被迫离开牙买加，海盗数量日益增多，不顾后果的冒险之举日益上升时，就更是如此。<sup>158</sup>不再需要海盗了。洪都拉斯湾的生产者乐于与冒着“极大风险把走私商品运入中美洲”的牙买加商人进行直接的接触。<sup>159</sup>

海盗曾进行掠夺。<sup>160</sup>英国人(及法国人)现在却满足于从事非法贸易，因为它同样实现了剩余财富的转移，同时又保证了持续

的生产，而海盗的抢劫活动是无法保证持续的。一旦海盗的根据地被查禁，“就有可能使西班牙种植园主在各岛及沿海地区再次蓬勃发展起来”。<sup>161</sup>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已有可能就所谓的阿先托(asiento)，即“合法”的奴隶贸易直接与西班牙人进行谈判。<sup>162</sup>西属美洲的走私活动只是整个殖民活动中较小的一部分。更大的部分是蔗糖，它长期以来一直是边缘国家的主要产品之一。蔗糖的生产由于不断耗尽地力而逐渐西移，<sup>163</sup>在16世纪后期到了巴西（以及较小程度上到了墨西哥）。17世纪时，它转移到加勒比海各岛。蔗糖不像小麦、家畜和白银，并没有卷入1600年左右的世界经济体的供过于求的困扰之中，这一困扰引起了边缘区向中心区出口的紧缩。糖更像木材，木材是波罗的海地区持续“增长”的作物。它永久的问题是生态环境的枯竭，因此必须发现可开发的处女地；但是利润也很高。<sup>164</sup>

由于中心区国家产生了新的食物品味，随着17世纪的不断深入，对糖的绝对需求增加了。中世纪时，欧洲对甜食的嗜好主要由蜂蜜和葡萄汁（未经发酵的葡萄汁）这两种天然的甜食来满足。如今，发现了新的饮料，并且发明了新式甜食，这种甜食需要加糖才能使它们可口。<sup>165</sup>糖的生产大约在1580年从大西洋各岛大规模地转移到巴西。<sup>166</sup>当西属美洲开始出现长期衰退迹象的时候，巴西似乎出现了一次回升。肖尼解释说，这个“迟到的转折点”大约在1630/1650年而不是1580年出现在巴西，这是因为从1570—1620年期间，巴西不像西属美洲，“仍然可以从初期适度的发展中获利”。<sup>167</sup>在我看来，这样说似乎有些勉强。利用前面讨论过的迅速的生态枯竭与世界需求间的关系不是更容易说明这种扩张吗，而且也更容易得出结论，作为世界经济的一种产品，糖并不像小麦和白银那样容易长期摇摆不定。肖尼发现的1630/1650年的衰退正是再次闯入它自身的劳动生产率降低的一个因素。<sup>168</sup>

总之，当荷兰从巴西的出口达到极大化时，而且在把荷兰人赶出巴西的1645年的伯南布哥起义（the Pernambuco revolt）之前，

正是荷兰的企业家把糖引入巴巴多斯(Barbados)。为什么呢?邓恩(Dunn)对此提出了两个原因:其一,欧洲人对糖的需求很大,大概“只有把巴巴多斯和巴西加在一起才能保证扩大供给”。其二,当“英国的海外贸易受到其国内战争的干扰”时,荷兰人却能从中间人的服务中获利。<sup>169</sup>也许是这样;但是也许还有荷兰人对甘蔗种植园的枯竭问题的了解。<sup>170</sup>选定巴巴多斯而不是其它岛屿,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荷兰人是在寻求最理想的环境。总的来说,巴巴多斯比加勒比海的其他岛屿具有更适宜的气候和更肥沃的土壤,并且从防止劫掠的安全性来说有更好的地理位置。<sup>171</sup>事实上,这些考虑适用于所有早期种植蔗糖的岛屿(巴巴多斯仅仅是同类中的第一位),如谢里登(Sheridan)指出:<sup>172</sup>

在建立种植园方面,小的岛屿起初比大岛有利。从运输和防卫的方面来看,小岛距北欧较近;那些向风的岛屿比背风的岛屿容易防卫;海岸线与陆地面积比率很高,能使大多数种植园与海上船只进行直接的接触。

而且,谢里登还补充说,那里有更多的风力可用来推动风磨,破坏性气候较少,奴隶暴乱和逃亡的可能性也较少。

当蔗糖的生产移到牙买加这个很大的岛屿时,区域扩张的进程停止了,至少对英国人是这样,因为牙买加提供了丰富的土地,而且英国制糖商害怕“任何更大的甘蔗地会使生产供过于求并降低糖价”。<sup>173</sup>从这方面来看,没有进一步地扩张是新生的重商主义势力的表现。法国人在夺取圣多明戈之后的态度也一样。<sup>174</sup>没有必要再进行以牺牲西班牙为代价的扩张,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控制的生产糖的土地面积足够维持一个世纪的生产。但是相互毁灭对方的财产一直是三次英法之间在加勒比海的战争的主要目的,三次战争的时间依序是:1666—1667年,1689—1697年,1702—1713年。如果这种相互的毁灭在1713年以后消失了,那么这是因为到

那时为止，世界需求已经扩大到足以容纳两个国家制糖工业的地步，它们正不断繁荣。“蔗糖种植园主终于发现了黄金国(El Dorado)”。<sup>175</sup>

有意思的是烟草总是糖的可怜的伴随者，起步早，亏损也早。起步早是因为它是一种初来者的作物。它一年内就能长成而且不需要什么特殊设备。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不利，至少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是这样。烟草“耗尽了地力”<sup>176</sup>，而且比糖的耗竭严重得多。它必须在25年左右就换地种植，因此实际上只适宜于在辽阔的岛上或拥有广阔内地的区域如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种植。<sup>177</sup>此外，烟草比糖的世界市场要小而且边际利润也不多。它“不像糖那样适于大农业的发展……种糖在10年内就能致富”。<sup>178</sup>像糖一样，人们认为它具有药性；但是糖在17世纪初时就已是大宗产品而不是药物，而烟草只是在一个世纪、甚至两个世纪以后才成为主要产品。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有两个明显的事实：一是糖有营养价值而烟叶没有，二是不断扩大的糖的消费补充了不断扩大的咖啡、茶、可可的消费。<sup>179</sup>

进一步而言，因为烟草不像糖那样，可以在非热带气候下生长，欧洲许多地方都可以作为农业的替代选择加以种植。蔗糖的生产只能在地中海岛屿上进行，而且它已经“走遍”这些地区。因此，尽管烟草生产引起了土壤的迅速枯竭，但是，世界性的供过于求总是常常发生在烟草生产而不是糖的生产领域。烟草的情况由于多数欧洲国家的政策进一步复杂化，这些国家抓住这种奢侈品作为容易征税的一个税源，实际上通过国家垄断进行征税。可以肯定，各地并非都是如此。联省共和国为适应世界主要的烟草市场，没有强行征税，<sup>180</sup>内地的烟草生产不断发展，尤其是在谷类生产的艰难岁月，更是如此。<sup>181</sup>大多数国家除了对烟草加以管理和征税以外，还力图禁止国内的生产。英国和法国尤其如此。这样作的最可能的动机是为了便于财政的控制。“对进口到伦敦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的烟草征收关税比对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

或格斯肯尼(Gascony)生产的商品(征收)货物税要容易一些”。<sup>182</sup>

起初,政府税收损害了美洲的烟草业。其主要后果是“抬高了价格并限制了市场”,<sup>183</sup>特别是因为强征关税转而助长了欧洲各国内部的生产,因此恶化了西半球生产中的“种种经济问题”及“劳动力和运输的成本”。<sup>184</sup>然而,到18世纪初期,各种因素的综合改变了整个局面。首先,政府对欧洲烟草生产的限制相对来说已取得成功。其次,在西半球的生产商中,切萨皮克谷地(the Chesapeake Valley)的英国殖民地开始生产价格低廉的优良农作物。第三,英国人把各种热带商品(包括烟叶)的转口贸易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经济活动。因此,英国人主要把烟草当作商业收入而不是财政收入来源。<sup>185</sup>在这同时,法国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把烟草税当作一种“主要的国家收入”。<sup>186</sup>1720年以后,由于政府的鼓励,法国成为从英国转口而来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烟草的最大买主,一下购买了总产量的1/4,从而(终于)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繁荣,也促进了生产和商业的日益集中。<sup>187</sup>

在17世纪的最后几年,大概是1692—1695年之间,巴西“发现了”黄金。<sup>188</sup>因而开始了黄金出口的繁荣时期。官方数字表明,黄金出口从1699年的725千克增加到1712年,即顶峰年的14500千克。然而,博克瑟估计,这仅是实际出口量的1/10到1/3,其余部分则进行走私。<sup>189</sup>为什么正好在那时“发现”了巴西的黄金呢?维拉尔认为,巴西“黄金周期”的开端正好与1689年至1713年间战争引起的英国的通货膨胀一致;他正确地指出,能够解释英国商业发展和膨胀的不是这些发现,恰恰相反,“开采新矿的需求和利益”的增长“才能解释‘黄金周期’的开端”。<sup>190</sup>走私贸易几乎不是秘密进行的,而是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把巴西的黄金运到英国,实际上完全避开了葡萄牙的经济。

战争与和平时期,巴西黄金可以装上皇家海军船只运往英国,也可以通过每周一次的法尔茅斯—里斯本(Falmouth—

Lisbon)的定期邮船运往英国。军舰和邮船不受葡萄牙海关及所有其他官方的检查。因此,里斯本的商人,包括英国人和外国人,都愿意用这种手段把他们的黄金汇寄到英国,因为自中世纪以来,葡萄牙就一直禁止硬币和贵金属从本国的出口。<sup>191</sup>

前面提到的那些事件表明,1600—1750年长期的经济衰退并不是边缘地区单纯的衰退。某些从前的边缘区活动(特别是谷物生产和畜牧业)出现了从边缘区移向中心区的重新布局(因此迫使东欧和西属美洲的生产重新转向地方市场),还建立了新的边缘区,对其中一部分地区实行了直接的殖民统治,只生产中心区国家不能生产的商品。这个新建的边缘地区从巴西的东北部一直延伸到马里兰州的广大的加勒比海地区,该地区三种主要的产品是糖、烟草和黄金。联省共和国、英国、法国三个中心区国家分享了这些经济利益——荷兰在1650年以前分得较多,英国只是在后来,特别是在大约1690年以后才分到更多的份额。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新建的边缘地区的阶级形成的过程,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形式。位于边缘地区的资产阶级身兼“商人与种植园主”两种地位。17世纪时,在东欧与欧洲最南端(西西里以及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西属美洲的“旧的”边缘地区,衰退趋势盛行,制造业再次发挥了作用,市场成为地区性市场。因此,如果用集中在一个群体手中的总资本的百分率或者他们活动的利润率或者他们的政治影响(地方性和世界性的)作为一种衡量尺度,那么似乎很清楚的是,商人阶级的重要性与生产企业家即种植园主的重要性相比下降了。许多远距离贸易的消失必然要严重损害商人集团的利益,特别是损害他们与拥有土地种植专供销售的农作物的生产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国际的劳役偿债制度(种植园主对商人)的总的体系随着地区性劳役偿债制度(农民对地主)的发展,也必然地衰落下去。<sup>192</sup>

但是“新”的广阔的加勒比海边缘地区情况如何呢？这难道不是典型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场所吗？值得对正在发生的事进行一番仔细考察，先从理查德·佩尔斯对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属西印度群岛与英国之间的资本投资和资本流量的详细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开始：

因此，可以说是种植园主正在为他自己所受的束缚付出代价。种植园的利润是偿付这些种植园本身所支付的债务的来源。从这种意义上讲，亚当·斯密是错误的；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并不完全出自母国；最初开始的贷款使经济启动以后，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就从西印度群岛本身的利润中产生出来，而且，在一些英国纳税者的协助下，大量的财富在大不列颠永远地安家落户了。<sup>193</sup>

这个体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我们必须清楚，我所讨论的问题不是加勒比海地区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英国的资本积累；问题在于资产阶级的内部冲突是如何影响剩余价值在他们之间的分配以及最后如何从边缘地区流入中心区的。

糖的“利益”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转到了英国。但是，邓恩跳过了一步。他认为，虽然加勒比海的糖种植园主是“大规模经营的企业家”以及“农场主—制造商的综合体”，<sup>194</sup>但是到17世纪末，“遥领所有权日益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sup>195</sup>开始，一般的模式是，拥有少量土地和有限资本的种植园主在他们移居到的一个地区开始创业。他们从居住在欧洲的港口城市如伦敦和迪耶普(Dieppe)的商人那里获得所需要的投资资本。商人不是提供无抵押负担的贷款，而是与小种植园主结成一种伙伴关系（一种合伙人关系，法语称之为同舟共济）。种植园主得到了自己和他的契约奴的迁移费，以及购买工具和最初所需的供应品的资金。商人投下了他的资本并获得商品的报偿。这种制度与投资者作为直接的

所有者，而“种植园主”作为他的“代理人”的关系相反，对商人极为有利，因为这些商人依靠合伙关系“部分地得到了保护以免受到不守信用的代理人的损害——这是所有殖民地企业的主要危险——而这种合伙关系也使种植园主随着企业的发展而获得应有的利益”。<sup>196</sup>

然而，一旦在岛上建立起种植园，由于大规模的生产者面临激烈的世界竞争而具有极大的弹性，从而产生了土地集中。当种植园规模不断扩大时，相对于其商人合伙人而言，种植园主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在有关航海条例的冲突中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重商主义的立法保护制造商和商业再出口商。但它对边缘地区的主要生产者来说几乎没用。17世纪中叶，当英属加勒比海糖的生产相对于其它地区的生产更为兴盛，而英国国内消费比较少的时候，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小种植园主通过北美、荷兰与法属西印度群岛，甚至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商人向欧洲大陆兜售产品的方式来阻止英国商人的活动。18世纪时，这条路线改变了。其它地区糖的生产得到了扩大，英国国内市场价格由于保护而上升，英国人的需求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也增加了。非英属地区的种植园主那时则通过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人努力销售其商品。这样就削弱了英国种植园主的地位，加强了伦敦商人的地位。<sup>197</sup>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加勒比的种植园主相对于大规模经营的商人而言，规模小而且软弱。由于土地的集中，种植园主发展得越来越强大而且取得了岛上的地方政权。<sup>198</sup>更为重要的是，委托制(the commission system)得到了发展；如今种植园主不是商人的“代理人”，商人却成为种植园主的“代理人”。这种委托制度有助于排除以海岛为基地的小商人(他们与英国的大代理商是对立的)。<sup>199</sup>这种制度的另一好处就是减少各岛之间的秘密贸易。1707年时，西印度群岛的势力已相当强大，足以在苏格兰以及通过著名的1732年的糖浆法(Molasses Act of 1732)，在爱尔兰和英属北美洲建立一个“排他性”市场。<sup>200</sup>通过加勒比海种



植物园主和英国商人间的直接联系，委托制度消除了边缘地区的中间商。它把糖的主要市场的位置从加勒比海移到欧洲。委托制度首先出现在与巴巴多斯的糖的生产的联系之中；有两个因素为这种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种植园主通过土地集中不断增强了实力，以及由于他们需要占有更多的利润份额以维持同样的收入水平，由此引起的价格下跌给他们带来了压力。<sup>201</sup>这一制度扩大到其它岛上，到17世纪90年代，烟草生产中也使用了这种制度。<sup>202</sup>它把企业投资的重点从商人转移到种植园主。“种植园主把其产品送回欧洲，通过他的代理人的商人以委托的方式出售，而且这些代理商按照种植园主的货单，再次以委托的方式买下种植园的库存之物”。<sup>203</sup>委托制度并不普遍。英国的蔗糖种植园使用它，法国则不采用。弗吉尼亚烟草生产向这种制度的转变是暂时的，在18世纪30年代，种植园主转回到早期所采用的管理方式。我们必须对三个问题作出答复：其一，这种制度为什么只产生于英属各岛而不是法属各岛呢？其二，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主为什么倒转回去呢？其三，我们如何解释利润归属的转变呢？

在谈到为什么英国人采用这种制度而法国人不使用它的问题时，佩尔斯首先指出戴维斯的解释是，委托制度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大种植园主必须给他们的奴隶支付报酬。在伦敦，代理商能利用汇票进行支付，然后通过寄售蔗糖而得到补偿。委托制度因此为大种植园主——企业家建立了信誉。然而，佩尔斯说，法国的大种植园主对奴隶也需要信誉，而又没有建立委托制度，是其他的因素发挥了作用——即英属岛上的遥领地主比法属岛上的遥领地主产生的更早也更普遍。<sup>204</sup>但遥领地主表示什么意思呢？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成功的企业家利用好的机遇而不断获利，这是他们企业实力的标志。他们的角色已从工头转变为资金的经理；而且由于他们所积累的资本的规模，他们已能够专门从事后一项任务（偶尔也把更多的个人时间用于消费他们的利润）。遥领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制）出现在英属各岛而非法属岛屿，更多地与糖

发生联系而不是与烟草，其原因恰恰在于英国所辖的地区和糖的经营利润较高。<sup>205</sup>

这样就部分地回答了弗吉尼亚烟草种植园主为什么要变回去的原因。由于法国垄断性买主的出现，烟草种植园主不能轻易成为遥领式企业家。法国市场的购买商寻求大规模的供应商，苏格兰西海岸的苏格兰公司自身承担了这一角色。尽管他们到法国各港的航行距离并不更远，但是他们却（比其他英国商人群体）具有优势，因为他们靠近弗吉尼亚而且其劳动成本低（由于格拉斯哥处于半边缘地区）。由于有一个大市场需要供给，苏格兰公司把其代理人遣往切萨皮克谷地（the Chesapeake Valley），避开那些在伦敦有委托代理商的大种植园主，接近那些有信誉的能以商品作为回报的内地较小的农场主。<sup>206</sup>因此，力量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就转回到交换的买方一边。最后，要回答企业风险和利润的方向转变的问题，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债务的含义。由于糖的价格下跌是这种急剧转变的一个因素，佩尔斯认为“企业家的地位并不是种植园主从商人手里夺取的一种自豪而且有利可图的地位，它只不过是商人强加于他的一种卑微而且毫无利益的地位”。然而，这种角色并不是一种卑微和无利可图的角色，如佩尔斯所言：“遥领式蔗糖种植园主，与东印度的富豪一样，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为引人注目的富翁”。<sup>207</sup>

我们把这个事实与另外一个事实，即整个 18 世纪英国种植园主对英国商人所欠的日益增长的债务联系在一起，这难道没有表明又一次的转化，即阻止种植园主向商人转化吗？也许是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金融上的调整。这种对代理商负债的结构只有在制糖工业蓬勃发展之时才发挥作用。然而，很显然，遥领种植园主开始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几乎每次大的债务……都是以欠款或往来帐户上的欠帐开始，而以实物抵押结束……结果……许多西印度群岛的地产证明比他们抵押的数量的价值要少”。<sup>208</sup>我们知道，糖（和烟草）自身都在耗竭着。在商人资助企业的

最初阶段，以及土地集中和种植园主控制利润的实现的第二阶段以后，有没有一个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不可避免的衰落，种植园受到那些没能以同等水平再生产出资本的遥领地主的压榨？可以肯定，这些遥领地主与他们的代理商分享了超额利润；但是这种调整并不是商人占统治地位的前工业时期的范例，而是紧随高度劳动生产率和效益相对好的时期利润形式的范例。<sup>209</sup>

现在，我们必须看看这个方程式的另一端：创造了日益增加的生产效益的劳动力的供给。蔗糖与奴隶制“紧密相连”<sup>210</sup>确属事实。然而，最初开始在加勒比海地区种植蔗糖和烟草时，实际上几乎总是使用契约劳工，而不是奴隶。只是到17世纪末，奴隶才成为这些岛上特有的劳动力，而且只是到18世纪初期，才可以说北美南部大陆殖民地也广泛使用了奴隶。<sup>211</sup>这两种身份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异程度在学者之间存在着用语之争，一派如拉尔夫·戴维斯强调契约劳役是短期的奴隶制，<sup>212</sup>另一派如K.G. 戴维斯提醒我们它仅仅是短期的奴隶制。<sup>213</sup>真正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从长时期来看，使用哪一种劳动力在成本上有利和不利呢？为什么加勒比的早期企业家宁愿要契约劳动而不要奴隶，是不难理解的。首要的而且可能是决定性的原因是最初的资本开销要低得多。那时，必须预付一个契约奴的移居费约5英镑到10英镑，而用一个非洲奴隶得花20至25英镑。<sup>214</sup>即使以后一个奴隶的食物和衣物的开销比较少，即使契约劳动力的开销可在3至4年的时间内分期偿还，但是仍存在着初始资本的周转问题。

当然，必须有可得到的供给。实际上谁来西半球做契约劳工呢？一般而言，这些人很年轻，大多是青少年，是雇佣劳动者以及较贫穷的中产阶层的孩子。他们并没有被强迫服劳役。吸引他们到那些不稳定的严酷环境从事艰苦劳动的是通过劳役会得到一块土地，从而有可能向社会上层流动。有时人们认为他们比非洲奴隶技术上更娴熟；然而就他们的年龄和生活经历而言，这是令人怀疑的。的确，人们可能会提出截然相反的理由。需要花好几年

时间才能把一个工人培养成为有效率的人，而且正当契约劳工“获得某种技术”时，<sup>215</sup>他们就离开他们的雇主。然而非洲奴隶一旦被训练出来就会留下来。当我们说巴巴多斯决定利用奴隶劳动是为了找到“更稳定、更可靠的劳动力”，<sup>216</sup>这难道不是在回答人们所争论的问题吗？

是什么使代理商改变了赞成使用契约劳动的观点呢？首先，由于土壤耗竭引起的耕地转移，再加上土地日益集中，使得“尚未利用的可耕地”已经用尽，<sup>217</sup>再也没有调整余地。因此，奴隶制在蔗糖种植园比在烟草种植园出现的早，而且较早出现在西印度群岛而不是北美洲南部大陆。<sup>218</sup>如果一个契约劳工不期望报酬，为什么他要承受种植园里残酷劳役的痛苦呢？当劳动力供给减少而需求却在增长时，肯定会采用奴隶制。即使此时它“未必是经营蔗糖种植园的最廉价和最有效的方法……它也是唯一的一种可行的方法，尤其是对白人劳工已不再有吸引力的时候”。<sup>219</sup>因此那时奴隶的替代常常与繁荣时期相联系，这并非巧合。<sup>220</sup>奴隶代替欧洲的契约劳工作为劳动力的理由相对来说比较明白。然而为什么是非洲人呢？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作奴隶呢？而且当印第安人（与印欧混血儿）的债务劳役制在西属美洲的多数地区使用的时候，为什么就没有在广阔的加勒比海地区得到利用呢？

事实上，印第安人开始是被当作奴隶的，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在囚禁中死得快”，<sup>221</sup>并且认为“他们无力适应……制糖厂的生活条件”。<sup>222</sup>他们开始时也在智利的采矿业中被当作奴隶使用，<sup>223</sup>但是在1589年以后他们被非洲奴隶代替，梅拉夫(Mellafe)说非洲黑奴是“使(西班牙的殖民地)在智利生存下来的主要因素之一”。<sup>224</sup>在那些使用非洲奴隶代替印第安劳动力的地区，印第安人要么一直主要是猎人和采集者(如在小安的列斯群岛)，要么他们的农业还没有产生明显的阶级结构[如大安的列斯群岛的阿腊瓦(Arawak)或泰诺(Taino)]。正是这些民族“不能适应”强制性劳动而且“灭绝了”。<sup>225</sup>但是，再分配的生产方式已经存在的地区，印第安

人已经有了阶级分化，而且下层人民已经生产出剩余价值，受到上层阶级的剥削。所以能较为成功地以一种改变的方式强迫他们继续为欧洲掠夺者的利益而生产，特别是如果他们以前的领主加以配合的话——从而在新西班牙、危地马拉和秘鲁产生了再分配制度、mita制，最后发展了债务劳役制。<sup>226</sup>

如果非洲奴隶只是在不能成功地迫使印第安人从事这样或那样的强制劳役的地方取代了印第安劳动力，那么奴隶制一定是一种最后的手段；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使用生产商品性农作物的强制劳动 (Coerced cash-crop labor)<sup>(1)</sup>——无论是在农业、采矿业，还是工业中——比使用奴隶的成本要低。<sup>227</sup>那么，只得到他们劳动成果的一部分的“工资”的劳动，例如生产商品性农作物的强制性劳动，怎么会比获得并不慷慨的实物报偿的劳动的成本要低呢？这是因为，假如只是雇主一方初始成本的投入有差别，那么初始成本是能够得到分期偿还的；然而，生产商品性作物的强制性劳工及其亲属在雇主控制之外的土地上生产以食物形式表现的归他们自己所有的那部分“工资”，由此就从雇主的劳动成本中扣除了。这样，使用奴隶劳动的总的经常性劳动成本就比使用生产商品性农作物的强制性劳动的成本要高。<sup>228</sup>

因此，在广大的加勒比海地区，这个1600—1750年间的新边缘区，无产阶级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sup>229</sup>是奴隶制而不是雇佣劳动、租佃关系或生产商品性农作物的强制性劳动。在那个时代的既定政治条件下，奴隶制对资产阶级生产者来说是经济上最理想的选择，他们通过法律制度和市场在该地区建立了这种基本的生产关系。

## 注释

1 参见沃勒斯坦(1974, pp. 269~271)。

2 在威斯让斯基(Wyczanski)的著作中，对波兰的这种顺序作了很好的描述(1967)。至于该顺序的前半部分，古尔德认为“农民对价格下跌的大量的

(1) 指类似农奴制的强制性劳动。——译者

不同层次的反应是扩大，而不是缩减生产，努力把总收入保持在一种可以接受的常规水平上”(1962, p. 332)。

3 威斯让斯基(1967, pp. 68—69)。

4 帕赫(1970b, p. 254)。

5 齐曼伊(Zimanyi)(1973, p. 327)。

6 马特杰克(Matejek)(1968, p. 210)。

7 托波尔斯基(Topolski)(1971, p. 62)。参见表 4.1 中库拉(Kulta)对不同阶层的贸易条件的罗列。库拉对托波尔斯基的评论可以在 1970, pp. 164—165, 以及 p. 164 中找到。库拉甚至接受了 1650—1700 年这一小分期的推断。

8 博古茨基(1972, p. 1)。

9 马恰克和博古茨基, 在巴兹著作中作了引证(1970b, p. 258)。同时参见马恰克(1970, p. 139, 表 16)。

10 马恰克(1975, p. 3)。

11 博古茨基(1972, p. 4)。地方钱商也反对这种措施, 因为他们分享了国际投机者的利润(p. 5)。

12 博古茨基(1972, p. 13)。

13 朱特克威齐(Zytkowicz)发现, 在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希米亚, “农家耕种产量普遍降低”, 但是 1655—1750 年与 1500—1655 年相比并不特别低(1971, p. 71)。斯利彻·范巴思发现, 17 世纪时, 东欧出现了“停滞甚至衰退”。对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俄国来说, 他认为, 在 1600—1649 年以及 1650—1699 年期间从 4.3 下降到 3.9(1969, pp. 175—176)。马恰克对朱特克威齐 16 世纪的低数据表示怀疑(1976b, p. 23), 并且认为的确存在着下降, 它“在 16 世纪的前半期就已经很明显了”(1968, p. 77)。威斯让斯基指出有一个领地从 1569 年的 4.8 下降到 1615 年的 4.1, 1660 年为 4.4, 1765 年为 3.2(1960, p. 589)。托波尔斯基认为有一个总的下降, 从 16 世纪末的 5 左右降到 18 世纪末的大约 3—4(1974a, p. 131)。斯兹杰尔斯基(Szczygielski)使用了最激烈的语言。他认为, 波兰的产量在 15 和 16 世纪的欧洲是最高的, 然而在 17 和 18 世纪则是最低的(1967, pp. 86—87)。

14 帕赫(1970b, p. 262)。

15 马恰克(1968, p. 77), 他认为“毫无疑问, 农场规模的缩小引起了市场剩余产品量的收缩”(p. 78)。

16 斯兹杰尔斯基(1967, p. 94), 他说木材的采伐也一样: “17 世纪期间,

不顾后果的采伐导致了森林的荒芜”(p. 97)。

17 莱斯纳达斯基(Lesniodarski)(1963, p. 24)。

18 埃贝尔(1973, p. 251, 图 45)。同时参见斯利彻·范巴思,他认为出口的高峰是在 1617 年(1977, p. 87)。

19 让南(1964, p. 320, p. 322)。这在贸易的另一方得到了证实。在谈到苏格兰进口波罗的海的小麦时,斯莫特(Smout)和芬顿(Fenton)发现,17 世纪中叶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即进口剧烈下降——他们以“英国和爱尔兰的供给商部分地取代波罗的海的供给商”来解释这一事实。他们还说,实际上,1675 年至 1685 年期间,苏格兰的粮食“甚至运往波罗的海”(1965, p. 76)。

20 马凯(Makkai)(1971, p. 483)。同时参见普里克勒(Prickler)(1971, pp. 143~144)。威赛(Wiese)就“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前”的欧洲牲畜贸易的总的情况用了同样的术语(1974, p. 454)。

21 马恰克(1972, p. 679)。马恰克说“牲畜,包括挽畜(大部分是牛,也有马)出现了灾难性的减少”,从 1549 年每百公顷农民土地上的 77 头下降到 1630 年的 53 头,此后一直有持续下降的趋势(1976b, p. 23)。

22 埃贝尔认为,丹麦牲畜的出口在 17 世纪受到“削减”(1973, p. 249)。同时参见格拉曼(1977, pp. 236~237)。

23 帕赫(1968, p. 316)。威赛的观察可以证实巴赫的论点,威赛认为从 1640—1820 年,德意志各地的肉类价格都不如黑麦价格有利(参见威赛,1966, p. 105)。匈牙利和波兰的牲畜出口到南德意志各城市,但是,丹麦的牲畜则大部分出口到荷兰(参见格拉曼,1977, p. 216, p. 233)。

24 参见帕赫(1970b, p. 257)。

25 费伯(Faber)(1966, p. 131)。托波尔斯基认为,17 世纪波兰粮食出口的下降是由于生产率的下降引起的,因此是一种“带有比较”的利益的下降(1974c, p. 435)。我们则认为恰恰相反——其它地区小麦产量的增加间接地引起了波兰生产率的下降。

26 齐曼伊(1973, p. 330)。

27 柯伦贝兹(1974, p. 262),以及弗拉兹奥威(Vlachovic)(1971, p. 626)。也有来自日本和智利铜币的竞争(巴兹,1970b, p. 257)。

28 有关瑞典入侵对波兰的影响,参见巴拉诺斯基(Baranowski)等人(1966, p. 79)和杰斯特诺娃(Gieysztorowa)(1958);关于匈牙利,参见马凯(Makkai)(1971, pp. 493—494)和瓦尔科尼(Varkonyi)(1970, p. 272);关于丹麦,

参见乔格森(Jorgensen)(1963, p. 79)。

29 齐曼伊(1973, p. 309)。

30 朱特克威齐在比较了17世纪农民农场的生产率和马索维亚(Masovia)的大地产之后,把这当作他暂时的结论。“不管怎么说,这种(领主)制度出现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它生产了较多的食物,而是它能够使封建土地所有者阶级增加收入”(1968, p. 118)。然而,克雷利(Kirilly)在研究了匈牙利的谷物生产之后,认为18世纪前半期有一个“转变”：“与以前的数世纪相比,领主的小麦从此以后有了更高的产出率”(1965, p. 621)。

31 托波尔斯基认为,在17世纪中叶的毁灭性战争以后,保留地的产量最后都能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农民的土地却只能恢复到以前生产的60%~65%(1967, p. 114)。对于格涅兹诺(Gniezno)地区来说,他认为保留地的全部面积在16世纪初时只相当于农民土地面积的13%,16世纪中期时为16%,16世纪末期时为20%,到18世纪时为25%(1970, p. 90)。拉森斯基(Rusinski)认为,“农民平均土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中部和南部地区,开始于16世纪,17世纪时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了贫困”(1972, pp. 112~113)。

由于战争,卢特克斯基(Rutkowski)把17世纪中叶看作一个转折点:“农民较大的农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较小的农场……或是由Closiers, Chatupnicy或日工/交租者耕种的小块土地”。他谈到了“农村人口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以及“农业生产的绝对集中”(1920b, pp. 119~120)。后来的波兰历史学家虽然对卢特克斯基的因果解释(有关战争的因果解释)提出了异议,却没有对这些考察结果提出异议。参见在杰罗斯基(Gierowski)著作中引用的各种研究结果(1965, p. 244)。

32 斯皮兹(Spiesz)把捷克的时间定在1620年,但是他说,在摩拉维亚,领主的土地与农民的土地的比率大致一样(1969, pp. 43-44)。勒姆(Lom)认为,波希米亚从1650至1750年间,“土地集中日益增加”,大庄园的百分比也有所增长(1971, pp. 9~10)。梅德里克(Mejdricka)说“可以在17世纪后半叶发现使用强制劳动的大领地的大规模扩张”(1971, p. 394)。

33 尽管达恩斯多夫把这看作是发生在18和19世纪的一个过程,“但是,人们还是能在17世纪看出领主保留地(gutsherrlichen Wirtschaften)的规模有所扩大”(1950, p. 115)。

34 马恰克(1972, p. 673)。德沃扎兹克(Dworzaczek)认为,在这同一时期,大业主逐渐扩大了小贵族的领地(参见1977, p. 159);而在16世纪,拉森



斯基认为，“富裕农民向其贫穷邻居购买土地促成了土地向他们集中的趋势”（1972，p. 104）。有关富裕农民的作用，参见马洛维斯特（Malowist）（1972，pp. 203—204）。

35 帕赫（1970b，p. 261）。在波兰，只有几个地区还残存着永佃权。在其中一个地区，旧普鲁士的埃尔布拉格（Elbląg）附近地区作出解释时，朱特克威齐说，之所以能有这种例外，是由于“靠近发达市场，较随意地处理剩余产品以及通往市场的廉价运费”（1974，p. 251）。

36 库拉（1961，p. 138），同时参见朱特克威齐（1968，p. 109）。

37 库拉（1970，p. 91）。

38 库拉解释了他取得这些数字的方法，并且承认“这些结果肯定被夸大了”（1970，p. 94）。

39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是真的。歉收时，物价高涨而且需要大量强制劳役。马恰克说：“我猜想，至少在某些领地，地主常常在歉收的年月更为苛刻地压榨佃户，虽然他们也在营救那些奄奄一息的人……这是从（1550年至1695年间有关一块领地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即在歉收的岁月——价格上涨时——公爵领地的管家会从佃户身上榨取相对多的谷物”（1975，p. 16）。会有一种曲线关系吗？当物价相对高涨时，因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就需要更多的强制劳役；因为农民宁愿为高价市场生产自己的产品，所以他们不会对工资作出反应。当物价相对低时，因为需要更多的非雇佣劳动，因此需要更多的强制劳动。当物价平稳时，对强制劳动的需求降到最低点。强制劳动不断变化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出现长时期的物价上涨和下降时它会持续地成为一种手段。

40 库拉说：“投资于（物质设备和劳动）的决策不是来自市场条件的改善……而相反是因为它的恶化，这样说实际上并不荒谬”（1970，p. 35）。他说这是非资本主义行为；但是在20世纪的经济停滞时期，多国公司不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吗？

41 即使在贵族没有被迫把产品完全卖给商业巨头的时候，由于普遍缺乏现金，使“商业巨头成为地主阶级的银行家，并使他们获得额外的有利地位，银行家总是对顾客拥有这种有利地位”（马恰克，1968，p. 88）。

42 勃格卡（1975，p. 147），他谈到收藏珠宝、贵金属以及硬通货的情况；但是其动机与囤占土地是一样的，即为了免遭剧烈通货膨胀的危害，这两类储备都被用来支持她的结论：“这种贮藏……无疑对国家的经济会产生不利

的后果,因为大量的资本被冻结了许多年”(p. 148)。

43 帕赫(1962,p. 234)。

44 由于认为农民不会对世界市场作出反应,库拉认为,资本核算的方法并不适用于这种“企业”(1970,p. 27)。艾基利斯(1959,pp. 51~52)同样怀疑农业生产是否在16世纪和17世纪确实对价格作出过反应。他们两人都没有在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大地主与农民或半无产阶级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

45 斯皮兹(1969,p. 61)。梅德里克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即波希米亚与波兰和德意志在市场的地理范围方面是有区别的:“捷克的农产品和原料市场仅限于国内各个地区间的交换,以及一定程度上与邻国的交换”(1971,p. 401)。

46 克拉科(Cracow)“表明它作为地区市场比作为洲际市场要持久得多,也稳定得多”(迈勒基[Malecki],1970,p. 119;同时参见1971,p. 151)。“在17世纪后半叶……波兹南贸易逐渐有了新的生机,但却仅仅是地区性的市场了”(格鲁兹(Grycz),1967,p. 55;同时参见1971,p. 119)。

47 马恰克提醒我们说“波兰虽然穷,但她给其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利益。与其他现代早期的国家相比,波兰没有经历过真正普遍的饥荒”(1972,p. 678)。马凯认为“东欧地区的农民比法国、德意志以及意大利的雇佣工人的营养还要好,但是又不如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日益发展的西欧国家的工人”(1974,p. 207)。关于后者,他特别列举了英国和麻省共和国。因为对于法国,他唯一引证的是勒·鲁瓦·拉杜里的著作,所以他所说的符合法国南部的情况,但是法国北部属于“日益发展的西方国家”。以这本书的话来说,他认为,半边缘区乡村工人的处境要比边缘区糟,这大概是因为后者更能保持比较稳定的谋生场所。

48 参见马恰克(1972,p. 677)和卢特克斯基(1927b,p. 122)。兹安特拉(Zientara)认为,17世纪时,大规模的铸铁业中引进了强制性的农民劳动(参见1971,p. 284)。卢特克斯基说,18世纪的税收不如17世纪的高(1927a,p. 89)。从另一方面来看,卢特克斯基可能估算错了。库拉指出,增加农民税收的一种方法是提高对农民征税的小麦的估算。克拉科地区1蒲式耳(bushel)在16世纪时是26.26升,18世纪时是43.7升;在华沙,16世纪时是52.5升,19世纪时是64升(1962,p. 279)。

波兰贵族表明他们是资本主义机制的老练的操纵者。他们认识到,这样

重新确定度量单位对他们作为收租者有利而作为销售者则不利。因此，他们决定使“专用于出口的批发度量单位稳定下来并较早地统一起来，而用于税收支付的零售度量单位——蒲式耳——继续扩大。其结果是，经过一段时期以后，the laszt 折合的蒲式耳越来越少”。应该说，这也是在日益下跌的价格市场上维持利润水平的一种手段。

49 参见吕特格(Lütge)(1963, pp. 123~127)。

50 参见马凯(1963, p. 41)，他说，它主要适用于小麦的生产，“因为在牲畜饲养和葡萄酒生产方面，强制劳役(Fronar-beit)由于技术上原因不如小麦生产中的作用大”。然而，17世纪匈牙利的谷物生产还是增加了——或许是因为它受惠于强制劳役。参见克雷利与济斯(Kiss)(1968, p. 1235)。

51 马洛维斯特认为，波希米亚强制劳役的不断加剧“主要是在1621年哈布斯堡在比亚·格瓦(Biala Gora)(白山)取得胜利后以及波希米亚在三十年战争中所遭受的蹂躏造成的”(1974, p. 344)。同时参见克利玛(1957, p. 87)，卡夫科(Kavke)(1964, p. 58)以及莱特(Wright)(1966, p. 14)。

52 参见斯特凡内斯库(Stefanescu)等人的观点(1962, p. 56)，他把勒索的日益增加划在17世纪晚期。

53 参见尼尔森(Nielsen)(1933, p. 153)。同时参见唐尼森(Tonnesson)(1971, I, p. 304; II, pp. 719~720)，他坚持认为，“把丹麦看成东方类型的一个范例”是合适的(II, p. 719)。关于挪威以及丹麦的一部分地区还存在一个问题。大多数挪威农民在17世纪末期获得了自由。参见约翰森(Johnsen)(1939, pp. 392~393)。唐尼森解释说，“在贵族弱小的国家，保持农民大众保卫国家的忠诚，以抵抗邻国瑞典，对于(丹麦王权)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971, I, p. 311)。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波兰的乌克兰地区也应该显现出同样的情况。波兰人应该维护乌克兰农民的忠诚，使他们能够抵制俄国人的甜言蜜语；而我们知道这根本不是他们的态度。大概反而是由于挪威缺乏出口作物，而且当初就没有发展出口作物的愿望，才能说明挪威人与乌克兰人态度的差别。

54 拉森斯基(1974, pp. 40~41)。

55 拉森斯基(1960, p. 420)。

56 参见拉森斯基(1972, p. 112)。

57 卢特克斯基认为，17世纪中叶，“雇佣劳动与强制劳动一起在领主保留地的组织中，发挥一种比以前更为重要的作用”(1926, p. 473)。库拉也认

为：1650年以后，“由于战争加剧的农业人口的流动增加了雇佣劳动的供给”（1970,p. 152）。

58 卢特克斯基(1926,p. 503)。

59 卢特克斯基(1926,p. 486),他说“当时的政府无力引进一种绝对的、不会经常遭到抵制的附属于土地上的农奴制”(p. 485)。库拉也认为“大量的农民背弃领主,贵族面临这种现象束手无策”(1961,p. 145)。

60 马洛维斯特(1972,p. 215)。

61 “商品和货币的封闭式流通使垄断性地主获得了大量的利润。他在其地产上建立起工匠工场以满足他本人和农民的需要”(马恰克, 1972, p. 672)。罗斯特瓦洛斯基(Rostworoski)指出,大地产(latifundia)实际是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小王国:“一个商业巨头,以他自己的运输工具和自己的经纪人,把一大片农业地区的出口和进口贸易集中在他自己的手中。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自由,只有一种强制和垄断的制度……这些条件导致了大地产制造业的创立”(1968,p. 307)。莫兰达(Molenda)认为,铅矿区的控制权在17世纪从克拉科商人转到那些由于税收方面的特权可以以较低成本进行冶炼的大业主手里(参见1976,p. 169)。还因为比较容易获得强制劳役吧?

62 关于波兰的情况,参见斯兹杰尔斯基(1967, p. 97)以及库拉(1970, pp. 102~103)。关于匈牙利的情况,参见帕赫(1962, pp. 262~263)以及马凯(1963,p. 41)。

63 朱特克威齐(1972, p. 149);同时参见斯利彻·范巴恩(1977, p. 116)。列斯克耶维奇(Leskiewicz)认为,在波兰的皇家领地上,酒精饮料收入的百分比从1661年的0.4%上升到1764年的37.5%,而农业产品收入的百分比却从59.6%降到38.2%(1960,p. 414,表Ⅲ)。

64 罗斯特瓦洛斯基,在论述18世纪中叶的形势时说,“波兰的大业主被认为是欧洲最富的人,仅次于英国的贵族”(1968,p. 291)。这部分是因为在萨克逊—波兰联合的宫廷中能够获得待遇优厚的闲职,但是在17世纪却不是这样。当然,他们不可能突然从赤贫变为巨富。

65 马洛维斯特说,生活在领主和教会贵族宫廷里的年轻贵族,在17世纪上半叶充当“贵族的地产,特别是大领主招募的军队中的管理人”(1976, p. 15)。马恰克认为,特弗雷罗珀“对王室宫廷挥霍的评论同样适用于波兰大业主的庭院”(1975,p. 33,p. 16)。这样无疑说明了卢特克斯基的观点,即在17世纪和18世纪,生活在王国主要城镇的贵族的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

(1927b, p. 153)。

66 马凯(1974, p. 198)。马恰克同样认为,这并不代表“中世纪道路的延续……旧的和新的地主上层的成员……现在比以前需要更多的贵族的家臣”(1975, p. 10)。克威斯基(Kowecki)(1972, p. 6)指出,波兰和匈牙利(还有西班牙)的贵族,比起法国的贵族规模要大。他给出了下列数据:波兰的贵族占8%~10%(占波兰族人口的16%);匈牙利为5%(多于资产阶级);法国为0.7%(如果把教士包括在内则为1.0%)。

67 瓦尔科尼(1970, p. 279)。

68 瓦尔科尼引用兹雷伊(Zrinyi)的话说:“没有军队,国家便不得安宁,没有恂俸便没有保卫国家的军队,没有赋税也就没有供养军队的恂俸”。(1970, p. 281)。

69 实际上,自从德意志南部的资本家被赶走后,荷兰和其它国家在整个世纪都企图获得这种贸易。瓦尔科尼把17世纪时在旅行中侦察地形的早期西方的“旅游者”看作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侦察代理人”(1970, p. 275)。

70 瓦尔科尼(1970, p. 299)。我们今天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那种外国入侵,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马恰克描述了波兰的类似现象。波兰出口贸易的中心当然是享有相当自治地位的格但斯克;对国王而言,“格但斯克的公司起到了一种类似大业主的作用”(1976b, p. 12)。瓦拉蒂斯格四世(Wladyslaw IV),在瑞典战争(1626—1629)后的“一片吹呼声”中登上王位(塔兹伯尔[Tazbir], 1968a, p. 235)。他力图加强王权。马恰克讲述了所发生的事:“就在瑞典人和波兰人于1635年在斯坦姆斯多夫(Stuhmsdorf)签署条约之后,波兰国王力图从关税中获得一份(格但斯克的)岁入,并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丹麦军人阻止了这位国王继续逞强,格但斯克在关税方面的城市主权保持不变”(1976b, p. 14)。

71 卢特克斯基描绘了上层贵族,即庄园主(panowie)或大业主、中层贵族以及小贵族之间的差别。后者没有农奴;他们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实际上就是农民,其收入可比得上富裕农民。此外,还有一个小贵族的小分支,称为交租贵族,他们从庄园主那里租佃土地,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1926, pp. 498~499)。

72 大业主与乡绅之间的古老的区分总是潜存着,但在农业繁荣和社会平等的年月已经被人们忘却了。在17世纪,这种区分重新流行起来。在这个世纪,在立陶宛和乌克兰兴起了大地产,它不但加强了大地主的地位,还产

生了一个庞大的小乡绅阶层，他们情愿为大业主效劳，并帮助大业主摧毁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旧的结构(勃斯威尔[Boswell], 1967, p. 159)。换句话说，与已经提到过的委托人(Clientele)现象相联系的贵族的膨胀，增加了依附于大业主的小贵族的数量，因此日益威胁到要求与大业主平起平坐的中等贵族和旧的小贵族的权利。

在匈牙利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萨特马尔(Szatmár)和约时期(1711)，大约有200至300名大业主和25000名乡绅，每个人在国会中都有一席之地。“这是大业主的全盛时期，以前从没有一个匈牙利寡头统治集团享有过那样的机遇：不是(再分配结束后)获得财富的机遇，而保存财富的机遇……(大业主的田庄)很大一部分位于从土耳其收复的地区，是已经解除了劳役负担的。那些田庄的所有者能够把它们当作‘基督的’土地，对任何国家都不承担任何义务。因此，他们的生产成本极低，低得足以使他们进行利润丰厚的资本投资，这种投资有时会使他们得到10倍的报酬”(马卡特尼[Macartney], 1967, p. 129)。

73 塔齐比尔(Tazbir)(1968b, p. 259)。

74 塔齐比尔(1968b, p. 264)。有关立陶宛和罗塞尼亚(Ruthenian)的大业主在语言和宗教上的“波兰化”的必然性，参见克尔斯登(Kersten)(1977, pp. 125~126)。

75 17世纪时，Fr. 沃斯爱兹·德波尔爱斯基声称“波兰人是亚当(Adam)与夏娃(Eve)的直接后裔，因此，他认为他们是最古老的民族，注定要统治世界”(塔齐比尔, 1966, p. 20)。

76 塔齐比尔(1968b, p. 265)。

77 P. 安德逊(P. Anderson)(1974a, p. 292)。

78 罗斯特瓦洛斯基(1968, p. 302)。1658年瑞典的征服造成物质和文化的毁灭之后，华沙作为一个“萨马特(Samate)”城重建起来，而且“东方化”了——它的资产阶级毁灭了[参见汤姆基耶维兹(Tonkiewicz), 1967]。罗斯特瓦洛斯基讽刺地谈到华沙：“首都的衰败对文化生活特别有害。萨克逊时代的华沙不仅没有履行艺术和文化保护人的义务，也没能成为一个社会生活的中心……波兰成为一个大的行省，文化生活在羊肠小道上散漫地飘荡”(1968, p. 302)。

当奥古斯都三世(Augustus III)在1733年把萨克逊和波兰联盟的宫廷迁移到德累斯顿时，什么也没有留下。“直到那时，尽管对君权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君主仍然是联邦政治机构的拱心石，而且宫廷一直是国家文化生活

的一个重要机构。奥古斯都二世雄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以后，波兰—萨克逊联盟把波兰的那个地位剥夺了。（罗斯特瓦洛斯基，1968，p. 275）。

79 “（17世纪波兰的）货币问题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各个集团之间阶级仇恨和对抗的复发，这又演变成为各个派别之间的残酷斗争”（勃格卡，1975，p. 152）。同时参见斯利彻·范巴恩：“在整个中欧和东欧，这是一段频繁发生农民战争与起义的时期”（1977，p. 122）。

80 参见塔齐比尔：“17世纪时，民族观念——作为一个种族单位——受到极度主观的、以萨尔马特神话为依据的贵族民族（*nation nobiliaire*）观念暗暗地推进。……反宗教改革的胜利在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里西亚）不仅表现为几乎完全使用拉丁语，而且还有受教会支持的日耳曼化的推进……萨尔马特民族概念的胜利助长了波兰各地特有的地方主义的复兴。17世纪时，马索维亚重新展现了它的特性”（1966，pp. 14—15，p. 20）。

然而，罗斯特瓦洛斯基认为：“尽管其中央政府有局部的瘫痪，甚至萎缩，但是，联邦内并未产生地方分离主义。农民大众与自治市民之间的深刻差别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仍很突出，但是，‘乡绅民族’变得越来越具有统一的面貌。罗塞尼亚贵族波兰化的过程已经完成（1697年在法律文件中消除了罗塞尼亚）。由成千上万个家庭关系联结在一起的波兰，立陶宛和罗塞尼亚乡绅，同化成为一个庞大的贵族兄弟家庭”（1968，p. 297）。然而，问题是“大业主”在多大程度上会鼓励这种波兰意识去抵制地方主义倾向。

81 趁着16世纪的扩张大批涌入东欧的犹太人到17世纪时成了衰退的替罪羊。参见威恩里博（Weinryb）：“在16和17世纪，很多犹太人已经定居在〔波兰〕的乌克兰地区……大量的犹太人作为村庄或整个城镇以及小客栈的租借人，并且作为贵族和王室领地的收税人，起到了一定的经济作用。租借经常与某些权力的行使联系在一起，包括对不同人口阶层的司法权力的行使。这些活动与权力可以说把犹太人置于波兰地主的地位，以致他们往往成为乌克兰“下层”居民（如编年史家汉诺弗〔Hanover〕所称的那样）实际上的领主。这样，犹太人就相当于波兰的贵族了”（1973，p. 185）。威恩里博通过波兰贵族在瑞典战争中的损失，特别是克拉科（Cracow）地区财产的没收，详细描述了替罪羊的情况（1973，pp. 190—191）。

P. 安德逊认为，波兰东部和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种族层次包括波兰（或同化了的立陶宛）的地主贵族和非波兰籍的农奴，他们在宗教上信奉正教，讲白俄罗斯语或罗塞尼亚语。（而且正如我们从威恩里格那里所见到的那样，还

有作为中间层的犹太人)。安德森提醒我们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殖民”环境(1974a, p. 285);应该补充的是,困难时期的殖民环境助长了种族集团之间的冲突。

82 塔齐比尔谈到了农民对劳役工作日数量增加的反应。“农民的反应是大批的出逃,拒绝工作,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武装抵制。除了1651年的农民起义以外,还有在克拉科省督管辖地(1669—1672)的西南部、帕德黑尔(Podhale)、科尔比(Kurpie)(在普鲁士公爵领地的边缘)等地的王室地产上以及波德拉西(Podlasie)的苏拉兹(Suraz)地产上所发生的多次起义”(1968b, pp. 258—259)。此外,乌克兰还不断出现“哥萨克问题”。参见塔兹伯尔(1968a, pp. 237—241)。

在匈牙利,存在着反对外部势力的“民族主义”斗争,农民在绝望中被匈牙利的乡绅—资产阶级拖入了这场斗争。从1704年至1706年,拉科齐(Rakoczi)在反对贵族和哈布斯堡家族的斗争中通过解放农奴并且武装他们从而加强了实力(瓦尔科尼,1970, p. 292)。人们能想像出农民并没有很快地放下武器。

83 布罗代尔(1956, p. 196)。

84 关于瓦伦西亚的情况,参见卡斯特罗(Castillo)(1969, pp. 251—252);关于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的情况,参见庞索特(Ponsot)(1969, p. 105)。威特曼(Wittman)把西班牙农业的衰落与匈牙利农业的衰落作了比较(1965)。

85 艾马德(Aymard)(1971b, p. 440)。

86 坎西拉(Cancila)(1969, p. 25)。

87 达·席尔瓦(Dasilva)(1964b, p. 244)。

88 达·席尔瓦(1964b, p. 248)。

89 达·席尔瓦(1964b, p. 250)。

90 卡斯特罗(1969, p. 242, p. 247, p. 273)。人口的减少也反映了压制迁徙的作用,它结束了来自法国南部的移民潮。参见纳达尔(Nadal)和格拉尔特(Giralt)(1960, pp. 83—84, p. 198)。

91 艾马德(1968, p. 222, 同时见 1971b, p. 427)。关于那不勒斯(Naples),见彼特拉科恩(Petraccone)(1974, pp. 40—41, p. 51)。

92 弗灵登(1963, p. 37)。拉科埃(Larquié)认为,17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南部的奴隶制同样衰落了,而且到18世纪也消失了。他认为这是由疲弱的经



济形势造成的。“最后，商业流通混乱了，西班牙的经济困境影响了消费阶层；渐渐地，他们节制了对奢侈品的渴望”（1970，p. 55）。虽然他认为使用奴隶是一种奢侈，但是他认为许多奴隶是“王室奴隶”，用于港口的维修，还用于阿尔马登(Almadén)矿区以及大型帆船上(见 p. 67)。这几乎不是奢侈的用途。经济紧缩时期，在旧的边缘地区，奴隶与强制劳役相比，难道不是一种更为昂贵的劳动形式吗？(在后面论及加勒比海的奴隶制时将讨论这一问题)。

93 艾马德(1971a, p. 11)。

94 布罗代尔(1956, p. 194)。

95 塞里尼(Sereni)(1961, p. 195)。这时，意大利南部根本不存在附属于土地的农奴。“再次封建化”，在这里也如在东欧那样，意味着(西班牙)政府相对于地方拥有土地的贵族而言，其权力正在衰落。参见维拉里(Villari)(1962, p. 260 以及 1963 和 1965)；同时参见维万蒂(Vivanti)(1974, p. 422)。

96 查尔斯·弗灵登的解释是：“封建”土地占有制不仅引进了西属美洲，而且还引到了巴西、法属加拿大以及荷属加勒比海，这是因为“缺乏中心城市的资源”，这些城市“不想承担最初的风险”(1971, p. 347)。他发现，这种形势只是随着白人的移居才发生变化。所以在西属美洲，尽管“理论上”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只要白人的移居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密度，从而还没有使政府的岁入增加到足以使公共权力的各个方面得以改观，领主制度就会存在下去”(p. 348)。

97 毛罗(Mauro)(1974, p. 249)，他认定：“长时期危机对封闭性经济——如西属美洲经济——的“唯一的影响”是“使它更为封闭……或更加开放”(p. 245)。因为他的“唯一”实际上就是一切，人们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毛罗使用这个词。他提出的关于 17 世纪的另外一个特征值得注意：如果因为糖生产的重要性，“我们(对巴西)完全支持‘资本主义的’论点，那么对西属美洲我们就会坦率地倾向于‘封建主义的’论点”(p. 245)。在运用这种特征解释 18 世纪后期的政治差异时，他说，“封建主义的”西属美洲(像法国那样)比“资本主义的”巴西(类似英国)会有更加猛烈的政治大变动。参见 p. 251。

毛罗把这种差别应用到土地占有制：“(巴西的)Sesmaria 并不是一种农民占有制；这是 [捐助者 (donatario)] 带着促进农业出口的眼光向资本主义企业家所作的让步……其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种加洛林王朝那样的领地，甚至也不是要建立 17 世纪墨西哥大地产式的封闭式经济”(1971, p. 388)。这个甚至，

原文中虽没有加着重强调的符号,说明毛罗毕竟还是在加洛林王朝领地与墨西哥大地产之间发现了某种区别。

98 谢瓦利埃(Chevalier)(1970, p. 309, p. 311, p. 313)。请注意谢瓦利埃半抒情式的散文描述指的是最大的地产,那么稍小的地产如何呢?他们如何获得食物的呢?还需注意的是,他没有提到这样的事实:虽然大地产可以自给自足,但也生产必须在其他地区出售的剩余产品,那么如何处理所得的利润呢?

99 弗兰克(1979a, p. 38)。参见皮埃尔对谢瓦利埃—弗兰克争论的简要评述(1975, pp. 147~148)。P. J. 贝克韦尔(P. J. Bakewell)在分析银矿在墨西哥经济中的作用时,主要站在弗兰克一边:“17世纪新西班牙的(这种)经济,在许多方面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1971, p. 225)。

100 林奇(Lynch)(1969, II, p. 204)。贝克韦尔批评了谢瓦利埃的类似的时间划分,他说,谢瓦利埃“把采矿业衰落的时间定在17世纪的头10年,定早了20年”(1971, p. 117, p. 4)。

101 林奇(1969, II, p. 184),他说:“1592至1622年是扩张与紧缩之间一个停顿时期,的确是一个明显的停顿时期,它具有继续繁荣的迹象,但也同样出现了表明从以前趋势倒退的明显迹象”(p. 185)。他称新西班牙“从17世纪20年代至17世纪50年代是跨大西洋经济的病夫”(p. 189)。同时参见肖尼(1959, VIII, 此类提法在该书中随处可见)。肖尼认为,在这同一时期可以在菲律宾见到“与大西洋—塞维利亚(危机)十分吻合”的衰落,1630—1640年间在菲律宾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1960b, p. 246, p. 250)。

102 麦克劳德(MacLeod)(1973, p. 208),他说货币危机在1655年至1670年间达到高峰。此时,货币贬值,无力偿债以及币值重估“损害了出口,摧毁了国内贸易,甚至削弱了政府命令的可靠性和信誉”(p. 286)。

103 参见伯塞(Berthe)(1966, p. 103)。这与谢瓦利埃的观点相一致,即墨西哥白银生产的第一个经济周期大约结束于1630年至1640年间(1970, p. 4)。

104 梅拉夫(Mellafe)(1959, pp. 207~208, 加了着重符)。

105 贝克韦尔(1976, p. 224)与戴维斯(1973b, p. 158)。戴维斯称这种证据“很多”。

106 戴维斯(1973b, p. 159)。

107 贝克韦尔(1971, p. 188)和戴维斯(1973b, p. 159)。M. F. 朗(M. F. Larg)(1968, p. 632)也认为水银的短缺是首要因素。

108 罗马诺(Romano)(1970, p. 131, p. 140)。还参见欧纳蒂(Ornody),有关巴西的黄金,他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并引用了巴西财政部19世纪的一个文件,文件中称:“我们必须在现有环境下,在帝国范围内,把我们的国家货币当作一种真正的商品,我们的沿海贸易或我们的沿海航行的一部分”(1971, p. 236, p. 2)。

109 弗兰克(1979a, p. 54)。戴维斯也同样认为:“然而,总的来说,上涨的成本得到了调节。由于白银的价值与其可以购买的商品相比日益下跌,银矿的开采受到抑制……(白银的固定价格以及进口商品日益上涨的价格)使白银购买价值很低,以致不值得以固定的或不断增加的实际成本继续生产它”(1973b, p. 159)。当然,我们会问为什么白银的价格没有上涨,这里罗马诺的回答是:“美洲银矿减少了生产只是因为处于停滞阶段的欧洲经济并不需要(银币),或者说至少减少了对它的需求”(1972, p. 140)。世界需求的减少(或者说实际上是生产过剩)以及减少的利润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生产减少的两种解释也一样。

110 麦克劳德(1973, p. 382)。尽管靛蓝生产对劳动的需求不高而且事实上它也不要求最肥沃的土壤,但它还是在17世纪停滞了。(参见p. 202)。

111 参见拉贝兹(Lopez)(1974)对巴拉圭茶(Verba mate)价格下跌的详述。巴拉圭(Paraguay)只是在17世纪才与世界经济体联系起来。

112 拉罗兹的图表表明,价格指数在1504年至1596年间不仅稳步增长而且增加了3倍,两种主要的税收即alcabala与millones的指数开始时上升缓慢,后来在1575年大大超过价格指数,到1596年达到了537(见1943, p. 79)。

113 E.J. 汉密尔顿(1947, p. 12)。莫里诺建议我们向查尔斯·威尔逊请教一个“老问题”:西班牙的高税率,“16世纪还不十分突出的一种赎金,在17世纪难道不是苦难与衰退的原因吗?”(1978d, p. 158)。

114 林奇(Lynch)(1969, II, p. 165)。

115 参见以塞尔(Israel)。因此,以塞尔说,我们不应该把高税率当作是西属美洲“经济运行的一项指数”,而是“西班牙强加于其殖民地身上的压力的一项指数”。西班牙税收的需求在其它方面也影响了经济生产。1630年之后墨西哥矿区水银的严重短缺是由于西班牙王室决定减少一半航运业务而造成的。布雷丁(Brading)和クロス(Cross)认为,之所以“王室采取了这一决定是

因为(秘鲁)的总督辖区偿付了 quinto, 而墨西哥只偿付了 diezmo”(1972, p. 574)。

116 林奇(1969, II, pp. 165~167)。

117 参见麦克劳德(1973, p. 311), 他把公职看作是阻止许多克里奥尔人(Creoles)和西班牙人“地位下降”的“唯一可取的答案”。

118 巴赞特(Bazant)(1950, p. 90), 他补充说,“总产量的一部分是为了出口”。

119 佛罗里斯卡纳(Florescano)(1969, p. 150)。并参见贝克韦尔:“也许向扎卡提卡斯(Zacatecas)提供粮食的过程中最明显的特征是这个网络所覆盖的范围……孔卡提卡斯的白银装在向不同方向返回的马车和骡马身上, 作为购买粮食的支付款, 运向北方的萨尔蒂勒(Saltillo)和南方的普布拉(Puebla)”(1971, p. 64)。这种对墨西哥的描述可以与林奇对秘鲁的描述相比:“种植园产品, 糖、葡萄酒和棉花的最大市场是上秘鲁的矿区。从某种程度上说, 整个秘鲁为波托西(Potosi)生产, 并从其财富中赚取利润”(1969b, p. 217), 在1687年秘鲁地震的影响中可以找到进一步的证据。它在智利引起了“小麦的抢购”, 在那里, 生产者从畜牧业和葡萄酒生产转而生产小麦(罗马诺, 1969, p. 280; 同时参见卡马格纳尼(Carnagnani), 1973, pp. 31~42, pp. 265~266)。

120 佛罗里斯卡纳(1969, p. 183)。

121 “(所有的证据)表明在一段相对短暂的间隔时期, 大地产的供给成功地满足了地方消费的需求。但是, 一旦达到这种水平, 大地产即使还没有发挥其最大的生产能力, 市场的地区性结构, 遥远的距离, 糟糕的道路, 高昂的运费以及王室的政策, 都不可能使它把剩余产品出口到这个地区范围以外的地方。因此大地产即使不减少生产, 至少也不得不把生产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佛罗里斯卡纳, 1969, p. 184)。

122 参见沃尔夫(Wolf)和明兹(Mintz)(1957, p. 380)。

123 贝克韦尔(1971, p. 235); 也参见莫纳(Morner)(1973, p. 191)。林奇甚至走得更远, 把这称作是“西属美洲的第一次解放”。他说:“把美洲贸易的大萧条归因于殖民地经济的崩溃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它更是转变的结果而不是崩溃的结果。如果殖民地不再像从前那样支撑这种贸易,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将其资本用于本土的公共和私人的投资”(1969b, p. 139)。皮埃尔进一步扭转这一论点, 否定那些认为跨大西洋船运数量的减少导致贵金属出现低缓流通的作者们的说法:“如果跨洋货币流量减缓了, 那么, 这难道是采矿生产下降的标

志,而不是本地保存贵金属的比率日益增大的标志吗?”(1975,p. 151)。

124 例如,参见库克(Cook)和勃拉(Borah)。菲律宾出现了相应的,但不严重的人口减少。参见菲兰(Phelan)(1959, p. 194)和肖尼(1960b, p. 74, 表 1)。

125 有关天花的情况,参见克罗斯比(Crosby)(1967)。安第斯地区(Andes)似乎在 16 世纪避免了中美洲的巨大的死亡率,然而在 17 世纪晚期却陷入了困境(参见多宾斯[Dobyns], 1963, p. 514)。关于智利,见梅拉夫(1959, p. 226)。关于中美洲,见麦克立奥德(1973, pp. 204~205)。

126 以塞尔(1974a, p. 39),他指出“17 世纪 30 和 40 年代,出现过多次墨西哥人的激烈抵抗”。M.F. 朗认为,显然“限制新西班牙和秘鲁之间贸易的愿望是王室不愿把水银从万卡韦利卡(Huancavelica)供给墨西哥矿区的主要动机”(1968, p. 639)。

127 参见恩里克·塞莫(Enrique Semo)对分配制(repartimiento)所作的解释,他承认这种定义是 20 世纪的分析家提出来的,未必就是同时代人的用法:“我们认为 repartimiento 是西班牙经济企业中配给和轮换工作制度,它既影响到被赏赐给 *encomienda*(大庄园)的印第安人,也影响到那些没有被赏赐的人。这种制度使所有者阶级享受的利益比 *encomienda* 享受的利益广泛得多。对此应该补充的是,不像在 *encomienda* 中的印第安人,被作为为王室服役的报偿而赏赐给大庄园主,而且由接收者随其所便地使用;这种 *repartimientos* 经常被授权为明确规定的经济目的而使用印第安人,同时被禁止为其它目的而使用印第安人。在新制度之下,总督最后把优先权固定下来……优先顺序把银的生产置于 *encomiendas* 所需要的生产范围之内”(1973, p. 222)。

128 以塞尔(1974a, p. 47)。比较一下麦克立奥德所作的有关中美洲的描述:“1630 年至 1640 年这一时期是 *derrama*(附加税)占绝对优势时期,这一时期,通常由克雷奥尔人充当的政府小官吏,迫使印第安人以高价购买并不需要的产品,或者迫使他们生产商品而不给任何报酬或只给少量的施舍”(1973, p. 84)。

129 以塞尔的文章详细说明了 1620 年至 1664 年在墨西哥的统治阶层之间就控制稀缺劳动力而发生的相互摩擦。

130 参见扎维拉(Zavala)(1966, 特别是 p. 79),戈丁浩(Godinho)(1948),还有舍瓦利耶,他写道:“偿债劳役渐渐地——而且不可逆转地——蔓延到越来越多的大地产。17 世纪末或 18 世纪初,普遍地把 *gañanes* 或 *naborios* 当作庄园的财产”(1970, p. 285)。同时参见菲兰:“通过偿债劳役制使印第安人附属

于大地产比其它劳动形式有利。黑奴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分配制劳动没有效率，因为每周换班的数量和可用的印第安人的数量逐渐减少（1959, p. 191）。以矿工为例，矿主从一开始就企图通过采矿的工资和津贴来留住工人为其谋利。这种情况在墨西哥称为 *pepena*，在秘鲁称为 *dobla*。然而，印第安人不能占有开采出来的额外的银；他们不得不廉价卖给矿主。在某些情况下，工资劳动实际上转变为实物偿付，不管怎么样，矿主开始使用债务的手段把工人固定在原地。参见罗马诺（1970, pp. 132~133）和贝克韦尔（1971, pp. 125~126）。戴维斯把这种债务奴役制看作是“当人口数量在 16 世纪末达到最低水平时”，雇主对付自由市场上的劳工力量的手段（1973b, p. 167）。

131 “得到 *gañanes* 和雇农的最佳途径是夺取印第安城镇的土地……对土地这种主要的补充资源的垄断，是大地产农业得以发展和延续的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原因（虽然大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是与之相关的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从社会垄断而不是从私人垄断的观点来看）的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原因” [弗兰克(Frank), 1979a, pp. 70—71]。同时参见麦克立奥德有关 1580 年至 1590 年这一时期的论述：“这是（中美洲的）西班牙人初次占有死去的或“被集中的”印第安人抛弃的 *tierras baldias* 和 *realengas*。也正是在此时，对印第安人第一次严重的侵占开始了”（1973, p. 221）。

132 洛克哈特(Lockhart)很有说服力地说明了下列观点：不管有什么样的法理上的区分，从 *encomienda* 到大地产的社会连贯性很明显：“*encomendero* 和后来的大地产同出一辙”；大地产那种被夸张的自给自足“很难与一个商业企业的多样性或整体性相区别”；而且，最重要的是，工人们的生活仍旧没有变化：“村民先是在 *estancias* 干活，然后到大地产，先是通过 *encomienda* 义务，后来是通过 *repartimiento* 机制，最后通过个人的安排，但是他们总是同一些人做同样的事”（1969, p. 419, pp. 425~426）。也参见 R.G. 凯兹 (R.G. Keith) (1971, p. 441) 和皮埃尔(1975, p. 161, p. 238)。

大地产的法律依据是西班牙王室于 1591 年发布的两个公文，在其中，它宣布对所有不存在合法所有权的土地拥有权利。这就迫使地主支付 *composicion* 费，以取得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些土地被说成是 *boldios*，荒地 and 废地。参见 E.M. 巴雷特(E.M. Barrett) (1973, pp. 89~90)，并参见里拉(Lira)和穆罗(Muro) (1976, p. 143)。到 1713 年，西班牙王室迫切需要资金，因此在秘鲁，他们甚至愿意在印第安人有钱时把 *boldios* 卖给他们。参见皮埃尔 (Piel) (1975, p. 191)。

133 参见麦克立奥德，他认为“下层阶级某些成员的状况稍有改善”（1973, p. 227）。

134 舍瓦利耶（1970, p. 107）。

135 参见贝克韦尔（1971, p. 75），但是他认为：“阿隆迪加（alhondiga）在价格调整中的作用是无法弄清楚的”（p. 66）。同时参见古德里（Guthrie）（1939, p. 105）和舍瓦利耶（1970, pp. 62~65）。

136 麦克劳德（1973, p. 153）。当然有抵制。奥斯本（Osborn）（1973）认为，墨西哥印第安人此时抵制土地剥夺的能力取决于村社组织的力量。

137 莫纳（Moxner）（1973, p. 192）。

138 贝克韦尔（1971, p. 234）。

139 贝克韦尔（1971, p. 230）。菲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观点：“勃拉（Borah）关于印第安人劳动力短缺的论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正是这种短缺才可能更有助于17世纪的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促使其停滞。‘萧条’一词，我认为，把其应用到整个时期是一个使人误解的词语”（1970, p. 213）。

140 “如果秘鲁的大地产的出现在时间上与货币经济和非农业企业——开采业、制造业、商业的衰落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解释17世纪秘鲁obrajes的增长呢？那一时期它的生产数量超过了西班牙的生产规模；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解释西属秘鲁商业资产阶级人口的显著增长呢？他们到1613年竟能够迫使马德里通过建立利马执政府的法庭（the Tribunal of the Lima Consulate）来分享秘鲁和西班牙之间殖民地商业垄断权。”（皮埃尔，1975, p. 150）。有关与塞维里亚（Seville）经济精英分子相比较的新西班牙经济精英“日益增长的幅度”，参见包依尔（Boyer）（1977, p. 457及其他各处）。关于墨西哥本地的aviadores或旅行装备商的实力如何增强，以致能够与王室力量抗衡，迫使债务人纳税之前偿债的情况，参见贝克韦尔（1976, p. 219）。

141 波尔（Pohl）（1969, p. 448）。但是，戴维斯强调“墨西哥生产的大量商品比较便宜，质量较低，高档的羊毛制品，亚麻制品和金属器皿还是来自欧洲”（1973b, pp. 161~162）。

142 巴格勒（Bargallo）（1955, p. 251）。

143 邓恩（Dunn）（1972, pp. 9~10）。

144 肖尼（1959, p. 1539）。

145 引自拉罗兹（1943, p. 90）。

146 查尔斯·博克瑟把17世纪2/3的时间里荷兰—葡萄牙之间在世界

各地的斗争概述如下：“虽然可能过于简单化，还是可以说，这场漫长的殖民战争是为了争夺亚洲的香料贸易、西非的奴隶贸易和巴西的蔗糖贸易。同样，可以说，最后的结果实际上是荷兰在亚洲取得了胜利，在西非则不分胜负，在巴西葡萄牙取得了胜利”（1961, p. 49）。这是中肯的论述吗？从政治统治方面来看，是这样；但是，从经济控制方面来看，难道不是荷兰（后来被英国所代替）在所有三个地区的胜利吗——胜利所表现的不同形式取决于它发生在外部地区（亚洲）还是边缘地区（巴西），西非此时正处于从外部地区向边缘地区的缓慢过渡？这种差别在于葡萄牙在生产过程中的自卫力量的大小，博克瑟本人向我们提供了这一线索：“（这些）葡萄牙人，尽管有各种错误，但作为殖民者已深深地扎根（于巴西）；所以，他们一般来说不可能由于一次海战或陆战的失败，甚至由于一系列这样的失败而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1961, p. 54）。

147 麦克劳德(1973, p. 212)。

148 佩尔斯(1960, p. 20)。

149 海盗(boucaniers)一词的起源，是因为他们把肉放在铁架和碟子上即印第安语言中的bucan进行熏制以后再卖掉。参见德斯堪普(Deschamps)(1973, p. 40)。这并不是说，海盗在这之前不为人所知。而是，“直到1650年左右，西印度群岛的海盗活动”，与后来海盗的“全盛期”相比，“或多或少地具有偶然性”[哈里(Haring), 1964, p. 249]。

150 戴维斯(1973b, p. 169)。17世纪初期，荷兰海盗“在追逐西班牙舰队时最具冒险精神……而且顽强……‘荷兰人’这一名字成为‘私掠’和‘海盗’的同义词”[彼德森(Peterson), 1975, p. 250]。

151 斯特朗(1899, p. 233)。斯特朗补充说：“查理二世的顾问们明白克伦威尔的征服和殖民计划具有多么深远的打算，而且看到了他进攻西印度群岛的真正动机。‘文学士’代表查理二世在1656年1月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着重强调克伦威尔打算对西印度实施殖民，并且利用他的舰队切断西班牙贸易。事实上，如果是出于别的理由，整个计划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认为这位护国主在作了大量准备并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将会满足于几平方公里的区域，那是很荒谬的”（1899, p. 244）。

152 佩尔斯(1960, p. 3)。

153 J. 朗(1975, p. 55)。结果，哈里说，“西班牙商人实际上常常成为接受委托的中介人、代理人或代理商，他们的西班牙名字常常被借用来逃避法



律”。最终,这意味着“西班牙与美洲的贸易或多或少成为一种消极的工具,成为一种在王室的控制之下使欧洲其他地区提供的商品得以畅通的手段”(1947,pp. 314~315)。

154 这是一次跨越加勒比海地区的活动。荷兰人以同样的方法与挪威的丹麦人“殖民地”联系起来。参见伦德(Lunde):“总的来看,走私活动被哥本哈根的统治当局认为是一大问题。挪威全国范围内大量的走私是众所周知的事实。Staatsloven(总督议会[Viceregal council])谴责了被认为是这方面行家的荷兰人。他们写道,只要有关税,挪威商人就必定要走私;只有一种补救方法——减少关税。这就是他们努力做的,但收效甚微,走私仍在继续……商人们自己也说,如果他们诚实的话,他们就会遭到毁灭……走私是哥本哈根支配的经济制度和实行的商业政策引起的一个直接后果”(1963,pp. 38~39)。

155 佩尔斯(1960,p. 12)。

156 克里斯特洛(Christelow)(1942,p. 312)。谢里登(Sheridan)的估算清楚地表明为什么走私贸易继续存在:“在大约 1763 年之前,不列颠非正式的帝国贸易并不比它的正式的帝国贸易差”(1969,p. 24)。他列举了不列颠正式的帝国贸易的两大竞争者,即经过牙买加的走私贸易和经过加的斯和葡萄牙的间接贸易。人们不应忘记还有经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非法贸易。“由于它的位置远离西班牙帝国在利马和西印度群岛的统治中心,而且接近巴西的葡萄牙人,因而对它加以充分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由于该港口为了大帆船贸易利益而近乎关闭,使用遭到西班牙人拒绝的手段来保证其利益的诱惑是不可抗拒的”(哈里,1947,p. 329)。

157 参见德斯塔普(1973,pp. 44~45)。哈里提醒我们说,这种授权可能是“实在的,也可能是做样子的”(1964,p. 249)。

158 参见弗洛伊德(Floyd)(1967,pp. 26~28)。并参见法尼(Farnie):“糖使种植园的经营成为次要的角色,结束了加勒比海历史上的‘海盜’阶段”(1962,p. 209)。

159 麦克劳德(1973,pp. 367~368)。

160 戴维斯(1973b,p. 169)。实际上有两种抢劫的方式。一种是抢劫装满财宝的船只。另一种是抢劫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城市。海盜从没有真正参加过前一种抢劫,只是海军分遣队参与抢劫,而且只有三次,一次是荷兰人在 1628 年,另外两次则是英国人在 1656 年和 1657 年干的。参见哈里(1964,pp. 235~247)。然而,抢劫西班牙的城市是海盜们的特长。

1655—1671年间,18座城市遭到了破坏;而且正是这种抢劫方式在改变跨洋贸易的模式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是这些与非法贸易相结合的手段,而不是通过摧毁运银船的方法,使西班牙—美洲贸易的源泉枯竭”(哈里,1964,p.250)。最后,正如格拉曼所说,“海盗经济……(并不能)促进增长……军舰,不管是不是飘扬着海盗旗,与那些满载谷物的驳船或其它装载煤、砖和酒桶,盐和干鱼的沿岸船只相比,是不能促进贸易和繁荣的消极工具”(1977,p.191)。

161 戴维斯(1973b,p.169)。同时参见邓恩,他说,17世纪末,英国、法国以及荷兰“都默许让西班牙这个美洲病夫控制它那发展缓慢的、落后的加勒比帝国的其余地区。的确,英国和法国的当权者们发现,与西班牙殖民地进行贸易所得的利润比抢劫他们的要多,而且从1680年以来,他们就竭尽全力镇压海盗”(1972,p.22)。实际上,在1678年的奈梅亨条约(the Treaty of Nijmegen)之后,荷兰就不再是“一个在加勒比海地区需认真加以对付的因素了”[高斯林格(Goslinga),1971,p.482]。邓恩在这一政策转变<sup>(1)</sup>中发现一个至少适合英国的更深一层的因素。他说,光荣革命代表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和蔗糖种植园主的胜利,这些种植园主此后“与王室保持着较好的关系”,王室不再像王权复辟时代那样吃尽他们的利润(1972,p.162)。

162 参见内特尔(Nentels)著作中对政策转变的讨论(1931b,pp.17~19)。

163 参见沃勒斯坦(1974,p.88,特别见p.70)。

164 舍瓦利耶在谈到墨西哥时说:“每当气候允许时,地产主非常希望用糖代替小麦。……被认为是主要商品的小麦受制于(当地的)最高限价和征用,常常只留给生产者一点有限的利润;另一方面,糖是一种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奢侈品,而且由于需求的增加,可以卖得较高价钱”(1970,p.74)。

墨西哥为什么没有成为主要的蔗糖生产者呢?伯塞(Berthe)认为原因在于政治方面的因素使劳动力成本保持着差异。“由于为了小麦大种植园的利益把糖厂长期排除在 repartimiento 制度之外,致使(糖厂)不能独自地使用印第安雇佣工人,而必须大量地使用奴隶,它既容易枯竭,又很昂贵”(1966,p.103)。另一方面,伯塞强调糖的生产比烟草和棉花的生产更困难:它需要“大量的资本开支,相当多的劳动力,以及生产过程中难于掌握的知识”(1976,p.13)。

---

[1] 原文为 sift(筛),从上下文看,应为 shift,故译为“转变”。——译者

165 “17世纪时，喝甜饮料与吃甜布丁和馅饼的习惯变得更为普遍”（福布斯[Forbes], 1957, p. 7）。同时参见戴维斯(1973b, p. 168)和帕里斯(1960, p. 23)。

166 博克瑟称 1580 年到 1680 年是巴西“糖的世纪”(1952, p. 388)。

167 肖尼(1961, pp. 1193~1194)。毛罗解释说，由于糖从一种药物转变为一种食物，从而使需求量增加，因此在 17 世纪的危机中出现了巴西糖的“特殊事例”(1960, p. 233)。

168 参见德·卡斯特洛(de Castro)(1976)。佩尔斯在谈到英属西印度群岛在晚些时期，即 18 世纪的糖的生产时说：“可以清楚地看到因种植甘蔗而使地力耗尽的影响。每 10 年就要使用更多的奴隶从相同面积的土地上生产同样数量的糖，或者，在耕种扩大和产出增加的地方，只是以大量增加劳动投入为代价才达到这一目的”(1960, p. 41)。梅斯菲尔德认为，由于反复地耗尽地力，使制糖工业出现了“摇摆不定的命运”(1967, p. 291)。贝蒂(Batie)有关巴西提出了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与荷兰的战争(1630~1641)“严重摧毁了”糖种植园(1976, p. 15)。

169 邓恩(1972, pp. 65~66)。谢里登认为，英国烟草生产者在 1636 年发生了一场生产过剩危机，这引起了对其他出路的寻求。荷兰人在 1637 年带来了蔗糖——还有技术、资本和黑奴(见 1969, p. 11)。另一方面，富尔塔多(Furtado)认为：“要不是 17 世纪前半期末年的外部事件——荷兰入侵者最后从巴西北部被驱逐出去的话，大概加勒比海经济的变化会更为缓慢”(1963, p. 25)。

170 伊德尔(Edel)把这种变化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即巴巴多斯(Barbados)的成本由于土壤翻新和土质优良比巴西的成本低得多。因此，“尽管荷兰资本家在伯南布哥有现存利益，但是，他们认为巴巴多斯是一块适合新投资的土地，更何况荷兰控制的巴西东北地区还不安全”(1969, p. 42)。贝蒂(Batie)增加了正在经历的危机因素。1645 年伯南布哥起义之后，荷兰的西印度公司，因为考虑到它寿命的短暂，命令它在黄金海岸的代理商继续遣送奴隶。当这些奴隶到达的时候，就被送到小安的列斯群岛“以低价赊欠出售。在这些岛屿中，只有巴巴多斯离雷西腓(Recife)最近”(1976, p. 21)。

171 关于气候和土壤，参见邓恩(1972, pp. 26~30)。关于安全性，参见佩尔斯：“巴巴多斯特别平静的生涯(自从它建立以来，从来没有一天换过旗

织) 归功于这样的事实, 即由于处于距重要的岛群以东数英里的地方, 因此, 它不仅处于西班牙人而且处于加勒比人(Caribs)的行踪之外”(1960, p. 10)。贝蒂说, 安全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糖需要大量的投资。“入侵的威胁特别使富有的投资者担忧, 即使是最短暂的海上袭击, 也会使他们遭受奴隶和设备等财产的损失”(1976, p. 15)。

172 谢里登(1969, p. 19)。巴西的不利条件之一是内陆给这些逃亡奴隶提供了可以生存的地盘。这种情况在巴伊亚(Bahia)的凯鲁(Cairú)和卡马穆(Camamu)尤其突出。参见斯瓦兹(Schwartz)(1970)。

173 邓恩(1972, p. 21)。并参见戴维斯:“牙买加在1655年被占领以后的半个世纪的特点是英国利益在西印度群岛的巩固而不是扩大”(1952b, p. 89)。

174 参见邓恩(1972, p. 21)。

175 邓恩(1972, p. 23)。即使是相互的战争破坏也没有阻止糖工业的增长率(需求持续增加的标志), 那么它必定会影响社会的生产组织。“在英属岛屿,(从1689年至1713年)的(长期的)战争无疑损害了小农场主的利益, 但却有利于大种植园主”(邓恩, 1972, p. 147)。并参见谢里登(1965, p. 299, 表3)有关牙买加从1670年到1754年土地日益集中的描述。

176 佩尔斯(1960, p. 20)。

177 佩尔斯令人惊讶地把这种不利条件变为一种优势:“(糖和烟草)种植园主遭受了土壤枯竭的损害。烟草殖民地损失最小, 因为地力耗尽的种植园主人能够轻易地获得处女地——至多二百英里远——并且能够把他的奴隶迁到那里……糖种植园主却无能为力。许多岛屿面积狭小”(1960, p. 41)。但是, 这样就本末倒置了。为什么糖首先在较小的岛屿取代烟草, 好像是后来才退移到较大的岛屿和切萨皮克谷地(Chesapeake valley)呢? 这种在较小的岛屿上从烟草到糖的转变到17世纪60年代才最后定形。参见佩尔斯(1960, p. 22)以及法尼(Farnie)(1960, p. 40)。尽管1645年至1680年糖价暴跌, 情况仍然如此。参见佩尔斯(1960, p. 40)。创业人开始种植以后, 他的利益会驱使他不顾土壤耗竭而继续种下去。正如佩尔斯指出:“糖种植园不像烟草种植园那样容易换地种植——有大量的重机器, 而且在已种植的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本。由于这些原因, 蔗糖种植园主常常不得不留在原地”(1960, p. 41)。

178 兰德(Land)(1965, p. 647)。

179 关于烟草这一时期如何被看作是药物, 参见奥梯兹(Ortiz)(1947,

pp. 242~245)。关于对糖的爱好的增加,内夫提出了这样的解释:“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欧洲人产生了对糖的爱好,它在较早开化的民族中并不存在。北方经济文明的发展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一点。北方的水果和蔬菜不像生长在地中海土壤中的水果和蔬菜那样多汁。因此,要使它们可口,就必须在它们中加糖”(1968,p. 77)。

180 欧洲唯一不对进口烟草征税的地区是西属尼德兰,参见格雷(Gray)和威克夫(Wyckoff)(1940,p. 4)。

181 参见罗辛(Roessingh):“从长期来看,烟草种植的发展可以解释为在大约1650年至大约1750年这段时期的漫长的农业衰退的伴随物。内陆的烟草与谷物的价格比率有利于烟草,种植者们通过扩大烟草面积对这些经济变化作出反应”(1976,p. 500)。

182 佩尔斯(1960,p. 26)。然而,要铲除欧洲的烟草生产并不那么容易。比尔(Beer)注意到:“最初对英国烟草的禁令颁布于1620年……并且花了大约70年时间的不懈努力和有力的措施才根绝了这种产业”(1912,p. 145)。在英国,对烟草种植并没有任何生态上的障碍。瑟斯克称英国的农业条件“完全适合”,而且指出它的生长时间并不妨碍必需的食品作物的种植(1974,p. 89)。

183 格雷(Gray)和威克夫(1940,p. 4);但是,布里恩(Breen)“把弗吉尼亚的转变归因于1684年以后烟草价格的上涨”(1973,p. 13)。

184 K.G. 戴维斯(1974,p. 144)。

185 1723年,沃波尔(Walpole)通过免除进口税刺激烟草的转口贸易(因而消除了荷兰和德意志烟草的价格优势)。参见J.M. 普莱斯(J.M. Price)(1964,pp. 504~505)。

186 J.M. 普赖斯(1964,p. 504)。“1700年,英国国王从烟草中获得了两倍于法国国王的收入,而到18世纪60年代,法国国王从烟草中获得大约四倍于其英国伙伴的收入”(p. 503)。

187 J.M. 普赖斯把这种情况直接与“法国的垄断性购买”的压力联系起来(1964,p. 506)。

188 博克瑟(1969b,p. 35)。

189 博克瑟(1969b,p. 59)。

190 维拉尔(1974,p. 279)。或许,还有问题的另外一面。博克瑟指出“由于17世纪最后25年糖价下跌,许多里斯本商人坚持(购买奴隶)要用现金而

不是实物(糖和烟叶)来支付,随之而来的货币输出在巴西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1969b, p. 26)。这就激发了巴西人和英国人去“发现”金矿的动机。

191 博克瑟(1969a, p. 460)。

192 关于16世纪盛行的国际债务偿还体系的讨论,参见沃勒斯坦(1974, pp. 121~122)。

193 佩尔斯(1960, p. 50)。

194 邓恩(1972, p. 194)。加工过程包括拥有从甘蔗中榨取汁水的作坊,蒸发糖中的水分使糖结晶的蒸馏房,使糖干燥和提取糖蜜的加工场,把糖蜜转变为糖酒的酒厂,以及存放糖桶的仓库(见 pp. 189~190)。

195 邓恩(1972, p. 200)。

196 佩尔斯(1960, p. 5)。

197 参见谢里登(1957, pp. 63~66)。

198 “到18世纪初期,富有的种植园主在大部分岛屿的立法会议中占有大多数席位”(谢里登, 1957, p. 67)。

199 “在殖民地的许多地方,作为一个阶级的常驻商人开始减少,甚至消失,尽管他们在牙买加的金斯敦(Kingston)得以幸存,因为那里与西班牙帝国联系紧密;还有巴巴多斯的布里奇顿(Bridgetown),这里的商业活动是奴隶交易,以及马提尼克(Martinique),这里代理商靠其它岛屿的贸易养肥自己。在其它地区,他们的重要性大大减弱了。还有商人,但是,他们大都仅仅是代理商,以接受委托的方式出售北美洲的产品”(佩尔斯, 1960, p. 33)。

200 “种植园主成功地提高了糖的价格,以致(在1753年)买主被迫寻求议会的援助”。谢里登把这看作是18世纪30年代末至1763年这段时期出现“超额利润”的主要原因(1957, p. 81, p. 83)。

201 参见K.G. 戴维斯(1952b, p. 101, pp. 103~104),他说:“这种委托制起初是处理以巨额投资从事大规模种植的大地产所生产的糖的方法”。

202 参见J.M. 普莱斯(1954, p. 506)。

203 佩尔斯(1960, p. 33)。

204 参见K.G. 戴维斯(1952b)与佩尔斯(1960, pp. 33~34)。佩尔斯补充说:“但是,对这种解释有激烈的异议:在英国殖民地中,不仅遥领种植园主,而且几乎每个常驻种植园主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把糖转交给国内去托人销售”。我并不认为这是有力的反驳。一旦这种模式产生,小所有者就顺势而

上,而且发现伦敦商人愿意接受他们的业务。

205 兰德(Land)指出,切萨皮克谷地的烟草并没有遇上西印度群岛的糖的好运。“结果,切萨皮克的种植园主没有‘回到家乡’去向人们炫耀其财富。他们的利润首先来自支撑其家业的烟草生产,其次来自获利丰厚的企业”(1965,p.647)。换句话说,他们无法“专门化”;他们不得不继续当监工。然而,J.R.沃德(J.R.Ward)怀疑,18世纪时英属岛屿和法属岛屿的利润率是否真有多大的差距(见1978,p.208)。

206 参见J.M.佩尔斯:“如果[格拉斯哥]的商人需要更多的烟草,他只得增加向种植园主的赊购信贷,这样在收获季节就会得到更多的烟草。因此,苏格兰人和其他人的赊购信贷比价格机制更能有效地保证自己的烟草货源。苏格兰人赊购信贷的支撑者是法国买主”(1964,p.509)。

207 佩尔斯(1960,p.35,p.38)。

208 佩尔斯(1960,pp.48~49)。

209 因此,当谢里登说:“显然,牙买加的种植园经济开始受到一群伦敦商人和遥领种植园主的控制,大家族的财富更多地与商业和金融而不是热带农业发生更为密切的联系”(1965,pp.309~310),他的话对后期情况来说是对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期阶段只是由于早期生产的竞争效益才成为可能。

210 梅斯菲尔德(1967,p.290)。

211 见戴维斯(1973b,p.134)。然而,布里恩(Breen)却认为弗吉尼亚的转折点是1680年,此时“英国公司有把黑奴从非洲直接运往大陆殖民地”(1973,p.14)。他也指出,1682年时,英国通过了征募契约劳工的新条例,要求所有契约必须有英国治安法官的签字,而且14岁以下孩子的契约应该有父母的同意。

212 戴维斯(1973b,p.130,增加了着重符号)。

213 见K.G.戴维斯(1974,p.107)。

214 见佩尔斯(1960,p.19)。并参见菲兰:“使用黑奴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1959,p.191)。

215 佩尔斯(1960,p.19)。

216 邓恩(1972,p.72)。德比安(Debien)引用了下述事实,即被招募者是“一支流动人口”,以说明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变化(1942,p.74)。

217 戴维斯(1973b,p.131)。土地没有分尽恰恰说明了契约劳工在法属

加拿大而不是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幸存的原因。参见德米尼(Dernigny)(1950, p. 236)。

218 佩尔斯一方面认为烟草是“一种自由人的农作物”，因为它需要“准确的判断”，因此“不能轻易地按常规托付给奴隶种植”；但是，他也承认，“弗吉尼亚的经验表明烟草也能在奴隶种植园种植”(1960, p. 21)。

219 戴维斯(1973b, p. 133, 增加了着重符号)。艾伦(Allen)认为，在1667年奴隶密谋和1682年的烟草暴动之间，在弗吉尼亚有10次奴隶起义或密谋，具有决定意义的是1676年4月的培根起义(Bacon's Rebellion)。他认为，种植园主已发现需要给白人劳工一种不同的地位来分化工人阶级。因此，“转而使用非洲劳工是1685年之后突然发生的变化”(1975, p. 49)。梅纳德(Menard)指出，“契约劳工的价格在17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上涨”(1978, p. 24)。对奴隶需求的增长在1700年左右导致了价格的上涨，为了降低价格，“开始在船运奴隶总数中增加年轻奴隶和女奴的比率”[盖尔森(Galenson), 1979, p. 24]。

220 参见邓恩(1972, p. 59)关于1640年至1660年间糖的繁荣的影响的论述以及法尼(1962, p. 208)关于1680年至1700年间烟草繁荣的结果的论述。柯廷(Curtin)认为除了欧洲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和对劳动力需求的上升之外，还有第三个因素：发病率的差别。非洲人“来自一个疾病流行的环境，那里有热带病和大范围流行的非洲—欧洲疾病，因而具有抗感染的巨大优势。”(1971, p. 253)。他认为，在加勒比海地区，欧洲劳工与非洲劳工的死亡比率是3:1。在一篇早期的文章中，他说这种比率是4:1，如果我们假设维持(黑奴和契约劳工)的成本大致一样，那么就可估算出非洲黑奴在相当于欧洲人价格的3倍时也是宁可选择黑奴的”(1968, p. 207)。

221 博克瑟(1952, p. 223)。

222 维亚纳(Viana)(1940, p. 11)。事实上，非洲人当然也表现出同样的“无力”，而且也在死亡。斯瓦兹提醒我们下列事实：巴西人用来描述奴隶在糖繁荣时期(1570—1670年)的生活条件的形容词是“地狱般的”；收获季节标准的睡眠时间是4小时；而且“管理奴隶的盛行理论是以尽可能少的成本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1970, p. 316)。

223 参见罗马诺(1970, p. 133)。

224 梅拉夫(1959, pp. 252~253)。

225 在谈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情况时，杜布依(Dupuy)说：“阿腊瓦克人(Arawaks)生产的社会形成和组织并不具有剥削和征服另一个阶级的特点。阿



拉瓦克社会的生产关系中使用价值占主要地位，完全缺乏交换价值即商品生产的特点……所以，他们宁在山上饿死，也不愿被外国殖民者奴役而死”。(1976, p. 22)。

226 参见罗马诺(1970, p. 130)。布雷丁和克罗斯(Cross)指出，强制劳役在秘鲁的矿区中存在的时间比在墨西哥矿区中存在的时间更长(一直到1812年)。在墨西哥矿区，印第安人以惊人的速度减少。结果，到18世纪，墨西哥的矿工开始得到相对高的工资，而且从黑白混血儿和西班牙、葡萄牙与印第安混血儿以及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中征募矿工。“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但是……从两个印第安民族不同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定居点所处的不同的地理位置去探讨其原因，是可取的途径”(1972, p. 557)。贝克韦尔(Bakewell)认为，早在17世纪，“扎卡特卡(Zacatecas)的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主要关系是……雇主与受雇人的关系”(1976, p. 217)。相比之下，塞斯彼德斯(Cespedes)谈到的却是“驯服的秘鲁土著居民”(1947, p. 39)。

227 奥布雷姆(Oberem)正是在比较 *conciertos* 或无债务工人的成本与在厄瓜多尔使用非洲黑奴的成本之后，提出了这一观点。他把 *conciertos* 说成是“准奴隶”，因为他们甚至可以“买到”(1967, pp. 767~770)。

228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同意D. 霍尔(D. Hall)的观点，他把奴隶看作是“资本设备”，并且说人们不能把奴隶劳动成本与自由劳动成本相比较，因为它实际上是代替劳动和资本成本的问题(1962, p. 309)。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就正如兰德实际上也认为的那样，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园主使用奴隶就不合算了。兰德说，种植园主在17世纪和18世纪有一种“坚定不移的偏好”，就是通过增加奴隶劳动而不是改善技术设备来扩大生产，因此“禁绝了技术设备的改善”(1969, p. 75, p. 79)。这与W. 巴雷特(W. Barrett)对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糖种植园的考察结果是一致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实行了规模经济”(1965, p. 167)。

然而，这使得这种偏好本身得不到解释，因而归之于“文化”和经济的非理性。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劳动成本都是资本成本，它总是一种机器劳动(死劳动)和活劳动的最优结合的选择，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什么情况下，短期内使用奴隶劳动是最优的而且政治上是可能的一种选择，值得用以代替：(a)雇佣劳动，(b)生产商品作物的强制性劳动，(c)追加的机器劳动。当我们记得奴隶在许多地区能够以卖主的身份加入货币经

济并积累资本的时候,答案就更显复杂了。如斯瓦兹问道(见 1974, pp. 628~629),巴西奴隶怎么能够付钱去赎买自己的自由呢?明兹(Mintz)指出,在牙买加,“18 世纪初期,奴隶们在市场上积极出售和购买自己的产品”(1964, p. 251)。

229 基本的形式并不意味着唯一的形式。斯瓦兹论述巴西产糖地区的 Lavradores de cana 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他们的租佃制度,甚至所有权制度,代表了大土地所有者剥削劳动的一种选择形式,这些形式怎样利用,随经济条件而不同。“甘蔗栽培者的使用……在经济发展时期是一种减少资本成本的方法,也许还是对 engenho 财产加强监督的方法”(1973, pp. 193~194)。

## 第五章 十字路口的 半边缘区

等级性的（而且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而世界体系中经济活动地位的（更换以及相应的）特定地理区域的变换，则是又一个永恒的要素。从国家机器的角度来看，各个地方、地区以及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的相对变化（这些变化是有规则的但并非持续不断的）可以看成是（的确常常被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国家的盛衰的“变动”，而这是相对于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其他国家来加以衡量的一种运动。在 20 世纪，人们都谈论着国家的“发展”，而在 17 世纪，人们则谈论王国的“财富”。但 17 世纪的人们对如下这一点比我们今天看得更清楚：至少在现代世界体系的范围内，衡量的是所处地位的相对序数，而不是自身拥有的基数。各个国家地位的改变突出地发生在普遍衰退或停滞时期；对于处在等级阶梯中部的即半边缘地位的那些国家来说，这种变动主要是受到国家行为的制约和影响。半边缘国家的变化通常是衰落和上升。

这似乎有唯意志论的味道。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这样。明智的国家政策同所发生的事态密切相关，但我们必须立刻做两点说明。首先，国家政策不是原动力而是对过程的干预。其次，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机器都可以应用任何一套既定的政策从而带来合乎预期的理想结果。事实的确完全相反。许多国家试图使其境况得到改观，但仅有少数国家成功地改变了在世界分工中的基本地位。这是因为，正是某一国家的成功消除了其他国家取得成功的机会。17 世纪时，许多半边缘地区处境不佳——西班牙、葡萄牙和欧洲古老的高地地带（从佛兰德斯跨过德意志的西部和南部直至

意大利北部)；但也有少数地区地位提高了：突出的是瑞典、勃兰登堡—普鲁士及英属北美的“北部”殖民地(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的殖民地)。上述那些落伍地区历经的许多过程与我们对边缘地区的描述相似，虽然，有许多原因使这两者有着结构上的重大区别，而上述那些地位渐升的地区只是刚刚开始努力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世界经济体中心地区的一部分，就这些地区而言，即便是在这条道路上刚刚起步，也是一种成就，更何况他们能把世界经济体的种种困境变成他们的优势，而不是仍然承受由中心地区造成的更多的损失，如同大部分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所遭受的损失那样。

在这方面，西班牙的“衰落”是17世纪最突出的现象——甚至那个时代的人也能察觉此点。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西班牙衰落的原因深深植根于它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之中，并且在16世纪，其相对衰落已达到相当的程度。<sup>1</sup> 西班牙的军事力量和显而易见的金银财富部分遮掩了它的衰弱；但是世界经济的全面经济倒退揭掉了挡在西班牙外表上的帷幕，向西班牙自己和全世界展现了它的衰弱真相。如果我们需要确定一个年代，或许在1596年，即腓力二世的第二次破产之时，可以作为一个恰当的年代。这次破产“不仅标志着卡斯蒂利亚北部金融优势的结束；也意味着腓力二世帝国梦幻的破灭。”<sup>2</sup> 传统的史学著作描绘的17世纪的西班牙的图景，是一幅经济衰落的图景。在汉密尔顿伯爵看来，这幅图景不免夸张，然而他又补充说，17世纪代表了“西班牙经济史上最严重的衰退时期之一。”<sup>3</sup> 那么我们对这个时期西班牙的农业生产了解如何呢？比我们应该知道的要少。<sup>4</sup> 17世纪成了一个“不开垦土地，不灌溉土地而且牲畜极度匮乏的时期。”<sup>5</sup> 从17世纪的最初三分之一时期起，对土地的过度使用(即年年播种而不是三年一轮种)从而地力耗尽的问题当时就有许多讨论。杂粮——谷子、高粱和大麦——以及玉米代替了小麦，<sup>6</sup> 这使我们联想到了边缘地区的发展情况。葡萄酒业生产的发展损害了粮食生产，就像在法国南部一

样。葡萄酒业的发展非常广泛,以致人们开始用葡萄酒换小麦。<sup>7</sup>

伴随着西班牙农作物的变化,其出口量开始下降。总的来说,“作为一个原料出口国,西班牙(在17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实属平常。”<sup>8</sup>然而那时的西班牙并不是一个仅限于出口原料的边缘国家,它曾是一个制造业中心,现在这方面的衰落却更加突出,而最严重的还是西班牙的纺织业。作为西班牙丝麻生产中心的托莱多在1600—1620这20年间实际上已销声匿迹,<sup>9</sup>塞哥维亚和昆卡的命运也是如此。不仅纺织业,冶金业和造船业也不景气。在这三种欧洲现代早期“发展迅速的新行业”中,西班牙“失去了出口市场,[而且]也丢掉大部分国内和殖民地市场;它把那些市场丢给了英国、法国和荷兰。”<sup>10</sup>所以,在这个停滞时期,西班牙农业不仅向边缘区退化,而且向非工业化倒退。其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是西班牙日渐出现两极分化和地区间的冲突;二是西班牙不得不用殖民地的财富维持生存。

16世纪,西班牙已出现卡斯蒂利亚与西班牙的其他地区间日渐扩大的裂隙。“各种各样的因素促成卡斯蒂利亚拥有绝对的,而且日益增大的优势。”<sup>11</sup>普遍的经济困境以及西班牙沉重地卷入三十年战争所需的费用导致税收持续增加。卡斯蒂利亚无疑同西班牙其他城市一样承受负担,或许还要重些;但如海梅·维桑·维韦斯(Jaime Vicens Vives)所指出,卡斯蒂利亚得到“巨大的补偿……开发美洲大陆以及地处西班牙中心,因而具有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sup>12</sup>它与西班牙其他城市间的裂隙可能在扩大。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直到17世纪开始之际还是同卡斯蒂利亚保持各自经济平等的两个主要地区,而现在它们无论如何感受到了来自卡斯蒂利亚的新的广泛的经济压力。<sup>13</sup>因此,当奥利瓦雷斯政府(Olivares)要征集更多的费用时,“[加泰罗尼亚人]完全合乎逻辑地在费迪南德自治法的坚强保护下奋起自卫,对政府表示不信任”<sup>14</sup>——反抗的不仅有加泰罗尼亚人。1628年和1629年在波尔图和圣塔伦爆发了反印花税起义,而且1632年在巴斯克地区出

现了“盐工暴动”，新的税收是导致这次暴动的主要原因——“各种形式的敲诈勒索榨干了使人们忍耐度日而不铤而走险的最后一滴水。”<sup>15</sup>加泰罗尼亚的特殊之处不在于普遍的怨恨“突然猛烈地爆发出来，”<sup>16</sup>而是这种普遍怨恨同“资产阶级的清醒”以及“加泰罗尼亚统治阶级的矛盾心理”<sup>17</sup>结合起来。这几种不满势力的结合致使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历时如此之长，威胁如此之大。<sup>18</sup>

正是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由蓬勃发展转向停滞的时期里，葡萄牙在伊比利亚联盟中或葡萄牙人后来称之为“60年的监禁”中成为西班牙的法理上的一部分。葡萄牙王位继承的缺口，再加上1578年在阿卡扎-伊尔-凯比(Alcazar-el-kebir)军事上败于莫罗克斯人(Moroccums)，使西班牙国王在1580年率军进入葡萄牙，并成为葡萄牙的国王。因为伊比利亚联盟给葡萄牙人带来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它的反对势力并不强大。带给它的好处之一是废除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传统疆界，使葡萄牙免税得到西班牙的小麦。<sup>19</sup>好处之二是这个联盟使葡萄牙资产阶级进入了西班牙帝国，1580年这个帝国“发展到了顶峰并且强烈唤起葡萄牙人的首创精神。似乎葡萄牙人习惯于不同的文化和陌生的交易方式。他们热切地在各地扩大市场，清楚地看到这种关系带给他们的无限潜在利益。”<sup>20</sup>从西班牙的角度来讲，这个联盟允许西班牙在卡斯蒂利亚政府机构的金融压力日渐加大的时候进入新的金融网络，从而给西班牙带来了经济利益。葡萄牙的银行家现在能进入卡斯蒂利亚的金融范围——正式进入是在1606年以后，而非正式进入则在此之前。

葡萄牙人得到正在寻求解决西班牙财政问题的奥利瓦雷斯的支持。葡萄牙银行家同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机构有联系，并且可能正在使用在荷兰的存款。<sup>21</sup>(事实上他们几乎都是 marranos，即犹太人的 Conversos<sup>(1)</sup>)。<sup>22</sup>他们又是商人兼银行家，<sup>23</sup>对他们来说，进入

[1] marrano, 指被迫信奉基督教但私下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 Conversos, 教友。

——译者

西班牙也就是进入了西属美洲——布宜诺斯艾利斯、拉普拉塔河、特拉费马(Terra ferma)、安的列斯群岛。<sup>24</sup>此外,葡萄牙人可以在西班牙小舰队的保护下<sup>25</sup>从殖民地巴亚的兴旺的制糖业中<sup>26</sup>获利。所以,部分是由于伊比利亚同盟的一些益处才使葡萄牙人得以免遭 17 世纪最初的经济停滞的打击;但它不可能最终幸免。一方面,西班牙人开始反对葡萄牙人获利,<sup>27</sup>这很容易把仇恨犹太人的情绪掩饰起来。<sup>28</sup>另一方面,葡萄牙人也开始倒霉,因为西班牙人逐渐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保护。葡萄牙人把荷兰对巴西的占领部分归因于荷—西的持续冲突。<sup>29</sup>总之,卢祖—大西洋(Luso-Allantie)贸易开始逆转,<sup>30</sup>而在 1600—1630 年间这种贸易远比塞维利亚—大西洋贸易兴旺。葡萄牙人在巴西遇到种种困难,而从 1638 年起又失去了在西非与英国及荷兰的海上黄金贸易。<sup>31</sup>

1640 年加泰罗尼亚人起义的同时,葡萄牙人也开始反抗,但是没有出现加泰罗尼亚人那样的内部阶级分裂。这“使(葡萄牙资产阶级)易于接受从与西班牙的联系过渡到独立。”<sup>32</sup>葡萄牙恢复了独立并且开始同英国建立联系。博克瑟认为,在 17 世纪初,葡萄牙在亚洲的贸易控制就为荷兰人所取代,因为后者“实际和潜在的力量远胜于穷困不堪的葡萄牙王国。”<sup>33</sup>我们已经看到,葡萄牙在与西班牙的联盟中曾得到某些补偿;然而欧洲世界经济的逆转所带来的压力甚至正在消除这些补偿。在布罗代尔看来“最大的问题是:从经济角度来讲葡萄牙不是西班牙惬意的伙伴吗?”<sup>34</sup>当西班牙因分离而失去少许物质利益时,它同时又因殖民地财富开始外流而受到损失。首先,如肖尼指出,1622—1680 年期间,<sup>35</sup>美洲与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出现了大衰退。其次,走私贸易已发展成为欧洲—美洲交易的一个主要渠道。首先进行这种贸易的是荷兰人,<sup>36</sup>接着是英国人和法国人,<sup>37</sup>17 世纪逐渐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中心区国家与西属美洲的直接联系“通过走私途径提供了西属美洲的大部分基本需求。”<sup>38</sup>

因此,在整个 17 世纪,西班牙充其量是中心区国家与西班牙

殖民地之间的一个相当被动的传送带。西班牙从中心区国家输入纺织品和纽芬兰干鱼，并在国内消费；当走私贸易还没有完全超越它时，就把这些进口商品运到殖民地，西班牙则部分以出口伊比利亚半岛的原料、从殖民地获得的染料特别是美洲的金银来支付进口费用；来自美洲的金银“是同古老的西班牙进行贸易的主要吸引力。”<sup>39</sup>西班牙在财政拮据时期同联省共和国、法国、加泰罗尼亚、葡萄牙的接连不断的战争，导致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引起的Vellon币的贬值。1650年以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结果，到17世纪80年代，“卡斯蒂利亚的行政和经济全面崩溃了。”<sup>40</sup>在这种状况下，西班牙君主国很难抵挡中心区强国对美洲的蚕食和劫掠，甚至很难抵挡从西北欧向西班牙本土销售制成品的不断扩张的压力。<sup>41</sup>兰伯特总结道：“到17世纪末，西班牙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它是一个巨大而又未真正开发的市场，欧洲各种贪婪的势力都汇聚到那里……[西班牙]勉强地依赖[更先进的国家]生存。”<sup>42</sup>

葡萄牙多少面临同样的处境。从“复辟时期”英国纺织业的角度来看，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展现出广阔的海外市场的前景，虽然英国商人仅能通过中介商与南美进行贸易。”<sup>43</sup>实际上，1642、1654和1661年相继签订的《英葡条约》使英国在巴西获得的利益超过了从西属美洲获得的利益，<sup>44</sup>英国人介入葡萄牙的三角贸易（使其成为四边形贸易）使葡萄牙“更加半边缘化。”<sup>45</sup>欧洲各国、特别是葡萄牙于165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短暂的经济高涨在1670年结束时，<sup>46</sup>葡萄牙为了摆脱中介人和传送带的处境，毅然决定采用17世纪的普救药方——重商主义政策。这是1675—1690年间担任国务大臣的佛朗蒂拉侯爵（Marquis of Fronteira）和埃里塞拉公爵（Duke of Ericeira）公开宣示的政策。葡萄牙人清楚认识到这是对柯尔伯政策的模仿。他们引入法国技术人员帮助他们建立能与英法竞争的工业，<sup>47</sup>并且创立了从事非洲奴隶贸易的商人公司，试图取代西班牙的经营。有一段时间他们曾把货币的名义价值提高



20%，试图以此把金银特别是西班牙的金银吸引过来。<sup>48</sup>

葡萄牙重新谋求从巴西取得金银，也是17世纪70年代这场危机的结果，<sup>49</sup>虽然实际上到1693—1695年才发现大量的黄金。<sup>50</sup>这次危机还促使它去寻找新出口市场，而且正是在此时为马德拉岛(Madeira)的葡萄酒开辟了广阔的出口市场。英国人发现“马德拉岛葡萄酒是可在炎热气候下保存和运送的最好的葡萄酒。”<sup>51</sup>英国人事实上如此看重这一点，以致在1663年的《航海法》中，从马德拉岛和亚速尔群岛输入的葡萄酒被列为不受该法案限制的三种主要商品之一；该法案规定：欧洲的商品必须经过英国才能运到美洲的英国殖民地。<sup>52</sup>由于不受该法案限制，英属西印度群岛和新英格兰迅速成为这些葡萄酒的主要市场，<sup>53</sup>发展葡萄酒业的重要性在葡萄牙也持续增加。<sup>54</sup>1690年，埃里塞拉(Ericeira)去世。到1692年，葡萄牙的重商主义政策受到了沉重打击。原因何在呢？戈丁浩提出了三个原因：<sup>55</sup>第一，导致糖和烟草价格的全面上涨的普遍商业危机在1690年结束了，由于荷兰人的暂时困境而给葡萄牙人造成的有利地位也消失了；第二，对英属美洲的葡萄酒销售一直在增长，再加上英法战争导致英国禁止进口法国葡萄酒，并转而进口葡萄牙的葡萄酒，使后者的销售量进一步增加；<sup>56</sup>第三，巴西黄金猛增的冲击开始了。<sup>57</sup>

重商主义是作为对付严重的商业危机而采取的政策；<sup>58</sup>但固有的反重商主义的势力非常强大，一旦时机再次对他们有利，就不可能制止他们在政治上再次推行自己的主张。<sup>59</sup>葡萄牙人在1703年和1713年轻易地签订了《梅休因条约》(Treaties of Methuen)，用戈丁浩的话说，这些条约“把17世纪各种事态促成的1692年最后形成的实际局面基本上确认下来了”。<sup>60</sup>这些条约是赞美国际分工的李嘉图理论的典型体现。它们虽然没有为英国人带来新的特权，却恢复了1642、1654和1661年的条约中包含的特权。<sup>61</sup>用英国的布匹交换葡萄牙葡萄酒成为辉格派商业政策的光辉象征。<sup>62</sup>

如果说在埃里塞拉控制下(1675—1690)的重商主义时期表现了葡萄牙人阻挡他们在那个时代的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日趋下降的短暂努力,那么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可以解释为西班牙人类似的、也同样受挫的阻挡企图。在17世纪,西班牙国家已十分衰弱,以致1697年赖斯韦克和约(Peace of Rijswijk)刚刚缔结,法、奥、英和联省共和国就共谋瓜分西班牙帝国。到1702年,西班牙把赌注押到与法国结盟反对包括葡萄牙在内的欧洲其他国家。葡萄牙于次年签订了《梅休因条约》。<sup>63</sup>从英国的角度来看,法国长期以来已在西班牙馅饼中占有了太大的一份,而波旁王族在西班牙继承王位又要进一步削去英国人的一份——与其说是在美洲殖民地,不如说是在西班牙本土和整个地中海地区,削去英国人的份额。<sup>64</sup>因为在美洲英国人挫败了法国人。

法英之间进行的这场战争的波及范围远远超出西班牙。双方都力图摧毁对方的贸易网,特别是力图通过私掠船达此目的。<sup>65</sup>正如阿塞因·莱格瑞利(Arsène Legrelle)对此指出的那样,“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sup>[1]</sup>史不是西班牙的内战史。”<sup>66</sup>法国人很快发现:其西班牙盟友主要关心的并不是促进法国人的利益,而是把西班牙从它认为自己所受的经济束缚中解脱出来。<sup>67</sup>

加泰罗尼亚的起义也须用同样观点看待。1670年之后加泰罗尼亚经历了缓慢的经济复兴,这主要是因为“税收负担较轻而且……其经济衰竭不如卡斯蒂利亚严重。”<sup>68</sup>这种有限的繁荣依赖于商业上的中介作用。实行重商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西班牙不会容忍

---

[1] 1700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无嗣,生前遗言,指定法王路易十四之孙、安茹伯爵腓力为其继承人,但规定不得因此而将西班牙合并于法国。路易十四让其孙继承西班牙王位时,却以敕令肯定其孙将来有继承法国王位之权,显露了吞并西班牙的意图,英国趁机协同荷兰、奥地利建立反法大同盟,由此开始了长达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欧洲大部分国家先后卷入其中,成为欧洲国家之间的一场国际战争。但其中主要还是英法两国争夺西班牙及其殖民地和海上霸权。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失利,于1713年签订《乌特勒支条约》,英国由此加强了海上殖民势力。——译者

“这个……幻想‘贸易自由’并想成为另一个荷兰的新兴阶级。”<sup>69</sup>此外，“法国作为一个大国，则是敌人，”<sup>70</sup>它在1659年的《比利牛斯条约》中攫取了加泰罗尼亚的领土。因此，加泰罗尼亚运动——这是统治阶级的运动而不是像1640年那样一场民众的起义——“它试图与英—奥‘结盟’而导致重新征服与法国结盟的比利牛斯半岛”。<sup>71</sup>这次运动并不是一场摆脱西班牙的独立运动，而是一场希望通过阻止西班牙内部持重商主义观点的统治集团上台执政，以保护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运动。<sup>72</sup>在这个意义上，重商主义的观点是进步的功利性的观点。<sup>73</sup>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西班牙被迫放弃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以外的领土，更重要的是，它不得不与英国签订了《阿森托条约》(Asiento Treaty)，把以前为法国拥有的权利给与英国，即向西属西印度群岛输送奴隶(每年至少4800名)。有两项内容是以前与法国签订的阿森托条约所没有的：英国人可在里约德拉普拉塔建一个殖民地；每年还可有500吨位的“特许船”在西属美洲殖民地进行综合贸易。<sup>74</sup>

使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得以结束的各种条约是“反对路易十四联盟的一次无可争辩的胜利，”<sup>75</sup>但主要是英国的胜利。<sup>76</sup>

然而，加泰罗尼亚人在西班牙内部被其盟友抛弃，菲力浦五世继续加强西班牙的中央集权。1716年颁布了Nueva Planta，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丧失了自己的特权和法规。<sup>77</sup>瓦伦西亚的市镇特权在1707年已被废除。<sup>78</sup>只有纳瓦拉(Navarre)和仍效忠菲力浦五世的巴斯克地区保留其市镇特权，因而被称为“豁免省”。<sup>79</sup>在全面的国际殖民和《阿先托条约》的背景之下，西班牙的中央集权不可能实现既定的目标。<sup>80</sup>根据《乌特勒支条约》的规定，不允许西班牙改变对大不列颠损失所承担的义务，而且，用以偿付的税银折算现行货币(Vellon)的比值固定为1700年查理二世统治结束时的通行比值。这一点“有效地消除了十足的保护性银税。”<sup>81</sup>

正像罗米洛·德·索里斯(Romero de solis)着重指出的那样：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波旁王朝的胜利无疑是中产阶级和小贵族对教会和封建贵族的胜利。<sup>82</sup>毫无疑问，菲力浦五世也会力图“在《乌特勒支条约》允许的范围内”尽力结束西班牙作为一个半边缘国家的作用。<sup>83</sup>但是，果真像卡门认为的那样，“如果西班牙在乌特勒支摆脱了意大利和尼德兰带来的负担，就可以在国内恢复元气在国外重振旗鼓了吗？”<sup>84</sup>不错，波旁王朝确曾为此努力。但正如卡门本人所说，首先进行这种尝试的声誉要追溯到查理二世和1680年，当时葡萄牙也正在进行这种尝试。“菲力浦五世使西班牙基本上摆脱了币制上的混乱不堪局面，这种局面曾是西班牙近一个世纪的突出特征。”<sup>85</sup>很清楚，无论波旁王朝多么努力，西班牙也不可能在18世纪改变其经济地位；而是在1750年之后世界经济重新发展时期，丧失了对美洲的控制。如果《乌特勒支条约》的某些有利因素没有以《阿先托条约》的签订及西班牙追寻重商主义政策能力的削弱而抵销，那么人们是否应把波旁王朝的成就同其本应该取得的成就比较一下呢？菲力浦五世或许由于他延缓了西班牙在世界经济地位的进一步衰落而受到称赞，尽管这只是暂时性的，但很难说菲力浦五世扭转了西班牙每况愈下的大趋势。西班牙在重建工业基础方面所取得的任何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讲，靠的是损害法国而不是英国的利益。<sup>86</sup>

关键问题在于《阿先托条约》。英国人在奴隶贸易中肯定会有巨大的利益。此外，《阿先托条约》使这种合法贸易可以“被当作掩护物，借以向西班牙殖民地输入违禁商品。”<sup>87</sup>到18世纪30年代，这种非法贸易的规模在“南海公司”的庇护下已相当可观。<sup>88</sup>“走私贸易是‘南海公司’日常活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up>89</sup>它成为18世纪40年代“詹金斯的耳朵战争”<sup>[1]</sup>的主要原因。<sup>90</sup>走私贸易主要活动于牙买加、巴巴多斯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sup>91</sup>这种贸易通过加

[1] 詹金斯的耳朵战争(War of Jenkin's Ear),指爆发于1739年10月的英国—西班牙战争,其导火线之一,是詹金斯船长在英国下议院展示他的一只耳朵,说那是西班牙海岸警卫队劫掠他的船时割下的。——译者

的斯而成功地减少了运输费用。<sup>92</sup>英国人通过英国—西属美洲的直接贸易没有获得的利益，<sup>93</sup>却通过经由加的斯的间接贸易得手了，在这样的贸易中，西班牙最终用美洲的贵金属弥补了与英国贸易的财政差额。<sup>94</sup>西班牙在损失贵金属的同时，国家预算又出现日益严重的失衡；而这正是波旁王朝推行中央集权化的结果，这导致1701—1745年波旁王朝的王室开支增加了3倍。<sup>95</sup>法国尽力在西班牙和世界各地抵制英国势力，使西班牙获得一些喘息时机，但最终还是在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当法国“作为美洲殖民地一股势力的地位实际上被消除的时候，西班牙在此后20年间只得独自承受英国人的威胁。”<sup>96</sup>从1600年到1750年或1763年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西班牙已显示出它自己不能阻挡被称之为西班牙的“衰落”的趋势。

英国同西班牙及西属美洲的合法贸易与非法贸易兴旺繁荣，而与葡萄牙和巴西的合法非法贸易甚至还有过于此。<sup>97</sup>《梅休因条约》的影响是其直接原因。在10年中，葡萄牙人从英国进口的商品增加一倍多——而其出口量仅增加40%。这个条约扼杀了尚在摇篮中蹒跚起步的纺织工业。<sup>98</sup>与此相应的是1670—1710年葡萄牙葡萄酒的生产增加了5倍，这就“吸引了大部分葡萄牙可利用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吸引了葡萄牙更多的劳动力。”<sup>99</sup>用葡萄牙葡萄酒取代法国葡萄酒给英国带来的好处是：虽然葡萄牙葡萄酒较为昂贵，但不必像对法国那样用贵金属支付，因为英国大量的纺织品出口到葡萄牙。<sup>100</sup>这或许使英国的顾客受到更多的损失，但英国资产阶级的日子会好过一些。事实上葡萄酒贸易对葡萄牙并不是非常有利的。除去这种贸易在制造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之外，贸易本身也主要受英国人的利益所支配，“英国人靠着对贸易的支配权获取了大部分利益。”<sup>101</sup>所以，法国外交大臣杜·德·乔伊塞尔(Du de Choiseul)在1760年不无道理地指出：葡萄牙“必定已被认为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了。”<sup>102</sup>

就出口葡萄酒的价值而论，它远低于所进口的纺织品。英国

的贸易赤字至 1700 年还无足轻重，此后每年达到 100 万英镑左右。<sup>103</sup>葡萄牙所幸运的是它至少仍是一个半边缘国家。它拥有殖民地巴西，而巴西是一个富庶之地。<sup>104</sup>正是巴西的黄金使葡萄牙在 1710 年以后直至 18 世纪中叶与英国保持着贸易平衡。<sup>105</sup>葡萄牙史学家 J.P. 奥利维拉·马丁斯(J.P.Oliveira Martins)在 1908 年尖刻地指出：“巴西的黄金仅仅是经过葡萄牙而在英格兰抛锚卸船。这是为了支付英国供给我们吃穿的面粉和布匹。歌剧和信仰构成了我们的工业。”<sup>106</sup>另一方面，英国获得了必要的贵金属，其金钱储备足够支撑它在世界经济的生产和贸易总量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sup>107</sup>而且，英国不仅因此在合法的黄金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还控制了贵金属走私贸易。<sup>108</sup>英国史学家查尔斯·博克瑟在如下情况中为葡萄牙找到了安慰：“葡萄牙靠其海外殖民地及来自这些殖民地的财富，能够避免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的命运，这是葡萄牙从其海外殖民地获得的利益。”<sup>109</sup>从 20 世纪占上风的观点来看，葡萄牙在 17、18 世纪由于借助于巴西可能会较富有而不会较穷。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复杂，其以后的工业发展不在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之内，但它们不会因为没有一个巴西而受到损害；葡萄牙因为拥有巴西而能够同英国进行不平衡交换，这种交换在国内没有政治动荡时对葡萄牙的某些集团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为此付出代价的是巴西的直接生产者，但葡萄牙因此而在国内缺乏寻求结构变化的内部压力。

如果说，在 16 世纪曾是辉煌的殖民者和贵金属的控制者的那些伊比利亚国家在 17 世纪如此不光彩地下降到仅仅是西北欧加工制品的传送带的地位的话，那么，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曾是伟大的工业中心的那些地区又怎么样呢？欧洲的脊柱地区——意大利的北部、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西班牙控制的)尼德兰南部也戏剧性地衰落了，尽管它们衰落的道路不同。这些地区由于没有殖民地，因此也就没有用以购买进口商品的贵金属和热带原料，它仅有赖以生存的工业和农业，以及传统的商业和金融业。

这些国家生存的关键是其分散加工的体制。这种体制基本上由下列特征决定：实际生产者在自己的庭院使用自己的设备从事加工，使用自己的工具。他或者是有几个学徒的匠师，或者独自工作，或者以家庭小组从事生产。他从包销商那里获取其加工所需的原料，包销商因此有权按照固定价格“购买”加工产品并负责把产品运到销售市场。如果生产者独自或以家庭小组从事生产，那么一般只是部分时间从事生产并且把这种生产活动同某些经济活动结合起来。这种体制的运作经常导致生产者对包销商负债累累，这与当时在各种农业生产中盛行的债务奴役状况相似。

这种分散加工体制在中世纪时就已为人所知，但在16世纪主要是城市工业中才首次广泛发展。<sup>110</sup>这种体制常常与纺织业相联，但几乎各种工业生产都利用这种体制。<sup>111</sup>在17世纪经济停滞时期，这种体制甚至比其在16世纪发展更快，但有重大改变。在欧洲各地，这种分散制工业进入了农村。主要目的是增加包销商的利润。布罗代尔告诉我们：“凡是采用[分散体制]的地方，这种体制总是给行会以重创。”<sup>112</sup>然而，只要生产过程仍集中在城镇，行会就会利用有利时机通过合同调整包销商和工匠生产者(artisan-producer)之间的关系，从政治方面在分散体制内进行反击。<sup>113</sup>

一旦这种分散体制的工业进入乡村，包销商就要躲避行会，<sup>114</sup>用“提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sup>115</sup>的农民取代行会工匠。乡村位置也保证了劳动力的自然分散，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组织起来的危险，而原料的分配仍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包销商手中。<sup>116</sup>柯伦贝兹强调，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种体制绝不是静止的，<sup>117</sup>而是随着经济状况的发展而变化。这种体制发展的道路之一是向工人持久地依附于包销商的方向发展。<sup>118</sup>特别是半边缘国家，还应注意这种分散体制的另一个特征：这种体制经常掌握在外国的包销商手中。荷兰人与其霸权地位相适应，无处不插手其中：在北海及波罗的海的诸城市国家；在勃兰登堡、斯堪的那维亚、库尔兰(kurland)、俄国、

莱因兰和意大利北部,到处可见。但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出现在这些地区中的许多地方。17世纪时旧有的包销商集团,例如意大利人,起着日趋下降但仍然重要的作用。“少数族”外国集团也异常活跃;如德意志、北美、瑞士、荷兰以及英国的胡格诺教徒;遍布各地的犹太人和德意志一些重要地区的孟诺派教徒(Mennonites)<sup>[1]</sup>。<sup>119</sup>

就像国家机关的贪污腐败和使用雇佣军标志着国家机关官僚化(即无产化)的开始一样,这种分散体制标志着无产阶级化的开始。在分散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形式上拥有生产工具而实际上却是包销商的雇佣工人,这些包销商控制着生产者的实际收入,榨取剩余价值。但是,即使他们直接在工作场所进行监督,仍不能保证生产者的最高效率。<sup>120</sup>(相似的是,这种情况同官僚政治国家中的情形一样。)当时把半边缘国家与边缘国家区别开来的区分点正是半边缘国家还拥有分散加工工业。半边缘国家的分散工业有渐渐被外国集团控制的趋势,所以很难有贸易保护立法的实施,这又不同于当时中心地区的工业。分散加工制就是门德尔(Mendels)用“原始工业化”这个著名词语描述的那种体制,<sup>121</sup>虽然我认为把这种工业化说成“原始的”并不恰当,因为它意味着那不是真正的工业化。分散体制效率较低,但事实上比工厂体制更能剥削更多的劳动力,<sup>122</sup>因此在经济相对停滞时期,这种体制较为理想。

欧洲的脊柱地区的原有工业在17世纪都陷入了衰落,意大利北部尤其如此,但德意志和尼德兰南部的情况也基本相同。罗马诺凄楚地描绘了意大利北部的衰败景况。他将之概括为四种趋势:城市人口下降(但不是全部);历史上著名城市(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以及那不勒斯)的工业生产,特别是较廉价的纺织品的生产下降;集散贸易的衰落;物价下跌并且流通中的货币减少,而工资则完全停止增长(结果导致失业,因而乞丐和无业游民增

---

[1] 孟诺教派是1523年兴起于瑞士的一个基督新教派,反对婴儿洗礼、就公职、服兵役等。——译者



加)。因此罗马诺认为,城市经济在 1620 年至 1740 年间处于“非常萧条的状态”。此外,罗马诺又谈到了意大利农村经济的普遍衰退。<sup>123</sup>他认为意大利是 17 世纪生活在“经济衰退之中”<sup>124</sup>的欧洲大多数国家中毋庸置疑的一部分(这些国家与英国和联省共和国的情况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同于法国)。在罗马诺看来,意大利所以错过 14 世纪那样的“重新振兴的伟大历史时机”,是因为它的“整个统治阶级宁愿忍受”这场危机,准备“安稳地度过”虽然暗淡却不会伤害到他们的“漫漫长夜”。<sup>125</sup>普罗卡西(Procacci)抨击了这种认为意大利错过发展时机的观点,认为这是唯意志论的假设;<sup>126</sup>塞拉也抨击这种经验式描述,认为这种描述言过其实。他认为:到 17 世纪末,意大利北部的工业“远非衰落不堪”,工业制成品在出口贸易中仍占据“显著地位”。<sup>127</sup>他还认为,农村的状况(至少在伦巴底)更好一些——17 世纪的历程虽然面临逆境,但它仍具有相当的耐力、适应力和恢复力。<sup>128</sup>

在研究德意志西部和南部的文献中,我们也发现存在着类似的混乱解释。施莫勒(Schmoller)早在 19 世纪就强调指出:在 1600 年至 1750 年间,德意志的西部与南部“绝对依赖”荷兰。<sup>129</sup>比廷(Beutin)引用 1770 年的一项史料说明:1600 年至 1750 年,法兰克福只不过是一个由荷兰人控制的货物集散地。<sup>130</sup>安德逊认为由于荷兰人控制了出海口,从而导致了“莱茵河地区经济的衰退。”<sup>131</sup>库思克(Kuske)认为,16 世纪末莱茵兰开始出现一个“消极颓废时代”,<sup>132</sup>利贝尔(Liebel)描述了 17 世纪的战争对斯瓦比亚(Swabia)的重要城镇——奥格斯堡、乌尔姆和纽伦堡的“毁灭性影响。”<sup>133</sup>基希(Kisch)却肯定“邻近的荷兰人的支撑带来了积极的影响,”<sup>134</sup>认为这是莱茵兰之所以能“避免经济衰退”的原因,而这场衰退却在 17 世纪冲击了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sup>135</sup>

我们在讨论尼德兰南部时,也发现了同样的争论。我们知道皮雷尼(Pirenne)的传统观点是: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塞尔特河的封闭以及不能从西班牙人或奥地利人那里获得保护贸易的措施。<sup>136</sup>斯托

尔斯(Stols)支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佛来芒继续保持同西班牙的关系,也不会像从荷兰人那里获利一样而从西班牙人那里取得好处,因为西班牙对佛来芒人潜在的亲荷情绪一直抱有戒心。<sup>137</sup>另一方面,布鲁来兹(Brulez)却认为:17世纪安特卫普的状况“并不是我们今天相信的那么糟。”<sup>138</sup>他认为这是由于安特卫普继续发挥着支配者的作用,在那里做出有关欧洲贸易和商业交易的各种决定,而且佛来芒的商人还从历史上取得的商业联系中获得好处。<sup>139</sup>

所以,还是让我们更切近地考察17世纪上述地区的实际经济结构吧。城市工业的衰落在意大利北部各中心城市是确凿无疑的,至于衰落的起点是1619年还是1636年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sup>140</sup>无论如何,米兰的羊毛生产在1619年有60至70个生产厂家,年产量达15 000 panni,而1640年年产量为3 000 panni,生产厂家只有15家,1682年又下降到5家,1709年仅有一家,生产100 panni。<sup>141</sup>布尔费雷蒂把米兰羊毛生产的衰落归咎于17世纪法国的重商主义,他认为这种重商主义给伦巴底(以及托斯卡尼)的制造业和手工业以“致命的一击”;但他也归咎于工人对技术革新的抵制。<sup>142</sup>德·曼德纳(De Maddalena)指出:1706年米兰并入奥地利帝国实际上可以认为是明确地“扩大了长期衰落的趋势。”<sup>143</sup>摆脱西班牙控制而兴起的伦巴底也“陷于绝境”。<sup>144</sup>热那亚<sup>145</sup>的羊毛业和威尼斯<sup>146</sup>的各工业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利贝尔(Liebel)认为:直到三十年战争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资产阶级最大的集中地”的符腾堡的一些行业,也同样是衰退不堪,尤其是毛织业和麻织业。<sup>147</sup>

至于瑞士,人们似乎做着非做不可的事又装成出于高尚的动机,它把同法国的特殊关系变成走向半边缘的途径。这种特殊关系的源头起始于16世纪,当时瑞士人扮演着雇佣兵的角色,瑞士政府正是以此作为向法国要求免除关税壁垒的条件。法国市场因此成为“瑞士工业的主要推动力。”<sup>148</sup>尽管与法国的这种特殊关系

加强了瑞士人的地位，但他们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开始采取其闻名于世的中立立场，这种态度使他们“把法国人从德意志市场挤了出去，”<sup>149</sup>并以此作为发展出口工业的基础。<sup>150</sup>然而，当法国在1678年兼并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时，瑞士制酪业对这个地区输出的盐的依赖加强了瑞士政治上对法国的依赖。<sup>151</sup>瑞士在经济上反对法国的重商主义，<sup>152</sup>又接受法国的政治保护，并且成功地发展了钟表和制酪的家庭手工业，因此到18世纪末，瑞士就成为“欧洲大陆工业化最快的国家。”<sup>153</sup>

如上述讨论所表明的那样，不能说17世纪工业已从欧洲的脊柱地带消失，而应该说工业，特别是羊毛和棉纺业已转入乡村。已经证明，威尼斯、热那亚、亚琛、佛兰德斯、苏黎世，甚至17世纪后期的荷兰的情况都是如此。<sup>154</sup>在所有情况下，力求降低由于城市行会力量的加强所导致的高昂的工资成本，被认为是工业转入乡村的主要动因。另一方面，在这些城市中，奢华的丝绸业继续发展，这些城市中的丝绸作坊已发展成为名符其实的工厂。<sup>155</sup>工艺品的生产和出口是此时发展起来的第二种城市奢侈“工业”。<sup>156</sup>在乡村，我们看到：对农民剥削加重的趋势和分散加工的工业在同一些地区同时出现。17世纪意大利北部出现了掠夺公用地的现象，<sup>157</sup>贝尔特拉米(Beltrami)认为特拉费玛的贵族的财产“因而具有真正的大领地的性质。”<sup>158</sup>1633年威尼斯元老院明令禁止农民迁移，即使不带走他们的牲畜和生产工具，也不许迁移。所以博雷利(Boreli)问道：“我们怎能不想到庄园农奴制这种旧制度在以更现代的形式复活呢？”<sup>159</sup>

在整个17世纪，意大利北部地主对农民的控制得到加强（这是“下滑”的半边缘化的结果）；而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却是国家的力量得到加强（这是“上升”的半边缘化的结果）。这使得这两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更加接近，以致到18世纪早期，后来成为意大利和德意志组成部分的皮埃德蒙和勃兰登堡—普鲁士呈现了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sup>160</sup>尼德兰南部（和列日）也似乎出现了类似的发

展。在这里,大地主的势力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早期得到发展,许多农民由于从佃农变成交纳谷物的佃户,从而失去了某种程度的独立地位。<sup>161</sup>有关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研究著作常常强调农民保留对土地控制的程度;<sup>162</sup>然而,人们不应忽略这些地区乡村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德国学者为了说明介于领主农场与易北河以东的领主自营农场之间一些地方的新结构而发明了一个新术语领地农场(Wirtschaftsherrschaft)。<sup>163</sup>如前所述,领地农场是中欧半边缘化程度较深地带的一种盛行的体制。

一个地区的衰落一般是指这些地区的资本持有者开始转移其投资场所,所以,地区的整体衰落并不意味着个人或家庭的衰败。资本转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转向经济上具有较好前景的地区,这种形式通常呈现出自然运动的形式;另一种是在同一地区转向具有较高利润的生产单位,这经常是由于较高的剥削率所致。在 17 世纪经济停滞时期,一个地区内的资本转移常常表现为把资本投资于土地。欧洲的脊梁地带的资本家当时从事着这两种形式的资本转移。金融活动逐渐从热那亚这些中心转到了阿姆斯特丹<sup>164</sup>,工商业者和手艺人也移居——佛莱芒人移向英格兰、德意志人移向荷兰、威尼斯人移向里昂等等。拉普完全正确地认为:这些工业从业者并不是追求更高的工资,因为他们毕竟来自高工资地区。这些迁移表现着小资本家的“经营性迁徙”。他们冒险迁移是为了“获取巨大的利润。”<sup>165</sup>

对这时意大利北部资本由工业转向土地的情况已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这或许是由于这种情况在此地表现得尤为突出。布尔费雷蒂(Bulferetti)称此变化为“对土地的保险性投资”,<sup>166</sup>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虚幻的想像。伍尔夫(Woolf)提醒我们:皮埃德蒙的证据相当明确地表明,这时新旧土地所有者“都使用有效的方法进行地产的经营管理”。<sup>167</sup>塞里尼(Sereni)认为,意大利的农业进步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并指出,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农业的商品化一直在发展。[17 世纪的]经济衰退并未严重到中断其发展的

程度”。<sup>168</sup>显而易见,当毛纺织业不景气时,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农业是企业家投资的理想场所。意大利北部较大程度上的粮食自给自足,再加上“水稻的推广”扩展到未曾利用过的土地上,<sup>169</sup>部分地促成了主要粮食作物的世界性生产过剩,致使东欧粮食生产在17世纪大幅度衰退。

意大利北部的资本找到了保护自己的其他方法。其一是 Commenda 或 Commandite 的出现,尤其是在托斯卡尼的丝绸生产中。这是一种有限责任的合股关系的形式。达·席尔瓦(da silva)认为我们应将此视为一种“资本集中的形式”<sup>170</sup>。其二是包税制的兴起,这与国家贷款有关<sup>171</sup>。在一些人看来,意大利北部17世纪和18世纪国债的出现是用来“从生产活动中榨取更多的金钱”<sup>172</sup>。或许是这样的。但这些钱又落入谁的手中?落到了那些抢先利用贷款的实业家手中——虽然意大利北部整体上在衰落,但个体的资本家仍然存在(甚至生机勃勃)。

现在我们再讨论一下在17世纪漫长的停滞时期找到了发展机遇而不是走向衰落的那些非中心地区的情况。其中,瑞典显然是独占鳌头。1599年废黜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查尔斯(后来是查尔斯九世)成为摄政时,瑞典只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很落后的小国。但到1697年查尔斯十二世继位时,瑞典已成为欧洲的一个军事强国,而且相对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强国。那么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中世纪晚期,斯德哥尔摩属于汉萨同盟的一个城镇,而且总的来说,直到16世纪,瑞典“几乎处于德意志的一个殖民地的地位”<sup>173</sup>。虽然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Vasa, 1523—1560)在位期间这种状况开始变化,但迟至1612年政治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仍然是如何从市政官职中排除德意志的势力<sup>174</sup>。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行会从没有在瑞典站住脚跟。行会是“从德意志引进的外来产物”。在某种程度上说,瑞典的确存在着行会,但只限于斯德哥尔摩<sup>175</sup>。

16世纪中叶,某些地方的贸易量开始增加。德意志的垄断被

打破，荷兰人和苏格兰人的贸易打进来。外国纺织品的进口开始增加<sup>176</sup>。瑞典的出口也向前发展，特别是矿产品的出口<sup>177</sup>。（瑞典）边缘化的过程似乎正在出现，但结果不同于东欧<sup>178</sup>。众所周知，在瑞典，农民在法律上处于非常强有力的地位。16世纪中叶埃里克十四世（Erik XIV）在位期间，“等级”一词首次为瑞典人普遍使用，<sup>179</sup>“议会”一词的用法也是这样。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等级议会在1617年最终确定下来，瑞典第一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四个等级的议会，第四等级就是明确规定为拥有农庄的农民。<sup>180</sup>我早就曾把这种独特性解释为由于土壤和气候的因素造成瑞典农业经济落后的结果，这意味着在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发展时期贵族并不认为土地关系的“（重新）封建化”有多少利益。<sup>181</sup>结果，贵族的兴趣并不是像东欧的大地主反对其统治者那样，直接反对瓦萨王朝推行国家机构集权化<sup>182</sup>。

当17世纪经济衰退的最初征兆开始冲击欧洲时，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Gustavus Adolphus）（1611—1632）能够利用这种危机进一步加强瑞典的国家力量，并且发动了一场经济改革。他调动瑞典的资源投入三十年战争。他增加税收，同时规定可用货币交税。他推行包税制。他还从普鲁士榨取金钱（所谓的普鲁士特许证税或港口通行税）。他实行王室垄断，这种垄断未能控制盐和谷物贸易，但多少垄断了铜和铁。总之，正如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对此所作的概括：

古斯塔夫·瓦萨统治时期的瑞典所处的边缘与落后地位一去不复返了。由于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的推动，瑞典的经济利益已经与欧洲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在经济方面的政策顺应了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模式。<sup>183</sup>

铜的作用十分奥妙。“铜是穷人的黄金；”<sup>184</sup>最需要铜的穷人却是西班牙那个富豪。它在16世纪垄断了白银资源。由于卡斯蒂利

亚试图维持哈布斯堡在尼德兰的统治而造成的财政压力，掌管菲力浦三世政府的勒玛(Lerma)公爵在1599年允许铸造纯铜的Vellon。从此，西班牙开始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个事实表明，“对于一个长期拮据的政府来说，从钱中赚钱的诱惑力实在太强烈了。”<sup>185</sup>整个17世纪，Vellon的发行，以其持续的贬值而开始，也以持续贬值而告终，直到1686年通货膨胀被最终控制住为止。<sup>186</sup>

虽然西班牙是铜本位贬值的主要牺牲品，并且因此也是扩大世界对铜的需求的主要推动力，<sup>187</sup>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牺牲品。1621—1623年，德意志出现了自行浮动的货币。1607—1621年法国铸造了大量的铜币。<sup>188</sup>1625年瑞典也转向铜—银本位制。<sup>189</sup>此外，造币并不是此时黄铜的唯一用途。人们喜欢荷兰生产的水壶和铜器；自15世纪中叶以来，铜就用于造加农炮。17世纪让位于铁造加农炮的青铜加农炮在1600年达到其用途的顶点。<sup>190</sup>在16世纪，铜的主要来源是提洛尔、上匈牙利以及图林吉亚，无论这些来源的枯竭是由于开采殆尽所致还是为瑞典的产量所淹没，<sup>191</sup>瑞典已迅速成为欧洲主要生产国，采铜是瑞典最主要的经济活动。<sup>192</sup>

在这第一次巨大的跃进中——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执政时期开始，并在克里斯蒂娜女王统治时期，在阿克塞尔·奥森蒂耶纳(Axel Oxenstierna)执政时继续发展的瑞典与荷兰的联系，是其关键所在。我们可以说，瑞典的经济发展主要是（至少直到1660年）“在荷兰人的庇护下”取得的。德·弗里埃(de Vries)就是这样说的<sup>193</sup>。但这种说法有些模糊。特罗伊(Treue)更加谨慎地表述了这种现象：瑞典在为生存斗争并且争取成为一个大国的不同时期，得到了荷兰和汉堡的国际商人和实业家的支持，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说来很有意义。”<sup>194</sup>购买瑞典铜的正是阿姆斯特丹（以及汉堡），既用以作为铸币的主要成分而再出口，又向尼德兰各城市大量的制铜业提供原料。<sup>195</sup>在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执政时期，我们看到，外国（主要是荷兰人和佛莱芒人）开始投资于瑞典的矿业

和冶金业,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参与经营管理。<sup>196</sup>大量的荷兰贷款的条件是“必须以铜偿付”。<sup>197</sup>劳役偿债制这种人们熟悉的模式正在被用于国际债务。

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在1619年试图通过创立瑞典贸易公司,以控制瑞典铜的市场来解除这种威胁。<sup>198</sup>这位国王努力把短期国库收入的较大优势同促进结构的变化结合起来。最初的特许证把垄断权授予瑞典贸易公司,条件是该公司必须在三年内建起铜的冶炼厂和精加工厂。这个公司欢迎外国资本,并且也确实成功地吸引了外国资本。该公司试图利用汉堡去牵制阿姆斯特丹市场。但是世界黄铜市场突然跌落,到1627年这个公司也就瓦解了。这也许是由荷兰资本家操纵的?不过,我们倒是知道:特里普公司(这是瑞典铜的主要投资者)也同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有联系,这个公司在1624年就购买了日本的铜。特里普公司全部购买了VOC在1624和1627年从日本进口的铜。我们也知道:1627年以后特里普对瑞典施放新贷款,也是以铜偿付,从而使阿姆斯特丹重新占有了主要的铜资源。<sup>199</sup>

如果我们还记得大约是在同一时期(1614—1617年)英国的科克因总督计划的相似的失败命运,那么,这种似乎是要使瑞典经济摆脱荷兰人控制的努力的失败,就不会使我们过于看重了。我们毕竟是在讨论荷兰称霸的时代。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的种种努力的引人注目之处,并不是他对付精明的荷兰企业家的无能,而是在建设瑞典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方面取得的成就——正如诺德曼(Nordmann)所说,这两者结合到一起,使瑞典在17世纪成为一个“武装的民族,靠战争生活并把[战争]作为自己的国家工业。”<sup>200</sup>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是他那个时代杰出的军事革新家。他采用了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的组织方法并加以改进,为欧洲军队创立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延用至法国革命。他强调训练和纪律,并进行了战术改革,使所有的战争恢复了以主动出击为重点的战术。最重要的革新或许是:他的军队由武装的



农民构成。诺德曼认为其独特性在于“这支军队是本民族的军队，而非外国雇佣军。”<sup>201</sup>

我们不要忘记，外国雇佣军在 16 世纪十分盛行。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不可能完全抛弃雇佣军，但他降低了它的作用。他能够充分利用瑞典封建传统淡薄以及从未组织中世纪时的重装骑兵这一事实。瑞典之所以没有组织中世纪时期的重装骑兵，部分是地形条件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农民的强大，而后者也是土地条件造成的结果。

古日耳曼人的尚武传统在瑞典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地方保存得更多；闯入瑞典森林的入侵者，遇到的是居民的人海战术。他们主要是步战，如果地域开阔，他们就组织成不正规的庞大的散兵群。<sup>202</sup>

征集的军队的主要编制是地方团队，主要吸收工匠和青年农民入伍，不像当时其他一些军队那样把“下贱人”拒之门外。建立了中央军需补给站。军饷由一个分散的体系定期发放，该体系负责分配从纳税户征集的收入，武器和军需品实行了标准化。炮兵被置于重要地位。

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建立了兵器工业，使瑞典达到了军备自给。<sup>203</sup>他组建军队的一大特点，是从国外筹集相当大一部分军费。在三十年战争中为瑞典军队筹措资金而颁发的所谓“普鲁士特许证”的作用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这些特许证由波兰和瑞典在 1629 年签订的《阿尔特马克休战协定》(Truce of Altmärk) 确认下来。它允许瑞典在布兰登堡和库尔兰(Courland)的港口增加关税，特别重要的是允许在格但斯克加收关税。收入是可观的，大约相当于有案可查的全部军费的 20%。当 1635 年这些特权被废止时，代之而起的是在《斯图姆斯多夫条约》(Treaty of Stuhmsdorf) 中允许瑞典在立窝尼亚征收关税的权利。<sup>204</sup>瑞典基本上得到了一部分由

东欧流向西北欧的剩余价值,并用来确立它本身的半边缘地位。

军队是这个正在崛起的半边缘国家的重要工具,但是报偿则体现在工业化之中——不只是铜。在整个 17 世纪,作为瑞典采矿与工业生产的核心,黄铜已让位于铁。首先,铁取代了铜成为供应世界市场的原料——不仅用于造炮,<sup>205</sup>而且用于制造家用铁器。<sup>206</sup>然而,从瑞典的优势地位来看,铜与铁的区别在于:在当时世界拥有的铜矿资源中,瑞典占有绝对多数的份额,铁矿床却分布于欧洲各地。瑞典要作为铁的生产者竞争,不可能依赖于对矿石的近乎垄断和独自保有的技术。但它通过利用某种资源的好运并将此变成社会经济利益,的确非常有效地进行了竞争。这种好运就是瑞典的铁矿石具有“不寻常的高纯度”,就当时的技术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使瑞典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sup>207</sup>瑞典在生产中,“对质量的重视”<sup>208</sup>是 17 世纪和 18 世纪瑞典在铁的销售中受到称赞的突出特点。

瑞典铁的开采至少要回溯到 12 世纪。甚至当时,其韧性铁的高质量就闻名欧洲<sup>209</sup>。16 世纪前半期,低价的韧性铁出口德意志,炼成高价的条形铁,这首先惹怒了古斯塔夫·瓦萨。为了结束资源的外流,他引入德意志的技术人员,建立了瑞典的锻铁工场。然而,生产的韧性铁继续超过条形铁。1600 年至 1650 年之前,韧性铁占生产的 2/3,此后比率趋于平衡。炼钢业也发展起来了。由采韧性铁用矿石到锻造条形铁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这位国王提供了大部分投资。投入了资金就需要扩大开采,还需要相应地向瓦姆兰省 (Värmland) 那样拥有大量矿产资源的边远地区移民。<sup>210</sup>现在,瑞典铁工业的重要地位已足以吸引荷兰的实业家。15 世纪 80 年代,威勒姆·范·维克 (Willem Van Wijck) 获准租借乌普兰的矿山并在铜业垄断中获得一份权益。在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统治时期,国家放弃直接管理,再加上军备工业的发展,引起外国资本更大的兴趣。17 世纪早期,荷兰人路易斯·德吉尔 (Louis de Geer) 发挥着主导的作用。<sup>211</sup>虽说对工业的实际管理常常易手于国家与

外国实业家之间，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冲突不如说是共存。

诺德曼(Nordmann)谈到了铁的生产的起飞以及“首次工业革命。”<sup>212</sup>国家鼓励铁的生产，并且是主要买主，将铁制品用于军事装备。传统的冶铁小作坊主的地位得以保存，让他们从事铁矿开采和冶炼生铁，而拥有大冶制厂的外国大企业家则“被允许垄断精炼过程，并保证他们获得廉价的原料和半成品。”<sup>213</sup>在这些大铁厂中，劳动力主要由从瑞典边缘地区招募来的人构成——芬兰人以及来自瑞典粮食不足的地区农民构成——还有企图免除兵役的人和逃犯。简而言之，外国企业家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sup>214</sup>冶铁小作坊主保留的地位并不是给瑞典实业家保留的地位，恰恰相反，这些小作坊主通过包销制降到了半无产者的地位，他们由此负债于外国商人。瑞典冶铁业的历史与欧洲纺织业的普遍情况相似：

外国进口商向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出口商预支，这些出口商又向冶铁小作坊主预支，作为这个链条中最后一环，冶铁小作坊主又向工人预支。……所有各方都受其预支贷方的约束。……预支给工人的，通常就是主人仓库中的商品。由于工厂通常位于瑞典的偏僻地区，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的。<sup>215</sup>

人们或许会怀疑这里所描述的钢铁生产的景像是否有些夸张，因为主调似乎是外国的控制。然而我们必须牢记两点。首先，对瑞典来讲，17世纪是一个新兴出口工业的发展时期，我们说，这与波兰不同。另外，松脂和其他船用产品的出口，这可与波兰粮食和木材的出口相抵而有余。<sup>216</sup>其次，瑞典通过使企业家贵族化能够最终使工业“国有化”，<sup>217</sup>关键在于有意识地运用国家机器。实际上，瑞典国家近乎垄断了17世纪欧洲世界经济中的三种产品——铜、高质量的铁以及树脂。由于瑞典先是与霸权国家联系在一起，后来又从中心国家之间的角逐中获利，因此瑞典国家机器在此时

采取了类似当时英国和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sup>218</sup>在一定意义上说，瑞典有点像石油输出国组织。瑞典利用这三种半垄断产品建立了牢固的讨价还价地位，若没有这种地位，政治—军事扩展就难以实现。<sup>219</sup>政治—军事的扩张又转而促进了工业的改造。

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为瑞典军事力量奠定了基础，使其继承者们得以主宰安德逊所称的“东面的榔头，”<sup>220</sup>这种地位至少持续到北方大战（Great Northern War）之前，当时它的势力达到了极限，在1721年承认了它在北方大战中的失败。只要荷兰还保持霸主地位，瑞典就安然无恙。<sup>221</sup>瑞典通过1658年的《罗斯基勒条约》（Treaty of Roskilde）从丹麦手中得到了斯堪尼亚（Scania）。斯堪尼亚不仅是“波罗的海的门户”（由于控制着松德海峡，即厄勒海峡），而且100年后表明它也是瑞典的谷仓。<sup>222</sup>到17世纪中叶，瑞典已获得爱沙尼亚、立窝尼亚、英格瑞亚（Ingria）以及科克斯霍姆（Kexholm），把东波罗的海地区“变成了瑞典—芬兰本土的殖民地；<sup>223</sup>它还获得了不来梅—费尔登（Bremen—Verden）、波默恩（Pommern）、哈兰（Halland）以及耶姆特兰（Jämtland）以西的地区。简而言之，到17世纪50年代，对瑞典的波罗的海政策的唯一确切的表述就是“自觉的经济帝国主义。”<sup>224</sup>随着政治—商业的扩张，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商船<sup>225</sup>和海军舰队<sup>226</sup>的规模扩大了，占有的地位也显得更加重要了。

瑞典能建立比较强大而有效率的国家机器依赖于对贵族势力的羁縻。这个时期瑞典的阶级结构及其在世界分工和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使这一点成为可能，16世纪开始推行的把王室财产和岁入分割给贵族的政策在17世纪前半叶加速实行。这个政策“在国家财政方面包含了相当广泛的重大举措。”<sup>227</sup>不仅包括由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开始的包税制的实施过程，还包括通过出售和馈赠把王室土地和自由地产的岁入转让给贵族，作为对他们出任公职和承担军役的报偿。<sup>228</sup>这些是王室获得快速周转的资源途径；也是扩大瑞典经济的货币流通领域的途径；但是王室获得的利益是

以大贵族的政治经济势力日益增加为代价的。这新的势力由 1626 年的《贵族注册法》(1644 年重新确认)加以确定,它把 1617 年建立的等级议会中的贵族等级的选举权限制到 126 名注册的贵族,由此排除了较为贫穷的小贵族。“按瑞典的标准,上层贵族相对于王室而言,无论在相对或绝对意义上都非常富有,或许还变得越来越富有”。<sup>229</sup>

然而,农民的力量也非常强大,而且在 1617 年的等级议会中也被确认为一个等级。实际上农民分为:kronobänder,或者说是王室土地上的农民;frälsebänder,或者说是贵族土地上的农民;skattebänder,或者说是纳税农民,也即自由农民(freehold peasants)。自由农民所纳的税接近王室农民所交的租,但他们在法律地位上更加有保障。frälsebänder 免交国家征收的税并且只向贵族交纳相当于其他两种农民所交的一半的税,但他们的地位非常没有保障。他们可以轻易被驱逐,服从于领主的司法权力,而且一年必须为贵族服 30 天的劳役。<sup>230</sup>此外,当农民等级确立时,frälsebänder 就被排除在等级成员资格之外。<sup>231</sup>一般地讲,虽然这三种农民在经济报酬上区别甚微,人们还是普遍感到由于 frälsebänder 的租佃权没有保障,因而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sup>232</sup>王室地产的分割使一些原来的王室地产农民变成贵族地产农民。许多自由农即使不是在法律上,也在事实上遭此命运。<sup>233</sup>数字是惊人的,到 1654 年,贵族控制的土地由 21.4% 增至 63%。<sup>234</sup>农民奋起反抗。1634 年,农民等级由于担心沦为 Servitus(仆人)而“大声疾呼要求废除贵族特权。”1650 年,一位农民的代言人说:“农民知道在其他国家老百姓就是奴隶,他们担心会面临同样的命运,而他们生来本是自由人。”<sup>235</sup>

通过包税制出售收税权,固然可以增加国库岁入,但问题在于这是以加剧以后几年的预算危机的代价来解决一年的预算危机。我们必须记住:瑞典为了不断扩张而大力推行重商主义,导致了沉重的军费开支,<sup>236</sup>而它却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自然资源正在用尽),而且人口不多(17 世纪中叶瑞典人大约 100 万,芬

兰人和其他民族有 50 万)。这导致 17 世纪国家财政始终处于“紧张状态”。<sup>237</sup>1655 年因需要为波兰战争筹集经费,不得不首次实行“削减”(reduktion),也就是把王室转让给贵族的土地收回王室手中。<sup>238</sup>1655 年的“削减”规模比较小。在所谓不可转让地区的以前的王室土地被收回。1632 年以来“馈赠”的其他土地收回了 1/4。1604 年以来违背国会的 Nonköpping 决定(它规定只能按“采邑”条件赠送土地),而作为自由持有地赠送的一切土地如今都被重新确定为按“采邑”条件持有的土地。虽然 1655 年的“削减”规模不大,也不剧烈,<sup>239</sup>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再加上贵族人数的增加,就迫使他们通过出任官职寻找更多的收入。<sup>240</sup>

我们已提到过普鲁士特许证作为岁入来源的作用。1635 年这些特许证被废止了,在 1637 年至 1679 年间为法国津贴所取代。这些津贴如此重要,以至阿斯特罗姆称此时的瑞典“实际上是法国的卫星国”,称瑞典的军队是“法国在中欧和东欧的政策直接工具。”然而,法国津贴带来的岁入总额小于普鲁士特许证带来的岁入总额;然而无疑,正如阿斯特罗姆所说,“依赖法国的津贴总比从波罗的海贸易诈取钱财好些”。<sup>241</sup>所以,有总比没有强。当然,在波罗的海的贸易量极小<sup>242</sup>的法国人非常愿意使瑞典成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潜在的贸易竞争对手。对法国津贴的依赖也对上层贵族有利。上层贵族通过利用这些津贴中的收入,再加抵押或出售王室土地的收入,维持其“豪华的贵族生活方式”。17 世纪中期和晚期是法律上和实际上的摄政时期——即 1632 年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去世至 17 世纪 70 年代末查尔斯六世实际掌权这段时间的一多半时期。<sup>243</sup>在这段时期内,上层贵族以政务议事会成员资格购买王室土地,并将国税收入用于自己消费。

1680 年实行了“大削减”。这一举措从经济上似乎不难解释。全面停滞时期国家开支不断增加<sup>244</sup>、国家收入越来越多地转归贵族,<sup>245</sup>以及法国津贴的停止<sup>246</sup>,都给王室带来了财政危机。一项政治决定解决了这场危机。由于王室拥有的同盟者远远超过上层贵

族,才得以通过该项决定。那就是接连通过的两个“削减”法令。1680年国会决定收回按“采邑”的条件脱离王室的所谓的 Norrköpping 决议地产(价值 600 银币以下的地产除外,由此保留了小贵族的财产)。1682年国会进一步认可中世纪土地法授予国王既有权封授也有权废除采邑的权力;这实际上是授予国王以全权,依其所愿进行削减。<sup>247</sup>事实上大部分土地回到了王室手中,王室更加富有。而王室之所得即贵族之所失,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sup>248</sup>此外,这类土地的大部分后来由查尔斯七世卖给公务员、资产阶级和贵族——但条件是这些土地都要变成纳税地。<sup>249</sup>

另一方面,人们不应该夸大贵族的衰落。因为在削减以前的一个时期,除了贵族占有地(frälse)的比例靠着兼并王室与自由农民的土地稳定增长外,还出现了另一个变化:在 frälse 这类土地中,出现了亚类型,即 ypperligt(或最大的)frälse 土地。这是指庄园家庭农场,即 Säteri 及其周围土地,与贵族土地上的农民耕种的分散地块并存。分散地块要对王室承担某些轻微的义务,Säteri 则不承担任何义务。在“削减”前一个世纪里,ypperligt frälse 地作为 frälse 土地的一部分在发展,即贵族土地日益集中化。<sup>250</sup>“削减”开始时,贵族有权选择还回的土地。一般说来,他们交回分散地块而保留庄园,因此贵族土地进一步集中化,使贵族土地上的农民受到损害。<sup>251</sup>

然而,一般说来国家从“削减”中比从增加收入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特别是由于 1682 年名为配额制的饷酬支付制度的修改,为军队筹集资金奠定了更可靠的基础。全国的农庄现在划分成农庄组,每组包括三至四个农庄。士兵从农庄组获得军饷,并且住在那些地区的村舍。军官被安排在从贵族那里“削减”过来的土地上。大农庄必须为骑兵提供给养。沿海地区的农庄必须为水兵提供给养。推行了一种取代征兵制的“替代”制度,就是:步兵、骑兵和水兵不再从占有土地的农民阶级中征集,而是从那些无财产的“从童年起就习惯于服从其世俗和精神长官的乡村雇工中征募;

军官现在是“有薪金的王室的仆人，他们除了从军外没有别的职业。”<sup>252</sup>由于推行了“削减”才使这种更为合理的制度成为可能，在此之前，王室没有足够的农庄为这种制度提供支持。<sup>253</sup>

就国家机器在 17 世纪不断加强的程度来说，瑞典在非中心地区中引人注目。它创立了一支令人畏惧的军队。它控制了贵族阶层的贪婪并使其为国家服务。<sup>254</sup>它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冶铁工业和一支相当可观的商业舰队。它在波罗的海抵制英国，使它至少不能立即继承衰落中的联省共和国的所有特权。<sup>255</sup>不要说同波兰和匈牙利相比，就是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相比，瑞典的国家是强大的——在许多方面几乎与法国一样强，虽然比英国和联省共和国弱得多。实际上，从英国和联省共和国的角度来看，瑞典和法国正是 17 世纪进行军事扩张的两个大国。但瑞典在查尔斯十二世时其力量似乎刚达到顶峰之际，就表明它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sup>256</sup>

就欧洲标准而言，瑞典的人口相当少，所以对于它的国家机器来说，瑞典基本上是一个财政基础不巩固的国家。正如伦德克瓦斯特(Lundkvist)指出，瑞典帝国的财源“从长远看不足以维持它的地位。”<sup>257</sup>经济上，瑞典“达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衰落到那种地位——介于边缘与中心之间。瑞典不仅从其在波罗的海的战略地位中而且也从 17 世纪东欧边缘地带的日益衰落中获利。玛丽安·马洛维斯特从一个波兰人的角度看待这一点，认为瑞典是一个寄生虫：

在 17 世纪，瑞典从其邻国的工业衰落中获利，也从邻国贵族力量的巨大发展导致的政府衰弱中获利。总之，瑞典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以其邻居的衰落为生的寄生虫，并且主要是由于邻国的衰弱，在 100 年间瑞典成了波罗的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不过后来又让位于俄国。<sup>258</sup>

随之还让位于普鲁士。



1696—1697年，即北方大战爆发之前，芬兰受到饥荒的打击，大概丧失了1/3的人口。然而，国家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制止斯堪尼亚的市民向芬兰王国以外输出粮食。<sup>259</sup>此外，瑞典作为中间人的作用首次不仅遭到中间国家的打击，也受到俄国——商业链条的另一端——的打击。英国、联省共和国和瑞典在17世纪企图把俄国并入世界经济所作的努力充其量只取得有限的成功。<sup>260</sup>1695年，沙皇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在俄国掌权，并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和“西化”运动，包括他（作为“大使”）对西欧的访问（集中了解那里的造船业）。1703年圣彼得堡的建立（将成为俄国的波罗的海港口）以及对瑞典的挑战。从世界体系的整体观点上来看，彼得的努力可以看成是要充分参与世界经济体的尝试——但俄国是作为一个半边缘国家而不是像波兰那样的边缘地区的国家去参与。为此就有必要（虽然实力明显不足）消除瑞典的中介人的作用。瑞典同彼得一样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瑞典对东波罗的海沿岸的征服地区，有充分理由被视为维护其强国地位的堡垒，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保卫。”<sup>261</sup>

1700年，由于波兰—撒克逊国王奥古斯塔斯二世对立窝尼亚的进攻而爆发了北方大战。彼得参加了这场战争。为了乘此时机打击俄国人，瑞典阻止结束这场战争，<sup>262</sup>但它没有强大到从军事上打败俄国人。彼得采用了焦土撤退的政策，这注定要成为俄国典型的抵挡入侵的政策；后勤供给的困难以及冬天的到来使瑞典1709年在乌克兰的波尔塔瓦惨败。<sup>263</sup>诺德曼(Nordmann)认为，查尔斯十二世的政治帝国主义政策“打破了”查尔斯十一世确立的“均衡”。<sup>264</sup>什么样的均衡呢？查尔斯十二世推行帝国主义扩张，在国内造成过重负担，这是瑞典人民不能接受的；前一个世纪查理五世在卡斯蒂利亚打破的也是这种均衡。“配额制”确立了“税源与开支项目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sup>265</sup>这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国家预算，在长期的战争中就很难维持下去，尤其是在没有外国的津贴和兵员补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北方大战中，8万军

队“不得不主要从这个帝国的中心地区招募”；一旦俄国人真正为战争动员起来，“瑞典就只有认输而别无他择。”<sup>266</sup>

继续进行战争是查尔斯十二世的错误决断吗？是他的狂妄自大导致了灾难吗？去争论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很难说有什么意义。因为瑞典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sup>267</sup>在某种意义上，瑞典的力量是一种假像；一旦它的假像被识破，其地位也就发生了“根本改变。”<sup>268</sup>1721年，瑞典把立窝尼亚、爱沙尼亚、英格瑞亚、卡累利阿——东波罗的海的大部分地区——丢给了俄国。它还将其在德意志的占有地割给了普鲁士。瑞典因而失去了土地、人口、国家收入，对其“谷仓”的控制<sup>269</sup>——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在波罗的海的垄断地位。<sup>270</sup>由于瑞典巨人的立足基础是它所处的半垄断地位，所以，“日耳曼—斯拉夫的推进”成功地使瑞典成为二流国家。<sup>271</sup>对瑞典来讲，内部的因素导致的结果是引人注目的。表面上，似乎专制主义让位于议会自由。从1718年至1772年这段时期<sup>272</sup>是瑞典历史上的所谓 Frihetstiden，即“自由时代”。1680—1682年的大妥协由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新旧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的融合而形成。这种妥协由“自由时代”加以完善和完成。这与1688—1689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沃波尔<sup>[1]</sup>时代使英国革命得以完善和完成一样。唯一的区别是：18世纪英国正在逐步成为一个世界霸权国家，而瑞典则在争取成为一个强大的半边缘国家并最终成为一个中心国家而努力，并为其失败的困境所困扰。因此英国在实际上的一党制之下达到了政局稳定，而瑞典则明显地表现出地道的两党制下那种资产阶级之间的内部纷争。

自由时代的最初几年中，瑞典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的破产。阿维德·霍恩伯爵（Count Arvid Horn）领导了一届致力于和平<sup>273</sup>和“温和的重商主义”<sup>274</sup>的政府。1738年出现一个名为“镶边帽党”的

[1] 沃波尔（Robert Walpole 1676—1745），又译为华尔波尔，英国辉格党领袖、下院议员，曾两次出任财政大臣，一度成为英国政府的实际领导人，促进了现代责任内阁制的形成。——译者注

强硬的重商主义政党，并推翻了霍恩，但他们实际上执行了同样的政策。<sup>275</sup>镶边帽党执政到 1765 年，随后在英国取得世界性胜利的时候为其反对派“无边帽党”取代。镶边帽党的政策仿效法国，即重商主义和通货膨胀的政策；他们代表了大规模出口业、冶铁业及纺织业业主的利益，他们的口号是“瑞典人穿瑞典制造的衣服”。无边帽党的政策仿效英国，即自由贸易、紧缩通货；他们代表了进口商、小商人和工业家的利益，他们以无社会特权的激进党派面目出现。<sup>276</sup>但是在安德森称之为“腐败的贵族议会政治”<sup>277</sup>的把戏后面果真有选择余地吗？可能与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情况相差无几。北方大战时瑞典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对西班牙一样：都是一种试图摆脱世界经济强加于它们的结构束缚的努力。二者都没有成功，但都阻挡了更坏事态的发生。

只要英法谁将赢得对抗的胜利还不十分明了（直到 1763 年为止），瑞典就（同西班牙一样）仍可能利用其回旋余地并且发挥比它的实力允许发挥的程度还要大的作用。<sup>278</sup> 后来，在 1763 年至 1815 年间，瑞典的结算时刻来到了，当时由于法国最后阶段的抵抗，英国收回了它的赌注。瑞典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强国。国家机器的力量与瑞典国王形式上的权力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通过瑞典与丹麦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到。丹麦比瑞典更早就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并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久，然而远比瑞典软弱，相比之下，瑞典的政策却使它充当了半边缘区的角色。人们常认为丹麦是一个“独特的星座”，<sup>279</sup>不适合于现代早期欧洲劳动分工的任何一种模式。我们在第四章中指出：我们认为丹麦是主要出口廉价商品的边缘地区的组成部分。就丹麦而言，主要是出口粮食和牲畜。然而，与 17 世纪大部分边缘地区不同，丹麦在 1660 年建立了专制君主制，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这种政治上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推力把丹麦推进到同瑞典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一样的半边缘国家范围中去，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

一方面与东欧，另一方面与瑞典相比，丹麦的经济结构如何

呢？彼德森 (Peterson) 强调丹麦优于东欧诸国，因为丹麦既出口粮食又出口牲畜，这意味着它在困难时期有更大的灵活性。<sup>280</sup> 这可能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衰退的第一阶段 (1600—1650 年) 对丹麦的打击比对东欧诸国的打击要小；实际上 17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早期对于丹麦在世界市场上的利益来说是一个……最后的兴旺期。<sup>281</sup> 这个时期丹麦贵族极端的封闭性和免税权使他们在这一时期能够不断地把土地集中到手中。<sup>282</sup> 然而，国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地主，<sup>283</sup> 再加上他在三十年战争中得以增加松德海峡税，为他确保了大量的国库收入。<sup>284</sup> 瑞典经济体系的区别在于，农业不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源泉，它的生产与出口项目主要是矿物，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是瑞典工业增长的基础。而且瑞典农业生态上的特点加强了农民的社会力量，也阻止了类似于领主保留地之类的发展。

就农村社会结构来说，丹麦处于相反的一端。丹麦的农业组织包括大庄园和它周围的农民农场。农民农场的所有权属于庄园领主，农民要向领主服役而不交租金。承担这种劳役的阶层，或者称为周役农，人数上一一直在增加，到 17 世纪中叶占农民总数的 40%：“服役劳动不仅用于农田，还用于运货、建筑、手工艺劳动，甚至港口的装卸。”<sup>285</sup> 同一时期，丹麦商人的作用大大减小。德意志和荷兰的商人把丹麦人从出口贸易中排挤出去，尤其是在 1630 年至 1645 年的“最后的兴旺时期”更是如此。<sup>286</sup> 在 1645 年的《克里斯蒂安诺帕尔和约》(The Peace of Christianopol) 中，瑞典人 (同荷兰人一样) 强迫减少松德海峡税，以致 (现在的) 王室收入降到它以前“微乎其微的零头。”<sup>287</sup> 所以，在三十年战争的有利时机结束时，<sup>288</sup> 丹麦成了一个十足的边缘地区。它有主要面向出口的盛行劳役制的庄园农业；它的商业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国家机器的财政基础微弱 (最富足的土地实行免税；海峡税已微不足道)。

丹麦王室在 1657 年对瑞典宣战，以求恢复其失去的战略—经济优势，而当时瑞典已卷入其他战争。丹麦希望得到尼德兰的援

助,但没有实现。这场与瑞典的战争以 1658 年的《罗斯基勒条约》而告终。它很快引发了丹麦的政治危机。丹麦必须把斯堪尼亚、哈兰和布胡斯(Bohuslän)等省割让给瑞典,即松德右岸的全部地区和两岸的临近地带。<sup>289</sup>然而,当年晚些时候,当瑞典的查尔斯十世重新发动战争试图兼并整个丹麦时,他立即遭到荷、英、法的反对,他们一起达成了所谓的《海牙协议》(1659年5月11日)。这三个中心国家在协议中要求交战国(恢复)和平并且禁止“在波罗的海阻止非沿岸国家的船队航行。”<sup>290</sup>丹麦由此免于灭亡,因为中心区列强要压制瑞典,为了它们的利益要确保丹麦有税收基础以维持一支足以发挥地缘政治作用的强有力的军队,这显然不同于 1657—1660 年的情况。

此外,丹麦的国债相当惊人,1660 年超过 400 万 rigsdaler,其中 38%是欠外国的,其中 1/4 是欠尼德兰国会的,另 1/4 欠于荷兰的商号,其余的是欠汉堡和吕贝克的商人集团。所以荷兰国家和外国私人债主极为关注丹麦摆脱其财政上极端困境的能力,正像乔根森(Jørgensen)所说:

关于这个国家的债主在 1660 年的结构剧变和随后发生的情况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很难确定……但就近期来讲,它对政治发展肯定有相当大的影响,……丹麦国家的破产肯定会给北欧的相当一部分商人带来恶果。……通过授予债主管理王室土地的权力,已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清偿了债款。<sup>291</sup>

这是有助于说明丹麦为何突然实行专制制度——这似乎是很难解释的——的一个背景。专制制度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君主变为世袭而且“至高无上”;意味着行政管理的变革——包括建立枢密院以及对北方官僚结构实行更直接的控制。它意味着贵族自主权的结束和税收的增加。总之,它意味着国家能够在偿付外债和制止瑞典扩张上发挥某些作用。

然而，它意味着改变其基本的经济结构吗？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变。贵族仍有免税权，虽然现在要求他们把从自由农民那里征来的税上缴以支持国家。现在国王能够把自己的土地变卖给新近迁来的德意志的服役贵族，而他们在建立出口型庄园结构方面会迅速同旧贵族展开竞争。由于现在重点转向单一经营（粮食而不是牲畜），所以减少了丹麦与东欧经济结构之间原有的细微差别。<sup>292</sup>在30年中，贵族拥有的土地逐渐增加——使王室和自由农民都遭受损失。<sup>293</sup>另一方面，农民在经济和法律上的地位也在恶化。1733年最终发展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sup>294</sup>至于国家，无疑比以前具有更大的购买力；<sup>295</sup>然而，当瑞典加强其在本国征集的军事力量时，丹麦却放弃了在本国征集的军事力量，转而依靠雇佣军。<sup>296</sup>丹麦在重商主义立法方面也做了一些微薄的努力，<sup>297</sup>但丹麦国家的力量基本上是徒有其表，而且以外国为靠山。丹麦的经济地位同样如此。的确，在1650—1750年期间，无论怎么说它也是在日益边缘化。

尽管丹麦形式上是君主专制，但仍是一个边缘国家。这一点并不真令人吃惊，远为惊人的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边缘地区，勃兰登堡，到18世纪却首先能够发展成为半边缘强国，即普鲁士，<sup>298</sup>随后又超过并最终把一些似乎更有希望上升的国家——北面的瑞典及南面的萨克森和奥地利——抛在后面。要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就必须考虑：（1）作为经济力量的表现的国际体系内部不断的相互作用；（2）特定地区在历史上特定时期能够发挥的经济作用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范围）。普鲁士发展的关键在于：从中心国家的角度来看，在中欧为某个主要的半边缘国家留下了一个位置。当瑞典徘徊不前时，普鲁士就顺势补缺。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是，这是怎样发生的和为什么发生。但如果我们不首先理解同一地区的两个国家为什么未能同时获得普鲁士所获得的成功，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一过程。

在17世纪，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地区在农业生产的社会组

织方面经历了大体上与波兰和东欧其他地区同样的过程。这是盛行领主自营农场(Gutswirtschaft)和领主农场(Gutsherrschaft)的地带,与德意志南部的领主农庄(Grundherrschaft)和/或者领地农场(Wirtschaftsherrschaft)不同。<sup>299</sup>16世纪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大地产通过购买(常常是强买)和兼并农民迁出后遗弃的土地发展起来。<sup>300</sup>三十年战争之后这一过程在梅克伦堡、勃兰登堡及波美拉尼亚发展异常迅速。<sup>301</sup>劳役由一周平均2天、3天增加到6天。<sup>302</sup>随着土地由农民手里转到大领主手里,这些土地也就变成免税(地),这意味着留在土地上的农民“负担更加沉重。”<sup>303</sup>在哈布斯堡统治地区,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发展情况与此相似,但奥地利本身却仍旧盛行传统式的田庄。<sup>304</sup>如果我们把易北河以东地区同东欧其他边缘地区相比较,农民所受的压迫是一样的;实际上可以说他们的处境更加悲惨。<sup>305</sup>

那么18世纪的普鲁士是怎样出现的呢?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易北河以东农民所受的压迫比波兰农民更重,但土地集中的程度较弱。领主农场(Gutsherrschaft)要多于领主自营农场(Gutswirtschaft)。吕特格(Linge)要我们注意克莱普(G.N.Knapp)的名言:“领主[Gutsherr]在经济上愈不富有,就愈加施用权势。”他由此得出了如下结论:这是君主力量发展的源泉。<sup>306</sup>没有真正的土地集中,大部分地产属于中等规模,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达官显贵阶层”的缺乏是易北河以东地区与包括欧洲大部分其他边缘地区的突出区别。<sup>307</sup>这就意味着,面对着潜在的中央权力,容克阶级比起17世纪欧洲其他边缘地区的领主来说,从经济上获得政治统治的能力较弱。这方面力量的弱小是普鲁士崛起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很难说是充分条件。然而它同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结合起来了。

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前,勃兰登堡选帝侯<sup>[1]</sup>“充其量是一个上层容克,”<sup>308</sup>他生活在一片分散的、无防御的土地上,在这块土地上没

---

[1] 即有权选举“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诸侯。——译者

有大量的资源或商业收入，并且有“一些欧洲最顽强的独立城镇和不屈服的贵族”<sup>309</sup>。三十年战争恰恰同时又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权力处于最低点的时期，也正是他的良机，其中部分是由于纯粹的运气。<sup>310</sup>这运气就是，勃兰登堡选帝侯间接地继承了一些土地：1609年继承了克勒夫斯（Cleves，莱茵河北端邻近联省共和国的一个地区）的公爵领地；1625年继承了普鲁士（濒临波罗的海，邻近波兰，并且实际是在波兰的保护下）；1637年继承了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由此使自己处于两个主要的战场之间，即莱茵兰和波罗的海之间。勃兰登堡获得了为各个欧洲国家“垂涎三尺”的“具有极高战略意义”的地区，并且“没有动用自己任何军事力量”就做到了这点，它自己的军队也不堪此任。<sup>311</sup>此外，大国也允许勃兰登堡占领这些众所覬觐的地区。1637年勃兰登堡要求获得较远的波美拉尼亚时，此地正为瑞典人占领，由于法国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的支持，波美拉尼亚被承认是勃兰登堡的一部分。<sup>312</sup>勃兰登堡就这样成为均势政策的最先受益人之一。正是为了遏制瑞典，其他国家才支持勃兰登堡的扩张；正是为了防止瑞典国王毁掉这种惬意的形势，勃兰登堡的大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将他的注意力转到创立能够维持这个扩大了版图的官僚体制和军队上来。<sup>313</sup>

此时，容克在经济上不可能强大到足以建立自己的小规模军队，虽然他们的同辈，波兰的豪绅显贵具备这个条件。勃兰登堡选帝侯也不十分强大，他正在谋求税款以建立强大的、足以迫使容克纳税的军队。<sup>314</sup>1653年的大妥协（Great of Recess）是灵活妥协的第一步，在这当中，大选帝侯实际上把容克们地产中的全部收入（记住，并不是多到那种程度）加上通过官僚体制获取的新收入都给与了容克阶级，并为此得到了沉重压榨农民和城市市民的权力作为回报。他因此得以建立强大的官僚体制和军队，对外保护国家，并最终使其继承者得以在国内确立发展工业的政策（容克阶级不想也不可能制止这一点）。这种妥协对其他地方的国王



——波兰国王、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和西班牙的波旁王朝——来说似乎也是可行的。为什么只有勃兰登堡能够做到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所发生的情况，到1653年，主要税款是所谓的（军事）赋税，即一种土地税。贵族免交此项赋税，在乡村，贵族们推举一名贵族在农民中摊派这个地区承担的全部赋税。这个国家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收入相当少。

1650年选帝侯召开等级会议，希望说服贵族们允许他仿效荷兰并实行任何人都不得豁免的消费税（即针对商品征收的间接税）。然而，联省共和国这样一个中心国家所能够采取的措施，对于即使由一个精明强干、魄力非凡的统治者领导的边缘国家来说，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贵族拒绝实行消费税。然而，在多事之秋需要维持一支军队，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两方达成了1653年妥协。这是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选帝侯在6年多的时间里征收了一笔50万塔勒(thalers)的附加税，但没有消费税；他在相当程度上允许容克们使农奴制进一步制度化。最重要的条款是作出了法律上的推定：农民除非能举出反证，否则就是农奴。如果这就是全部内容的话，我们今天就很难提及1653年的妥协。它看起来似乎是17世纪一个颇为边缘化的国家的一个颇为辉煌的胜利。但是1653年的妥协对这位大选帝侯来说却是“得寸进尺的开端”，<sup>315</sup>1655—1660年北方大战中他就利用了这一妥协的成果。我们已经讨论过这场战争，当时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军事作用已达到它的顶峰。它打败了波兰和丹麦，制止了俄国的扩张，获取了斯堪尼亚，因而也就得到了松德海岸的一边。

勃兰登堡是怎样趁机行事的呢？1657年以前它站在瑞典一边反对波兰，随后又在荷兰人的支持之下转而站在波兰一边。因此它制止了瑞典吞并波兰，或至少制止了吞并波兰的沿岸地区，而自己则获得了对普鲁士的完全控制。这样，勃兰登堡就通过限制瑞典人的力量支持了荷兰人（和英国人）。它是当时唯一能做到这点的国家，因为它创立了一支通过1653年妥协而获得税收后建立

起来的军队。在勃兰登堡国内，这位大选帝侯得以把这种地缘政治上的成功转变成它的直接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卡斯腾把北方大战而不是 1653 年妥协看成是国力增加的转折点的缘由。<sup>316</sup> 回顾大选帝侯此后一系列政治举措的细节——各个地区各种等级会议，各种法令，对 1674 年柯尼斯堡市民起义的镇压——不如去回顾大选帝侯在 1688 年统治结束时为止，即光荣革命和九年战争的前夕发生了什么变化。<sup>317</sup>

大选帝侯把枢密院重新组建成为中央政府机关并建立了财政、军事和司法等三个职能部门，负责贯彻中央的决定。<sup>318</sup> 这些官僚机构管辖范围很广泛，而其规模到 18 世纪也“小得惊人”<sup>319</sup>，国库收入从 1640 年的 100 万塔勒增加到 1688 年的 330 万，<sup>320</sup> 主要用以维持一支志愿兵的军饷，军队中的一部分是由外国人组成的。1653 年，常备军为 4 000 人，1688 年为 30 000 人，<sup>321</sup> 然而，这些官僚机构的权力进不了容克等级的大门，在这个等级内，由容克们自己选举的地方长官控制着最高权力。<sup>322</sup> 但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对这些庄园主却有波兰、奥地利、丹麦和瑞典统治者所没有的有利条件——大地产甚少。这一点，再加上容克们时运不佳，<sup>323</sup> 大规模战争的破坏<sup>324</sup> 以及土地中自然资源的贫乏，<sup>325</sup> 意味着为普鲁士国王效劳可能是对物质欲望的极大满足。……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条件下，这是获取或增加财富的绝好捷径之一。<sup>326</sup> 由于并不存在大地产所有者，所以它不仅是“绝好捷径”，实际上还是唯一的途径。

因此，容克既需要在地产上艰难度日，<sup>327</sup> 又渴望加强作为他们必需的职业出路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官僚机构。<sup>328</sup> 结果就使国家无需付出官职冗滥的昂贵代价，就建立了现代官僚体系。<sup>329</sup> 它允许保留贵族的某种封闭性<sup>330</sup>（法国则不可能做到此点）而同时又维持节俭有效的国家机器。勃兰登堡—普鲁士同此时欧洲的任何国家一样，既扩大贵族对农民的“封建”权力，又把贵族吸收到国家官僚中去。但是因为容克地产充其量只具有中等规模而且比较穷，国家

结构<sup>331</sup>不断增强——最初作为军事力量，后来作为作用于世界经济的一种力量——所以到18世纪初，普鲁士成了一个半边缘国家。

当然，在某些方面，奥地利所处的地位使它可以更好地充当普鲁士力求充当的那种角色。在17世纪初，奥地利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强国。哈布斯堡王朝推行了反宗教改革政策，到17世纪中叶使奥地利、捷克和匈牙利大部重新皈依天主教。1620年白山(White Mountain)战役后，哈布斯堡王朝摧毁了波西米亚，并“将(其)降到一个省的地位”。<sup>332</sup>这场动乱把波西米亚贵族从独立的土地占有阶级变成了宫廷贵族，并消灭了当地的资产阶级。<sup>333</sup>此外，哈布斯堡能够充实并不限于贵族的国家官员，如勃兰登堡—普鲁士一样。<sup>334</sup>但哈布斯堡王朝始终未能把其统治的版图组成一个在国际体系中适当发挥作用的坚固统一的国家。只有民族比较单一的国家结构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兴旺发达。<sup>335</sup>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其前辈查理五世所陷入的同样困境。

哈布斯堡统治力求达到这种统一的主要绊脚石是土耳其的军事力量。17世纪是奥地利同奥斯曼斗争的世纪，以1683年土耳其的围困达到高潮。当时哈布斯堡王朝成功地抵抗了对维也纳的第二次包围。<sup>336</sup>然而，当哈布斯堡王朝显现出胜利的喜悦时，胜利之中也包含着代价——此时对匈牙利贵族的让步，他们总是趁机打土耳其牌，要求拥有在哈布斯堡王国内的自治权。<sup>337</sup>土耳其直接的经济威胁以及对这个国家的结构的间接影响，使哈布斯堡在17世纪“或许比其它任何统治者”<sup>338</sup>都更加饱尝国库匮乏之苦，使他们“特别拮据”<sup>339</sup>。到查理六世统治(1711—1740)时，奥地利的财政收入只能维持相当于法国一半的军队，实际上仅比普鲁士稍强一点儿。<sup>340</sup>结果，就其重商主义的努力的效果而言，拥有两倍于普鲁士的军队和更多的财富与人口的奥地利，取得的成果却仅仅与普鲁士大体相当。

我们应该清楚地记住如英法这样的中心国家的重商主义与

半边缘国家的重商主义的区别。特罗伊(Treue)对此指出：

基本上，[重商主义]在中心区国家相当于侵略扩张的经济政策，在德意志，它带有自负性的防御目标；与其说是征服市场，不如说占据市场；与其说渴望统治他国，不如说是抵抗他国——尤其是西欧邻国——的统治<sup>341</sup>。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到拿破仑时代结束的整个时期，在德意志诸邦，实际上在整个中欧，都是重商主义时代。<sup>342</sup>哈布斯堡的重商主义政策可追溯到1660年左右。<sup>343</sup>霍亨索伦王朝从这位大选帝侯开始，把重商主义作为政府的主要政策。<sup>344</sup>问题的实质在于这些重商主义政策取得了哪些成就。一方面，1650年至1750年国家鼓励制造业的结果在各地“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这可能是真实的。<sup>345</sup>冯·克莱弗恩(Von Klavern)认为，落后国家中的重商主义是“假重商主义”，其真正目的是“增加地方权贵的财富”。他还认为“没有任何人真正希望重商主义取得成功。”<sup>346</sup>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真的，但如果只说到这一点，就忽略了可能至少推行了假重商主义的半边缘国家与可能连假重商主义也未推行的边缘国家之间的区别。

同样显而易见，在这个漫长的衰落时期里，半边缘国家的重商主义为大约在1750年之后世界经济体扩张时期制造业的显著发展奠定了基础。<sup>347</sup>所以，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的是18世纪上半叶发生的情况，可以说当时瑞典已经在这场竞争中被击败，而普鲁士和奥地利事实上正在竞相成为中欧最能充分利用欧洲进一步发展机会的强国。查理六世1711年登上哈布斯堡王朝的宝座；1713年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登上普鲁士王位。1713—1714年，随着乌特勒支和拉施塔特(Rastatt)条约的签订，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奥地利获得了西属(现在奥属)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和撒丁尼亚(1720年以萨伏依交换西西里)。1718年通过帕萨洛维茨(Passarowitz)协议从奥斯曼获得了

塞尔维亚、巴纳特和小瓦拉几亚 [在 1699 年的卡洛维茨 (Carlowitz) 条约中已获得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奥地利重新建立了维也纳东方贸易公司 (1683 年的初建未成功), 以便从巴尔干贸易的新机会中获利。1719 年, 查理六世终于能够使的里雅斯特和阜姆宣布为自由港, 这个意图在 1675 年曾进行了首次尝试。<sup>348</sup>

这样, 奥地利“向海洋推进”, 1719 年是一个转折点。奥地利现在既可以进入大西洋 (在奥斯坦德), 又可以进入地中海 (在的里雅斯特)。它试图同威尼斯和汉堡竞争。<sup>349</sup> 它似乎最终要成为一个强国。<sup>350</sup> 它突然发现自己同时与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发生了争执”<sup>351</sup>——因为它们都受到奥地利新的贸易要求的威胁。可以肯定, 此时普鲁士的力量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在《斯德哥尔摩条约》(1719 年) 中, 普鲁士获得了瑞典在德意志的最后领地。它现在在军事上要强于瑞典, 到弗里德里克大帝统治时, 普鲁士获得了“欧洲军事强国的声誉”, 而这一声誉到查理七世死去之前一直为瑞典所有。<sup>352</sup> 到 1713 年, 普鲁士仍是一个“主要的农业国”,<sup>353</sup> 其资源也“少得令人不屑一顾”<sup>354</sup>。然而, 到 18 世纪中叶, 奥地利就已经被确定为第二流的世界强国, 并保持到 1918 年, 当时普鲁士正在向着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强国迈进。使普鲁士的崛起成为可能的是我们前已论及的它的特殊的国内结构,<sup>355</sup> 如果我们不探讨英—法竞争的情况, 我们就无从解释有利于普鲁士的普—奥之间的激烈竞争, 而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

巴勒克拉夫认为: 此时这两国的竞争“势必导致两败俱伤”;<sup>356</sup> 其实这样描述并不完全对。普鲁士被利用去将奥地利撵了出去, 并得到了西里西亚作为奖赏。西里西亚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自 10 世纪以来诸强就对它展开了争夺, 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 西里西亚是勃兰登堡外交政策中的首要目标。<sup>357</sup> 西里西亚是“东欧的一个名符其实的工业区, 是 [奥地利] 世袭领地

上的一块宝石。”<sup>358</sup>无疑,英国、荷兰和汉堡的商人都购买西里西亚的亚麻,它可以说是反映了“殖民渗透的典型模式”。<sup>359</sup>然而,生产是地方性的,特别是三十年战争之后,亚麻生产以采购制的形式在村庄这一层次上得到了发展,村子里的商人采购后把产品出售给集中控制产品质量的大商人。<sup>360</sup>在许多情况下,庄园内也有工厂,庄园主是企业主,农奴挣取工资。<sup>361</sup>这些广泛的工业活动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在哈布斯堡王朝所属的波希米亚的三个地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中,西里西亚以“其农奴与领主关系相对温和而著称”。<sup>362</sup>所以当1748年普鲁士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获得西里西亚作为奖赏时,它就因此而占有了哈布斯堡版图内“最繁荣、工业最发达的省份。”<sup>363</sup>

这对奥地利是一个“压倒性的打击”,不仅是由于西里西亚的工业产量,还因为西里西亚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同外部世界的“主要的贸易中介”。<sup>364</sup>奥地利失去西里西亚所带来的影响,也波及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因为后者的纺织业者到1742年为止一直都在向西里西亚的商人出售其纺织产品。即使像和约所允许的那样,这一交易还可以继续进行,这些规定是否实行,恐怕“在经济上取决于普鲁士的意愿”<sup>365</sup>。奥地利被迫缩回到原来的地位。这样,普鲁士获取西里西亚就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大大推进了19世纪工业化的进程<sup>366</sup>。普鲁士军队和国家的创立,再加上英国人(和荷兰人)要抑制瑞典并进而挫败奥地利的需要,使上述情况成为可能;而普鲁士土地贵族相对于其他边缘国家的贵族所具有的独特的软弱性,又使普鲁士军队与国家的创立成为可能。正是一个世纪中各种事态的促成,才使勃兰登堡这个微不足道的边缘地区到1750年有可能成为具有极大潜力改变它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的欧洲半边缘强国。

英属北美的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殖民地构成了这个时代产生的完全不同于其他的最后一个半边缘地区。这些地区的殖民化仅仅始于1620年。而且可能除了新阿姆斯特丹作为荷兰的世

界网络中的军事和商业前哨以外,这些地区在 1660 年以前甚至还没有构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sup>367</sup>。的确,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只是在王朝复辟时期才被英国人殖民化。<sup>368</sup>北美的转折点是 1660 年,因为那是英国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殖民地利益[要服从于]本民族利益”<sup>369</sup>这一重商主义信条制度化。17 世纪 60 年代英国颁布的各种航海条例规定,凡被“列举”到的最重要的殖民地产品——糖、烟草、染料木等等——必须装上英国的船,并且卖给英国人,这大大影响了西印度和切萨皮克流域的生产者。最初,这些条例对北美殖民地并没有产生什么消极影响,部分地因为它们极少得到贯彻,部分地因为这些殖民地并不是大量生产以上列举的产品。<sup>370</sup>实际上,“在英国海运业能够满足殖民地的全部需求以前”<sup>371</sup>,为了把荷兰人赶出北美洲,这些航海条例刺激了殖民地的造船业,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影响是积极的。

17 世纪时,这些殖民地生产的产品极少卖给英国,并且它们本身太小,不足以成为英国商品的市场,但它们参与运输贸易竞争,并因此几乎成为英国的一个负担。英国对它们没有撒手,部分地是由于担心法国会控制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先占权的保留。<sup>372</sup>斯图亚特王朝进而废除特许权,并通过在 1684 年建立“新英格兰自治领”取得了对这些桀骜不驯的殖民地的有效控制。如果新英格兰对斯图亚特王朝政策的反抗没有与最终导致了光荣革命的英国国内起义同时发生,这些地区可能就实实在在边缘化了。光荣革命“结束了或至少延缓了对殖民者的威胁”<sup>373</sup>。所以,正是由于洛德(Lord)所谓的“对这些殖民地粗心大意的忽略”——但更为恰当的说法是由于执行英国重商主义雄图大略在国内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使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的商人到 1770 年不仅作为造船主,还作为贸易中间人“迈出了一大步。”<sup>374</sup>

这些商人卷入到所谓的三角贸易中,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同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中,西印度群岛的糖浆进入北美殖民地,而北美殖民地的糖制甜酒和零碎小商品运往非洲,非

洲的奴隶则被贩到西印度群岛。在与英国和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中，北美殖民地的粮食和木材运到西印度群岛，西印度群岛的糖和烟草输入英国，而英国的加工制品则被贩进北美殖民地（或在英国出售北美殖民地的船只）。在同南欧和英国这第三种规模较小的三角贸易中，北美殖民地的小麦、<sup>375</sup>鱼、木材进入南欧；南欧的酒、盐和水果运到英国；英国的加工制品则再次被贩到北美殖民地。对这些著名的三角贸易我们必须着重注意两点。这些三角贸易很大程度是分别地构成的。它们反映的主要是商品的流动而不是船只的运动。北美殖民地的船只集中在西印度群岛一带穿梭，只是偶尔越过大西洋到达英国，几乎不怎么去非洲。<sup>376</sup>

其次，英国人强迫北美殖民地保持直接贸易逆差，这意味着后者如果想获得英国的加工制品，就必须拥有硬币。由于三角贸易并没有使他们得到必需的金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或者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从而减少从英国的进口），或者找到一种主要物产。<sup>377</sup>18世纪上半叶北美殖民地同英国的政治斗争集中围绕在这两种选择中寻求哪一种的问题。17世纪时，北美的殖民者作为造船业主、船运商和西印度与欧洲的粮食供应商，逐渐成为英国生产者的对手。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他们“（与其说）是（英国人的）一份财产，不如说是一个对手”，因此也是“英国领地中最无价值者”<sup>378</sup>。1689年后，英国人积极努力<sup>379</sup>以改变这种状况；他们试图通过鼓励生产一种新的土特产品（海军舰船用的树脂等补给品）并抑制刚刚兴起的工业生产，<sup>380</sup>来发展北美殖民地作为英国制品市场的功能。怎样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建立”市场呢？就是促使当地的人们为世界经济而生产；如果当地的人民没有足够高的收入，就鼓励“殖民”。英国人正是采取了后一种行动方针。这使他们同美洲的法国人、荷兰人、甚至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明显地区分开。<sup>381</sup>

在1713—1739年之间，确实有一股特别重要的移民潮流，尤其是移向大西洋中部各地。由于英格兰人并不希望大量移居，所



以那时他们通过向非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北爱尔兰人以及所谓的荷兰人(他们实际上是德意志人和瑞士人)<sup>362</sup>——开放英属北美殖民地而实现这一目的。英国人希望这些移民从事新的土特产品——海军补给品的生产。这不仅有希望给英国人带来经济利益,而且会带来军事利益。长期以来,英国殖民地贸易的一种“严重欠缺”<sup>363</sup>就是海军补给品,弥补这一缺陷成为英国在整个17世纪政策中的一个“坚持不懈的目标”。<sup>364</sup>由于1689年“九年”战争的爆发,这一缺陷更加严重。英国几乎所有的海军补给品的生产或运输都落入瑞典人手中,他们是中立的,但又是亲法国的;这是造成英国人“总是惴惴不安的一个原因”。<sup>365</sup>可供选择的资源显然就是北美殖民地(以及爱尔兰)。1696年,英国建立了贸易和殖民委员会(Board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其首要关心的事就是使英国摆脱对瑞典的依赖。他们企图实行垄断以达到目的,但这种办法遭到了强烈抵抗。<sup>366</sup>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这个问题再次变得尖锐,而且这种情况又与作为垄断者的斯德哥尔摩柏油公司的建立相随发生。这就导致了1705年“海军补给品条例”的出台,其中规定以奖励金来诱导北美殖民地的生产。<sup>367</sup>力图使英国摆脱对瑞典的依赖,显然并不是“海军补给品条例”的唯一动机。内特尔(Nettles)提出了三条理由证明在北美殖民地建立市场才是主要目标,甚至是根本的动机。首先,对瑞典的依赖实际上只限于沥青和焦油,而“海军补给品条例”除鼓励这些生产外,还为树脂、松脂、松油和造船木材(的生产)提供奖励金——所有这些东西本来能够从许多国家获得。其次,海军官员似乎对这种依赖最不关心,这使人产生了对短缺真实性的怀疑。他们一直以质量差为由反对从北美殖民地获得沥青和焦油。(然而,内特尔提醒我们,贸易委员会的官员指控海军官员与东方商人勾结牟利。)第三,贸易委员会对从卡罗利纳获得沥青和焦油并不感兴趣,即使质量优于北美殖民地的产品(当然,卡罗林纳已经生产这种商品。)

内特尔进一步认为：海军补给品计划最一贯的支持者正是那些同北美殖民地做买卖的英国商人。<sup>388</sup>无论如何，北美的移民仍然对木材的生产比对焦油和沥青的生产更感兴趣，<sup>389</sup>而且木材不是运到英国，而是用于当地的造船业，<sup>390</sup>事实是，造船业的发展对于英国商品市场的发展至少做到了一项成功的海军补给品生产方案所能做到的程度。这或许是以下事实的根本原因：在航海条例的保护下，“出于最实际的目的”，移民拥有的船只从不被排除在英国拥有的船只享有的特权之外。<sup>391</sup>由于这个原因，在北美殖民地造船具有经济意义，那里虽然工资高，但木材的价格低到超出了补偿工资因素的地步。<sup>392</sup>由于在1675—1775年间美洲殖民地航运业生产率的稳步提高，这种比较优势得到加强。<sup>393</sup>结果，到1775年在英国注册为英国所有的全部船只的近1/3都是在北美殖民地建造的——这是“殖民地繁荣的一个重要根源。”<sup>394</sup>

至于造船业以外的殖民制造业，英国人的确试图加以阻止，但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1699年，他们通过了《羊毛法令》，禁止将货物运到殖民地以外的地区。1732年通过了《帽子法令》，也作了类似的限制。1733年的《糖浆法令》试图限制糖酒的生产。1750年的《冶铁法令》则禁止再建冶铁厂。<sup>395</sup>所有这些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贯彻。<sup>396</sup>原因之一是英国人对与荷兰人、德意志人及法国人的竞争的关注远比对殖民地的制造业的关注更为积极<sup>397</sup>。而且，正如布吕什(Bruchey)所认为的，在北美殖民地“熟练劳动力的不足和资金的缺乏及有选择的分配”已成为一种“自然的”限制<sup>398</sup>。无论是否是自然的，这种因素的确导致英国政策实施的松弛，而且至少到1763年以前都是如此。我们如何总结北美殖民地的这段经历呢？它们在多方面都是幸运的。它们缺乏自然资源，但它们是正在崛起的世界工业和贸易强国的殖民地，而强国与它们相距很远，这使它们能通过开发一项主要的资源——木材，用于造船业，得以在经济上大获其利。造船业是一个开端，也是一个关键性产业。这些条件创造出来以后，就使得在18世纪下

半叶变化的形势下爆发了美国革命，到 19 世纪，一个主要的工业强国崛起起来。

1600—1750 年这一段时期，最初是英法摧毁荷兰霸权，随后又各自发展到顶点的时期。在这一漫长的相对停滞（相对于延长的 16 世纪明显的经济扩张）时期里，边缘地区的直接生产者遭受了大大加重的剥削，并减少了当地剥削阶层的利益（减少是与中心国家类似阶层相比较而言的）。半边缘国家的情况复杂得多。中心国家试图使它们成为对边缘性国家充当剩余价值传送带的中介人。中心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但在中心国家内部出现了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一些地区能够提高自己的相对地位。属于这种情况的国家首先是瑞典，后来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在较小程度上，英属北美殖民地也是这样。

## 注释

1 参见沃勒斯坦(1974,第 5 章多处)有关 16 世纪西班牙结构的讨论。关于 17 世纪西班牙思想家对他们的衰落的自我感觉，参见埃利奥特 (Ellicot) (1977)。

2 见埃利奥特(1966,p.283)。鲁伊斯·马丁(Ruiz Martín)把“衰退的世纪”定为 1586 到 1680 年或 1690 年(1970,p.43)。不过，有时为了说服参加实际讨论的人们，有的学者举出了另一些事件和另外的 50 年。1643 年 5 月 19 日西班牙步兵在罗克鲁瓦(Rocroi)的失败似乎标志着曾长期支撑着西班牙强国地位的军事体系的崩溃。那时西班牙已没有可以左右新的国际局势的军队和领袖人物(p.345)。在斯特拉德林(Stradling)看来，直至 1668 年，“由于西班牙正式承认葡萄牙的独立而蒙受最大的耻辱，因此腓力二世的世界帝国不复存在”(1979,p.82)。G. 德斯德瓦斯·德·德尔泽特(G.Desdevises De Derzert)说，到 17 世纪末，“西班牙再也谈不上有什么实在的军事力量”(1927,p.354)；并参见 E.J. 汉密尔顿(1943,p.192)。

3 见 E.J. 汉密尔顿(1935,p.111)。乔斯·詹特尔·达·席尔瓦(José Gentil da Silva)也认为出现了“衰落”，虽然，这可能是“过于简单”的表述(1965,pp.175~179)。最近有两篇文章从相反的观点向传统观点挑战。卡门认

为, 17世纪不是一个衰落的世纪, 因为西班牙自15世纪以来就处于“从属地位”, 所以“很难去说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怎么能在未曾言强以前就‘衰落’了”(1978, p. 35, p. 41)。斯特拉德林认为, “西班牙的努力及其势力范围[延续]到17世纪60年代”, 并且直到那时, “一个对手或若干对手联合起来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给它一次致命的打击”(1979, p. 167, p. 171)。斯特拉德林在这里重复了亨利·豪泽(Henri Hauser)把“西班牙的优势地位”确定为1560—1660年的观点。

4 参见J.H. 埃利奥特于1961年指出这方面的欠缺。韦斯尔(Wisser)引用并响应了他的这一看法。(1973, p. 615)

5 见E.J. 汉密尔顿(1935, p. 111)。显示塞哥维亚(Segovia)情况的生产曲线“有助于证实17世纪是一个‘衰退’或‘停滞’的世纪的观点”(见阿尼斯和勒·弗莱姆)(Anes and Le Flem)(1965, p. 16)。

6 见达·席尔瓦(1965, pp. 156~158); 并参见阿尼斯和李·弗莱姆(1965, pp. 18~19)有关黑麦和燕麦生产的相对增长以及由于耗尽了腐殖质和肥料从而造成的土地过度利用的论述, 他们还指出, 种植黑麦需要的人力较少。

7 见达·席尔瓦(1965, pp. 158~160)。

8 见林奇(1969, p. 153)。

9 见韦斯尔, 他认为, 若要对此作出解释, 希望不要像E.J. 汉密尔顿那样强调“外部因素(也就是金银)的重要性”, 而是用“卡斯蒂利亚内部的经济状况”来解释。然而, 他所提三个内部因素原来是: 其一, “在维持生存与发展工业的需要之间失去平衡”。这种失衡大约开始于1575年, 其原因又是马斯塔畜群的减少和对北方贸易的偏好, 由此迫使托莱多更加依赖于殖民地的工业实力; 其二, 因商品的出现, 这些商品……以低于当地产品的价格大量出售; 其三, 马德里的兴起, 它吸引了托莱多的人口, “王室的帝国野心”导致了后者人口的减少(1973, pp. 614~615, pp. 637~640)。韦斯尔还把都市人口的衰落归因于对莫里斯克人(Moriscos)<sup>[1]</sup>的驱逐(p. 632), 这也是沃登(Warden, 1864, p. 261)在解释托莱多的亚麻生产濒于消亡(从1550年的50家工厂减至1665年的13家)的原因时所引用的一个因素。

10 见林奇(1969, p. 152, pp. 149~151)

---

[1] 即摩尔人。——译者

11 见埃利奥特(1963, p. 11)“中世纪的界限——这一点给予足够重视了吗?——并没有像人们可能想像的那样泯灭,而是在这些世纪中更显著了”(见维拉,1962b I, p. 191)

12 见维桑·维韦斯(Vicens Vives)(1970, p. 107)

13 尽管孔德公爵(Conde Duque 即奥利瓦雷斯)从卡斯蒂利亚榨取更多的金钱的努力获得如 1637 年那样的成功,但他也同其他人一样清楚地认识到:势必有一天卡斯蒂利亚会被榨干殆尽。这意味着“军事同盟”必须有效地建立起来,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这两个被认为是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富足的国家,必须劝导它们发挥与它们可能拥有的资源相称的作用。在奥利瓦雷斯看来,这两个国家似乎存在着与这个君主国其余地区‘分离’的危险(见埃利奥特,1966, p. 333,加了着重符号)。

14 见维桑·维韦斯(1970, p. 107),并参见皮埃尔·维拉尔:“中央政府在极大的财政困境下盯住了加泰罗尼亚的资源,而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强烈反对征税以保护自己的资源。”(1962b, p. 627)

15 伊米利安诺·费尔南德兹·皮内多(Emiliano Fernandez de Pinedo)把波尔什涅夫(Porchnev)针对法国所说的这句话引用过来,认为它完全适用于此时的比斯开(1974, p. 76)。

16 见埃利奥特(1963, p. 463)。他认为这些普通民众的怨恨是指小农、无地农民对富有农民和贵族的憎恨;乡村失业者的激愤;希望土匪对那些曾镇压他们的人进行报复;城市与乡村、贫苦市民与城市寡头之间的夙怨深仇(pp. 462~463)。

17 参见埃利奥特(1963, p. 127, p. 465)。

18 “这场战争给这个公国带来了最大的灾难,卡斯蒂利亚自 1600 年以来也为此而蒙受痛苦:庞大的公共开支,通货膨胀,生产停顿,可怕的传染病导致的人口锐减以及国际斗争的最后结果使卡斯蒂利亚失去了加泰罗尼亚的部分土地,包括非常富饶的罗斯西伦(Roussillon)平原(见维拉尔,1962b, I, p. 633)。受害最深的是那些独立的小农。(见维拉尔,1962a, pp. 80~81)。请再次注意这种情况与边缘地区的相似性。当然,这种情况加剧了暴动。并产生了一种“社会迹象,它预示可能会迫使贵族屈服于暴民统治”(见埃利奥特,1966, p. 349)。由于这个原因,加泰罗尼亚的团结分崩离析了,而且加泰罗尼亚人在 1652 年又重新处于西班牙的控制之下。

19 A. H. 德·奥利维拉·马奎斯(A. H. de Oliveira Marques)认为“关税

的取消特别是葡萄牙人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事”(1976, I, p. 308)。

20 见马奎斯(1976, I, p. 308)。葡萄牙人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以塞尔估计,到1640年葡萄牙人已占新西班牙人口的6%。在整个西属西印度群岛出现了类似的群体。他说到,“葡萄牙人口的一次真正的大规模外迁……(这)反映了葡萄牙乡村和小城镇人口的迁移以及葡萄牙实业家从萧条的葡萄牙、衰落的西班牙和多灾多难的意大利脱身的行动”(1974b, p. 32)。

21 参见卡斯特罗的论述(1964, 特别参见 pp. 311—314)。

22 在伊比利亚其他非卡斯蒂利亚地区,情况也是如此,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边缘地带[葡萄牙、加泰罗尼亚的沿海地区、巴伦西亚],……资产阶级身份与“教友”身份之间有密切的关联(见肖尼,1963a, p. 82),毛罗也持同样的观点:“葡萄牙并不是17世纪唯一拥有资产阶级和新基督教徒<sup>(1)</sup>的国家,但它与其他国家不同之点在于这两种身份的事实上的混合”(1970, p. 34)。

23 参见毛罗对这些商人—银行家的描述:“没有专业上的术语将他们加以区分,批发、半批发,还是零售?他们全都干着。长途贸易、国内贸易还是地方贸易?他们多少都参与其事。商品贸易还是金融交易?他们兼而有之”(1961c, p. 20)。

24 参见休格特(Huguet)和皮埃尔·肖尼(1954, p. 53)。勒瓦(Revah)指出:“在这些地区,葡萄牙人这个专有名词成了‘新基督教徒’的同义语,常常也是‘秘密犹太教徒’的同义语”(1959—1960, p. 37; cf. p. 48, n. 4)。然而,参见伊斯雷尔对Judaizantes和Conversos所作的细致区分。后者实际上与“新基督教徒”无异,前者则是一个介乎中间的群体,他们不是犹太化者,但犹太习俗毕竟对他们的生涯有强烈的影响”(1974b, p. 24 和 pp. 19—32 有关各处)。

25 毛罗提醒我们“不要把葡萄牙的命运与16世纪[末期]的西班牙帝国混淆起来,因为巴西和其糖业的巨大发展造成了一个不小的区别”(1959, p. 183)。

26 参见休格特和皮埃尔·肖尼(1954, p. 52)。

27 参见J. 埃利奥特在“17世纪的革命”中的论述(1958, p. 68)。迪斯尼(Disney)在解释为什么葡萄牙实业家不愿意投资于葡属东印度公司(创建于1628年)时提出了一个原因:“某些葡萄牙人在其中看出了马德里的险恶用心;取消腓力二世在1580年授予葡萄牙的行政上的独立”(1977, p. 252)。

---

[1] 此处专指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的教徒,他们往往仍然秘密地信奉犹太教。

28 参见休格特和皮埃尔·肖尼(1954, p. 54)。他们指出,犹太人成了众矢之的,并且说到“这些南特敕令在A阶段适用,在B阶段就予以废弃。并参见肖尼(1963d)。一些新基督徒干脆移居汉堡,18世纪时,他们在汉堡的商业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参见柯伦贝兹(1958)。

29 博克瑟认为这次占领是“[葡萄牙人]在1640年起义反抗西班牙王室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他指出:“葡萄牙人曾希望,一旦这些葡萄牙征服者和他们的祖国与西班牙断绝联系,荷兰人针对葡萄牙征服者的侵略就会停止。但他们失望了。相反……”(1961, p. 52)。

30 参见肖尼(1961, p. 1194)。毛罗认为,葡萄牙大西洋经济的“光彩”持续到1670年(1960, p. 513);但他更为审慎:“与塞维利亚相比,巴西的大西洋经济是由暗淡的影子和细微的差别妆点起来的,而塞维利亚的大西洋经济早在17世纪初就呈现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明显的长期的逆转趋势。”他也谈到了“在17世纪30年代晚期,或许是1650年,出现了姗姗来迟的转折点。它是发展的减速而不是停止。”葡萄牙人的起义不是可以说明至少到1670年巴西还有复兴的能力吗?相反,如埃利奥特所说,这种复兴是“对葡萄牙的拯救”,因为“它有助于引起外国(尤其是英国人)对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的注意。”(1966, p. 351)

31 参见戈丁浩(1950a, p. 34)。

32 参见埃利奥特(1963, p. 543)。

33 参见博克瑟(1961, p. 53)。

34 参见布罗代尔(1956, p. 196)。

35 参见肖尼(1959, VIII, 2bis, p. 1568)。并参见赫尔默(Helmer):“从1630年开始,在西印度的卡加多拉斯(Cargadoras de Indias)就出现了大量的破产”(1967, p. 405)。肖尼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个微妙的因果关系问题,这个时期就会与billón<sup>[1]</sup>的膨胀联系起来。他提醒说:“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巧合?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巧合”(1959, VIII, 2bis pp. 1568~1569)。

36 的确,维桑·维韦斯在回顾此时的西班牙政府失策的教训时说:“奥利瓦雷斯本来不应该卷入这场令人烦恼的欧洲争斗之中(在这场争斗中法国和荷兰的力量正在等待着他),而应该医治荷兰人在加勒比海对这个帝国造成的第一批伤口,应该将美洲殖民地置于战争状态。他不是用他从安达卢西

---

[1] billón, 掺铜较多的金银币。——译者

亚征集来的黄金去推行稳健的政策,而是用以支付三十年战争的军费,结果,西属美洲的前途在欧洲就被断送了”(1970,p.106)。

37 维格诺尔斯(Vignos)指出:虽然横跨大西洋的走私贸易不同时期强度不同,但总大于欧洲之间的走私贸易及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内部的走私贸易(1925,p.240)。

38 参见拉罗兹(1943,p.98)。西班牙的官员和殖民者的腐败帮助和纵容了走私贸易,参见潘特列奥(Pantaleao)(1946,pp.127~129,pp.235~236)。

39 参见麦克拉伦(McLachlan)(1940,p.13);并参见克里斯特洛(Christelow)(1941,p.516)。

40 见埃利奥特(1966,p.360)。他说,卡斯蒂利亚的崩溃“与其文化和精神生活的瘫痪是分不开的”(p.361)。并参见拉罗兹(1943,p.96)。卡门在详述1677年和1686年间的危机时称Vellon Coinage的贬值“简直是场大灾难”(1964,p.75)。这些困难的另一个反映是在整个17世纪土匪活动持续不断,特别是在瓦伦西亚的活动(见卡门,1974,p.654)。

41 德卢摩(Delumeau)称这种贸易为法国的“深谋远虑”(1966,p.100),潘特列奥说,“与西班牙帝国的贸易引起了整个大英帝国的兴趣”(1946,p.272)。

42 参见兰伯特(Rambert)(1959,p.269)。

43 参见弗朗西斯(Francis)(1966,p.187)。

44 参见潘特列奥(1946,p.15)。而且《1661年条约》使布提干萨的凯瑟琳与查理二世的婚约生效,把孟买和丹吉尔(Tangiers)作为凯瑟琳的嫁妆给与了英格兰。博克瑟认为这是葡萄牙为了“寻求英国盟友的保护”以反对荷兰人(1961,p.52)。

45 参见西德里(Sideri)(1970,p.21)。

46 毛罗把此定为1680年(1975,p.9);但这里他似乎与大部分学者产生了争论。参见维拉尔(1974,p.280),他认为这场危机是从1670年至1703年,V.M.戈丁浩则认为从1670年至1690年(1974,p.266;和1950b,p.186);塞德尔认为“经济困境”发生于1670年(1970,p.26)。事实上这场危机是由于白银进口的衰落和葡萄牙殖民地的糖及烟草逐渐被排出法英及荷兰市场之外而降临的。此外,荷兰同葡萄牙在几内亚湾的竞争导致奴隶价格上涨;而安哥拉奴隶来源部分枯竭又与这种状况相结合。所有这些开始于1670



年,这使葡萄牙人很难发挥它在先前的贸易结构中所起的那种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收支危机。参见戈丁浩(1950b, pp. 184~185)。

47 一个结果是在1670年至1680年之间,法国成为葡萄牙的主要贸易伙伴。当毛罗力图解释为什么以后不再如此时,他强调是因为法国与葡萄牙的商品在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1961b)。然而,这难道是英—葡重新建立联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吗?

48 参见戈丁浩(1950b, pp. 186~187)。他们利用这些政策获得了成功。例如戈丁浩在论及货币流通时指出“在1688年,不可能安排支付;1689年,硬币已在里斯本正常流通。因此,运转是成功的。”

49 参见戈丁浩(1950b, p. 191);比较维拉尔(1974, pp. 280~281)。

50 参见西德里(1970, p. 40)。

51 参见弗朗索瓦(1972, p. 64);并参见西尔伯特(Silbert)(1954, pp. 413~419)。

52 参见安德鲁斯(1929, I, p. 275);比尔(Beer)(1912, I, pp. 78~79)。

53 参见T. 本特利·杜坎(Bentley Duncan)(1972, p. 46)。他认为:“考虑到英国及葡萄牙殖民地不多的人口,马德拉岛葡萄酒贸易即使按欧洲人通常标准来看是有限的,在美洲却是重要的商业。”(1972, p. 48)。但他也注意到:对美洲的葡萄酒贸易“完全掌握在丰沙尔(Funchal)的英国商人手中,他们靠卖英国的纺织品及其他进口商品(咸鱼、腌鲜鱼、英国制造品、亚速尔小麦等)的收入购买葡萄酒”(pp. 50~51)。

54 戈丁浩认为:“葡萄酒生产的增加与美洲市场的扩大直接相关”(1953, p. 79)。

55 参见戈丁浩(1950b, pp. 188~190)。

56 并参见博克瑟,他说,在威廉国王战争期间,对葡萄牙葡萄酒的日益增大的需求,降低了葡萄牙的“贸易逆差”,因此“由国产品替代从英国进口的纺织品也就不太迫切了”(1958, p. 34)。英国人并不真正喜欢葡萄牙的葡萄酒胜于喜欢法国的葡萄酒。赛德尔列举了一些数字。1683年,法国葡萄酒在英国受禁。这一年,英国人从法国进口了65加仑葡萄酒,而从葡萄牙进口了16 772加仑。在1686年解禁时,他们从葡萄牙进口了289加仑,而从法国进口了12 750加仑(见1970, p. 64)。

57 卡多索认为:黄金猛增的一个影响是促进了“在巴西非法引进外国

产品的增加”，而那里本来是“[葡萄牙]能够获利的唯一市场”(1946, p. 146)。

58 “我个人确信，正是这场危机能解释为什么会推行鼓励制造业的政策”(见戈丁浩 1953, p. 76)。他说，“说到底，重商主义时期只不过是糖、烟草和盐的周转与巴西的黄金，波尔图和马德拉葡萄酒的周转之间的‘转车盘’罢了”(1950b, p. 190)。

59 “实业家让位于葡萄园庄园主”(见戈丁浩, 1950b, p. 189)这一点为以后的观点所证实。“后来甚至葡萄牙人也倾向于承认：杜罗河上游的葡萄园的发展要归因于英国人，并且认为，在英国人到来之前，那里除了金雀花和荆豆外什么也没有”(参见弗朗索瓦 1972, p. 109)。

60 参见戈丁浩(1950b, p. 188)。

61 参见马塞多(Macedo)(1963b, p. 53); 赛德尔(Sederi)(1970, p. 42)。

62 “辉格党人在 1713 年赞成同葡萄牙而不是法国贸易，为此而投票[反对托利党]反对派。他们掌了权，并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们执政的头几年，英一葡贸易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参见弗朗索瓦, 1966, p. 185)。

在一次私人交谈中，E. 费尔南德兹·德·皮内多 (E. Fernandez de Pinedo) 对我说：自 1650 年以来，荷兰人与英国人由于不希望他们用于把纺织品、咸鱼和小麦运到西班牙的船只空载而归，就在加泰罗尼亚鼓励生产白兰地酒，在马拉加海岸生产葡萄干和杏仁。他把这种贸易称为“白银梅休因条约”，主要是因为贸易赤字由美洲金银来平衡。

63 参见卡门(1969, pp. 1~5)。

64 参见坦伯利(Temperley)(1940, ix-x); 比较麦克拉克伦，他认为：英国商人反对 1698 年和 1700 年的分割条约，因为他们觉得，一旦条约签订，地中海“将会成为法国的内湖”(1940, p. 30)。克拉克也持这种观点：“如果法国人获得成功，荷兰和英国这两个主要的海上强国很可能会失去其大部分贸易”(1928, p. 262)。

65 法国人最终会在公海的战斗中失败。“英国人不仅成功地消除了法国私掠船的威胁，在同一次作战中作为侵略者他们表现得也很出色”(见克拉克, 1908, p. 264)。

66 阿塞因·莱格瑞利 (Arsène Legrelle), *Lockdiplomatie française et la Succession d'Espagne* (Paris, 1888~1892) III, p. 332。转引自卡门(Kamen)(1969, p. 9)。

67 卡门评论说：“要推进法—西贸易，(必须)降低关税并且禁止与[英

一荷]敌人贸易。使法国人苦恼的是,他们发现做到上述两点并非易事,因为这很有可能要减少他们已得到正式承认的贸易特权的价值”。(1969, p. 127)而且,法国人的确在西班牙享有特权。正是这些特权唤醒了英国人;法国对获取进入西属西印度群岛的权利更感兴趣。然而,“尽管(有)法国海军的优势,尽管有 Asiento 条约,尽管通过圣马洛进行着大量的非法贸易,对法国来讲整个问题最终还是归于失败。路易十四从不设法打破加的斯对西印度群岛的垄断”(卡门,1969,p. 155)。

参见兰伯特:“西班牙波旁王朝的君主总会经常记住他们的血统,从一开始他们就以 100% 的西班牙人面目出现”(1959, p. 272)。

68 见埃利奥特(1966, p. 365)。维拉尔认为它不仅仅是缓慢的恢复。他争辩说:“西班牙查理二世(1665—1700)统治时代对加泰罗尼亚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期……对富裕农民、商人及各种实业家来说……17 世纪的最后 1/3 是一个繁荣的时期。……1700—1715 年的危机根本不是像 1640 年的脱离运动那样,由对王室的猛烈攻击为前导。”(1962a, p. 101)

69 见维拉尔(1962a, p. 104)。

70 见维拉尔(1962a, p. 103)。

71 见维拉尔(1962b, I, p. 672)。在一段时间内,加泰罗尼亚运动是非常成功的。正如卡门指出,这次同 1640 年的危机不同,“不是卡斯蒂利亚军队进驻里斯本和巴塞罗那。我们看到葡萄牙与加泰罗尼亚的军队进驻了马德里”(1969, p. 248)。

72 见维拉尔(1962b, I, p. 678)。

73 肖尼抓住了这种经济选择的文化含义:“腓力五世的西班牙打算开放,但它只能缓慢地这样做。……它要开放什么呢?它要向法国,向地方开放。……在查理二世统治的末期,聚集在纽堡的玛丽—安娜皇后周围的德意志派,无疑是在艺术上受意大利影响的派别,是过时的派别”(1963c, pp. 468—469)。有关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西班牙波旁王朝作为文化的“现代化者”的作用,参见维桑·维韦斯(1970, pp. 116—120)。

74 参见皮特(Pitt)(1970, pp. 475—476)。

75 见维伦达尔(Veenendaal)(1970, p. 44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拉尔把《乌特勒支条约》看成是一个转折点。它完成了“在欧洲对老大的西班牙帝国的清算,结束了法国的霸权,并且宣告了英国在海上和殖民地世界中优势的来临,这种优势的突出标志就是对直布罗陀的占领”(1962a, p. 12)。

76 G.N. 克拉克指出：虽然英国人和荷兰人曾是盟友，但“这次议和的总的特征……在于英国人为了与荷兰进行商业竞争而利用其政治上的优势，使自己占据有利地位”（1928, p. 279）。并参见 A.W. 沃德：“联省共和国获得了一个牢固地建立在联盟领土上的强大屏障，以反对法国任何的重新入侵。然而，虽然他们除此之外还从这个和约中继续保全某些商业利益，但作为一个强国的政治地位却永远消失了，面对曾是他们对手的这个强国，没有作任何真正的抵抗；……而且他们的商业优势也同样结束了”（1908, P. 438）。

77 见埃利奥特（1966, pp. 370~371）。海梅·维桑·维韦斯尖刻地指出：“加泰罗尼亚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通常是非常高昂的。”

78 参见卡门（1974, p. 687）。

79 参见维桑·维韦斯（1970, p. 114）。

80 在维桑·维韦斯看来，“无论如何，地方特许状的神秘手段仅为中央集权化的神秘手段所取代……在这项事业中，波旁王朝及其合作者（同其先辈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1970, p. 113）。

81 见 E.J. 汉密尔顿（1935, p. 116）。

82 罗米洛·德·索里斯（Romero de Solis）（1973, p. 54）。他谈到了“新的中产阶级、农业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p. 66）和“在他们将自身转变为农业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Servidores）——国家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成为土地贵族的中等阶层”的腓力五世的党徒（p. 67）。然而，多米圭斯·奥梯兹（Dominguez Ortiz）认为：“虽然波旁专制王朝反对任何对中央集权的削弱，但是一旦剥夺了大领主最后的政治地位——而那种地位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时期几乎已经丧失殆尽，波旁王朝就会同领主们达成“交易”（1955, p. 301）。卡门也认为：“应该强调的是，大贵族的衰落虽然在基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上是重要的，但是在西班牙的社会史中却没有意义。就像在从前的统治时代中那样，贵族仍牢固地保留着他们的特权和地产”（1969, p. 115）。

83 参见 E.J. 汉密尔顿对这些努力的阐述（1943, p. 206）；并见拉·福斯（La Force）（1964, pp. 337~338）。

84 参见卡门（1969, pp. 391~392）。

85 参见卡门（1969, p. 34）。

86 参见兰伯特。他说，“他们时刻关注的关税政策[在整个 18 世纪]在

设立壁垒方面逐步取得了成功,在这种壁垒的保护下,民族工业得以发展,并且国家本身也部分地摆脱了外国的控制。在竞争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法国注定成为这种发展的主要牺牲品”(1959,p.270)。

87 见纳尔逊(Nelson)(1945,p.55)。

88 纳尔逊指出,1730年和1739年间贸易额为550万镑,并且指出,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对西班牙的重商主义构成了真正的威胁”(1945,p.64)。

89 见V.L.布朗(Brown)(1928,p.179)。纳尔逊指出,南海公司利用一切手段进行非法贸易:秘密交易(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虽然西班牙政府在理事会有自己的成员,但大部分信息交往并不经过理事会);贿赂西班牙的官员;把奴隶贸易作为挡箭牌;欺骗;武力及英国军舰提供的保护(见纳尔逊1945,pp.56~60)。

90 参见纳尔逊(1945,p.55)。

91 参见克里斯特洛(Christelow)(1941,p.532);纳尔逊(1945,p.57)。

92 见戈丁浩(1948,p.552)。

93 参见纳尔逊(1945,p.61)和戈丁浩(1948,p.553)所列的交换产品表。

94 戈丁浩注意到:这时西属美洲贵金属的流入即使没有像来自巴西的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的贵金属那样多,“但在欧洲的货币流通中也有重要的影响”(1948,p.553)。并参见H.E.S.费希尔(Fisher)(1971,pp.4~5)。与西属美洲的合法与非法贸易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英国两个不同的阶层,西班牙政府试图利用他们作为合法贸易的参与者去限制非法贸易,但并不很成功。参见戈丁浩(1948,p.552)。

95 参见E.J.汉密尔顿(1949,p.316)。

96 见V.L.布朗(1928,p.187);涉及到迄于1763年的那一时期,可参见克里斯特洛(1941,pp.519~520)。

97 1700到1750年这一时期,葡萄牙是英国出口品的第三大消费者(仅次于联省共和国和德国各邦)。英国在里斯本的船舶数从未低于总数的50%。参见马克斯韦尔(Maxwell)(1968,p.612)。

98 参见西德里(Sideri)(1970,pp.44~46)。马塞多认为:尽管英国有这样优势,但与其他国家在加工制品方面的竞争也迫使英国降低价格,并且取消了这种垄断;但是西德里否认这一说法,指出马塞多本人这一陈述上的矛

盾：“荷兰或法国的纺织品从未能抵销英国所取得的优势，因为他们不可能从英国商人拥有的那种分配网络和基础牢固的影响中获利”（Macedo, p. 51, 转引自 Sideri, p. 46）。H.E.S. 费希尔认为：英国的纺织业商人与法国、荷兰和德意志的竞争者相比具有优势，因为他们“更擅长于生产中低档价格的细羊毛线和羊绒织品”，并且“运输……也更为便宜”（1971, pp. 36~37）。仔细阅读费希尔的著作也可以看出，这是循环式的作用，因为较廉价的运输是贸易量较大的结果，纺织品的出售与购买葡萄酒直接相关，并且“在葡萄牙的英国商人控制了运往英格兰的葡萄酒的采购和运输”（p. 36）。

99 见西德里（1970, p. 46）。

100 见西德里（1970, p. 41, p. 48）。他在 41 页上说，白银弥补了英国对法国的逆差，但在 48 页又说是黄金弥补了这种逆差。

101 见西德里（1970, p. 46）。

102 克里斯特洛沿引（1946, p. 27）。G. 扬（Young）1917 年作出了类似评论：“杜罗（Douro）港地区成了英国殖民地的腹地”（*Portugal Old and Young*）（牛津 1917, p. 185），西德里（Sideri）的沿引（1970, p. 56）。

103 见西德里（1970, p. 56）。

104 博克瑟断言：“在 18 世纪，人们不会怀疑（巴西）在大多数方面比其母国更加繁荣”（1969b, p. 323）。

105 参见弗朗索瓦（1972, pp. 179~180）。

106 见奥利维拉·马丁斯的（J.P. Oliveira Martins），*História de Portugal*（伦敦 1908, 2 vols., pp. 149~151），为西德里所引（1910, p. 67）。

107 参见西德里（1970, p. 49）。莫里诺试图缓和一下这个判断的意思：虽然巴西的黄金对于英国向葡萄牙的出口“确实有某种影响”，但它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总起来说，从英国 18 世纪的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巴西的黄金——既不是发展的唯一动因，也不是最强大的动因”（1978h, p. 44, p. 47）。然而，这只是在攻击想像中的敌人。贵金属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事实上，此时所获得的贵金属主要来自巴西。

108 弗朗索瓦指出：“荷兰人和汉堡人也需要贵金属，但没有 [英国人] 那种方便条件，并且是取道伦敦才得到他们那部分走私贩来的贵金属”（1966, p. 217）。

109 见博克瑟（1961, p. 90）。

110 参见布罗代尔（1972, I, pp. 430~432）。

111 例如弗雷德里克斯(Friedrichs)指出：“到16世纪早期，分散加工制(Verlagssystem)已经被引进到金属工业的许多部门，并且在生产提包、手套、刷子、纸和帐簿以及亚麻和粗斜纹布部门中都被采用。17世纪晚期，在纽伦堡，甚至铅笔的生产都在分散加工制的基础上组织起来”(1975, pp. 32~33)。柯伦贝兹持同样的观点，并且补充说：“在铁矿和非铁矿的开采中，购买抽水机、锅炉和其他必要的技术设备常使小作坊债台高筑，并且需要商人的帮助。经常购买产品的那些人显然需要借贷，也就尤其需要商人帮助”(1972a, p. 469)。

112 见布罗代尔(1972, I, p. 431)。克雷贝克斯(Craeybeckx)就根特和布鲁日谈到：“17世纪时，‘行会’的束缚日趋松弛，尤其是在后半叶。工人、‘匠师’或‘帮工’知道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商人手里，只有他们才能保证其产品的销售”(1962, p. 427)。

113 参见弗雷德里克斯(Friedrichs)，他认为：“当这种关系证明对其成员有害时，行会能够终止这种安排”(1975, p. 33)。

114 参见柯伦贝兹(1965, II, p. 420)。

115 见柯伦贝兹(1977a, v, p. 470)。塞拉认为：至少从威尼斯开始，工业向农村地区的转移，更多的是由于行会成员的工作效率不高，而不在于他们的工资高。但是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码事。参见塞拉(1968, pp. 122—123)。在农村，并非所有的农民都同样渴望扮演这种角色。琼斯指出：家庭(分散的)工业特别常见于那些“有着贫瘠的沙地、难以耕作的粘土”的低洼地带和某些“高地地带”。他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地区“不能以农业本身的资源来供养他们的人口”，才使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补充其收入(1975, p. 339, p. 341)。门德尔斯(Mendels)以类似的语调指出：“有证据表明……成为织布工的农民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并且一直如此”(1972, p. 242)。彼特·克里德特(Peter Kriedte)认为：“由于缺少可耕地，[来自农业的收入]越少，小商品制造者中忽视农业，并将其技术集中于工业生产上的趋势就越大”(见克里德特等人著，1977, p. 68)。克利马和马丘雷克(Klima and Macurek)评论说，在捷克，从事乡村制造业的工人都是来自“乡下的穷人”(1960, p. 90)。还可参见瑟斯克对手工业与某些农业社区的联系问题的讨论(1961)。

116 参见库里斯彻尔(1931, p. 11)。

117 见柯伦贝兹(1965, II, p. 427, 及有关各处)。

118 见弗雷德里克斯(1975, p. 33)。布尔费雷蒂和康士坦丁尼(Bulfretti

and Constantini)指出：“经过了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前半叶(的发展),商人资本与独立的手工业工人之间的那种古老的对抗在热那亚开始转变为一种手工业工人阶层(Corpi di mestiere)对商人兼企业主控制的一律服从的关系”(1966, p. 73)。彼特·克里德特认为:甚至在采购制(Kaufsystem)中,虽不像在分散加工制中那样工作按委托加工方式完成,但通过给与借贷也“开始出现经济依附”,并且尽管生产者有形式上的独立,仍有“通过贸易进行的剥削”(见克里德特等人的著作,1977, pp. 202~203)。更何况,在分散加工制中也是这样,商人兼企业主可以“自始至终决定着是否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生产多少”(p. 241)。

119 参见(Treue)的研究(1957, pp. 41~42)。有关在德意志的犹太人,参见特罗伊(1955, pp. 398~399);有关在意大利的英国人—荷兰人,参见范范尼(Fanfani)(1959, pp. 57~58, p. 128);有关在波希米亚的英国人和荷兰人,参见克利马(1959)和米卡(Mika)(1978, pp. 234~235);有关中欧的分散加工制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参见克里马和马丘雷克(1960, p. 96)和克里德特在克里德特等人的著作(1977, p. 64)中的论述。

120 参见松巴特(1900, pp. 1138~1140)。甚至连并未依附于商人兼企业的家庭手工业者,由于市场的作用,事实上也降到了类似的地位,正像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所强调指出的:“无论是家庭手工业的织布工、编织工、制钉匠还是制刀匠,他们本人和在采购制下做工的人都是既作为买者又作为卖者进入市场的;或者无论他是否被组织在分散加工制中,他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商人资本”(1976, p. 296)。分散加工制当然比采购制对商人兼企业主来说更为有利,因为在采购制下,直接生产者可以保留较大一部分剩余价值,虽然就管理控制而言,分散加工制不能与工厂制相比,但它优于采购制,并且因此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由此产生的利润大部分落入商人兼企业主的手中。虽然直接生产者的计件收入在分散加工制下要比在采购制下少,但由于在分散加工制下工作更有保障,因此年收入可能相对较高。参见施龙博姆(Schlumbohm)在克里德特等人的著作(1977, pp. 215~216, 包括 n. 56)中的论述。

121 见门德尔斯(1972)。参见克里德特等人著作中对这一概念在编史学上的起源的讨论(1977, pp. 13~35)。他认为前工业化在决定世界经济中特定地区的最终经济职能方面具有“战略意义”(pp. 30~31, n. 52)。克利马和马丘雷克对于把分散加工制的制造业看作是“由行会制经过工场制向大规模机



械化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奠基石 [jalón]”提供了根据。至于为什么应该把工场制和工厂制看作是发展过程中的环节而不是彼此间裂缝很深的对立物，他们的解释是：工场制“加深了分工的程度”，并且“使大批不熟练或熟练程度很低的工人进入生产领域”(1960, IV, pp. 96-97)。米什卡(Myska)在讨论捷克地区集中化的铁制品业时，基本上持同样的观点(参见1979, pp. 44-49和有关各处)。并参见雷德利希(Redlich)(1955, pp. 93-97)。

122 梅迪克对这种分散加工制如何运转做了非常精彩的解释，并且对此进行了总结。他说：“家庭经济生产的运作变得有效，首先是因为贫穷的、无地的劳动者倾向于求助手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剥削，只要这对保证家庭日常生活和经济自足是必要的。”这样做的结果就为商人兼企业主带来了“不同的利益”，这些利益“既超过了从行会制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能够获得的利益，又超过了从工场制的相似的劳动工资关系中能够获得的利益”(1976, p. 299)。梅迪克对“家庭经济和商人资本的共生关系”尤其感兴趣。他认为：“传统的维持家庭生计的经济行为的规范和规则”在促使资本主义产生(我更愿说是它的发展)方面比新教伦理更为重要(1976, p. 300)。

123 见罗马诺(1974, pp. 188-189)。

124 见罗马诺(1971, p. 201)。

125 见罗马诺(1974, p. 195)。

126 见普罗卡西(Procacci)(1975, p. 28)。他认为这种思想“过于简单和激进”。博雷利(Borelli)就为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意愿问题提供了一个好的例证。他注意到了威尼斯在1588年通过禁止生丝出口来挽救其丝织业所作的努力。由于这导致了生丝在国内市场上价格低落，所以又鼓励走私出口。到1694年，2/3的威尼斯生丝被秘密出口。(参见博雷利, 1974, pp. 27-28)。这还不足以显示重商主义政策的效果。必须在政治上足够强大才能确保它们的实施。在这方面，重商主义措施所带来的竞争盈余不足以抵销威尼斯非常高的生产成本。

127 见塞拉(1969, p. 244)。拉普(Rapp)对这种经验描述所持的保留意见与塞拉有些不同。他赞同威尼斯从出口导向型工业转向国内服务型工业的做法。认为这是要努力维持就业并进而保持繁荣水平，还取得了一定成功。(参见拉普, 1975, pp. 523-524)。

128 见塞拉(1975, p. 12)。一种复原的形式实际上就是城市与其周围乡村之间日益发展的经济联系，就像在威尼斯和特拉费马的情况那样。参见马

里诺 (Marino): “特拉费马生产上日益增加的财政负担, 对农业和地区市场的投资, 使威尼斯和它的内地结为有机的统一体……[17世纪]危机最重要的后果是突然出现了统一的地区经济和相应的经济政策”(1978, p. 100)。

129 见施莫勒(1897, p. 74)。德弗里埃(J. de Vries)就这种依附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在1650年以前的那段时期, 哈勒姆的服装商依靠内地提供女织工; 但是到1650年, 这项任务就已经从地理上向外转向了威斯特伐利亚(和南尼德兰)农户。“哈勒姆现在成了布商网络的聚焦点, 他们把布送到这里是为了漂白和最后出售”(1974, p. 97)。

130 *Die Handlung Von Holland*, (法兰克福和莱比锡, 1770, pp. 251~252)。由比蒂(Beutin)所引用(1939, 120), 比蒂引用弗雷德里希的表格, 表示他持这种观点, 他本人对此“没有怀疑”(1939, p. 127)。

131 见安德逊(1974a, p. 249)。

132 见库斯克(1922, p. 189)。

133 见利贝尔(Liebel)(1965a, p. 287)。无疑, 这些城镇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了长期的衰落。

134 见基希(Kisch)(1968, p. 3)。

135 见基希(1959, p. 555)。

136 参见皮雷尼(Pirenne)(1920, v, pp. 65~69, pp. 129~130, pp. 193~201)。当然其间有重商主义的插曲, 并且它本身看来也是有益的。贝海克伯爵简·德·布鲁恰文(Jean de [Jan Van] Brouchaven, Count of Bergeyck)这位号称比利时的科尔伯式的人物, 曾于1698年尽力说服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伊曼纽尔, 这位西属尼德兰的总督, 去建立关税; 建立东方公司以推进印度群岛的贸易; 设法改善国内航道; 在1699年甚至禁止了羊毛的出口和外国纺织品的流入。但是由于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报复行为以及各省之间的猜忌, 使马克西米利安不得不打退堂鼓(pp. 64~69)。

腓力五世登基之后, 马克西米利安被放逐, 他的军队为法军取代, 贝海克再次被授权去进行他的科尔伯式的改革。这就是所谓的“regime anjouin”(pp. 94~105)。法军在1706年在拉米伊(Ramillies)被马尔伯勒(Marlborough)击败后, 法国的占领就被英—荷占领所取代。关税马上就废除了, 行政管理的集中化也结束了。皮朗指出: “这样, 着手使国家从四分五裂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改革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 并且没有人注意到它。曾反对贝海克计划的地方主义势力现在为[英荷当局]的联盟会议效劳。中央政府不复存在。各

个省都沉湎于自己的事务，并且仅考虑它的眼前利益。英格兰和联省共和国则袖手旁观，听之任之，怡然自得。他们知道：一旦和平到来，他们就保不住比利时，所以最好在政治、经济软弱无力而又平静无事的状态下把它转交给[奥地利的]查尔斯三世(p. 114)，并参见哈斯昆(Hasquin)(1971, pp. 125~126)。

甚至连坚持认为这时南尼德兰的生产与英荷的竞争者相比并不逊色的克莱伊贝克斯(Craeybeckx)也根据欧洲普遍的衰落情势来解释 17 世纪晚期的危机：“其中在南尼德兰感受尤其严重，因为他们完全失去了再次对邻国空前激烈的保护主义作出反应的手段。”(1962, p. 465)。凡·德·威认为：17 世纪南尼德兰的复兴实际上是与“明显的非城市化”和“返回到自给自足的、传统的农业中去”相伴随的(1978, p. 14, p. 17)。

137 特别是在 1648 年以前这一点是真实可信的。斯托尔斯(Stols)引用了 1617 年来自布鲁日的一个传教士谈及西属美洲时所说的话：“此后，进入西印度对佛莱芒人似乎变得困难了，这是由于荷兰内奸所致”(见斯托尔斯所引, 1976, p. 40)。

138 见布律莱(Brulez)(1967, p. 89)。克莱伊贝克斯也持这种观点(1962, pp. 413~418)。然而他承认“经济重心逐步转向了农村”(p. 419)，也逐步转向列日(Liège)，参见柯伦贝兹：“据说西属尼德兰的不幸就是列日的好运”(1965 II, p. 393)。并参见让南(1969, p. 70)。

139 参见布律莱(1967, pp. 94~99)；克莱伊贝克斯(1962, p. 416)。巴腾斯(Baetens)对在 17 世纪直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还很兴旺的佛莱芒人海上私掠事业的讨论，也强化了这种观点。巴腾斯谈到了它对安特卫普商人团体的消极影响，他们为了进行广泛的贸易去使用荷兰的运输工具，这显示出佛莱芒人以欺诈手段避开对其经济施加法律限制的主要途径。(参见巴腾斯, 1976, p. 74)。

140 默夫雷特认为是在 1636 年(1953, p. 216)；奇波拉认为是在 1619 年(1958, I, p. 392)。

141 参见奇波拉(1958, I, p. 392, p. 394)。

142 见布尔费雷蒂((1953, p. 53)。

143 见德·马达伦纳(De Maddalena)(1974b, p. 77)。“米兰的经济无疑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阶段”(p. 79)。

144 见凯兹(Caizzi)(1968, p. 6)。

145 参见布尔费雷蒂和康士坦丁尼(1966, p. 35)。

146 拉普认为到 17 世纪后半叶，出口部门中的总就业量降到了 1539 年的水平，即“工业化开始之前”的绝对水平(1976, p. 104)。他补充道：“威尼斯港并没有随着 17 世纪经济困难的出现而衰落，但它的性质却发生了变化，由世界贸易的支撑点变成为本地区服务的港口(p. 103)。莱恩(Lane)指出，威尼斯不再能将与它抗衡的舰队排斥在亚德里亚海之外或者阻止能与之竞争的港口的兴起(参见 1973, p. 417)。

147 见利贝尔(1965a, p. 295, p. 300)。

148 伯金(Bügin)(1969, p. 220)。他认为，17 世纪末，瑞士“成为世界制表中心”(p. 227)。

149 见伯金(1969, p. 221)。

150 “这个国家的政治中立是其出口贸易顺利发展的政治基础”，也是“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非常重要的”过境贸易顺利发展的“政治基础”。见博德默尔(Bodmer, 1951, p. 574)。而且，瑞士由于它的中立吸引了流亡的企业家们(p. 598)。

151 “忠实于科尔伯主义原则的法国政府，用新赢得的[佛朗什孔泰的]矿产资源为其强权政治服务，并且仅在有利条件下把食盐供给那些表明能按他们愿望行事的地区”(见博德默尔, 1951, p. 576)。

152 看上去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正是由于缺乏完善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才帮助这个特殊地区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取得了贸易顺差”(见博德默尔, 1951, p. 575)。实际上反重商主义并未排除国家向企业家贷款，不征关税“则遭到例如日内瓦行会的反对”(参见皮乌兹(Piuz)1970a, p. 9)。

153 见博德默尔(1951, p. 598)。他认为瑞士“不仅大量出口工业品，而且也出口某些山区经济产品，特别是乳酪和牛肉”。

154 参见拉普对威尼斯的研究(1976, p. 159)；布尔费雷蒂和康士坦丁尼对热那亚的研究(1966, pp. 48-50)；基希对亚琛的研究(1964, p. 524)；门德尔斯对佛兰德斯的研究(1975, p. 203)；以及德弗里埃对苏黎世的研究(1976, p. 97)。在荷兰，纺织品从哈勒姆和莱登运到特文特和北布拉班特；代尔夫特的陶制品运到弗里斯兰；烘制的饼干运到北荷兰以外的地区。凡·德·武德(Van der Woude)把这称之为“[荷兰]贸易和工业的乡村化”(1975, p. 239)。

155 “毛织业衰落下去，而丝织业却发展起来”(见 1974, p. 25)，并参见布尔费雷蒂和康士坦丁尼(1966, p. 70)和拉普(1976, pp. 105-106)。皮乌兹谈

到了日内瓦丝织业中“城市分散加工制”的兴起(1970a, p. 5)。基希注意到了18世纪早期在克雷菲尔德(Krefeld)由生产亚麻到生产丝绸的转变(1968, p. 28)。然而,吉诺·卢扎托(Gino Luzzatto)坚持认为:即使对丝绸来讲,一切也都不顺利,因为法国的保护主义给销售造成了损害——不仅在法国,在欧洲其他地区也是这样。(参见卢扎托,1974, pp. 161~162)。有关类似现代工厂的丝绸作坊,参见波尼(Poni)(1976, pp. 490~496)。

156 见哈斯科尔(Haskell)(1959, p. 48)。艺术出口的另一方面是引入观光者。威尼斯或许在17世纪成了第一个现代旅游中心(参见德弗里埃,1976, p. 27)。

157 参见罗马诺(1962, pp. 510~513);博雷利(Borelli)(1974, p. 20)和塞雷尼(Sereni)(1961, p. 207)。与此相伴随的是1600—1750年间分成制在整个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持续传播(参见塞里尼,1961, p. 205)。

158 罗马诺所引(1968, p. 733)。

159 博雷利(1974, p. 15)。

160 斯图亚特·伍尔夫详细说明了这些相似性,“在两个国家中,统治者维托利奥·阿马迪沃二世(Vittorio Amadeo II),卡洛·伊曼纽埃尔二世(Carlo Emanuele II)——大选帝侯,把他们视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主要障碍;确立了新的中央行政体制;贵族的财政特权受到打击;但在这两个实例中,贵族财政豁免权的主要方面仍被保留下来,而他们对地方行政的控制实质上未受触动”(1964, p. 283)。

161 关于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增长的问题可参见让南(1969, p. 69)。关于分成制在列日兴起的问题,参见卢威特(Ruwet)(1957, p. 69)。

162 例如,参见韦斯(Weis)(1970),他对德意志西部(除了莱因兰)与法国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法国农民拥有法国土地的35%,而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农民拥有90%的土地;所以“在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法国农民在经济、社会、法律以及心理上的状况……[是]更为不利的……尽管法国拥有更肥沃的土地和农业生产方法取得了全面进步”(p. 14)。并参见布拉施克(Blaschke)(1955, p. 116)对萨克森的研究。

163 参见吕特格著作中的讨论(1963, p. 139和1965, p. 685)。领地农场这个概念是阿尔弗雷德·霍夫曼(Alfred Hoffmann)发明的,他明确地把这种制度构想为16世纪和17世纪旧式的租佃农庄和新式的领主农场演进之间的一个过渡。他这样定义领地农场:“在这种形式中,绝大多数的可耕地仍旧

同以前一样被分成单个独立的农民类型的农庄。然而,通过更加集中的纳税,更多地为领主服劳役,使农民农场比以前更紧密地相互联结成经济联合体,这种联合体不仅包括农民纯粹的农业经济活动,也包括一系列的手工业生产,并且紧密与一个面向出口市场的公司联系起来”(1952, p. 98)。霍夫曼认为:从租佃农庄向更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的领地农场转变“导致了农庄地产追求市场利润倾向的明显加强。”(pp. 166~167)

巴克(T.M. Barker)认为:领地农场意味着一种“集体化的,合理经营的‘农场或庄园’……它为了从农民的私人劳动中获利,千方百计把领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起来”(1974, p. 27)。马凯认为:主要特点是,领主“充分利用其垄断权力(小旅店、磨坊、屠宰场等等),并且自己从事商业活动,以增加自己的收入”(1975, p. 230)。马凯认为:把这种制度看作是经济制度的第三种类型是“难以成立的”(p. 231)。在强调领主的商业活动的重要性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并且能够引用霍夫曼本人所写的《作为企业家的庄园主》一文加以支持(1958)。但是就领地农场实行了合理化经营这一点来说,它不同于传统的小农庄。然而最好是说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小农庄地产都在向领地农场方向发展。

164 关于热那亚 17 世纪 20 年代那样,作为给西班牙贷款的银行家那种旧有金融地位的衰落,参见凡·德·威(1977, p. 333, p. 375)。关于热那亚通过对国债的投资,首先是向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其次向英格兰、斯塔的那维亚、萨克森等投资,从而作为欧洲银行家的这种新地位,参见德明格尼(Dernigny)(1974, p. 549)。德明格尼认为“热那亚的财政投资富有讽刺意味,以致“稍微夸张一点,人们就可以谈到寄生性——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p. 562)。

165 见拉普(1976, p. 37)。范范尼也注意到在 17 世纪来自意大利的移民超过其迁出数(1959, pp. 130~131)。

166 见布尔费雷蒂(1953, p. 47)。

167 见伍尔夫(1964, p. 283)。

168 见塞里尼(Sereni)(1961, p. 188, p. 210)。维拉尼(Villani)谈到同样的情况:“17 世纪 [在意大利农业部门中] 并没有衰退,而是继续发展”(1968, p. 124)。

169 塞里尼把水稻看作是“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决定性推动力”(1961, p. 187)。并参见格拉曼(1977, p. 201),他认为在伊比利亚半岛玉米的引进是一

种类似现象。

170 见达·席尔瓦，并参见 pp. 490~491；卡莫那 (Carmona) (1964, pp. 106~107)。

171 罗马诺(1968, p. 735)。

172 本图拉(Ventura)(1968, p. 719)。

173 罗伯茨(1958, II, p. 20)。

174 参见罗伯茨(1958, II, p. 21)。

175 罗伯茨(1958, II, p. 21)。

176 卡尔-古斯塔夫·希尔德布兰德说：“进口宽幅布压倒国内产品的主要优势，并不是经久耐用或精致雅观，而是“其质量比较相当”(1954, p. 101)。

177 参见罗伯茨(1958, II, pp. 39~142)。

178 汉斯-爱德华·鲁斯(Hans-Edvard Roos)提到了在这本书的第一卷(1974)中我对“倾斜的结构”的讨论，并且说：“这并不适于瑞典的情况。尽管在16世纪后半叶，庞大的赤字是国家财政的特征，但这并没有引起所谓‘下滑的盘旋’和国家衰弱并陷入边缘地位的后果。相反，本文的一个基本点是，从这种困境中找到了新出路，这些出路最终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产生了民族经济的新形式”(1976, p. 65, n. 35)。

179 这个术语“同其他许多术语一样，是从德意志引进的，指任何拥有相同特权和责任，对社会有同样的要求并在社会中发挥同样作用的人”见罗伯茨(1953, I, p. 285)。

180 罗伯茨(1958, II, p. 48)。

181 见沃勒斯坦(1974, pp. 312~313)。佩里·安德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农业中商品化的指数在大陆可能是各地中最低的”(1974a, p. 179)。

182 实际上，安德逊认为：“瓦萨改革[古斯塔夫·瓦萨1527年至1542年之间在时兴的宗教改革旗号下对教会财产的没收]无疑是欧洲任何王朝完成的那一类改革中最成功的经济行动”(1974a, p. 173)。安德森不仅详细阐明了行政集权化措施，而且阐明了这位君主在经济上增加的收益。他总结说：不过，这些措施“并未反对贵族阶层。贵族在[古斯塔夫·瓦萨]统治的整个时期始终表现出与这种体制基本上保持团结一致”(p. 174)。

183 罗伯茨(1958, II, p. 120)。他对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统治下的经

济变革进行了全面描述(第二章,随处可见)。事实上,16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了初期的垄断,威勒姆·范维克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些垄断并没有延续下来。

184 格拉曼(1977,p.242)。有关17世纪铜在金属中(仅次于银和金)的重要地位,参见柯伦贝兹(1976b,p.290)。

185 见埃利奥特(1996,p.300)。从16世纪开始到17世纪达到高潮的通货膨胀的后果之一,是资本明显地向国内集中(参见鲁伊斯·马丁(1970,p.60))。

186 参见埃利奥特(1966,p.300,p.329,p.344,pp.352~353,p.361,p.365)。在卡斯蒂利亚,Vellon铜币的铸造到1693年才结束。

187 例如安德逊认为:“正是由于1579年货币贬值时莱尔马公爵(Lerma)发行了新的Vellon铜币,导致了国际上对法伦的科帕尔贝格(Kopperberg)出产的铜的强烈需求”(1974a,p.183)。恰恰是在1599年,“瑞典政府的货币政策发生了变化”,这绝不是偶然的;在那一年,他们开始“大量发行纯铜的Vellon通货,(这)导致了1600年以后铜价的暴涨”(见罗伯茨,1958,II,p.33)。

188 见凡·德·威(1977,p.299)。

189 赫克舍认为:其目的是既提高铜价,又减少对进口白银的需求(1954,pp.88~89)。

190 见格拉曼(1977,p.243)。

191 格拉曼认为:16世纪后半叶,中欧的矿产量日趋衰落(1977,p.189)。罗伯茨认为,是三十年战争中断了匈牙利的矿山生产,并且使图林吉亚的矿山丧失了生产能力。(1958,II,p.90)。柯伦贝兹反对这两种解释,并把匈牙利生产的下降以及由此而来的德意志中部铜市场的萧条归因于“瑞典铜的供过于求”。(1974,p.262,并见1977b,p.340)。

192 见罗伯茨(1958,II,p.90)。见赫克舍:“冶铜业是瑞典政治扩张和经济发展之间最强劲的纽带”(1954,p.85)。最终它受到了1623年首次出现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的日本铜的挑战。但是在1650年前这场竞争是否有意义,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参见罗伯茨书中有关这场争论的论述。(1958,II,p.7,n.3);并见诺德曼(1964,pp.474~475)。

193 见J.德弗里埃(1976,p.21)。

194 特洛伊(1957,p.28)。参见波利森斯基:“当瑞典的铜和钢成为以特里普家族(Trips)和德·海尔(de Geer)家族为代表的荷兰—瑞典联手企业控



制的商品时，哥德堡和其他城镇只不过是荷兰在瑞典国土上的前哨”（1971，p. 175）。并参见罗伯茨：“1619年后兴起的新哥德堡的发展，是这种方向改变（向西）的明显标志。因为哥德堡的贸易全部在波罗的海以外，其最重要的市场是阿姆斯特丹。“荷兰的商人在哥德堡定居，就像他们在汉堡定居一样，目的明显是可以同西班牙自由贸易，而不顾法国议会（1789以后）的禁令”（1958，Ⅱ，p. 122）。

195 格拉曼（1977，p. 244）。

196 见罗伯茨（1958，Ⅱ，p. 28）。也有证据表明，威勒姆·范维克早在16世纪80年代就介入了瑞典采矿和冶金业的经营。

197 格拉曼（1977，p. 245）。

198 指出时间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公司创建于1619年的7月24日。1619年是贸易发生剧烈危机的一年，也是荷兰出现政治危机的一年。4月23日，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正式宣布了阿米尼派的五条罪状，就是 *the Sententia Remonstrantium*。5月13日，欧尔登巴涅维尔特（Oldenbarnevelt）被处决。是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有意地抓住了那些大都参与了波罗的海贸易的摄政者们政治上衰落的时机吗？这些人倾向于阿米尼阵营，他们的政治衰落是与普遍的贸易危机相随的。

199 参见罗伯茨（1958，Ⅱ，pp. 92~98）和格拉曼（1977，pp. 245~246）的讨论。

200 诺德曼（1972，p. 133）。

201 诺德曼（1972，p. 133）。所以瑞典军队是近代第一支非掠夺性的军队。见哈顿（Hutton）（1968，p. 524）。

202 罗伯茨（1958，Ⅱ，p. 189）。保持这种步兵传统的另一个国家是瑞士。

203 这个论断的根据是罗伯茨书中“陆军”一章的论述，并参见“海军”一章（1958，Ⅱ，3、4章）。由于有这些成就，瑞典陆军成为克伦威尔、士兵大王（Roi Sergeant，即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和彼得大帝仿效的榜样，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1972，p. 147）。

204 见鲍曼（1936，pp. 343~344）和埃斯特罗姆（Aström）（1973，pp. 92~94）。1630年至1635年，即特许证时期，战争的费用剧增。在1630年前，瑞典每年的军费是50万瑞克斯元（Rixdalers），此后每年为2~3千万。让南认为：“[军费开支]剧增的基本前提是以战养战”（1969，p. 324）。他引用在古斯塔夫

斯·阿道夫斯在 1628 年所写的一段话：“如果我们不表明战能养战，我就不知道我们如何才能成功地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关键问题是：普鲁士特许证是否能使瑞典自己单独承担增加的军费？或者阿尔特马克条约 (Treaty of Altmark) 和随后的普鲁士特许证能否使他们自己和使别人增加军费？在对瑞典偿付能力的分析中，瑞典在没有卖官鬻爵的情况下获得了法国在同样情况下无能为力的成就。罗伯茨对此评论说：“对[瑞典税收基础薄弱]这个难题的一个可能的答案，存在于这样一个矛盾之中：安全和偿付能力能够在以侵略面目出现的瑞典的受害者那里找到。战争可以用来支持战争。此外战争可以带来丰富的报酬；瑞典需要的是战争经济而不是和平经济。”而且，当后来瑞典的军队不再能使其邻国畏惧时，瑞典财源的真正缺乏就日益明显了” (1973a, p. 12, p. 14)。

205 瑞典的一位实业家路易斯·德·海尔（实际是一位在瑞典投资和生活的荷兰人）在 1644 年宣称：用于战舰的铁炮能够以青铜大炮 1/3 的价格获得——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铁炮在各地普遍使用起来，那时它已大为改进，即使从技术观点看，与老的铜炮也不相上下（格拉曼，1977, p. 243）。

206 “从铜制器皿转向铁制器皿的变化是清晰可见的。铁制品价格低廉是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此外还有如下事实，即铁锅、铁盘较易清洗，并且不影响食物的味道”（格拉曼 1977, p. 203）。

207 萨缪尔森 (Samuelsson) (1968, p. 28)。

208 萨缪尔森 (1968, p. 30)。并参见关于瑞典铁矿开采技术的讨论 (pp. 30~31)。

209 罗伯茨 (1958, II, p. 29)。

210 罗伯茨引用瑞典历史学家埃里克·古斯塔夫·盖耶 (Erik Gustav Geijer) 所说的“钢铁打开国门”的名言，认为查尔斯九世 (1599~1611) 对瓦姆兰 (Varmland) 的殖民之举是这一名言包含的真理的一个著名例证 (1958, II, p. 36)。罗伯茨还就国家干预冶铁工业的历史进行了讨论 (pp. 29~31, pp. 35~36)。

211 这里，和在注中，德·海尔被认定为荷兰人，因为他在瑞典就被看作是荷兰人。但是德·海尔家族表明了资本的流动性。由于政治—经济机遇，列日的德·海尔家族在 16 世纪末才将其“指挥部”移到阿姆斯特丹。（耶尔劳克斯 [Yernaux] 1939, p. 101, pp. 120~124)。并参见有关荷兰在中欧和北意大利

的分散加工工业中进行投资的论述(p. 195)。卡门认为,这些投资者都是佛莱芒人、瓦隆人(Wallcons)或比利时人,即都是来自尼德兰南部——和列日?(见1972, pp. 92~99)。16世纪后半叶的确如此,那是他从中得出其特定结论的时刻;但是在尼德兰起义过程中,这些佛莱芒人中的许多人定居在荷兰,随后到其他国家去投资。在这些国家里,在17世纪,他们被看作是荷兰人,并且不仅仅是“当时的英国人”这样认为。卡门认为是英国人“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并认为“这掩盖了”他们是佛莱芒人这一事实(1972, p. 95)。但词的使用常常是揭示而不是掩盖社会真实。

212 诺德曼(1972, p. 137)。

213 萨缪尔森(1968, p. 31)。

214 见罗伯茨(1958, II, pp. 37~38)。比吉塔·奥登(Birgitta Odén)在一次私人通信中告诉我,她对此表示怀疑,因为除了烧炭外,“劳动力都具有高度的技巧,并且是按级别组织起来的。”

215 见赫克舍(1954, p. 99)。蒙克特尔(Munktel)的研究(1934)表明:工人既从事采矿,又在其小茅屋中进行初步的冶炼,而铁器制造商主要是向他们提供木材。在约翰·弗林特(John Flint)帮助下,我得知这研究成果。名为Utarbetningsträtt的分散加工制也广泛用于铜的生产中。参见鲁斯(1976, p. 59),并参见博修斯(Boëthius)(1958, pp. 148~149)。

216 见萨缪尔森(1968, pp. 28~29)。17世纪时谷物出口实际下降到零。参见阿斯特罗姆(Aström)(1973, p. 67, 表5)。木材出口也由于挪威人的竞争和本国政府为满足自己海军的需要禁止出口栎木而受到削减。参见萨缪尔森(1968, p. 29)。

217 参见萨缪尔森:“17世纪为发展国家的海运业而进行的斗争(且不说瑞典为维护国内一般工商业而作的其他努力),或许可以与一种已经取得了政治自治,但还力求摆脱经济枷锁的前殖民地的渴望相比。也许这种比较可以更大胆地延伸……正像一些新兴的非洲国家注意保留前殖民地的官员,以帮助他们进行经济和国家行政管理一样,瑞典在17世纪也尽力劝说以前的金融家和其他来自国外的商人成为瑞典臣民。其用意是‘接纳’他们而使其资本和能力‘瑞典化’”(1968, p. 41)。

并参见赫克舍:“汉萨人把自己视为一种更先进的文明的代表,并且把瑞典视为一块殖民领土;他们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德意志人,从未被同化。但是,即使在17世纪,这个国家也未能从属于外邦人;他们,或至少是他们的子女,

几乎是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适应下来了。一般来讲，第二代人从习惯和语言上看都成了瑞典人……17世纪的政府也在追求一种周密的政策以达到吸纳外国人的目的”(1954, pp. 107~108)。赫克舍所指的政策就是给予外国人尊贵和荣誉的政策。

218 参见德约恩(1969, pp. 36~37)。然而,德约恩认为:瑞典与英国和法国不同,它“与联省共和国的经济紧连在一起”,以致不能贯彻一套系统的经济政策(p. 22)。

219 萨缪尔森(1968, p. 29)。实际上,萨缪尔森称这三种垄断为“商业上的霸权”,而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夸大其辞。

220 安德逊(1974a, p. 29)。他把瑞典在17世纪东欧的军事地位比作西班牙在16世纪的西欧所处的军事地位。他认为瑞典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时间是从1630年至1720年。罗伯茨认为是从1621年吉斯塔夫斯·阿道夫斯攻陷里加到1721年的尼斯塔德和约(Peace of Nystad),“整整一个世纪”(1973a, p. 1)。

221 罗伯茨将瑞典比较成功的历程追溯到17世纪70年代——恰恰是我们确定的荷兰霸权的结束时期。这当然就解释了为什么“瑞典不完全适合用于解释‘17世纪危机’的任何普遍结论”(罗伯茨,1962, p. 53)。

222 萨缪尔森(1968, p. 75)。

223 阿斯特罗姆(1973, p. 68)。帝国结构是分层建立的,正像阿斯特罗姆指出:“组织成一个骑士般团体的古老的贵族在语言上和思维方式上都属于日耳曼人。在一些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在稳定的里加、停滞的雷瓦尔(Reval)和繁荣的纳尔瓦(Narva),这些城市的市民也是如此。……大总督和总督,通过他们的小衙门和来自瑞典和芬兰的官吏,代表瑞典国王对各公爵领地进行行政管理。瑞典和芬兰的卫戍部队构成了他们权力的基础。爱沙尼亚和立窝尼亚的贵族靠其领地生活,在他们周围耕种土地的是操着不同于他们主人的语言的处于农奴地位的农民。”从东波罗的海这些地区的角度来看,17世纪的突出现象是反对外国资本渗入的持久斗争,但这场斗争不太成功。参见阿诺德·苏姆(Arnold Soom):“无疑,缺少资本(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为了与荷兰人成功地展开竞争,需要大量的资本”(1962, p. 458)。

224 罗伯茨(1973a, p. 4)。他也认为:为获得“永久稳固的财政地位”的努力失败了,但是“无疑,帝国对瑞典本身在经济上还是有重要意义的”(pp. 4、5、6),伦德奎斯特(Lundkvist)也认为,瑞典在其波罗的海帝国中的“商

业抱负”失败了，但从对里加的控制以及由此可以得到生长在其内陆的亚麻和大麻的利益是例外。”“里加贸易的统计数字表明，17世纪晚期肯定存在着向上发展的趋势；这个城市的重要性在稳步增加”（1973, p. 47）。达恩斯多夫认为：就和波罗的海以外的地区进行贸易来讲，17世纪仅有三个重要港口：但泽（格但斯克）、柯尼斯堡和里加（见1947, p. 2）。简施（Jensch）证明，进入里加港的船只越来越多——由1600—1690年的96只增加到1650—1657年的263只，其中荷兰船只从65只增加到221只（见1930, p. 88）。

225 在17世纪后半叶，船的数量每年由40只左右增加到300只左右（顿斯多夫斯，1947, p. 6）。

226 见让南（1969, p. 95）。

227 艾格伦（Agren）（1973a, p. 9）。

228 见卡尔（Carr）（1964, pp. 20—21）。

229 罗伯茨（1958, II, 1958, p. 159, 并见 pp. 57—60 的讨论）。并参见萨缪尔森（1968, pp. 53—54）。

230 见罗伯茨（1958, II, 1958, pp. 50—52）。并见唐尼森：“正是在这些贵族的佃农中，人们发现大多数都要服劳役。随着以贵族城堡为中心的农业大庄园的建立，17世纪时劳役不断发展，并且日益沉重，而贵族城堡在这个时期更加壮观”（1971, p. 307）。唐尼森观察到地区的差别：北部没什么大地产，无疑是因为生产商品作物难于获利；在斯德哥尔摩以西和以前属于丹麦的斯塔尼亚各省以及荷兰等地，土地高度集中。

231 见卡尔松（1972, p. 575）。

232 达格伦（Dahlgren）（1973a, p. 109）。

233 见罗伯茨（1958, II, pp. 55—56）。

234 见哈顿〔Hatton〕1974, p. 4, n. 2〕。唐尼森（1971, p. 308）认为，贵族领地从1560年的15%增加到1655年的60%。朱提卡拉（Jutikkala）认为，从1600年至该世纪中叶，瑞典的贵族领地从1/4增加到2/3，在芬兰则从5%增加到50%（1975, pp. 159—160）。

235 罗伯茨（1958, II, p. 153）。罗伯茨从维提洛克（G. Witrock）（1927）书中引用了一个农民代言人的这段陈述。

236 “17世纪的瑞典帝国只有继续扩张才能继续存在”（达格伦，1973b, p. 175）。

237 阿斯特罗姆（1973, p. 58; 并参见 pp. 65—75）。

238 见达格伦，他认为战争只是直接的借口：“查尔斯十世事实上甚至在其继位（在1654年）以前就已经计划要削减。他认为削减是必然要采取的措施，与瑞典是否进行战争无关”（1973b, p. 178）。

239 见埃格伦(Agren)(1973b, pp. 240~241)和达格伦(1973a, p. 210)。

240 见埃格伦(1973a, p. 27, 并见1973b, pp. 237~241)。这个压力在1680年的削减之后尤为严重。见达格伦(1973a, pp. 126~131)。

241 埃斯特伦(1973, p. 94)。他认为瑞典偶尔也从荷兰、英格兰、西班牙、德意志的一些邦国中得到一些补助金，但是这“并不具有重大意义”。一般来讲，瑞典试图通过其在纳尔瓦、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的海关港口，开辟西欧与波兰和俄国的贸易，见埃斯特伦(1963, p. 50)。

242 见班姆福特(Bamford)(1954)。

243 见埃斯特伦(1973, p. 73, pp. 86~87)。为贵族的掠夺付出代价的是芬兰农民而不是瑞典人，芬兰（以及科克斯霍姆）成了福地，因为波斯尼亚湾和拉多加(Ladoga)湖沿岸的赠送“为高级政务会议贵族的大地产的产品出口”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渠道（埃斯特伦，1973, p. 87）。当芬兰开始提供军事弹药时，它的贡献也超出了自己的本份”。如果说在“鼎盛时代”来临之际，芬兰骑兵形成了哥萨克式的军队，这或许是一个非历史的比拟，或者是一个偏执的夸张。然而其中毕竟有些真实成份。（埃斯特伦，1973, p. 64）。

244 诺德曼提醒我们注意欧洲价格普遍跌落的重要意义；瑞典价格的跌落“较晚”（1650年以后），“然而也是清晰可见的”（1971, p. 454）。英格兰和联省共和国物价跌落也同瑞典一样晚。见让南(1969, p. 95)。价格跌落对国家收入的影响由于如下事实而加强了：即价格（在1672年）开始适度回升不久，瑞典就卷入了法荷战争（在1675年）。罗森(Rosén)认为：“路易十四以不给补助金相威胁，迫使瑞典进攻勃兰登堡，即联省共和国的同盟者。1675年6月，瑞典军队在费尔贝林(Fehrbellin)遭到失败。瑞典违心地被拖入了大国的角逐……菲尔比林这场不大的武力冲突抹去了自三十年战争以来一直环绕着瑞典军队的实力光环”（1961, p. 529）。罗伯茨“到1679年，此前30年间使欧洲为之震惊的这个强国已降到一个十分卑微的地位。……古斯塔夫斯·阿道夫斯的继承人成了法国的附庸；法国与荷兰的外交官在争论瑞典领土的命运时，就像他们讨论西班牙的占领地一样，把瑞典领土当成战利品或交换筹码讨价还价（1967, p. 230）。罗森补充道：“正像1657—1660年的战争激发了专制制度在丹麦—挪威出现一样，1675—1679年的战争导致了专制制度在瑞典的

建立”(1961, p. 531)。并参见埃斯特鲁德(Østerud):“为了应付严重的财政和军事危机,1680年左右瑞典确立了专制君主制”(1976, p. 8)。

245 达格伦认为,瑞典贵族在经济上比欧洲其他国家的贵族显然做得更好些。“在欧洲其他国家,甚至在像丹麦这样与瑞典近在咫尺的国家中,情况常常是这样,即土地贵族发现自身正在渡过一个剧烈的经济危机的时期……人们得到的突出印象是,就瑞典贵族而言,在1680年以前,并没有任何这种危机的迹象。他们处境相当不坏的原因似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上层贵族,抓住机会对各种工商业活动进行投资,或是在海运业中,或是在贸易公司里……1680年以后,瑞典贵族才面临危机,并且这个危机的到来与其说是经济因素造成,不如说是政治决策的结果”(1973a, pp. 124~125)。

不应忘记,王室财产的分割政策特别有利于上层贵族(与寒门贵族[löfgadel]对立的所谓高门贵族[högadel]),并且直到1680年前,日益依靠为国家服役取得收入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寒门贵族阶层。对“削减”政策的一种解释是:寒门贵族在1675—1679的战争期间,发现自己的薪水不够支付,并且希望通过没收高门贵族的土地,增加国家税收来保证他们的收入。参见艾格伦书中关于罗森和赫斯勒(C. A. Hessler)论点的讨论(1976, pp. 56~58, pp. 79~80)。阿斯特罗姆对有关贵族分裂的讨论补充了种族上的考虑。他指出:克里斯蒂纳和查尔斯十一世把许多德意志血统的波罗的海人列入了高门贵族的行列,而“削减”政策的“狂热支持者”则是“来自芬兰的人,如格鲁茨人(Greutz)、佛莱芒人或瑞德人(Wrede),或是来自瑞典中部的人,他们的家族只是最近才出现在社会舞台上”(1973, p. 77)。在芬兰国内,支持“削减”的“斗士”也是那些其男爵领地“位置最不利”,位于波的尼亚湾和拉多加湖一带的人(p. 87)。里夫对爱沙尼亚的研究倾向于确认阿斯特罗姆的观点。在利夫兰(Livland),贵族失去了其土地的5/6,在埃斯特兰(Estland)失去了2/5,在萨列马(Saaremaa)失去了将近1/3(参见里夫,1935, p. 35)。

246 法荷战争以1678—1679年的《奈梅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结束。“路易十四未经任何实际协商就代表瑞典同他的敌人达成了和约……路易十四没有同查尔斯十一世协商(这件事)遭到了怨恨。法国也违背了在1672年盟约中许下的诺言,即瑞典在关税方面得到了某些让步后才与联省共和国休战。并且在与荷兰人的和约中包含着一个贸易协议,它对瑞典极为不利,以致查尔斯十一世拒绝认可”罗森(1961, p. 530)。哈顿把“削减”看作主要是“解决议和带来的问题”的“一个相当成功的举措”,使瑞典摆脱了它在欧洲事务中

选择自由受到的限制，以及‘均势政策’盟约和补助条约”对它的制约。(1968a, p. 74)。

247 见埃格伦(1973b, p. 243)。

248 埃格伦(1973b, p. 257)。此外，这种土地的转让对农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间接的影响，正像赫克舍指出的那样：“这些贵族由于失去了大量地产，因此逐渐成为绅士农场主而不是食租人……他们……比从前更有生产积极性”(1954, p. 128)。

249 见阿斯普瓦尔(Aspvall)(1966, pp. 3-4)。

250 埃斯特鲁德(1976, pp. 13-14)。

251 见罗森(1961, p. 534)，埃斯特鲁德(1976, p. 14)和达格伦(1973a, p. 125)。“一些王室重臣[利用]削减造成地价下跌的时机为自己获得了大量的地产”，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集中(见达格伦 1973a, p. 125)。埃格伦同意贵族拯救了庄园的说法，但关于王室重臣攫取土地的论断，他说：“断言地价下跌——这是整个辩论的基点——只是一个推测，并未得到证明”(1973b, p. 256)。

我们也不应忽视学术界对新旧上层贵族力量对比的讨论，尤其是因为“在 17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加封贵族异乎寻常地频繁”(卡尔松, 1972, p. 580)。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土地所有者和非世袭官员日益合流。1700 年，25% 的上层文官出自贵族世家，44% 则是后来加封的。北方战争期间(1700—1721)，查尔斯十二世加封了许多军官为贵族，这些人往往是出身于外国的贵族家庭(见卡尔松, 1972, p. 586)。战后，许多文官得到加封，而不是被授予各种政治权力(p. 610)。同时，在国家机构中旧贵族保留的尊贵席位，使旧贵族尽管地产被削减，仍能在战争期间忠于王室。见哈顿(1974, p. 4)。

这一切举措的效果，就是把新老上层分子一起笼络在国家机器统辖之下。1700 年左右，国家的力量对比在阶级结构的两极分化中得到反映；贵族与平民之间出现了“鲜明的区别”。“贵族既是国家官员，又是土地所有者，而平民或者只是官职持有者(教士、文官、陆海军官)，或只是土地所有者(农民)，或者只是商人或工匠”(见卡尔松, 1972, p. 608)。参见埃格伦对 19 世纪瑞典史学界认为国王打算通过“削减”把农民从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观点表示的极大怀疑(1973b, p. 244, pp. 257-263)。另一方面，罗伯茨却相信这一点；他认为：“农民的自由再没有受到威胁”(1967, p. 249)。

252 艾伯格(1972, p. 272)。这种制度曾普遍推行。在 1675—1679 年的战



争中，“征募步兵尤其引起了大部分农民的不满，因为贵族的侍从和佃农通常是免于征募的”[斯托耶(Stoye), 1970b, p. 770]。

253 见达格伦(1973a, p. 129)。埃格伦指出：合理化措施的推行不只限于军队，“严格地说，把‘配额制’这一术语仅用于说明军队的情况，就过于狭窄了。在广义上，它表明，每一项开支都与确定的收入来源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种组织逐渐地不仅用于军事也用于民事开支”(1973b, 248a.)。

254 “从此以后，Råd(议事会)的成员将是国王或国会的大臣——侍从，就像实际上得以实现的那样——他们除了头戴貂皮冠，身着天鹅绒长袍，绝对没有查尔斯十一世时期的少数党人那样庄重严肃的雄辩、镇定自若的表情以及那种传统的元老式的高贵姿态”。(罗伯茨, 1967, pp. 242~243)。

255 随着英格兰在17世纪对谷物需求的减少以及对木材需求的增加，它的贸易逐渐从波兰转向瑞典，因为波兰的木材过于昂贵。见费多罗维茨(Fedolowicz)(1976)。这一转变在1655—1656年的波兰—瑞典战争后更加迅速(见费多罗维茨, 1967, p. 377, 图表I)。但是瑞典能够避免波兰已经陷入的那种的命运。“[英国人]抱怨的一个永久性问题是限制外国人在(瑞典国内)的自由活动和贸易”(阿斯特罗姆, 1962, p. 101)。瑞典人支配贸易条件的能力使英国饱尝苦头，以致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英国在18世纪初竭力试图通过在英属北美建立一个竞争性的海军补给品基地(并未取得很大的成功)来挫败瑞典。

256 萨缪尔森(1968, p. 13)。

257 奎斯特(1973, p. 57)。

258 马洛维斯特(1959, p. 189)。并参见哈顿(1970, pp. 648~650)。

259 见朱提卡拉(1955, p. 43, p. 63)。

260 柯伦贝兹认为17世纪的俄国是一个已并入到17世纪的世界经济中的国家。见柯伦贝兹(1973)。关于苏联学者对17世纪的看法，参见切列普宁(Cherepnin)(1964, 特别是pp. 18~22)。阿斯特罗姆认为，俄国和西欧各国之间经济关系方面的转折点只是在“18世纪中叶才出现，当时，英国进口的铁、大麻、亚麻、沥青、焦油以及钾碱大部分都是来自俄国占有的港口”(1962, p. 113)。

261 哈顿(1970, p. 648)。这很难说是一种经济上的不合理情况，正如奥伯(Ohberg)指出，“所以，可以说，瑞典按垄断方针制定自己的商业政策有一定的实际理由。瑞典作为一个国家，在资本上并不富有，并且不可能依靠它自己

公民拥有的手段与诸如尼德兰和英格兰这些富有的国家在俄国市场上进行竞争。然而,如果瑞典能够通过军事或政治途径获得一种垄断地位,就可以从俄国市场中获得丰厚的财政利益”(1955,p. 161)。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英格兰和尼德兰“在17世纪90年代的战争中追求一种共同的波罗的海政策”的原因(阿斯特罗姆,1962,p. 45)。

262 “海上强国<sup>(1)</sup>渴望结束战争,并由此利用瑞典军队参加他们即将同法国进行的角逐(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因而在1700年在彼得和查尔斯之间进行调停,此后几年又多次进行调停。但总是得到沙皇的接受,而瑞典国王总是予以拒绝。瑞典国王因成功而志满意得,并且受到一种正当的复仇愿望的驱使。因为他曾遭到那些国家的攻击”(安德逊,1970,p. 734)。

263 见钱德勒(Chandler)(1970,p. 754)。

264 诺德曼(1972,p. 147)。

265 伦德奎斯特(1973,p. 26)。

266 阿斯特罗姆(1973,p. 100)。

267 “甚至自1721年(正式结束这场战争的尼斯塔德和约签订)之时,关于瑞典帝国崩溃的原因,一直在进行争论。这是查尔斯十二世走好运时拒绝议和的过错吗?……相反,人们可以说,保持瑞典大国地位的唯一希望随着查尔斯十二世的死亡才被灭了”(哈顿,1970,p. 679)。

268 “使查尔斯十二世由一位征服者变成逃亡者的波尔塔瓦之战改变了整个形势……它大大增加了彼得在西欧的影响,此外也提高了他只有军事成功才能给予的威望。乌尔比奇(Urbich)(俄国驻维也纳的大臣)1709年8月给莱布尼茨(Leibniz)的信中写道:“现在,人们开始像以前惧怕瑞典一样惧怕沙皇”。这位哲学家赞同地说:“人们都说,沙俄将使整个欧洲感到害怕,他将成为一个北方的土耳其”。(安德逊,1970,p. 735)。请注意与土耳其的比较。土耳其同俄国一样,在17世纪也是处于欧洲世界经济体外部地区的一个世界帝国,并且受到被吞并和边缘化的威胁。

269 实际上,“立窝尼亚一直到它在1721年[并入]俄国时才真正成为瑞典的面包篮子”(见萨缪尔森,1968,p. 76)。1721年的条约特别允许瑞典从它以前的这个行省免税进口谷物,一年价值达5万卢布。见伦德克瓦斯特(1973,p. 56)。

---

(1) 指英国和荷兰。——译者

270 “1720年后，以前几乎完全为瑞典人所垄断的产品——铁、焦油和沥青——其不断增加的需求量可以从俄国直接得到”(阿斯特罗姆,1962,p.106)。

271 诺德曼(1971,p.455)。

272 查尔斯十二世死于1718年。他没有留下继承人，正是在复杂的王位继承问题中，“由有势力的土地所有者、军官和行政官员组成的一个松散的反专制政体的派别赢得了胜利”，他们强迫乌尔里卡(Ulrika)在她1719年5月继位登基以前宣布“签署并遵守由国会制定的宪法”。(哈顿,1966,p.351)。乌尔里卡违背诺言，被迫放弃继承权。她的继承者弗雷德里克一世签署了1720年的宪法，这个宪法基本确定了由最终向国会负责的内阁统治的君主立宪制(见哈顿,1966,pp.352~355)。

273 萨缪尔森把霍恩(Horn)的努力比作类似于“大约同时”在路易十五统治下的红衣主教弗勒里(Cardinal Fleury)<sup>[1]</sup>“解决大破产”的努力(1968,p.14)。哈顿指出：霍恩在议事会中力量最强大的那些年里，“瑞典似乎再次由代表土地贵族、高级官僚和高级教士利益的寡头议事会统治”(1966,p.352)。

274 哈顿(1966,p.357)。

275 他们把自己标榜为“戴睡帽的人”，那是“强调武力的头饰”，因此也包含着对霍恩缺乏军事支柱的指责。他们称他们的对手是“睡帽党人”或“无边帽党人”，认为他们是“贪睡的懦夫，头戴睡帽的老人”(见哈顿1966,p.356)。

276 见萨缪尔森(1968,p.107,pp.109~120)；伊格里(Eagly)(1969,p.748,p.752;1971,pp.13~14,pp.18~20)；霍夫德(Hovde)(1948,pp.23~25)。

277 安德逊(1974a,p.190)。

278 睡帽党和无边帽党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争论。哈顿认为：“18世纪20年代的严格的重商主义突出体现为1724年的产品运输法案”，它“仿效英国的航海条例”，沉重打击了荷兰和英国的波罗的海航运业。哈顿认为，严格的重商主义还体现在1726年制订的进口条例。1738年后，睡帽党人重新制定了那些条例，“加强了对瑞典工业企业的支持，并且为此提供了空前有力的保护以对抗外国竞争”。哈顿认为：“回顾一下就不难看出，仅仅靠着瑞典和芬兰的十分稳定的出口，首先是瑞典的铁制品的出口，睡边

[1] 弗勒里(André-Hercule de Fleury, 1653—1714)，法国红衣主教和政治家，曾任法王路易十五的导师。1726—1746年间是路易十五实际上的首相。——译者

帽党人才得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发展新的制造业继续进行重商主义的试验。不过,直到1762—1763年的危机(这场危机部分由于瑞典卷入七年战争,部分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引起)发生以前,无边帽党人没有对镶边帽党人的重商主义政策理论提出过强有力的抗争,虽然他们不断敦促执政党缓和其政策。同样,这两个党派在农业政策上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一致”(哈顿,1966, p. 357)。

重商主义政策的前提条件逐渐消失,这不仅因为英国实力的增长逐渐超过法国,而且俄国作为一个铁制品出口国,其竞争地位也在稳步上升。瑞典由18世纪初铁制品产量占世界的75%~90%下降到18世纪60年代只占世界产量的1/3,这时俄国的产量超过了瑞典,由于在1730—1745年左右,瑞典的销售在一种不利的条件下逐渐下降,瑞典人就严格控制产量以维持价格。萨缪尔森认为这并非愚蠢之举,而是“不得已而为之”(1968, p. 89)。并见赫克舍尔(1932, pp. 134~135, p. 139);博修斯(1958, pp. 151~152);希尔德布兰德(1958, p. 13)。

279 埃斯特鲁德(1976, p. 24)。他所说的“独特的复合体”就是“建立在半农奴性质的农民和蒸蒸日上的城市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专制主义国家”。

280 见彼德森(1967, pp. 20~21 和 1968, p. 1249)。

281 彼德森(1967, p. 30)。当然,像在任何那样的形势中一样,一个竞争者的不幸对一个没有受到不幸打击的竞争者来说,就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彼德森指出,“在安全条件方面”,“丹麦在一个硝烟弥漫的时期里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他说:“1617—1623年德意志和波兰的商业与金融危机,以及17世纪30年代中叶以前瑞典的波罗的海政策,给丹麦农业提供了不寻常的机会;瑞典战争的爆发和限制谷物贸易的政策……再一次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提高了谷物的价格,这就使荷兰的生产者为本国赢得了超额利润。”

282 见彼德森(1967, pp. 6~7)和埃斯特鲁德(1976, p. 19)。

283 在非领地的土地中,56%属于王室。见彼德森(1968, p. 1238)。

284 见希尔(1926, pp. 102~152)和罗伯茨(1970, pp. 402~403)。

285 朱提卡拉(1975, p. 164)。认识总是取决于人们对百分比的某一部分的理解,彼德森显然是看重其中的60%,意在强调丹麦农业以传统的领主农庄为基础(见1967, p. 23; 1968, pp. 1251~1252)。彼德森的确注意到,丹麦贵族在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流动的封闭程度上,“完全不同于”瑞典的(以及英国和法国的)贵族。(1968, p. 1237)。

286 见乔格森(Jorgensen)(1963, p. 78, p. 107);格拉曼(1977, p. 240)和彼德森(1970, p. 84)。

287 见雷德韦(Reedaway)(1906, p. 573);埃斯特鲁德说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1978, p. 15)。

288 丹麦在17世纪50年代受到了瘟疫的打击,失去了大量人口。参见彼德森(1967, p. 31)和乔格森(1963, p. 79)。

289 《罗斯基勒条约》将挪威的特隆赫姆(Trondheim)地区和波罗的海中的博恩霍尔姆(Bornholm)岛划归瑞典,但这些地区在1660年的《哥本哈根条约》中又回到了丹麦手中。见罗森(1961, p. 552);C. E. 希尔(1926, p. 184);达比和弗拉德(Fullard)(1970, p. 36)书中的地图。

290 见瑞达维(1906, p. 588),并参见希尔(1926, pp. 174~175)。瑞典的推进曾得到荷兰的支援。1658年8月29日荷兰派出军舰支援瑞典海军进入松德海峡,尽管战术上不分胜负,但瑞典进入了哥本哈根,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希尔指出,分遣舰队的指挥官就是德·威特(De Witt),他就是“在1645年推进到松德反对[丹麦]克里斯蒂安四世的那位海军上将”(1926, p. 70)。在这场战争的早期阶段,得到荷兰援助的瑞典在《布勒姆瑟布鲁条约》(Treaty of Brønsebro)中获得了相当有利的条件,这些条件“明显标志着丹麦在北欧优势的衰落”(瑞达维,1906, p. 572)。这个条约重新确认了瑞典免交松德海峡税的古老特权;更重要的是,把这一特权扩展到瑞典在东波罗的海和德意志占有的新省份。

291 乔格森(1963, pp. 97~98)。同时,1660年农业萧条造成的价格跌落“从社会上、经济上和人口上看,对丹麦贵族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见汉森(S. A. Hansen)(1972, p. 101)。这显然使贵族几乎没有能力对抗新的专制政策。

292 见罗森(1961, pp. 523~526)。关于向单一耕作发展的趋势,参见简森(Jensen)(1937, pp. 41~42)。

293 见罗森(1961, p. 536)和朱提卡拉(1975, p. 160)。

294 见简森(1937, p. 45),罗森(1961, p. 526);伊姆霍夫(Imhof)(1974, 随处可见)和蒙克(Munck)(1977, 随处可见)。

295 见乔格森(1963, p. 96)。

296 见罗森(1961, p. 538)。

297 见肯特(Kent)(1973, pp. 6~8)。

298 国家这个专用名称的发展,反映了这个过程。统治柏林附近地区的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在15和16世纪把一些不相连接的领土归入他的版图,17世纪并人的更多。随着领土的扩大,所加的头衔越多,例如,他是波拉美尼亚、马格德堡和克利维斯(Cleves)的公爵。他是哈尔伯施塔特和明登(Halberstadt and Minden)的亲王。他是马尔克和拉文斯堡(Mark and Ravensberg)的伯爵。1618年他又成为普鲁士公爵,但这仅限于东普鲁士,到1657—1660年为止,它们处于波兰宗主权的统治之下。1701年他在普鲁士内部被称为国王,只是在1772年由于波兰被第一次瓜分,他获得了西普鲁士,(只有在这时)他才被称为普鲁士的国王。虽然在国际外交中,迟至1794年这个国家仍被称为“La prusse”,“普鲁士诸邦”才被承认“拥有一般的国家权利”(Allgemeines Landrecht)。只是在1807年,即拿破仑时代的大动荡中,这一过程才变得明朗化,当时普鲁士一般被称为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国,当然是直到它成为德国为止。应该指出,只是在1804年“哈布斯堡家族的国土”才成为“奥地利帝国”。见罗森堡(Rosenberg)(1958, pp. 27~28);达比和弗拉德(1970, pp. 138~144, p. 146)。

299 与传统的领主农庄(Grundherrschaft)相对的领主农场(Gutsherrschaft)的确切含义,在文献中是一个广泛争论的问题。可能与这个词义相近的一个英文词,就是与Manor(庄园)不同的Demesne(领主自营田庄, Gut)。对此有三种定义。

奥托·欣策(Otto Hintze)认为:“领主农场的主要特征是:领主亲自经营庄园,靠在远方市场出售其产品所得的收入维持生活,使用农奴劳役,并且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庄园构成了合法的行政单位(Gutsbezirk),领主对农民拥有政治和司法权……传统的领主农庄的主要特征是:领主本人并不经营庄园而是靠租佃农民所缴纳的现金和实物生活。由于这种制度下的农民在经济上受其领主的控制较小,所以他们比起在领主农场制度下农民享有更大程度的自由”(1975a, p. 39)。

约阿希姆·弗雷赫尔·冯·布劳恩(Joachim Freiherr Von Braun)认为:“领主自营农场(Gutswirtschaft)是一个大农业企业,所以也是一个以自主经营(Betriebsleiters)为基础的独立组织。因此这种单位能够最大限度地面向市场进行生产,其运作不必顾及法规和非直接相关的义务。(Zur Ostdeutschen Agrargeschichte), 1960, p. 10)。

弗里德利希·吕特格认为:“领主自营农场……是一种经济现象。农场属

于一个领主，他通过雇佣和指派非家庭劳动力做工来使其运作。领主农庄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出租农庄，在这种形式中领主仅为自己保留一小块土地，并且主要是靠租金生活，等等。另外一种形式则是经营型领主农庄(Wirtschaftgrundherrschaft)，在这种形式中，在一个农庄的结构[即相当于传统的领主农庄的一个法定机构]中，保持一个较大的领主自营农场(即在领主直接控制下的一块地产”(Zur ostdeutschen Agrargeschichte, 1960, p. 83)

必须记住，herrschaft(领主农庄)指政治法律结构，Wirtschaft(经营型农庄)指社会生产关系，并且，像在下萨克森那样，领主农庄和领主自营农场盛行的地区有可能出现“混合”形式。参见布劳恩和吕特格之间的讨论(Zur Ostdeutschen Agrargeschichte, 1960, pp. 84~85)。

这里我们不打算回顾在沃勒斯坦(1974)一书中详加讨论的领主自营农场是否只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变种，还是资本主义现象这个问题。我们只简单地指出：在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历史科学杂志》) 即民主德国有关这一主题的杂志中已经有过一段长期的争论。1953年，约翰斯·尼特威斯(Johannes Nichtweiss)认为：因为领主自营农场涉及到大规模地为市场而生产，因此它不同于封建经济。他还指出：“在那种封建奴役经济中，典型的是把农民束缚在农民的土地上而不是[像在领主自营农场中那样]”束缚在领主土地上(1953, p. 705)。于尔根·库辛斯基(Jürgen Kuczynski)对此表示同意(1954)。接着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见尼特威斯(Nichtweiss)(1955)，曼弗雷德·哈曼(Manfred Humann)(1954)，格哈德·海茨(Gerhard Heitz)(1955)，尼特威斯(1956)，威利·博尔克(Willi Boelcke)(1956)，海茨(1957)和尼特威斯(1957)。正如尼特威斯指出，库辛斯基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与吕特格是相似的(1957, p. 805)。泰勒在把容克庄园比作“美洲大草原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时，与尼特威斯的观点也是相近的(1946, p. 29)。

300 参见卡斯腾(1947, p. 145, p. 157)；库恩(Kuhn)(Zur ostdeutschen Agrargeschichte 1960, pp. 40~41)；吕特格(1963, pp. 101~102)；斯利彻·范巴恩(1977, pp. 111~112)。领主自营农场明显地与 Wüstungen 或空闲地有关[参见施莱辛格(Schlesinger) Zur ostdeutschen Agrargeschichte, 1960, p. 48]。但这种联系又是什么呢？西格蒙德·沃尔夫认为：农民弃地导致了空闲地的出现。而空闲地又使领主自营农场的产生成为可能。参见沃尔夫(1957, pp. 323~324)。然而，贝托尔德(Berthold)认为：农民弃地是对日益沉重的剥削的一种反应(1964, p. 16, p. 19)。

301 见特罗伊(1955, p. 413); 巴勒克拉夫(1962, p. 394); 哈尼斯(Harnisch)(1968, pp. 130~131); 斯利彻·范巴恩(1977, p. 111)。

302 见库里斯彻尔(1932, p. 12)。

303 卡斯腾(1954, p. 198)。

304 见塔皮埃(1971, pp. 123~124)。实际上,到1654年,哈布斯堡王朝对那些把乡村(公用)地兼并过来的领主土地不再给予免税权(见塔皮埃1971, p. 120)。

305 一方面,在易北河以东还有一种奴仆劳役期制度(Gesindezwangdienst),它要求农奴的孩子必须作为家内奴仆在领主庄园服劳役1~4年。参见库里斯彻尔(1932, p. 14); 斯利彻·范巴恩(1977, p. 15); 卢特科斯基(1926, p. 496)指出,奴仆劳役制极为残酷,以致“宁愿在监狱过10年,也不愿服两年苦役”;尽管这种劳役是有薪水的(无疑报酬较低),卢特科斯基认为易北河以东农民的全部义务(劳役和纳税)比波兰农民要重(1927a, p. 97)。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也存在着奴仆劳役期制度。参见斯皮兹(1969, p. 53)。

306 吕特格(1963, p. 117)。克莱普(Knapp)引用的这个论断来自“*Die Bauernbefreiung in Österreich und in Preussen*”一文,该文转载于*Grundherrschaft und Rittergut*一书,(1897, I, p. 34)。并参见格利茨(Gorlitz),他在谈到勃兰登堡—普鲁士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社会变化时说:“农民不再仅仅是贵族的下属;贵族作为一个阶层,类似于国君的朝臣。农民和贵族都成为国君的下属。贵族不再占有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而是成了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956, p. 86)。这个观点与卢特科斯基对易北河以东农民处境的解释是相吻合的。他认为,工业的兴起和王室对农民的保护,使得18世纪时很难获得农业劳力。因此,“奴仆服役期”的状况更加恶化,因为领主只有加重对他们控制下的农民的剥削,才能在经济上生存下去(参见卢特科斯基,1926, p. 497)。斯皮兹认为:易北河以东庄园比起东欧其他地区的庄园强迫徭役要少,尽管在法律上有这种可能性;并且庄园劳作更多地依靠“强迫或自愿基础上受雇的家庭雇佣劳动”(1969, p. 23)。

307 安德逊(1974a, p. 262)。而且,相对的实力在三十年战争中受到进一步削弱,这场战争“无疑标志着在德意志许多地区庄园命运的决定性变化(恶化)”(卡斯腾,1959, p. 437)。

308 罗森堡(1958, p. 31)。



309 见霍华德(Howard)(1976, p. 67)。并参见卡斯腾：“在 17 世纪晚期，在如此不利的基础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是德国历史上的奇迹之一，因为勃兰登堡似乎本来注定要踏上波兰或梅克伦堡的道路的”(1969, p. 544)。

310 卡斯腾(1954, p. 179)。他认为战争提供了“意外的幸运条件”(1950, p. 177)。

311 卡斯腾(1950, p. 178)。而且，克利夫(Cleve)以及马尔克和拉文斯堡一带在三十年战争以前就有大量的工业存在。

312 “霍亨索伦王朝是继哈布斯堡王朝之后，从三十年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德国最重要的统治王朝”(卡斯腾，1969, p. 544)；但是希塞·波美拉尼亚(Hither Pomerania)却到了瑞典手里。

313 安德逊特别强调作为“东欧的铁锤”的瑞典的作用，它使普鲁士专制政权“作为对日益迫近的瑞典威胁的一种直接反应而建立起来”(1974a, pp. 198~199)。

314 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简洁地指出：“如果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在三十年战争后最终还要继续成为君主，那么他显然就需要一支军队。但同样明显的是，没有容克支持他，连一支小的武装队伍也不可能维持，在与容克对立的条件下就更不可能维持了”。(1975, p. 47)。

315 卡斯腾(1950, p. 188)。

316 卡斯腾(1954, p. 189)，他说，“从国内的迹象看，弗雷德里克·威廉似乎不可能在此时有任何使自己实行反对国会的专制统治的计划。更多的条件促使他走上了这条路，最重要的是外部事态对内部发展的影响。”

317 在卡斯腾(1954, pt. III)中，可以找到对这一段政治史的详细说明。

318 见多瓦尔特(Dorwart)(1953, p. 17)；布劳恩(1975, pp. 134~140)。奥托·欣策认为：“法国旧制度的行政机构的建立过程和普鲁士的委员会出现的过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省的]行政长官在旧法国的行政体制中占据的位置与‘战争和领地委员会’在旧普鲁士占据的位置一样”(1975b, p. 275)。

319 多恩(Dorn)(1932, p. 261)，“在整个王国内，每一类别的官员不超过 14 000 名。旧制度下的法国，民众常常抱怨行政官员过多，而在普鲁士官员则不够。普鲁士国王不可能用得起过多的官员”。多恩这里说的是 18 世纪已经

日益发展的官衙机构。不用说,在大选帝侯时代更是如此了。同样,巴勒克拉夫在谈到 18 世纪时,也认为:“对开支的节约和严格控制,以及导致这一结果的周密管理,是普鲁士行政管理的特征”(1962,p. 400)。

320 见范纳(Finer)(1975, p. 140)。关于征税,见拉切尔(Rachel)(1911, pp. 507~508);罗森堡(1958, pp. 49~50)和布劳恩(1975, pp. 271~273)。卡斯腾认为:城市消费税偏重,以致“成为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1954,p. 198)。

321 见范纳(1975, p. 139)。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1713—1740)把常备军增加到 8 万人(有一半是外国人),并且使它“在军事训练和组织纪律上在欧洲都无与伦比”[见巴克(E. Barker), 1966, p. 42]。

322 见克雷格(Craig)(1955, p. 16)和布劳恩(1975, p. 273)。

323 “17 世纪晚期惨淡的经济形势更加刺激地主阶级向霍亨索伦国土上日益发展的王侯靠拢”见安德逊(1974a, p. 243)。

324 “首先,由于军队纪律涣散,长途跋涉,由于掠夺、消耗和外国的入侵,使普鲁士[在北方斗争中]一败涂地(卡斯腾,1954, p. 208)。当然,勃兰登堡和克利夫斯在三十年战争中已遭惨败。

325 梅林提到了“在马尔克和波美拉尼亚不稳定的世袭财产”,并且指出:对于容克来说,“每个新公司就同新庄园一样有吸引力”,“即使不敲诈勒索”,每年也能为他们赚得几千塔勒(1975, p. 54)。

326 罗森堡(1958, p. 102)。梅林注意到大选帝侯建立的这支军队如何解决了三十年战争带来的四处漂泊的游民无产者的问题以及被称为“木马骑士”的破落贵族的问题。他们分别成为这支军队的士兵和军官(1975, pp. 48~49)。并见克雷格(1955, p. 11)。罗森堡指出:在弗雷德里克一世(1688—1733)时,由于胡格诺教徒和德意志平民得以加入军官行列,破落贵族通过军队得到晋升的途径遭到了破坏。但在士兵大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的统治之下重新得到恢复;他让这些“贵族的‘后备军’加入职业的服役贵族行列,使他们在社会上获得安全和尊贵的地位,从而逐步缓和了政局的动荡,消除了恐惧,使容克阶级绝大多数人能够容忍中央专制权力的增长”(1958, pp. 59~60)。

327 泰勒(A. J. P. Taylor)认为:效率和刻苦工作的品德“恰恰是容克拥有的品德,而 18 世纪的德意志市民却不具备这方面的品德”(1946, p. 29)。安德逊持有相似的观点:“17 世纪晚期和 18 世纪早期的普鲁士容克——一个小国中有实力的阶级,具有从事艰苦的乡村产业的传统”(1974a, p. 263)。而且庄园上的艰苦工作与军队的需要密切相关。“小麦贸易决定于迅速增长的消费

阶层、军队的需要、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和贸易的边际条件。弗雷德里克一世在那个富于想象的时刻，在小麦贸易政策、军队的补给、庄园经济和军事改革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特罗伊,1955,p.423)。

328 “特别是在那些需要补充人员的地区,在旧的地位稳固的军官与新崛起的‘委员’(Commissars)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从一开始,随着新建行政机构而崛起的一些人,就来自常设的国家机构官员们组成的动荡不安的队伍”(罗森堡,1958,p.56)。

329 见罗森堡(1958,p.79,p.83)。容克的这种经济状况使他们没有大量的钱用以购买官职。

330 封闭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不可能变成地主。特罗伊指出:“在波美拉尼亚、梅克伦堡、勃兰登堡、波希米亚、下萨克森和威斯特伐利亚许多当过军队中师、团包办人而致富的上校和将军,从负债的贵族那里购买了土地,成为地主阶级的成员”(1955,p.414)。

331 罗森堡指出:在福隆德运动之后的法国,穿袍贵族实际上被排斥在国家机器之外达两代人之久;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随着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胜利,一个全新的阶层兴起了;但在普鲁士,贵族对专制王权的反抗“没有爆发成为有组织的起义和血腥的内战。霍亨索伦王朝的三大掌权者从来没有把容克推得太远”(1958,p.44)。并参见卡斯腾(1954,p.273)关于与法国的比较。在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在安排上做了进一步的调整。他向平民敞开了进入文官队伍之门(在普鲁士国家雇用人员时创造了无以伦比的晋升机会。到20世纪20年代,普鲁士国家机关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据点),又使军队变成为“与贵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团体”(见罗森堡1958,p.67,p.70)。这两个集团互相牵制,但都会对国家表示满意。

332 卡夫克(Kavke)(1964,p.59)。

333 见卡夫克(1964,p.55,p.57)。无疑,贵族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恢复。赖特(Wright)认为贵族地位“从1627年的最低点开始,到1740年达到顶峰”(1966,p.25)。1740年后,出现了玛丽亚·特利莎(Maria Theresa)<sup>[1]</sup>和新的中央集权制。然而,人们不应夸大这一点。赖特本人告诉我们:“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在17和18世纪后半叶]的费用日益增长,因此对税收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紧迫,农奴的赋税负担也更加沉重。当农奴在赋税的重压下怨声载

[1] 玛丽亚·特利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君主(1740—1780),以实行“开明君主专制”著称。——译者

道时，国家又把他们作为给政府提供收入的生产者加以关照和保护，支持他们抵制那些有可能毁灭他们的领主”(1966, p. 21)。所以，1679年的波希米亚的农民起义带来了1680年的“徭役特许法”，把徭役限制到最多一周不得超过三天。波利森斯基把1680年看作是一个“分水岭”(1978, p. 200)。此外，1717年和1738年又颁布了两次“徭役特许法”。这种情况实际上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参见斯皮兹(1969, pp. 33~34); 冯·希普尔(Von Hippe)(1971, pp. 293~295); 斯利彻·范巴思(1977, p. 117)。

334 见卡恩(Kann)(1973, p. 9); 并参见巴克(1978)。

335 相反，到现代初期，勃兰登堡已从最初的多民族成分(见特罗伊, 1955, p. 355)转变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见卡斯腾(1941, p. 75和1947, p. 147)。

336 见巴克(1967)的详细阐述。

337 安德逊把匈牙利称作是“建立一个效忠皇室的军事大国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它拥有“类似土耳其的军事力量……这对于中央集权的奥地利的专制权力进入匈牙利是一个决定性的客观障碍”(1974a, pp. 314~315)。

338 贝林格(Bérenger)(1973, p. 657)。他的文章详细阐明了随后对国债的依赖。他认为，这些国债的确是他能够支配的，也正因为如此，皇帝利奥波德一世(1657—1705)的财政状况“并不像一般所推测的那样糟糕，也不像他本人所喜欢宣布的那样不佳”(p. 669)。但是对私人金融家的依赖所带来的长期后果并不利于加强国家机器。但应该注意的是，土耳其战争<sup>[1]</sup>对农村经济(从而对可能的税源)具有积极的影响，因为农村经济对于部队的补给是必不可少的。博格(Bog)(1971)相信土耳其战争是整个德意志在三十年战争后得以复兴的主要因素。三十年战争由于带来了战火的破坏，没有起到同样的作用。但是，土耳其战争的破坏不是也给农村经济带来影响了吗？见巴克(1967, pp. 282~284)。

339 万格尔曼(Wangemann)(1973, p. 12)。他把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君主作了比较，认为前者不如后者。他们控制的领土大体相等。但“更重要的是，[后者拥有]一致的民族成分、整块的国土、正规的赋税收入和有利于商业经营的设施”。奥地利的强迫劳役留下的唯一成果，只是那些或许会使我们赞叹的辉煌的巴洛克建筑。参见左尔勒(Zollner)(1970, pp. 279~280)。

---

[1] 指16—18世纪奥地利与土耳其为争夺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北部地区进行的战争，又称奥土战争。——译者

340 见万格尔曼(1973, p. 14)。

341 见特罗伊(1974, pp. 106~107)。重商主义从来就不完全是防御性的,关于这一点的证明,参见多尔瓦特(Dorwart)关于为什么在德意志对犹太人实行新的宽容的讨论。他认为:“德意志各诸侯几乎不顾一切地吸收犹太人去帮助他们恢复三十年战争所带来的残破不堪的商业”(1971, p. 212)。多尔瓦特对大选帝侯 1650 年决定允许犹太人从波兰回到勃兰登堡的描述,清楚地表明了犹太人的帮助是怎样得到认可的:“由于奥德河口掌握在瑞典人手中,要重新打开与波兰的直接贸易,犹太商人可能会发挥有益的作用”。(1971, p. 122)。克鲁格(Kruger)(1958, p. 65)认为,就法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而言,重商主义在法国是“自然的”,但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就不是这样。克鲁格的这一观点,是他批驳自施莫勒以来德国资产阶级史学家一直在宣传的、他称之为“社会领域”的“霍亨索伦神话”的一部分(1958, p. 13)。

342 见吕特格(1966, pp. 321~322); 博格(1961, pp. 134~135, p. 139); 克利马和马丘雷克(1960, p. 98)。

343 参见特雷梅尔(Tremel)(1961, p. 176); 克利玛(1965, p. 107); 左尔勒(1970, p. 283)。

344 参见冯·布劳恩(1959, pp. 611~614)和基希(1968, p. 4)。

345 见库里斯彻尔(Kulischer)(1931, p. 13)。

346 见范·克拉维伦(Van Klaveren)(1969b, pp. 149~150)。德约恩指出:“重商主义的计划随处可见,”但常常仅仅是一种冲动,纯粹形式上的决策,没有任何效果的谏言(1978a, p. 208)。

347 见克利玛(1965, p. 119); 库里斯彻尔认为,如果没有前一时代,即科尔伯主义时期的准备,法国、普鲁士、奥地利、莱茵兰和俄国的工业在 18 世纪中叶以后是否能迅速兴起,是值得怀疑的(1931, pp. 13~14)。

348 见哈辛格(Hassinger)(1942, pp. 36~37)。

349 见卡腾斯塔德勒(Kaltenstadler)(1969, pp. 489~498)和(1972)。这条入海通道促进了这一时期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羊毛工业的迅速发展。参见弗洛伊登贝格尔(Freudenberger)(1960b, pp. 389~393)。

350 斯托耶(J. W. Stoye)赞许地引用了雷迪奇(O. Reddich)论述 1700 年至 1740 年的奥地利一书的标题:“一个大国的兴起”见(1970a, p. 598)。

351 马卡特尼(1966, p. 397)。

352 萨缪尔森(1968, p. 69)。

353 布鲁福德(Brukford)(1966, p. 293)。“在普鲁士可以真正算作欧洲的一个独立国家之前,必须克服由于其各省地理配置上的缺陷、经济发展的滞后和劳动力的缺乏所带来的严重困难”。

354 泰勒(1946, p. 27)。他加了这样几句话:“没有工业区,没有重要城市,没有出海口,土地贫瘠低产,贵族贫穷而且愚昧,文化生活基本不存在。”

355 这个时期普鲁士在国家机构方面优越之处,伯伦斯(Behrens)和罗森堡阐述得十分清楚。伯伦斯说:“在1740年玛丽亚·特利莎继位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上没有中央行政机构,更说不上是一个民族了。中央机构只是在1748年后才开始出现,也仅出现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这些所谓的德意志世袭地区”(1977, p. 551)。普鲁士行政的统一也仅是在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在位时才实现,即比奥地利早30年(见伯伦斯,1977, p. 557)。然而,“在旧制度的基本发展方向上,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普鲁士与欧洲其他专制政体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其最突出的特征或许是如下这个事实:许多政治上的革新、行政上的改革和财政措施都被过于热忱的领导人推向极端”(罗森堡,1958, p. 23)。

356 巴勒克拉夫(1962, p. 386)。

357 勒斯琴斯基(Leszczynski)(1970, p. 104)。

358 特雷梅尔(1961, p. 177)。“西里西亚的亚麻在荷兰、英格兰、波兰和俄国找到了出口市场。荷兰商人需要它去供给西班牙、葡萄牙和立范特。西里西亚的面纱(Schleier,由亚麻或类似亚麻的棉花制成的轻的、透明的女用头罩)出口非洲、库拉索岛(Curacao)和印度尼西亚。西里西亚的羊毛在羊毛市场上占据支配地位”。西里西亚为什么是“宝石”的另一个原因,是其首府布雷斯劳(Breslau)的关键作用;它是通往东方的陆路运输要冲,在这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见沃兰斯基[Wolanski]1971, p. 126);并见赫罗齐(Hroch)(1971, p. 22)。

359 基希(1959, p. 544);利贝尔探讨了汉堡在18世纪怎样压倒荷兰人而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1965b, pp. 210~216)。

360 见克利马(1959, pp. 37~38)。

361 见奥宾(Aubin)(1942, p. 169)和克利马(1957, p. 92)。

362 赖特(1966, p. 20)。尽管有这种缓和,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仍爆发了几次农民起义;他们被军队镇压下去。参见基希(1959, p. 549);参见迈克尔科维奇(Michalkjewicz)(1958)和塔皮埃(1971, p. 121)。

363 安德逊(1974a, p. 317)。并参见冯·布劳恩(1959, pp. 614~616)关

于普鲁士获得西里西亚的重要性的讨论。

364 弗罗伊登贝格尔(1960b, p. 384)。

365 弗罗伊登贝格尔(1960a, p. 351)。

366 见库拉(1965, p. 221)。

367 见克雷文(Craven)对1660年的新英格兰的描述：“经济……基本上依靠农业……新英格兰的典型城镇是农业村庄……波士顿现在是一个大的拥有3000人的城镇，但从事维持基本生计的农业，对于所有其他活动来说也具有根本性意义，以致在城外田野里不时可以见到大臣”（见克雷文，1968, p. 18）。

368 参见克雷文(1968, pp. 68~103)。对“重建殖民地”的论述，其中包括1664年从荷兰人手中夺得的两个卡罗利纳和纽约。

369 贝林(Bailyn)(1955, pp. 112~113)。制度化是一个关键术语。克伦威尔也是重商主义者；但是“英国的殖民者试图利用内战作为争取承认某种独立的机会，而英国方面，只要不涉及到对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诚问题，共和政府就会容忍许多的要求……[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成全时刻……是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时期，而不是克伦威尔共和派统治的时期”。见里奇(1961, pp. 330~331)。

370 克雷文认为这些法案并未使殖民地“受到不利的影晌”(1968, p. 39)。内特尔认为，1685年和1700年间，新英格兰和纽约几乎“没有向英格兰出口”(1933, p. 326)。贝林指出：1673年的一条规定，要求对新英格兰商人加倍征税——无论是出港还是入港——而只对英格兰商人征收单一税，这条规定作为“整体上的区别对待”而受到保护(1955, p. 151)。卡门认为，到17世纪70年代晚期，新英格兰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是“不同于伦敦其他竞争集团的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1970, p. 37)。

371 内特尔(1952, p. 109)和(1931b, pp. 9~10)。

372 见比尔书中的讨论(1912, I, pp. 51~53)。

373 巴罗(Barrow)(1967, pp. 34~35)；并见贝林(1953, p. 386)和克雷文(1968, p. 246)。

374 洛德(1898, p. 105)。

375 斯利彻·范巴思竟然认为，在17世纪后半叶和18世纪的前半叶，“只有[欧洲]的大土地所有者才能生产出廉价的谷物并足以与宾夕法尼亚的谷物竞争”(1963a, p. 220)。

376 沃尔顿(Walton)(1968b, pp. 365~371)。原因在于经济方面。商人与其代理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大大减少了风险,这导致了航线的专门化。走三角航线的商船上的船员在港口付给报酬,而短距离往返的商船上的船员则不是(见沃尔顿,1968b, pp. 386~389)。奥斯特兰德(Ostrander)进一步研究并对这种解释的有效性提出了怀疑,因为商船事实上并没有做这种航行。他把这种概念归因于19世纪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见1973, p. 642)。

377 洛德(1898, pp. 124~125)。

378 巴罗(1967, p. 8)。内特尔认为这种分析忽视了英格兰从北美殖民地获得的“无形的利益”——硬币和金银的流入、海盗掠夺的果实、荣誉职务的“购买”,甚至为英国买主造船;但是这些无形的利益恰恰是因为不甚明显,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改变英国对北美殖民地价值的认识(见1933, pp. 344~347)。

379 尽管他们曾有意识地努力提高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价值,与他们扩大加勒比海殖民地的态度相比,英国人对北美殖民地无疑是一种忽视的态度。弗兰克(A. G. Frank)认为:由相对贫瘠、恶劣的土地和气候以及贫乏的矿产资源引起的英国的忽视,恰恰是这些殖民地的幸运,因为这使得这些殖民地得以沿着与热带和亚热带殖民地不同的方向发展(弗兰克,1978, p. 60)。巴罗从另一角度看待这种“有益的忽视政策”。他指出:至少在18世纪“要使[英属北美的]殖民者满意,就需要一种安抚,而不是高压政策。因此,在沃波尔和其继任者们那里,指导方针就是一切顺其自然。所以在殖民地管理方面,‘清静无为’(Quieta non movere)就成了沃波尔的政治格言”(1967, p. 116, p. 134)。

380 见内特尔(1931a, p. 233)。关于确定时间的问题,内特尔提到了比尔的观点:北美殖民地只是在1745年后才具有作为一个市场的价值。内特尔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到17世纪末北美殖民地的价值已非常突出(参见1931a, pp. 230~231)。卡门认为在1713年之后,“[英国人]认为所有殖民地的资源[包括北美殖民地的资源]在促进帝国的自给自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1970, p. 46)。布鲁奇(Bruchey)认为这种情况出现在“殖民地晚期”(1966, p. 8)。科尔曼给出了最早的时间。他说:“1650年后,英属北美殖民地在促进需求的净增长方面作出了最显著的贡献,因而恰恰是在欧洲内部贸易衰落并且竞争加剧时为英国工业品开辟了广阔市场”(1977, pp. 197~198)。

或许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始于17世纪90年代的)一种计划,(到18世纪



中叶)逐渐变为现实,法尼(Farnie)为整个美洲殖民地定的时间表明,作为英国商品的市场,殖民地(的进口量)由1701—1705年的10%,增加到1766—1770年的23%,作为向英格兰输出商品的发源地(输出量)从19%增加到34%。大陆殖民地(但包括了南北美)的作用在1726—1730年第一次超过了西印度群岛的作用。法尼认为:英国对外贸易的“美洲化”——他从施洛特(Schlote)那里借用了这个术语——导致了“最终的过份依赖”,这也是18世纪后半叶英国陷入经济困境的原因(1962, p. 214)。对此我深表怀疑——实际上就像重商主义概念被推向极端一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关键问题是:英格兰不能阻止北美殖民地成为半边缘地区,在这方面,英格兰为它自己制造了一些日后的困难。但即使问题不出在这里,也会出在别处。

381 见内特尔(1933, p. 322)。

382 见汉森(M. L. Hansen)(1945, pp. 48~50)。

383 见麦克拉克伦(1940, p. 4)。

384 阿斯特罗姆(1962, p. 15)。

385 阿斯特罗姆(1962, p. 20)。1699—1700年,在向英国输出的包括来自北欧的全部产品——大麻、亚麻、沥青、焦油、铁、钾碱——中,48%主要产自瑞典,26.4%来自俄国,24.1%来自东欧国家;仅1.5%来自丹麦——挪威。然而,俄国的商品要经过掌握在瑞典手中的纳尔瓦,东欧国家的商品要经过也掌握在瑞典手中的里加(见阿斯特罗姆,1962, p. 99)。

386 抵制有三个方面。北美殖民地的商人是反对势力;海军,它主要关心的是要获得价廉物美的海军补给品,也是反对势力;英国舆论也转而对垄断表示怀疑。见洛德(1898, pp. 38~39)。

387 见洛德(1898, p. 56)和内特尔(1931a, p. 247)。

388 见内特尔(1931a, pp. 255~264)。里斯(Rees)提供了一条证据,表明摆脱对瑞典的依赖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他认为,尽管英国制铁商人长期反对北美的熟铁和金属器具制品,但是当1717年由于与瑞典关系的紧张引起铁价暴涨时,“人们就提议寻找新的供应来源,其途径是把条形铁和生铁列入海军补给品项目,鼓励在殖民地生产这些产品”(1929, p. 586)。然而,这个法案并未实施,因为瑞典的查尔斯十二世去世,英国与瑞典的关系随之而得到改善。

389 内特尔认为,他们并没有生产“最急需的商品”(1931a, p. 269; 并见1952, p. 112)。然而,阿斯特罗姆认为瑞典对焦油和沥青的垄断大约在1728年

结束,并认为其原因是北美殖民地产量的增长。(1962,p. 117;1973,p. 101)。

390 见洛德(1898, pp. 101~123)对殖民者逃避各种限制性法律的顽强能力所作的论述。

391 哈珀(1939a,p. 9)。

392 见戴维斯(1974,p. 193)。

393 见沃尔顿(1967和1968a)对于导致较高生产率的各种因素的讨论。

394 见迪克森(Dickerson)(1951,p. 32)。

395 参见布鲁奇(1966,p. 9)和奥斯特兰德(1956,pp. 77~79)。糖浆法带来了最有力的保护。“糖浆和甜酒是殖民地经济中的关键因素”(哈珀,1942,p. 11)。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似乎是要帮助西印度的生产者。

396 见迪克森(1951, pp. 46~47),他认为充其量不过对制帽工业产生了一些影响。见奥斯特兰德(1956,p. 77)对糖浆法的论述。

397 见哈珀(1942,pp. 6~8)。

398 见布鲁奇(1965,p. 69)。

## 第六章 中心区的斗争

——第二阶段：1689—1763

如果我们不把各种社会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联系起来，就无法对社会现象加以分析。我们把空间界限的概念作为本书分析的中轴；但是，又怎样看待时间和使历史写作者们产生严重分歧而又长期争论不休的分期问题呢？我们已指出：本卷所包含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时间单位的范围大约是从1600年到1750年。可以说，这是这样一个时期：在该时期内，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从整个体系来看，其生产总量经历了长期的相对停滞（停滞相应地表现在全面的人口增长、物质扩张和贸易周转速度的相对停顿，还表现为全球性的物价低落）。为了证明这一论断，我们已经在全书中提供了我们所有的这方面证据。<sup>1</sup> 在分析中，我们把对相互竞争的中心区国家的探讨分成两个阶段：1651—1689年和1689—1763年。这一分期并不完全与上面所提到的1600—1750年这一阶段相吻合。遗憾的是，现实世界并不是由清晰可辨而且适用于各种用途的分界线组成的。1651—1689年和1689—1763年这两个时间分期，反映了变化中的世界经济形势，同时还强调了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政治后果。

在第一阶段（1651—1689年），正如我们已讨论的那样，荷兰人的霸权受到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有力挑战，他们到1672年渐渐地觉察到，荷兰人已不再是一个以往那样毋庸置疑的巨人。我认为，到1689年，甚至连荷兰人也承认这一点。所以，威廉和玛丽继承英

国王位<sup>[1]</sup>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转折点。<sup>2</sup>由此也就择定了1689—1763年这样一个时期，因为它确定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英法争霸的时间范围。人们可以把1763年<sup>[2]</sup>看作是英国在所谓的“第二次百年战争”<sup>[3]</sup>之后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虽然法国人直到1815年才承认失败。<sup>3</sup>在1689年，英国在同法国人进行的斗争中能否取得胜利，还是一个未知数。法国有4倍于英国的人口和更为强大的军队，它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良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而且，其工业生产在持续增长。而“在英国，内战后的增长速度减缓了。”<sup>4</sup>所以就像查尔斯·威尔逊认为的那样：“从1689年开始[英国]面临着一个远比以前的西班牙或荷兰更为可怕的强敌[法国]。”<sup>5</sup>此论不无道理。争夺围绕着欧洲的土地、同盟、市场和边缘地区、外部地区(美洲、西非和印度)的供给品(奴隶、热带和亚热带产品如蔗糖以及皮毛、海军补给品)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几乎是无休止的战争。<sup>6</sup>

1689年奥兰治的威廉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的国王，即威廉三世。<sup>7</sup>始于1688年11月的法荷之战因此也就成了法英之战。<sup>8</sup>这在英国标志着“具有克伦威尔意图的对外政策”的再版。<sup>9</sup>这一点只是因为光荣革命的政治和解而成为可能，这种和解在沃波尔和辉格党时代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与法国的对抗中，英国军队所需开支超过了他们以往所得到的份额。这就需要国会的支持，而最终是以国会同意发行抵押公债的形式得到实现。1689年

---

[1] 指威廉·奥伦治(William Orange)，原为尼德兰执政，娶英国詹姆斯二世之女玛丽为妻。1688年“光荣革命”后被迎为英王，称威廉三世(1689—1702)；玛丽同时被尊为英女王，称玛丽二世。——译者

[2] 法国在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屡战失利，被迫于1763年与英国签订《巴黎和约》，承认英国在战争中夺取的殖民地。“七年战争”是英法之间近百年之久的争夺的最后一场战争。——译者

[3] “英法百年战争”是指1337—1453年间英法为争夺佛兰德尔和英国在法国境内的领地的战争，以法国胜利而告终。所谓“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是指1689—1763年间英法为争夺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和殖民地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译者

的政治和解结束了王权与国会的对抗关系，使必要的合作成为可能。英国在 1689 年还存在着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直贯穿在整个 18 世纪，那就是英国的军事战略重点应该在陆上还是在海上的问题。这是海上派(the Maritime School)与大陆派或陆军派(the Continental or Military School)两个思想派别之间的一场争论。在战略分析中，双方各执己见：一方认为，战争中依靠陆军力量进入大陆对英国有利(因为这样做可以支持同盟国)；另一方则认为进入大陆对英国不利(因为他们的陆军太弱，难以战胜法国陆军。相反，英国海军却比法国海军有明显的优势)。

在战略争论的背后，隐藏着经济上的分歧。由于海上派把战争基本上看成是争夺新市场和排除竞争对手的斗争，他们主张战争必须是在海上及边缘地带进行。他们认为陆战将会导致税收过高从而间接地损害贸易。大陆派则认为：除非英国人致力于欧洲的陆战，否则法国人将会把其他欧洲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就会把英国排除在大陆关税体系之外。<sup>10</sup>经济问题上的争论还反映到社会政治上的争论中。辉格党人是那些促成了光荣革命的人的后嗣，而他们的信条之一是“不要常备军”。但是到 1694 年辉格党就已经停止了对这个口号的鼓吹，并且实际上成为急剧扩军的主要倡导者(到 1711 年军队人数从 1689 年的 1 万至少增加到 7 万)。<sup>11</sup>正如 J·H 普拉姆指出的：“一个多么令人奇怪的辉格党原则……从(1694 年)起，对于立宪原则，辉格党人变得非常保守……他们想要掌握政府机器并驾驭它……他们觉得，如果能够得到国王的充分支持，他们就可以造就一个既服务于国家利益又为他们自己谋利的政府。”<sup>12</sup>

虽然辉格党议会并没有明确地授权，但至少是逐渐对一些问題予以宽容。英法战争期间，陆军和海军通过简单的途径开始摆脱议会的控制。陆军扣留军饷并挪用这笔款项，给议会带来不得不在事后予以解决的赤字；海军则抬高用以支付货物、杂役和粮食的债务款，也给议会造成“既成事实”。罗斯维尔(Roseveare)略带

讥讽地谈到了这种体制，“议会竟然容忍这些作法，这一点似乎令人莫名其妙，但它的确这样做了。”<sup>13</sup> 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这种体制很早就被接受。1689年以后，辉格党代表了大地主、日益发展的官僚及商人阶层的联合力量，它主要对抗由那些反对纳税、反对常备军、反对“腐败”政府的小乡绅组成的“乡村党”（country party）。为了扩编军队，一批委任状被出售，而有钱买这些委任状的主要是辉格党家族中的幼子。所以这支军队“正是由控制议会的辉格党同一家族的分支充任军官，并由他们掌握指挥权。”<sup>14</sup>

不过关键之处还不在于英国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而在于在这场对英国的“全民族构成严峻考验”<sup>15</sup>的九年战争中，陆海军都发生了质的变化。<sup>16</sup> 当然，海军的变化比陆军更大，因为欧洲的政治家们现在都认为，海洋不同于陆地：在陆地有可能保持力量均势，而“海洋则是一个整体”。<sup>17</sup> 如我们很快就要发现的那样，海洋日趋成为英国的海洋。然而，在1689年，法国的海军还可以同英国或荷兰的海军抗衡，并且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着。在此20年前，柯尔柏<sup>(1)</sup>“真正从零开始”把它建立起来。<sup>18</sup> 他在大西洋（主要基地在布列斯特）和地中海（主要基地在土伦）建立了一系列海军基地，并且把海军分为两个编队，分别驻防这两个区域。<sup>19</sup> 而且这个时期法国在海军技术上也优于英国或荷兰的海军。船上装有巨大的重炮，但它们对船所造成的压力较轻，而且移动起来快捷、灵活。法国人发明了一种新式的先进船只，即能发射炸弹的双桅船，这是一种便于轰击海滨城市和城堡的小型战船（这种船曾帮助路易十四在1682年顺利地进攻阿尔及尔）。

虽然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海军受到轻视，荷兰海军也日渐落后，<sup>20</sup>但在1694年巴夫勒尔的决定性战斗中，法军发现自己

---

[1] 柯尔柏(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呢绒制造商出身。1649年任国务参事, 1665年开始任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 推行重商主义, 又称柯尔柏主义, 主要是保护关税, 增加出口, 减少进口, 建立垄断贸易的特权公司, 建立海军舰队和国外商行, 加紧对北美的殖民扩张等。——译者

在战船数量和枪炮数量上都处于劣势（战船：法军 44 只，英荷 99 只；枪炮：3240 对 6756），<sup>21</sup>机动性也欠缺。<sup>22</sup>海军上将马汉尖刻地写道，法国海军“犹如烈火上的一片叶子，迅速地卷缩了。”<sup>23</sup>这次战役不仅对这场战争，而且对下一个世纪的战争都是一个转折点。“经过这次大战，制海权一下子就转到了同盟国一边，特别是转到了英国手里”<sup>24</sup>——人们会对此感到迷惑。西姆克斯(Symcox)认为：1693 年的农业危机和法国对外贸易的衰落导致法国政府的财政危机，这使法国不可能“与同盟国保持某种近于平等的地位。”<sup>25</sup>一部分战船不得不搁置起来，以便省出钱用于陆军。这里表现了英国人在海上派与大陆派之间的争论中纠缠难解的同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经济处于全面停滞的时期，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不可能所有的战线同时担负起军事战备费用，而必须做出选择。所以自然而然地英国人就以海军为发展重点，而法国人则注重陆军。

由于法国国土辽阔，国内政治和经济上相对缺乏团结，它似乎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sup>26</sup>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制海权始终是“用于积累财富的贸易链环中的关键一环。”<sup>27</sup>无论如何解释法国海军的这次惨败，它从此把法国的海军战略由“舰队战”转变为“劫掠战”。现在法军不再以击毁敌人战船和赢得制海权为主要目标，而是捕获和屠戮敌国的商人并破坏敌国的贸易，无论是海军战船还是私掠船只均以此为目的。这种战略在 1694 年之前就已开始推行，但现在成了主要的作战方式。<sup>28</sup>G.N 克拉克说，“破坏贸易是海战中弱方使用的惯常手段。”<sup>29</sup>它的确是一种惯常手段，但毕竟是下策，因为它难以协调由私人实业家所控制的战船的活动。西姆克斯认为，法国的全部努力“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并且指出了这种策略所隐含的矛盾。“如果政府不能提供费用，它就无法去发号施令”，<sup>30</sup>而且英法两国都能玩这种把戏。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吉利海峡诸岛的私掠船干得十分出色，以致“引起法国人极大的惊慌，并且关键是可以给法国港口之间的贸

易造成严重的损害。<sup>31</sup>

1697年的《赖斯韦克条约》结束了九年战争，但这个条约仅意味着短暂的间歇。这一条约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标志着自黎塞留<sup>[1]</sup>以来“法国的第一次退却”。<sup>32</sup>法国被迫承认威廉三世为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的国王，并承认安妮为他的女继承人。获得这一承认本是威廉三世的主要战争目的。而且，法国又把《奈美根条约》以来得到的所有地盘都还给了英国（除去斯特拉斯堡和阿尔萨斯的“留尼旺岛”）。这样法国让出了其四周所有的地盘——佛兰德斯、卢森堡、洛林、莱茵兰、皮内罗洛和加泰罗尼亚这些地区的部分或全部。<sup>33</sup>在海外较小的调整中，法国把奥尔巴尼堡归还哈得逊海湾公司，而重新获得本地治里（Pondichery）和新斯科舍（Nova Scotia）——恢复战前的原状。荷兰人也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法国人签订了有利的商约，恢复了1664年的法国关税，法国人接受了所谓的荷兰壁垒（Nether lands Barrier）。

联省共和国与法国之间建立军事屏障的想法有一段漫长的历史。它最早始于1635年，其想法是：（西属）南尼德兰应成为一个Scheidings zone或者是缓冲区。然而，1678年签订的《奈梅京条约》把南尼德兰的16处要塞让与法国，只允许荷兰的一些小分遣队驻守邻近地区。到1684年法国人已占据卢森堡，使荷兰人在《停战协议》中被迫承认了这种状况。由于九年战争，上述所有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在《赖斯韦克条约》中，建立军事屏障的思想有了新的明确的形式，荷兰人有权在法国人归还的一系列要塞中驻军。<sup>34</sup>九年战争使欧洲势力的重新组合得以确定。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后，各国之间的权力斗争实质上是联省共和国、英国、法国之间三方面的斗争。但由于各种事态变化，并且荷兰人日渐成为英国人貌合神离的永久同盟（虽然实际上它是一个实力较弱的伙伴），此时三方的斗争已减为两方之间的斗争。

---

[1] 黎塞留(Richelieu, 1585—1642),曾任主教和红衣主教等高级教职。1624—1642年间任法王路易十三的首相。——译者



J.R. 琼斯认为，荷兰人在 1689 年 5 月就已“失去了大国地位”，<sup>35</sup>那时威廉三世已促使荷兰海军臣属于英国。荷兰人对自己沦为这个新角色并非无痛切之感——荷英同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同盟。”<sup>36</sup>一方面，他们不希望他们同英国的结盟破坏他们同法国的贸易关系，特别是他们有利可图的波罗的海贸易“依赖于法国商品的不断供给”。<sup>37</sup>荷兰人在整个世纪始终认为：不应干预中立国（就像他们自己经常充当的那样）的海上贸易。他们的口号是“商船自由，商品自由”，而英国人主张有权搜查中立国船只，法国人甚至认为应有权没收为敌人运送物品的中立国船只。<sup>38</sup>荷兰人并不希望最后诉诸战争。1702 年，当战争开始发展成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正是荷兰人不断敦促英国人谋求和平，但以荷兰人能够保持尼德兰屏障为条件。<sup>39</sup>最后，英国人愿意支持荷兰人取得这个屏障，虽然对英国人来说这意味着商业上的危险，但英国人要以此作为对荷兰保证其新教王后的王位继承权不受威胁的必要的报偿，而王位继承问题乃是英格兰（和苏格兰）政治中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sup>40</sup>

正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关系到了紧要关头，而且得到了解决。由于 1688 年的协议，法国实际上失去了干预英格兰内政的能力，而且由于 1707 年所谓的议会合并<sup>41</sup>（Union of Parliaments），法国同样失去了干预苏格兰内政的能力。1707 年的政治谈判和最终调解的策略是复杂的，<sup>42</sup>但实质问题是世界经济体内中心国的竞争如何给苏格兰造成了压力，并促成了议会的合并。对于苏格兰来说（同其它边缘地区一样），17 世纪的后半叶始终是一个漫长的“不断出现危机和衰落的经济停滞”<sup>43</sup>时期。苏格兰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英格兰，但英格兰的主要贸易对象却不一定是苏格兰，并且随着经济停滞的继续，苏格兰日益在更大程度上依赖英格兰。“同其他民族一样，苏格兰人进行了贸易抵制。1681 年，国王在苏格兰的代表约克公爵召集各方商人与他和他在枢密院设立的贸易委员会一同商讨苏格兰（同英格兰、挪威、法国和波

罗的海地区)对外贸易的方式,国内贸易、海运以及苏格兰希望建立一个加勒比海殖民地等问题。苏格兰议会当时制定了各种保护措施。此后不久建立了新米尔斯纺织厂,使议会在同一年通过了“促进贸易法案”。这一法令的保护使得公司兴盛起来——一直持续到《合并条约》的签订。<sup>45</sup>

1695年,议会通过建立“非洲和西印度贸易公司”的法案,苏格兰公司由此得以建立。这个公司体现了三种利益的结合:努力参与非洲贸易的爱丁堡商人;希望在新建的加勒比海殖民地中找到推销亚麻的市场的格拉斯哥商人;渴望遏制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权的一些伦敦商人。<sup>46</sup>这个后来以达连公司(Darien Company)闻名的新公司的建立,可能与导致1707年合并的压力增强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很明显的是“独立的苏格兰威胁着整个(英格兰的贸易)系统。”<sup>47</sup>雅各宾派要求觊觎王位的詹姆斯二世之子登上王位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sup>48</sup>而且,处于危险之中的不仅仅是苏格兰,还有爱尔兰。<sup>49</sup>所以促成合并对英格兰有长期利益。

苏格兰方面,虽然想法截然不同,但达连计划最终表明是一场闹剧。苏格兰公司试图在达连地峡(位于今天的巴拿马)建立一个世界贸易中心。它不仅仅是非法经营者的避风港。这个公司还打算开辟陆路商道[由以后称之为喀里多尼亚(Caledonia)的殖民地来控制],以取代经由好望角的商道(这预示着巴拿马运河的作用)。由于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的商人都不投入必要的资本,使得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遭到失败,并且1698—1700年的许多探险活动都失败了。<sup>50</sup>伦曼(Leriman)认为,苏格兰人的目标过高了:

苏格兰没有力量维持一个垄断贸易的帝国或殖民地以对抗那些掠夺成性、大都强大得多的欧洲国家。对苏格兰来讲,殖民地方面唯一值得争取的目标是其他国家的殖民者。同他们开展贸易是可行的,并且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致能掩盖苏格兰由于法律上的非法而带来的危险(例如,西班牙拥

有对达连地峡的合法权利)。17世纪晚期格拉斯哥的繁荣部分是因为同英帝国进行大量的非法贸易。浪费在达连的那一部分资本,如果用于同半独立的美洲殖民地进行走私就会带来巨大的利益。<sup>51</sup>

我们再次看到,在经济停滞时期,重商主义是一个只有非常强大的国家才能成功运用的武器。

正如赖利(Riley)认为的那样,或许1707年的合并确实应“直接归因于英国而非苏格兰的政治”。<sup>52</sup>但是如果没有苏格兰人的默许,英格兰也不能实现其目的。那么这种默许又来自何处呢?是圣公会的大部分苏格兰贵族、是那些参加光荣革命并属于反雅各宾派的人、是那些在英格兰占有土地从而受到1705年英格兰侨民法威胁的人,是这些人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苏格兰另一个甚至更有势力的集团是自治城市的商人。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领导了一场由英格兰政府谋划的宣传运动,劝使这些自治市的商人相信,英格兰过去是并且应该继续成为苏格兰出口的主要市场,而走向繁荣的阳关大道就是向英格兰出口苏格兰的牛和亚麻(以及还可能包括谷物、羊毛和盐),因为那样就能保持同英格兰有利的贸易平衡。1704年,苏格兰议会通过了安全法,规定在安妮女王死后自动终止统一的君主政体;为了报复,英格兰议会通过了侨民法,规定:如果苏格兰不撤销其法案,向英格兰的所有出口将被拒之门外。<sup>53</sup>不过历史从未考验过英格兰在这方面的决心。<sup>54</sup>

正如能够预想到的那样,自治城市之间也互有矛盾。一些城市的贸易利益主要依赖同英格兰的贸易,而另一些城市则在英格兰之外以及它的殖民地进行大量的贸易;当然,行会受到了英格兰竞争的威胁。斯莫特(Smout)提请我们注意,越来越多的地主,尤其是贵族,事实上是从事出口贸易的“商人”。如我们常常看到的那样,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比我们通常想像的更加模糊。此时的苏格兰就是如此。“在大部分贵族看来,扩展同英格兰的贸

易是有重要意义的；而且举行选举时，他们当中的 70% 都赞成合并。这两种情况的巧合非常明显，所以不容忽视。”<sup>55</sup>那么，合并法中究竟有什么样的经济条款呢？又是谁人得到了好处呢？这个法案含有对苏格兰有利的两条经济条款。首先，英格兰议会可按照成本加利息购买苏格兰公司的股票，以利于该公司的解散。这显然有利于促进以前为达连计划投资而蒙受损失的地区，特别是爱丁堡地区的经济复兴。

第二，所谓的种植园贸易第一次从法律上向苏格兰开放。它特别使格拉斯哥和苏格兰西部克莱德（Clyde）地区的商人获利。此外，或许是作为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的一个自然的结果，议会在 1727 年建立了一个水产业和制造业的托管委员会，它促进了苏格兰亚麻工业的发展。<sup>56</sup>这一切是苏格兰的苦酒还是它的机遇呢？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但无论如何合并已成为事实，而且大不列颠这个新国家接着就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场战争显然是围绕谁将统治西班牙而展开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西班牙帝国今后的贸易怎样发展。1701 年，西班牙国王把西属美洲奴隶贸易的垄断权——即阿先托权利移交给了法国几内亚公司。法国一些著名的资本家和法、西两国的国王都拥有这个公司的股份。以前阿先托是由一家葡萄牙公司掌握。正是这一关键事实，激怒了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使战端再起。<sup>57</sup>

《乌特勒支和约》把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给了波旁王朝，而将阿森托送到了英国人手里。<sup>58</sup>南海公司获得了 30 年内每年向西属美洲出卖 4800 个奴隶的贸易权。而且，这个公司每年可以派一只船运载 500 吨货物到西属美洲出售。至于荷兰人，奥地利皇帝或许算是得到了西属尼德兰，但是荷兰人更获得了他们的屏障。根据和约，荷兰军队将在由法国归还给奥地利皇室的所有地区——那慕尔（Namur）、图尔奈、梅宁、弗尼斯、瓦尔纳通、伊普尔、克诺基（Knoque）和多特蒙德驻军（这些驻军所需费用的 60% 由奥地利人承担）。这种协定不仅使荷兰人有了安全感，而且“起到了掩护荷

兰人渗入南尼德兰市场的作用。”<sup>59</sup>这样，每个海上强国都已从西班牙这块馅饼中分得他们的一份。他们还将会继续获利。在随后相对和平的 25 年中，凯旋的英国人不能确保和平将继续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正像普拉姆指出的那样：

1713—1739 年是一段和平时期。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种不断降调的和平。这种和平使英国蒙受法国的欺骗；法国在友谊的幌子下日益加紧重建其海上和工业力量，为两国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作准备。大部分商界舆论在为战争叫器。<sup>60</sup>

战争真的开始了。这是在与法国结盟的普鲁士和最终与英国、尼德兰结盟的奥地利之间进行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8 年《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Treaty of Aix-La-Chapelle) 的签订使这场战争宣告结束。当时“双方的和解近似于回到战前状态”<sup>61</sup>但是这场没有结果的战争非常有利于英国的商业利益。坦伯利(Temperley)甚至说，这是“英国人第一次使商业利益在战争中占绝对优势的战争，而且战争仅仅是被用来平衡贸易而不是平衡势力。”<sup>62</sup>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尽管英国人与荷兰人结盟，但他们就南尼德兰(现属奥地利)问题一直在争吵不休。奥地利既要为“尼德兰屏障”支付费用，而又不允许它在屏障地区以及在英国、尼德兰发展自己的贸易；它为此而怨恨在心。英国确实曾威胁说要排除这个障碍，进而允许西里西亚(仍属奥地利)的亚麻取道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出售。还有，佛莱芒商人在与荷兰商人竞争中，也为受到政治束缚而不满。<sup>63</sup>

至于西班牙，它也对英国在其殖民地过分地从事违法贸易不满——这就是“西班牙激烈反对英国商船的真正秘密”，“而英国政府也担心一个有能量的西班牙和法国的波旁王族联盟的复活。”<sup>64</sup>另一方面，南海公司却极力维护它自身的狭隘利益，并且作为英国一个活跃的压力集团进行活动。<sup>65</sup>南海公司也不是侵略政

策的唯一受惠者。英属西印度的蔗糖种植园主发现：这场战争使17世纪30年代严重的蔗糖萧条状况得以结束。<sup>67</sup>并且英国的海上保险公司也曾“保证法国商船在海上不被英国海军所截获。”<sup>68</sup>的确，商业利益对于英国政府的政策来说太关键了，以致在整个战争期间实行了护航制度，而且护送船只的“护航安全是被考虑的首要因素”<sup>69</sup>。在陆地上，法国和普鲁士军队在人数上超过了英国和奥地利，<sup>70</sup>而英国海军则是法国海军的两倍。西班牙海军与法国海军合在一起，同英国海军的规模相差不多，但如果把荷兰的战船与英国战船加在一起，后者就在数量上稍占优势；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统一的指挥。尽管1713年以来法国一直在重建海上势力，但经过这场战争，英国的制海权重新得以确立。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损失了一半的战船和1000多艘商船。“法国海上势力的基础已经被摧毁。”<sup>71</sup>

和平仍旧只是短暂的间歇。1754年在美洲，1756年在欧洲，战争又一次爆发。英法在美洲的贸易冲突，虽然“几乎不易察觉，但却肯定无疑地”<sup>72</sup>在继续发展，最后发展成为一场战争，即七年战争。荷兰人试图保持中立，但英国人强迫他们限制同法国的贸易。<sup>73</sup>西班牙人被劝诱与法国结盟以达到最终剥夺英国人特权的目的是。<sup>74</sup>但它并没有给法国带来什么好处。1763年的《巴黎条约》标志着英国在同法国一百年的斗争中取得了最终的优势。“在欧洲，等待法国的是类似于西班牙的一个漫长的衰落时期。”<sup>75</sup>英国赢得了这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斗争，从而在17世纪中叶最终继承了荷兰的霸权。生长在英国并得到英国政府帮助的世界资产阶级的这个特定部分，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能够在政治上帮助英国企业家建立和扩展其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使之超过植根于法国的竞争势力。只有作这样的分析，才能对此有充分的理解。

让我们首先从人口变化的角度开始考察。这个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不仅涉及到人口变化的原因，而且也涉及到被用来作

出解释的数据。一些人认为：1600—1750年英格兰的人口增长速度较慢，<sup>76</sup>有些人甚至认为“实际上是处于停滞状态”；<sup>77</sup>而另外一些人反驳说：在那个时期（1600—1750年）人口增长了50%。<sup>78</sup>对于法国，人们似乎一致认为，1500—1750年人口基本保持稳定，<sup>79</sup>人口数量超过英格兰的三倍，是整个大不列颠的两倍多。一些人发现法国在1700年人口增长处于一个较低点，在1700和1750年之间稍有提高。<sup>80</sup>一些人认为在这一期间的所有年份里，英格兰的人口数“异常地低”。<sup>81</sup>相比之下，人们所估计的法国在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显得更加惊人，因为法国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在1693—1694年遭受了一次非常严重的饥荒，<sup>82</sup>而英格兰例外，并且法国在1709—1710年<sup>83</sup>又经历了一次饥荒。还有1720年马赛地区遭受到欧洲最后一次大的瘟疫。<sup>84</sup>然而，到1740年，英格兰和法国以及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人口数量开始扶摇直上。<sup>85</sup>

赫夫顿（Hufton）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变量是全面的食物供给。“一般地说，忍饥挨饿的人口不可能进行自身的再生产，而营养欠缺的人口做到这一点却不困难。”<sup>86</sup>那么食物供给的全面增长从何而来呢？这不是气候变化的结果，或至少说不只是由于这种原因。因为从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整个这一时期被称为小冰期，<sup>87</sup>在1750年左右（气候条件）不可能有任何大的改善。更为可能的是，英格兰和法国（北部和东南部）农业生产制度的发展是食物供给全面增长的主要因素。一些人高度称赞马铃薯的种植，他们认为，18世纪人口的增长“随着（马铃薯）的扩种和消费”<sup>88</sup>而发生变化。其他一些人则把马铃薯仅看作是食物普遍改善中的一个因素。茶取代了酒类。大米和糖的消费增加了，特别是糖的消费的增加，表现在水果、果酱和甜点的食用上，从而有助于人们的饮食多样化，特别是在冬季。<sup>89</sup>我们已经描述了农业发展的社会背景，那就是通过压榨穷困的生产者而使农田日益集中。<sup>90</sup>圈地是在1750年以前很早就已开始实行的一种重要方法，<sup>91</sup>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够实行，一方面是通过立法，另一方面则是由土地所有者的

效率和利益决定的。<sup>92</sup>较大的土地所有者能够对效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的改善，这主要是因为使用铁制工具取代木制工具。<sup>93</sup>其次，人们发现轮作性的草地和饲料地对牲畜所有者非常有用，这些人也逐步发展成为大农场主。<sup>94</sup>

然而，长期以来谷物价格的低廉对于土地不断走向集中化的趋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sup>95</sup>从1600年至1750年整个这一时期，几乎没有粮食丰收年。<sup>96</sup>已经有人提出：粮食低价这种不幸对于英格兰来说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导致了农业的变革。<sup>97</sup>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当谷物价格在全欧洲持续低落时唯独或者说主要在英格兰却出现了农业的革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18世纪上半叶粮价最低时英国成为欧洲主要的谷物出口国。对于这一点，最明显的解释是：英国政府为鼓励粮食出口而在1688年颁布的《谷物补贴法》(Corn Bounty Act)<sup>98</sup>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普遍有利”<sup>99</sup>的条件。毫无疑问，这种补贴的实施使英格兰的谷物产量得以增长，并且由于使国内市场有更多的谷物出售，而不是出现相反的情况，它的实施也的确造成了国内谷物价格的进一步下跌。<sup>100</sup>这样做显而易见是要帮助英国的农业资本家增加他们的边际收益。

为英国不断增加的谷物供应所提供的市场在哪里？出路在于制造杜松子酒和酿酒，这些产品的市场则是由城市中的劳动大军提供，(因为)在漫长的经济停滞时期，他们的实际工资有明显提高。<sup>101</sup>例如吉尔博(Gilboy)指出：伦敦工人增加的实际工资几乎可以说全都消耗在“杜松子酒的泛滥”之中。<sup>102</sup>在尼德兰也是如此，为了满足荷兰制酒商的需要，对英国增加的谷物进口中尤以麦芽和大麦为主。<sup>103</sup>英国的各种鼓励使英国对荷兰的出口量不断扩大，<sup>104</sup>并且由于从1700—1720年尼德兰谷物价格的上涨，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了英国的生产。<sup>105</sup>英国人得以把波罗的海的生产者排挤出荷兰市场，<sup>106</sup>因为他们可以低价出售其商品。这不仅因为英国的运费较低，而且政府的资助金已占到出口谷物实际价值的16.5%。<sup>107</sup>1768年问世的



有关政府资助方面的一本伦敦小册子对此作了如下解释：“我们毅然去和被荷兰人雇为农夫的波兰人竞争……同时我们也让我们的爱尔兰兄弟去同为荷兰人养牛的丹麦人竞争。”<sup>108</sup>这种资助普遍奏效，并且在英国农业生产的所有地区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在这一高出口时期整个英国的小麦价格日趋统一表现出来。<sup>109</sup>

英国政府之所以竭力为本国的企业家占领荷兰粮食市场，是因为（在获利机会受到限制的时期）要以此作为其他获利机会的一种补充，同时又作为通过连锁作用来获得利益的一种途径。例如，作为已取代了波罗的海生产者的结果，英国人在贩运粮食的贸易中取代了荷兰人。<sup>110</sup>当然其他国家也力图做到这一点。的确，在1650—1700年这半个世纪中，南尼德兰和法国都扩大了对荷兰人的出口。荷兰人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生产；<sup>111</sup>但是英国政府通过提供资助，廉价出售商品，使这些生产者在1700年至1750年中失去了市场。<sup>112</sup>这样，英国凭借投资于世界粮食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而求其次），而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且在1700年至1750年间促进了整个欧洲把毛荒之地开辟为耕地。<sup>113</sup>然而，由于整个世界经济仍然脆弱，以上情况就迅速导致了谷物的生产过剩和1730年到1750年间的农业再一次衰落。<sup>114</sup>在1750年以后的整个世界经济体开始好转的过程中，英国为了在工业生产中实现更大的专门化，再次降低了它作为一个世界粮食生产者的作用。<sup>115</sup>

如同我们已谈论的那样，法国与英国的差异要比我们想象的少。当我们考察发生在1690年以后的各种变化时，我们首先要问，为什么法国人没有设立补贴。或许是因为法国比英格兰大得多而不需要。1688年至1713年的战争切断了法国先前的粮食进口，并且因此“产生了有利于法国南部发展谷物种植的形势。”<sup>116</sup>此外，由于这场战争给西班牙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并因而切断了西班牙对牛和酒的需求的市场。同时，封锁又切断了英国和荷兰对亚麻仁需求的市場，因此法国西南部的生产者明显地恢复了小麦生产。<sup>117</sup>

从这一时期起直至 18 世纪中叶，土地不断地集中，米迪—比利牛斯地区已成为“地中海地区生产单一的谷物出口区。”<sup>118</sup>同时，由于交通革命 [1680 年杜米迪运河 (Canal du Midi) 开放，1725 年开始修建新道路]，朗格多克地区的农业繁荣起来；改善后的运输条件使小麦有可能以低至足以在地中海市场上竞争的价格运到马赛。<sup>119</sup>这样，在法国，谷物生产的发展同英格兰小麦生产的发展齐头并进，并且对农村社会结构和世界经济的意义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普遍停滞时期，中心地区正致力于收回有利可图的“边缘区的”行业。

鉴于前述，为什么在历史编写中会普遍认为 1650 年至 1750 年左右英国有一场农业革命而法国则没有呢？要回答这一点，我们必须考察非农产业的情况。1700 年以后，英格兰的冶金和纺织业呈现出“一种普遍复苏的趋势，但还没有明显的增长。”<sup>120</sup>同农产品一样，工业品的价格一直到 1750 年都保持着“缓缓下降”的趋势，而“实际工资和市场需求均呈现出日趋增长的态势。”<sup>121</sup>增长了的需求首先表现在出口需求方面，特别是殖民地的需求，这一点，我们先前曾指出，它是英国对英属北美诸州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作为这个时期农业财富增长的结果，它也表现在国内需求的增长。<sup>122</sup>大土地所有者首先从他们自己需求的增长中获得好处。1700 年至 1750 年间，地产收益源泉的日益增加弥补了常常出现的地租的减少。这些收益来自木材的出售，来自将土地出租给采矿场、采石场、炼铁厂和石灰窑。<sup>123</sup>

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冶金业的一个主要推动力，<sup>124</sup>并且同法国连年开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sup>125</sup>这些战争导致了对军需金属制品的需求，使得进口更加困难（至少在战时），并且造船业的发展耗尽了木材。国内需求的日益增长带来了建筑业的发展，这一发展又刺激了铅制品的生产；然而铅制品的价格仍然较低，这也许表明事实上相对于缓慢增长的需求而言，产量增加得太快了。<sup>126</sup>古尔德推测 1600 年至 1750 年间食品价格较低的真正意义

在于降低了纺织业的成本。<sup>127</sup>这方面同小麦的出口情况一样,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政府介入世界市场。英国政府率先实行了今天称之为“进口替代”的政策。<sup>128</sup>早在1675年,国会就对英国织工从印度的贸易中所感受到的竞争进行了讨论,并对棉布征收了关税。

17世纪90年代特殊的经济危机导致了1696年至1700年所谓的棉布论战,论战的结果是产生了1700年禁止从波斯、印度和中国进口印花布的法令。尽管这个法令遭到了东印度公司和向英国市场出售或加工印度商品的人们的反对,但还是这样做了。然而,这并没有对羊毛制造商们起到帮助作用,因为白布可以在英格兰印染。1719年的织工暴动(由失业引起)导致了1720年《节约法》的颁布,这一法令禁止使用和穿带印花布(只有少数例外)。强制的作用无疑是有限的。因为平纹细布仍可进口,因此许多印花布就在平纹细布的名义下被输入进来。同时还偷运印花棉布。1735年《曼彻斯特法》有所退让,尤其是把在英国加工的亚麻和棉毛、印染制品排除在《节约法》限制之外,只要这些产品是在英格兰加工的。这实际上最终使棉布和亚麻织品获得了合法权利。<sup>129</sup>所以,这一法规的全部影响在于“鼓励了英格兰内部棉布替代品的生产。”<sup>130</sup>

然而我们仍然没有到达棉布时代,因为直至1773年,所谓的英格兰棉布实际上是一种横向的棉纬线同纵向的亚麻经线相结合的一种纺织品。<sup>131</sup>亚麻继续大量进口,主要是从德国、爱尔兰和苏格兰输入。<sup>132</sup>18世纪,德意志的亚麻逐渐让位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亚麻,这同样是始于1660年并且在此之后执行得更为坚定、严格的政府政策的结果。<sup>133</sup>当然,1707年以后苏格兰成了英国的一部分。这种合并所带来的基本影响是“英格兰的毛织品取代了苏格兰的毛织品(最粗劣的制品除外);而作为回报,苏格兰的亚麻可以畅行英格兰。<sup>134</sup>这会给苏格兰的土地所有者兼制造商<sup>135</sup>带来多大的利益,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爱尔兰的情况更是单

方面的。《利默里克条约》的签订结束了 1689—1691 年的威廉明特战争 (Williamite War), 条约宣称, 爱尔兰同其他殖民地一样受英国王权的统治。<sup>136</sup> 这对爱尔兰生产活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权复辟时期, 就已采取措施, 禁止爱尔兰同美洲殖民地的直接贸易关系, 从而削弱了爱尔兰的工业。<sup>137</sup> 1666 年的《大家畜法》(Great Cattle Act) 又将爱尔兰产品排除出英格兰市场, 并迫使爱尔兰主要向英格兰出口羊毛。<sup>138</sup>

在光荣革命以后的时期里, 英国走得更远。他们通过 1699 年的《爱尔兰毛纺织品法》破坏了爱尔兰的毛纺业。<sup>139</sup> 这个法案利用工资极低的家庭手工业, 把爱尔兰推向亚麻生产。<sup>140</sup> 詹姆斯认为: 对爱尔兰来讲这并不是是一件多么坏的事。因为在 18 世纪他们同苏格兰一样被允许向英格兰和英属殖民地出口产品, 西印度群岛已成为爱尔兰粮食的一个主要市场。<sup>141</sup> 然而, 这一看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这种出口贸易的主要受益者是在爱尔兰的英国大土地所有者。希尔的评价似乎更加合理: “继黑奴之后, 爱尔兰成为英格兰获得世界霸权的航海体系的主要牺牲品。”<sup>142</sup> 所以, 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模式, 英国政府依靠它在 1650 年至 1750 年间 (特别是在 1689 年以后) 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措施以扩大英国在世界冶金业和纺织业中所拥有的份额。<sup>143</sup> 毛纺织业和棉纺织业为英格兰所专有, 但苏格兰和爱尔兰被允许在亚麻生产上分享利益。<sup>144</sup> 问题仍然在于, 英国工业生产上这种毋庸置疑的发展如何与法国的情况相比较?

英伯特 (Imbert) 认为: 在旧制度的最后三个世纪中, 法国的工业资本无疑也获得了进步, 但它小于英国工业资本的进步。<sup>145</sup> 最初法国处于领先地位, 门德尔认为: “1700 至 1750 年, 法国仍是世界上头号工业强国。”<sup>146</sup> 莱昂 (Léon) 指出: 虽然在 18 世纪法国工业品的出口比例同 (英国) 是一样的, 但绝对量是 (英国的) 4 倍, 并且他认为: 面向出口的工业在技术上是最先进的部门。<sup>147</sup> 内夫认为: 1640 年至 1740 年间法国工业产量以比 1540 年至 1640 年间更快

的速度发展着，而英国的发展速度由于内战而变缓，只是在 18 世纪 50 年代才回升。因此他认为英法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趋于一致。<sup>148</sup> 定量的数据不多，学者们彼此矛盾，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慎重行事。或许对英国王权复辟以后的时期和法国科尔伯以后的时期的生产进行定性的或结构上的比较，是最好的选择。1892 年柯宁罕姆做了这种比较：

在 [1689—1776 年这一时期的] 大部分时间里，一种针对谷物进出口的引人注目的政策 [资助制] [在英格兰] 得以实施……这一政策举措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为它似乎引起了农业改良的大推进，而这种推进正是在这一政策推行时出现的……这似乎是起源于英格兰的重商主义方针的要点之一。法国人发展工业，荷兰人发展航海，英国则选择了一条推进农业发展的道路……。18 世纪，这种措施证明它本身是英国繁荣的奠基石。<sup>149</sup>

这样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果认为这个时期英法两国的政策区别是一方重视农业，另一方重视工业，这样的看法对吗？二是这可以解释成英国以后更繁荣的原因吗？马尔科维奇 (Markovitch) 最近从事的研究，通过考察 18 世纪英法两国农业和工业的贸易条件，倾向于证实柯宁罕姆的结论。他发现法国工业品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较高，而在英格兰情况恰恰相反。<sup>150</sup>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或许是因为各自政府有意为之。如果他们真是这样做了，在世界经济的长期停滞背景中，这难道与这两个国家的大小没有某些关系吗？无论是英格兰的国内市场还是法国五大包税区的国内市场都还不足以构成向工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于英格兰来讲，这意味着需要征服国外市场，对于法国来讲，则需要实现国家的经济统一。<sup>151</sup>

因为这个时期世界需求减弱，出口粮食而不是制成品对英国

人来讲好像是进入并最终控制国外主要市场的较可靠途径，所以英国政府强调谷物补贴，虽然并不排除其他政策。法国情况则不同。法国工业很大一部分在波那特(Ponant)，这是一个处于五大包税区以外的地区，并且同美洲有最密切的商业联系。波那特的企业家发现在法国其他地区出售其产品比在荷兰出售更困难。为了保持同荷兰的商业联系，他们开始放弃糖加工业而向荷兰直接出口西印度的原糖，以换回印花棉布和金属器具。<sup>152</sup>这就开始使波那特处于同荷兰相对应的位置，就像葡萄牙与英格兰相对应一样。

科尔伯的政策并没有成功地“合并”波那特，但是通过恢复在其他地区被波那特放弃的工业，确实使法国免遭葡萄牙的灾难。17世纪初，波那特是一个富裕的地区，生产布匹和亚麻；由于科尔伯，这种情况开始变化，东北部（在五大包税区之内）和朗格多克的工业开始发展起来。<sup>153</sup>1700年到1750年间，东北部的毛纺业占55%，南部占28%，西部（即波那特）则降至4%。<sup>154</sup>法国对工业的重视适应了急迫的需要，从长期看是成功的。当科尔伯政策在拿破仑时代最终得以充分贯彻时，实现这种政策所需的工业基地被保存下来。“听之任之，通行无阻”的政策，最初就是指在重商主义的法国内部排除种种障碍的思想。<sup>155</sup>

1700年到1750年间英国对农产品出口的充分重视可以解释英国在以后的世纪所取得的经济胜利吗？<sup>156</sup>也许可以，但影响只是间接的。正是对对外贸易的重视（此时大部分恰好是粮食贸易）使英国重视海军和殖民地，从而使英国取得了在同法国长期斗争中的军事胜利。法国政府在竭尽全力克服国内各种障碍之时，被英国政府的谋略挫败。这远不是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是强大的国家政府的胜利，而它的强大又是必然的结果。英法两国的生产实力须与前霸主荷兰共和国的生产实力相比较，才能得到最恰当的评价。在整个17世纪，荷兰的生产成本相对于英法两国提高了，到1700年，区别更明显可见。<sup>157</sup>成本的提高是通常伴随着霸权而来的两个特征的结果：税收的提高<sup>158</sup>和工资水平的提高，<sup>159</sup>尤其是后

者损害了劳动密集部门(这方面如纺织业、造船业、酿酒业)。<sup>160</sup>荷兰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相对缺乏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荷兰资本主义得以为继依靠的是其在国外的投资的收入。所以,荷兰的衰落仅是相对于英格兰和法国而言,而不是绝对的<sup>161</sup>。

英法两国生产方式的缓慢变化(以及尼德兰的相对持续衰落,且不说西班牙和葡萄牙)导致了新的商业模式,或至少加强了前已出现的某些趋势。1660年到1700年期间,英格兰成为殖民地产品再出口的主要货栈;但世界经济中的海上贸易仍然“是欧洲人占优势”,并且仍主要掌握在荷兰人手中。然而,在新殖民地贸易中,经济发展的方向,特别是1700年以后,明显地向西发展,在这方面英格兰力图成功地取代荷兰人。<sup>162</sup>1689年到1713年英法战争期间,在英格兰就重商主义政策为贸易带来的利益问题展开了公开的辩论。一方面,1696年的《英国航海法》和贸易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政府对贸易进程方向的新的关注。<sup>163</sup>另一方面,人们正要求更自由的贸易,并要求修改重商主义政策。<sup>164</sup>但没有一方获得成功,这反映了英格兰在世界经济中虽已日益强大,但还远没有取得霸权地位。<sup>165</sup>

18世纪的上半叶,西向贸易首先是糖,<sup>166</sup>其次是用来生产糖的奴隶。<sup>167</sup>1700年,英国在糖方面明显地控制了世界贸易,但到1750年,支配权转到法国。<sup>168</sup>比较一下牙买加沿海地带的生产和法国控制地区的生产,或许能最好地解释这种变化。在牙买加,由于沿海地区的枯竭,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而法国人控制的产地却是新近开发的地区。<sup>169</sup>这意味着法国竞争过英国了吗?不完全是。正如维拉指出的,当法国的对外贸易在18世纪日益“美洲化”时,英国的对外贸易则逐渐“全球化”。<sup>170</sup>英国在糖贸易中的损失,在其他方面——首先从奴隶贸易中——得到了补偿。在17世纪非洲奴隶贸易的争夺中,荷兰人最初是最强大的竞争者,<sup>171</sup>这正适合他们当时的地位。西班牙殖民地是主要市场,所以1662年重新开始了对阿先托这种奴隶贸易垄断制度的竞争。<sup>172</sup>

在英格兰，皇家非洲探险公司垄断了始于 1663 年的奴隶贸易。<sup>173</sup>最初，由于世界糖业生产的萧条，利润较低，但是 1689 年的战争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sup>174</sup>这家英国公司垄断了在英国殖民地的销售，并且不受《航海条例》的限制，这一条例允许他们在英属加勒比港口向西班牙买主出售奴隶（西班牙港口同英国的奴隶贩子关系密切）。这些买主再将这些奴隶装上西班牙商船运走。这使这个公司遭到英国种植园主的攻击，他们认为西班牙的销售提高了奴隶价格，并且增加了西班牙的竞争能力。<sup>175</sup>种植园主要求自由的奴隶贸易。公司的垄断事实上在 1698 年就结束了，尽管它声称非洲的奴隶贸易具有公共效益的性质。<sup>176</sup>从奴隶贸易中获利似乎仍是英国政府要加以保护的一项合法事业，就像从糖业的发展中获利一样。政府能两全其美的唯一途径是获得“向西属美洲提供奴隶的一项单独的协议”<sup>177</sup>——简言之，即奴隶贸易垄断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英国政府在 1713 年已获得该项权利。

英国的种植园主得到了自由的奴隶贸易，而英国奴隶贩子也获得了西班牙市场。种植园主认为，这个妥协有利于奴隶贩子一方。<sup>178</sup>而且，从一直是奴隶货栈的牙买加半岛获利的那些人，现在也对南海公司直接介入西班牙港口表示不满。<sup>179</sup>奴隶贸易垄断权也严重地切断了法国人在美洲的走私贸易，法国人被迫回到早期的利益颇少的同西属美洲的贸易方式中，即把货物交付给西班牙商人，再由西班牙商人用西班牙货船出口。<sup>180</sup>相比而言，英国人有三种不同的与西班牙进行贸易的形式。同法国人一样，他们也通过西班牙进行贸易；但还通过南海公司每年的商船进行贸易；并经过牙买加进行走私但又半受保护的贸易。<sup>181</sup>西班牙的商船队日渐消逝，<sup>182</sup>即使有一些残存下来，英国现在也要从无形的以船作抵押的贷款项目中获利。<sup>183</sup>

在 17 世纪开始之际，法国人在地中海贸易中扮演了比英国人更重要的角色[马森(Masson)称之为绝对优势<sup>184</sup>]。在整个 17 世纪，英国的渗透不断加强，<sup>185</sup>但在 1689—1731 年战争期间衰退



了。一方面,法国的外交取得了成功。1690年,法国同阿尔及尔签署了条约,从而消除了北非伊斯兰教各国海盗对法国贸易活动的袭击,这些海盗同时继续威胁其他欧洲国家的贸易活动。<sup>186</sup>法国也获得了在埃及的特权地位(路易十四没有和他的土耳其盟友协商就在1697年签订了《赖斯韦克条约》,法国人从此又失去了这个特权地位)。<sup>187</sup>总的来说,法国介入立范特贸易,显然出现了一个高潮。<sup>188</sup>主要原因似乎是法国的纺织品质优良,至少质量优于同时期在立范特出现的英国的中档纺织品。<sup>189</sup>马赛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垄断了法国的贸易,<sup>190</sup>因此也成了立范特和北非各种产品再出口贸易的中心。<sup>191</sup>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还基本上是一个外部的舞台,<sup>192</sup>所以,它的贸易在法国的(实际上也是西欧的)全部商业活动中所占的比重日趋减少而不是增加。<sup>193</sup>

17世纪晚期亚洲同欧洲的贸易也缓慢地开始由胡椒和香料转向其他奢侈品:印度的纺织品,中国、孟加拉和波斯的丝绸;中国的手工艺品(真漆、瓷器等);<sup>194</sup>茶叶和咖啡,最初也是奢侈品。<sup>195</sup>这种日益发展的贸易本身没有使印度洋地区边缘化。一个原因是纺织品生产的增加没有“伴随制造技术的任何重大变化”<sup>196</sup>,或任何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无疑,欧洲国家开始亲自促成这种变化。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同Mahrattas结盟;1684年他们又在孟买驻军设防,从而结束了“不设防工厂”的政策(贸易港口意义上的工厂)。萨瑟兰(Sutherland)认为这只是“为了得寸进尺而打进的一个小楔子”。<sup>197</sup>不断增加的欧洲人利益导致了欧洲内部的不断竞争。在1746年后,随着法国人从英国人手里占领了马德拉斯,这种竞争采取了战争形式。此后尽管欧洲出现了短暂的和平,但潜在的冲突仍持续不断;<sup>198</sup>这种冲突只是在1763年《巴黎条约》签订后英国获得了决定性的支配权才告结束。

然而,尽管欧洲在亚洲贸易中的利益日趋增长,<sup>199</sup>亚洲仍然是一个外围舞台。1600年至1750年,中心国家全都逐渐成为世界广大地区的殖民国或半殖民国。它们积极深入北美(因为通过移民,

殖民地可以扩大市场)<sup>200</sup>和西印度群岛(因为可以得到有利可图的糖的供给),却极为勉强地卷入印度洋地区、非洲沿岸和穆斯林的地中海。即使在后面这些地区,有时欧洲的政治当局也直接侵入,通常是为了遏制对手的要求或威胁。从欧洲人的角度看,交换产品中奢侈品在日益减少。然而,直到18世纪中叶世界经济出现高潮之前,可能还不是那样;在那以后,才开始真正的边缘化;即使在那时,边缘化也才开始出现在诸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经济上有前途的地区。<sup>201</sup>只是在波罗的海和白海的贸易中,人们才能最明显地察觉到1689年以后荷兰在世界经济中的商业霸权的结束的真正含义。无疑,荷兰的地位也在其他地区衰落,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一般来说还有亚洲,荷兰的贸易都在衰落;<sup>202</sup>但北方的贸易才是荷兰的主要贸易,正是在这里,英法的竞争给荷兰以最沉重的打击。

像同印度的贸易一样,同俄国的贸易虽然日益频繁,但也没有使俄国边缘化。<sup>203</sup>这个时期的大宗贸易(如粮食、大麻和钾碱)显然还没有常规化;只是当欧洲市场的价格特别高时,粮食才从阿尔汉格尔斯克输入到西欧;但是诸如蜡、鱼子酱和毛皮这些奢侈品,“因其运输成本在售价中不占重要地位”得以定期输入。<sup>204</sup>荷兰人无疑在同俄国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sup>205</sup>但在1700年以后,英国人渐渐取代了荷兰人,<sup>206</sup>特别是作为木制桅杆进口商。<sup>207</sup>英国人也开始控制瑞典铁的进口。<sup>208</sup>法国这时增加了在北方的贸易,虽不及英国,但又一次损害了荷兰的利益。<sup>209</sup>威尔逊认为,荷兰对欧洲运输和商业的“实际垄断”大约到1730年“仍然未受动摇”<sup>210</sup>,只是在1740年以后,荷兰人的贸易中心地位才受到沉重打击。<sup>211</sup>

也许威尔逊是对的,但有两件事实可能促使我们认为荷兰人的实际垄断地位甚至更早就结束了。首先,在17世纪,英国的商品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滞销并且被委托出售,但是到了18世纪情况就反过来了:伦敦是贸易中心,而荷兰的亚麻只有通过委托才被英格兰接收。<sup>212</sup>其次,有迹象表明,18世纪敏锐的英国人不

再认为荷兰人是霸主；他们倒是把法国人看作是比荷兰人更为厉害的竞争对手。<sup>213</sup>当然，在金融方面荷兰人仍然领先。但是即使在这方面，英法两国的地位最终还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于1689年的第二次百年战争给英国和法国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问题，尤其是法国。<sup>214</sup>作为“大陆性”强国，法国不得不无休止地提供资金去维持雇佣军和它在整个欧洲的外交活动，法国政府最初力图在1690年和1725年间实行一系列的货币贬值<sup>215</sup>来满足这些日益增长的费用。<sup>216</sup>这些贬值措施短期内在某些方面对国家有所补益，<sup>217</sup>但从中期来看，代价就高了，<sup>218</sup>因为名义价格的上涨掩盖着剧烈的周期性危机、生产的普遍下降和税收的日益增加。<sup>219</sup>

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较好地克服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部分是因为英国的纯军事费用较少，部分是因为英国在贵金属方面占有有利地位。17世纪晚期，欧洲各国都遭受了一场白银危机，英国当然也不例外。17世纪90年代英国部分地禁止贵金属出口，与东印度公司和波罗的海进行贸易时例外。<sup>220</sup>我们已指出：由于法国的产品大都在法国市场上出售，因而需要在国内贸易中流通的货币（白银）；而英格兰（由于其疆域较小）主要面对出口市场，国外市场则需要通行于国际的结算货币（黄金）；所以英格兰事实上倾向单一的金本位制，而法国则倾向银本位制。<sup>221</sup>贵金属的贸易关系又加强了这个趋势。法国通过西班牙获得墨西哥的白银，而英格兰通过葡萄牙垄断了来自巴西的黄金。<sup>222</sup>英格兰利用1689—1714年的战争时期确保了它的黄金供给。<sup>223</sup>所以，白银危机对英格兰的打击没有法国严重。在法国因白银储备负担过重而削弱了国家结构之际，英格兰则通过对不断扩大的黄金贮存实行商业性控制而加强了其国家结构。

无疑，贵金属的重要性并不是它本身固有的，而是其它商品价格脆弱的反映；<sup>224</sup>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掌握充足的贵金属储备毕竟是中心国家互相竞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英法两国都努力将其国家财政置于较坚固的基础上，在这两个国家中，专门机构发

展起来，税收日益扩大，纸币增多，公债也不断增加。<sup>225</sup>但是，1689—1714年的战争使法国国家金融于1715年陷入一片“混乱”，<sup>226</sup>而英国的国家财政却具有较强的偿付能力。有什么不同呢？凡·德·威认为，法国的重商主义在路易十四施展“宏图”时期主要是“服务于军事扩张政策”，而英国的重商主义则是“系统地服务于经济扩张政策”。<sup>227</sup>凡·德·威就是这样对军事扩张（意味着国家资金的非生产性应用）和经济扩张（较为可取）进行了对比。这是一般性观点，但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存在。

我们已经指出：法国和英国地理位置的不同迫使法国进行以陆地为基础的经济扩张付出了代价较高的努力——首先是要在法国本土实现经济上的有效统一。作为一个陆地国家，衡量法国的相对成功不应与英格兰作比较，而应与奥地利进行比较。“在18世纪开始之际，虽然奥地利君主国拥有同法兰西国王一样广阔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但是它的税收收入却比法国少5倍。”<sup>228</sup>不单是法国，英格兰和法国都需要人不敷出地度日，只要还存在着信心，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总是有可能的。信心主要是经济现实的反映。成功产生成功，失败引起失败。我们已经看到，法国政府利用货币贬值作为举债筹资手段，影响尤为重大的是，法国政府推行了一种不利于未来税收的举债形式。17世纪90年代，商业银行家开始出售以财政部对未来税收的预期额为基础的贴现债券，随着这个过程本身的推进，商业银行家实际上发行了以政府在战争时期作出的并不可靠的诺言为基础的信用货币，这个信用大厦在1709年崩塌了，政府把延期偿付权授予了商业银行家。正如卢西所说：“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是自己在延期偿付”。<sup>229</sup>

同时，*affermage*，或者说包税金成为增加王室收入的主要途径；它相当于从科尔伯到法国革命时期王室收入的一半。<sup>230</sup>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包税金是一种代价昂贵的筹资手段。莱昂说，“在一个欠发展的国家里”，金融家作为一个要价高昂的中间人集团，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种国家中，直接发行公债“即使不是没有可

能,也很困难”。<sup>231</sup>此时英国的发展情况截然不同。的确,国家的财政在早期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克拉彭(Clapham)说道:“斯图亚特王朝晚期的财政是捉襟见肘的”。<sup>232</sup>但在1689年至1714年的战争时期,先是在威廉和玛丽的统治下,接着在安妮女王统治下,英国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创立了长期公债制度,这就使政府以较低的代价取得了一个可靠的财政基础。1694年,建立了英格兰银行,此外,这个时期重新组建了联合东印度公司,并且建立了南海公司。所有这三家企业都被授予特权,条件是给国家长期贷款。<sup>233</sup>这三家企业的贷款在“由浮动国债向统一国债过渡中起了关键作用。”<sup>234</sup>

这些贷款的确是较好的权衡。对于官方来说,这些贷款虽然需要偿付,却是永久性的贷款;对于股票持有者来说,利息率高,而且股票能逐步增值。这仍需要一定的信任。卡特(Carter)认为:在威廉和玛丽执政后,金融界感到他们可以相信政府。“这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sup>235</sup>谁是投资者?除了城市居民外(甚至还有农村的一些人),卡特还提到了国外的一些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和胡格诺教徒。<sup>236</sup>深入的研究清楚地表明:英国国债赖以确立的关键信用是荷兰银行家及其金融盟友,包括那些组成所谓胡格诺教徒国际组织的人。<sup>237</sup>这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胡格诺教徒在南特敕令废除以后立刻把钱存在英格兰的银行而不是法国的银行,<sup>238</sup>也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那些在战争中同英格兰结盟反对法国的荷兰人会有同样感觉。但是为什么不在荷兰投资呢?1689年后,英国人可能是在冒借债度日的风险,并且正如查尔斯·威尔逊所认为的那样,英国或许的确是在“利用从荷兰的黄金时代借来的利益,为争取帝国的前途下赌,并且赌赢了”。<sup>239</sup>但是荷兰人不得不甘愿借钱。

如果荷兰金融界在18世纪对英国的国债表现出“特别活跃的兴趣”,就一定有某种原因。我认为这个原因与其说与英格兰有关,不如说同荷兰有关。<sup>241</sup>我们首先举出两个事实。在18世纪英

国国债大部分是欠外国人的。<sup>242</sup>1689年后,英格兰成为“阿姆斯特丹资本投资的首选之地”。<sup>243</sup>英法两国17世纪重商主义政策的最后结果是在生产方面,甚至更大程度上在商业方面消除了荷兰的优势。荷兰工资成本增加了。荷兰的技术优势消失了。<sup>244</sup>政府征收的税率特别高,部分原因是发行公债的成本很高。荷兰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大地位而带来的低利息率现在似乎要靠“一种疲弱的商业态势”来维持,而那种疲弱的商业态势“可能是把资金转移到外国的原因”。<sup>245</sup>由于联省共和国利息率从17世纪早期的6.25%降至18世纪中叶的2.5%,所以英格兰银行的6%的利息率(和年金及殖民地的抵押契据的5%的利息率)对荷兰的投资者就显示出很大的吸引力。<sup>246</sup>

总之,并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促使荷兰人把钱投放在英格兰的既不是“封建商业”的心态,也不是缺乏爱国主义。“比较成本,比较的资本报酬以及财政政策,都促使(荷兰人)投资于国内外有固定利息的股票,而不是工业。”<sup>247</sup>桑巴特认为这种转变是资产阶级总是在“衰退”的表现,但是荷兰的自由主义史学家A.N. 克莱恩反对桑巴特的这一“有争议的”说法,而赞成马克思的解释:每一个资本家都是竭力使资本得到补偿或自我扩张的狂热追求者。克莱恩认为这种特性完全符合荷兰人的情况:

17世纪的荷兰商人和他们的18世纪的食利者后代符合这一概念,只要我们理解到后者的金融投资的活动范围要狭小得多,如果某一个狂徒比其他狂徒更迅速更有效地实现其目的,这或许应归因于他更多的机会,而肯定不是他更大的决心所致。<sup>248</sup>

荷兰的金融变化既不是突然的,也不是全面的,而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荷兰的银行仍然是其他国家可以存放其贵金属的稳固、可靠的场所,<sup>249</sup>并且18世纪时期的铸币率在继续增加。<sup>250</sup>

到 1763 年,欧洲人把阿姆斯特丹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信念仍未动摇;<sup>251</sup>但在 18 世纪荷兰人就把资金转向可以得到最多补偿的地方,即英格兰。这是“一种直接的商业调整”,<sup>252</sup>在这种情况下,荷兰投资者的较高利润率有助于英国政府减少借债成本。最终英国人可以像法国人一样增加其国内收入,而荷兰的投资“帮助英格兰在最少干扰经济的情况下参战。”<sup>253</sup>这个前霸主和正在崛起的霸主之间的共同安排为一方提供了体面的隐退收入而为另一方反对其对手准备了关键的推动力量。这种情况后来在 1873 年至 1945 年间重演:英国扮演了荷兰的角色,而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

《乌特勒支条约》以后,法国努力消除英国在世界金融中正在出现的优势。哈森(Harsin)指出了法国的症结所在。“直到 1715 年,缺乏真正的公众信誉是法国财政体系中最严重的缺陷。”<sup>254</sup>约翰·劳<sup>(1)</sup>的“私人”银行<sup>255</sup>企图弥补这一缺陷。劳的努力就是建立一个容纳国家收入的银行,恢复法国政府的信誉;在这个基础上,这个银行发行可以汇兑黄金的有效货币。长远目标是保证货币的稳定,增加流通货币,降低利息率,提高与外币的汇率,或许,首要的是减少国家开支(无论在公债方面的开支还是居间的官僚阶层对政府收入的不断消耗)。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创造条件去大力推进海上和殖民地扩张计划。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劳主要提出了两点方案:扩大纸币发行量和财政改革。<sup>256</sup>这似乎是在努力完成科尔伯的工作,一种似乎能恢复法国在与英国的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的想当然的跃进。这个计划彻底失败了。在得到最初的资本以后,劳氏银行就建立了西方公司,通过国家垄断开发密西西比河流域(被称为路易斯安那)。这个银行继续吸收其他贸易公司(塞内加尔公司、东印度公司、中国公司)参加,并且在 1719 年建立了印度公司。

同时,劳氏银行接管了对公债的偿付,而不再以税收偿付。劳也努力重新建立税收制度并使之合理化,但是在滥发股票和纸币

(1) 约翰·劳(John Law, 1671—1729), 苏格兰金融家, 曾获法国政府允许在法国建立“总体银行”, 为法国筹划金融改革, 以失败而告终。——译者

引起的投机狂潮中，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方案。突然出现了信用危机。收缩股票的努力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这个体系在所谓的密西西比泡沫中彻底崩溃了。原因何在？德约恩和雅卡特(Deyon and Jacquart)认为：尽管“方案的前景带来了‘赞扬’，但劳并不具备‘推行之术’，缺乏伺机行事的能力；即使有最出色的战略，都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才能成功。”<sup>257</sup>哈森认为：劳建立的体系“目标坚定(但)不成熟”，计划失败，归根到底是由于“他倡议鲁莽而且推行过急，而不是由于那些方案缺乏逻辑和对手的联合抵制。”<sup>258</sup>然而，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劳的失败是必然的，这只是因为“无论是路易斯安那还是和中国或东印度的贸易，都没有带来足够的利润去补偿哪怕一部分资本的利息”。<sup>259</sup>

如果考察一下在英格兰出现的类似投机，我们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劳的失败。英格兰的投机也导致了类似的所谓南海泡沫的危机(当然，投机不局限于英格兰和法国，日内瓦、联省共和国、汉堡和北意大利的银行家和投资者都积极地参与投机)。<sup>260</sup>约翰·劳的体系把三种国家的垄断拢在一起：发行银行、贸易公司以及对间接税收的集中控制。1719年10月，当劳主动偿还余下的1.5亿法郎的国债时，英国也像法国一样，对公债的需求远远超出了预计。英国人因此利用已有的南海公司推行类似的计划，<sup>261</sup>同样是需求超出了预计。英国这两次举措的特点是，独立的政府债权人都是被诱导而非强迫购买公债。<sup>262</sup>然而，在法国，在高压下进行劝导之后，竞技规则就改变了。银行纸币有一半被贬值为记帐货币。正如汉密尔顿指出的那样：

因为劳和当权者都曾反复庄严地许诺银行纸币永远不会变成记帐货币，因此引起了一片惊慌。因为王室不守信用而造成的第一次打击已使银行纸币的名义价值减少了一半，纸币持有者就竭力在第二次打击到来之前把它们花费或投资出去<sup>263</sup>。



这场“大崩溃”从巴黎蔓延到伦敦。它无疑“生动地显示了新的金融大厦的脆弱性”，但也同样无疑地表明了“新的金融手段的弹性”<sup>264</sup>。英格兰和法国随后就进入了长期的财政稳定时期，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sup>265</sup>在这个意义上，结果是令人满意的。然而，法国利用约翰·劳的体系克服英法两国在财政力量上不断扩大的差距的努力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英格兰以前建立的中央银行渡过了南海泡沫而生存下来，但法国的类似机构却导致了密西西比泡沫，并与它同归于尽。“劳的短暂统治震撼了一切，却一无所获。”<sup>266</sup>在英格兰，国会支持南海公司破产，它“保全了面子”，因此也保住了英国人的信誉。<sup>267</sup>在法国，这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约翰·劳体系的直接的消极影响被过于夸大了。<sup>268</sup>甚至可以说他的体系还有些积极影响。<sup>269</sup>真正的消极影响是未能成功，因此也未能扭转落后的进程。

随着 18 世纪的推进，英格兰在世界经济体中的金融中心地位逐步提高，法国的地位则逐步下降，<sup>270</sup>因为法国政府不如英国政府强而有力。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英国政府为何比法国政府强大。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是荒谬的，因为他们衡量一个政府的力量，是根据个人受到保护、不受政府专横政策影响的程度，或者根据国家官僚机构规模的大小。但是，我们已明确说明了我们的观点：政府的力量取决于掌权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自己的意志胜过国内外其他人的意志。按照这样一个标准，我们认为，英国政府到 18 世纪早期已明显地超过法国政府。真正强大的政府很少需要炫耀铁拳。坦伯利(Temperley)认为：如果说沃波尔时代是“一个和平的(并且是)平静的时期”，这是由于他以前的领导人的才干所致：“1703 年与葡萄牙的《梅休因条约》和 1713 年《乌特勒支和约》有关商业的条款，普遍被认为是向英国贸易的让步，而这本是通过武力或武力威胁才能得到的”。<sup>271</sup>武力也不是充分条件，还必须有政府的效能。普拉姆认为：“到 1714 年，英国拥有了欧洲最有效能的国家机器。”<sup>272</sup>

我们已指出：17世纪晚期在英国和法国实现的社会妥协，其差别比人们有时认为的要少，而且，那些妥协在1689年至1763年的英法战争期间给两国都带来了相对的内部稳定。18世纪是“整个欧洲君主制和贵族阶层之间相互和解的时代”，<sup>273</sup>这种和解基于政府对地主阶级收入的强有力的保护。人们普遍承认法国是这样。但英国难道不是商人资本称雄的国度吗？无疑是的。但这同土地收入如此不相干吗？<sup>274</sup>除了人员的身份相互重合，政府一方面在我们指出的多个领域帮助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同时又允许地主阶级占有大部分剩余价值。人们普遍承认法国也是如此。免税的贵族和行贿的穿袍贵族是我们想象中的旧制度的支柱，<sup>275</sup>但英国就不是这样吗？在这个“贵族垄断土地”的“大地产时代”，<sup>276</sup>沃波尔的稳定的结果是什么呢？汤普逊尖锐地指出：

18世纪20年代英国的政治生活有些香蕉共和国的病态性质……每位政治家通过裙带关系、利害关系和收买，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其报偿就是给他们某些职位，使他们可以捞到一些国家收入：军饷、教会基金、消费税……上层绅士、投机商和政客都是大富翁，他们的收入像安第斯山脉，高高耸立在贫困的平民百姓的雨林之上。<sup>277</sup>

英国式的这种“官府强盗”<sup>278</sup>，就其对土地财产的影响来看，与法国式的稍有不同的“官府强盗”相比，果真有重大区别吗？我们必须回到什么原因使英国政府比法国政府强大的问题。也许最简单的答案是：那是英国在1689—1714年的战争中遏制法国的军事能力的结果；而英国之所以能赢得这场战争是英荷联盟的结果，并不是因为荷兰人的军事援助（虽然这并非不重要），而是因为荷兰人的投资。荷兰人获得的利息确立了一种信誉，使英格兰银行得以建立，也使英格兰银行得以熬过南海泡沫而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是，它使英国有可能在沃波尔一党制政府中最终弥合英国统

治阶级在早期斯图亚特王朝开始出现、并且在 1689—1715 年的托利—辉格党激烈的斗争中继续以不同形式存在的分裂。<sup>279</sup>英国之所以日益强大，英国企业家之所以能继续征服经济世界，并不是因为英国比法国更民主，而是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民主较少。<sup>280</sup>一夜之间，政治暴力气氛变成了政治稳定的形势。<sup>281</sup>

上层阶级的政治和解是 18 世纪英国稳定的基础。这在法国仅部分地得以实现。在英格兰，上层阶级中的新阶层获得了政治结构中的合法地位，不再是一种敌对势力；<sup>282</sup>法国的类似集团，穿袍贵族也是如此。<sup>283</sup>然而，与英格兰不同的是，法国的行政机构从没有全面地控制国家。“专制主义的理论和实际之间的裂隙仍然相当宽。”<sup>284</sup>为了说明法国上层阶级和解的不彻底性，还是让我们回到胡格诺派和南特敕令的废除这个问题上。16 世纪的“新教党”获得一半法国贵族的支持，尤其是中小贵族。由此引起的一个反常后果是，中小贵族受到王室官员的欺压时，就转而依靠“对农民表现出附有条件的反常的宽容”。然而，当 1598 年的政治妥协转变成 1629 年王室的胜利时，社会后果是巨大的：“新教党的失败首先是贵族的失败。”<sup>285</sup>1598 年后，贵族先是逐渐地，随后在 1630 年以后便迅速地抛弃了新教，这就使 1685 年废除南特敕令成为可能。<sup>286</sup>

由于南特敕令的废除，一些新教徒，主要是市民新教徒，四散出走。<sup>287</sup>但是这只占法国新教徒总数的 10%。其他许多人改变了信仰。<sup>288</sup>留下了什么呢？

王室的严厉惩罚就这样摧毁了集中化和制度化的、有教士和资产阶级的新教。这种新教在 17 世纪时压倒了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后者在逆境中复兴起来。起初没有教士，后来也只有俗人布道者……它的复兴主要是由那些曾是 16 世纪改革派教会主力的贵族和农民促成的。当南特敕令的废除迫使他们寻求新的抵抗手段时，他们的第一个本能的选择就是起义<sup>289</sup>。

重建起来的新教教会的突出特征是“主张各教会独立自主的组合主义、联盟主义、世俗性、议会制和平等主义”。<sup>290</sup>平等派和造反派！法国政府面对着一个潜在的、正在崛起的中间阶层——贫穷的贵族和富裕的农民——他们是需要认真对付的。它陷入这种困境，是由于疆域太大和经济太分散，不能迅速地形成强有力的政府结构，因此在16世纪就出现了由历史形成的困难处境。

可能引起动乱的因素必须加以缓解和控制。实际上也这样作了。其中一部分措施是1720年后减轻了农民的税收<sup>291</sup>。还在农村推进了初等教育，这是通过反宗教改革实行文化引入的模式。<sup>292</sup>然而，降低税收只不过扩大了英法两国力量之间已经在增大的距离。<sup>293</sup>教育和宗教的发展虽然可以控制18世纪法国农村中的“激进主义”和“犯罪行为”<sup>294</sup>，但是远不足以消除政治上排斥大农场主的观念，这些人在英格兰被称为乡绅或至少是小乡绅。由于没有在政治上联合这部分人，国家未能真正强大起来。<sup>295</sup>法国国内的斗争与影响重大的英荷联盟的建立并非完全无关。荷兰在18世纪愿与英国而不是与法国结盟，这一点在17世纪中叶绝不是明朗的。英国人是荷兰人的主要商业对手，而后者却与法国联系甚多。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荷兰人当时正在把波南特<sup>[1]</sup>变成一个经济传送带，类似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正在变成的那样。

然而，法国国内的困境迫使它成为镇压新教徒的大陆军事扩张国家。在荷兰的资本拥有者看来，无论是共和主义者还是保王派，都会觉得与英国打交道比同法国打交道风险要小一些。荷兰受到被法国包围和消灭的威胁，而英国却愿意促进两国资本主义阶层逐渐混合。奥兰治王族登上英国王位直接证明了荷兰人倾向英国人。所以，正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强大总是导致更强大，衰弱总是走向更衰弱。16世纪建立国家机构的重重困难，使法国四分五裂，饱经沧桑，最终导致法国在18世纪末未能完成统一。16世纪

---

[1] 波南特(Pennant)，即法国西部。——译者

的英国是一个巩固的国家。内战的困扰迫使英国形成团结一致的统治阶级，使它能够吸收和兼并凯尔特人居住的边缘地带，而且能吸引足够的荷兰资本，从而能够在18世纪建立稳固的沃波尔一党制政权。正是英国国家相对实力的稳步增长——而不是英法两国在1600年至1750年间生产组织和价值体系上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使英国的国力在1750年至1815年间最终超过了法国。

我们在本卷中始终强调了英法两国生产组织的相似性。至于怎样衡量技术和思想方面的更新，完全取决于读者读到的那些史书。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无疑已开始在联省共和国和英国广为传播。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保罗·哈泽德的经典性论证：启蒙思想在法国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发生在法国大革命乃至百科全书派活动之时，而是在1680—1715年期间。<sup>296</sup>正如拉布鲁斯(Labrousse)所说，“18世纪[在法国]发现了资产阶级”。<sup>297</sup>不仅法国是这样。虽然在整个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前社会的意识形态仍居于统治地位，但越来越多的阶层首先并最终是按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方式行事。他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追求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权利。这实际上是我们论证的中心问题。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都还没有兴起。但是他们的实践活动已经对社会行为构成了主要的制约力。

### 注释

1 当然，关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时期划分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皮埃尔·肖尼认为：“1586年至1760年间”，欧洲在人与土地的关系方面“没有大的变化”（1966a, p. 242）。但他又认为，“18世纪的长期发展阶段的起始时间，在马尼拉也像在美洲甚至荷属东印度一样，应该确定为1680年至1690年间。那里的回升比大为延迟的欧洲大陆的回升早四五十年左右”（1960a, p. 213）。皮埃尔·古伯特和皮埃尔·维拉都把欧洲开始回升的时间定为1733年（古伯特，1970g, p. 333；维拉，1962b, I, p. 708）。但是维拉还认为：“在经济上，人们普遍认为，18世纪的所谓大发展始于1733年，但在1760年以后才开始起飞，并持续到1817年”（1962a, p. 11）。拉布鲁斯持相似的观点，认为

1726年至1763年间有缓慢的回升，只是在此之后才出现了“大飞跃”（1970，p. 388）。

2 克里斯托夫·希尔认为，“1688年的革命不仅是英国政治和宪制史上的转折点，也是其经济发展过程的转折点。詹姆斯逃走前一周，皇家非洲公司还照例下令授权逮捕那些侵犯1672年特许状权利的非法商人。由于没有书面决定，该公司放弃了运用强制手段实施其垄断权的要求。后来国会法案正式确立了自由贸易原则。但只是到詹姆斯二世垮台时才发生了真正的变化”（1961a，p. 262）。赫克舍（1935，I，pp. 262~263）也把1688年视为一个分界点，视为（自由派的）英国与（科尔伯的）法国之间出现歧异的大转折点。我已对这种解释提出怀疑。

3 见谢里登（1969，p. 13）。并见西利（Seeley）（1971，p. 64）。布罗代尔认为早在1713年乌特勒支条约签订之时“英国就胜过了法国”，不过他又说英国只是“在1815年获得胜利”（1977，p. 122）。

4 见内夫（Nef）（1968，p. 149）。并参见古伯特，他认为“数字的力量，人口的优势，是旧制度的特征”（1970b，p. 21）。弗雷德·科特雷尔（Fred Cottrell）则认为，英国拥有“能量”的优势：“在英国，帆船产生了它能够带来的重大变革。作为一个岛国，与大陆国家相比，英国肯定占有优势。它的屏障主要来自帆船的使用，而不是靠军队，因为帆船本身产生（能量的）剩余价值。防御侵略所必需的剩余价值比其邻国所需较少，这就使能量可用于生产更多的其他物资，而并不危及国家的生存。大陆的军队却不断消耗着它们的剩余价值。”（1955，pp. 69~70）。

5 威尔逊（1965，p. 282）。

6 安德鲁斯（1915，p. 546）。

7 有时被确定为1688年。产生这一歧异的原因是，英国直到1752年还使用儒略历，因此英国1689年的新年开始于3月25日，威廉于1月7日成为“执政者”，2月23日与玛丽一起接受王冠和《权利宣言》，因此光荣革命被定在1688年或1689年。见默里（Murray）（1961，p. 162）和德比尔（De Beer）（1970，pp. 206~208）。

8 从理论上讲，这是片面的。虽然威廉作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国王于1689年5月17日向法国宣战，但路易十四从未对英国宣战，直到1697年还承认詹姆斯二世为合法国王，并承认《赖斯韦克条约》。见克拉克（1970，p. 226，n. 2）。

9 C. 希尔(1961a, p. 257)。

10 见费伊勒(Fayle)的论述(1923, p. 285)。他指出,大陆派因此预见到了德乔塞尔公爵(Duc de Choiseul)向西班牙提出的建议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

11 见普拉姆(Plumb)(1967, p. 120, p. 134)。

12 普拉姆(1967, p. 135)。

13 罗斯维尔(1969, p. 93);并参见巴尼特(Barnett),他谈到在乔治国王时期的英国“近卫军和卫戍部队”一年一度的更换。“在和平时期,那样一种军队的临时征召原则看来是特别受到重视。每年的兵变诉状给国会里的顽固派提供了要求削减和取消他们惶恐地称之为‘常备军’的部队的机会。直到1755年首次发布不断征召现役军队名册时,‘军队’才得到正式承认”(1974, p. 166)。

14 范纳(Finer)(1975, pp. 123~124);并参见巴尼特:“托利党是‘海洋派’,辉格党是‘大陆派’”(1974, p. 148)。

15 这是出自琼斯的一个说法(1966, p. 85)。

16 格雷厄姆(Graham)说:“直到18世纪,英国海军的活动范围很少超出欧洲舞台以外……疾病和大风几乎是最凶恶的敌人……然而,到17世纪末,造船和航海技术以及维护健康的方法的改善,使战船能够在海上停留较长时间,并能更远地离开本国港口(1948, p. 95)。

17 “较强的舰队一旦控制了海上交通,它就获得了近乎独占的垄断权”(格雷厄姆,1958, viii)。

18 西姆克斯(Symcox)(1974, p. 1)。

19 见西姆克斯(1974, p. 43, p. 49)。

20 见西姆克斯(1974, pp. 37~40)。然而,卡特认为,(奥兰治的)威廉在1686年获得了另外一个巨大的优势,这是他和国内对手之间相处气氛较好的结果。那就是重建荷兰海军的资金。它是通过一项决定筹得的,按该决定征收了若干种荷兰关税,并为此目的而向亲王交付了一笔可观的款项。因此,到1688年,荷兰的海军相当强大(1975a, pp. 24~25)。

21 见埃尔曼(Ehrman)(1953, p. 395)。

22 西姆克斯指出,虽然此次和前几次海战中主要的海军战术,是专为海战设计的“列队战船”之间的“猛烈对射”,但“海军炮火极不准确”;因此,他说,海战是“一种笨拙的、极不协调的行当”。在那种情况下,胜利取决于“有利

的位置和风向”(1974,p. 56, pp. 60~61, p. 64, p. 67)。

23 马汉(Mahan)(1889, p. 225)。

24 埃尔曼(1953, p. 398)。布罗姆利(Bromley)和赖恩(Ryan)指出:“荷兰人 1689 年还在同英国人争联合海军的指挥权, 1714 年却被迫投入 8 艘战船为国王乔治一世护航”(1970, p. 790)。

25 西姆克斯(1974, p. 147)。

26 通常是以法国在 1683 年至 1717 年的经济停滞来解释, 而经济停滞据说是由于南特敕令废除后胡格诺教徒移居国外引起的。正如斯克维尔(Scoville)所说, 这是“因此一所以”谬误推理的一个典型实例。固然, 以南特敕令的废除来作解释“无济于事”(1960, pp. 218~219), 但是, 大多数新教徒作为新改宗者留下来了。实际上, “宗教迫害似乎并未削弱和减少他们的能量, 而是增强了他们的决心。”(1960, p. 252)斯科维尔就此举出了各个方面的证据: 制造业、贸易、造船业、农业。关于这个时期法国的经济危机, 还可参见莱昂(1956, p. 152)。

27 马汉(1889, p. 226)。他认为, 正是由于一支强大的海军和繁盛的贸易的结合, 才使得“英国拥有了凌驾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的海上力量”(p. 225)。

28 见西姆克斯(1974, pp. 5~6, pp. 187~220)。

29 克拉克(1960, pp. 123~124); 并见西姆克斯(1974, pp. 68~69)。克拉克继续写道:“拥有较强舰队的一方能够封锁敌方的贸易海路, 但它自己的商船容易招致避开了舰队警戒的快捷海盗船的袭击。一个国家的贸易量越大, 越容易受到这种袭击。由于这些原因, 海盗私掠在法国十分盛行。”

30 西姆克斯(1974, pp. 222~223)。

31 布朗利(1950, p. 465)。

32 亨利·马丁(Henri Martin), *History of France*(波士顿, 1865, II, p. 167); 转引自摩尔根(Morgan)(1968, p. 174)。摩尔根指出:“赖斯韦克标志着路易十四末日的开端。赖斯韦克条约为他的毁灭放置了不祥之蛋, 乌特勒支条约则孵出了宣告他毁灭的无情之鸟”(p. 195)。哈泽德谈到该条约时说:“这位显赫君主的荣耀无疑已丧失殆尽!”(1964, p. 84)。

33 布朗利在谈到路易保留阿尔萨斯和斯特拉斯堡的原因时说:“因为法国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在他的盘算中习惯上总是居于中心地位, 所以他保留了对他的王国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1970, p. 26)。



34 见卡特(1975a, pp. 25~26)。

35 J.R. 琼斯(1972, p. 329)。

36 斯托克-彭宁(Stock-Penning)(1967, p. 113)。

37 J.R. 琼斯(1966, p. 93)。

38 见克拉克(1923, pp. 4~6, p. 121)。

39 见斯托克(1967, pp. 113~114)。正如威尔逊所说,荷兰的态度是“看风使舵,自私自利,息事宁人”(1968, p. 165)。

40 见卡特(1975a, pp. 30~31)。

41 默里指出,人们通常认为1603年的王室合并由议会的合并加强了。这“可能是一段美妙的历史,但在法理上是可疑的”。他认为,确切的法理陈述是:“每个王国的王位继承仍然取决于该王国的法律。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位继承法律是有差异的,虽然差别不大,一旦有某种意外情况发生,王位可能再度分离,各自遵循自己的继承制度……直到1707年的合并条约付诸实施以前,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王室是同时并存的(不受克伦威尔的干预)。在此之前,‘王位合并’是暂时的联合,不是永久合并。1707年的合并条款从根本上确立了不可分离的王位合并”(1961, p. 162)。由于1707年的合并,英格兰和苏格兰成了大不列颠。特雷弗-罗珀指出,1652年的合并实际上比1707年的合并更紧密,但显然未坚持下去(1964, p. 79)。

42 详细的政治进程,见布朗(Brown)(1964, p. 78)。

43 斯莫特(Smout)(1963, p. 256);并参见特雷弗-罗珀(1964, p. 78)。

44 见斯莫特(1963, p. 29, p. 238)。

45 见英什(Insh)(1952, pp. 32~37, pp. 51~55)。“但是,当这个时期曾阻止了英格兰布匹制造商竞争的贸易壁垒被合并条约拆除后,早先的苏格兰公司逐渐衰落下去。1713年2月15日,该公司在爱丁堡储存布匹的大厅被出售,一个月后,又卖掉了机器和余下的原料存货”(p. 55)。

46 见英什(1952, pp. 69~71)。凯兹(T. Keith)指出:1695年的法案“(在英格兰)引起了警惕。人们担心苏格兰人会逐渐占有越来越多的美洲市场,在那里他们已经非法地占有了很大的份额”(1909, p. 54)。并参见汉密尔顿,他认为,在17世纪后半叶格拉斯哥在大西洋贸易中的“比重迅速增长”(1963, p. 249)。斯莫特实际上正是根据这些事实来解释格拉斯哥商人反对联合的原因。“正因为格拉斯哥(在海外贸易方面)已经在向前推进,他们感到不合并更好”(1960, pp. 211~212)。

47 凯兹(1909, p. 60)。英什说：“1706年秋，欧洲事态的压力对英格兰—苏格兰关系再次产生了重大影响(1952, p. 80)。英格兰的盟国荷兰和奥地利为争夺新近从法国手中夺回的南尼德兰的控制权发生争吵。瑞典的查尔斯十二世刚刚打败了彼得大帝，征服了波兰，占领了萨克森，还威胁着波希米亚。路易十四力劝他南进打击奥地利。“同时，最重要的是，在东西欧都密布乌云的形势下，不能容许出现一个心怀不满而且可能独立的苏格兰去助长法国雅各宾派图谋的威胁，并为雅各宾派的活动提供基地”(1952, p. 81)。

48 老的王位觊觎者詹姆斯·弗兰西斯·爱德华(James Francis Edward)，这位圣乔治骑士，是站在法国方面的一位积极斗士。他要求继承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位，如能得手，无疑他就会单独接受苏格兰王位。琼斯认为，“正是由雅各宾派在苏格兰议会的举动，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成为紧迫的问题……头等紧迫的问题……(1704年苏格兰议会的一项法案)规定，安妮在苏格兰的继承人应是苏格兰王族的人，但不是~~不是~~在英格兰继承她的王位的同一个人……既然唯有合并才能消除(雅各宾派的人在苏格兰继承王位的)可能性，那就必须尽快合并”(1954, p. 73)。

49 雅各宾派的图谋在爱尔兰比在苏格兰甚至更受欢迎。在苏格兰，“詹姆斯二世和詹姆斯七世的宗教信仰始终是引起愤恨的因素，但爱尔兰人却因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而当然地更喜欢他”(皮特里[Petrie] 1958, p. 100)。英格兰人艰难地镇压了1689—1691年爱尔兰保王派流亡者发动的远征(见皮特里, 1958, p. 100~135)。英国人胜利了，而且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利默里克条约》(Treaty of Limerick)标志着旧爱尔兰的彻底结束，就像阿波马托克斯标志着旧南方的彻底结束<sup>[1]</sup>一样”(詹姆斯, 1973, p. 17)。

随后的刑法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官职和拥有土地，极富“震慑力”，致使爱尔兰人在1715年和1745年雅各宾党徒发动起义时也没有暴动。皮特里指出：“在其他两个王国并没有对[光荣]革命的反对派实行这种报复性惩罚。爱尔兰人在利默里克被诱降以后，就寄希望于军队去成功地抵抗征服者，就像不久前犹太人希望推翻颇为相似的希特勒的暴政一样。”(1958, p. 133)关于刑法的阐述，见詹姆斯(1973, pp. 22~25)。直到1713年乌特勒支条约签订之时，爱尔兰人仍有八九个团作为法军的一部分参加战斗，因此英国人仍然担心，

[1] 1865年4月9日，美国南军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向北方政府军投降，标志着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告终，它也标志着南部同盟分裂国家企图的失败。原文为Appomattox，为Appomattox的异读。——译者

雅各宾派在苏格兰的图谋的任何进展都会重新引发爱尔兰问题。

50 见英什(1952, pp. 74~77)。他说：“远征达连海峡的损失和挫折产生了贸易自由和进入英格兰殖民地的需要，这是促使苏格兰接受1707年合并条件的最主要的动机”(p. 50)。但伦曼(Lenman)在苏格兰问题的争论中反对强调进入殖民地市场的重要性(见1977, p. 55)。而且，1696年和1699年苏格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那是雅各宾派所说的“威廉国王的七个灾难年头”的一部分(见伦曼, 1977, pp. 45~52)。

51 伦曼(1977, p. 51)。并参见斯莫特：“一个大国如果有足够的勇气、经验、资金、人力和海上力量，是能够实现达连计划的。苏格兰人只有勇气，所有其它条件，包括他们有限的知识，都极为缺乏”(1963, p. 252)。斯莫特还认为，达连计划的失败只是17世纪90年代的四大灾难之一，其他三大灾难是英法战争的负面后果，四年的饥荒，影响到英格兰、联省共和国、南尼德兰、法国、北美和挪威等国贸易的激烈的关税战(见 pp. 244~253)。

52 赖利(1969, p. 498)。卡斯泰尔斯(Carstairs)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从长远看，合并由英格兰方面的压力促成，但从短期看，苏格兰人之所以在武装抵抗数世纪之后终于同意合并，“可能是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促成”。(1955, p. 65) 斯莫特对英格兰的政治动机和苏格兰的经济动机作了区别(见1946b, p. 462)。

53 见哈里斯(R. W. Harris)(1963, p. 68, p. 70)。

54 伦曼同我一样对此表示怀疑：“要对这场危机静观忍耐，需要有比苏格兰领导集团更坚强的意志和精神，还要看英格兰在欧洲深深卷入一场巨大冲突的时候是否真正愚蠢到还要在北部边境冒险开战”(1977, p. 57)。

55 斯莫特(1963, p. 273)。

56 见英什(1952, pp. 84~89)和伦曼(1977, pp. 58~60)。卡斯泰尔斯怀疑这些举措究竟会带来多少直接利益。他认为，英属北美和西印度贸易的扩展只是1750年以后才出现。他说，合并并没有促成亚麻工业的发展。直到该世纪中叶，北美的进口主要由德意志和奥地利的亚麻制造商供货，这些货物以“退税再出口”方式经过英国转销美洲。只是1742年建立补贴制度以后，苏格兰的亚麻出口贸易才开始发展(见1955, pp. 69~70)。伦曼持折衷看法。他同意卡斯泰尔斯认为合并对苏格兰最初没有带来什么利益，但他认为1727年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这个特别的夏天最初几只燕子的到来”(1977, p. 66)。

57 “法国的表现从未像路易十四接受西班牙的查尔斯二世的遗嘱的直接后果那样严重地威胁到英格兰和联省共和国……西班牙帝国的庞大市场岂不要变成法国商人的私家猎场？”[德约恩 1978b, p. 235]。古伯特注意到英国人和荷兰人多么快做出了反应：“阿先托垄断权转让书签字后仅仅几天，后者就结成‘海牙庄严同盟’(Grand Alliance of the Hague)。在海牙，皇帝和两个海上强国紧紧站在一起，限路易十四两个月内达成协议，否则战场相见，其目标是撤销西班牙王位继承的决定，封闭法国与尼德兰联系的渠道，控制意大利和地中海，让同盟国进入西班牙殖民地，同时把法国排除于贸易之外” (1970a, pp. 237~238)。

58 沃德对各个条约的具体内容作了阐述(1908, pp. 440~450)。

59 卡特(1975a, p. 26)。

60 普拉姆(1966, p. 29)。他说：“在 18 世纪的许多英国人看来，战争是……黄金般的机遇，可以使邻国变成乞丐，占有世界财富，还可以暴露出国家容忍那些甘受教皇压榨的、贪食的、软弱的、穿木屐的奴隶式的法国人的耻辱”(p. 14)。并参见萨瑟兰(Sutherland)(1956, pp. 56~57)。

61 汤普逊(1966, p. 436)。

62 坦伯利(1909b, p. 197)。西利持同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个时期英国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既是商业国家，又是一个好战国家”(1971, p. 88)。

63 见迪克森(Dickson)：“(1739 年)奥地利与英荷的谈判立场显然互不相容。英国人和荷兰人希望把奥属尼德兰作为经济殖民地保留下来，部分地由奥地利支付费用的荷兰卫戍部队来守卫，这一要求在 1715 年的屏障条约中曾得以实现……在经济上，英国在 (1746 年) 要求保留它在 1746 年前的关税利益和对尼德兰的贸易顺差，而这一顺差看来是靠关税取得的。英国对佛来芒人提出的降低英国关税和直接进入东印度贸易的要求则不屑一顾”(1973, p. 83, p. 107)。

64 坦伯利(1909b, p. 204)。见 V.L. 布朗：“走私贸易在每个时期都是南海公司经营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1928, p. 179)并参见纳尔逊(Nelson)(1945, p. 55)。

65 坦伯利指出，在整个 18 世纪，西班牙“有时是消极的旁观者，往往是直接的敌人，从来不是英国的朋友”。然而政府在 1739 年的观点是，“把西班牙推入法国的怀抱，就会危及英国在新世界的主导地位的前景”(1909b,

p. 198)。

66 再参见坦伯利：“流行的观点认为，英国人维护侵权者和私人非法贸易的愿望在内阁中有重大影响力。对文献的研究证明这种观点不能成立。内阁的厚爱留给了南海公司。财政纽带把该公司与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纽带促使沃波尔在 1720 年对公司加以拯救，而该公司的回报却是在 1739 年使他垮台”(1909b, p. 222)。

67 见 K.G. 戴维斯：“总的说来，我倾向于认为，英法之间的大西洋战争(美洲战争除外)给英国种植园主带来了更多的利益而不是损害，虽然应该承认有许多例外”(1960, p. 109)。戴维斯在这方面举出 1739—1748 年和 1689—1713 年的战争为例。

68 瓦伊纳(Viner)(1960, p. 84)。“国会在长期争辩后拒绝把这种作法认定为非法。”

69 费伊勒(Fayle)(1923, p. 288)。的确，法国人甚至走得更远，“力图把护航与真正的防御任务联系在一起……更令人吃惊的是，……法国的战船实际上租给了商人，……为了在船货价值得到安全保障而利润到手后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

70 伦纳德(Leonard)(1958, p. 192)提供了 1740 年的以下数字：法国，160 000；普鲁士，84 000；奥地利，107 000；英国，59 000(包括汉诺威人的)。

71 里奇蒙(Richmond)(1928, p. 173)。

72 安德鲁斯(1915, p. 780)。

73 见卡特(1963, pp. 820~821)。

74 见克里斯特洛(Christelow)(1946, p. 24, p. 29)。然而，那是西班牙方面的一个错误。“西班牙不明智地卷入七年战争使英国人在冲突结束时巩固了他们前些年取得的利益，而且为他们获取西属殖民地的财富打开了新的通道”(布朗, 1928, p. 186)。

75 德里欧(Dehio)(1962, p. 117)。

76 达比(1973, p. 304)。

77 塔克(Tucker)(1963, p. 214)。

78 见威尔逊(1977b, p. 116)。

79 见古伯特(1965, p. 473)。

80 见古伯特(1965, p. 473)；亨利(1965, p. 455)；拉布鲁斯(1953,

p. 22)。

81 塔克(1963, p. 214)。

82 见弗林恩：“在西欧，大概从来没有一场饥荒有 17 世纪 90 年代那场饥荒那样剧烈和广泛”(1974, p. 301)。弗林恩指出，英国是一个例外。然而在法国，“绝大多数人口受饥荒之苦，甚至实际上饥饿而死(古伯特，1970a, p. 216)。彭特兰对英国作了复杂的解释。1690—1710 年间英国人口增长率很高。那时农产品价格高涨(可能由于欧洲普遍发生饥荒)。由于这个原因，还由于这个时期青壮年人稀少(由于先前人口增长率低)，农场雇佣机会增多，导致早婚和高出生率，而这又导致 1705—1710 年后机会的减少和逆转。1720 年以后，价格低落，死亡率上升，其原因是 18 世纪 20 年代瘟疫大流行——“这是 10 年来生活条件恶化的必然结果，而生活条件恶化是伴随着人力(而不是饥荒)太多和农业产出超过需求而(不是饥荒)过剩造成的”(1972, p. 174)。

83 见古伯特(1970d, p. 60)和雅卡特(1975, p. 187)。

84 兰伯特(1964, pp. 606—617)。莱因哈德和阿门高(Amengaud)认为，最后一次大瘟疫发生在 1668 年，此后瘟疫“不多见了”(1961, p. 131)；但他们提到 1694 年西班牙的一次瘟疫。勒·鲁瓦·拉杜里说到，尽管有马赛的瘟疫，法国人口在 1720—1737 年间仍大为增长(1975a, p. 364)。

85 德普雷(Deprez)把 1740 年称为“欧洲人口史的大转折点”(1965, p. 626)。通常的解释是瘟疫和饥荒的结束。见勒·鲁瓦·拉杜里(1975a, p. 388)和赫莱纳(Helleiner)，他们认为灾荒结束了(1967, p. 95)。

86 赫夫顿(Hufton)(1974, p. 15)。

87 雅卡特(1975, p. 187)。然而，古伯特把法国饥荒的结束归因于较好的气候，较为温暖少雨(见 1970d, p. 63)。勒·鲁瓦·拉杜里强调关键的因素是普遍湿润但并不寒冷的气候，至少在法国是这样(见 1967, p. 281)。莱因哈德和阿门高持同样的观点。

88 范登布罗克(Vandenbroecke)(1971, p. 38)。论点是，与谷物相比，马铃薯给每个人提供了双倍卡路里的食物。虽然 1 英担<sup>(1)</sup>马铃薯的卡路里含量仅约 1 英担谷物的 1/5，但产量是后者的 10 倍。“而且马铃薯是夏熟作物，因此较少受天气影响。谷物种植总是担着风险，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然

---

[1] 1 英担(quintral)为 112 磅，约等于 50.8 千克。——译者

而，萨拉曼(Salaman)(1949, pp. 455~456)认为，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间，马铃薯才普遍成为英国穷人的食物，虽然两个世纪以前已在稳步地推广。他说，直到1775年左右，土豆主要用作动物的食品。在土豆能够成为穷人食物的一部分之前，有必要证明它值得用作猪的饲料。”

89 希尔(1969, p. 256)。

90 并参见科尔曼(1977, p. 125)，明格(Mingay)(1963, pp. 81~82)和拉夫罗夫斯基(1960, pp. 354~355)。明格指出，1660年和1750年间小地主阶层明显衰落(1968, p. 31)。

91 “从1750年的情况看，英国的很大一部分土地显然已经被圈占了”[霍尔德内斯(Holderness)1976, p. 52]。

92 “甚至在那些18世纪仍保持敞田制的乡村，也往往强烈地倾向于只保留少量的大种植单位”(明格, 1962, p. 480)。这种情况似乎已经在英国出现，尽管由于马铃薯的高出产率靠很小一块土地就能维持生活。(范登布罗克, 1971, p. 38)这可能意味着，谷物生产在经济上占据着关键地位。

93 谁能承担这样的费用？看来是那些总收入已经较高的人。贝罗克(Bairoch)认为，也许是通过周转，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中获得购置新农具的资金(见1966, p. 16)。

94 “假如没有萝卜，单是维持牲畜的生存，就会在冬春季节遇到麻烦”[厄恩利(Ernle), 1912, p. 176]，不仅萝卜，还有三叶草、驴喜豆、车轴草、红色剪秋罗和黑麦草，到1720年时，在整个英国都已广为人知(见霍尔德内斯, 1976, p. 65)。

95 实际情况是，小农场主在好年成也只能为市场生产一小部分剩余产品，在歉收年成就减少收入。但他们之所失就是大农场主之所得。后者由于这些小生产者退出竞争而发意外之财”(古尔德1962, p. 321)。

96 厄恩利(1912, pp. 168~169)；古尔德(1962, p. 323)和哈特韦尔(Hartwell)(1969, p. 25)。

97 约翰(1969, p. 171)，并参见威尔逊(1965, p. 245)和霍尔德内斯(1976, pp. 74~75)。

98 R. 艾什顿(R. Ashton)(1969, pp. 49~50)。

99 明格(1960, p. 337)。1700—1750年间英国谷物出口从3.7%增长到19.6%。见T.S. 艾什顿(1960, p. 12)。斯利彻·范巴思认为，在1690—1720年

间“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的加权平均比价”出现了暂时有利于农业的转变，这是在1620—1740年这段时间内对农业不利的比价这一背景范围内发生的暂时的倒转(1963a, p. 211)。

100 见古尔德(1962, pp. 331~332)。

101 “1660—1760年间(英国实际工资的)提高是实在的,但并不是很大的改善……到1750年,情况毕竟比1600年好得多。1670年以后物价上涨率的降低,1750年前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农业(特别是食物)剩余量的积累,经济活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的复苏,是1750年前实际工资增长的原因”。(1976, p. 204)。

即使实际工资增长了,失业不是也增长了吗?是的,失业也增长了,不过部分地由那个时期的另外一些行当作了弥补。工人们成了私酒酿造者和绿林好汉。妇女从事纺织。渔业有了发展(这是“穷人的最后一点依靠”)。男人们宁愿划着小船在大海上艰苦谋生。流动商贩的数量增加了。甚至建筑业也出现了繁荣,几乎是在相反方向上与出口的繁荣同时并进(见T.S. 艾什顿, 1959, p. 138)。尽管这个时期实际工资有了增长,但城市生活质量极低,工人们几乎不能挣脱小旅店的处境。“在高雅和奢侈之间,到处弥漫着肮脏和疾病,在乔治一世统治时期和乔治二世统治初期<sup>(1)</sup>,伦敦是一个恶臭盈室、遍地泥泞、污尘四溅、贫民窟不断增多的大都市(见普拉姆,1966, p. 17)。

102 吉尔博(Gilboy)(1936, p. 613)。的确,这个过程是循环式的。较高的实际工资导致饮杜松子酒的人口增加,后者又要求增加谷物供应。如果谷物供应由于某种原因而增加过多,更多地销售杜松子酒就能摆脱这一困境。见钱伯斯:“杜松子酒时代并不是什么伦敦民众不可思议的嗜酒如命的反常行为的表现……连年丰收扩大了谷物供应,而一系列的时疫又减少了消费粮食的人口。1739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开始时,谷物出口下降了,其他的谷物出路部分地被封闭了……伦敦的种族自杀的结果,帮助了内地的农民,他们正在经受丰收的折磨,但引起他们怨声载道的过剩,由于酒巷子猛增而部分地消除了”(1957, p. 44)。

然而,中部农民得不偿失。伦敦的蒸馏和酿酒业者兴起了利用养牛养猪的废料的连锁活动。这一活动盛极一时。伦敦人消费的肉和奶越来越多地来自18世纪的伦敦城区养的肉猪和奶牛。伦敦附近六郡的农民由于“如今已是

[1] 英王乔治一世在位时间为1714—1727年,乔治二世在位时间为1727—1760年。——译者



自成体系的‘资本主义的’肉类生产”的激烈竞争而大遭其殃〔马塞厄斯(Mathias)1952, p. 254〕。

103 见奥姆罗德(Ommrod)(1975, pp. 39~40)。补贴是支付给大宗产品的。大麦得以“充气”。它的出口因受到鼓励而超过了其他谷物。这也是荷兰的杜松子酒时代。见约翰(1976, p. 53)。

104 “荷兰人或许会陷入进口(英国谷物)的陷阱而受到伤害。但人们也可能像陷入廉价的或有补贴的谷物陷阱一样, 陷入没有补贴的谷物的陷阱”(德弗里埃, 1975, p. 55)。荷兰并不是唯一的出口市场。葡萄牙是第二个重要市场。见费希尔(1971, p. 64)。

105 见斯利彻·范巴恩(1963a, p. 212)。如果说价格在1720—1740年间再度下降, 难道那不是英国增加产量的部分反应吗?

106 约翰举出了英国和波罗的海地区年均谷物出口量的惊人数字。1650—1699年间波罗的海地区输出谷物每年约58 800拉斯特(Last) [1拉斯特约相当于10.5夸特(quart)]<sup>[1]</sup>, 英国约输出2 500拉斯特; 1700—1749年波罗的海的出口量下降到31 000拉斯特, 英国上升到42 000拉斯特。两者的总和从58 300拉斯特上升到73 000拉斯特(见约翰, 1976, p. 56, 表6)。并参见里普森(1956, II, p. 460), 让南(1964, p. 332)和奥姆罗德(1975, p. 38)。

107 约翰(1976, p. 59)。

108 *Consideration on the Effects Which Bounties Granted on Exported Corn, Malt and Flour have on the Manufactures of this Kingdom* (London, 1768, p. 61, p. 62脚注), 为约翰(1976, p. 56)所引用。

109 “要恰当地认识一个复杂多变的领域, 不能采取教条式方法……我们倾向于认为, 至少就小麦而言, 市场的自发性可能被严重夸大了”〔格兰杰(Grange)和埃利奥特(Elliott)1967, p. 262〕。

110 见奥姆罗德(1975, p. 40)。

111 见德·弗里埃(1974, p. 171)。

112 见埃贝尔, 他认为英国的出口在1711年至1740年间堵住了法国和德意志的生产通向世界市场的道路(1973, p. 265)。杰森(Jansen, J.C.G.M.)指出, 在1680—1740年时期, 南林堡(South Limburg)<sup>[2]</sup>的农业生产者由于粮价

[1] 1夸特谷物约等于0.25吨, 1拉斯特谷物约等于 $10.5 \times 0.25 = 2.625$ 吨。——译者

[2] 在南尼德兰即后来的比利时境内。——译者

下跌减少了普通谷物(Kortkoren 和饲料用的斯佩尔特小麦)的种植,改种“高价小麦”(以及燕麦),“以弥补粮价跌落的损失”(1971,p.255)。

113 见肖尼(1966a,p.242)。Ager是与Saltus相对而言的耕垦地,Saltus是天然植被覆盖的未垦地(1966a,p.640)。

114 见明格(1956,p.324,p.336)。

115 见T.S.艾什顿关于18世纪后半叶的论述:“当人口迅速增加而且英国从农业转向加工制造业时,就很难避免从剩余农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1969,p.50)。

116 见斯利彻·范巴恩(1977,p.75)。

117 见恩贾尔伯特(Enjalbert)(1950,p.116)和布罗代尔(1951,p.71)。

118 弗雷什(Frèche)(1974,p.835)。

119 见勒·鲁瓦·拉杜里(1975a,pp.397~400)。

120 柯伦贝兹(1977a,p.547)。他说道:“障碍仍然太多,特别是在冶金业,尽管经济变化有利于富有铁矿和森林资源的俄国”。见伊斯特:“像煤一样,铁矿的大规模开采要在地图上留下标记,需要等到19世纪”(1951,p.512,加了着重符号)。

121 科尔曼(1977,p.151)。他说,1650—1750年这个时期“是英国工业的投资和创业时代,尽管没有像下一个世纪那样引人注目的变化,但至关重要是打下了比较牢靠而可塑的基础,因此才能推进以后的革命”。

122 见威尔逊(1977a,p.8)。

123 明格(1960,p.373)。

124 贝罗克(1966)对此作了详细分析。既分析了铁在工具制造中的使用情况,也分析了所用的工具的数量增加情况。他还着重考察了马的使用的增加情况和钉马掌的新方法。他认为,这个方面出现变革的关键时期在英国是1720—1760年,在法国是1760—1790年,或者甚至是1790—1820年。参见钱伯斯,他认为,17和18世纪的英国农业对工业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贡献:为铅、铁、煤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本和领导力量;消费了工业产品;促进了运输的变革,特别是大路的畅通(1957,p.36)。

125 约翰认为,这些因素“加速了将煤用于冶炼的方法的探求”,导致了1688—1698年间反射炉的发明,他还提醒我们,“1714年至1763年间海军规模扩大了两倍”(1955,p.330,p.333)。柯林贝兹指出,一旦煤代替木炭用于炼铁,铁的生产与稠密人口地区脱节现象即告消失。他认为这是铁的生产明显

地从瑞典转向英国的原因(见 1974, pp. 206—207)。

126 见伯特(Burt)(1969, p. 266)。

127 古尔德(1962, p. 320)。与这一看法不同的是,古尔德认为,要想找出收成波动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的任何尝试都是“冒险的”(p. 319);他表明那样的波动可能引起相反的结果。威尔逊不太相信古尔德的观点:“然而,从复辟到 18 世纪晚期工业化这段时期制造业的急剧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生活必需品的总价格水平的稳定甚至回落,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77a, p. 13)。

128 见奥姆罗德(1975, p. 40)。1678 年主要针对法国的大禁令,那时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阿斯利, 1897, p. 338)。

129 见托马斯(P. J. Thomas)(1963, p. 68, p. 101, p. 125, p. 139, p. 150, pp. 163—164)。尽管如此,在整个 18 世纪,毛纺织业仍然是英国的主要工业(迪恩[Deane] 1957, p. 207),而且在 1700 年到 1740—1750 年间经历了一个“显著发展”时期(p. 221)。

130 斯梅尔策(Smelser)(1959, p. 53)。赫克舍认为,法国与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区别在于英国鼓励进口替代。他感到需要补充一点:“也许最重要的”是英国并未严格实行它的进口禁令,而法国却那样作了(1935, I, pp. 174—175)。真有这方面的证据,还是这仅仅是自由派的(反法的)偏见?

131 沃登(1864, p. 373)。

132 对亚麻进口的依赖程度,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哈特(Harte)认为,“在 18 世纪,英格兰消费的亚麻中,自己生产的可能比从苏格兰和爱尔兰进口的总和还要多”(1973, p. 107)。也许是这样,但从各种渠道进口的亚麻比本地生产的更多,而且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亚麻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33 哈特(1973, p. 76)。并参见戴维斯(1962, pp. 287—288)。“在 1690 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中,名义上对大部分品种的亚麻征收的商税……大致是以前的 4 倍”(哈特, 1973, p. 78)。哈特认为,法国亚麻受到打击是由于直接的竞争,而德意志、佛来芒和荷兰的亚麻受到打击则“纯粹是由于财政上的原因”(p. 97)。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自己也承认,国家财政的紧迫需要,为支付战争费用而不断增加税收的需要,所产生的副作用同对法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副作用一样大。

134 见古尔文(Gulvin)(1971),汉密尔顿(1963, p. 255)和杜里埃(Durie)(1973, p. 47)。坎贝尔认为,“有充分的经济上的依据可以说明,只要其他事态

正常进行,1707年的合并肯定会促进苏格兰经济[专注于]凭借与英格兰的联系可以保证其产品销路的领域”(1964, p. 477)。

135 斯莫特坚持认为存在着这种结合。他表明,对于那种把工业革命视为资产阶级对贵族的胜利的“简单化的陈腐之论”,苏格兰提供了一个“讽刺性的扭曲”的实例。“18世纪的(苏格兰)地主与中产阶级并肩携手发展一种有活力的新型经济……——而且当他们取得成功时,就成了一个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sup>[1]</sup>,他们的特权和领袖地位烟消云散(1964a, p. 234)。

136 见詹姆斯(1973, p. 277)。他认为,爱尔兰甚至比美洲殖民地更像是一个殖民地,因为“爱尔兰的政府依靠征服,而且不能摆脱其军事血统”(p. 290)。卡伦(Cullen)认为,早在17世纪,爱尔兰在英格兰体制中的地位“某些方面已是殖民地式的”,而在18世纪已“完全依附于英格兰”(1968, p. 2, p. 46)。

137 见詹姆斯(1973, pp. 191~192)。

138 见卡伦(1968, p. 53)。

139 见卡尼(Kearny)(1959)。卡伦认为,羊毛法案与牛法案和历次航海条例相比,后果不那么严重,却更为恶劣,其原因就在于,后者只是规定英格兰贸易的英格兰人的法案,而羊毛法案是关于爱尔兰出口的立法,而且是表明不列颠国会有权为爱尔兰立法的明显实例”(1967, p. 2)。

140 见柯伦贝兹(1965, pp. 385~386); 吉尔(Gill)(1925, p. 31); 沃登(1864, p. 393)。

141 “那时爱尔兰人不是把牛卖给英国商人,而是把牛肉、猪肉和奶酪卖给世界各地的顾客”(詹姆斯,1963, p. 576)。另见詹姆斯(1973, pp. 190~217)。然而,卡伦指出,航海条例有一个重大的消极后果:“由于缺乏直接的殖民地贸易和转口贸易,就削弱了对成熟的金融体制的需求”(1977, p. 171)。

142 希尔([Hill]1969, p. 164)。

143 拉尔夫·戴维斯认为,17世纪90年代是英国保护政策的开端期。“到1722年,工业保护显然已经执行并得到承认”,而且在此后50年间扩大了范围(1966, p. 306, p. 313, p. 317)。

---

[1] 弗兰肯斯坦是玛丽·谢利(Mary Shelly)剧作 *Frankenstein* 中的男主角,为一年轻的医学研究生,研制成一个怪物,而自己为怪物所毁,由此成为典故,喻作法自毙。  
——译者

144 即使如此,1740—1790年这个时期也是英国亚麻生产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哈特,1973,p.107)。然而,杜里埃指出,这个时期英格兰亚麻在出口市场上还不是苏格兰亚麻的竞争对手(1973,p.37)。

145 英伯特(1965,p.385)。

146 见门德尔斯(1972,pp.258~259);参见马尔科维奇(Markovitch)(1968b,p.579)。然而,莱昂认为,在18世纪,法国在总产量中所占的百分比落后于英国,在工业方面——是1/5对1/4(1970c,p.528)。赫克舍这位英国的热烈维护者虽然贬低法国,但承认英国的优势不在数量,而在于“技术”。为什么不在数量?因为法国革命爆发时,即使在英国,工业化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其形成阶段,创新只是在孕育之中,还未成为现实”(1935,I,pp.202~203)。

147 见莱昂(1970b,pp.229~230)。C.E.拉布鲁斯说:“在竞争中,18世纪已经羽翼丰满的资本主义轻而易举地胜过了封建的旧阵地及其传统的收入项目”(1970,p.704)。

148 内夫(1968,p.149)。克鲁泽(Crouzet)认为两国增长率旗鼓相当时期是1700—1750年,但认为在1750—1800年英法之间出现了反差(1966,p.268)。

149 柯宁罕姆(1892,II,pp.371~372)。

150 马尔科维奇(1968b,p.578)。

151 见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ehl):“在英国,国内市场太小,内部产生的总需求水平不够充分,自身难以促发和支撑一场工业革命。法国是一个大得多的国家。在那里,国内需求足以满足一场工业革命的需要。法国不需要依靠世界市场来补充其总需求。英国不得不依靠国际需求作为补充,如果单靠它自己过于狭小的国内市场,难以有力地推动工业化”(1976,p.272)。

152 见布尔(Bouille)(1975,p.73)。荷兰人又以奴隶贸易来帮助南特商人(希尔,1972,pp.76~80)。惠茨·德兰普斯(Huetz de Lamps)注意到,在波尔多商人那里也有同样现象。“波尔多的经济生活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样严重地依赖过荷兰人(1975,p.614)。莫里诺认为,法国的巴斯克地区,特别是巴约讷(Bayonne),作为荷兰与西班牙的合法和非法贸易通道而起着关键作用(1964a,p.326)。

153 见莱昂(1970c,pp.525~526);并见勒·鲁瓦·拉杜里(1974a,p.155)。当然,朗格多克象波南特一样,也处于五大包税区之外,但它的出口市场主要是地中海,在那里,法国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能够较有利地与英国和

荷兰竞争。卡里尔(Carriere)说到,1689年以后朗格多克与马赛紧密联系在一起(1974,p.169)。

154 见马尔科维奇(1968b,p.556)。

155 见博塞尔(Bosher)(1964,p.66,p.69)。

156 英国的真正的国民财富,应按照J.H.普拉姆的估量来评价,他根据18世纪初的情况认为:“在1714年时,英国是一个城市狭小和人口分散的国家;它的人民的财富与法国和荷兰的人民的财富不能相比”(1966,p.28)。

157 见威尔逊。他说,“1700年左右,英国人开始报怨荷兰商品的成本和质量”(1968,p.236)。罗辛认为,相对于英国而言,荷兰的烟草工业于1720年开始衰落(1976,pp.501~502)。博克瑟说道,到18世纪30年代,英国的造船业者的技术已领先于荷兰(1964,p.149)。卡里尔认为,1700年法国南部生产的增长,是荷兰(还有英国)在地中海的势力衰落的结果(1974,p.172)。

158 见巴克豪森(Barkhausen)(1974,p.246),并参见威尔逊,他提供的数据表明,这个时期荷兰的税收约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3倍(1969b,p.120)。

159 见斯沃特(1975,p.47)和德弗里埃(Devries)(1975,p.56),他说道:“这个共和国的大规模的慷慨救济决定了一种最低工资标准,它高于许多雇主在某些行业支付的工资,这就(使得)失业与劳动力短缺同时并存。”

160 科斯曼(1975a,p.53)。这又伴随着环境的灾难——攻木蛉(T·Navalis)蛀毁了堤上的木椿,水污染迫使布匹染整业者进口纯净水用于染整。见诺伯斯(Knoppers)(1975b),卡特(1975a,p.67)和范·菲恩(1950,p.73)。1731年以后,荷兰投资兴建石头防护设施,但这十分昂贵。

161 见莫里诺(1965,p.170)和克莱因(Klein)(1970,p.33)。哈泽德(Hazard),清楚地描绘了这一情景:“荷兰是繁荣的,荷兰是强大的。即使在商业领域它遇到了英国的竞争;即使1688年以后它开始看起来像是一条大船旁边的一叶小舟,即使它逐渐失去了曾使它成为海上殖民强国的战斗精神和冒险精神,也绝不能说改变了的环境已使它贫穷不堪。它是富裕的,而且享受着富裕的果实”(1964,p.96)。

162 威尔逊(1957b,pp.27~28)。“在整个18世纪中叶,英国出口贸易的主要推动因素是……殖民地贸易”(戴维斯,1962,p.290)。

163 见克拉克(1923,pp.135~137),安德鲁斯(1929,p.285),奥格(Ogg)

(1970, p. 261), 以及霍芬登(Hoffenden)(1970, pp. 490~491)。

164 见彻里(Cherry)(1953, p. 119)。

165 英国政府政见上的摇摆不定无疑是经济现实动荡不定的反映。“18世纪上半叶(在世界贸易方面)的有限的进展,可能大都发生在头20年到25年之间,在18世纪40年代更强劲的、多方面的发展高潮开始到来之前,前进的运动停顿于20年左右,随后的数十年才发展成日益强劲的运动”[迪恩和科尔(Cole), 1962, p. 61]。

166 莫雷诺·弗拉吉纳斯(Moreno Friginals)把糖称为“最主要的世界产品,也就是说,它是在国际商业交易的总价值中占据着顶尖地位的商品”(1978, I, p. 22)。

167 “奴隶贸易在欧洲和美洲的重要性不在于非同寻常的利润——那可能是神话——而在于它对加勒比热带经济的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戴维斯, 1973b, p. 137)。

168 “1701—1725年,(法国的)发展很快,以致……法国人不仅供应法国,而且在大陆市场,特别是在汉堡、佛兰德斯、荷兰和西班牙以及斯特雷茨(Straits)能够以低于英国人的价格出售商品。(法国人)与葡萄牙人一起从巴西向立范特供应食糖”(安德鲁斯, 1915, p. 550)。英国糖的再出口贸易不断衰退,它在此项转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698—1700年的37.5%下降到1733—1737年的4.2%(见谢里登, 1957, p. 64)。在此同时,它却是“法国最富有活力的经济部门”(布尔, 1972, p. 71)。并参见莫里诺·弗拉吉纳斯(1978, I, p. 27), 莱昂和卡里尔(1970, p. 197)。

169 莫里诺·弗拉吉纳斯认为这些“经济和技术”因素的转折点发生在1730年左右(1978, I, pp. 32~34),它与安德鲁斯所说的英国政策的转折点密切相关;1731年,禁止非英国糖进入英国和英属殖民地的法案没有通过(1915, p. 772)。梅(L. P. May)对1673—1757年法国在马提尼克岛的保护主义政策的衰落表示惋惜,这可能是糖的力量标志(1930, p. 163)。

170 维拉尔(1974, p. 323)。然而,从绝对值上看,法国的贸易在发展。罗马诺说到,在18世纪——除战争时期以外——,“法国商业活动在内容和结构上处于良好状态”(1957, II, p. 1278)。

171 K. G. 戴维斯(1957, p. 2)。其他的竞争者是葡萄牙、法国、英格兰、瑞典、丹麦、勃兰登堡和苏格兰。

172 见K. G. 戴维斯(1957, p. 13)。

173 垄断是渗入非洲的皇家合资公司(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s)的垄断,它于1672年由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 Company)接替(见邓恩1972, p.20)。

174 见K.G. 戴维斯(1957, pp. 335~343)。

175 见帕里(1961, p. 175)。

176 沃德尔(Waddle)(1960, p. 9)。

177 帕里(1961, p. 176)。

178 见里奇(1967, 356), 他引用马拉奇·波斯特勒斯维特(Malachi Postlethwayte)论述乌特勒支条约的阿先托条款的话说道:“一项条约几乎没有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利益,这实属少见”。应该注意的是,种植园主得到了他们想要的——1648年垄断权的废除,而奴隶贩子则在1713年得到了阿森托特权,在这两个年代间隔期里,输入牙买加的奴隶增加了2倍,总人口增加1倍,“这样,当乌特勒支条约结束法国的战争之时,牙买加终于成了一个地道的糖的社会,完全由大种植园主控制”(邓恩,1972, p. 165)。因此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保护他们的实力地位。

179 阿先托“妨碍了被牙买加视为它自己的特权的贸易”[唐南(Donnan)1930, p. 442]。唐南引用了一本1731年在伦敦出版的书中的话,该书题为*Importance of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in America to this Kingdom*, 其中说道:“牙买加岛直到1716年还很繁荣,进行着可观的贸易,其数额之大几乎前所未见;在该项贸易中他们雇用了1200至1500人。那既是对他们特殊机遇的有力保护,又使他们从到那里花钱的众多人群中获利。这些人中不少就是本地居民,或者在那里结了婚,或者在那里出生。那里的贸易尽管给该岛带来那样非同寻常的利益,他们靠那样的贸易每月能赚25%~30%的利润,一年通常能赚到30万至40万金币,但是,在1716年,自从阿先托代理商进驻西印度群岛后,那里的贸易虽然没有彻底遭到破坏,然而已受到严重影响,不但贸易量微不足道,而且极不稳定,以致眼下人们认识到,现在阿先托公司和私商雇用的人加在一起还不到从前受雇人数的一半。这对牙买加岛的恶劣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容易感受到的”。

阿先托除了使那些在牙买加合法地从事奴隶贸易的人们获利,还损害私掠者的利益:“由于私掠者们的生计依靠对西班牙船只的袭击,他们惊讶地看到,保护在加强,牙买加人与西班牙人之间的半合法的(奴隶)贸易在发展”(内特尔,1931b, p. 6)。他们因此与种植园主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阿先托



人”。私掠者的这种不满导致了深远的后果。正如佩尔斯指出：“人们普遍承认，在威廉国王的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私掠者的失业几乎在世界各地导致了海盗猖獗。而乌特勒支和约签订以后，要求美洲的英国和西班牙水手不仅要忘记两次漫长战争的传统，而且要忘记一个世纪之久的械斗和劫掠，实际上，令人惊奇的不是他们曾一度继续进行过他们习以为常的敌视和抢劫，而是他们竟然终于完全平静下来了”（1963, p. 17）。

180 见彭森(Penson)(1929, p. 345)。无论如何，法国人在走私贸易方面干得并不很出色。见佩尔斯：“法国人在走私贸易方面相对失败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荷兰人和英国人销售的货物价格比他们的价格更低廉……使法国竞争者吃亏的并不是他们对超额利润的偏爱，而是他们的日常费用太高。法国人的船运费用似乎比英国人的费用更高，而且由于……在这项贸易中装备了更多的武器和人员，英国人的优势地位必然更为加强，特别是英国人有时还得到瓜达-科斯塔(Guado-Costas)救险护航队的救助”（1960, p. 132）。法国人高昂的船运费用在整个18世纪始终是一个限制因素。诺伯斯指出：在1785年，“法国商人得到了给法国海军供应木材的合同后，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北方公司’。然而，民族主义的考虑终究未能胜过国外运货商的费用低廉得多的事实。1786年，法国海军取消了给予该公司的合同，把它转让给了荷兰货运商”（1977b, p. 1）。

181 见H.E.S. 费希尔(1963, p. 219)。

182 见哈里(Haring)(1947, pp. 335~347)。

183 见约翰(1953, p. 154)。然而有人认为商业利益被夸大了。麦克拉克伦甚至把那些利益称之为错觉。然而，如果真是那样，就很难理解西班牙人为什么一直对南海公司的利润感到恼火。见希尔德纳(Hildner)(1938, pp. 322~323)。而且，当1748年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签订和1750年马德里条约签订以后，阿森托垄断权则被放弃，英国人看来就稳稳地获得了贸易优势[见塞勒(Scelle)1910, p. 658]。

184 马森(Marsson)(1967a, p. 522)。

185 见塞诺沃迪亚努(Cernovodanu)(1967, p. 457)。

186 见博诺(Bouo)(1964, pp. 51~61)。法国人还在1687年与的黎波里签订了一项条约。

187 见帕里斯(Paris)(1957, p. 91)。法国与萨布莱姆-波尔特(Sublime-Porte)之间的外交关系在下一个世纪一直动荡不定(见帕里斯，

1957, pp. 91~100)。

188 斯托雅诺维奇(Stoianovich)谈到了“1680—1720年间英国人在阿勒顿的商业衰落”(1974, p. 80)。马森认为那是“最为出乎意料的转变,连法国人也感到惊讶”(1967b, p. 367)。

189 见斯托雅诺维奇(1974, p. 86, p. 100), 马森(1967b, p. 370)和帕里斯(1957, p. 100)。

190 见帕里斯(1957, pp. 12~15, pp. 30~36)。

191 见帕里斯(1957, pp. 5~6)。

192 涅古耶夫认为该地区只是在18世纪末才汇入世界经济体(1975, p. 11)。帕里斯指出,在那时以前“欧洲商人主要依靠奥斯曼土耳其的官府,因而也依靠后者与他们的君主的关系”(1957, p. 80)。

193 17世纪初利凡特贸易占法国对外贸易的50%, 而到1789年却只占5%。1750年时,它已远远落后于与美洲和西班牙的贸易,虽然同荷兰的贸易与之大体相当(见马森,1967b, p. 429)。

194 见博克瑟(1965, p. 199), 维拉(1974, p. 345)和格拉曼(1974, p. 477ff)。维拉认为,直到1765年左右贸易还是单向的(见p. 345, p. 354等)。

195 见博克瑟(1965, pp. 174~178)和格拉曼(1958, p. 14)。随着这些产品在欧洲普遍受到欢迎,它们开始在那里被廉价地仿造。17世纪中叶出现了荷兰代尔夫特彩色陶器(Delft potteries)。1709年德意志东部的迈森(Meissen)造出了瓷器。英国在18世纪开始生产印花布。茶和咖啡当然是不能在欧洲生长的,但茶从1734年开始盛行起来,咖啡的盛行比较晚些。

196 博克瑟(1965, p. 197)。数量的增加毕竟是一个有影响的因素。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积极鼓励进口,但1696年和1699年在议会里受到毛织业主和纺织业主的猛烈攻击(见P.J. 托马斯, 1963, p. 39)。勒维利奥特(Leuilliot)谈到这一因素的影响时说:“印度棉布和薄棉布输入欧洲,起初是激起保护主义的回应——法国下令禁止进口是在1686年,威尼斯和佛兰德在1700年,英国在1701年(禁止印花布是在1721年),普鲁士大约也在那时下了禁令。它还刺激了棉纺织工业,而后者又受到美洲殖民地化的影响,而且与非洲的奴隶贸易相联系。对印度产品的仿造,在英国、德意志、尼德兰和法国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兴盛起来”(1970, p. 260)。

197 萨瑟兰(1952, p. 3)。

198 萨瑟兰(1952, p. 48)。

199 莱昂认为,在1650—1750年“(欧洲人的)大宗贸易的利益中心转到了亚洲”(1970a,p.128)。我觉得此说过于夸张。

200 然而,我宁愿把北美的皮毛贸易区(主要是加拿大)视为外部地区。劳森(Lawson)认为皮毛是“奢侈需求品”(1943,p.2)。并参见格伦德(Glenday)(1975,特别是pp.24~35)。K.G.戴维斯说它最初是奢侈品,但他把河狸皮帽称为“平民化的皮帽”,也就是说,把它归入市民消费价格的范围。他说,1600年的“涓滴”到1650年变成了“溪流”,1700年则成了“洪流”(p.174)。里奇认为到1696年出现了生产过剩(1966,p.26)。我们还须注意科贝特(Cobbett)在18世纪的英国议会里发表的观点。他指出,花费80万镑的军费与法国打仗去保护价值5万镑的一项贸易;“如果让整个皮毛贸易沉入大海,对这个国家究竟有什么损失呢?”[见英尼斯(Irnis),1943,××的引语]。

201 “……只是到1750年以后,欧洲人在印度洋的经济才成为真正的殖民经济。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到那时它开始向欧洲返回经营利润”(肖尼,1966b,p.893)。“必须强调的是,(在17和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在爪哇、锡兰和马六甲成了统治一片领土的国家权力机构,但即使在它直接统治的地区,也仍然只是处在亚洲社会边缘的一个外来实体”(博克瑟,1965,p.194)。

202 格拉曼在论及英荷之间在进口亚洲纺织品方面的竞争时说道,1700年以后,“英国人的贸易终于超过了荷兰竞争者的贸易”(1977,p.251)。

203 肖尼认为关键性的转变发生在18世纪中叶。他认为在此以后俄国成了欧洲政治的一部分(1966a,p.639)。

204 奥伯(1955,pp.131~133)。然而,在阿尔汉格尔附近一带生产的大宗产品——鱼油、沥青、皮革,还有垄断产品牛脂,也定期运送。

205 实际上,诺伯斯认为从1716—1717年到18世纪40年代初这段时间达到了最高峰,此后就急剧衰落(1977b,p.12)。

206 见阿斯特罗姆(Aström)(1963,p.188,pp.196~198)。

207 见班姆福特(Barnford)(1956,p.141)和乌格(1959)。他也认为铁的进口增加了。

208 见伯奇(Birch)(1955)。

209 莫里诺认为,在1742年,法国对北方的出口与荷兰的出口持平了(1965,p.206)。然而,让南指出,“法国与北方的直接贸易在18世纪的发展中受益,而发展的部分原因是荷兰的中间商作用的减少。但是如果汉堡在某种

程度上代替了阿姆斯特丹，从法国商人的观点来看，这一变化真的就那么重要吗？”(1975, p. 71)。

210 威尔逊(1954, p. 254)。

211 见威尔逊(1941, p. 137)。

212 奥姆罗德指出：“这意味着荷兰商人实际支付了关税，并承担了全部风险，他们的资本直到亚麻实际售出以前一直冻结着。而英国商人不承担任何风险就获得 2% 的（委托费），而且他们的资本可以自由运用于其它更为有利可图的目的”(1975, p. 72)。

213 见安德鲁斯：“当时的人们对于荷兰人竞争的作用的看法，可从下述事实推知：1713 年，约翰·威瑟斯(John Withers)感到有必要写一封‘一位市民致一位乡下绅士’的信，标题为《荷兰人较之法国人更适于作朋友》。他在该信中反驳了以下这种流行观点：荷兰人是‘在我们的贸易中反对我们，在我们的商业中损害我们；一旦这些英国佬被压垮，世界贸易就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贸易’……他力图证明，实际上法国人是英国的大敌，荷兰人是英国的朋友”(1915, pp. 545~546, n. 18)。

荷兰人对商业利益的损失的认识和处理方式，从他们在英法战争中尽可能退居中立的态度可见一斑。对此作出的解释充满令人费解的内在矛盾。例如，可参见艾丽斯·卡特(Alice Cater)和戴维·霍恩(David Horn)。卡特说，荷兰人在 18 世纪保持中立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宪政形式和政治体制使他们实际上不可能迅速作出决策，但那种形式和体制毕竟十分恰如其分地保障了它的利益”(1963, p. 818)。霍恩说：“乌特勒支协议之后联省共和国的强国地位的突然消失，决不是由经济实力的衰败而是由于意志的瘫痪……不干预和立中的谋略虽然使荷兰对角逐双方都失去影响力，但至少有助于推迟最后清算的时间”(1967, p. 24, p. 88)。这两位作者都是纯粹从政治上作出解释(政体形式，意志的瘫痪)，但最终却承认中立政策在经济上是有利的。在他们的产品的比较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荷兰人只得通过降低其“保护成本”来竞争。

214 皮埃尔·古伯特在论及这些战争中的第一次战争时指出：“要供养和装备 20 万人的军队，在 9 年的时间里，在 4 条主要战线和 4 个遥远的战场上，去同几乎整个欧洲作战，这使阿姆斯特丹银行，以及不久(1694 年)也使英格兰银行，面临无比沉重的负担，其金钱的耗费难以估量”(1970a, p. 205)。

215 我们今天把纸币(记帐货币)相对于金属货币价值的降低称为货币

贬值,在现代初期则称之为“货币增大”(augmentation des espèces),指的是金属货币较之记帐货币有了更多的价值,因为金属货币较之其他货币的比值在这个时期明显处于有利地位。关于法国的情况,见卢西(Lüthy)(1959, p. 99);关于英国的情况,见艾什顿(T.S. Ashton)(1959p. 106)。

216 见卢西(1959, pp. 114~120)。

217 卢西指出对政府有三方面的利益:对铸造新币征税(droit de seigneurage);国债贬值;政府增加了手中控制的硬币数量,因为在每次贬值措施中政府实际上偿还的硬币的数量比它得到的要少(1959, p. 101)。贝斯涅尔(Besnier)补充了第四方面的利益,那就是法国政府把大幅度的贬值与经常性的小幅度升值结合起来,其结果是迫使硬币持有者去服从政府:“例如,在1703年,沙米亚尔(Charmillart)<sup>(1)</sup>连续宣布了几次升值,这就促使靠债券利息生存的人们同意降低债券的利率,因为他们受到要用硬币偿还的威胁,而硬币价值的降低,失去其标准价值的前兆,已经逼近眼前”(1961, p. 83)。

218 每次贬值都引起“对法国造成损害的金属货币的放血”(卢西, 1959, p. 118)。卢西认为,“法国财政部最终为不付代价的幻想支付了高昂的代价”(p. 120)。布罗代尔和斯普纳以1750年为观测点对这个时期作了回顾后指出:“回顾起来,1750年时,在整个欧洲最严重的贬值出现在波兰、土耳其和法国这三个庞大的政治体内”(1967, p. 382)。到19世纪,波兰已不复存在,土耳其成了“欧洲的病夫”——而法国呢……?贬值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影响:它们最终导致了领主的衰落。“记帐货币的每一次贬值都是长期演化过程中迈出的一步,那一演化过程耗尽了并且最终消灭了世袭的报酬(租税)”(卢西 1959, p. 101)。

219 见雅卡特(1975, p. 211)。并参见里奇特对1690—1720年的法国经济状况表示怀疑的观点。他怀疑那是柯尔柏紧缩政策(1660—1690)的回升。从记帐货币看,谷物价格像葡萄酒和橄榄油价格一样在急剧上涨,但从金属货币含量来看,却在继续下跌。“那是‘名义上的’上扬,由人为的货币贬值激扬起来的,是贫困的象征,而不是繁荣的标志”(1968, p. 762)。

220 见威尔逊(1951, pp. 240~241)。斯伯林根据利润率作出的解释是一个例外。“白银东流不是因为贸易要完全依靠白银,而是因为白银有利可

---

[1] 沙米亚尔(Charmillart, Michel de 1652—1721),法国政治家。1700—1709年任路易十四的国务部长和军事国务秘书。——译者

图”(1962, p. 62)。原因是在世界不同地区白银对黄金的比值不同:在西属美洲是 17:1;欧洲是 15:1;印度是 12:1,日本是 9:1。布利茨(Blitz)提供了类似的比值:在西班牙为 16:1;英国为 15:1;在东方为 9/10:1(1967, p. 53)。

221 梅尔腾斯(Mertens)(1944, p. 56)认为英国的黄金本位制起源于 17 世纪白银的严重短缺。但是既然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应用于法国,又怎能作那样的推论呢?”

222 见布维尔(Bouvier)(1970, pp. 308~309)。

223 见维拉尔(1974, pp. 278~279)。并参见威尔逊:“1703 年的英葡条约……使黄金流向改为从巴西转向了伦敦(1941, p. 8)。改变流向,也就是改变了从前流向阿姆斯特丹的方向。在 1713 年,黄金占了巴西船货的 60%(见莫里诺,1978, p. 32)。在整个 18 世纪,巴西输出的纯金约达 800 吨(莫里诺,1978h, p. 24)。

224 维拉尔说:“我们必须牢记,商品价格普遍极为低落的时代就意味着那是一个对金银的购买力很高的时代,由此产生了对金银的渴求”(1974, p. 247)。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走向复苏,那样的优势就开始消失,如莫里诺指出:“与 1730 年的高峰相比,(黄金的)商业价值在临近 19 世纪时急剧地下降了。仅举一例,1 公斤纯金 1740 年在里斯本‘值’12.25 箱糖(约 7 200 千克),在 1778 年值不到 7 箱(3 900 千克),在 1796 年值不到 3.5 箱(1950 千克)。谁会相信,在黄金和糖之间,竟是从前价格最高的黄金跌落下来呢?”(1978h, p. 40)

225 见莫斯尼尔(1951, pp. 1~8),他坚持认为英法之间的差别点多于相似点。然而他提供的实际证明少,而先验的意识形态上的论证多。英国是“更加资本主义化,更加资产阶级化的”(p. 8)。“在 1713 年,法国有一个具有独裁倾向的专制性质的政府,英国有一个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多元性的政府”(pp. 13~14)。

226 凡·德·威(1977, p. 378)。

227 凡·德·威(1977, pp. 391~392)。

228 阿丹特(Ardant)(1975, p. 200)。

229 卢西(1959, p. 112)。比较凡·德·威(1977, p. 378)和哈森(Harsin)(1972, pp. 272~273)的说法。

230 见杜兰德(Y. Durand)(1976, p. 21)。

231 莱昂(1970d, p. 623)。他说,在 1685—1715 年,“法国的财政‘统治’是专横的。”那个时期的金融家是指负责收税的人,他们既是王室官员,又是给政府贷款的银行家。但他们究竟能榨取多少剩余仍然受到限制。“这些人似乎有权有势,但在政府面前仍然是软弱的、依附的;他们无疑受到政府‘控制’,但他们也‘控制’政府”(莱昂,1970d, p. 624)。随着 18 世纪的推进,‘收税人’让位于‘高贵的承租者’。他们的活动较为稳定,较少投机性。他们再也不能发横财,但在整个世纪里他们仍能赚取较多的剩余。见莱昂(1970d, pp. 628~630)和杜拉德(1976, pp. 13~16)。

232 克拉潘(Clapham, 1944, p. 25)。

233 见克拉潘(1944, pp. 1~2)和凡·德·威(1977p. 352, p. 387)。

234 德约恩和雅卡特提供了这方面的实际证据,表明英国为政府筹资的新方式优于法国体制。“(1688—1713 年的)战争促使英国作出的财政努力与法国相当。税收,特别是间接税,和贷款量,在这两个国家都以相似的速度增长。然而,乌特勒支条约签订之时,法国的国债为英国国债的 5 倍或 6 倍之多”(1978, p. 500)。

235 卡特(1955, p. 21)。并见罗斯维尔。“议会改革消除了伦敦金融中心一向对政府提供大笔贷款感到的忧虑,以国王和女王为首的富有阶层(在 1694 年)毫不犹豫就捐助了 120 万镑作为合并所需的资金(1969, p. 69)。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乐观。地主阶层中一些人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英格兰银行是国会之外的一个收入来源。关于他们的抵制,见鲁比尼(Rubini)(1970, pp. 697~701)。

236 卡特(1955, p. 22, p. 30, pp. 39~41; 并见 1959)。

237 见蒙特尔(Monter)关于瑞士在英国的投资的论述,那是仅次于荷兰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如果瑞士的投资者主要是日内瓦人,而日内瓦人大都是胡格诺教徒(而且如果 18 世纪在英国股票交易所投资的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也主要是胡格诺教徒),那么,真正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如有可能还需作定量分析的问题,就是“18 世纪初伦敦股票交易所的‘胡格诺国际集团’的活动”(1969, p. 298)。蒙特尔指出,柏林和汉堡在英国的投资者“几乎是清一色的胡格诺教徒”。关于胡格诺国际集团,还可参见布维尔(1970, p. 312)。马雷斯(Marrès)指出,胡格诺移民建立了“一个商业和委托人的网络,经营朗格多克的工业品。他们留在朗格多克的弟兄,被禁止担任公职后,就着手经营某些最兴旺的工业,特别是纺织业”(1966, pp. 152~153)。并参见卢西

(1959, p. 424)。

238 后来,路易十四死后,胡格诺教徒曾再次回到法国投资,特别是投资于法国的对外贸易(见布维尔,1970, pp. 312~313)。“荷兰君主和他的顾问们到来后紧接着就出现了金融革命,这绝非纯粹巧合,那些顾问精于财政和金融事务,特别是长期的政府借贷,而且同荷兰银行界有联系”(布劳恩 1975, p. 292)。

239 威尔逊(1949, p. 161)。英格兰银行这个关键机构的成功,由以下事实可以证明:虽然直到 1833 年它发行的纸币在法律上还不合法,但在事实上,“早在 18 世纪初,英格兰银行的纸币就稳固地确立了它的地位。已经被普遍接受作为最终的债务结算货币(霍斯菲尔德,1977, p. 131)。

240 凡·德·威(1977, p. 389)。

241 “荷兰资本到英国去找投放场所似乎不是英国需要资金,而是在本国没有投资机会,也许只是少数战争年代例外”(约翰,1953, p. 158)。

242 威尔逊(1941, pp. 72~73),单是荷兰人就持有 3/7 的国债券(威尔逊, 1941, p. 78, p. 190)。然而卡特认为,这方面的证据是“十分靠不住的”(1953a, p. 159)。她从总帐得到的印象是,荷兰人拥有的国债券仅在 1/8 至 1/6 之间(p. 161)。不过她承认,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之前,荷兰人在英国国债中的投资已达到“其总额中的很大份额”(1953b, p. 338)。

243 巴勃尔(Barbour)(1963, p. 125)。

244 克莱恩(Klein)指出,联省共和国的国债在 17 世纪增长最为迅速,那是可望给它带来霸权的世纪。他们试图保持低税率,部分原因是反抗西班牙的战争的思想动机之一就是反抗重税;但是代价终究是要偿付的。“因此可以说,荷兰人在 16 世纪取得的自由看来是由以后几代人付出代价去购买的”(1969, p. 19)。

245 莫里诺(1974, p. 775)。并参见卡特(1971, pp. 131~135)。

246 见威尔逊(1954, pp. 263~264)。

247 威尔逊(1960b, p. 439)。

248 克莱恩(1970, p. 34)。这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决策,可由以下事实说明:荷兰首先在 18 世纪开创信托投资方面的金融革命,而英国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才有了这方面的观念,当时英国才达到了联省共和国在 1689 年已经达到的阶段(见克莱恩,1969, p. 12)。

249 见范·迪伦(1926, pp. 199~200)。



250 见莫里诺(1972,p.4)。

251 见威尔逊(1954,pp.264—265)。

252 卡特(1953b,p.323)。

253 约翰(1955,p.343)。

254 哈森(1970,p.276)。

255 约翰·劳建立一个国家银行的建议由于遭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反对,该银行“不得不以一家私人银行的面貌掩饰起来,目的是为了获得授权”(哈森,1970,pp.277—278)。关于约翰·劳建立法兰西银行的意图,见汉密尔顿(1969;pp.140—149)。汉密尔顿把约翰·劳1702年提出的最初的计划称作“我在那个时期见到过的任何国家建立国家银行的最佳计划之一”(p.143)。1718年12月4日,该银行最终正式成为皇家银行之时,“全部主要股份都已被政府秘密收购”(E.J.汉密尔顿,1969,p.145)。这一事实说明,它原来的私有性质只是一种掩饰。

256 对劳的意图的这种阐述,出自哈森(1970,p.279)。卡斯韦尔说:“劳的增加社会财富计划的核心,是发行一种国家纸币,认为它将被普遍接受,因为有政府当局支持,并通过地方办事机构网络加以管理。他坚信那种纸币优于金属货币,以致在他最初的方案里认为有必要对纸币超过金银币的报酬加以限制,提出在用黄金偿还100纸币的债务时,不能要求超过110纸币的价值”(1960,pp.78—79)。

257 德约恩和雅卡特(1978,p.502)。

258 哈森(1970,p.280)。

259 韦伯(1950,p.288)。他对南海泡沫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解释:“这里破产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南海贸易不足以支付预付款的利息”(p.289)。

260 见阿克曼(Akerman)(1957,II,pt.1,pp.254—255);哈森(1970,p.294);金德尔伯格(1978,pp.120—122)。艾什顿补充了丹麦、西班牙和葡萄牙(1959,p.120)。关于日内瓦,见塞由斯(Sayous)(1937)。阿克曼把1720年的危机称为“第一次国际危机”(p.255),韦伯把那些危机与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那些大震荡区别开来(1950,p.286)。帕克使用了几乎相同的用语:“现代的第一次国际危机”(1974a,p.582)。

261 南海公司在1711年首次被用来偿还短期债务,大获成功。“这一次的漂亮举动使英国在1713年签订乌特勒支和约时大出风头,因为它的信誉确实未受损失,尽管它还欠着巨额国债”(帕克,1974a,p.581)。弗林恩(1960)

对这一成就甚表怀疑。但 B.W. 希尔认为，它虽然更多的是一次经济上的重大举措，但也是一次政治上的重大举措：“托利党控制的国会说服支持国债，而辉格党控制的伦敦金融中心承担了国家债权人角色。这在政治上和金融上对未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上，因为他们消除了政府更迭（1710 年政府从辉格党转入托利党之手）将使国债化为乌有的恐惧；在财政金融上，因为自革命以来由‘富有阶层’建立的这个机构（英格兰银行），得到了代表作为伦敦金融中心的最大批评者的地产绅士阶层的内阁的认可，甚至保护”（1971, p. 411）。

262 见帕克（1974a, p. 583）。

263 汉密尔顿（1969, p. 147）。

264 帕克（1974a, p. 586）。

265 关于英国，见维拉尔（1974, p. 285）；关于法国，见卢西（1961, p. 31）和布维尔（1970, p. 307）。

266 卢西（1959, p. 414）。

267 哈森（1970, p. 279）。普拉姆关于政府行动的观点甚至更激烈。他说，沃波尔“拯救了宫廷”（1950, 59）——而且因此在两年后当上了首相。

268 普瓦松（Poisson）（1974, p. 266）。

269 英伯特（J. Imbert）谈到了“1718—1721 年对法国经济”的有益的“鞭策”（1965, p. 354）。E.J. 汉密尔顿认为它使法国摆脱了经济危机，但这不是“无代价的”（1969, pp. 147—148）。

270 关于 1720 年以后里昂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衰落，见卢西（1959, p. 55）。

271 坦伯利（1909a, p. 40, p. 49）。沃波尔凭借的是保守主义，他的“政策极为简单——避免战争，鼓励贸易，减税，其他都率由旧章——并无创新。如他自己恰当地说的那样：‘我不是圣人，不是勇者，不是改革家’”（普拉姆，1966, pp. 78—79）。

272 普拉姆（1967, p. 13）。效率比人数更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也没有忽视人数。“1689—1715 年政府雇用的人数增长之快，为英国历史上前所未见”（普拉姆，1967, p. 112）——直到 19 世纪都是如此。并参见艾尔默（Aylmer）：“就政府人数的净增长来看，关键的时期……看来是在 1642—1652 年和 1689—1697 年（可能还有 1702—1713 年）”（1974, p. 24）。对比普拉姆的说法，伯杰（Berger）对 1689 年以后法国政府效率增长作了如下估价：“在研究了

1693年的饥荒(和法国政府如何处理它)以及假定由战争需要所推动的政府的巨大攻势之后,并没有在这方面留下什么印象。”(1978,p.120)。

273 安德逊(1974a,p.232)。

274 关于英国和地产财富,见哈巴库克:“没有理由怀疑,1715年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地产收入的境况比1640—1715年那个时期有利”(1970b,p.9)。并参见普拉姆:“地产绅士越来越置身于社会的新经济结构之中。贸易,投机,(还有)冒险,对他们来说终于不再陌生”(1967,p.8)。关于法国和商人资本,见麦克曼勒斯(McManners):“金钱是理解18世纪法国社会的钥匙。靠着它背后的金钱的力量,财阀渗透到了贵族阶层”(1967,p.26)。并参见格拉斯比(Grassby)(1960)。他谈到了“蜕化”观念得以回避的某些途径,从而使得贵族和商人之间的严格界限不可能保持下去,而那一观念就是用来加强那个界限的。

275 泰勒把它称为“宫廷资本主义”。“贵族、金融家、银行家和职业投机家促使政府参与引起争议的投机行为,运用政府的力量作出官方决定,去提升或压低价格,或者使投机者免受将来的不利承诺的损失”(1964,p.488)。

276 明格(1963,p.15,p.26)。

277 E.P. 汤普森(1975,pp.197~198)。

278 此话出自E.P. 汤普森(1975,p.294)。

279 荷兰人在英国政治中发挥的金融方面的作用当然是通过伦敦金融中心来调节的。萨瑟兰认为伦敦金融中心的支持是沃波尔体制的四大基础之一,无论是直接的支持,还是通过与之相联的东印度公司的支持(见1952,pp.18~23)。

280 普拉姆令人信服地说到,1715年标志着英国自1640年以来司空见惯的公开争论的最终驯服。“地产所有者在17世纪的英国成了政治动物……到18世纪中叶,当然的权利大都丧失殆尽”(1969,pp.115~116)。普拉姆指出,1715年以后,英国的稳定是“三种主要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一党制政府,执行机构牢牢地控制着的立法,主宰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的人们团结一致的意识”(1967,xviii)。

281 “在统治阶级中间,从诺曼征服以来就有一种进行密谋、动乱、阴谋和叛乱的传统。到1685年,政治中的暴力行动是英国人的天然权利”(普拉姆,1967,p.19,加了着重符号)。“政治稳定来临之时,它往往很快就出现在社会面前,就像水冻成冰那样突然地变化”(p.xvii)。克里斯托弗·希尔有类似

看法,不过他认为转折点是在 1688 年,而不是 1715 年。“英国以其政治上的暴烈震荡闻名于整个欧洲……1688 年以后,英国政治的激烈时代结束了。继先前 50 年的剧烈震荡之后,出现了相对的平静”(1969, p. 119, p. 213)。

282 “(荣托 [Junco] 和沃波尔)使辉格党人脱离了激进主义……该党把贵族、大财阀和执政的政府的利益融合在一起。沃波尔把这一进程加以扩大,把大部分地产绅士包容进来”(普拉姆,1967, p. 187)。

283 富兰克林·福特(Franklin Ford)注意到,虽然在 1614 年的等级代表会议上穿袍贵族的上层人物还被视为平民,“在 1715 年对穿袍贵族最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他们的贵族身份在法律上已不再有疑问”(1953, p. 59)。他继续说到,实际上,“在 1715 年高级的穿袍贵族确立了贵族身份,恢复了政治权利,成了贵族中最有势力的力量”(1953, p. 188)。

即使那些仍然在正式场合被视为庶民的资产阶级,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受到了所谓的封建反动的消极影响。埃莉诺·巴伯(Elinor Barber)指出,虽然“中等的”资产者发现他们的前程受到了阻挡,“大”资产者却运用他们的财富使自己“很少受到影响”(1955, p. 143)。

284 布朗利(Bronley)(1957, p. 135),他说:“政府从传统的限制解脱出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常常中断,而且从未完成”(p. 137)。

285 肖尼(1965b, pp. 26~27)。

286 “仔细想来,(大元帅)蒂雷纳(Turenne)<sup>[1]</sup>(在 1668 年)的改教比南特敕令的废除更为重要。没有蒂雷纳的改教,枫丹白露的敕令是不可想像的。如果绅士们决心不动摇,国王控制不了他们中的一半。一个半世纪以后,在 1789 年 6 月 23 日保证第三等级取得胜利方面,拉法耶特(La Fayette)、拉罗什富科-连库尔(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和其他 90 位自由派贵族起的作用,比米拉波<sup>[2]</sup>的演说的作用大得多”(肖尼,1965b, p. 27)。

[1] 蒂雷纳大元帅原是胡格诺教派领袖人物之一,是拥有子爵爵位的贵族,他带头放弃胡格诺信仰,对胡格诺教派影响甚大。——译者

[2] 拉法耶特(1757—183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1830 年七月革命中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扶持奥尔良公爵登上王位。拉罗什富科-连库尔(1747—1827),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贵族自由派头面人物之一。1789 年作为贵族代表出席三级会议。后因持保王立场,反对雅各宾专政,流亡美国。米拉波(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出身贵族,1789 年被选为第三等级代表出席三级会议,制宪议会期间,多次发表演说,抨击专制政体,宣传人民主权,但到 1790 年与王室勾结,反对革命。——译者

287 1680—1720年,约有20万胡格诺教徒出走,主要是到英国、联省共和国、日内瓦和德意志诸邦〔见斯科维尔(Scoville),1959,pp.409~410〕。

288 见斯克维尔(1960,pp.3~5,p.118),有些改教者实际上是假装的,是“新的暗中信仰者”(见伦纳德,1948,pp.177~178)。

289 伦纳德(1948,p.178)。由此就有了卡米撒派(Carnisards)的战争,安东尼法庭(Antoine Court)和1715年下塞文山区(Basses-Cevennes)的旷野宗教会议(Synod of the Desert)。<sup>[1]</sup>

290 伦纳德(1948,p.179)。

291 见勒·鲁瓦·拉杜里(1975c,pp.35~37)。

292 见勒·鲁瓦·拉杜里(1975a,p.528)。18世纪与17世纪不同,是“盛行农民上学的时代”(1975a,p.538)。

293 见莫斯尼尔对1690—1715年的关税、消费税、贸易站税和印花税进款加以比较后提供的数字。法国的稳定岁入在1690年约为7000万都尔硬币,到1715年减少到4700万;而英国的岁入从1700年的2050万增加到1715年的5900万(1951,p.18)。随着该世纪的推进,差距不断扩大。马赛厄斯和奥布赖恩(O'Brien)(1976)对这整个世纪的赋税负担作了仔细的比较考察以后说,“法国的赋税负担比英国轻”(p.634);他们指出,英国的捐税之重,仅次于联省共和国。“这也许不是偶然巧合”,因为唯有后者“其国内市场的联系甚至比英国更紧密”(p.640)。

294 勒·鲁瓦·拉杜里(1975a,p.550,p.552)。

295 勒·鲁瓦·拉杜里对18世纪英国和法国农村的政治联盟作了对比;在英国是领主和富裕农民结成联盟;而在法国,则是贫农、中农,甚至还有富裕农民,结成“传统的联盟”去反对封建主(1975a,pp.584~585)。

296 “从未有过那么强烈的对照,从未有过比这一变化更为突然的转变……某一天,法国人思考问题几乎全都像波舒哀(Bossuet),一天以后……就

---

[1] 卡米撒派,18世纪初法国南部下期格多克和塞文山区的新教教派,曾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反抗路易十四对新教徒的迫害,采取伏击和夜袭等战术,重创王军。但终于遭到王军残酷镇压。零星战斗持续到1710年,但其余波持续到18世纪上半叶。安东尼法庭和旷野宗教会议都是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译者

全都像是伏尔泰<sup>[1]</sup>。那不是通常的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摆动，那是一场革命”（哈泽德，1964，p. 7）。

297 拉布鲁斯(1970, p. 716)。

---

[1] 波舒哀(1627—1704)，法国天主教神学家，支持路易十四，鼓吹绝对君权，曾任主教和国王长子教师和国王顾问等职。法兰西学院院士。伏尔泰(1694—1778)，著名启蒙思想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反对君主专制和天主教神学。——译者

# 索 引

(本索引中的数字系原著页码, 即本译著所标边码)

## A

Aachen, 亚琛 200

Abel, Wilhelm, 埃贝尔, 威廉 3, 16, 22, 28, 31, 132~133, 262

Absentee ownership, 不居乡者所有权 168, 170~171

Absenteeism, 不居乡地主制 86

Absolutism, 专制主义, 见 State, absolutism

Achilles, Walter, 艾基利斯, 沃尔特 28, 137

Act of Union, 联盟法案, 见 Great Britain, Union of Parliaments (of 1707)

Adams, Geoffrey, 亚当斯, 杰弗里 124

Administrative unification, 行政的统一, 见 State, strength of

Admiralty colleges, 海军部的机构 62,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Adriatic, 亚得里亚海, 199

*Adscriptus glebae*, 农奴, 乡下佬, 见 Serfs

Affermage, 包税制, 见 Tax-farming

Africa, 非洲 9, 17~18, 46, 51, 146, 171~174, 210, 235, 237~238, 270  
coast of, 非洲, 海岸, 见 Africa, West

East, 东部 49

North (or northern), 北部 172, 272, 见 Mediterranean (region)

southeast, 东南部, 见 Africa, East West, 西部 50, 52, 61, 158, 184, 246, 274

Age of Liberty, 自由时代 220

Ager, 耕地, 见 Land, cultivated

Agren, Kurt, 艾格伦, 克尔特 212, 215

Agriculture, 农业 3, 5, 9, 13~16, 27, 29, 39~42, 46, 50, 54, 59, 81~87, 89, 92, 94, 98, 101, 116, 119, 123, 132, 145, 147~149, 152, 155, 164, 174, 180~181, 193~194, 196~198, 201~202, 204, 221~222, 227, 234, 236, 249, 259~262, 267~268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农业革命 5,

- 83, 263
- agronomy, 农艺学 14, 25, 46
- arable production, 可耕地产量 14, 41, 84, 194, 201
- capitalist, 资本主义农业 14, 48, 83, 119, 134, 147, 151, 167, 190, 202, 204, 212, 226, 232, 见 Coerced labor; Farmers; 强制劳动; 农民
- Laborers; Slavery, 劳动者; 奴隶
- cash - crops, 商品性农作物, 见 Agriculture, capitalist
- commercialization, 商业化, 见 Agriculture, capitalist
- consolidation, 合并 141, 155, 164, 168, 171 ~ 172, 216, 225 ~ 227, 259, 262
- contraction of cultivated areas, 耕种面积(地区)的缩小 13~15, 135
- crop rotations, 谷物轮作 82 ~ 83, 133, 146, 180
- enclosures, 圈地 86, 88 ~ 89, 121, 259
-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耕种面积(地区)的扩大 13, 15, 25, 29, 82, 135, 260, 263
- fertilizers, 肥料 14, 41, 44, 54, 180
- fodder (forage), 草料 41, 83, 259, 见 Grasses
- fruit culture, 果树栽培 41
- horticulture, 园艺 41
- industrial crops, 经济作物 13, 41
- innovation in, 革新 15, 39 ~ 42, 83, 259 ~ 260
- mixed farming, 混合农业 82
- monoculture, 单一种植 224, 262
- pasturage, 牧场 14 ~ 15, 25, 41, 86, 152, 166
- subsistence, 糊口农业 137, 146, 181, 236
- tropical, (似)热带的 103, 171
- yields, 收获, 产出 13 ~ 14, 25, 41, 75, 83, 90
- Agro - industrial production complex, 工农业复合生产 44, 66, 79
- Agronomy, 农艺学, 见 Agriculture agronomy
- Agulhon, M. . 阿古隆, M. 125
- Aix - la - Chapelle, Treaty of (1748) 1748年艾克斯拉沙佩勒条约 256, 272
- Akerman, Johan, 阿克曼, 约翰 282
- Albany, Fort, 奥尔巴尼, 福特 250
- Albers, J. , 阿尔伯斯, J. 63
- Alcabala, 阿尔卡巴拉税 150
- Alcazar - el - Kebir, 阿卡扎 - 伊尔 - 凯比 182
- Alcoholic beverages, 含酒精的饮料 141, 259, 见 Beer; Brandy; Distillers; Gin; Port; Rum; Taverns; Whiskey; Wine
- Alderman Cockayne's Project, 奥尔德曼·科克因的方案 43, 76, 206
- Aleppo, 阿勒颇 272
-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108



- Algiers, 阿尔及尔 248, 272
- Alhóndiga*, 阿隆迪加价格调整 155
- Allen, Theodore, 艾伦, 西奥多 173
- Allgau, 阿尔高 14
- Allgemeines Landrecht*, 一般的国家权利 225
- Allodial tenure, 自主地产所有权(或使用权), 见 Tenure, allodial
- Almadén, 阿尔马登 146
- Alps, 阿尔卑斯 94, 200
- Alsace, 阿尔萨斯 14, 250
- Altmark, Truce of (1629), 1629 年阿尔特马克休战协定 207~208
- America (the Americas) 美洲(南北美洲) 9, 17, 49~50, 52, 101~103, 108~110, 130, 145~146, 150~153, 157~158, 160, 165, 172, 181, 184~188, 190, 238~240, 245~246, 252~253, 256~257, 267, 270~271
- American Indians, 美洲印第安人, 见 Amerindians
- Central, 中美洲 4, 148, 150, 152~154, 158~159, 161
- Hispanic (Spanish), 西属美洲 21, 33, 61, 102, 108, 147, 149, 151~152, 155~156, 158, 160~162, 166~167, 173, 184~185, 189, 191, 198, 255, 271, 276, 见 America, Iberian
- Iberian, 伊比利亚人 4, 148, 见 America, Hispanic; Brazil
- Latin, 拉丁, 见 America, Iberian
- Middle, (美洲)中部, 见 America, Central
- North, 北美 17~18, 47, 83, 97, 100, 103, 157, 168~169, 179, 191, 195, 217, 236~241, 253, 255, 263, 273, 见 Middle Atlantic colonies; New England
- southern colonies, 南部殖民地 169, 171~172, 253, 255
- temperate America, 美洲温带地区, 见 America, North
- tropical America, 美洲热带地区 17~18, 见 America, Hispanic; America, Iberian; Brazil; Carib-bean
- Amerindians, 美洲印第安人 110, 151~155, 158, 162, 173~174
-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国革命, 见 Revolution American
- Amiens, 亚眠 90~91
- Amodiateurs*, 土地出租人, 见 Estates, inter-mediaries
-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2, 6, 21, 24, 28, 43~47, 50~51, 53~60, 63~64, 67~70, 78, 96, 106, 108, 115, 141, 183, 202, 205~206, 209, 222, 253, 275, 277, 280~281
- Bank of, 阿姆斯特丹银行, 见 Wisselbank van Amsterdam, De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113
- Ancien Regime*, 旧制度 6, 8, 23, 94, 229, 246, 266, 285

-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 145
- Anderson, M. S. 安德逊, M. S. 211, 219
- Anderson, Perry, 安德逊, 佩里 13, 29 ~ 32, 64, 71, 144 ~ 145, 197, 204 ~ 205, 211, 221, 227 ~ 228, 230, 232, 235, 284
- Andes (region) 安第斯(地区) 153, 285
- Andrews Charles M. 安德鲁斯, 查尔斯 M39, 65, 186, 246, 257, 269 ~ 270, 275
- Anes Alvarez, Gonzalo, 阿尼斯·阿尔瓦雷兹, 贡萨罗 180
- Anglo~Dutch wars, 英荷战争 51 ~ 52, 70, 78 ~ 80, 100
- Anglo~French wars, 英法战争 187, 245, 247, 258, 275, 284
- Anglo~Portuguese Treaties, 英葡条约 185, 277
- Anglo-Spanish Treaty (1670) 英西条约 159
- Angola, 安哥拉 52, 186
- Animals, 家畜, 见 Livestock
- Anne (of England) 安娜 250, 252, 254, 278
- Antilles, 安的列斯(群岛), 见 Caribbean
- Antwerp, 安特卫普 45 ~ 46, 53 ~ 54, 198
- Appalti di gabelle*, 包税制 203, 见 State, finances
- Appotomax, 阿波托麦克斯条约 253
- Aquila, 阿基拉 147
- Aragon, 阿拉贡 189
- Araire*, 摆杆步犁 88
- Arawak, 阿腊瓦克人 173
- Archangel, 阿尔汉格尔 274
- Ardant, Gabriel, 阿丹特, 加布里埃尔 277
- Ardennes, 阿登 95
- Aristocracy, 贵族阶层 22, 26, 32, 56, 63, 69, 71, 86, 94, 103, 112, 119, 122 ~ 125, 132, 138 ~ 139, 141 ~ 143, 145, 148, 182, 204, 211, 214 ~ 216, 220, 224, 230 ~ 231, 253 ~ 254, 265, 285 ~ 286, 见 Classes, upper, Junkers; Landlords; Nobility; Seigniors  
“aristocratization,” “贵族化” 63, 68, 119
- Armaments, 武装力量 80, 95, 103, 207 ~ 209, 248, 263, 见 Army, Navy; War
- Armengaud, André, 阿门高·安德列 18, 75 ~ 76, 258 ~ 259
- Arminius, Jacobus (Arminians) 阿米尼乌斯, 雅各布(阿米尼信徒[派]) 51, 67 ~ 69, 206
- Army, 军队 64, 80, 114 ~ 115, 117, 141 ~ 142, 150, 158, 163, 180, 198, 203, 207, 209, 211, 213 ~ 214, 216 ~ 217, 219 ~ 220, 223, 227 ~ 236, 239, 246 ~ 249, 253, 268, 274, 276 ~ 277, 285, 288, 见 Navy; War

- commissions, 军职任命状 247  
 contractors, 承包商 80, 150, 见 Merchants  
 mercenaries, 雇佣兵 26, 57, 95, 195, 199, 207, 224, 275  
 private armies, 私人军队 195, 207  
 victualling, 储备粮食 231  
 Art objects, 艺术的对象 65, 67, 200  
 Artillery, 大炮, 见 Armaments  
 Artisans, 手工业工匠 15, 45, 93, 98, 125, 141, 194~196, 199, 201, 207, 216, 254  
 Asher, Eugene L., 阿谢尔, 尤金 L. 119  
 Ashley, M. P. 阿斯利, M. P. 78, 118, 264  
 Ashton, Robert, 艾什顿, 罗伯特 76, 114, 260  
 Ashton, T. S., 艾什顿, T. S. 90, 104, 260, 262, 276, 282  
 Asia, 亚洲 9, 17~18, 47~49, 97, 107~109, 158, 184, 273  
 Asiento, 阿先托 77, 161, 188~191, 270~271  
 Aspvall, G., 阿斯普瓦尔, G 215  
 Assiento Company, 阿先托公司 255, 271  
 Åström, Sven - Erik, 阿斯特罗姆, 斯文 - 埃里克 42~43, 96, 98~101, 106, 108, 208, 211, 213~215, 217~220, 239~240, 274  
 Atlantic (world) 大西洋 23, 51~52, 102, 110, 133, 150, 162, 184, 237, 248, 见 Trade, Atlantic; World ~ economy  
 Attman, Artur, 阿特曼, 阿图尔 106  
 Aubin, Hermann, 奥宾, 赫尔曼 235  
 Auge, 歌日地区 14  
 Augmentation des espèces, 货币升值, 见 Money, devaluation  
 Augsburg, 奥格斯堡 197  
 Augustus II (of Poland), 奥古斯塔斯二世 219  
 Austria, 奥地利 22, 71, 138, 143, 188, 198, 225~226, 228, 230~236, 252, 255~257, 277  
 Austrian Succession, War of,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235, 256, 260, 280  
 Hereditary Lands, 世袭领地 225~226  
 Austrian Netherlands, 奥属低地国家, 见 Netherland, southern  
 Autarky, 自给自足 156  
 Aviadores, 采矿主 156  
 Ausöndring, 分割政策 212~213, 215  
 Aylmer, Gerald E., 艾尔默, 杰拉尔德, E. 284  
 Aymard, Maurice, 艾马德, 莫里斯 145~147  
 Azores, 亚速尔群岛 186

## B

- Bacon, Sir Francis, 培根, 弗朗西斯爵士 34

- Bacon's Rebellion (1676) 培根的反叛 173
- Baehrel, René, 巴勒尔, 勒内 4, 16, 21, 111
- Baetens, R, 巴腾斯<sup>[1]</sup> 198, 293
- Bahia, 巴伊亚 163
- Bailyn, Bernard, 贝林, 伯纳德 236 ~ 237
- Bairoch, Paul, 巴洛克, 保罗 84, 263
- Bakewell, P. J., 贝克韦尔, P. J. 148 ~ 149, 152, 155 ~ 156, 174
- Balibar, Etienne, 巴利巴尔, 艾廷纳 5 ~ 6
- Balkans, Turkish, 土属巴尔干 8, 234
- Baltic (region), 波罗的海(地区) 20 ~ 23, 40 ~ 41, 43, 52, 77, 80, 96, 99 ~ 101, 107, 109, 130, 133, 162, 194, 206, 211 ~ 212, 217 ~ 223, 227, 229, 261, 见 Trade, Baltic
- Bamford, Paul Walden, 班姆福特, 保罗·沃尔登 99 ~ 100, 214, 274
- Banana republic, 香蕉共和国 285
- Banat, 巴纳特 234
- Banditry, 盗匪活动 182, 260, 见 Piracy; State, state banditry
- Bangs, Carl, 班斯, 卡尔 69
- Banking, 银行业 29, 36, 38, 55 ~ 58, 112, 132, 137, 171, 180, 183, 266, 275 ~ 276, 278 ~ 281, 283, 见 Financiers; Loans; Merchants; Money private, 私人银行 183, 223, 281 ~ 282 state, 国家银行 57, 202, 281, 283
- Bankruptcy, 破产, 见 State, finances
- Banque Royale, 皇家银行 283, 见 Banking, state
- Barbary, 巴巴里 98
- Baranowski, B., 巴拉诺斯基, B 134
- Barbados, 巴巴多斯 52, 162, 169, 172, 191
- Barber, Elinor G., 巴伯, 埃莉诺 G. 286
- Barbour, Violet, 巴伯, 维奥莱特 43 ~ 44, 48, 280
- Barcelona, 巴塞罗那 189
- Bareel, William, 巴里尔, 威廉 69
- Barfleur, Battle of (1694), 1694 年巴夫勒尔战役 248
- Bargalló, Modesto, 巴加洛, 莫德斯托 156
- Barker, Ernest, 巴克, 欧尔斯特 70, 118, 121, 130
- Barker, T. M., 巴克, T. M. 201, 232
- Barkhausen, Max, 巴克豪森, 麦克斯 268
- Barley, 巴利 14, 46, 180, 261
- Barnett, Correlli, 巴尼特, 克瑞利 80, 247 ~ 248
- Baron, Salo W., 巴伦, 萨罗 W. 78
- Barraclough, Geoffrey, 巴勒克拉夫, 杰

[1] 此项索引原书遗漏, 今据原书第 198 页和 293 页补上——译者注

- 弗里 226, 230, 235  
 Barrier Treaty (1715), 关口条约 256  
 Barrow, Thomas C., 巴罗, 托马斯 C. 237~238  
 Basque country, 巴斯克人地区 124, 182, 189, 268  
 Basse - Provence, 下普罗旺斯 84  
 Basses - Cévennes, 下塞文山脉 287  
 Bassett, D. K., 巴斯特, D. K. 97  
 Batavia, 巴达维亚 46  
 Batavian Republic, 巴达维亚共和国 62  
 Batie, Robert Carlyle, 巴捷, 罗伯特卡莱尔 162  
 Batjan, 巴占岛 49  
*Bauernlegen*, 置农地 226  
*Bauernschutz*, 对农民的保护 227  
 Baulart, M., 包拉特, M. 29  
 Bavaria, 巴伐利亚 23  
 Bayle, Pierre, 贝尔, 皮埃尔 67  
 Bayonne, 巴约讷 268  
 Bazant, Jan, 巴赞特, 简 151  
 Beaujon, A., 博容, A. 39, 61  
 Beauvaisis, 博韦, 21, 90  
 Beef, 牛肉, 见 Meat  
 Beer, 啤酒 141, 165, 260, 见 Malt  
 Beer, George Louis, 比尔, 乔治路易丝 186, 237~238  
 Behrens, Betty, 贝伦斯, 贝蒂 235  
 Belgium, 比利时, 见 Netherlands, southern  
 Belorussia, 白俄罗斯 145  
 Beltrami, Daniele, 贝尔特拉米, 达尼埃莱 200  
 Bengal, 孟加拉 273  
 Berckheyde, Adiaensz Job, 贝克海德, 阿迪安兹·角布 2  
 Bérenger, Jean, 贝朗热, 让 232  
 Berger, Patrice, 贝尔热, 帕特里斯 284  
 Berlin, 柏林 225, 279  
 Berthe, Jean - Pierre, 贝尔特, 让 - 皮埃尔 149, 162  
 Besnier, R., 贝尼耶, R. 276  
 Bessin, 贝桑 14  
 Bethlen, Gábor, 比斯伦, 加博 142  
 Beutin, Ludwig, 比乌廷, 路德维格 45, 67, 197  
 Biala Gora, 比亚瓦古拉, 见 White Mountain, Battle of (1620)  
 Billon, 合金, 见 Vellon  
 Birch, Alan, 伯奇, 阿朗 274  
 Black Death, 黑死病, 见 Epidemics  
 Blacks, 黑人, 见 Negroes  
 Blake, Admiral Robert, 布莱克, 罗伯特海军上将 79, 111  
 Blaschke, Karlheinz, 布拉施克, 卡尔海因茨 201  
 Blitz, Rudolph, 布利茨, 鲁道夫 106, 276  
 Bloch, Marc, 布洛赫, 马克 83, 86  
 Bluche, Francois, 布吕什, 弗朗索瓦 124  
 Bodmer, Walter, 博德默尔, 瓦尔特 199~200

- Boelcki, Willi, 伯尔克, 维利 226
- Boethius, B., 伯丘斯, B. 210, 221
- Bog, Ingomar, 博克, 英格曼 232
- Bogucka, Maria, 博古茨基, 玛丽亚 52, 59, 131~132, 137, 144
- Bohemia, 波希米亚 14, 20, 24, 132, 135, 138~139, 195, 226, 231~232, 234~236, 252, 见 Czechia; Czechoslovakia
- Bohuslan, 布胡斯省 223
- Bois-le-Duc, 博伊斯-列-杜克 42
- Bomb ketch, 装有炸弹的双桅船 248, 见 Navy
- Bombay, 孟买 185, 273
- Bond-labor, 奴役劳动, 见 Serfs
- Bonification of land, 土地垦殖, 见 Land, land reclamation
- Bono, Salvatore, 博诺, 萨尔瓦托雷 272
- Boom periods, 繁荣期, 见 Cycles, economic, A-phases
- Borah, Woodrow, 博拉, 伍德罗 153, 156
- Bordeaux, 波尔多 268
- Borelli, Giorgio, 博雷利, 乔治 197, 200
- Bornholm (island), 博恩霍尔姆岛 223
- Bosher, J. F., 博舍尔, J. F. 268
- Bossuet, Jacques Bénigne, 博叙埃, 雅克贝尼涅 289
- Boston, 波士顿 236, 250
- Boswell, A. Bruce, 博斯韦尔, A. 布鲁斯 143
- Bothnia, Gulf of, 波的尼亚湾 214~215
- Boucaniers, 海盗, 冒险家 159, 见 Piracy
- Boulle, Pierre H., 布勒, 皮埃尔 H. 267~268, 270
- Bounties. 补助金 255, 261~262, 267, 见 Great Britain. Corn Bountv Act
- Bourbons, Spanish, 西班牙波旁家族 188~191, 221, 228, 256
- Bourde, Andre-J., 博尔德, 安德烈-J. 115
- Bourgeoisie, 中产阶级, 市镇自由民 5, 19, 23, 30, 34, 45, 65, 68, 77, 89, 96, 112, 114, 116~117, 119~121, 124~125, 129, 132, 140, 142~145, 147, 150, 153, 156, 161, 167, 175, 182~184, 189~190, 193, 199, 202~203, 206, 215, 220, 222, 226, 231, 233, 254, 258, 273, 277, 280, 286~289, 见 Burghers, Capitalism, Farmers, capitalist; Financiers; Gentry; Industrialists; Merchants
- Bourgeois revolution, 资产阶级革命 5~6, 20, 24, 63, 87, 120, 123, 138 commercial, 从事商业的资产阶级, 见 Merchants
- foreign 外国的资产阶级 22, 143
- manufacturing, 从事制造业的资产阶级, 见 Industrialists
- Bourgogne, 勃艮第, 见 Burgundy

- Bouriliv, V. L. 博利里, V. L. 125
- Bouvier, Jean, 布维耶尔, 让 276, 279, 283
- Bourwsma, William, 鲍斯马, 威廉 4, 33, 118
- Bowman, Francis L., 鲍曼, 弗朗西斯. L., 46, 208
- Boxer, C. R., 博克瑟, C. R. 48, 63 ~ 64, 69, 158, 162, 166, 173, 184 ~ 185, 187, 192 ~ 193, 268, 273 ~ 274
- Boyer, Richard, 博耶, 理查德 156
- Brabant, 布拉班特 51, 54, 200, 见 Netherlands, southern
- Brading, D. A., 布雷丁, D. A. 151, 174
- Brandenburg (- Prussia), 勃兰登堡, 见 Prussia
- Braudy, 白兰地酒 187
- Braudel, Fernand, 布罗代尔, 费尔南 3, 6, 8, 20 ~ 21, 28 ~ 29, 145, 147, 184, 194, 246, 262, 276
- Braun, Rudolf, 布劳恩, 鲁道夫 229 ~ 230, 279
- Brazil, 巴西 17, 22, 51 ~ 52, 103, 147, 150, 157 ~ 158, 160 ~ 163, 166 ~ 167, 173 ~ 175, 183 ~ 187, 191, 193, 270, 276 ~ 277, 见 America, Iberian
- Bread, 面包 28, 见 Cereals
- Breda, Treaty of (1667) 布列达和约 79
- Breen, T. H., 布里恩, T. H. 165, 171
- Bregenzerwald, 布雷根茨林山 14
- Bremen - Verden, 不来梅 - 凡尔登 211
- Brenner, Robert, 布伦纳, 罗伯特 89 ~ 90
- Breslau, 布雷斯劳 235
- Brest, 布列斯特 248
- Brewers, 啤酒酿造人 260 ~ 261, 269
- Brick, 砖 13, 56
- Bridgetown, 布里奇顿 169
- Bristol, 布里斯托尔 115
- Britain, 不列颠, 见 Great Britain
- Broadcloth, 絨面呢, 见 Textiles, wool-len
- Bromley, J. S., 布罗姆利, J. S. 249 ~ 250, 286
- Brönsebro, Treaty of (1657) 布勒姆瑟布鲁条约 223
- Bronze, 青铜 156, 205, 208
- Brown, Vera Lee, 布朗, 韦拉李 191, 251, 257
- Bruchey, Stuart, 布鲁奇, 斯图尔特 238, 241
- Bruford, W. H., 布鲁福德, W. H. 234
- Bruges, 布鲁日 194, 198
- Brulez, W., 布律莱, W. 198
- Buccaneers, 海盗, 见 Piracy
- Buckwheat, 荞麦 14
- Buenos Aires, 布宜诺斯艾利斯 160, 183, 191
- Buffer stocks, 缓冲股票 56, 见 Trade
- Bulferetti, Luigi, 布尔费雷蒂, 路易吉

26, 195, 199~200, 202  
Bullion, 金块, 金条 16~17, 25, 37, 48  
~50, 58, 76, 103, 106~112, 149~  
152, 180, 184~187, 191~193,  
238, 276~277, 281, 见 Gold:  
Mints: Money: Prices: bullion: Silver  
Burckhardt, Jacob. 布克哈特, 雅各布  
114  
Burghers, 市民, 自治市居民 45, 67,  
70, 99, 145, 211, 218, 230, 254,  
287, 见 Bourgeoisie: Patricians:  
Towns  
Burghers revolt (1674), 市民起义 229  
Burghs, 市镇, 见 Towns  
Bürgin, Alfred, 伯金, 阿尔弗雷德 199  
Burgundy, 勃艮第 14, 80, 148  
Burke, Sir Edmund, 伯克, 埃德蒙爵士  
6  
Burke, Reter, 伯特, 彼得 62~63  
Burt, Roger, 伯特, 罗杰 263  
Busquet, Raoul, 比斯凯, 拉乌尔 125  
Buss, 巴斯 39  
Butter, 奶油, 见 Dairy products

## C

Cadiz (Cadix) 加的斯 111, 160, 188,  
191  
Cairú, 凯鲁 163  
Caizzi, Bruno. 凯兹, 布鲁诺 199  
Caledonia, 喀里多尼亚 253

Calico, 洋布 108, 264, 273  
Calories, 卡路里 55, 259, 见 Food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 51, 53, 67, 69,  
114, 125, 见 Christianity  
Camamú, 卡马穆 163  
Cambrai, 康布雷 95  
Camelots, 卡默洛 91  
Carneralism, 重商主义, 见 Mercantil-  
ism  
Carnisards, 卡米撒派〔1〕287  
Campagna, 坎帕纳 14  
Campbell, R. H., 坎贝尔, R. H. 81,  
265  
Canada, 加拿大 100, 102, 147, 172,  
273  
Canal du Midi, 杜米迪运河 262  
Canals, 运河, 见 Transport, canals  
Cancilo, Orazio, 坎西洛, 奥拉左 146  
Cane, 甘蔗, 见 Sugar  
Cape of Good Hope (Cape route), 好  
望角 47, 77, 253  
Capital, 资本 16, 19, 30, 32, 49~50,  
54, 56, 60, 67, 85~88, 91, 95, 100,  
107, 111, 125, 137, 152~155, 163  
~164, 167~168, 170~172, 174~  
175, 193, 202~203, 205~206,  
209, 211, 218, 241, 253, 263, 266,  
275, 280, 282, 285, 288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3, 5~9, 19, 23,  
26~28, 31~33, 37~38, 45~51,

〔1〕18世纪初在 Cévennes 地区反对路易十四的加尔文派教徒——译者



- 57, 59~60, 63, 65, 85, 93~94, 108  
~109, 116~117, 122, 130, 137~  
138, 143, 147~148, 156, 201~  
202, 255, 266, 269, 277~278, 280,  
289, 见 Agriculture, capitalist; Bour-  
geoisite; Companies; Industries; Mon-  
ey; Trade, World-economy  
capitalist agriculture, 资本主义农  
业, 见 Agriculture, capitalist  
court capitalism, 宫廷资本主义 285  
entrepreneurs, 企业家 25~26, 37,  
48~49, 51, 56~57, 78, 86, 93,  
100, 119, 130~131, 137, 147, 156,  
162, 167~172, 183, 194~195, 199  
~203, 206, 208~210, 231, 235,  
249, 258, 260~261, 265, 267, 274,  
286, 见 Bourgeoisie; Financiers;  
Gentry; Industrialists; Merchants;  
Planters  
merchant capital, 商业的资本 5,  
28, 32, 56, 76, 78, 123, 167, 193~  
195  
monopolies, 垄断 46, 49, 51, 56,  
121, 141, 154, 165, 201, 203~204,  
209~211, 218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从封建主  
义的转变 3, 5, 7, 31~32  
Capitalists, 资本家, 见 Bourgeoisie  
landed, 见 Farmers, capitalist  
Caps (political party), 无边帽党 220  
~221  
Cardozo, Manuel, 卡多索, 曼努埃尔  
187  
Carelia, 卡累利阿 219  
*Cargadoras de Indias*, 印度的码头工  
人 184  
Caribbean, 加勒比 9, 46, 52, 61, 64,  
69, 97, 103, 107, 112, 146~148,  
157~175, 183~184, 186, 188, 236  
~241, 255~257, 265, 267, 270~  
271, 273~274  
Carlo Emanuele II (of Savoy), 卡洛,  
埃马努埃莱二世 201  
Carlowitz, Treaty of (1699), 1699 年  
卡洛维茨条约 234  
Carlsson, Sten, 卡尔松, 斯腾 213, 216  
Carnagnani, Marcello, 卡马格纳尼, 马  
塞里奥 152  
Carmona, Maurice, 卡莫那, 毛里斯  
203  
Carolinas, 卡罗利纳 236, 240  
Carolingian era, 加洛林时代 13, 147  
Carr, Raymond, 卡尔, 雷蒙德 212  
Carrera, “竞赛” 157, 见 Trade, Atlantic  
Carrière, Charles, 卡里埃, 查尔斯 98,  
100, 103~104, 116, 268, 270  
Carstairs, A. M., 卡斯泰尔斯, A. M.  
254~255  
Carsten, F. L., 卡斯腾, F. L. 22~23,  
57, 226~232  
Carswell, John, 卡斯韦尔, 约翰 115,  
282  
Cartagena, 卡塔基纳 149  
Carter, Alice C., 卡特, 艾丽斯 C. 63,

- 79, 115, 250 ~ 251, 255, 257, 275, 279 ~ 281
- Cartographers, 绘图家 66
- Castile, 卡斯蒂利亚 14, 21, 108, 145, 180 ~ 183, 185, 188 ~ 189, 204 ~ 205, 219
- Castillo, Alvaro, 卡斯特罗, 阿尔瓦罗 58, 145 ~ 146, 183
- Catalonia, 加泰罗尼亚 14, 181 ~ 185, 187 ~ 189, 193, 250
- Catalan Movement, 卡塔兰运动 189  
Revolt of the Catalans, 卡塔兰人的起义 182, 188
- Cateau - Cambresis, Treaty of (1559), 卡托 - 康布雷西和约 70
- Catherine (of Braganca), 凯瑟琳 185
-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5, 63, 68 ~ 69, 102, 124, 145, 190, 204, 231, 253, 285, 见 Christianity; Counter - Reformation
- Cattle, 牲畜 83, 131 ~ 134, 139, 152, 157 ~ 158, 161, 221 ~ 222, 224, 254, 261 ~ 262, 265, 见 Livestock
- Cavalry 骑兵, 见 Army
- Caviar, 鱼子酱 274
- Cédulas, 证明, 字据 155
- Celtic (areas), 凯尔特族地区 123, 288
- Cens, 年贡, 见 Rents, quit - rents
- Cereals, 谷物 13 ~ 14, 16, 21 ~ 22, 25, 40 ~ 41, 46, 50, 53, 60, 63, 75, 82 ~ 84, 87, 89 ~ 90, 98 ~ 99, 131 ~ 132, 134, 139, 141, 146, 151 ~ 152, 165 ~ 166, 180, 202, 210, 217, 219, 222, 224, 237, 259 ~ 260, 262, 267, 274, 见 Barley; Bread; Buckwheat; Food; Millet; Oats; Rye; Sorghum; Wheat  
shortage of, 粮食短缺, 见 Food, shortage of
- Cernovodeanu, Paul 塞诺沃迪亚努, 保尔 272
- Céspedes del Castillo, Guillermo, 塞斯佩德斯, 德尔·卡斯蒂略, 吉列尔莫 174
- Ceylon, 锡兰 274
- Chatupnicy, 135, 见 Farmers, small
- Chambers, J. D., 钱伯斯, J. D. 82, 260, 263
- Chamillart, Michel de, 沙米亚尔, 米歇尔 276
- Chandler, David G, 钱德勒, 达维德 G 219
- Channel, the, 海峡 83
- Channel Islands, 海峡群岛 249
- Charcoal, 木炭 101
- Charity, 慈善 45
- Charles I (of England), 查理一世(英国国王) 59, 77
- Charles II (of England), 查理二世(英国国王) 79, 83, 122, 159, 185
- Charles II (of Spain), 查理二世(西班牙国王) 185, 188 ~ 190, 255
- Charles III (of Austria), 查理三世(奥

- 地利国王)198
- Charles V (of Spain), 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32, 38, 114, 232
- Charles VI (of Austria), 查理六世(奥地利国王)232, 234
- Charles IX (of Sweden), 查理九世(瑞典国王)203, 209
- Charles X (of Sweden), 查理十世(瑞典)213, 223
- Charles XI (of Sweden), 查理十一世(瑞典)214~215, 217
- Charles XII (of Sweden), 查理十二世(瑞典)203, 215~217, 219~220, 234, 240, 252
- Charrue*, 犁 88
- Chartered companies, 特许的公司, 见 Companies
- Chartists, 宪章运动者 125
- Chaudhuri, K. N., 肖德尤里, K. N. 97, 107~108
- Chaunu, Huguette, 肖尼, 于盖特 107, 183~184, 262
- Chaunu, Pierre, 肖尼, 皮埃尔 3~4, 6~7, 14, 20~22, 25, 27, 51, 67~68, 75, 84~85, 148, 152, 157, 162, 183, 189, 245, 274, 286~287
- Cheese, 乳酪, 见 Dairy products
- Cherepnin, L. V., 切列普宁, L. V. 218
- Cherry, George L., 彻里, 乔治 L 269
- Chesapeake Valley, 切萨皮克谷地 164~165, 170, 236
- Chevalier, Francois, 舍瓦利耶, 弗朗索瓦 148~149, 154~155, 162
- Child, Josiah, 蔡尔德, 乔赛亚 93~94
- Chile, 智利 134, 149, 152~153, 173
- China, 中国 97, 107, 264, 273, 见 Orient
- Chinoiserie, 中国古玩 273
- Chintz, 花布 264
- Choiseul, Etienne - Francois, Duc de, 舒瓦瑟尔, 艾蒂安 - 法朗西斯, 迪克·德 192, 247
- Christelow, Allen, 克里斯特洛, 艾伦 160, 185, 191~192, 257
- Christian IV (of Denmark), 克里斯蒂安四世(丹麦)223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70, 144, 见 Calvinism; Catholic Church; Mediterranean; Christian; Protestantism
- clergy, 教士 68~69, 99, 120, 124, 142, 216, 244, 287
- new Christians, 新基督教徒, 见 Marranos
- Christianopel, Peace of (1645) 1645年克里斯蒂安诺帕尔和约 223
- Christina (of Sweden), 克里斯蒂娜(瑞典)205, 215
- Cipolla, Carlo M., 奇波拉, 卡洛, M 3, 5, 20, 199
- Circulation, 流通, 见 Trade
- Cities, 城市, 见 Towns
- Civil servants, 文官, 见 State, bureaucracy

- Civilizations, 文明 7, 23, 27, 32, 65, 210
- Clapham, Sir John, 克拉彭, 约翰爵士 278
- Clarendon, Earl of (Edward Hyde), 克拉伦登, 厄尔 40, 61
- Clark, G. N., 克拉克, G. N. 5~6, 40, 46, 66, 90, 188~189, 246, 249, 251, 269
- Classes, 阶级 9, 19, 31, 71, 114, 117, 111~123, 144, 167, 169, 179, 188, 201, 212, 222, 231, 247, 262
- class - struggle, 阶级斗争 70, 84, 113, 120, 141, 144, 147, 189, 287
- lower working, 低层劳动 16, 28~29, 31~32, 45, 63~64, 68, 125, 144, 155, 173, 见, Poor; workers
- middle manufacturing, mercantile, 中产阶级 6, 32, 63, 67~68, 12, 172, 190, 265, 287, 见 Bourgeoisie; Mercants; State, bureaucracy
- peasant, 农民, 见 Peasantry
- upper ruling, landowning, 上层统治 19, 25, 30~31, 33, 70, 120, 122, 121, 129, 142, 144, 154, 185, 189, 197, 216~217, 267, 285, 286, 288, 见 Aristocracy; Junkers; Nobility; Seigniors
- Classicism, 古典主义 33
- Clergy, 教士, 见 Christianity, clergy
- Cleve, 克利夫 215, 227~228, 230
- Climate, 气候 18, 29, 82, 163~164, 186, 214, 230, 238, 248, 258
- Clock-making, 钟表制造 93, 199~200
- Closed economy, 封闭的经济, 见 Mercantilism
- Clasiers 小块土地耕作者 135, 见 Farmers,
- Cloth, 布料, 见 Textiles
- Clothiers, 布商 97, 207, 236, 260, 见 Weavers
- Clover, 苜蓿 84, 259
- Clyde, 克莱德 255
- Coal, 煤炭 95, 100, 263
- smelting, 冶炼 148, 263
- Coats, 科兹 W., 94
- Cobbett William, 科贝特, 威廉 274
- Cochinea, 洋红 91
- Cocoa, 可可
- Coen Jarpieterszoon, 46~47
- Coerced labor, 强制劳动 103, 132, 135, 146, 153~155, 174, 见 Corvee - labor; Slavery, 劳役, 徭役
- Cash-crop, 商品性农作物 134, 138, 174~175
- Coffee, 咖啡 164, 273
- Coffeesergeants, 咖啡巡视官 49
- Coinage, 造币, 见 Money
- Colbert, Jean-Baptiste, 科尔贝, 让-巴蒂斯特 44, 81, 84, 94~95, 112, 116~119, 123~124, 186, 198~199, 246, 248, 266, 268, 278, 282
- Colcheste, 科尔切斯特 66

- Cole, 科尔 W. A. , 269
- Coleman, D. C. , 科尔曼, D. C. 5, 37, 238, 259, 263
- Coleseed, 油菜籽 13
- Colonies, 殖民地 20, 46~47, 51~52, 101~103, 146, 151~152, 156~160, 164~165, 167~170, 173, 181, 183~186, 189, 191, 193, 203, 209~210, 235~241, 247, 253~255, 257, 263, 265~266, 268~270, 273, 280, 282
- colonial products, 殖民地产品 43, 61, 103, 236, 241
- settlers, 移民 48, 52, 101, 103~104, 109, 154, 159, 193, 239, 273
- Columbus, Christopher, 哥伦布, 克里斯托弗 6
- Comenius, John Amos, 科梅纽斯, 约翰阿莫斯 67
- Commenda, 科曼达 203
- Commerce, 商业, 见 Trade
- Commercial aristocracy, 商业贵族, 见 Merchants
- Commercial crops, 商业农作物, 见 Agriculture, capitalist
- Commerical primacy, 商业的首要性, 见 Trade, commercial primacy
- Commission agents, 代理商 56, 169~170, 275, 见 Merchants
- Commonwealth of the Gentry, 贵族共和国 142~144
- Communal proerty, expropriation, 公共财产, 见 Agriculture, consolidation
- Compagnie de Chine*, 中国瓷器公司 282
- Compagnie des Indes*, 印度公司 282~283
- Compagnie d' Indes orientales*, 东印度公司 282
- Compagnie d' Occident*, 西方公司 282
- Compagnie d' Ostende*, 东方公司 198
- Compagnie du sénégál*, 塞内加尔公司 282
- Compagnie française du Nord*, 法国北方公司 272
- Companies, 公司 27, 32, 46, 50~57, 78, 95~96, 98, 107, 111, 125, 137, 171, 201, 206, 215, 237, 255, 278, 见 Companies by title; Partnership system; Stocks
- 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s into Africa, 皇室非洲探险公司 270
- Company of Scotland, 苏格兰公司 252~254
- Composición*, 合成物 155
- Conciertos*, 协议 174
- Conde, Prince of 康德王子 74
- Conscription, 征兵(制度), 见 Army
- Conseil du Roi*, 国王参议院, 枢密院, 议事会 84, 见 France
- Constantini, Claudio, 康士坦丁尼, 克劳迪奥 195, 199~200
- Contadini*, 农民, 见 Peasantry

- Continental Blockade, 大陆封锁 247
- Continental (or Military) school of thought, 大陆(陆军)学派 246 ~ 247, 249
- Contraband, 禁运品 79, 102, 151, 153, 158, 160 ~ 161, 166, 184 ~ 185, 191, 193, 197, 253, 256 ~ 257, 260, 271
- Contraction, economic, 经济缩减, 见 Cycles, economic, B-phases
- Contra - Remonstrants, 反抗辩, 见 Gomar, François
- Cook, Sherburne, F., 库克, 舍伯恩, F. 153
- Cooper, J. P., 库珀, J. P. 64
- Coornaert, E. L. J., 库尔纳特, E. L. J. 46, 48
-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160, 223
- Copper, 铜 17, 108, 112, 133 ~ 134, 204 ~ 206, 209 ~ 210
- Copper coins, 铜币 108, 112, 130, 205, 见 Money, metallic; Vellon
- Copyholders, 公簿持有农 86 ~ 87, 125
- Core (states), 中心国家 8 ~ 9, 17, 26 ~ 27, 32, 37 ~ 39, 48, 61, 65, 75 ~ 76, 81 ~ 84, 93, 95 ~ 96, 116, 123, 129 ~ 130, 137, 142 ~ 144, 151, 156, 158, 160, 162, 166 ~ 168, 179, 185, 196, 211, 217 ~ 218, 223, 225, 228, 233, 241, 262, 273, 277
- Core rivalries, 中心国家的竞争 76, 92 ~ 93, 98, 181, 184, 241, 245 ~ 246, 250 ~ 251, 253, 274
- Corn, 谷物, 见 Wheat
- Corn Laws, 谷物法 90
- Coromandel, 科罗曼德尔 107
- Corporations, multinational, 多边国家的法人组织, 见 Companies
- Corregidores, 督办 153 ~ 154
- Corsair fleets, 海盗船, 见 Piracy
- Corvée - labor, 劳役, 徭役 132, 135 ~ 136, 138 ~ 141, 212, 222 ~ 223, 226 ~ 227, 232, 见 Coerced labor, cash crop
- Corvisier, André, 科威斯尔, 安德烈 124
- Cossacks, 哥萨克 145, 214
- Cost of living, 生活消费 16, 268, 270
- Coaster, Samuel, 科斯特, 萨缪尔 68
- Cotentin, 科唐坦半岛 14
- Cottagers, 农场雇工 15, 216, 见 Laborers: Peasantry
- Cottars, 农事工人或佃农 132
- Cotton, 棉花 51, 91, 98, 103, 152, 162, 200, 264, 266 ~ 267, 273
- Cottrell, Fred, 科特雷尔, 弗雷德 246
- Council Pensionary 养老金会议 62,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 Counter - 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 76, 145, 231, 287, 见 Catholic Church
- Country (as contrasted with Town or Court), 乡村 16, 22, 30, 87, 92, 122 ~ 123, 132, 138, 158, 182 ~ 183,

- 194, 197 ~ 198, 200 ~ 201, 222, 228, 231
- Courland, 库尔兰 207
- Court, Antoine, 安东尼法庭 287
- Courtiers, 朝臣, 见 Aristocracy
- Cowboys, 牛仔 159
- Cows, 奶牛, 见 Livestock
- Cracow, 克拉科 138, 141, 145
- Craeybeckx, Jan, 克雷贝克斯, 简 194, 198
- Crafts, 工艺, 见 Artisans
- Craig, Gordon A., 克雷格, 格登 A. 230
- Craven, Wesley Frank, 克雷文, 韦斯利·弗兰克 236
- Credit, 信贷, 见 Money credit
- Creoles, 克里奥尔山岭 151, 154, 158
- Creutz, Count Philip, 克罗伊茨, 菲利普伯爵 215
- “Crisis”, “危机” 3 ~ 4, 7, 9, 13, 15 ~ 16, 18 ~ 20, 24 ~ 26, 29 ~ 31, 33 ~ 34, 87, 110, 137, 149, 166, 185 ~ 188, 197, 204, 206, 215, 221 ~ 222, 249, 251, 253 ~ 254, 264, 276, 282, 284, 见 Cycles, economic, B ~ phases
- Cromwell, Oliver, 克伦威尔, 奥利佛 77 ~ 79, 159, 207, 236, 246, 251
- Cronstadt, Carl Johan, 克龙斯泰特, 卡尔·约翰 170
- Croot, Patricia, 克鲁特, 帕特丽夏 89 ~ 90
- Crosby, Alfred W., 罗斯比, 阿尔弗雷德 W. 153
- Cross, Harry E., 罗斯, 哈里 E. 151, 174
- Crouzet, Francois, 克鲁泽, 弗朗索瓦 4, 96, 266
- Crown, 国王, 见 State
- Crying-up of money, 拜金, 见 Money, devaluation
- Cuba, 古巴 157
- Cuenca, 昆卡 181
- Cullen, L. M., 卡伦, L. M. 265
- Cultivators, 开垦者, 见 Farmers
- Culture, 文化 65, 67, 181, 234, 289
- Cunningham, W., 柯宁罕姆, W. 40, 59, 266 ~ 267
- Curacao, 库拉索 64, 159, 235
- Curing (salting), 腌 39
- Currency, 货币, 见 Money
- Curtin, Philip D., 柯廷, 菲利普 D. 102, 173
- Cycles, economic, 周期性 3 ~ 8, 18 ~ 21, 33 ~ 34, 37, 53, 71, 120, 149
- A - phases, 3 ~ 4, 8, 18, 20, 25, 29, 31, 100, 104, 120 ~ 121, 129 ~ 130, 136, 139 ~ 140, 142, 148 ~ 149, 156, 162, 166, 173, 182 ~ 183, 211, 233, 241, 245, 262, 269, 276 ~ 277
- B - phases, 3 ~ 4, 8, 12, 17 ~ 26, 30 ~ 34, 40, 49 ~ 50, 52, 57, 76, 82, 87, 89 ~ 90, 92 ~ 94, 96, 98 ~ 99, 103 ~ 104, 110 ~ 111, 120, 129 ~ 133, 137, 139, 142, 144 ~ 150, 152,

- 155 ~ 156, 158, 162, 165 ~ 166, 179, 182, 184, 194, 196, 198 ~ 199, 202 ~ 204, 214, 224, 229, 233, 241, 244, 249, 251, 253, 257, 258, 260, 262, 267, 270, 276, 见“Crisis”
- Cyprus, 塞浦路斯 49
- Czechia, 捷克 75, 139, 231, 见 Bohemia; Czechoslovakia; Moravia
-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131, 138, 142, 194, 196, 见 Bohemia; Czechia; Moravia; Slovakia
- ### D
- Dahlgren, Stellan, 达格伦, 斯特兰 213, 215 ~ 217
- Dairy products, 乳制品 13, 41, 88, 199 ~ 200, 261, 265
- Dales, J. H., 戴尔, J. H. 107
- Danby, Earl of (Thomas Osborne Leeds), 丹比 122
- Danzig, 但泽, 见 Gdańsk
- Darby, H. C., 达比, H. C. 82, 99, 223, 225, 258
- Darien, Isthmus of, 伊斯默斯的达里恩 253
- Darien Company, 达里恩公司 252 ~ 253
- da Silva, José Gentil, 达·席尔瓦, 何塞-让蒂尔 146, 180, 203
- Davies, C. S. L., 戴维斯, C. S. L. 125
- Davies, K. G., 戴维斯, K. G. 101 ~ 102, 163, 165, 169 ~ 170, 240, 257, 273
- Davis, Ralph, 戴维斯, 拉尔夫, 3, 19, 41, 48, 50, 78, 96, 98, 102, 104, 149 ~ 150, 154, 156, 159, 161 ~ 162, 172, 265, 266
- Deane, Phyllis, 迪恩, 菲利斯 265, 269
- Debien, Gabriel, 德比安, 加布里埃尔 172
- Debotecki, Fr, Wojciech, 德波尔曼斯基, Fr. 沃斯爱兹 144
- de Brouchaven, Jean, 德·布鲁恰文, 简. 198
- Debt papers, 欠债文件, 见 State, finances
- Debt peonage, 偿债工(劳役偿债) 155, 167, 174, 194, 206, 见 *Gananes; Naborios*
- Decadence, century of (*decadencia*), 颓废的世纪 180
- de Castro, Antonio Barros, 德·卡斯特洛, 安东尼奥·巴罗斯 162
- Declaration of Rights (1689), 权利宣言 246
- de Dezert, G., 德尔泽特, G. 180
- Deflation, 通货紧缩, 见 Prices, decline of
- Defoe, Daniel, 迪福, 丹尼尔 46, 254
- de Geer, Louis, 德·海尔, 路易丝 206, 208 ~ 209
- Dehio, Ludwig, 德黑欧, 路德维格 102, 257
- Delamarre, Mariel Jean Brunhes, 德拉



- 马里, 马里耶·让·布鲁赫斯 88  
 Delft potteries, 陶器场 200, 273  
 Delumeau, Jean, 德卢摩, 让 96, 116, 185  
 De Maddalena, Aldo, 德·马达伦纳, 阿尔多 14~15, 20, 40, 116, 199  
 Demesne, 领地不出租的自营地 30, 216, 222~226  
 Democracy, 民主 286  
 Demography, 人口统计学, 见 Population  
 De Moncada, Sancho, 德·蒙卡达, 桑乔 157  
 Dendermonde, 登德尔蒙德 255  
 d'Enghein, Duke, 德昂吉安, 公爵 74  
 Denmark, 丹麦 22, 66, 77, 133, 138~139, 143, 160, 211, 213~215, 221~224, 229~230, 239, 261, 270, 282  
 Depreciation, 缺少宰食, 见 Meat, shortage of  
 Depression, economic, 经济萧条, 见 Cycles, economic, B-phases  
 Depression of 1622, 1622 年大萧条 76, 148  
 Deprez, P., 德普雷, P. 258  
 Dermigny, Louis, 德米尼, 路易斯 78, 172  
*Dérégation*, 违背 285  
*Derrama*, 特别的(或暂时的)税收 154, 见 State, finances  
 Descartes, René, 笛卡尔, 勒内 7, 34, 66, 70  
 Deschamps, Hubert, 斯堪普, 胡伯特 159, 161  
 Dessert, Daniel, 德色特, 丹尼尔 117  
 Desserts, 鲜果 259  
 Devonshire, William Cavendish, Duke of, 德文郡, 威廉·卡文迪什公爵 122  
 De Vries, Jan, 德·弗里埃, 让 18, 41, 46, 63, 78, 92, 200, 261~262, 268  
 De Vries, Philip, 德·弗里埃, 菲利普 78, 83, 197, 205  
 de Witt, Jacob, 德·威特, 雅各布 69, 80, 223  
 De Witt, Johan, 德·威特, 约翰 62, 80  
 Deyon, Pierre, 德约恩, 皮埃尔 42, 44~45, 58, 60, 76, 90~91, 95, 107, 110, 125, 233, 255, 278, 282  
 de Zeeuw, J. W., 德·泽, J. W. 54  
 Dickerson, Oliver M., 迪克森, 奥利佛 M. 241  
 Diplomacy, 外交 214, 272, 275  
 "Disastrous War" school, "灾难战争" 学派 22  
*Dispositionshandel*, 支配者 198  
 Distillers, 蒸馏器 168, 261, 见 Alcoholic beverages  
 Dobb, Maurice, 多布, 莫里斯 5~6, 30  
*Dobla*, 154  
 Dobyms, Henry F., 多宾斯, 亨利 F. 153  
 Dominquez Ortiz, Antonio, 多米圭斯·

- 奥梯兹, 安东尼奥 190
- Donnan, Elisabeth, 唐南, 伊利沙白 271
- Dordrecht, Synod of, 多德雷赫特宗教会议 67~68, 206
- Dorn, Walter L., 多恩, 沃特 L. 230
- Dorsal spine of Europe, 欧洲之脊 112, 179, 193, 196, 200, 202
- Dorwart, Reinhold A., 多瓦尔特, 赖因霍尔德 A 229, 233
- Douro, 杜罗河 187
- Dover, 多佛尔 77
- Downing, Sir George, 唐宁, 乔治爵士 40, 61, 79, 118
- Drake, Sir Francis, 德雷克, 弗朗西斯爵士 111
- Draperies, 绸缎, 见 Textiles
- Dresden, 德累斯顿 144
- Drobná szlachta*, 低等贵族 143, 见 Nobility, lesser
- Droit de seigneurage*, 领主权, 见 State, finances
- Duby, Georges, 达比, 乔治 13
- Ducal Prussia, 普鲁士大公, 见 Prussia, Ducal
- Duckham, Baron F., 达克罕姆, 巴罗·F. 93
- Dunbar, 邓巴 39
- Duncan, T. Bentley, 杜坎, T·本特利 47, 186
- Dunn, Richard S., 邓恩, 理查德 S 161, 163~164, 168, 172~173, 270
- ~271
- Dunsdorfs, Edgars, 达恩斯多夫, 埃德加斯 52, 135, 211~212
- Dupâquier, J., 迪帕格, J. 87~89
- Dupuy, Alex, 杜布依, 亚历克斯 173
- Durand, Georges, 杜兰德, 乔治 89
- Durand, Yves, 杜兰德, 伊夫 278
- Durie, Alastair J., 杜里埃, 阿拉斯泰尔 J 265~266
-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荷兰东印度公司 46~51, 61, 78, 206, 274
- "Dutch Gold Mine", "荷兰金矿", 见 Herring
- Dutch Republic, 荷兰共和国,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 Dutch war of independence, 荷兰独立战争, 见 Netherlands, revolution
-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荷兰西印度公司 50~51, 163
- Dworzaczek, Włodzimierz, 德沃扎兹克, 伍罗德兹密尔兹 135
- Dyes, 染料 41, 43~44, 91, 185, 269, 见 Cochineal; Coleseed; Indigo; Madder; Pastels; Rapeseed
- Dyewoods, 染料木 236

## E

- Eagly, Robert V., 伊格里, 罗伯特 V. 221
- "Earlier decline" school, "过早衰落" 学派 22

- East, W. G., 伊斯特, W. G. 263
- East Anglia, 东英格兰, 37, 42
- East Country, 东方国家, 106, 239
- East Elbia, 见 Germany, east
- East Indies, 东印度群岛, 见 Indies, East
- Eastland Company, 伊斯特兰公司 52, 99, 240
- Ecological exhaustion, 生态的枯竭, 见 Soil conditions
- Ecuador, 厄瓜多尔 174
- Edel, Matthew, 伊德尔, 马修 163
- Edict of Nantes, 南特敕令 124, 183  
Revocation of, 南特敕令的撤销 102, 124, 249, 279, 286, 287
- Edinburgh, 爱丁堡 252, 254
- Education, 教育 66, 287~288
- Edward I (of England), 爱德华一世 (英国) 78
- Egypt, 埃及 49
- Ehman, John, 埃尔曼, 约翰 248~249
- Eighty Years' War, 八十年战争, 见 Nether-lands, revolution
- Elbe, 易北河 201
- Elbeuf, 埃尔伯夫 95
- Elblag, 埃尔布拉格 135
- El Dorado, 埃尔多拉多 164
- Elizabeth (of England), 伊丽莎白 (英国) 5, 159
- Elliott, C. M., 埃利奥特, C. M. 261
- Elliott, J. H., 埃利奥特, J. H. 26, 180~185, 188~189, 203
- Elmina, 埃尔米纳 52
- Emmanuel, Archin, 伊曼纽尔, 阿芬 94
- Emmenthal, 埃默河谷 14
- Emmer, Pieter, 埃默, 彼得 32
- Empire, 帝国 48, 151, 184~185, 188  
Austrian, 奥地利帝国 190, 199, 225, 255  
Hapsburg, 哈布斯堡帝国 75, 139, 142~143, 145, 190, 204, 225~226, 228, 231, 234, 236  
Holy Roman, 神圣罗马帝国 199  
Mughal, 莫卧儿帝国 98  
Ottoman, 奥斯曼帝国 8, 49, 91, 98, 106~108, 144, 146, 219, 232, 234, 272, 276, 见 Balkans, Tinkist world - empire, 世界帝国 38, 47, 64, 180, 219, 见 State universal monarchy
- Employment, 雇工, 16, 56, 66, 86, 92, 94, 99, 129, 159, 196, 199, 258, 264, 269, 280, 见 Workers
- Enclosures, 圈占地, 见 Agriculture enclosures
- Encomienda, 监护制, 监护区 155
- Encyclopedists, 知识渊博者 289
- Endelman, Todol M. 恩德曼, 托德 M. 78
- Engagés, 雇用, 见 Laborers indentured
- Engels, Friedrich,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6, 28, 31
- Enghein, Duc, d'74 昂吉安公爵

- Engineering, 工程 40, 80
- England, 英国,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英国东印度公司,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East India Company
- Engravers, 雕刻师 66
- Engrossment, 大量收购 226
- Enhaut, 恩豪特地区 14
- Enjalbert, Henry, 恩贾尔伯特, 亨利 262
-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4, 66
- Entrepreneurs, 企业家, 见 Capitalism, entrepreneurs
- Eon, Chevalier d', 埃翁, 谢瓦利埃 148
- Epidemics, 传染病 42, 50, 75, 130, 146, 153, 173, 187, 223, 248, 258, 260
- Episcopalians, 主教派教友 254, 见 Protestantism
- Erfurt, 爱尔福特 14
- Ericeira, Count of, 埃里塞拉伯爵 186 ~ 187
- Erik XIV (of Sweden) 埃里克十四世 203
- Ernle, Lord, 厄恩利勋爵 259 ~ 260
- Esquemelin, John 埃斯奎默灵, 约翰 128
- Estancia, 埃斯坦西亚 148, 155
- Estates, 等级, 集团, 财产 85 ~ 89, 138 ~ 144, 147 ~ 158, 161 ~ 164, 167 ~ 175, 202, 211 ~ 217, 220, 225 ~ 231, 235, 263, 285
- intermediaries, 中间人 88
- owners, 领主 86 ~ 87, 162, 202, 见 Landlords
- Swedish, 瑞典人, 见 Sweden, Estates
- Third Estate, 第三等级 见 France, Third Estate
- Estland, 埃斯特兰 215
- Estonia, 爱沙尼亚 132, 211, 215, 219
- Ethnic groups, 种族集团 142, 144 ~ 145, 232
- Europe, 欧洲 3, 5 ~ 8, 13 ~ 14, 16 ~ 20, 23 ~ 24, 26 ~ 31, 34, 39 ~ 42, 46 ~ 49, 51, 54, 60, 65, 67 ~ 68, 70, 75, 82, 91, 96, 101 ~ 103, 107 ~ 110, 112, 115, 120, 122, 132, 134, 142, 150, 152, 155 ~ 157, 160, 162 ~ 163, 165, 168 ~ 169, 173 ~ 174, 179, 181, 184, 186, 188 ~ 189, 191, 194, 196, 198, 200, 203 ~ 204, 207 ~ 208, 210, 214 ~ 215, 217, 221, 227, 230 ~ 231, 234, 236 ~ 238, 245 ~ 248, 257 ~ 258, 260, 262, 269, 272 ~ 276, 281, 284, 286, 见 Mediterranean (region)
- central, 中欧 14, 20 ~ 21, 71, 130, 144, 195, 201, 205, 209, 214, 225, 233 ~ 234
- eastern, 东欧 8, 13 ~ 14, 18, 20, 31, 84, 98 ~ 99, 131 ~ 135, 138, 140 ~

- 147, 151 ~ 152, 155, 158, 166 ~ 167, 202 ~ 204, 208, 211, 214, 217, 222, 224 ~ 227, 235  
 expansion of, 欧洲的扩张 75, 145, 234  
 northern, 北欧 14, 21 ~ 22, 37, 42, 50, 97, 99 ~ 100, 163, 208, 224, 239  
 northwest, 西北欧 37, 49 ~ 50, 132, 157, 185, 193, 207  
 southern, 南欧 13, 21, 43, 75, 133, 145, 147, 158, 167, 237  
 western, 西欧 13 ~ 14, 30 ~ 31, 88, 103, 109, 133, 138, 211, 218 ~ 219, 233, 258, 273 ~ 274
- Evelyn, John, 伊夫林, 约翰 99
- Everitt, Alan, 埃弗里特, 艾伦 85
- Exchange, 交换, 见 Trade Old, 2
- Exempt Provinces, 免税省 190
- Exeter, 埃克塞特 21
- Expansion, 扩展, 见 Agriculture, expansion of cultivated areas; Cycles, economic, A ~ phases; Population, expansion of
- Exploitation, 开发 30, 167, 196, 200, 241
- External arena, 外部地区 17, 47, 50, 272
- F
- Faber, J. A., 费伯, J. A. 42, 44, 52, 91, 133 ~ 134
- “Factory ship”, “工厂船” 39
- Factory System, 工厂制度 196
- Falmouth, 法尔茅斯 166
- Falun, 法伦 205
- Family, 家庭 27, 31, 86, 89, 120, 193, 196, 202, 206, 215, 227
- Famines, 饥荒, 见 Food, food shortages
- Fanfani, Amintore, 范范尼, 阿明托雷 29
- Far East, 远东, 见 Orient
- Farmers, 农民, 农场主 15, 41, 82, 87, 131, 164, 216, 222, 259 ~ 261, 288, 见 Gentry; Landlords; Peasantry  
 capitalist, 资本主义农场主 86, 88 ~ 90, 168, 见 Agriculture, capitalist; Junkers  
 gentlemen, 绅士 86, 215  
 small, 小农场主 15, 83, 86 ~ 89, 134 ~ 135, 155, 170, 259  
 tenant, 佃户 15, 85 ~ 90, 136, 140, 145, 175, 201, 212, 217, 222  
 yeoman, 自耕农 15, 85 ~ 89, 92, 134 ~ 135, 141, 143, 182, 188, 213, 216, 286 ~ 287
- Farms, 农场, 见 Agriculture
- Five Great, 五大包税区, 见 France, Five Great Farms
- Farnell, J. E., 法内尔, J. E. 78
- Farnie, D. A., 法尼, D. A. 79, 161, 164, 173, 238 ~ 239
- Fayle, Ernest C., 费伊勒, 欧内斯特 C. 247, 257
- Febvre, Lucien, 费夫尔, 吕西安 117

- Fedorowicz, Jan K., 费多罗维茨, 简 K. 217
- Fehrbellin, Battle of (1675) 费尔贝林战役 214
- Fenton, Alexander, 芬顿, 亚历山大 83
- Féodalité* 289, 封建制度, 见 *Classes*, upper
- Ferdinand (of Spain), 斐迪南(西班牙国王) 182
- Fermages, fermiers*, 地租, 佃农, 见 *Farmers, tenants*
- Ferme générale des impôts*, 封闭的普遍的税收 283, 见 *State, finances*
- Fermes - Unies*, 287
- Fermiers - généraux*, 包税人 88, 278
- Fernandez de Pinedo, Emiliano, 费尔南德兹·皮内多, 伊米利安诺 182, 187
- Fertilizers, 肥料, 见 *Agriculture, fertilizers*
- Feudalism, 封建主义, 封建制度 3, 5 ~ 8, 24 ~ 32, 85, 94, 119, 121, 125, 134, 147 ~ 148, 204, 207, 213 ~ 215, 226 ~ 227, 231, 264, 286  
 crisis of, 封建主义危机 18, 25, 29 ~ 37, 147  
 feudal dues, 封建义务 276
- Field, Peter, 费尔德, 彼得 5 ~ 6
- Fifteen Years' War, 15 年战争 134
- Financial Revolution, 财政革命, 见 *Revolution, financial*
- Financiers, 财务官, 金融(银行)家 38 ~ 39, 49, 67, 123, 210, 232, 278 ~ 279, 282, 285, 见 *Banking; Money; Traitants*
- Finer, Samuel E., 范纳, 塞缪尔 E. 80, 115, 230, 248
- Finland, 芬兰 100, 209, 211, 213 ~ 215, 218
- Firms, 公司, 见 *Companies*
- Fischer, 费希尔, 沃尔弗拉姆 Wolfram, 81
- Fish, 鱼类 39 ~ 40, 52, 161, 185 ~ 187, 237, 见 *Food*
- Fisher, F. J., 费希尔, F. J. 83, 103
- Fisher, H. E. S., 费希尔, H. E. S. 191 ~ 192, 261, 272
- Fisheries, 渔业 39, 43, 61, 79
- Fishermen, 渔民 39
- Fishing boats, 渔船, 见 *Transport, maritime*
- Fiume, 阜姆 234
- Fjärdedepartsräfsten*, 被交回 213
- Flanders, 佛兰德斯 16, 41, 45, 75, 77, 83, 179, 198, 200, 202, 206, 209, 215, 250, 256, 265, 270, 273, 见 *Netherlands southern*
- Flax, 亚麻 13 ~ 14, 41 ~ 42, 100, 211, 218, 239
- Fleming, Klas, 弗莱明, 克拉斯 215
- Fleury, André Hercule, Cardinal, 弗勒里, 安德列·埃居尔, 红衣主教 220
- Flinn, M. W., 弗林恩, M. W. 101, 258, 283

- Flint, John, 弗林特, 约翰 210
- Florence, 佛罗伦萨 196
- Florescano, Enrique, 弗罗里斯卡纳, 伊里奎 152
- Flotillas, 小舰队, 见 Navy
- Flour, 面粉 192, 261
- Floyd, Troy S., 弗洛伊德, 特洛伊 S. 161
- Fodder, 饲料, 见 Agriculture, fodder (forage)
- Folwark, 领地 134
- Fontamebleau, 枫丹白露 287
- Food, 食物 13, 16, 25, 39, 75, 146, 148, 151, 157, 159, 165, 172, 174, 202, 263, 见 Cereals; Fish; Meat; Staples  
shortage of, (食物的) 缺乏 13, 50, 75, 130, 138, 146, 218, 253, 258 ~ 259, 284
- Forage crops, 饲料, 见 Agriculture, fodder (forage)
- Forbes, R. J., 福布斯, R. J. 162
- Forced wage - labor, 强制工资劳动, 见 Coerced labor, forced, wage - labor
- Ford, Franklin, 福特, 弗兰克林 286
- Fouquet, Nicolas, 富凯, 尼古拉斯 95
- Frülsebönder, 贵族土地上的农民 212 ~ 213, 216, 见 Peasantry
- France, 法国 17, 20 ~ 22, 24, 31, 33, 39, 41, 46, 48, 50 ~ 52, 59 ~ 60, 62, 64 ~ 67, 70 ~ 71, 75 ~ 77, 79 ~ 82, 84 ~ 89, 91 ~ 105, 109, 111 ~ 113, 115 ~ 121, 123 ~ 125, 138, 141 ~ 142, 147, 157 ~ 161, 164 ~ 170, 181 ~ 182, 184 ~ 191, 193, 195, 197 ~ 201, 206, 208, 211, 214 ~ 215, 219 ~ 223, 228 ~ 235, 237, 239, 241, 245 ~ 248, 250 ~ 253, 256 ~ 258, 261 ~ 264, 266 ~ 270, 272 ~ 273, 276 ~ 277, 279 ~ 289  
eastern, 东部 75, 88
- Five Great Farms, 五大免税区 81, 104, 118, 267 ~ 268
- French Canada, 法属加拿大, 见 Canada
-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 6 ~ 7, 70, 120, 207, 266, 278, 283, 288  
northern, 北部 37, 41, 84, 87 ~ 90, 138, 141, 259  
Royal Manufactures, 王室工业 94 ~ 95, 117  
southeast, 东南部 259  
southern, 南部 84, 88, 138, 180, 262, 268  
Third Estate, 第三等级 287  
Treasury, 国库 276  
western, 西部 37, 75, 86, 267 ~ 268, 288
- Franche - Comté, 弗朗什 - 孔泰省 101, 199
- Francis, A. D., 弗朗索瓦, A. D. 186 ~ 187, 192 ~ 193
- Frank, André Gunder, 弗兰克, 安德列

·冈德 148, 150, 154, 238  
Franken, M. A. M., 弗兰肯, M. A.  
M. 51, 63~64, 69, 77, 79, 84, 96  
Frankfurt, 法兰克福 42, 197  
Frêche, Georges, 弗雷什, 乔治 262  
Frederick I (of Prussia), 弗雷德里克  
一世(普鲁士国王)220, 230  
Frederick II (of Prussia), 弗雷德里克  
二世(普鲁士)the Great, 234  
Frederick William (of Branden -  
burg), the Great Elector, 弗雷德里  
克, 威廉(勃兰登堡), 大选帝侯  
201, 207, 227~231, 234~235  
Freeholders, 自由持有农 86~87,  
213, 216, 286, 见 Farmers, yeoman  
Freudenberger, Hermann, 弗罗伊登贝  
格尔, 赫尔曼 234, 236  
Friedrichs, Christopher R., 弗雷德里  
克斯, 克里斯托弗 R. 194~195  
Friesland, 弗里斯兰省 39, 41, 62, 200  
Fronarbeit, 见 Corvée-labor  
Fronde, 福隆德 92, 116, 120~121,  
123~124, 231  
Fronteira, Marques of, 佛朗蒂拉侯爵  
186  
Fromirtschaft, 封建的附属经济  
225, 见 Feudalism  
Fruits, 水果 237, 259  
Fueros, 市镇特权 190  
Fuggers, 福格尔家族 6  
Fullard, Harold, 弗拉德, 哈罗德 223,  
225

Funchal, 丰沙尔 186  
Furniss, Edgar S., 弗尼斯, 埃德加 S.  
45, 92~93  
Furs, 毛皮 189  
Furs, 毛皮 246, 274  
Furtado, Celso, 富尔塔多, 塞尔索  
163

## G

Gaastra, F., 卡斯特, F. 49  
Galenson, David, 盖尔森, 戴维 173  
Gañanes, 常工 154, 见 Debt peonage  
Garman, Douglas, 加曼, 道格拉斯 5  
Gascony, 加斯科涅 165  
Gathering, 收集 39  
Gdańsk, 格但斯克 19, 21, 59, 98, 100,  
132~133, 143, 207, 211  
Geijer, Eric Gustav, 盖耶, 埃里克·古  
斯塔夫 209  
Gelderland, 海尔德兰 62  
Geneva, 日内瓦 200, 279, 282, 287  
Genoa, 热那亚 57~58, 195, 199~  
200, 202  
Gentry, 绅士阶层 86, 99, 119~120,  
123, 125, 132, 143~145, 246, 283,  
285~286, 288, 见 Farmers, capital-  
ist  
George I (of England), 乔治一世(英  
国)247, 249, 260  
George, Dorothy, 乔治, 道乐赛 92  
Geremek, Bronislaw, 吉里梅克, 布隆  
尼斯劳 20



- Germany (the Germanies), 德意志(德意志联邦) 6, 14, 20~24, 26, 28, 45~46, 53, 79, 101, 133, 166, 189, 191, 193, 195~196, 198, 201~205, 207, 209~210, 215, 219~220, 222, 224~225, 227~228, 230, 232, 234, 239, 241, 255, 262, 264, 273, 287  
east (east Elbia), 东部(易北河东部) 22, 98, 138, 201, 225~227
-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226  
northern, 北部 138  
northwest, 西北部 45  
southern, 南部 143, 179, 193, 197, 201, 225  
southwest, 西南部 20  
western, 西部 31, 116, 179, 193, 197, 201, 225
- Gesindezwangdienst, 家仆制 226~227
- Geyl, Pieter, 盖尔, 皮埃特 37, 38, 68~69, 75~78
- Ghent, 根特 194
- Gierowski, Jozef, 杰罗斯基, 约瑟夫 135
- Giesey, Ralph, E., 杰西, 拉尔夫 E 86
- Gieysztorowa, Irena, 杰斯特诺娃, 艾娜 134
- Gilbert, Sir Humphrey, 吉尔伯特, 汉费莱爵士 159
- Gilboy, Elizabeth Waterman, 吉尔博, 伊利莎白·怀特曼 260
- Gin, 杜松子酒 141, 260~261
- Gin Age, 杜松子酒时代 260~261
- Giotto, 焦托 6
- Gippers, 国内迁移者 39
- Giralt, E., 格拉尔特, E146
- Glamann, Kristof, 格拉曼, 克里斯托夫 13, 16, 41~42, 46~48, 56, 58, 60, 66, 91, 97, 107, 115, 133, 161, 202, 204~206, 208, 223, 273~274
- Glass, 玻璃 141
- Glenday, Daniel G., 格伦迪, 达梅尔 G. 273
- Gloucestershire, 格洛斯特郡 165
- Gniezno, 格涅兹诺 135
- Gobelins, Tapestries, 花毯 74, 94
- Godinho, Vitorino Magalhães, 戈丁浩, 维托累诺, 马加尔哈斯 154, 184, 186~187, 191
- Gold, 黄金 17, 20, 51, 58~59, 64, 106~112, 117, 149~150, 166~167, 184, 186~187, 192~193, 204, 276~277, 281~282, 见 Bullion: Money, metallic  
gold standard, 金本位制 276
- Gold Coast, 黄金海岸 163
- Gomar, Francois (Gomarians), 戈马, 弗朗索瓦 51, 63, 67~68
- Gorlitz, Walter, 格利茨, 沃特 227
- Goslinga, Cornelis C., 高斯林格, 科尼利斯 C. 51, 61
- Göteborg, 哥德堡 206, 210, 214

- Gothenburg, 哥森堡, 见 Göteborg
- Goubert, Pierre, 古贝尔, 皮埃尔 57, 79~82, 85~87, 91~92, 95, 117, 124, 245~246, 255, 258~259, 275
- Gould, J. D., 古尔德, J. D. 76, 131, 260, 262, 264
- Goyhenetche, Manex, 高罕纳兹, 曼内克斯 124
- Graham, Gerald, S., 格雷厄姆, 热拉尔德 S. 248
- Grain, 谷物, 粮食, 见 Cereals
- Grampp, W. D., 格兰普, W. D. 76
-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安东尼奥 113
- Grand Pensionary, 大补助金 62
- Granger, C. W., 格兰杰, C. W. 261
- Grantham, G., 格兰斯姆, G. 58
- Grassby, R. B., 格拉斯比, R. B. 125, 285
- Grasses, 禾本科植物 14, 41, 83~84, 259, 见 Clover, Hay, Lucerne; Non-such; Rye-Grass; Sainfoin; Trefoil
- Gray, Stanley, 格雷, 斯坦利 165
-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 7, 37~38, 48, 53, 77, 95, 103~104, 118, 160, 167, 220, 238, 241, 255~258, 260~261, 264, 270~271, 279, 281, 284, 287
- Corn Bounty Act, 谷物补贴法 260, 见 Bounties
- England, 英格兰 5~6, 19~22, 28~29, 31, 33, 39~43, 45~46, 48, 50~52, 55~56, 59~60, 62, 64~66, 70~71, 76~82, 84~85, 87~102, 104~109, 111~125, 133, 141~142, 147, 157, 159~161, 163~168, 170~171, 181, 184~193, 195~196, 198, 202, 211, 214, 217~218, 221~223, 229, 233~241, 245~249, 251~254, 256~260, 262~267, 269, 271~272, 275~281, 284~288
- Alien Act of 1705, 1705 年涉外法 254
- Bank of England, 英格兰银行 275, 278~280, 283, 285
- Board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 贸易与殖民部 239~240, 269
- Charter of 1672, 1672 年敕书 245
- Civil War, 内战 5~6, 33, 46, 70, 246, 266
- Committee of Trade, 贸易委员会 252
- Commonwealth, 联邦 76
- East India Company, 东印度公司 78, 97, 252, 262, 273, 278, 286
-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 96, 120, 123, 144, 159, 161, 220, 229, 237, 245~247, 253~254, 265
- House of Orange, 奥兰治家族 288
- Long Parliament, 长期国会 77
- Mint, 造币厂 77, 见 Mints
- National Debt, 国债 279
- Navigation Acts, 航海条例 44, 76~

- 79, 90, 95~96, 102, 116, 168, 186, 221, 236~237, 240, 265~266, 269~270
- Privy Council, 枢密院 252
- Scotland, 苏格兰 16, 39, 52, 66, 79, 81, 83, 93~94, 123, 168~170, 193, 203, 239, 251~255, 264~266, 270
- Act for a Company Tradeing to Africa and the Indies, 对非洲、印度群岛公司贸易法 252
- Act of Security, 安全法 254
- Board of Trustees for Fisheries and Manufactures, 渔业、制造业受托委员会 255
- Estates, 地产 252
- Highlands, 苏格兰高地 123
- Lowlands, 低地 123
- Union of Parliaments (of 1707), 议会的联合 251~252, 254~255, 265
- Union of the Crowns (of 1603), 王室的联合 251
- Wales, 威尔士 81
- Great Cattle Act (of 1666), 1666 年大牛法 265
- "Great Crash", 大崩溃 283
- Great Elector, 大选帝侯, 见 Frederick William I
- Great Northern War, 大北方战争 211, 216, 218~219, 221
- Great Recess (of 1653), 大休会期 228
- Groningen, 格罗宁根 41, 62
- Gronus, Hugo, 格劳修斯, 胡果 61, 70
- Grundwirtschaft, grundherrschaft, 领主农场 201, 222, 225~226
- Gruyeres, 格吕耶尔 14
- Grycz, Marian, 格鲁兹, 玛丽安 138
- Guadalquivir, 瓜达尔基维尔 157
- Guarda - Costas, 瓜达海岸 272
- Guatemala, 危地马拉 174
- Guérard, Nicolas, 盖拉尔, 尼古拉斯 12
- Guildhall, (中古时公会的) 会馆 244
- Guilds, 行会 42, 44, 92, 194, 196, 200, 203, 254
- Guinea, Gulf of, 几内亚湾 186
- Gulvin, G., 古尔文, G. 265
- Guns, 枪, 炮 见 Armaments
- Gustav Vasa (of Sweden), 古斯塔夫, 瓦萨(瑞典) 203~204, 208
- Gustavus Adolphus (of Sweden), 古斯塔夫斯, 阿道弗斯 204~209, 211~212, 214
- Guthrie, Chester L., 格思里, 切斯特 L. 155
- Gutswirtschaft, gutsherrschaft, 领主自营农场 135, 201, 222, 225~226

## H

- Haarlem, 哈勒姆 2, 197, 200
- Habakkuk H. John, 哈巴库克, H. 约翰 76, 82, 86~88, 120, 285
- Hacienda, 种植园, 庄园 147~148,

- 152~156, 158, 162, 见 Estates
- Hague, the, 海牙 62, 255  
 Concert of, 海牙音乐会 223  
 Treaty of (1795), 海牙条约 54
- Haiti, 海地, 见 Hispaniola
- Hakluyt, Richard, 哈克卢特, 理查德 159
- Halberstadt, 哈尔伯施塔特 225
- Haley, K. H. D., 哈利, K. H. D. 63, 67, 69~70, 79
- Hall, A. Rupert, 霍尔, A. 鲁珀特 80
- Hall, Douglas, 霍尔, 道格拉斯 174
- Halland, 哈兰 211, 213, 223
- Hallwil, 哈尔维尔 14
- Hamann, Manfred, 哈曼, 曼弗雷德 226
- Hamburg, 汉堡 183, 193, 206, 233~235, 253, 275, 279, 282
- Hamilton, Earl J., 汉密尔顿, 厄尔. J. 151, 180, 190~191, 283~284
- Hamilton, Henry, 汉密尔顿, 亨利 252, 265
- Hammer of the East, 东方之锤 211, 228
- Hanover, 汉诺威 145, 257
- Hanseates, 汉萨同盟 50, 203
- Hansen, Marcus Lee, 汉森, 马克斯·李 239
- Hansen S. A., 汉森, S. A. 224
- Hapsburgs, 哈布斯堡家族, 见 Empire, Hapsburg
- Hardware, 武器装备 267
- Haricotiers*, 小农场主 89, 见 Farmers, small
- Haring, Clarence Henry, 哈里, 克拉伦斯·亨利 159~161, 272
- Haringbuis*, 见 Buss
- Harrington, James, 哈林顿, 詹姆斯 119
- Harnisch, Helmut, 哈尼施, 赫尔穆特 226
- Harper, Lawrence, A., 哈珀, 劳伦斯 A. 78, 96, 116, 240~241
- Harris, L. E., 哈里斯, L. E. 59
- Harris, R. W., 哈里斯, R. W. 254
- Harsin, Paul, 哈森, 保罗 278, 281~283
- Harte, N. B., 哈特, N. B. 264~266
- Hartwell, Richard M., 哈特韦尔, 理查德 M. 260
- Harz, 哈茨山脉 14
- Haskell, Francis, 哈斯克尔, 弗朗西斯 200
- Hasquin, Hervé, 哈斯昆, 赫尔维 198
- Hassinger, Herbert, 哈辛格, 赫伯特 234
- Hastings, Warren, 哈斯廷斯, 沃伦 6
- Hat Act (of 1732), 帽子法 241
- Hatfield Chase, 哈特菲尔德奶酪 59
- Hats (political party), 镶边帽党 220~221
- Hatton, Ragnhild M., 哈顿, 拉恩希尔 M. 213, 215, 218~220
- Haudricourt, André G., 豪德里克特,

- 安德烈 G. 88
- Hauser, Henri, 豪泽, 亨利 180
- Häusler, 家庭农场主, 15, 见 Farmers, small
- Hay, 干草 84
- Hazard, Paul, 哈泽德, 保罗 44, 269, 288
- Heckscher, Eli F., 赫克舍, 伊莱, F. 56, 61, 94, 101, 105 ~ 106, 118, 205, 210, 215, 245, 264, 266
- Heeren Zeventien, De, 十七人委员会 46 ~ 49, 见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 Heerengracht, 海仑运河 45, 见 Transport, canals
- Hegemony, 霸权 38, 61 ~ 63, 65 ~ 66, 69 ~ 71, 77, 93, 109, 111 ~ 113, 195, 220, 268 ~ 269, 280 ~ 281
- Dutch, 荷兰人 49, 51 ~ 52, 57, 60 ~ 61, 63 ~ 65, 68 ~ 71, 75, 195, 206, 211, 241, 245, 258, 268, 274 ~ 275
- English, 英国人 71, 266
- French, 法国人 70 ~ 71, 75, 77, 189
- Spanish, 西班牙人 77
- Heitz, Gerhard, 海茨, 格哈德 226
- Helleiner, Karl F., 赫莱纳, 卡尔 F. 45, 258
- Helmer, Marie, 赫尔默, 玛丽 184
- Hemp, 大麻 14, 41 ~ 42, 100, 211, 218, 239 ~ 240, 274
- Henry IV (of France), 亨利四世(法国) 115
- Henry, Louis, 亨利, 路易斯 258
- Hereditary payments, 遗产税, 见 Feudalism, feudal dues
- Herlihy, David, 赫利希, 戴维 30
- Herring, 鲱鱼 39 ~ 40, 56, 60, 160, 186
- Herve, 埃沃 14
- Hessler, C. A., 赫斯勒, C. A. 215
- Highwaymen, 拦路的强盗, 见 Banditry
- Hildebrand, Bruno, 希尔德布兰德, 布鲁诺 28
- Hildebrand, Karl - Gustaf, 希尔德布兰德, 卡尔 ~ 古斯塔夫 203, 221
- Hildner, Ernest, G., Jr., 希尔德纳, 欧内斯特 G. Jr. 272
- Hill, B. W., 希尔, B. W. 266, 283
- Hill, Charles E., 希尔, 查尔斯 E. 77, 93, 121, 222
- Hill, Christopher, 希尔, 克里斯托弗 5 ~ 6, 80, 114, 123, 125, 245 ~ 246, 259
- Hilton, R. H., 希尔顿, R. H. 30
- Hinton, R. W. K., 赫顿, R. W. K. 52, 53, 76 ~ 79, 91, 99, 106, 116
- Hintze, Otto, 欣策, 奥托 225, 229
- Hispaniola, 伊斯帕尼奥拉岛 157, 159, 173
- Hitler, Adolph, 希特勒, 阿道夫 253
- Hobbes, Thomas, 霍布斯, 托马斯 34
- Hobsbawm, E. J., 霍布斯鲍姆, E. J. 3, 6, 15, 20, 27, 115

- Hoffenden, Philip S., 霍芬登, 菲利普 S. 269
- Hoffmann, Alfred, 霍夫曼, 阿尔弗雷德 201
- Höfadel, 贵族上层 215, 见 Nobility, upper
- Hogarth, William. 贺加斯, 威廉 244
- Hogs, 公猪, 见 Livestock
- Hohenzollerns, 霍亨索伦家族 225, 227~228, 230~231, 233
- Holderness, B. A., 霍尔德内斯, B. A. 259~260
- Holland, 荷兰 20~21, 24, 26~27, 37~43, 45~46, 50, 63, 65, 67~68, 70, 75, 78~80, 82, 90, 93, 96, 98, 103, 107, 109, 111~112, 133, 184, 189, 197, 200, 202, 205~206, 209, 214, 223, 234~235, 248, 252, 261, 267, 269~270, 273, 279, 282,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States of, 荷兰国家 62
- Hollandries, 低地国家 66, 见 Poldering
- Home Counties, (英国)内地各郡 37
- Homer, Sidney, 赫默尔, 悉尼 57~59
- Honduras, Gulf of, 洪都拉斯湾 161
- Honey, 蜂蜜 162
- Hoorn, 霍伦 39
- Hops, 霍普斯 14, 41
- Horn, Arvid, Count, 霍恩, 阿维德, 康特 220
- Horn, David Bayne, 霍恩, 戴维贝恩 80, 220, 275
- Horsefield, J. Keith, 霍斯菲尔德, J. 基思 279
- Horses, 马 88, 152, 263
- Hoskins, W. G., 霍斯金斯, W. G. 83
- Households, 全家人 197, 207~208
- Houtman, Cornelius, de, 豪特曼, 科内利乌斯德 47
- Howde, B. J., 霍夫德, B. J. 221
- Howard, Michael, 霍华德, 米歇尔 227
- Hroch, Miroslav, 赫罗奇, 米罗斯拉夫 24, 107, 235
- Huancavelica, 万卡韦利卡 153
- Hubert, Eugene, 胡伯特, 尤金 54
- Hudson Bay Company, 哈德逊湾公司 250
- Huetz, Christian de Lemp, 惠茨, 克里斯蒂纳·德兰普斯 268
- Hufton, Oliver H., 赫夫顿, 奥利佛 H. 258
- Huguenots, 胡格诺派 45, 67, 75~76, 102, 124, 195, 220, 230, 249, 279, 287~288 international, 国际性的 279
- Humanism, 人文主义 23, 33, 68
- Humus, 腐植土, 腐植质, 见 Agriculture fertilizers
- Hundred Years' War, second, 第二次百年战争 245, 275
- Hungary, 匈牙利 131~134, 138~139, 141~145, 205, 217, 226, 231~234
- Husbandry, 耕作 82, 84, 87, 89, 201

Hutchinson, E. P. 哈奇森, E. P. 76  
Hymer, Stephen, 海默尔, 斯蒂芬 44

## I

Iberia, 伊比利亚 61, 160, 183, 193,  
202, 见 Spain; Portugal

Iberian Union, 伊比利亚联邦 182

Ice age, little, 小冰期 259

Iceland, 冰岛 39

Ij (river), 伊吉河 54

Imbert, Gaston, 英伯特, 加斯頓 5,  
82, 266

Imbert, Jean, 英伯特, 让 284

Imhof, Arthur E., 伊姆霍夫, 阿图尔  
E. 224

Immigration, 移民出境, 见 Migration

Incas, 印加人(印卡人) 109

Income, 收入 15, 28 ~ 31, 49, 57, 64,  
85, 94, 103, 117, 130 ~ 131, 140 ~  
141, 148, 169, 194 ~ 196, 201, 222,  
228, 259, 278, 284 ~ 285

Incorporation, 形成法人或公司组织,  
见 World - economy

Indelningsverk, 分摊制 216 ~ 219, 见  
State, finances

India, 印度 47, 97 ~ 98, 106 ~ 108,  
198, 246, 264, 274, 276

Indian corn, 玉米, 见 Maize

Indian ocean (areas), 印度洋 22, 47 ~  
50, 274

Indians (if referring to Western Hemi-  
sphere), 印第安人, 见 Amerindians

Indies, 印度群岛

East, 东印度群岛 46 ~ 47, 49 ~ 51,  
54, 61, 69, 77, 79, 96 ~ 97, 107 ~  
109, 148, 157, 171, 188, 245, 256,  
276

West, 西印度群岛, 见 Caribbean

Indigo, 靛青 91, 150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47, 235, 274

Industrial crops, 经济作物, 见 Agricul-  
ture, industrial crops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5 ~ 6,  
27 ~ 28, 96, 105 ~ 106, 209, 265,  
267

Industrialism, 工业主义 7, 28, 94 ~  
95, 101, 190, 197, 207, 221, 227 ~  
228, 233 ~ 236, 256, 285

Industrialists, 工业家 187, 见 Capital-  
ism, entrepreneurs

Industries, 工业 8 ~ 9, 13, 15 ~ 17, 27  
~ 28, 39 ~ 46, 50, 90, 92, 94 ~ 95,  
117, 119, 121, 125, 140 ~ 141, 174,  
181, 186, 191, 193, 196, 200, 202 ~  
203, 207 ~ 208, 210, 217, 228, 246,  
260, 262 ~ 263, 265 ~ 267, 279 ~  
280

copper, 铜 205 ~ 208

depression, 衰落, 见 Cycles, econom-  
ic, B - phases

mining, 采矿 80, 93 ~ 94, 101, 110,  
125, 138, 143, 148 ~ 150, 152, 154  
~ 158, 173 ~ 174, 194, 205 ~ 206,  
208 ~ 210, 222, 238, 263

- Protoindustrialization, 原工业化 196
- Putting-out system, 放料加工制 44, 193~196, 200, 209~210
- rural, 乡村工业 16, 91~92, 156, 194
- shipbuilding, 造船业 16, 27, 40, 43~44, 46, 48, 54~55, 59~60, 91, 99~100, 116, 181, 215, 218, 236, 238, 240~241, 249, 263, 269
- textile, 纺织品 13, 16, 42~43, 46, 95, 181, 193~194, 199, 234, 252, 255, 263, 273
- urban, 都市工业 25, 54, 92, 140~141, 194, 196, 199
- Infantry, 步兵, 见 Army
- Inflation, 通货膨胀, 见 Prices, rise of
- Ingria, 英格瑞亚 211, 219
- Inheritance, 继承 30, 86
- Innis, H. A., 英尼斯, H. A. 274
- Insh, George, Pratt, 英什, 乔治, 普拉特 252~253, 255
- Instrument makers, 仪器制造者 66
- Insurance, 保险 38, 55, 57, 257
- Intendants, 州长 118, 见 State, bureaucracy
- Interest rates, 利息率, 见 Money, interest
- Investments, 投资 56, 60, 86, 89, 91, 95~96, 111, 118, 137, 144, 152, 154, 163~164, 168~169, 172, 197, 202, 206, 209, 215, 253, 263, 269, 279~285
- Involution, 内卷型 20, 129, 137, 166~167, 181, 196, 197, 见 Cycles, economic, B~phases
- Ireland, 爱尔兰 14, 16, 99, 123, 133, 168~169, 239, 252~253, 261, 264~266
- Irish Woollen Act of 1699 1699 年爱尔兰羊毛法 265
- Iron, 生铁 99~101, 138, 156, 196, 204~205, 208~210, 217~218, 220~221, 239~240, 259, 263, 274
- Iron Act of 1750, 生铁法 241
- Islam, 伊斯兰教 146, 274, 见 Mediterranean, Islamic; Moriscos
- Israel, J. I., 伊斯雷尔, J. I., 42, 49, 183
- Issawi, Charles, 伊莎威, 查尔斯 98
- Italy, 意大利 14, 20~21, 29, 50, 98, 147, 183, 189~190, 195~197, 200~201, 255
- northern, 北部 22, 31, 50, 75, 83, 103, 193, 195~197, 199~200, 202~203, 209, 282
- southern, 南部 146~147, 167

## J

- Jacobitism, 雅各宾主义 123, 252~254
- Jacquart, Jean, 雅卡特, 让 4, 13~15, 81~82, 84, 87~90, 92, 117, 125, 258~259, 276, 278, 282
- Jamaica, 牙买加 157, 159~164, 169,



- 171, 174, 191, 270-272
- James I (of England), 詹姆斯一世(英国) 43, 76, 100
- James II (of England) 詹姆斯二世(英国) 67, 245-246, 252
- James VII (of Scotland) 詹姆斯七世(苏格兰) 252
- James Francis Edward, Chevaner de St. Georges, 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 谢瓦利埃·圣乔治, 见 James VII
- Jams, 果酱 259
- Jamtland, 耶姆特兰 211
- Jansen, H. P. H., 杰森, H. P. H. 39, 42, 84
- Jansen, J. C. G. M., 杰森, J. C. G. M. 262
- Jansenists, 杰森派教徒 67, 124
- Japan, 日本 107-108, 134, 205-206, 276
- Java, 爪哇 274
- Jeanm, Pierre, 让南, 皮埃尔 19, 45, 67-68, 103, 132, 198, 201, 208, 212, 214, 261, 274
- Jenkin's Ear, War of, 詹金斯的耳朵战争 191
- Jensch, Georg, 简施, 格奥尔格 212
- Jensen, Einar, 简森, 埃纳尔 224
- Jesuits, 耶稣会士 198
- Jewelry, 珍宝 109, 137
- Jews, 犹太人 46, 78, 145, 183, 195, 233, 253
- Conversos*, 改宗者, 见 Marranos
- German, 德意志人 45
- Sephardic, 西班牙籍(葡萄牙籍)犹太人 67, 78
- Jodenbreestraat, 居住区 67, 见 Amsterdam
- John, A. H., 约翰, A. H. 260-261, 263, 272, 280-281
- Johnsen, Oscar Albert, 约翰逊, 奥斯卡·艾伯特 139
- Jones, E. L., 琼斯, E. I. 40, 82, 84, 194
- Jones, J. R., 琼斯, J. R. 37, 51, 77, 79-80, 82, 114, 123, 125, 248, 250-251
- Jordaan, the, 乔尔凡 45, 见 Amsterdam
- Jorgensen, Johan, 乔格森, 约翰 134, 223-224
- Journet, Jean-Louis, 茹尔内, 让-路易斯 117
- Journeyman, 工匠, 见 Artisans
- Judaizantes*, 犹太学学者 183
- Julian calendar, 朱利安历 246
- Junkers, 容克地主 226-231, 见 Aristocracy; Classes, upper; Farmers, capitalist; Landowners; Seigniors
- Junto, 荣托 286, 见 Whigs
- Jura, 尤拉 14
- Jurieu, Pierre, 朱里厄, 皮埃尔 67
- Jurisprudence, 法学 85
- Jutikkala, Eino, 朱提卡拉, 埃伊诺

213,218,222,224

## K

Kaltenstadler, Wilhelm, 卡腾斯塔德勒, 威廉 234

Kamen, Henry, 卡门, 亨利 23~24, 180, 185, 188~190, 209, 237~238

Kann, Robert A., 卡恩, 罗伯特 A. 232

Kätner, 小农场主 15, 见 Farmers, small

Kaufsystem, 采购制 195~196, 235

Kavke, František, 卡夫科, 弗兰梯斯克 139, 231

Kearny, H. F., 卡尼, H. F. 265

Keisergracht, 45, 见 Transport, canals

Keith, Robert G., 凯兹, 罗伯特 G. 155

Keith, Theodora, 凯兹, 泰奥多拉 252

Kent, H. S. K., 肯特, H. S. K224

Kellenbenz, Hermann, 柯伦贝兹, 赫尔曼 43, 91, 134, 183, 194~195, 198, 204~205, 218, 263, 265

Kepler, V. S., 凯普勒 V. S. 77

Kerridge, Eric, 克里吉, 埃里克 87

Kexholm, 科克斯霍姆 211, 214

Kindleberger, Charles P., 金德尔伯格, 查尔斯 P. 43, 282

King William's War, 威廉国王之战 187, 265, 271

Kingston, 金斯敦 169

Kirchheimer, Otto, 克兹海默尔, 奥托

93

Kirilly, Zs. 克雷利, Zs, 134, 139

Kisch, Herbert, 基希, 赫伯特 197~198, 200, 235

Kiss, Istvan, 济斯, 伊什特万 139

Klein, Peter W., 克莱恩, 彼得 W. 44, 48, 56, 59, 63~64, 96, 269, 280

Kleinbauern, 小农 15, 见 Farmers, small

Klima, Arnošt, 克利马, 阿诺斯特 42, 139, 194~196, 233, 235

Knapar, 贫穷的小贵族 212, 见 Nobility, lesser

Knapp, G. N., 克莱普, G. N227

Knechte, 雇农 15, 见 Laborers (common)

Knoppers, Jake, 诺伯斯, 杰克 58, 272, 274

Knoque, 克诺基 255

Komornicy, 交租者 135, 见 Laborers (common)

Königsberg, 柯尼斯堡 100, 211, 229

Kopparberg, 科帕尔贝格 205, 见 Industries, copper

Korzyn, 科尔奇纳 132

Kortkoren, 262

Kosminsky, Eugen A., 科斯明斯基, 尤金·A. 30

Kossmann, E. H., 科斯曼, E. H. 45, 62~63, 68, 118, 269

Kowecki, Jerzy, 克威斯基, 杰兹 142

Krefeld, 克雷菲尔德 200

Kriedte, Peter, 克里德特, 彼特 194 ~ 196  
Krippenreiter, “木马上骑士”(指贫困贵族) 230, 见 Nobility, lesser  
Kronobönder, 王室土地上的农民 212, 见 Peasantry  
Kruger, Horst, 克鲁格, 霍斯特 233  
Kuczynski, Jürgen, 库辛斯基, 于尔根 226  
Kuhn, Walter, 库恩, 沃尔特 226  
Kujawy, 库杰伊 140  
Kula, Witold, 库拉, 维托尔 131 ~ 135, 137 ~ 138, 140, 236  
Kulischer, Joseph, 库里斯彻尔, 约瑟夫 96, 195, 226  
Kurland, 库尔兰 195  
Kurpie (region), 科尔比 145  
Kuske, Bruno, 库斯克, 布鲁诺 45, 197

## L

Labor, 劳动, 劳工 14, 16, 29, 45, 84, 91 ~ 94, 100, 109, 129, 134, 149, 152, 156, 162, 165, 167, 171, 193 ~ 194, 196, 210, 222, 227, 260, 269, 见 Workers  
division of, 劳动分工 8 ~ 9, 20, 37, 42, 179, 187, 196, 199, 212, 221, 241, 见 Capitalism; Core; Periphery; Semiperiphery; World - economy  
labor force, 劳动力, 见 Workers  
modes of control, 劳工控制的方式 153 ~ 154, 见 also Coerced labor;

Farmers, tenant; Laborers, Slavery  
Laborers (common), 劳动者 8 ~ 9, 15 ~ 16, 25, 45, 85, 88, 139 ~ 140, 153 ~ 154, 172, 196, 217  
indentured, 关约, 双联合同 87, 102, 132, 168, 171 ~ 173  
urban, 城市劳动者, 见 Workers  
Laboureurs, 农夫 15, 87 ~ 89, 92, 见 Farmers, yeoman  
Labrousse, C. E., 拉布鲁斯, C. E. 87, 92, 245, 258, 289  
Labrousse, Elisabeth, 拉布鲁斯, 伊丽莎白 67, 120, 266, 289  
Lace, 花边, 饰带 42  
Lacquer, 假漆, 亮漆 273  
Ladoga, Lake, 拉多加湖 214 ~ 215  
La Fayette, Marquis de (Marie Joseph Gilbert du Motier), 拉法耶特, 马奎斯德 287  
La Force, J. Clayburn, 拉福斯, J. 克莱伯恩 190  
Lakens, 床单 42, 见 Textiles  
Land, 土地 14, 27, 30, 41, 45, 56 ~ 57, 64, 82, 85, 90, 135 ~ 136, 138, 146, 148, 152, 154 ~ 156, 164, 170, 194, 200 ~ 202, 212 ~ 216, 219, 222, 224, 226, 228, 238, 246, 248, 254, 259, 262, 285  
cultivated, 已开垦的土地 90, 262  
land reclamation, 土地垦殖 14, 25 ~ 26  
uncultivated, 未开垦的土地 85

- Landlords (landowners), 地主 14, 31, 85~90, 99, 116, 119, 123, 132, 135~137, 141~142, 145, 147, 152~155, 167~168, 175, 200~202, 204, 215~216, 220, 222, 225~227, 230~231, 235, 237, 247, 253~254, 259, 263, 265~266, 279, 284, 285, 见 Aristocracy; Estates, owners, Farmers, capitalist; Gentry; Nobility; Seigniors
- Land's Advocate of Holland, 荷兰的土地辩护士 62, 69,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 Lane, Frederic C., 莱恩, 弗雷德里克·C. 199
- Lang, M. F., 朗, M. F. 149, 153, 160
- Langton, John, 兰顿, 约翰 100
- Languedoc, 朗格多克 84~85, 95, 147, 262, 268, 279
- La Rochefoucauld - Liancourt, François - Alexandre - Frédéric, Duc de, 拉罗什富科-连库尔, 弗朗西斯-亚历山大-弗雷德里克, 迪克得 287
- La Rochelle, 拉罗谢尔 165
- Larquié, Cl., 拉科埃 Cl. 146
- Larraz, José, 拉罗兹, 何塞 87, 150, 158, 185
- Latifundia, 大田(地)产, 大庄园 141, 143~144, 148, 154, 200, 见 Estates
- Latvia, 拉脱维亚 132
- Lavradores de cana, 175, 见 Farmers, tenant
- Lavrovsky, V. M., 拉夫罗夫斯基, V. M. 87, 259
- Law, John, 劳, 约翰 281~284
- Lead, 铅 141, 263
- Lease, 出租(土地), 租契, 见 Tenure
- Leaseholder, 租借人, 见 Farmer, tenant
- Leather, 皮革 42, 103, 274
- Le Brun, Charles 勒布伦, 查尔斯 74
- Le Flem, Jean - Paul, 勒弗莱姆, 让-保罗 180
- Leghorn, 莱亨 50
- Legrelle, Arsene, 莱格瑞利, 阿塞因 188
- Leibeigen, 农奴 229, 见 Serfs
- Leibnitz, G. W., 莱布尼茨, G. W. 7, 219
- Leiden, 莱登 42, 45
- Leipzig, 莱比锡 28, 197
- Lenman, Bruce, 伦曼, 布鲁斯 253~255
- Lens grinders, 镜头磨光机 66
- Léon, Pierre, 莱昂, 皮埃尔 16, 91~92, 94~95, 98, 100~101, 103~104, 116, 124~125, 249, 266, 268, 270, 273, 278
- Léonard, Emile - G., 列奥那多, 艾米丽 - G. 124, 257, 287
- Leopold I (of Austria), 利奥波德一世(奥地利) 232
- Leopold I (of Belgium), 利奥波德一

- 世(比利时)5
- Leopold I (Holy Roman Emperor), 利奥波德一世(神圣罗马帝国)42
- Lerma, Duke of (Francisco Gomez de Sandoval y Rojas), 莱尔马公爵 204~205
- Le Roy Ladurie, Emmanuel, 勒·鲁瓦·拉杜里, 伊曼纽尔 4~5, 16, 29, 76, 82, 84~85, 87~89, 117, 124~125, 138, 258~259, 262, 268, 287~288
- Leskiewicz, Janina, 列斯克耶维奇, 简尼纳 141, 235
- Les Landes, 莱兰德斯 14
- Leśnodarski, Bogustaw, 莱斯纳达斯基, 伯高斯洛 133
- Leuilliot, Paul, 勒维利奥特, 保罗 273
- Levant, 立范特 47, 50, 54, 58, 98, 107, 235, 270, 272, 见 Mediterranean (region)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见 State, liberalism
- Lichtheim, George, 利希舍姆, 乔治 77
- Liebel, Helen P., 利贝尔, 海伦·P 197, 199, 235
- Lima, 利马 156, 160
- Limburg, 林堡 84  
South, 南部 262
- Limekilns, 石灰窑 263
- Limerick, Treaty of (1691) 利默里克条约 253, 265
- Linen, 亚麻布 42, 95, 156, 181, 199, 235, 252, 254~255, 265~266, 268, 275
- Linseed, 亚麻子 262
- Lipson, Ephraim, 里普森, 伊弗雷姆 46, 84, 90, 93~94, 261
- Lira, Andrés, 里拉, 安德列斯 155
- Lisbon, 里斯本 47, 166, 186, 189, 191, 277
- List, Friedrich,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197
- Lithuania, 立陶宛 143~145
- Livestock, 牲畜 13, 41, 82, 85, 132, 151, 159, 180, 200, 259, 261, 见 Agriculture, pasturage; Cattle; Dairy products; Meat
- Livland, 利夫兰 215
- Livonia, 利沃尼亚 134, 208, 211, 219
- Loans, 贷款 59, 200, 206, 232, 278~279, 见 Banking; Financiers; Money
- Locke, John, 洛克, 约翰 7, 66~67, 70
- Lockhart, James 洛克哈特, 詹姆斯 155
- Loevesteiners, 罗弗斯特尔派 63,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 Loewenthalers, (货币名称) 132, 见 Money
- Lögadel, 贵族下层 215, 见 Nobility, lesser
- Loire (river) 卢瓦尔(河)83
- Loire Valley, 卢瓦尔流域 85
- Lotn, František, 勒姆, 弗朗齐歇克

Lombardy, 伦巴第 197, 199  
 London, 伦敦 37, 45, 58, 76, 78~79, 95, 104~106, 111, 165, 168, 170~171, 193, 237, 252, 260~261, 271, 275, 277, 283, 286  
 London Monument, 伦敦纪念碑 244  
 Long Parliament, 长期国会,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Long Parliament  
 López, Adalberto, 拉贝兹, 阿德莱贝特 150  
 Lord, Eleanor Louisa, 洛德, 埃利诺, 路易萨 237~240  
 Lorraine, 洛林 250  
 Louis XIV (of France), 路易十四 33, 74, 79~81, 102, 112, 114~117, 123~124, 188~189, 214~215, 246, 248, 250, 252, 255, 272, 277, 279  
 Louisiana, 路易斯安娜 102, 282  
 Louvois, 卢瓦 81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14, 20, 40,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Luanda, 卢安达 52  
 Lübeck, 吕贝克 223  
 Lucerne, 卢塞恩 84  
 Lumpenproletariat, 流氓无产阶级 230  
 Lunde, Johs, 伦德, 约斯 160  
 Lundgreen, Peter, 兰德格林, 彼得 81  
 Lundkvist, Sven, 伦德奎斯特, 斯文 211, 217, 219  
 Lusatia, 卢萨蒂亚 138

Lütge, Friedrich, 吕特格, 弗里德里希 22, 38, 201, 225~227, 233  
 Lüthy, Herbert, 卢西, 赫伯特 108, 111~112, 117, 124, 276, 278~279, 283~284  
 Luxembourg, 卢森堡 250  
 Luxury, goods, 奢侈品 42, 49~50, 65, 94, 107, 131, 146, 162, 165, 200, 273~274, 见 Trade, luxury  
 Luzac, Elie 卢亚瑟克, 埃伊 39  
 Luzzatto, Gino, 卢扎托, 吉诺 200  
 Lynch, John, III, 林奇, 约翰 151, 181  
 Lyon, 里昂 91, 103, 202, 284

## M

Maas (river), 马斯河 41, 54  
 Macartney, C. A., 马卡特尼, C. A. 144, 234  
 Macedo, Jorge Borges de, 马塞多, 豪尔赫, 博尔赫斯得 187, 192  
 Machiavelli, Nicolo, 马基雅维利, 尼科洛 6  
 McLachlan, Jean O., 麦克拉克伦, 让 O. 185, 188, 239, 272  
 MacLeod, Murdo J., 麦克劳德, 默罗 J 4, 148~151, 153~155, 159, 161  
 Macůrek, J., 马丘雷克, J 194~196, 233  
 Maczak, Antoni, 马恰克, 安东尼 21, 107, 132~133, 135~138, 141~143  
 Madder, 茜草 14

- Madeira, 马德拉岛 186~187
- Madras, 马德拉斯 273
- Madrid, 马德里 156, 181, 183, 189
- Madrid, Treaty of (1750), 马德里条约 272
- Magde, 女雇工 15, 见 Laborers (common)
- Magdeburg, 马格德堡 225
- Magistrates, 地方长官 68
- Magnates, 权贵, 富豪 30, 135~137, 141, 143~144, 227~228, 见 Aristocracy; Landlords; Seigniors
- Mahan, Admiral Alfred T., 马汉, 阿尔弗雷德 T. 上将 64, 78, 81, 248~249
- Mahrattas, (孟买)马赫拉他斯人 273
- Maine (France) 缅因 16
- Maize, 美因茨 83, 151~152, 180, 202
- Makkai, László, 马凯, 拉兹罗 133, 138~139, 141~142, 201
- Málaga coast, 马拉加海岸 187
- Malecki, Jan M., 迈勒基, 扬 M. 138
- Malnutrition, 营养不良 13, 见 Food, shortage of
- Malowist, Marian, 马洛维斯特, 玛丽安 135, 139~141, 218
- Malt, 麦芽 261, 见 Beer
- Manchester Act of 1735, 1735 年曼彻斯特法案 264
- Manila, 马尼拉 245
- Manoeuvriers, 操纵者 15, 89, 见 Laborers
- Manorial economy, 庄园经济, 5
- Manors, 庄园, 领地, 见 Demesne
- Manufactures, 制造业 22, 42, 44, 67, 78, 92~96, 98, 100~101, 103~104, 147, 156, 167, 181, 185~187, 193, 196, 199, 233, 237~238, 249, 262, 264, 266, 273
- Manumission, 解放农奴, 见 Slavery, manumission
- Manure, 肥料, 见 Agriculture, fertilizers
- Mare clausum, mare liberum, 临海, 公海 61
- Maria Theresa (of Austria), 玛丽亚, 赛里萨(奥地利)231, 235
- Marie - Anne de Neubourg (of Spain), 玛丽 - 安妮·德·诺伊堡(西班牙)189
- Marino, John A., 马里诺, 约翰 A. 197
- Maritime school of thought, 思想界的海上派 246~247, 249
- Mark, 马克 225, 228, 230
- Market, 市场  
capitalist, 资本家, 见 World - economy  
market economy, 市场经济, 见 Money, money - economy  
world, 世界, 见 Trade (world)
- Markovitch, Tihomir J., 马尔科维奇, 蒂博密·J. 266~268
- Marl, 泥灰岩, 见 Agriculture, fertili-

- zers
- Marlborough, John Churchill, Duke of, 马尔伯勒, 约翰·丘吉尔 198
- Marques, A. H. de Oliveira, 马奎斯, A. H. 德奥利韦拉 182~183
- Marqueses del Valle, 马克斯·德·瓦伦 148
- Marranos, 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 58, 78, 183, 287, 见 Jews, Sephardic
- Marrès, P., 马雷斯, P. 279
- Marseilles, 马赛 21, 103, 258, 262, 268, 272
- Marshall, Alfred, 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 105
- Marsin, 马辛 117
- Martin, Henri, 马丁, 亨利 108, 250
- Martinique, 马提尼克岛 102, 169, 270
- Martins, J. P. Oliveira, 马丁斯, J. P. 奥利韦拉 192
- Martin Saint - Léon, Etienne, 马丁, 圣莱昂, 艾蒂安 93
- Marvell, Andrew, 马维尔, 安德鲁 40
- Marx, Karl, 马克思, 卡尔 5~6, 60, 280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5~7, 114, 122
- Maryland, 马里兰 164, 166~167
- Masefield, G. B., 梅斯菲尔德, G. B. 44, 162, 171
- Mason, 泥瓦工 28
- Masovia, 马索维亚 134, 145
- Masselman, George, 马西尔曼, 乔治 46~49
- Masson, Paul, 马森, 保罗 272~273
- Mata, Eugénia, 马塔, 欧热尼亚 17
- Matejek, František, 马特杰克, 弗兰特斯克 131
- Mateship, 副船 168
- Mathematicians, 数学家 66
- Mathias, Peter, 马赛厄斯, 彼得 261, 287
- Matjan, 马占 49
- Maurice of Nassau (Orange), 拿骚的莫里斯 24, 64, 68, 80, 207
- Mauro, Frédéric, 毛罗, 弗雷德里克 17~18, 162, 183~184, 186
- Maximilien Emmanuel (of Bavaria), 马克西米利安, 伊曼纽尔 198
- Maxwell, Kenneth, 马克斯韦尔, 肯尼思 191
- May, L. P., 梅, L. P. 270
- McManners, J., 麦克曼勒斯, J. 285
- Meat, 肉食 133, 159, 200, 261, 265, 见 Food; Livestock shortage of, 肉的缺乏 29
- Mecklenburg, 梅克伦堡 226~227, 231
- Medick, Hans, 梅迪克, 汉斯 195~196
- Mediterranean (region), 地中海 20~21, 23, 46, 48~50, 53, 64, 97~98, 103, 146, 165, 188, 248, 255, 262, 268, 见 Africa, north; Europe, southern; Levant; Trade, Mediterranean Christian, 基督教徒 9, 50, 54, 98,



- 145, 见 Christianity
- Islamic, 伊斯兰教的 9, 274, 见 Islam
- Mehring, Franz, 梅林, 弗朗茨 228 ~ 230
- Meilink - Roelofs, M. A. P., 迈林克 - 罗洛夫兹, M. A. P. 47, 61
- Meissen, 迈森 273
- Mejdricka, Kveta, 梅德里克, 克温特 135, 138
- Mellafe, Rolando, 梅拉夫, 罗兰达 149, 153, 173
- Menard, Russell R., 梅纳德, 拉赛尔 R. 173
- Mendels, Franklin F., 门德尔斯, 弗兰克森 F. 194, 196, 200, 266
- Merin, 梅嫩 255
- Mennonites, 孟诺派教徒 195
- Mentink, G. J., 门廷克, G. J. 75
-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5, 37 ~ 40, 43, 58, 60 ~ 61, 67, 69, 75, 77, 79, 90 ~ 92, 95, 97, 103, 105 ~ 106, 109, 113, 115 ~ 117, 122, 141 ~ 142, 144, 147, 157 ~ 158, 160, 164 ~ 166, 168, 186 ~ 191, 196 ~ 200, 203 ~ 204, 211, 213, 220 ~ 221, 224, 232 ~ 233, 236 ~ 239, 247 ~ 248, 250 ~ 253, 256, 264 ~ 269, 273, 275, 277, 280, 285, 287
- Mercenary armies, 雇佣军, 见 Army, mercenaries
- Merchant Capitalism, 商业资本主义, 见 Capitalism, merchant capital
- Merchant marine, 商人海上运输, 见 Transport, maritime
- Merchantmen, 商船, 见 Navy
- Merchants, 商人 19, 24, 27, 45, 48 ~ 49, 51, 53, 60, 87, 89, 95 ~ 96, 115, 147, 151, 156, 160 ~ 161, 166 ~ 171, 183, 188, 193 ~ 194, 198, 202, 206, 210 ~ 211, 216, 222 ~ 224, 233, 235 ~ 238, 240, 247, 249, 252, 254 ~ 256, 268, 272, 275, 280, 285, 见 Bourgeoisie; Trade (world)
- Mercury, 水银 149, 151
- Mertens, 梅尔腾斯, 雅克 E. Jacques E., 276
- Mesta, 牧主团 181
- Mestizo, 梅斯蒂索人(印欧混血人种) 152 ~ 153, 155 ~ 156, 158, 173 ~ 174
- Metals, 金属 17, 58, 105, 110, 130, 181, 204, 266, 282, 见 Copper; Iron
- Metalwares, 金属器皿 141, 205 ~ 206
- Métayers, 分成制佃农 88, 见 Sharecropping
- Methuen, Treaty of (1703), 梅休因条约 187 ~ 188, 191, 284
- Meuvret, Jean, 默夫雷特, 让 4, 15, 84, 86 ~ 88, 95 ~ 96, 118, 199
- Mexico, 墨西哥, 见 New Spain
- Mexico City, 墨西哥城 153
- Mexico, Gulf of, 墨西哥湾 161
- Mezzadria, 分成制 200, 见 Share-

- cropping
- Michalkjewicz, Stanislas, 迈克尔科维奇, 斯坦尼斯拉斯 235
- Michell, A. R., 米歇尔, A. R. 39~40, 43, 52
- Middle Ages, 中世纪 6, 13, 15, 18, 20, 27, 29, 49, 105 ~ 106, 121, 148, 162, 166, 194, 203, 207
- Middle Atlantic colonies 中大西洋殖民地 179, 237, 239
- Midi, 米迪 21, 91
- Midi - Pyrénées, 米迪 - 比利牛斯 262
- Midlands, 米德兰 14
- Migration, 迁移 45, 51, 64, 66 ~ 67, 102, 158, 183, 202, 239, 249, 279
- Mika, Alois, 米卡, 阿洛伊斯 195
- Milan, 米兰 196, 199, 234
- Milk, 牛奶, 见 Dairy products
- Millet, 黍米 180
- Millones*, 150, 见 State, finances
- Minas Geraes, 米纳斯吉拉斯州 191
- Minchinton, Walter, 明钦顿, 华尔特 26, 29, 46, 100, 116
- Minden, 明登 225
- Miners, 采矿者 93
- Mingay, G. E., 明格, G. E. 86 ~ 88, 120, 259 ~ 260, 262 ~ 263, 285
- Mining, 采矿, 见 Industries, mining
- Mint, 造币厂,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Mint
- Mints, 巨额 276, 281, 见 Bullion; Great Britain, England, Mint; State, finances
- Mintz, Sidney W., 明兹, 悉尼 W. 152, 174
- Mirabeau, Comte de (Honoré Gabriel Riqueti), 米拉波, 孔德 287
-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 102
- Mississippi Bubble, 密西西比泡沫 282 ~ 283
- Mississippi Valley, 密西西比流域, 见 Louisiana
- Mita, 米塔 149, 174
- Mode of production, 生产方式, 见 Production, mode of
- Molasses, 糖蜜(浆) 168, 237, 241
- Molasses Act of 1732, 1732 年糖浆法 169, 241
- Molenda, Danuta, 莫兰达, 戴纳塔 141
- Molinists, 摩利纳教徒 68
- Moles, Fr. Roger, 莫尔斯, Fr. 罗杰 18, 45
- Moluccas, 摩鹿加群岛 274
- Monarchy, 君主政体, 见 State
- Money, 货币 16 ~ 17, 25 ~ 27, 29 ~ 30, 49, 57, 59, 63, 81, 88, 92, 106, 109, 111 ~ 112, 116 ~ 117, 132, 137, 149 ~ 150, 152, 168, 185 ~ 186, 190 ~ 191, 193, 196, 202 ~ 206, 215, 222, 231 ~ 233, 238, 249, 253, 271, 276, 279 ~ 282, 285, 见 Banking; Bullion; Copper, copper coins; Financiers; Gold; Silver; Vellon

- bills of exchange, 汇票 58~59, 105~109, 170
- credit, 信贷 17, 25, 38, 57, 59, 81, 86, 105, 112, 170, 194~195, 203, 210, 278, 283
- devaluation, 减低币值 53, 205, 275~276, 278
- financial centers, 金融中心 57, 86, 94, 171, 180, 183, 193, 202, 281
- hoarding, 招贴板 106, 112, 137
- interest, 利息(率) 59, 86, 111, 276, 279~281
- metallic, 金属的 58~59, 105, 275~276, 281~282, 见 Bullion; Copper, copper coins; Gold; Silver; Vellon
- money - changers, 兑换业者, 见 Banking
- money - economy, 货币经济 70~71, 94, 129, 156, 174
- money - market, 货币市场, 见 Money, financial centers
- money of account, 记帐货币 16~17, 275~276, 283
- paper, 纸币 25, 275, 277, 282
- "Rising of the Moneys", 升值 130
- stability, 平稳 57, 130, 132, 281
- Monopolies, 垄断, 见 Capitalism, monopolies; Trade, monopolies
- Montpellier, 蒙彼利埃 14
- Monter, E. William, 蒙特尔, E. 威廉 279
- Morality (mores), 道德 27
- Moravia, 摩拉维亚 135, 138, 226, 231, 234~236, 见 Czechia; Czechoslovakia
- Moreno Fragnals, Manuel, 莫雷诺弗拉吉纳斯, 曼努埃尔 270
- Morgan, Henry, 摩尔根, 亨利 159
- Morgan, W. T., 摩尔根, W. T. 250
- Morineau, Michel, 莫里诺, 米歇尔 4, 19, 47, 49, 52, 58, 83~85, 97, 103, 110~111, 151, 193, 268~269, 274, 277, 280~281
- Moriscos, 西班牙的摩尔人 146, 181
- Mörner, Magnus, 莫纳, 芒努斯 152, 156
- Morocco, 摩洛哥 182
- Moselle (river) 摩泽尔(河) 14
- Moslems, 穆斯林, 见 Islam
- Mountain economy, 大山经济 200
- Mousnier, Roland, 莫斯尼尔, 罗兰 3, 16, 116, 277, 287
- Mughal Empire, 莫卧儿帝国, 见 Empire, Mughal
- Mükherjee, Ramkrishna, 穆克赫吉, 拉姆克利施纳 98
- Mulattoes, 穆拉托人(黑白混血儿) 152~153, 155~156, 158, 173~174
- Mun, Sir Thomas, 莫, 托马斯爵士 76, 105
- Munck, Thomas, 蒙克, 托马斯 224
- Munitions, 军需品, 军火, 见 Armaments

ments

Munktell, Henrik, 蒙克特尔, 亨利克  
210  
Munster, 蒙斯特 16  
Muro, Luis, 穆罗, 路易斯 155  
Murray, R. K., 默里, R. K. 246, 251  
Muslin, 平纹薄棉布 264, 273  
Myška, Milan, 米什卡, 米兰 196

## N

*Naborios*, 印第安仆人 154, 见 Debt  
peonage  
Nadal, J., 纳达尔, J. 146  
Naish, G. P. B., 纳伊斯, G. P. B. 43  
Namur, 那慕尔 255  
Nantes, 南特 102, 268, 279  
Naples, 那不勒斯 21, 146 ~ 147, 196,  
234  
Napoleon, 拿破仑 6, 114, 225, 233,  
268  
Narva, 纳尔瓦 100, 211, 214, 239  
National economy, 民族经济, 见  
Trade, national markets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144, 203, 210,  
272  
economic, 经济的, 见 Mercantilism  
Naval stores, 海军供应 99 ~ 100, 104,  
210, 217, 238 ~ 239, 246, 见 Hemp;  
Pitch; Resin; Tar; Turpentine  
Naval Stores Act of 1705, 1705 年海  
军供应法 239 ~ 240  
Navarre, 那瓦拉 189

Navigation Acts, 航海条例,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Navigation Acts  
Navy, 海军 52, 64, 78, 80, 99, 114 ~  
115, 118 ~ 119, 158, 161, 183, 188,  
207, 210, 212, 216, 239 ~ 240, 246  
~ 249, 257, 263, 268, 272, 见 Ar-  
my; Navy  
Nef, John U., 内夫, 约翰 U. 93, 95,  
100, 164, 246, 266  
*Negotiepenningen*, 商业货币 58, 见  
Money  
Negroes, 黑人 152, 154, 163, 172, 266  
Neguev, S., 涅古耶夫, S. 272  
Nelson, George H., 纳尔逊, 乔治·H.  
191, 256  
Netherlands, (northern), 尼德兰 7, 19  
~ 24, 33, 37 ~ 57, 59 ~ 67, 70 ~ 71,  
75 ~ 79, 82 ~ 84, 90 ~ 94, 96, 98,  
101 ~ 103, 106, 111 ~ 118, 132,  
134, 138, 143, 157 ~ 160, 162 ~  
163, 165 ~ 168, 181, 183 ~ 191,  
193, 195 ~ 198, 200, 203 ~ 207, 211  
~ 212, 214 ~ 215, 217 ~ 218, 221 ~  
223, 227 ~ 229, 235 ~ 237, 239,  
241, 246, 249 ~ 251, 253, 255 ~  
257, 261 ~ 262, 265, 267 ~ 271,  
273, 275, 279 ~ 282, 285 ~ 288, 见  
Batavian Republic; Holand; Low  
Countries; Trade Dutch; Zeeland  
Austrian, 奥属尼德兰, 见 Nether-  
lands, southern  
Netherlands, Barrier, 尼德兰屏障 250

- ~251, 255~256
- Revolt of the, 尼德兰的反抗 6, 25, 42, 44, 53, 70, 75, 125, 150, 209
- southern, 南部尼德兰 22, 45, 51, 54, 69, 79, 95, 165, 193, 196~198, 201, 209, 234, 250, 252~253, 255~256, 261, 见 Brabant; Flanders
- Spanish, 西属尼德兰, 见 Netherlands, southern
- States - General, 国会 39, 47, 60, 78, 96, 206, 223, 286
- War of Independence, 独立战争, 见 Netherlands, Revolt of the
- Nettels, Curtis P., 内特尔, 柯蒂斯 P. 161, 237~240, 271
- Neutrality, 中立 250, 275
- New Amsterdam, 新阿姆斯特丹 51~52, 79, 236, 见 New York
- New Christians, 新教徒, 见 Marranos
-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179, 186, 236~237
- New Jersey, 新泽西 236
- New Mills Cloth Manufactory, 新布匹加工工厂 252
- New Spain, 新西班牙 4, 109, 147~149, 151, 153~156, 161~162, 174, 183, 276
- New World, 新大陆, 见 America
- New York, 纽约 64, 236~237, 见 New Amsterdam
- Newton, Isaac, 牛顿, 艾萨克, 7
- Nichtweiss, Johannes, 尼特威斯, 约翰尼斯 226
- Nielsen, Axel, 尼尔森, 阿克塞尔 139
- Nijmegen, Treaty of (1678), 奈美根和约 80, 95, 124, 161, 215, 250
- Nine Years' War, 九年战争 229, 239, 248, 250
- Nobility, 贵族 31~32, 68, 75, 85~86, 119~120, 122, 124, 134, 136~137, 140~145, 182, 200~201, 210~218, 220, 222, 224, 226~229, 231~232, 234, 236, 254, 284~287, 见 Aristocracy; Classes, upper, Landlords; Seigniors
- lesser, 较小的 30, 99, 135, 143, 190, 212, 230, 287
- middle, 中等贵族 143
- quit - rent, 退租 141, 143
- upper, 上层贵族 143, 190, 212
- Nobility Matriculation Law (1626), 贵族考试法 212
- Noblesse de race, 世系贵族 231
- Noblesse de robe, 穿袍贵族 119, 143, 285~286
- Nomadism, 游牧主义 84
- Nonsuch, 绝品, 模范 259
- Nordmann, Claude J., 诺德曼, 克劳德 J. 205, 207, 209, 214, 219~220
- Normans, 诺曼人 286
- Norrkopping, Diet of, 国会的(一项决议) 213, 215
- North, Douglass C., 诺思, 道格拉斯 C. 44, 59, 90, 105

North Sea, 北海 39, 195  
Norway, 挪威 106 ~ 108, 139, 160,  
211, 214, 239, 252 ~ 253  
Norwich, 诺里奇 66, 115  
Nova Scotia, 新斯科舍 250  
Nueva Planta, 新普兰塔 189  
Nuremberg, 纽伦堡 194, 197  
Nystad, Peace of (1721), 1721 年尼斯  
塔德和平条约 211, 219

## O

Oak, 橡树 210, 见 Wood  
Oats, 燕麦 14, 180  
Oberem, U., 奥布雷姆, U., 174  
Obrajes, 制作工场 156, 见 Textiles  
O'Brien, Patrick, 奥布赖恩, 帕特里克  
287  
Odén, Birgitta, 奥登, 比吉塔 210  
Oder, 奥德河 233  
Ogg, David, 奥格, 戴维 269  
Öhberg, Arne, 奥伯, 阿纳., 218, 274  
Old Pretender, 老觊觎者, 见 James  
VII  
Old South, 旧南方地区, 见 America,  
North, southern colonies  
Olivares Gaspar de Guzman, Count of  
Olivares, Duke of Sanlúcar de Bar-  
rameda, 奥利瓦雷斯, 加斯帕·德古  
兹曼, 奥利瓦雷斯伯爵, 杉卢卡·德  
巴兰梅达公爵, 181 ~ 184  
Olive oil, 橄榄油 276  
Onody, Oliver, 欧纳蒂, 奥利佛 150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211  
Open door policies, 开放政策, 见  
State, liberalism  
Oporto, 奥波尔图 182  
Orangists, 奥兰格党员 51, 53, 62 ~  
63, 68 ~ 69, 78,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Orient, 东方 48, 84, 107 ~ 108, 见  
China Japan  
Orkneys, 奥克尼群岛 39  
Ormsrod, David, 奥姆斯罗德, 戴维 261,  
264, 275  
Ortiz, Fernando, 奥梯兹, 费尔南多  
164, 190  
Osborn, Wayne S., 奥斯本, 韦恩 S.  
155  
Ostend, 奥斯坦德 234  
Osterud, Oyvind, 埃斯特鲁德, 尼尔温  
215 ~ 216, 221 ~ 223  
Ostrander, Gilman M., 奥斯特兰德,  
吉尔曼 M. 238, 241  
Ottoman Empire, 奥斯曼帝国, 见  
Empire, Ottoman  
Overijssel, 上艾瑟尔 62  
Owen, Robert, 欧文, 罗伯特 6  
Oxenstierna, Axel, 奥森蒂耶纳, 阿克  
塞尔 205

## P

Pach, Zsigmond Pál, 帕赫, 兹格蒙德·  
Pál. 49, 131 ~ 135, 137, 141  
Pacifism, 和平主义 251

- Palestine, 巴勒斯坦 49
- Panama, 巴拿马 253
- Panama Canal, 巴拿马运河 253
- Panowie*, 领主 143, 见 *Seigniors*
- Pantaleão, Olga, 潘特列奥, 奥尔加 185
- Paraguay, 巴拉圭 150
- Pares, Richard, 佩尔斯, 理查德 92, 159~160, 162~165, 167~172, 271
- Paris, 巴黎 12, 21, 29, 76, 83, 86, 104~105, 272, 283
- Paris, Treaty of (1763), 1763 年巴黎和约 257, 273
- Parker, David, 帕克, 戴维 89~90
- Parker, Geoffrey, 帕克, 杰弗里 17, 23, 44, 58, 69, 80, 105, 116~117, 282~283
- Parry, J. H., 帕里, J. H. 39, 46~47, 49~50, 52, 111, 270~271
- Partnership system, 公司制度 56, 见 *Companies*
- Passarowitz, Peace of (1717), 1717 年帕萨洛维茨和约 234
- Pastels, 蜡笔 14
- Pastoralism, 畜牧主义 83
- Pasturage, 畜牧业, 见 *Agriculture*, *pasturage*
- Patriarchal society, 家长制社会 147
- Patricians, 贵族 68, 见 *Burghers*
- Pauperism, 贫困, 见 *Poor*
- Payments, 国际收支差额  
balance of, 收支平衡 57~58, 60, 92, 97, 106, 109, 111, 132, 186~187, 192, 200, 254, 256, 见 *Money*; *State*, *finances*  
system of, 国际收支体制 58, 105, 见 *World - economy*
- Peasantry, 农民 12, 14~15, 30~32, 41, 84~90, 117, 124, 132~144, 143, 145~146, 155, 164, 167, 182, 194, 200~202, 203~204, 207, 209, 211~214, 216~217, 221~222, 225~229, 231, 286~288, 见 *Cottagers*; *Farmers*; *Laborers*  
desertions of, 农民的逃亡 140, 145, 226  
*Estate of the Peasantry*, 农民的地产, 见 *Sweden*, *Estates*  
expropriation of, 地产的征用 90, 226  
peasant revolts, 农民反抗 5, 30, 101, 125, 139, 144~145, 147, 232, 235  
upper, 农民上层, 见 *Farmers*, *yeoman*
-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 236~237
- Penson, Lillian M., 彭森, 莉莲 M. 271
- Pentland, H. G., 彭特兰, H. G. 75, 258
- Pepeña*, 收养 154
- Pepper, 胡椒 13, 47~48, 273, 见 *Spices*
- Périgord, 佩里戈尔 14

- Periphery (peripheralization) 周围 8~9, 17, 22, 47~50, 65, 83~84, 97~98, 109, 123, 129~132, 134, 138, 141~142, 144~147, 151, 156, 158, 160~162, 166~169, 175, 179~182, 185, 196, 203~204, 209, 217~219, 221, 223~229, 233, 236~237, 241, 246~247, 251, 262, 273~274
- Perjés, G., 波耶斯, G. 115
- Pernambuco, 伯南布哥 163
- Persia, 波斯 108, 264, 273
- Persian Gulf, 波斯湾 47
- Peru, 秘鲁 87, 151~156, 174
- Peter the Great (Peter I of Russia), 彼得大帝 207, 218~209, 252
- Peterson, E. Ladewig, 彼德森, E., 拉得维希 159
- Peterson, Mendel, 彼德森, 门德尔 222~223
- Petraccone, Claudia, 彼特拉科恩, 克劳迪娅 146
- Petrie, Sir Charles, 皮特里, 查尔斯爵士 253
- Phelan, John L., 菲兰, 约翰 L. 153~154, 156, 172
- Philip II (of Spain), 菲利普二世(西班牙) 180, 183
- Philip III (of Spain), 菲利普三世(西班牙) 69, 151, 204
- Philip V (of Spain), 菲利普五世(西班牙) 189~190, 198
- Philippines, 菲律宾 107, 148, 153
- Piedmont, 皮埃蒙特 201~202
- Piel Jean, 皮埃尔, 让 148, 152, 155~156
- Pigs, 猪, 见 Livestock
- Pilgrimage of Grace, 恩典朝圣 5
- Pillorget, René, 皮勒格特, 勒内 112, 124~125
- Pinerolo, 皮内罗洛 250
- Pinkham, Lucille, 平卡姆, 卢西勒 123
- Piracy, 海上掠夺 48, 51, 69, 91, 111, 128, 157~161, 163, 188, 198, 238, 249, 271~272, 见 Banditry
- Pirenne, Henri, 皮雷尼, 亨利 198
- Pistoia, 皮斯托亚 30
- Pitch, 沥青 100, 218, 220, 239~240, 274
- Pitt, William, (the Elder), 皮特, 威廉 75
- Piuz, Anne-Marie, 皮乌兹, 安娜-马利埃 200
- Planned economy, 计划经济 5
- Plantations, 种植园 148, 152, 161, 163, 167~168, 172~173, 271, 见 Estates
- Planters, 种植者 161, 164, 167~171, 173~174, 257, 270~271
- Plow, 犁 88
- Plum, J. H., 普拉姆, J. H. 75, 96, 114, 119, 121, 247, 256, 260, 268, 283~286
- Plunder, 掠夺 161



- Plutocracy, 富豪阶级 63, 277, 285
- Podhale, 帕德黑尔 145
- Pohl, Hans, 波尔, 汉斯 156
- Poisson, Jean - Paul, 普瓦松, 让 - 保罗 284
- Poland, 波兰 14, 20, 22, 61, 66, 83, 98  
~ 99, 107, 131 ~ 136, 138 ~ 139,  
141 ~ 145, 207, 210, 214, 216, 219,  
222, 225 ~ 230, 233, 235, 252, 261,  
276  
eastern (southeastern), 东部(东南部) 145  
First Partition of, 第一次瓜分波兰 225  
North "Great Poland", 北部"大波兰国" 140  
polonization, 波兰化 145  
Poldering, 低地国家 40, 见 Hollandries  
Polišensk ý, J. V., 波利森斯基 J. V.  
4, 23 ~ 24, 64, 206, 232  
Polish War of 1655, 1655 年波兰战争 213, 217  
Politicians, 政治家 130, 285, 见 State  
Pollnitz, Charles Louis, 波尔尼茨, 查理·路易斯 2  
Poltava, 波尔塔瓦 219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211, 225 ~ 228, 230 ~ 231  
Pommern, 见 Pomerania  
Ponant, 西部, 见 France, western  
Pondicherry, 本地治里 250  
Poni, Carlo, 波尼, 卡洛 200  
Ponsot, Pierre, 庞索特, 皮埃尔 145  
Poor, 贫民 8, 28 ~ 29, 49, 63, 84, 89,  
92, 94, 125, 135, 140 ~ 141, 161,  
194, 196, 204, 259, 276, 285, 见  
Classes, lower  
Poor Laws, 济贫法 92, 121  
Population, 人口 13 ~ 15, 18, 30, 33,  
39 ~ 41, 45, 48, 63, 68, 75 ~ 76, 80  
~ 81, 88, 92, 102, 106, 115, 130 ~  
131, 140 ~ 141, 143 ~ 144, 146, 151  
~ 153, 158, 168, 172, 194, 207,  
213, 219, 228, 232 ~ 233, 246, 258,  
260, 268, 271  
decline of (depopulation), 减少 15,  
18, 25, 30, 42, 75 ~ 76, 130, 146,  
149, 153 ~ 154, 181 ~ 182, 196, 见  
Epidemics  
expansion of, 人口的发展 9, 15, 18,  
25, 41, 75 ~ 76, 129, 145, 245, 258  
~ 259, 262, 277  
Porcelain, 瓷器 273  
Porchnev, Boris, 波尔什涅夫, 鲍里斯 182  
Port, 港口 187  
Port - Royal, 皇家港口 159  
Portugal, 葡萄牙 19 ~ 21, 45 ~ 47, 49,  
52, 78, 97, 112, 146, 157, 160, 167,  
179 ~ 182, 184 ~ 191, 193, 217,  
235, 239, 255, 261, 268 ~ 270, 276,  
282, 284, 288, 见 Iberia  
Portuguese East India Company, 葡属  
东印度公司 183

- Postlethwayte Malachi, 波斯特勒斯维特马拉奇 271
- Postel - Vinay, Gilles, 波斯泰尔 - 维奈, 吉勒斯 4
- Potash, 草硷(碳酸钾) 100, 218, 239, 274
- Potatoes, 马铃薯 83, 259
- Potosí, 波托西 149, 152
- Poverty, 贫穷, 见 Poor
- Poznań, 波兹南 138
- Precious metals, 贵重金属, 见 Bullion
- Predikants, 牧师 68 - 69, 287, 见 Christianity, clergy
- Price, Jacob M., 普莱斯, 雅各布 M. 105 - 106, 166, 169 - 170
- Prices, 价格 3, 14 - 16, 19, 21, 25, 28 - 30, 33, 56, 76, 83, 110, 131, 133 - 134, 136 - 137, 150, 155, 160, 166, 168 - 169, 193, 205, 216, 262 - 263, 267, 272, 285  
 agricultural, 农产品价格 30, 40, 56, 75, 77, 82, 87 - 88, 131, 154 - 155, 164 - 165, 222, 224, 258 - 260, 262, 276  
 bullion, 金条, 银条 16 - 17, 21 - 22, 见 Bullion  
 decline of, 价格的低落 3, 13, 16, 19, 21 - 22, 40 - 41, 86, 88, 97 - 98, 131, 138, 145, 155, 169 - 170, 193, 196 - 197, 214, 220, 224, 245, 260 - 261, 264, 277  
 metallic, 金属的, 见 Prices, bullion  
 nominal, 挂名的 16, 21, 25, 276  
 rise of, 涨价 4, 13, 19, 21 - 22, 30, 33, 47, 75, 110, 129 - 132, 134, 137, 142, 150, 154, 165 - 166, 173, 182, 184, 186 - 187, 205, 214, 220, 260 - 261, 270, 274, 276  
 silver, 银, 见 Prices, bullion  
 silver - gold ratios, 金银比率 13, 17
- Prickler, Harald, 普里克勒, 哈罗德 133
- Priestly, Margaret, 普雷斯利, 玛格利特 95
- Prinsengracht, 普林森运河 45, 见 Transport, canals
- Printers, 印刷工人 44, 66
- Printmaking, 制版画者 12
- Prisons, 监狱 93, 226
- Privateers, 私掠船, 见 Piracy
- Procacci, Giulio, 普罗卡西, 朱利奥 197
- Producers, agricultural, 农业生产者, 见 Farmers; Peasants
- Production, 生产 5, 13, 24, 30, 38 - 39, 42, 44, 56, 86, 92, 119, 140, 155, 173, 194 - 196, 238, 259, 273 - 274  
 forces of, 生产力 6, 24  
 mode of, 生产方式 5 - 8, 29, 32, 54, 115, 173, 195 - 196, 见 Capitalism; Feudalism  
 relations of, 生产关系 6, 24, 146,

175, 196, 226, 273  
*Produktplakatet of 1724*, 产品广告, 221  
Profits, 利润 19, 26, 38, 41~43, 46~49, 51~52, 56~57, 63, 67, 69~70, 87, 89~90, 97, 108, 113, 116, 129~130, 132, 137~138, 140~142, 148~150, 152~157, 161~164, 167, 169, 171, 179, 184, 187, 191~194, 196, 198, 201~202, 204, 211, 218, 221~222, 255, 259~261, 263, 270~272, 274, 276, 279  
Proletarianization, 无产者化 8, 15, 135  
Proletariat, 无产者, 见 Workers  
*Propinatio*, 141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 见 Mercantilism  
Protestant ethic, 新教伦理 57  
Protestantism, 新教 23, 68~69, 77, 124, 249, 251, 254, 286~287, 见 Christianity; Reformation  
French, 法国人, 见 Huguenots  
Provence, 普罗旺斯 125  
Prussia, 普鲁士 66, 71, 135, 142, 179, 195, 201, 204, 214, 217, 219, 222, 225~236, 241, 256~257, 270, 273  
Ducal, 普鲁士公国 145  
East, 东部 225  
Prussian licences, 普鲁士特许状 207~208, 214  
West, 西部 140, 225

Public borrowing, 民间借贷, 见 State, finances  
Public service, 公益事业, 见 State, bureaucracy  
Pueblo, 印第安村 152  
Puerto de Principe, 普林西比港 128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157  
Pulo-Run, 伦岛 79  
Puritans, 清教徒 67, 70, 77  
Putting-out system, 生产体制, 见 Industries, putting-out system  
Pyrenees, Treaty of (1659), 比利牛斯条约 189

## Q

Quarrying, 钻掘 263  
Quencez, G., 奎恩塞兹, G. 88  
Quicksilver, 汞(水银), 见 Mercury

## R

Rabb, Theodore K., 拉布, 西奥多 K. 22~23, 34, 120~121  
Rabe, Hannah, 拉比, 汉纳 46  
Rachel, Hugo, 拉切尔, 胡戈 230  
Ragusa, 拉古萨 21  
Rákóczi, Ferenc, II (of Hungary), 拉科齐, 弗利克二世(匈牙利) 134, 142, 145  
Raleigh, Sir Walter, 雷利, 沃尔特爵士 159  
Rambert, Gaston, 兰伯特, 加斯顿 185, 188, 190, 258

- Ramillies, 拉米伊 198
- Ranches, 大牧场 158
- Rapeseed, 油菜籽 14
- Rapp, Richard Tilden, 拉普, 理查德·蒂尔登 50, 98, 197, 199~200, 202
- Rastatt, Treaty of (1714), 拉施塔特条约 234
- Ravensburg, 拉芬斯堡 225, 228
- Raychoudhuri, Tapan, 雷乔杜里, 塔潘 107
- Realengas, 弃地 154
- Reales de ocho, 八个里亚尔(西班牙古银币) 59, 108, 见 Money
- Recession, 经济衰退, 见 Cycles, economic, B-phases
- Recife, 雷西腓 163
- Red Sea, 红海 47
- Reddaway, W. E., 雷德韦, W. E. 223
- Reddich, O., 雷迪奇, O. 234
- Redevances, 租金, 见 Seigniors, seigniorial dues
- Redlich, Fritz, 雷德利希, 弗里茨 196
- Reduktion, 换算 213~217
- Reed, Clyde G., 里德, 克莱德 G. 59, 104
- Rees, J. F., 里斯, J. F. 240
-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 4, 6, 33, 76, 287, 见 Protestantism
- Refugees, 难民 42, 199
- Regents (of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摄政者 45, 65, 67~68, 115
- Régime anjouin, 198
- Regionalism, 地域主义 144~145, 181
- Reims, 兰斯 90
- Reinhard, Marcel R., 莱因哈德, 马塞尔·R. 18, 75~76, 258~259
- Religion, 宗教 65~68, 76, 102, 123, 145, 252, 288, 见 Christianity; Islam; Jews
- Rembrandt van Rijn, 伦布兰特, 范赖恩 36
- Remonstrants, 规谏者, 见 Arminius, Jacobus
-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4, 156
- Renier, G. J., 雷尼尔, G. J. 62~63, 68
- Rentengrundherrschaft, 见 Grundwirtschaft
- Rentes constituées, 法定地租 86
- Rentes foncières, 地产租 86
- Rentier, 靠养老金, 息票生活者 57, 215, 276, 280
- Rents, 地租 4, 13, 27, 30, 76, 85, 87~88, 90, 116, 138, 212, 222, 225, 263
- quit-rents, 退租 86, 140
- Repartimiento, 分配证 153~155, 162, 174
- Republicans, 共和党党员 69, 288
- Reserves, 储备 89, 139
- Resin, 树脂 240
- Resnick, Stephen, 拉斯尼克, 斯蒂芬 44
- Revah, I. S., 勒瓦, I. S. 183
- Revolts, 反抗者 119~120, 122, 125,

- 173, 182, 263, 280, 见 Peasantry, peasant revolts; Revolution; Slavery, slave rebellions
- Revolution, 革命
- agricultural, 农业革命, 见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 American, 美洲革命 241, 257
- bourgeois, 资产阶级革命, 见 Bourgeoisie, bourgeois revolution
- Dutch revolution, 荷兰革命, 见 Netherlands Revolt of the
- English, 英国革命,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Civil War
- financial, 金融革命 105, 118
- French, 法国革命, 见 France, French Revolution
-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Glorious Revolution
- industrial, 工业革命, 见 Industrial Revolution
- Malthusian, 马尔萨斯的 27
- Revolution of 1688, 1688 年革命,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Glorious Revolution
- Russian, 俄国革命, 见 Russia, Russian Revolution
- Rhine(river), 莱茵河 41, 133, 227
- Rhineland, 莱茵河以西地方, 莱茵省 195, 197~198, 201, 227, 233, 250
- Ricardo, David, 李嘉图, 大卫 187
- Rice, 稻米 145, 202, 259
- Rich, E. E., 里奇, E. E. 47, 49, 52, 236, 271, 274
- Richelieu, Cardinal Armand, 黎塞留, 卡迪诺·阿尔芒 75, 90, 95, 250
- Richet Denis, 里奇特, 丹尼斯 96, 276
- Richmond, Vice - Admiral Sir H., 里奇蒙, 海军中将 H 爵士 257
- Ridderhusordningen, 贵族考试法, 见 Nobility Matriculation Law
- Riemersma, Jelle C., 63
- Riga, 里加 100, 211~212
- Rijswijk, Peace of (1697), 1697 年赖斯韦克和约 188, 246, 250, 272
- Riley, P. W. J., 赖利, P. W. J. 253~254
- Ringrose, D. R., 林格罗斯, D. R. 59
- Rio de la Plata, 拉普拉塔 183, 189
- Roberts, Lewes, 罗伯茨, 刘易斯 106
- Roberts, Michael, 罗伯茨, 迈克尔 64~65, 77, 203~217, 222
- Robota, 劳役 232, 见 Corvée - labor
- Robotpatent of 1680, 1680 年劳役法 232
- Rocroi, 罗克鲁瓦 180
- Roehl, Richard, 罗尔, 理查德 83, 267
- Roessingh, H. K., 罗辛, H. K. 165, 268
- Rokkan, Stein, 罗凯, 斯坦恩 64
- Romano, Ruggiero, 罗马诺, 鲁基洛 14~16, 19~20, 24, 26, 40, 42, 49, 91, 150, 152, 154, 173~174, 196~197, 200, 203, 270

- Romero de Solis, Pedro, 罗米洛·德·索利斯, 佩德罗 190
- Rornein, Jan S., 罗曼恩, 简 S. 92
- Roorda, D. J., 卢达, D. J. 63, 68~69, 118
- Roos, Hans - Edvard, 鲁斯, 汉斯 - 爱德华 203~210
- Rosen, Jerker, 罗森, 杰克尔 214~216, 223~224
- Rosenberg, Hans, 罗森堡, 汉斯 225, 227, 230~231, 235
- Roseveare, Henry, 罗斯维尔, 亨利 118, 247, 279
- Roskilde, Treaty of (1658), 罗斯基勒条约 211, 223
- Rostow, W. W., 罗斯托, W. W. 19
- Rostworowski, Emanuel, 罗斯特瓦洛斯基, 伊曼纽尔 141, 144~145
- Rothschilds, 罗斯柴尔德家族 6
- Rotterdam, 鹿特丹 67, 275
- Roturiers, 平民的 286
- Roussillon, 鲁西伦 182
- Royal African Company (R. A. C.) 皇家非洲公司 52, 245
- Royal Bank, 皇家银行 281
- Royalists, 保王党员 67, 288, 见 Great Britain
- Rubens, Peter Paul, 鲁宾斯, 彼得·保罗 37
- Rubini, Dennis, 鲁比尼, 丹尼斯 279
- Ruiz Martin, Felipe, 鲁伊斯·马丁, 菲利普 180, 205
- Rule John, C., 鲁尔, 约翰 C. 80, 117
- Rum, 朗姆酒 168, 237, 241
- Ruraut, 见 Peasantry
- Rusche, G., 鲁舍, G. 93
- Rusiński, Władysław, 拉森斯基, 乌拉迪斯劳 135, 140
- Russia, 俄国 7~8, 58, 100~101, 106~109, 132, 139, 195, 214, 218~220, 229, 233, 235, 239, 263, 274
-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 6
- Ruthenia, 罗塞尼亚 144~145
- Rutkowski, Jan 卢特科斯基, 简 135, 138, 140, 143, 226~227
- Ruwet, Joseph, 卢威特, 约瑟夫 56, 201
- Ryan, 赖恩 249
- Rye, 黑(裸)麦 14, 180
- Rye - grass, 黑(裸)麦草 259
- Rzeczpospolita, 波兰共和国 142, 见 Poland

## S

- Saaremaa, 萨列马岛 215
- Sainfoin, 驴喜豆 259
- St. Dominique, 圣多明戈 159, 164
- St. Lawrence (river), 圣劳伦斯河 100
- Saint - Léon, Martin, 圣里昂, 马丁 93
- Saint - Malo, 圣马洛 188
- St. Paul's Church, 圣保罗教堂 244
- 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 218
- Salaman, Redcliffe N., 萨拉曼, 雷德克利夫 N. 259

- Salamanca, 萨拉曼卡 14  
 Salerno, 萨莱诺 147  
 Salt, 盐 39~40, 43, 56, 93, 160~161, 187, 199, 204, 254  
 "Salt Mutiny", (1632), "盐工暴动" 182  
 Saltillo, 萨尔蒂勒 152  
 Saltus, 毛荒之地, 见 Land, cultivated  
 Sainsonowicz, Henryk, 萨姆索诺维茨, 亨里克 21  
 Samuelsson, Kurt, 萨缪尔森, 库尔特 208~209, 211~212, 217, 219~221, 234  
 Santarém, 圣塔伦 182  
 Sardinia, 撒丁尼亚 234  
 Sarmatians, 萨马特人 144~145  
 Säteri, 庄园家庭农场 216  
 Savoie, 萨伏依 14, 234  
 Saxony, 萨克森 16, 133, 138, 141, 144, 201, 219, 225, 252  
     Lower, 下萨克森 226, 231  
 Sayous, André - E., 塞由斯, 安德列 - E. 282  
 Scammell, G. V., 斯卡梅尔, G. V. 56  
 Scandinavia, 斯堪的那维亚, 见 Baltic (region)  
 Scania, 斯堪尼亚 211, 213, 218, 223, 229  
 Scelle, Georges, 塞勒, 乔治 272  
 Scheldt (river) 塞尔特(河) 53~54, 69, 198  
 Schlesinger, Walter, 施莱辛格, 沃尔特 226  
 Schlote, Werner, 施洛特, 维尔纳 239  
 Schlumbohm, Jürgen, 施龙博姆, 于尔根 196  
 Schmoller, Gustav, 施莫勒, 古斯塔夫 61, 78, 197, 233  
 Schöffler, Ivo, 舍弗尔, 伊沃 4, 13, 20, 25, 33, 38~39, 48, 62, 107  
 Schumpeter, Joseph A., 熊彼特, 约瑟夫 A. 125  
 Schwartz, Stuart B., 斯瓦兹, 斯图尔特 B. 163, 173~175  
 Schwerin, 士威林 14  
 Science, applied, 应用科学, 见 Technology  
 Scotland, 苏格兰, 见 Great Britain, Scotland  
 Scoville, Warren C., 斯克维尔, 沃伦 C. 102, 249, 287  
 Seamen, 海员 271, 见 Navy  
 Securities, 证券交易 278  
 Sedan, 色当 95  
 Seeley, J. A., 西利, J. A., 246, 256  
 Segovia, 塞哥维亚 180~181  
 Seigniors, 领主 23, 86, 117, 134~135, 137~141, 143, 147, 190, 226, 276, 280, 见 Aristocracy; Classes, upper; Junkers; Landowners; Nobility  
     seigniorial dues, 领主费 86, 138, 140  
     seigniorial reaction, 领主的反应 30~31

- seigniorial revenue, 领主的岁入 89, 103, 140, 212
- Sella, Domenico, 塞拉, 多梅尼科 13, 15~16, 20, 43, 56, 194, 196~197
- Semeyns, Meynert, 西门斯, 梅纳特 39
- Semiperiphery, 半边地区 8~9, 26, 65, 84, 101, 129~130, 138, 151, 158, 170, 179, 190, 192, 195~196, 199, 201, 208, 218, 221~222, 225, 231, 233, 236, 239, 241
- Semiproletariat, 半无产阶级 137, 210
- Semo, Enrique, 塞莫, 恩里克 153
- Sententia Remonstrantium*, 抗议书 206
- Servia, 塞尔维亚 234
- Sereni, Emilio, 塞雷尼, 埃米俄 147, 200
- Serfs, 农奴 134, 140, 143, 145, 147, 154, 200, 225~226, 229, 231~232, 235  
 collier serfdom, 农奴身份的矿工 93  
 emancipation, 解放 30, 145  
 "second serfdom", "第二次农奴制", 见 Coerced labor, cash-crop
- Servants, 侍者 15, 102, 140, 168, 173, 见 Laborers
- Sesmaria, 可转让的土地 147
- Sète, 塞特港 14
- Settlers, 移民, 定居者, 见 Colonies, settlers
-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 70, 191, 221, 257
- Seym, 谢伊姆河 143, 见 Poland
- Seymour, Charles, Duke of Somerset, 西摩, 查里斯, 萨默塞特公爵 122
- Sharecropping, 分成制 200~201, 见 *Métayers*, *Mezzadria*
- Sheridan, Richard B. 谢里登, 理查德 B. 160, 163~164, 168~169, 171, 246, 270
- Shetlands, 设得兰群岛 39
- Shipbuilding, 造船业, 见 Industries, shipbuilding
- Shipping, 航运, 见 Transport, maritime
- Shipwrights, 造船工人 55, 238, 268
- Shrewsbury, Charles Talbot, Duke of, 施鲁斯伯里, 查里斯·塔尔伯特公爵 122
- Sicily, 西西里 145~146, 167, 234
- Sick man of Europe, 欧洲的病人, 见 Empire, Ottoman
- Sideri. S., 西德里, S. 186, 192~193
- Siena, 锡耶纳 21
- Sigismund (of Sweden), 西吉斯蒙德 (瑞典) 203
- Silbert, Albert, 西尔伯特, 艾伯特 186
- Silesia, 西里西亚 16, 133, 138~139, 145, 226, 234~236, 256
- Silk, 丝绸 42, 91, 98~99, 103, 145, 181, 197, 200, 203, 273  
 mills, 91, 197, 200
- Silver, 银 16~17, 20~22, 33, 51~52, 59, 61, 106~112, 148~154,



- 156, 161 ~ 162, 186, 190, 192, 204 ~ 205, 215, 276 ~ 277, 282, 见 Bullion; Money, metallic; Prices, bullion
- Simiand, François, 西米昂德, 弗朗索瓦 3~4, 6, 8
- Sixty Years' Captivity, 60年监禁 182
- Skattebønder, 交税的地产保有人 212, 见 Freeholders
- Slavery, 奴隶制 51, 93~94, 102, 146, 154, 162, 164, 167, 169~170, 172~175, 189, 213, 237, 246, 255~256, 266, 270, 见 Coerced labor manumission, 释放奴隶 174
- slave rebellions, 奴隶反抗(叛乱) 163, 173
- slave-trade, 奴隶贸易, 见 Trade, slavetrade
- Slicher van Bath, B. H., 斯利彻, 范巴恩, B. H. 3, 5, 13~16, 18, 21~22, 29, 40~41, 76, 83, 132~133, 141, 144, 226, 232, 237, 260~262
- Slovakia, 斯洛伐克 132, 138, 见 Czechoslovakia
- Sluiter, Engel, 斯柳特, 恩格尔 52
- Slums, 贫民区 260
- Smelser, Neil J., 斯梅尔策, 尼尔 J. 264
- Smit, J. W., 斯米特, J. W. 53, 91, 115
- Smith, Adam, 史密斯, 亚当 6, 78, 87, 167
- Smout, T. C., 斯莫特, T. C., 83, 251~253, 265
- Smuggling, 走私, 见 Contraband
-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 231
- Social groups, 社会组织 69, 152, 231
- Social security, 社会保险, 见 Charity
- Social structure, 社会结构 9, 25, 29, 32, 182, 201, 247
- Social struggle, 社会斗争, 见 Struggles, social
- Social system, 社会制度 6~8, 32, 64
- Social welfare legislation, 社会福利, 见 Poor Laws
- Socinians, 苏塞纳斯教徒 67
- Soil conditions, 土壤条件 41, 75, 84, 133, 146, 150, 161~165, 180, 201, 207, 222, 230
- Solon, 索伦 236
- Sombart, Werner, 松巴特, 沃纳 46, 195, 280
- Somme (river), 索姆河 83
- Soom, Arnold, 苏姆, 阿诺德 211
- Sorghum, 高粱 180
- Sossons, 小农 88~89, 见 Farmers, small
- Sound, the, 海湾(峡), 港 24, 64, 77, 211, 222~223, 229
- South Sea Bubble, 南海泡沫 282~283, 285
- South Sea Company, 南海公司 191, 255~257, 271~272, 278, 283
- Spain, 西班牙 14, 19~21, 23~24, 31, 42, 46~47, 49, 52~53, 58, 61, 64, 69, 75~77, 91, 97, 101, 106,

- 107, 110, 130, 142, 145~147, 153, 156~158, 160~161, 164, 167, 169, 179~187, 189~191, 198~199, 202, 204~206, 211, 214, 217, 221, 234~235, 239, 246~247, 253, 255~257, 262, 268~273, 276, 280, 282, 288, 见 Iberia  
Hispanic America, 西属美洲, 见 America, Hispanic  
southern, 南部 146
- Spanish Bourbons, 西班牙的波旁酒, 见 Bourbons, Spanish
- Spanish Netherlands, 西属尼德兰, 见 Netherlands, southern
- Spanish Succession, War of,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188~190, 198, 219, 221, 234, 239, 249, 251, 271
- Speculators, speculation, 投机者 45~46, 48, 132, 147, 278, 282, 285
- Spelt*, 斯佩尔特小麦 262
- Sperling, J., 斯伯林, J. 106~109, 276
- Spice Islands, 香料群岛 47
- Spices, 各种香料 47, 49, 51, 107~108, 273, 见 Pepper
- Spiesz, Anton, 斯皮茨, 安东 135, 137~138, 226~227, 232
- Spinners, 纺纱工人, 见 Clothiers
- Spinoza, Benedict, 斯宾诺莎, 本尼迪克特 6~7, 34, 66~67, 70
- Spitzbergen,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39
- Spooner, Frank C., 斯普纳, 弗兰克·C. 3, 17, 21, 27~29, 51, 112, 276
- Squirearchy, 大地主阶级 87, 137, 143, 见 Gentry
- Staatsloven*, 爱国 160
- Stadholder, 荷兰联合省的最高行政长官 62~63, 69, 76,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 Stagnation, economic, 经济停滞, 见 Cycles, economic, B-phases
- Standard of living, 生活标准 28~31, 168
- Staples, 主要产物 50, 56, 61, 96, 164, 186, 202, 206, 238, 240, 275
- Starvation, 饥饿, 见 Food, shortage of
- State, 国家, 6, 9, 20, 25, 27, 32~33, 37~39, 44, 62~63, 65, 67~68, 70, 77~78, 95, 103, 108, 111, 113, 115, 117~118, 121~122, 124~125, 142~145, 150~151, 179, 182, 184, 188, 191, 198~199, 201, 203~204, 209~210, 216, 224~225, 228~232, 235~236, 245, 247, 249, 258, 261, 263, 275, 277~278, 281~284, 286~287  
absolutism, 专制制度 32~33, 68, 102, 114, 118~119, 121, 124~125, 190, 201, 214~215, 220~221, 224~225, 228, 232, 286  
aristocratic, 贵族掌政的 26  
banks, 银行, 见 Banking, state  
bureaucracy, 官僚制度 9, 32, 38, 89, 113~114, 118~120, 124, 143, 153, 155, 157, 179, 183, 195~196,

- 210 ~ 213, 215 ~ 217, 220 ~ 221, 223 ~ 224, 228 ~ 232, 235, 247, 279, 281, 284, 288, 见 Tax - farming
- sale of offices, 出卖职位 86, 95, 142, 151, 195, 208, 231
- "capitalist", 资产阶级 7, 32, 60
- customs (tariffs), 关税, 见 Mercantilism
- feudal, 封建的官僚制度 6, 119, 122
- finances, 财政 30, 54, 57, 77, 86 ~ 89, 91 ~ 92, 103, 105, 113 ~ 118, 121, 137, 141 ~ 142, 147, 150 ~ 151, 153 ~ 154, 156, 165 ~ 166, 180 ~ 182, 184, 188, 191, 202 ~ 205, 207 ~ 208, 212 ~ 220, 223 ~ 224, 226, 228 ~ 232, 237, 246, 249, 265, 268, 276 ~ 283, 285 ~ 287
- interstate system, 州际体系 70 ~ 71, 179, 225, 232
-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61, 65 ~ 66, 68, 70, 94, 114, 141, 245, 268, 277
- 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 见 Mercantilism
- monopolies, 垄断 203 ~ 204, 283
- state banditry, 国家的盗匪行为 285
- state - machinery, 国家机器, 见 State, bureaucracy
- strength of, 国家力量 9, 26, 32 ~ 33, 38, 76, 112 ~ 114, 116 ~ 119, 123, 142 ~ 144, 188, 190, 203 ~ 204, 212, 217 ~ 218, 220 ~ 221, 227, 268, 277 ~ 278, 284 ~ 288
- taxation, 国家税收, 见 State, finances
- universal monarchy, 全世界的君主政体 32, 见 Empire, world - empire
- States - General, 联省, 见 Netherlands, States - General
- Steel, 钢 95, 206, 209
- Stefanescu, St., 斯特凡内斯库, St. 139
- Stewards, 服务员 86
- Stock - exchange, 股票交易 49, 57
-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 7, 100, 203, 210, 212, 214
- Treaty of (1719), 1719 年斯德哥尔摩条约 234
- Stockholm Tar Company, 斯德哥尔摩焦油公司 239
- Stocks, 存货 282 ~ 283, 见 Companies
- Stoianovich, Traian, 斯托雅诺维奇, 特瑞纳 272
- Stols, E., 斯托尔斯, E 61, 198
- Stone, Lawrence, 斯通, 劳伦斯 87, 111, 122
- Stork - Penning, J. G., 斯托克 - 彭宁, J. G. 251
- Stoye, J. W., 斯托耶, J. W. 234
- Stradling, R. A., 斯特拉德林, R. A. 180
- Straits, 海峡 270
-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28, 250

- Stratification, modes of, 分层方式 31, 62 ~ 63, 66, 68 ~ 69, 119 ~ 125, 131, 141, 143 ~ 145, 172 ~ 173, 241, 286, 288
- Strict settlement, 严格的清算 86
- Strikes, 罢工 93
- Strögdöds, 零散的土地 216, 见 Land
- Strong, Frank, 斯特朗, 弗兰克 159
- Struggles, 斗争 3, 8, 32, 76, 145, 238  
social, 社会斗争 121, 见 Classes, class-struggle
- Stuarts, 斯图亚特 121, 236 ~ 237, 248, 278, 285, 见 Great Britain
- Stuhmsdorf, Treaty of (1635), 1635 年斯坦姆斯多夫条约 143, 208
- Sublime Porte, 萨布莱姆, 波尔泰, 见 Empire, Ottoman
- Sugar, 糖 44, 51 ~ 52, 102 ~ 103, 152, 157, 160 ~ 175, 183, 186 ~ 187, 236, 246, 257, 259, 267, 270 ~ 271, 274, 277  
beets, 甜菜 83  
mills, 磨坊 173  
refineries, 炼糖厂 147 ~ 148, 267
- Sully, Duke of, 苏利公爵 87
- Supple, Barry E., 苏普莱, 巴里·E. 4, 43 ~ 44, 52, 92, 103, 106, 109, 122, 125
- Suraz estate, 苏拉兹庄园 145
- Surinam, 苏里南 79
- Surplus, 过剩 9, 30 ~ 32, 39, 139 ~ 140, 148, 152 ~ 153, 161, 173, 246, 259 ~ 260, 262, 278, 285
- Surplus-value, 剩余价值 167 ~ 168, 195, 208, 241
- Sutherland, Lucy, S., 萨瑟兰, 露西 S. 256, 273, 286
- Swabia, 士瓦本 197
- Swart, K. W., 斯沃特, K. W. 118, 268
- Sweden, 瑞典 58 ~ 59, 71, 79, 100, 106, 108, 134, 138, 143 ~ 145, 178 ~ 179, 203 ~ 206, 208 ~ 215, 217 ~ 225, 228 ~ 230, 233 ~ 234, 236, 239 ~ 241, 263, 270, 274, 见 Baltic (region)
- Estates (Stand), 地位 203, 212 ~ 213
- Swedish Trading Company, 瑞典贸易公司 206
- Sweezy, Paul, 斯威齐, 保罗 6
- Switzerland, 瑞士 24, 195, 199 ~ 200, 207, 239, 279
- Symcox, Geoffrey, 西姆克斯, 杰弗里 248 ~ 250
- Synod of the Desert, 沙漠宗教会议 287
- Syria, 叙利亚 49
- Szatmár, Peace of (1711), 萨特马尔和约 143
- Szczygielski, Wojciech, 斯兹杰尔斯基, 沃金斯 132 ~ 133, 141
- Szlachta czastkowa, 中等贵族 143, 见 Nobility, middle
- Szlachta czynszowa, 免役税贵族

143, 见 Nobility, quit - rent

## T

Taino, 泰诺 173

Tallow, 牛羊脂 274

Tangiers, 丹吉尔 185

Tapié, Victor - Lucien, 塔皮埃, 维克多 - 卢西恩 86, 115, 226, 235

Tar, 焦油, 沥青 100, 210, 218, 220, 239~240, 274

Taverns, 小酒馆 260, 见 Alcoholic beverages

Tawney, R. H., 托尼, R. H. 120

Taxes, 税收, 见 State, finances

Tax - farming, 包税 86, 117, 165, 204, 212, 278, 见 State, bureaucracy

Taylor, A. J. P., 泰勒, A. J. P. 226~230, 234

Taylor, George V., 泰勒, 乔治 V. 285

Taylor, Harland, 泰勒, 哈兰德 77

Tazbir, Janusz, 塔齐比尔, 简那森 144~145

Tea, 茶 49~51, 164, 259, 273

Technology, 技术 8, 27, 42~47, 54, 59, 65~66, 105, 150, 163, 174, 199, 208, 248, 280, 288

Temperley, Harold W. V., 坦伯利, 哈罗德 W. V. 188, 256~257, 284

Temple, Sir William, 坦普尔, 威廉爵士 45

Tenant farmers, 佃农, 见 Farmers, tenant

Tenure, 土地使用权 86, 88~89, 121, 147, 263, allodial, 213

Ternate, 特尔纳特 49

Terraferma, 特拉费马 183, 197, 200

Teuteberg, H. J., 陶特伯格, H. J. 29

Textiles, 纺织品 13, 16, 39, 42~43, 46, 49~50, 53, 90~91, 95~100, 111, 141, 181, 185~187, 192, 196, 198, 200, 203, 210, 220, 264, 266, 268~269, 272~274, 279, 见 Calico; Camelots; Chintz; Cotton; Industries, textile; *Lakens*; Linen; Muslin; *Obrajes*; Trade, textiles; Wool new draperies, 新式呢料 42, 66, 91 woollen, 羊毛制的 95, 156, 192, 198, 200, 234, 264

Thiérarche, 蒂耶拉什 14

Thirsk, Joan, 瑟斯克, 琼 82, 87, 122, 165, 194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22~24, 28, 44, 53, 70, 75~76, 78, 99, 115, 133, 138~139, 150, 181, 184, 199, 204~205, 207, 214, 222~223, 226~228, 230, 232~233, 235

Thomas, P. J., 托马斯, P. J. 97, 105, 264

Thomas, Robert Paul, 托马斯, 罗伯特·保罗 44, 59, 273

Thompson, E. P., 汤普森, E. P. 93, 285

Thompson, F. M. L., 汤普森, F. M. L. 85

- Thuringia, 图林吉亚 138, 205
- Tidore, 蒂多里 49
- Tiepolo, Giovanni Battista, 蒂耶波罗, 乔瓦尼·巴蒂斯塔 6
- Tierras baldias, 土地上的流浪汉 154
- Tillburg, 提尔堡 42
- Timber, 木材, 见 Wood
- Titoli pubblici, 见 State, finances
- Tobacco, 烟草 13, 51, 102~103, 157, 162~167, 169~174, 186~187, 236~237, 268
- Toledo, 托莱多 157, 181
- Tomkiewicz, Władysław, 汤姆基耶维兹, 沃勒德斯洛 144
- Tonnesson, Kåre D., 唐尼森, 科勒 D. 139, 212~213
- Tools, 工具 27, 200, 263
- Topolski, Jerzy, 托波尔斯基, 杰齐 19~20, 131~132, 134~135
- Tories, 托利党党员 80, 122, 248, 283, 285,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 Torr, Dona, 托尔, 多纳 5~6
- Tortuga, 托尔图加 157
-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277
- Toulon, 土伦 248
- Tourists, 旅游者 143, 200
- Tournay, 图尔奈 255
- Towns, 市镇 21~22, 30, 41, 45, 51, 68, 91~92, 104, 114~115, 121, 123, 125, 133, 140~141, 144~145, 151, 154~155, 182~183, 194, 196~198, 200, 203, 206, 211, 221, 227, 230, 234, 236, 248, 268, 279
- Trade (world), 贸易 6, 8, 15, 17~18, 22, 25, 29, 37~41, 44~54, 57, 59, 61, 63~64, 66~67, 75, 80, 85, 91~92, 96~99, 101, 104~108, 117, 121, 125, 133, 138, 147~149, 151, 153, 156, 158, 160, 163~165, 167, 171, 181, 183, 185~189, 191, 193, 195, 199, 202~203, 206, 210, 222, 234, 237~240, 246~247, 249~252, 256, 261~263, 267, 269~270, 272, 274~275, 284~285, 见 Bourgeoisie; Merchants, World ~ economy
- “administered”, 管理的 47~48
- Africa, 非洲 46, 186, 238, 252, 273~274
- Arab, 阿拉伯 48~49
- Asian, 亚洲人, 见 Trade, Indian Ocean
- Atlantic, 大西洋 46, 50, 78, 101~102, 104, 133, 148, 151~152, 156, 161, 184, 198, 238, 252, 274, 282, 见 Carrera; Trade, triangular
- Baltic, 波罗的海 24, 40, 42, 46, 48~50, 52~53, 55, 58, 63, 77, 96~98, 105~107, 132, 206, 214, 217, 240, 250, 252, 274, 276
- bullion, 贵金属, 金银 76, 105, 276
- bulk, 大批量 8, 40, 48, 261
- Caribbean, 加勒比海, 见 Trade, At-

- lantic
- cattle, 牛 131, 133, 155, 157, 265 ~ 266
- China, 中国 48 ~ 49, 273, 282
- commercial primacy, 商业的首要性 38 ~ 39, 见 Hegemony
- copper, 铜 143, 204
- decline of, 贸易的衰落 156, 187
- Dutch, 荷兰 39, 41, 48 ~ 50, 53, 55, 56 ~ 57, 66, 69, 78, 134, 189, 200, 203, 267
- Eastland, 东部地区, 见 Trade, Baltic
- entrepôt, 仓库 54 ~ 57, 59, 77 ~ 78, 102, 197, 211, 253, 275
- external arena, 内部角斗场 85, 98, 103, 108 ~ 109, 158, 219, 246, 267, 269, 273
- free, 自由贸易 38, 48, 53, 61, 84, 188, 220, 245, 253, 269, 271
- fur, 皮毛 47, 273 ~ 274
- grain, 谷物 13, 41, 134, 204, 211, 222, 261 ~ 262, 268, 见 Cereals
- herring, 鲱鱼 40
- illegitimate, 违法的, 见 Contraband
- Indian Ocean, 印度洋 46, 48 ~ 49, 97, 107, 269, 273 ~ 274, 282
- inland, 内地的 252, 276
- interregional, 地区之间 84, 103, 138, 146, 183, 197, 212
- intra - Asian, 亚洲内部 49
- intra - European, 欧洲内部 137 ~ 138, 188, 214, 238, 273
- Levant, 立范特 107, 273, 见 Trade, Mediterranean
- luxury, 奢侈品 8, 47 ~ 48, 50, 103, 107, 131, 见 Luxury goods
- Mediterranean, 地中海 46, 50, 53, 63, 98, 262, 272, 见 Trade, Levant
- monopolies, 垄断 61, 63, 156, 159 ~ 160, 193, 206, 219 ~ 220, 235, 239 ~ 240, 245, 252 ~ 253, 255, 270 ~ 272, 274 ~ 276, 282
- “Mother trade”, “贸易之母” 见 Trade, Baltic
- national markets, 全国市场 183
- Ottoman, 土耳其, 见 Trade, Levant
- plantation, 种植 254
- re - exports, 再出口 60, 102, 104, 165 ~ 166, 206, 266, 269
- “rich trades”, “奢侈的贸易”, 见 Trade, luxury
- Russian, 俄国人 106, 274
- salt, 盐 40, 237
- slave, 奴隶 52, 102, 146, 158, 161, 166, 186, 191, 255, 268, 271, 273
- spice, 香料 47, 59, 103, 158, 273
- sugar, 糖 103, 158, 166, 270
- terms of, 条件, 关系 9, 13, 19, 25, 37, 49, 97, 111, 131, 136, 193, 217, 267
- textile, 纺织品 42 ~ 43, 111, 192, 235
- timber, 木材 44

- trade war, 贸易战, 见 War, economic aspects of
- trading companies, 贸易公司, 见 Companies
- transcontinental, 贯通大陆的贸易 183, 199, 214
- triangular, 三国间的 51, 104, 185, 237~238, 见 Trade, Atlantic
- White Sea, 白海 274
- wine, 葡萄酒 193, 237
- Trading - posts, 贸易站 273
- "Train oil", 运油列车 39
- Traitants, 包税者 278, 见 Financiers
- Transport, 运输 27, 38, 102, 104, 136, 141, 163, 165, 193, 261, 263, 274~275
- canals, 运河 45, 54, 262
- land, 陆上 104
- maritime, 海上 39~40, 44, 46, 49~50, 53, 56~57, 66, 96~97, 100, 104, 116, 118~119, 132, 150, 152, 160, 193, 210, 212, 217, 221, 236, 238, 250, 252, 257, 272, 见 Buss, *Ventjagers*
-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 234
- Treasury, 宝库 59, 118,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 Trefoil, 车轴草 259
- Tremel, Ferdinand, 特雷梅尔, 费迪南德 233, 235
- Treue, Wilhelm, 特罗伊, 威廉 195, 205~206, 226, 231, 233
- Trevelyan, George Macauley, 特里维廉, 乔治·马考莱 122
- Trevor - Roper, Hugh R., 特雷弗 - 罗珀, 休 R. 123, 141, 251
- Tribute, 贡品, 纳贡 149
- Triage, 拣矿 15
- Trieste, 的里雅斯特区 234
- Trinidad, 特立尼达岛 157
- Trinkets, 小件饰物 237
- Trip, Elias, 特里普, 伊莱亚斯 206
- Triple Alliance, 三方联盟 79
- Tripoli, 的黎波里 272
- Trondheim, 特隆赫姆 223
- Tropical economy, 热带经济 238, 246
- Truce of 1609, 1609 年停战协定 45, 58, 64, 69, 见 Netherlands, Revolt of the
- Truce of 1621, 1621 年停战协定 42, 51, 见 Netherlands, Revolt of the
- Tucker, G. S. L., 塔克, G. S. L. 258
- Tulips, 郁金香属 282
- Tunisia, 突尼斯 98
- Turenne, Henri Vicomte de Marshal - General, 蒂雷纳, 亨利·维孔特德大元帅 287
- Turkenjahr* (1683) 1683 年的围困 232
- Turkey, 土耳其, 见 Empire, Ottoman
- Turpentine, 松节油 240
- Turnips, 萝卜 82, 259
- Tuscany, 托斯卡尼 14, 199, 203
- Twente, 特文特 16, 200



Tyrol. 提洛尔 138, 205

## U

*Ugedagsbonden*, 小农 222, 见 Farmers, small

Ukraine, 乌克兰 139, 143, 145, 219

Ulm, 乌尔姆 197

Ulrika (of Sweden), 乌尔里卡 220

Ulster, 阿尔斯特 239

Unequal exchange, 不平等交换 50

Unger, Richard W., 乌格, 理查德 W. 39, 43, 48, 60, 91

Unger, W. S., 乌格, W. S. 52, 274

Union of Arms, 武装联合 181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联合东印度公司,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East India Company

United Provinces, 联合省,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 38, 281

*Untertan*, 家臣 227, 见 Serfs

Unwin, George, 昂温, 乔治 76

Urban industry, 城市工业, 见 Industries, urban

Urban phenomena, 城市现象, 见 Towns

Urbich, Johann Christian, 乌尔比奇, 约翰尼·克里斯琴 219

*Utarbetningstratt*, 产出体制 210, 见 Industries, putting-out system

Utrecht, 乌特勒支 41, 189 ~ 190,

234, 246, 250, 253, 255, 271, 275, 278, 281, 283 ~ 284

Utrecht, Union of (1579), 乌特勒支联盟 62,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 V

Vagrants, 流浪者 196

Vajnshtejn, O. L., 瓦扬斯坦, O. L. 24

Valencia, 瓦伦西亚 145 ~ 146, 183, 185, 189

Valenciennes, 瓦朗谢纳 95

Valério, Nuno, 瓦莱里奥, 努诺 17

Vandenbrocke, Chr., 范登布罗克, chr. 259

Van der Wee, H., 凡·德·威, H. 41, 58 ~ 59, 198, 202, 205, 277 ~ 279

Van der Woude, A. M., 凡·德·武德, A. M., 200, 344

Van Dijk, H., 凡·迪克 63

Van Dillen, J. G., 范·迪伦, J. G. 58 ~ 59, 60, 63, 281

Van Hoboken, W. J., 凡·豪博肯, W. J. 51, 62

Van Houtte, Jean, A., 范·赫特, 琼 A. 45

Van Klaveren, Jacob, 范·克拉维伦, 雅可布 43, 233

Van Oldenbarnevelt, Johan, 凡·奥尔登巴内费尔特, 约翰 69

Van Riebeeck, Jan, 凡·里贝克, 简 77

Van Veen, Joh., 范·菲恩, 约翰 38, 40, 66, 269

- Van Wijck, Willem, 范·维克, 威勒姆 204, 206, 209
- Várkonyi, Agnes R., 瓦尔科尼, 阿格尼斯 R. 134, 142~143, 145
- Varnland, 瓦姆兰 209
- Vassal, 诸侯, 见 Feudalism
- Vaud, 沃德(州) 14
- Veenendaal, A. J., 维伦达尔, A. J. 189
- Vegetables, 蔬菜 14
- Vellon, (币的名称) 185, 190, 204~205, 见 Copper, copper coins; Money, metallic
- Venality of office, 职务上的贪污受贿, 见 State, bureaucracy, sale of offices
- Venezuela, 委内瑞拉 160
- Venice, 威尼斯 50, 70, 194, 196~197, 199, 200, 202, 234, 273
- Ventjagers, 快船 39
- Ventura, Angelo, 本图拉, 安赫洛 203
- Verlagssystem, 放料加工制, 见 Industries, putting-out system
- Verleger, 商人-企业家 192, 见 Merchants
- Verlinden, Charles, 弗灵登, 查尔斯 45, 146~147
- Vermuyden, Cornelius, 弗穆登, 科尔尼厄斯 59
- Verviers, 韦尔维耶 42
- Véxin français, 维克辛, 弗朗希斯 88
- Viana, Luis Filho, 维亚纳, 小路易斯 173
- Viborg, 维堡 100
- Vicens Vives, Jaime, 维桑·维韦斯, 海梅 181~182, 184, 189~190
- Vienna, 维也纳 28, 42, 131, 219, 232
- Vignols, Léon, 维格诺尔斯, 列昂 185
- Vigo, Giovanni, 维戈, 乔瓦尼 16
- Vilar, Pierre M., 维拉尔, 皮埃尔 M. 4, 17, 19, 21, 57~58, 67, 111~112, 166, 181~182, 186, 188~189, 270, 277, 283
- Villani, Pasquale, 维拉尼, 帕斯夸莱 202
- Villari, Rosario, 维拉里, 罗萨里奥 147
- Vincolismo, 维护大地产的法制 31
- Viner, Jacob, 瓦伊纳, 雅各布 257
- Virginia, 弗吉尼亚 164~166, 169~174
- Visconti, Alessandro, 维斯康蒂, 亚历山德罗 70
- Vittorio Amadeo II (of Savoy), 维托利奥, 阿马迪沃二世 201
- Vivanti Corrado, 维万蒂, 科拉多 147
- Vizcaya, 比斯开 182, 见 Basque country
- Vlachović, Jozef, 弗拉兹奥威, 约瑟夫 134
- VOC, 荷兰东印度公司, 见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 Vodka, 伏特加酒 141
- Voltaire, François - Marie Arouet de, 伏尔泰, 弗朗西斯-玛丽阿鲁埃 289

Von Braun, Joachim Freiherr, 冯·布劳恩, 约阿希姆·弗雷赫尔 225 ~ 226, 233, 235

Von Hippel, W., 范·希普尔, W. 232

Voralberg, 沃拉尔贝格 14

## W

Waddell, David A. G., 沃德尔, 戴维 A. G. 271

Wages, 工资 13, 54, 67, 76, 92, 100, 137, 202, 205, 209

decline in, 下降 15, 25, 28 ~ 29, 63, 93, 129, 146, 196

real 实际工资 9, 15, 16, 25, 28 ~ 29, 63, 129, 140, 260, 262

rise in, 工资提高 16, 28 ~ 29, 42, 63, 92 ~ 94, 116, 200, 240, 260, 268, 280

stickiness of, 工资的稳定 16

wages in kind, 工资种类 93, 154, 166, 168, 170, 174, 225

wage - workers, 领工资的工人, 见 Laborers

Wallachia, 瓦拉几亚 234

Wallerstein, Immanuel, 沃勒斯坦, 伊曼纽尔 16, 18, 24, 29 ~ 32, 47 ~ 49, 52, 104, 123, 161, 167, 180, 204, 226

Walloons, 瓦隆人 45, 209, 见 Brabant; Flanders

Walpole, Horace, 沃波尔, 霍勒斯 166, 220, 238, 246, 257, 283, 285 ~ 286

Walton, Gary, M., 沃尔顿, 加里 M. 238, 240

Wangermann, Ernst, 万格尔曼, 恩斯特 232

Wansink, N., 万新克, N. 51, 62

War, 战争 3, 14, 22 ~ 26, 33, 44, 65, 69, 78 ~ 80, 91, 99 ~ 100, 111, 116, 121, 123, 130, 134 ~ 135, 138, 140 ~ 141, 143, 145, 158, 162, 164, 182, 184, 188, 189 ~ 191, 207, 213 ~ 219, 222 ~ 223, 227, 230, 232, 246 ~ 247, 250 ~ 251, 254 ~ 257, 262 ~ 263, 269 ~ 273, 275 ~ 276, 278, 280 ~ 281, 284 ~ 285, 见 Armaments

civil wars, 内战 5, 63, 77, 124, 144, 163, 231, 236, 288, 见 Great Britain, England, Civil War

cold war, 冷战 76

economic aspects of, 经济方面 24, 77, 80, 115, 158, 166, 181, 185, 207, 208, 230, 247

*guerre de course*, 海上行劫战争 249

*guerre d'escadre*, 舰队战争 249

interbaronial, 男爵之间 26

military tactics, 军事战略 150

war materials, 战争物资 44

warships, 战舰 43, 99, 166

War of the Roses, 玫瑰战争 5

Ward, A. W., 沃德, A. W. 170, 189, 255

- Ward, J. R., 沃德, J. R., 170
- Warden, Alexander J., 沃登, 亚历山大 J. 181, 264~265
- Warneton, 瓦尔纳通 255
- Watt, James, 瓦特, 詹姆斯 6
- Wax, 蜡 274
- Weapons, 武器, 见 Armaments
- Weavers, 织工 194, 197, 199, 236, 264, 见 Clothiers
- Weaver's riots (1719), 织工暴动 264
- Weaving, 纺织 49
- Weber, Max, 韦伯, 马克斯 120, 282
- Weinryb, Bernard D., 威恩里博, 博纳德 D. 145
- Weis, Eberhard, 韦斯, 埃伯哈德 201
- Weisser, Michael, 韦斯尔, 迈克尔 180~181
- West, the, 西方, 见 Europe, western
- West India Company, 西印度公司, 见 Dutch West India Company
- Western Hemisphere, 西半球, 见 America
- Westminster, 威斯特敏斯特 95
-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 16, 45, 197, 231, Peace of (1648), 和约 228, 250
- Whales, 鲸 39
- Wheat, 小麦 13, 15, 22, 28, 30, 40, 46, 52, 56, 77, 87, 111, 131~134, 138~139, 145, 151~152, 161~162, 180, 182, 186~187, 231, 237, 254, 261~262, 267
- Whigs, 辉格党 67, 80, 94, 114, 122, 187, 246~248, 283, 285~286, 见 Great Britain
- Whiskey, 威士忌 141
- White Mountain, Battle of (1620), 白山战役 139, 231
- White Sea, 白海 274
- Wiener Orientalisch Handelskompagnie, 维也纳东方贸易公司 234
- Wiese, Heinz, 威赛, 海因茨 133
- Wiles, Richard C., 威尔斯, 理查德 C. 94
- William II (of Orange), Stadholder, 奥兰治的威廉二世 24, 61, 246, 248
- William III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威廉三世 (英国) 115, 246, 250
- Williamite wars, 国王威廉之战, 见 King William War
- Williamson, J. A., 威廉姆森, J. A. 79
- Wilson, Charles Henry, 威尔逊, 查尔斯·亨利 27, 39~46, 50~51, 56, 59, 63, 66~67, 78~80, 82, 84, 91~92, 94~97, 99~100, 102~107, 109, 111, 115~116, 119, 122, 151, 246, 251, 258, 260, 263~264, 268, 274~277, 279~281
- Windmills, 风车 40, 163
- Wine (growing), 酒 13~14, 25, 82, 84~85, 139, 141, 145, 152, 161, 187, 198, 262, 276
- Wirtschaftsherrschaft, 集中化的理性

- 管理的农场采邑 201, 225, 见 *Grundwirtschaft, Gutswirtschaft*
- Wisselbank van Amsterdam, De. 58, 275, 见 Banking
- Wittman, T., 威特曼, T. 145
- Wittrock, G., 维提洛克, G. 213
- Withers, John, 威瑟斯, 约翰 275
- Wladyslaw IV (of Poland), 拉蒂斯洛四世 143
- Wolański, Marian, 沃兰斯基, 玛丽安 235
- Wolf, Siegmund A., 沃尔夫, 西格蒙德 A. 152, 226
- Wood, 树林 15, 40, 43, 99~100, 133, 162, 210, 237, 240~241, 259, 263, 272, 274
- Wool, 羊毛 13, 42~43, 91, 199~200, 202, 235, 254, 264~266, 268, 273, 见 Textiles
- Woolf, Stuart J., 伍尔夫, 斯图亚特 J. 82, 201~202
- Woollens, Act of 1699, 1699 年毛织品法 241
- Workers, (wage~), 工人(工资收入者) 16, 28~29, 45, 63~64, 92~94, 114, 116, 138~140, 149, 151~152, 154~156, 162, 167, 172, 174~175, 182, 193~195, 199, 202, 210, 235, 260, 289, 见 Classes, lower; Laborers  
skilled, 技工 66, 93~94, 194, 241
- World - economy, 世界经济体 7~9, 17~19, 21, 23, 25~29, 31, 34, 45~49, 52, 54, 57, 64~65, 67, 70~71, 75, 82, 84, 90~92, 96~97, 99, 101, 103~104, 108~110, 112~114, 119, 122~123, 129~131, 134~135, 137, 139~143, 147~148, 150, 152, 156~158, 167~168, 175, 179~180, 182, 185, 188, 190, 193, 196, 199, 204, 208, 210, 218~219, 221, 231~232, 234, 236, 239~240, 244, 249, 251, 260, 262, 267, 269, 272, 274, 280, 284, 289, 见 Capitalism; Core; Labor, division of; Payments, system of; Periphery; Semiperiphery
- World - empire, 世界帝国, 见 Empire, world - empire
- World market, 世界市场, 见 Trade (world)
- World - system (modern), 世界体系 7~8, 19, 25, 29, 31~33, 69, 218
- Wrede, Karl Theodor, Prince, 弗雷德, 卡尔西奥多, 普林斯 215
- Wright, William E., 赖特, 威廉·E. 231, 235
- Wrigley, E. A., 里格利, E. A. 76, 83, 104
- Württemberg, 符腾堡 199
- Wüstungen, 被遗弃的村庄 226
- Wyckoff, V. J., 威科夫, V. J. 165
- Wyczanski, Andrzej, 威斯让斯基, 安德烈斯 131

## Y

Yarmouth, 雅茅斯 39  
 Yates, Frances, A., 耶茨, 弗朗西丝  
 A. 32  
 Year of Disaster, 灾年 79,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Year of the Miracle, 奇迹之年 80,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Yeomen, 自耕农, 见 Farmers, yeoman  
 Yerba mate, 巴拉圭茶 150  
 Yernaux, Jean, 耶尔劳克斯, 让 209  
 Yorkshire, 约克郡 39  
 York, Frederick, Duke of, 约克, 弗雷德里克公爵 251  
 Ypres, 伊普尔 255

## Z

Zacatecas, 扎卡提卡斯 152, 174

Zagorin, Perez, 扎戈林, 佩雷 121  
 Zavala, Silvio, 扎维拉, 西尔维奥 154  
 Zeeland, 泽兰 37, 51, 62, 见 Netherlands (northern)  
 Zhukov, E. M., 茹科夫, E. M. 7  
 Zientara, Benedykt, 兹安特拉, 本尼迪克特 138  
 Zimányi, Vera, 齐曼伊, 薇拉 131, 134  
 Zollner, Erich, 左尔勒, 埃里希 232 ~ 233  
 Zones, economic, 经济区, 见 Labor, division of  
 Zrinyi, Miklós, 兹雷伊, 米克洛什 142 ~ 143  
 Zurich, 苏黎世 14, 200  
 Zytkowicz, Leonid, 朱特克威齐, 罗纳德 132, 134 ~ 135, 141

本书在国外学巨分类

译为法、德、意、西、葡、韩、

匈、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日本等国

文字出版，还出版了布蕾尔盲文版。●本书论

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即现代世界体系的

起源与发展的历程。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欧洲

的部分地区，后来不断扩展，逐渐把世界其他一些地

区纳入其中，直至覆盖全球。●凡是研究 14 世纪

以来世界史的学者，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学者，

研究第三世界的发展学家，包括研究发展经济学、

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战略学的学者，对

沃氏的观点不论赞成与否，都将在自己的著作中

引述和讨论他的观点。●沃氏在本书（中文版）

序言中认为：21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将让位于超越的体系（一个或多个），我们

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

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

9 787040



20.00